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张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 2版.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

ISBN 7-01-004018-4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6418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十九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23.375 插页 5

字数:586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01-004018-4



9 787010 040189 >

ISBN 7-01-004018-4 定价:43.00 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9 年 10 月至 1860 年 3 月所写的著作。

19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欧洲度过了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反动时期,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开始出现新高涨。1857—1858 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这一新高涨的到来起了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 1857—1858 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有一种急迫的、也可以说是革命的性质。”(见本卷第 153 页)在德国和意大利,争取国家统一的任务又尖锐地提上日程。德国的工人运动再次活跃起来,意大利人民举行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在法国,人民对波拿巴反动专制制度的不满日益强烈。在英国,工会运动取得更大发展,英国工人阶级重新掀起争取国会选举制度改革运动。在俄国,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斗争如火如荼。这一时期俄、法、普、奥等国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也愈演愈烈。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作为工人阶级领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制定适应当时形势的革命理论和斗争策略,为聚集、团结和壮大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为创建一个能肩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重任的无产阶级政党准备条件,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本卷发表的著作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

本卷的主要部分是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他撰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回击1859年12月出版的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福格特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议员,帝国五摄政之一。他在这本小册子里不惜歪曲事实,大肆造谣,对马克思及其战友们散布大量恶毒的谎言,对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肆意诽谤。德国资产阶级报刊和工人运动的敌人也利用这本小册子来诋毁共产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于福格特挂着民主派招牌,还享有自然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声誉,他的言论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险性。为了维护和巩固共产主义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让广大群众了解党的事业的崇高和纯洁,了解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和现在的活动、他们的道德品质、革命胸怀和理想追求,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准备革命力量和扩大群众基础,马克思毅然决然地对福格特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他的阴谋和谎言。马克思在1860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和1860年2月23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阐明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指出:“福格特对我的攻击……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以及俄国一波拿巴主义恶棍对全党的坚决打击。因此应该予以坚决的回击。”同福格特之流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了揭穿福格特的造谣诽谤,马克思研究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政治史和外交史,并作了大量摘录。他专程去曼彻斯特拜访恩格斯,在他那里查阅有关材料。他还四处发信,收集有关资料。在对大量材料进行严格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他写成了《福格特先生》一书,于1860年12月出版。

在《福格特先生》这一论战性著作中，马克思针对福格特的歪曲捏造，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历史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真情实况。在本书第四章《泰霍夫的信》中，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阐述了同盟活动的历史条件、同盟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同盟的组织机构和民主制度、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对同盟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同盟的关系以及他们受同盟委托撰写《共产党宣言》的经过，等等。马克思针对泰霍夫信中对《宣言》思想的曲解，阐述了资产阶级统治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指出：“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从而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政治统治，无论对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来说，或者对创造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来说，都是基本的条件。”（见本卷第149页）。在该章和第三章《警察作风》中，马克思还叙述了1848—1849年革命后为重新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所进行的活动以及同盟内部与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冒险主义所作的斗争。马克思强调指出，这个宗派集团无视客观规律和现实形势，主张立即发动革命，采取冒险密谋的策略，“想把同盟卷入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革命儿戏中去”（见本卷第138页）。马克思还以1852年科隆审判案为例，揭露普鲁士警察国家、德国各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革命的流亡者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采取的残酷迫害、阴谋破坏等卑劣手段。这些论述为研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材料和指导线索。

马克思在本书中用了大量确凿的事实对福格特的真实面目作了全面揭露。在《福格特和〈新莱茵报〉》这一章和其他有关章节中，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期间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福格特作为左翼民主派领袖在革命期间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典型的怯懦和软弱，向大资产阶级妥协投降。

以福格特为代表的民主派企图“把政治运动看做投机勾当或资金来源”(见本卷第167页)。在流亡瑞士期间,诬指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警察有联系的福格特,本人却干了警探干的勾当,充当瑞士反动当局迫害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的帮凶。

马克思在本书第八章《达一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第九章《代理机构》和第十章《庇护人和同谋者》中着重揭露了福格特充当波拿巴代理人的反动面目。马克思剖析了1859年3月福格特所出版的《欧洲现状研究》,揭示了他的著作在内容和风格上同法国官方报纸《通报》和巴黎出版的宣传波拿巴主义的小册子如出一辙,指出他的言论正符合他的主子们的需要,企图在思想上影响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社会舆论,为拿破仑第三推行他的投机冒险的对外政策鸣锣开道。福格特在书中还替波拿巴涂脂抹粉,吹捧他是农民和士兵的皇帝。1859年6月福格特在德意志工人协会洛桑盛会上又吹嘘波拿巴受到极大多数巴黎工人的拥护。马克思根据种种事实断定福格特同波拿巴集团有勾结,是波拿巴集团的“传声筒”,是波拿巴雇用的代理人,是靠“法国食槽”来养活自己的。1871年拿破仑第三垮台后,法国政府公布了皇室秘密费用开支,其中列有福格特在1859年8月领取4万法郎的材料,这确凿地证实了马克思的上述判断。

马克思在揭露福格特反动面目的同时,广泛地全面地揭露并抨击了法国的波拿巴主义。波拿巴统治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当时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之一。波拿巴主义虽然产生于法国,却是一种国际现象。第二帝国的势力遍及全欧洲,有不少小国的政府追随它的政策;一些国家如撒丁、普鲁士等的统治阶级都表现了波拿巴主义倾向。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波拿巴主义看做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之一。

马克思在《硫磺帮》等章中援引他在 1852 年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论述对波拿巴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揭露,指出波拿巴主义通过实行在各阶级之间看风使舵的政策来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利用军队、警察和官僚对内进行专制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马克思还揭露了波拿巴集团的种种卑劣的政治手法:讹诈、收买、对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玩弄两面派手法、用小恩小惠拉拢某些社会阶层,甚至利用刑事犯罪分子,等等。在《达一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这一章中,马克思针对福格特关于 1859 年的意大利战争的蛊惑宣传,揭露了波拿巴集团对外政策的反动目的。他指出,第二帝国统治集团的财政状况和内外政策在 50 年代末已走上绝路,指望用发动对奥地利的“局部”战争的办法摆脱困境。这场战争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统治,而是通过这场战争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把意大利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扩大法兰西版图并阻止意大利革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还揭穿了波拿巴集团玩弄“民族原则”的骗人把戏,剥去了它冒充“民族的保卫者”的伪装。

马克思还抨击欧洲其他反动势力,特别是俄国。马克思历来认为,沙皇俄国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支柱。而挂着民主派招牌的福格特不仅对法国和拿破仑第三阿谀奉迎,还把俄国“看成是东方的‘争取自由’和‘人民和民族的发展’的‘朋友’”(见本卷第 207 页),把亚历山大二世称做“好心的沙皇”(见本卷第 208 页)。欧洲反动势力的这两个主要代表在他眼里竟成了联手“解放”欧洲的“天使”。对此,马克思历数了沙皇俄国的侵略罪行:和欧洲其他强国共同瓜分波兰,参与破坏或镇压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威胁德国,染指多瑙河两公国,排挤和削弱土耳其帝国以取而代之,等等。对于备受福格特称赞的俄国“农奴解放”,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按照俄国

政府的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略力量增强百倍。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完善专制制度……”(见本卷第208—209页)。同时马克思也谴责了英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帕麦斯顿在意大利问题上与路易·波拿巴相勾结并对俄国采取姑息态度。

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抨击是同他和恩格斯所主张的以革命民主方式实现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的斗争任务紧密相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的法国及其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是德意两国实现民族统一和民主改革的主要障碍。早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他们就坚决主张通过革命的道路自下而上地实现德国的统一。在《福格特先生》中,马克思又重申了自己的主张。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揭穿福格特的假民主主义面目时,还批判了庸俗民主派。从1848—1849年革命时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经历了分化和蜕变的过程。德国国内的民主派,有相当一部分人与封建大资产阶级妥协,甚至成为德国反革命的帮凶。流亡国外的民主派,有许多人成了庸俗民主主义者,其中像福格特之流还成了波拿巴集团的附庸。马克思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和原则立场,使之不受庸俗民主主义的影响,对庸俗民主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本书第四章《泰霍夫的信》和第十二章《附录》中,他以辛辣的笔触嘲笑了维利希、金克尔、席梅尔普芬尼希、卢格、戈克等人的革命空谈,他们的狭隘、鄙俗和相互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在谈到金克尔的“革命公债”冒险计划时,马克思指出,他们的冒牌革命活动,实质上迎合了反革命势力的心意。

马克思在本书第九章《代理机构》和第十章《庇护人和同谋者》中,把资产阶级报刊扮演的反动角色刻画得淋漓尽致,指出资产阶级

报刊的任务就是兜售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和攻击、诋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波拿巴派报刊的卖身投靠和毫无原则,指出这些报刊的代表人物“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见本卷第 292 页)。马克思也抨击了英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报刊,认为英国自由派报刊《每日电讯》是集社会脏物之大成的一个“纸制的藏污纳垢大中心”(见本卷第 329 页)。马克思对这家资产阶级报纸的评价,当然也适用于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的许多同类报刊。

马克思在第十一章《一件诉讼案》中公布了他控告柏林《国民报》对他进行诽谤的案件的全过程。1859 年 12 月福格特的小册子出版后,1860 年 1 月,柏林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就以社论的形式转述了该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为此马克思通过他的法律顾问在柏林对该报编辑察贝尔提出控告。察贝尔和福格特沆瀣一气,对马克思肆意诽谤。马克思列举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把‘民主主义者’察贝尔企图对我在流亡者中间的地位和我在国外的‘活动’所进行的下流无耻的诬蔑,奉还诬蔑者”(见本卷第 353 页)。柏林的法院以马克思的起诉理由不足予以驳回。马克思就此事对普鲁士司法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充满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这部著作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马克思在书中旁征博引,采用了文艺作品中的大量形象语言和文学典故,把科学的论证和艺术的刻画结合在一起,使得他对福格特之流的揭露和批判深刻而富有感染力。恩格斯在 1860 年 12 月连续几次写信给马克思,盛赞这部著作写得非常出色,信中说:“我越读越喜欢”,“这确实是你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

本卷除《福格特先生》和与此有关的马克思给几家报纸编辑部的信或声明外，还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期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评述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英、法、德等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欧洲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

马克思在《法国的状况》一文中评述了法国的经济状况。由于路易·波拿巴疯狂地扩军备战以及上层统治阶级恣意挥霍，法国民族的生产力已不堪重负。工人阶级的状况明显恶化，农业衰落，农民日益破产。波拿巴对法国社会所作的一切美好许诺，都不过是欺人之谈。在《英国对入侵的恐慌》中，马克思同样谈到波拿巴的困难处境。为了摆脱困境，波拿巴“只有一条出路——发动新的战争”（见本卷第27页）。而在确定下一次进攻的对象时，他只能在普鲁士和英国中间选择。由此产生了英国人对法国入侵的恐慌。在《德国的动荡局势》一文中，马克思就黑森选帝侯国的宪法危机分析了德国国内的局势，指出一切纷争的根源在于德意志两大邦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在德国的霸权；如果德国人民不能及时地反对“自己的两大家族”，必将爆发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内战。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问题历来十分关注，对中国人民一贯寄予极大同情。在《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妨碍英国对华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见本卷第20页）；而英国资产阶级往往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中国当局设置人为障碍，企图以此为借口要求政府发动战争来达到其掠夺的目的。马克思表示相信，英国人无论在当时和将来都不能像征服东印度那样征服中国。马克思的另一篇文章《英国的政治》也是围绕中国问题而写的。1859年6月，英法兵舰蛮横地闯入中国大沽口，炮轰炮台，并以陆战队强行登陆。他们的野蛮

行径遭到中国军队猛烈的反击,英法侵略者受重创。英国帕麦斯顿政府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伙同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府,筹划派遣一支新的英法远征军攻打中国(即随后的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马克思在文中严厉谴责英国政府在中国不断制造事端,并列举具体历史事件,说明英国对弱小国家一贯采取殖民主义的炮舰政策。为了推行这种政策,帕麦斯顿政府“在对中国人的关系上把战争的所有国际法准则破坏无遗……在对英国议会的关系上不遵守宪法准则”(见本卷第51页)。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主要是论述军事问题的。在《德国的军事改革》一文中,恩格斯分析了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的优劣,认为法国的军事组织为全欧之冠,而奥地利军队屡屡战败的原因在于它的组织不适合于实战的需要。在文章中,恩格斯从普鲁士军队的服装、编制、火器的口径等方面论述了普鲁士军队改革的必要性。他批评德国上层人士建立军队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检阅,认为如不改革,在德法两国未来的冲突中,德国将遭遇“一个新的耶拿”,重蹈当年普鲁士大败于拿破仑的覆辙。在《对摩尔人的战争》和《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中,恩格斯评论了1859年11月至1860年3月西班牙对摩洛哥发动的殖民战争,对双方的军事行动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了西班牙人在作战中的种种失误,描述了摩尔人在反侵略战争中的顽强抵抗精神。尽管西班牙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却无法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被迫于1860年3月签订了和约。在《论线膛炮》一文中,恩格斯指出了线膛炮较旧式滑膛炮优越之处,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详细考察了火炮改进的过程,对军事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给予高度的评价。

本卷还收录了1860年4月出版的恩格斯的小册子《萨瓦、尼斯

与莱茵),它是先前出版的另一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这两篇著作同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萨瓦与尼斯》一文构成统一的整体。恩格斯在文中一方面揭露了波拿巴法国不能容忍在它的身边有两个独立、统一、强大的邻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存在,对它们抱有领土野心,因此千方百计破坏它们的统一进程;另一方面系统地揭露了波拿巴法国兼并萨瓦与尼斯的图谋。北意大利战争结束后,法国根据与撒丁王国达成的协议要求占有萨瓦与尼斯,并抛出反动的“自然疆界论”来为它所提出的领土要求找根据,为它的侵略政策辩护。恩格斯借助他在军事科学、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渊博知识,证明法国兼并萨瓦与尼斯是没有道理的。恩格斯指出了这两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说明“吞并萨瓦和尼斯的计划无非是要在意大利和瑞士建立法国的统治”(见本卷第 68 页)。至于“自然疆界论”,恩格斯写道:“所谓法国自然疆界主要是指莱茵河……法国重提自然疆界论,是对德国的直接威胁”(见本卷第 475 页)。恩格斯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指出俄国是法国这一整套阴谋的帮凶。在 19 世纪上半叶,俄国曾两次与法国结成同盟,每一次都是以瓜分德国为其目的或基础。就是在当时,德国仍然受到法俄同盟的威胁。因此,恩格斯认为,只有把革命民主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开展反对以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为首的欧洲反动君主势力的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意大利和德国重新恢复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同时,恩格斯也看到了俄国国内正在形成的革命局势,他把奋起反抗沙皇制度的俄国农奴看成是欧洲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本卷共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 24 篇,它们原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13、14、15 各卷。恩格斯《论线膛炮》一文

的第四部分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8卷新收进的。本卷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8卷重新作了校订。

参加本卷译文译校工作的有：李成毅 高叔眉
杨彦君 胡慧琴 沈红文 顾锦屏

参加编辑资料工作的有：章 林 卢晓萍
沈 延 章丽莉 刘洪涛 李 楠 朱 羿
胡永钦 朱 毅 蒋仁祥

全卷译文由李成毅审定

目 录

前言	1—11
卡·马克思 *给《总汇报》编辑的信	3—4
卡·马克思 对和平的激进看法	5—8
卡·马克思 关于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 诉讼	9—12
卡·马克思 声明	13—14
卡·马克思 德国的动荡局势	15—19
卡·马克思 对华贸易	20—24
卡·马克思 英国对入侵的恐慌	25—27
弗·恩格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	28—34
卡·马克思 法国的状况	35—40
弗·恩格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	41—46
卡·马克思 英国的政治	47—52
卡·马克思 法英之间的新条约	53—57
弗·恩格斯 德国的军事改革	58—63
弗·恩格斯 萨瓦与尼斯	64—68
卡·马克思 福格特先生	69—430
前言	73

一、硫磺帮	76
二、制刷匠帮	88
三、警察作风	99
1. 自供	100
2. 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	102
3. 舍尔瓦尔	108
4.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119
5.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洛桑盛会(1859年6月 26日和27日)	123
6. 其他	128
四、泰霍夫的信	132
五、帝国摄政和普法尔茨伯爵	161
六、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164
七、奥格斯堡战役	174
八、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199
九、代理机构	261
十、庇护人和同谋者	296
十一、一件诉讼案	348
十二、附录	392
1. 席利被驱逐出瑞士	392
2. 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	399
3. 舍尔瓦尔	400
4.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401
5. 诽谤	409
6. 老鼠与青蛙之战	411
7. 反对帕麦斯顿的论战	414
8. 安·谢尔策尔先生的声明	414

9. 刊登在 1859 年 5 月 27 日《自由新闻》上的布林德的文章	416
10. 奥尔格斯先生的信	416
11. 反对卡·布林德的通告信	417
12. 费格勒的 Affidavit	418
13. 维厄的 Affidavit	419
14. 诉讼文件摘编	420
15. 丹屠出版的小册子	423
16. 补遗	426
(a) 卡尔·福格特和“水泥”公司	426
(b) 科苏特	426
(c) 埃德蒙·阿布(1860 年的普鲁士)	429
卡·马克思 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	431—433
弗·恩格斯 萨瓦、尼斯与莱茵	435—484
一	439
二	448
三	464
四	474
卡·马克思 *声明	485—487
卡·马克思 给《每日电讯》编辑的信	488—489
卡·马克思 英国的预算	490—494
卡·马克思 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信	495—497
卡·马克思 *反对爱德华·梅因的声明	498
弗·恩格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	499—504
弗·恩格斯 论线膛炮	505—521
一	505
二	510

三	515
四	519
注释	523 — 593
人名索引	594 — 655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656 — 661
文献索引	662 — 696
报刊索引	697 — 711
地名索引	712 — 725

插 图

1859 — 1860 年摩洛哥战争图	29
卡·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 1860 年伦敦第 1 版的扉页	71
卡·马克思校改的《福格特先生》一书的校样	389
卡·马克思的《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的第 1 页	427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 年柏林版扉页	437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59年10月—1860年3月



卡·马克思

* 给《总汇报》编辑的信¹

1859年10月19日

阁下：

我参加德国报刊工作时，攻击过奥格斯堡《总汇报》，《总汇报》也攻击过我。

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这当然不会妨碍我尽力帮助它。附上的文件，在伦敦这里，是具有司法文件作用的^①。不知在奥格斯堡是否如此。

我之所以要取得这份文件，是因为布林德不肯承认他向我和其他人说过的话，而我把这些话又告诉了李卜克内西，他对匿名传单^②里的揭露也就毫不怀疑了。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① 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187—189页。——编者注

② 卡·布林德《警告》[传单]。——编者注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0 月
19 日

载于 1859 年 10 月 27 日奥格斯
堡《总汇报》第 30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对和平的激进看法²

1859年10月20日于巴黎³

法国和奥地利的全权代表在苏黎世签订的和约,就其要点而言,不过是维拉弗兰卡条约⁴各条款的翻版。由于有关最后和约的谈判占用的时间几乎比在曼图亚城下突然停止的军事行动的时间长一倍,很多轻信的人便以为,和平缔造者们之所以裹足不前,是因为路易·波拿巴抱有某种深思熟虑的计划。他们说,波拿巴想给意大利人充分的行动自由,允许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以便在意大利的统一巩固起来之后,这位法国解放者能够体面地摆脱他向弗兰茨-约瑟夫作出的难堪的让步和承担的义务而诉诸**既成事实**这一至高无上的力量。政治协定也不能摆脱私人契约可能遇到的那种偶然事件的影响,按照**拿破仑法典**⁵的规定,一旦受到**无法预见的情况**^①的阻挠,这种契约即告失效。持这种见解的人又一次暴露了他们不仅对

① 原文是 force majeure,是从拿破仑法典第 1148 条中摘引出来的话,这一条宣称:“如果由于无法预见的情况或偶然事件妨碍了债务人,使他不能履行他应尽的义务,或者做了禁止他做的事情,不得向其追索任何赔偿。”——编者注

他们心爱英雄的性格无知得可怜,而且对于从“红衣主教”^①到十二月英雄⁶以及从督政府⁷的“恶棍”到1848年的“蓝色分子”⁸的法国传统外交也无知得可怜。这种传统外交的第一条原则宣告:法国的首要义务是阻止在它周边成立强大的国家,因而它无论如何都要维持意大利和德国的反统一的宪法。明斯特和约⁹和坎波福米奥和约¹⁰都是在这同一政策的指使下缔结的。无限期拖延下去的苏黎世谈判所追求的真正目的,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了。如果路易·波拿巴企图在7月初,就是说,在他自己的军队正陶醉于胜利、意大利人民正热情澎湃、法国正妄诞地以为自己在家里忍受奴役是为了把自由赋予其他民族,并以此安慰自己受伤的自尊心的时候,来实现维拉弗兰卡条约的条件,那么,这位荷兰的僭位者¹¹就会助长狂暴的敌对势力,而对付这种势力要比攻破明乔河和阿迪杰河之间的坚固四边形要塞区¹²困难得多。这样他也许就不能依靠自己的军队,也许就会促使意大利行动起来,而且很可能就会为巴黎起义发出信号。要从为了适应当时情况而演出的崇高传奇剧转到事先设下的骗局的细枝末节上去,他所需要的不外是时间了。法军仍然留驻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但是它已经从解放军变成占领军了,而且它和当地居民的日常关系远不是友好的,因为,像常见的那样,密切的接触产生厌恶感。从法国方面来讲,它已从短暂的睡梦中醒了过来,它对出现欧洲同盟这个危险感到震颤,它在反复思虑:它丧失了旧的军队同时又欠下了新的国债;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信任拿破仑观念。至于意大利本身,它的状况我们应该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官方的声明来判断。我们看到,加里波第没有得到足够的钱来替他的志愿军购买武器,¹³虽然这

① 黎塞留。——编者注

支军队的力量和独立战争¹⁴期间汇集在普鲁士旗帜下的人群比较起来几乎是滑稽可笑的,而当时普鲁士的领土比伦巴第还要小。

马志尼本人在给维克多-艾曼努埃尔的信中¹⁵承认,全民族的热情洪流正迅速地在各省的水洼里冻结,恢复原状的条件正迅速地成熟。诚然,在维拉弗兰卡条约和苏黎世和约之间的沉闷间歇期,在各公国和罗马涅上演了好几出由皮埃蒙特一手导演的大型政治历史剧¹⁶;尽管全欧洲的所有下等楼座上纷纷响起了喧闹的掌声,但是这些政治魔术师所玩的把戏仅仅对自己的隐蔽敌人有利。托斯卡纳、摩德纳、帕尔马和罗马涅的居民被欣然应允建立临时政府,把他们已逃亡的君主们的矮小宝座掀倒,并宣布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为被选举的国王。但同时,他们接到了严格的训示:应满足于这些表面文章,要保持平静,其余一切都应听从法国太上皇的旨意,这位太上皇正在苏黎世安排他们的命运并且对热情的奇想、民众激情的迸发和一切革命的越轨行为特别不满。他们不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自己强有力的行动上,而应寄托在自己有节制的举止上,不应寄托在自己力量的强大上,而应寄托在外国暴君的仁慈上。把一份地产从一个所有者手中转交到另一个所有者手中,也不会比中意大利从外国的枷锁下转到民族自治那样平静了。在内政方面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民众鼓动都被完全镇压下去了,新闻出版自由被取缔了,也许,看起来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没有经过革命的考验而收获了革命的果实。由于这一切,意大利的政治气氛大大消沉下来,以致路易·波拿巴能够提出他事先拟就的决议,而任凭意大利人去发泄他们无力的愤慨。一支法军驻扎在罗马,另一支法军驻扎在伦巴第,一支奥军从蒂罗尔高地进行威胁,另一支奥军占据着四边形要塞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在皮埃蒙特统治者如此成功地抑制了人民的热情的情况

下,意大利目前没有多少希望了。至于苏黎世和约本身,我们特别提请注意条约初稿⁴中所没有的两个条款。根据这两个条款中的一条,撒丁担负了 25 000 万法郎的债务,其中一部分应偿还给弗兰茨-约瑟夫,一部分是由于伦巴第一威尼斯银行的五分之三债务转到了它的身上。除了在克里木远征¹⁷和最近这次意大利战争¹⁸期间举借的债款(路易·波拿巴在几天前提出的一笔数目不大的作为他个人的武装保护费的期票还不算在内)而外,再加上 25 000 万法郎的新债款,撒丁在财政繁荣方面很快就会和它所憎恶的仇敌拉平。我们所提到的另一个条款规定:

“没有参加最近这次战争的意大利各个独立国的疆界如需更动,必须征得参加建立这些国家并保障它们存在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同意。”同时,“托斯卡纳、摩德纳和帕尔马的君主们的权利则由缔约大国另行规定。”

这样,扮演完了分配给自己角色的各意大利临时政府,现在被极其轻蔑地忽视了,而被它们抑制在那样寻常的消极状态下的居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到维也纳条约¹⁹缔造者的大门口去乞讨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0 月
20—21 日

载于 1859 年 11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8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卡尔·福格特对 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²⁰

1859年11月7日于伦敦

我从汉堡一位朋友寄给我的《自由射手》第132号中看出，**爱德华·梅因**认为他有责任过问**福格特**案件，在其中发挥自己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逻辑的马力，或者更确切些说，他的逻辑的驴力，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个绝妙的论断上：既然他同**布林德**的关系很好，而**布林德**却没有寄给他匿名传单^①的副本，可见我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原本一定是**假货**。由于他还有一点儿小聪明，他自然避免直截了当这样说；他是转弯抹角说的。

顺便说一句，我希望**爱德华·梅因**先生拿出证据来，说明我的时间毫无价值，可以用攻击德国庸俗民主派这样的事情把它浪费掉。

从1850年底起，我就同伦敦的德国流亡团体断绝了一切关系，维系这个团体的惟一基础是同我作对，在我抽去这一基础之后，这个

① 卡·布林德《警告》[传单]。——编者注

团体就彻底瓦解了。由于像梅因这样一些代理人大卖力气，例如他公开鼓动支持金克尔派反对卢格派，瓦解过程就特别加速了。那以后的9年中，我一直是《纽约论坛报》的撰稿人，这家报纸有20万订户，读者范围大致和《自由射手》相当。我是否有一次提到过哪一位德国庸俗民主主义者？我是否用片言只语回敬过对我的卑鄙攻击？虽然过去5年中，德国报刊，特别是美国的德文报刊，曾满纸是这些英雄好汉对我的攻击。

不错，这期间我攻击过爱德华·梅因先生有责敬仰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但没有诽谤过他们。例如，我攻击过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帕麦斯顿勋爵。由于不仅英国不同派系的报纸——从宪章派²¹的《人民报》到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自由新闻》都刊载了我的“诽谤”，而且伦敦、设菲尔德和格拉斯哥没有我的参与就把它翻印了至少15 000份单行本，我就更罪不可赦了。此外，我在这时期还揭露过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最初是在我的德文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这一著作在德国边境各处遭到没收，但在美国流传很广，当时伦敦的宪章派机关报刊登过它的摘要²²。我直到今天还在《论坛报》上“诽谤”“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波拿巴，分析他的财政制度，他的外交，他的作战方法，他的拿破仑观念。路易·波拿巴给《纽约时报》寄过一封公开信，感谢它对这些“诽谤”攻击进行了反击。7年前，我在《揭露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甚至揭露了“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施梯伯，该书在巴登—瑞士边境被销毁了。这一点，梅因先生怎么也会谅解我的。今天这种诽谤是符合民主的，因为“得到最高当局的恩准”。除了爱德华·梅因先生的报纸^①以

① 《自由射手》。——编者注

外,约瑟夫·杜蒙先生在科隆的报纸^①也证明我常常弄错时间。1848年和1849年,当我敢于在《新莱茵报》上出面维护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民族时,有谁比约瑟夫·杜蒙先生在科隆的报纸上挑剔得更厉害、叫嚣得更凶呢?不错,当时还没有一个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把“自由主义的”恩惠赐予各民族。至于《新莱茵报》过去的编辑们始终忠实于自己的观点,这是连从前的约瑟夫·杜蒙先生、现在的朱泽培·德尔蒙泰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中也看出了的。对于“狭义的”爱德华·梅因式的民主,我在经过9年的不加理睬之后,只不过有两次(而且是最近)打破了沉默:一次是反对科苏特,另一次是反对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先生。的确,我在《人民报》上对金克尔在《海尔曼》中的美学宏论从纯粹语法观点提出过一些意见。除了那篇标题为《偷梁换柱》的论维拉弗兰卡和约的文章²³以外,这就是我给《人民报》写过的全部东西。但是在爱德华·梅因看来,一个“好的民主主义者”似乎有权破坏句法的“专横”规则,正如有权从共和主义阵营转向保皇主义阵营一样。

在这封信的结尾,我所处的窘境同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开头所处的窘境正好相反。他是想从有到无,而我则想从无到有,即从爱德华·梅因到福格特案件。为了不多费笔墨,现在向卡尔·布林德提出以下问题:

(1)5月9日在乌尔卡尔特所组织的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有没有把内容同《警告》这个传单完全相符的关于福格特的消息告诉我?

(2)布林德是不是在5月27日伦敦的《自由新闻》上发表过一篇

① 《科隆日报》。——编者注

题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匿名文章，内容基本上同传单《警告》一样，只是删掉了福格特的名字？

(3)布林德有没有委托别人在伦敦索霍区利奇菲耳德大街菲·霍林格尔先生那里自费印刷过上述传单？

不管梅因民主派怎样支吾搪塞，也不管伟大的陌生人、“卓越的法学家”约瑟夫·杜蒙先生是否乐意，一切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是谁让印刷《警告》这个传单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只是因为翻印这个传单而受到控告。福格特认为必须在全世界面前洗清的只是这个传单上对他的指控。在印发传单的人面前，正如罗伯特·皮尔说的：摆着三条路。或者他是有意撒谎。我不认为卡尔·布林德会这样。或者他后来确信，使他有权印刷这个传单的材料是伪造的。那他更应该加以解释。最后，或者他手中有证据，但出于个人考虑，他想暗中了结这全部事情，并且用宽宏大量的谦逊精神忍受那些扔向我而不是扔向他的臭鸡蛋。但是，在为了弄清有名无实的德国帝国摄政和现实的法国皇帝之间的关系这样重要的事情上，难道不应该把一切个人考虑都置之度外吗？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1 月
7 日

载于 1859 年 11 月 19 日《改革
报》第 139 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声 明²⁴

福格特很了解自己的同伙，他玩了一套很巧妙的手法，把揭露他的人的来源从所谓民主营垒转嫁到社会主义营垒。但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对助长这种混淆丝毫不感兴趣，所以不能对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313 号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

(1) 5 月 9 日在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群众大会的讲台上，布林德曾把传单《警告》上对福格特的全部指控告诉过我。这些细节他也告诉过别人，例如弗莱里格拉特。从内容和语言上看，他的口头讲述和印出的传单完全相同，所以一开始便很自然地认定他是传单的作者。

(2) 在 5 月 27 日伦敦的《自由新闻》上登出了一篇题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布林德的匿名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传单《警告》的先声。布林德在这篇文章中说，他认识一些德国的自由派和伦敦的民主派，有人建议他们宣传波拿巴主义以获取“巨额贿赂”。当快要审理福格特的诉讼的时候，《自由新闻》主编多·科勒特先生来找我，他代表布林德请求我不要利用我知道的上述文章出自谁手这一实情。我回答科勒特先生说，我不承担任何义务，我是否保持缄默，更多地取决于布林德的言行。科勒特先生也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

(3)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声明可笑之至。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知道,他印刷传单不标明印刷地点是公然违反了英国法律。所以他擅自给自己造了一个证明,说他同这个小小的过失毫不相干。《人民报》上转载的传单用霍林格尔印刷所还保存的活字版排印,纯属偶然。这样一来,也不用证词,只要把传单同《人民报》转载的传单略加对照,就可以在法庭上证明,传单“出自菲·霍林格尔印刷所”。若是把案件从奥格斯堡移到伦敦,布林德—福格特的全部秘密就都揭穿了。

卡尔·马克思

1859年11月15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1月
15日

载于1859年11月21日奥格斯
堡《总汇报》第325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德国的动荡局势²⁵

1859年11月15日于巴黎³

现在德国人的纷争提上日程了,不管这个纷争在广大群众心目中多么无关紧要,但是它却有可能酿成德国的、甚至是欧洲的灾难。这个为占主导地位的条顿大国提供纷争口实的小国,在合众国的历史上名声很坏。大家知道,英国曾经在德国买了成千上万的受过训练的奴隶,经过大西洋送到自己发生骚乱的殖民地,这批奴隶主要是黑森-卡塞尔提供的,因为黑森-卡塞尔的宗法制选帝侯通常是用自己忠实的臣民去换不列颠的黄金来取得收入。从这个值得纪念的时代起,历任选帝侯和他们臣民之间的关系看来变得越来越敌对了,直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²⁶发出黑森-卡塞尔革命²⁷的信号。这场革命得到现任选帝侯^①的暗中支持,当时他非常渴望同他亲爱的父亲^②分担最高权力的责任。小小的革命为1831年1月5日的黑森宪法扫清了道路,该宪法现在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斗争的主要战斗口号。1850年,这部宪法驱使它们在布龙采尔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战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威廉第二。——编者注

斗,而在路易·波拿巴把“意大利问题”搞成一件惹人厌烦的事情以后,如果情况顺利,这部宪法可能很快促使他研究“德国问题”。为了说明当前的冲突,不妨简略地评述一下1831年的黑森宪法、它所经历的变迁以及使它的命运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争霸野心纠缠在一起的那些事件。

1831年的黑森宪法,抛开它所规定的选举办法,即由各旧有等级(贵族、城市居民、农民)选举代表的方法不谈,可以认为是欧洲曾经宣布过的一部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根本法。没有哪一部宪法对行政机关的权力作过这样严格的限制,使政府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立法机关,并且给司法机关广泛的监督权。为了说明这个奇怪的事实,可以说,1831年的黑森革命实际上是律师、文武官员同各个“等级”中怀有不满情绪的人们协调一致所进行的反对君主的革命。根据宪法第一章的规定,凡是拒绝对宪法宣誓的黑森亲王一律剥夺王位继承权。关于各部大臣的责任的条文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空话,它使代表们能够依靠国家法院来解除任何一个大臣的职务,只要他被认为是犯有哪怕是曲解立法议会的某项决定之罪过。君主被剥夺了赦免权。他既无特权违反政府成员的意志让他们退休养老,也无特权将他们革职,因为他们有权随时向法院上诉。法院有权对有关官员任免奖惩制度的一切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众议院从议员中选出一个常任委员会,组成类似古代雅典最高法院的机构,对政府实行检查和监督,并把违反宪法的官员送交法院审判,即使是下级执行上级命令时违反宪法,也不得例外。于是,政府官员便摆脱了王权的控制。另一方面,法院由于握有对行政机关的一切法令条例作出最后裁定的全权,便成为全能的了。由人民选举的市镇议会议员,不仅应关注本地的,而且应当关注全国的法律实施情况。军官们在服兵役之前必须

宣誓效忠宪法,这样他们在各方面,在对王权的关系上就享有同文职人员完全一样的权利。代议机关只由一院组成,它同行政机关不论发生什么冲突,都有权停止征收一切费用和赋税。

1831年的黑森-卡塞尔宪法就是如此。当今执政君主的父亲威廉第二选帝侯“在各个等级的完全同意下”宣布了这部宪法,并且

“衷心希望它将作为君主和臣民之间和睦一致的牢固纪念碑永世长存”。

接着这部宪法的草案由政府提交给德意志联邦议会²⁸,联邦议会虽然没有作出保证,可是显然把它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了。可以预料,尽管有一切善良的愿望,宪法机器在黑森-卡塞尔也是注定不能顺利运转的。从1832年到1848年,立法议会开会至少不下10届,其中有两届甚至任期没有满就更换了。1848—1849年革命使1831年宪法具有了更加民主的精神:等级选举制废除了,最高法院成员的任命权转交给了立法机关,最后,从君主手中收回了对军队的最高监督权并把它转交给了要对人民代表负责的人——陆军大臣。

1849年,当根据新选举法选出的第一届黑森立法议会开幕的时候,德国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反动;不过,一切都还处在蠢蠢欲动之中。旧德意志联邦议会²⁸被革命浪潮扫除了,而德国的国民议会²⁹连同它那虚有其表的政府也被刺刀推翻了。这样一来,整个德意志联邦的中心便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要求恢复法兰克福的旧议会,那里它的影响始终是占据优势的,而普鲁士则力图建立北方联盟³⁰,想利用和控制这个联盟。有4个德意志王国和巴登支持的奥地利,实际上已设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把旧德意志联邦议会的残余聚集到自己周围,而普鲁士也稍微尝试了一下,在一些较小的邦的参加下在爱尔福特组织联盟议会³¹。不言而喻,受自己的自由主

义立法议会领导的黑森-卡塞尔首先属于奥地利的主要对手，并且是普鲁士的盟友。但是，当选帝侯刚一确信奥地利有俄国的支持，很可能在这场角逐中获胜时，他就抛开假面具，表示赞成奥地利的联邦议会，反对普鲁士的联盟，扶植以声名狼藉的哈森普夫卢格为首的反动内阁上台执政，解散了拒绝表决通过赋税和持反政府立场的立法议会。他企图依仗自己的权威去征收赋税未果，而且在军队、官僚和司法机关中又得不到支持，于是便在黑森-卡塞尔宣布戒严。但是，为慎重起见他溜走了，跑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便在那里受奥地利的直接保护。奥地利以它一手恢复的旧联邦议会的名义派出联邦的一个军去废除黑森宪法，使选帝侯重登宝座。普鲁士方面则被迫表示赞同黑森宪法，反对选帝侯，以便强调它自己对恢复德意志联邦议会的抗议，加紧建立在它自己庇护下的北方联盟的尝试。于是，黑森宪法就成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斗争的口号。当时事态日益危急。联邦军队和普鲁士军队的前卫在布龙采尔附近遭遇，但是，双方都吹了后退号。普鲁士首相冯·曼托伊费尔先生于1850年11月29日在奥尔米茨会晤了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公爵，向他屈膝求和，在有关议会、黑森-卡塞尔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上完全放弃了普鲁士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一切要求。普鲁士作为低头认错的罪人回到了议会。奥地利的一支军队向北海海岸胜利进军，使普鲁士的屈辱又加一等。1831年的黑森宪法自然被不由分说地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最初是戒严法，后来是1852年由哈森普夫卢格一手炮制、经选帝侯稍作更动并由德意志联邦议会订正和批准的极端反动的宪法。这部1852年宪法成了经常使国家和选帝侯之间发生纠纷的缘由，而且无论怎样调解，都是徒劳。新近的意大利事件和随后发生的德国的运动，在普鲁士政府看来，为奥尔米茨失败雪耻，为恢复

自己以往同奥地利的斗争提供了良机。普鲁士知道,1850年曾经使天平倒向奥地利一边的俄国,这一次将会朝相反的方向行动。直到现在角逐双方除了纸上交战以外,还没有任何别的接触。至于说1831年和1852年的两部黑森宪法,那只是它们斗争的口实。这从下面这一简单的情况中就可以看出:奥地利主张根据1831年宪法的条文来修改1852年宪法,而普鲁士则坚持1831年宪法要根据德意志联邦议会的总的(君主制的)原则加以修订后再行恢复。人民和黑森-卡塞尔的议会依靠普鲁士的支持,要求恢复过去的宪法。如果德国人民不在适当时机转过身来反对“自己的两大家族”^①,这一切由利害相关的顾问们从外面操纵的事情,可能会以德国的内战告终。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1月
17日

载于1859年12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07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8卷翻译

① 借用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3幕第1场中的话。原指两个有世仇的贵族家庭。——编者注

卡·马克思

对华贸易³²

过去有个时候,流行一种十分虚妄的见解,以为天朝帝国“大门被冲开”一定会大大促进美国和商业;当时我们根据对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所作的较详尽的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没有可靠根据的。^①我们认为,除我们已证明与西方工业品销售成反比的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为了证实我们以前的论断,现在可以援引题为《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的函件》的蓝皮书³³。

每当亚洲各国的什么地方对输入商品的实际需求与虚拟需求——虚拟需求大多是根据新市场的大小,那里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推算出来的——不相符时,急于扩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正是这种错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拼命支持每一个许诺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对外贸易从

^① 见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编者注

中国当局方面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商界人士眼中能为对天朝帝国施加的一切暴行进行辩护的绝好借口。额尔金勋爵的蓝皮书中所包含的宝贵材料,将会使一切不抱成见的人大大消除这些危险的错觉。

蓝皮书中附有 1852 年广州的一位英国官员米切尔先生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我们现在从这份报告书中摘录一段如下:

“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的商约充分生效至今(1852 年)已近 10 年。每一个预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 000 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在紧靠生产地区之处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老实说,结果就是:经过 10 年以后,贸易部的报表告诉我们,亨利·璞鼎查爵士在 1843 年签订附约³⁴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本身在 1850 年底给我们带来的还要大些!——这是就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论,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惟一问题。”

米切尔先生承认,自从 1842 年条约³⁵订立以来,几乎完全是以白银交换鸦片的中印贸易,已经大大发展。但即使是对于这种贸易,他也还补充说:

“它从 1834 年到 1844 年的发展,与从 1844 年到现在的发展,速度是相同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可以认为它是在条约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从贸易部的报表上,我们看到一件非常突出的事实,即 1850 年底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同 1844 年底相比,几乎减少了 75 万英镑。”

1842 年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作用,这可以从下表看出:

申报价值

	1849	1850	1851	185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棉织品	1 001 283	1 020 915	1 598 829	1 905 321	1 408 433	640 820	883 985	1 544 235	1 731 909
毛织品	370 878	404 797	373 399	434 616	203 875	156 959	134 070	268 642	286 852
其他商品	164 948	148 433	189 040	163 662	137 289	202 937	259 889	403 246	431 221
共 计	1 537 109	1 574 145	2 161 268	2 503 599	1 749 597	1 000 716	1 277 944	2 216 123	2 449 982

现在我们把这些数字与据米切尔说 1843 年为 175 万英镑的中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额比较一下, 就可以看出, 在最近 9 年内, 英国的输出, 有 5 年远远低于 1843 年的水平, 而 1854 年只有 1843 年的 $\frac{10}{17}$ 。米切尔先生首先用一些看来过于笼统而不能确切证明任何具体事物的理由来解释这一惊人的事实。他说: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 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 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 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 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 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 3 年, 而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 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 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重量的 3 倍, 换句话说, 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斜纹布和普通棉布重量的 3 倍。”

没有需求以及偏爱传统服式, 这些是文明商业在一切新市场上都要遇到的障碍。至于斜纹布的厚度和强度, 难道英国和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使他们的产品适合中国人的特殊需要吗? 这里我们就接触到问题的症结了。1844 年, 米切尔先生曾将各种质地的土布样品寄到英国去, 并且注明其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 按照他所开列的

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不能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把它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布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破解了这个谜。我们再来引述米切尔先生的话吧：

“在收获完毕以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一种粗重而结实、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主就收购这种土布来供应城镇居民及河上的船民。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毋宁说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自家生产的糖的价值。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谓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设置齐备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所有别的国家，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到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船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他生产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让他家里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家庭工业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下面是额尔金勋爵对他溯航长江时所见到的农民的描述，可以看做是对米切尔先生的记载的补充：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说来都挺守本分并且心满意足。我曾竭力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性质、应交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精确资料，虽所得无几，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交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正是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过去长期阻挡了而且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社变成纯粹的农场，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之类的原料来和英国货交换。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1 月
17—18 日

载于 1859 年 12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0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对入侵的恐慌³⁶

1859年11月25日于伦敦

恐慌早已是英国工业体系中的通常现象,最近恐慌看来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也成为通常现象了。如果被控制得适当,恐慌能够给所谓自由国家的政府提供许多好机会。当人们被吓得神经错乱的时候,很容易使他们的头脑摆脱危险的幻想。就拿英国实行改革的问题来说吧。正当英国在研究是否永远放弃它对北美的监督问题时,格雷勋爵提出一项彻底的改革法案,以便消除上院对下院的全部传统影响。1783年里士满公爵提出一项改革法案,这个法案甚至要求每年进行一次议会选举和实行普选制。是皮特(他的百年诞辰根本没有受到同胞们的注意就悄悄地过去了,因为那时他们正为韩德尔百年祭的纪念活动奔忙)最先在他的旗帜上写上了“议会改革”的口号³⁷。18世纪统治阶级中最有见识的人物梦寐以求的改革运动随后消逝得无影无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运动被法国革命引起的恐慌所扫除,继法国革命之后又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³⁸,欠下了骇人听闻的国债,出现了可耻的禁口令³⁹。几年以前对俄国的恐惧断送了两个改革法案⁴⁰,现在对法国入侵的恐惧大概会产生同样

的效果。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对布莱特先生领导的英国激进党人的隐忧做出正确的评价。他们声言:寡头政体及其在舆论界的工具故意散布恐惧谣言,利用法国入侵的幽灵来破坏改革,使暴政万世长存。这件事情确实具有某些不光彩的、可疑的特征。制造入侵恐慌的,主要是帕麦斯顿的报刊,而帕麦斯顿本人被公认为是路易·波拿巴的挚友。一个由于没有征得自己同僚们的同意就承认政变而从一届内阁中被撵了出来,又由于提出关于法国阴谋的法案而被逐出另一届内阁的人⁴¹,他可能成为破坏波拿巴计划的最合适的人物吗?帕麦斯顿的报刊一方面警告英国人民要提防波拿巴背信弃义,同时又号召他们同这个人一道投入一次对中国的新远征。

但是,不能否认,英国目前对战争的恐慌并不是没有合理根据的,诚然,它可能被利用来为贵族政党的政策服务。每当波拿巴签订一个新的和约,英国总会本能地自问,现在该轮到它遭到攻击了吧?可见,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官方的欧洲由于害怕革命而承认了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但是,周期性地发动战争却是这个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他只有在一个明确的条件下,才肯使各国政府摆脱革命的妖怪,这个条件就是各国政府让他逐一征服。波拿巴登上他篡夺来的宝座还不到两年,对俄战争⁴²就成了他继续执政的必要条件了。同俄国签订和约还不到两年,又感到只有在意大利进行一场冒险才能使他免遭可耻的灭顶之灾。诚然,接二连三的战事并没有减轻他的困难,战争的结果从一方面说只不过是骗局,从另一方面说则是国债的增加和御用军⁴³的日益蛮横,更不用说除了国内已经存在的不稳定局面的其他因素以外,还出现了教权反对派。在同俄国作战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心怀不满的奥尔良党人⁴⁴就大胆地冷嘲热讽起来,陷于悲观绝望的革命家们又勇敢地

投起了手榴弹。最近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失望情绪,最明显地表现在:法国商业活动陷于停滞、皇帝的大赦⁴⁵彻底失败、对报刊的迫害重又加剧、奥尔良派的希望正在复活。大多数法国人都在抱怨毫无收获的战争耗尽了他们和平时期的全部积蓄,而大多数军人却在咒骂和平,认为和平使他们失去了战争的果实。再过几个月,路易·波拿巴所面临的困难就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他就只有一条出路——发动新的战争。但是,他迫于自己的处境而接二连三发动的战争,对他本人以及欧洲都是越来越危险了,而英国可以说是欧洲最强大的代表。克里木战争几乎没有怎么在欧洲土地上进行。意大利战争之所以没有蔓延开来,只是由于它突然停止了。假如莱茵河上爆发了战争,特别是入侵英国,那么从一开始就会是全欧战争。可是,在确定下一次进攻的对象时,路易·波拿巴只能在普鲁士和英国中间选择。在两种情况下,英国都将参战,一种情况是作为交战的主要方面,另一种情况是作为辅助方面。后一种情况可能性较大。但是,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在法国和英国之间将引起哪些直接碰撞,还无法预测。我们准备以后再研究英国鉴于即将发生的冲突而进行的备战活动。

卡·马克思写于 1859 年 11 月
25 日

载于 1859 年 12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1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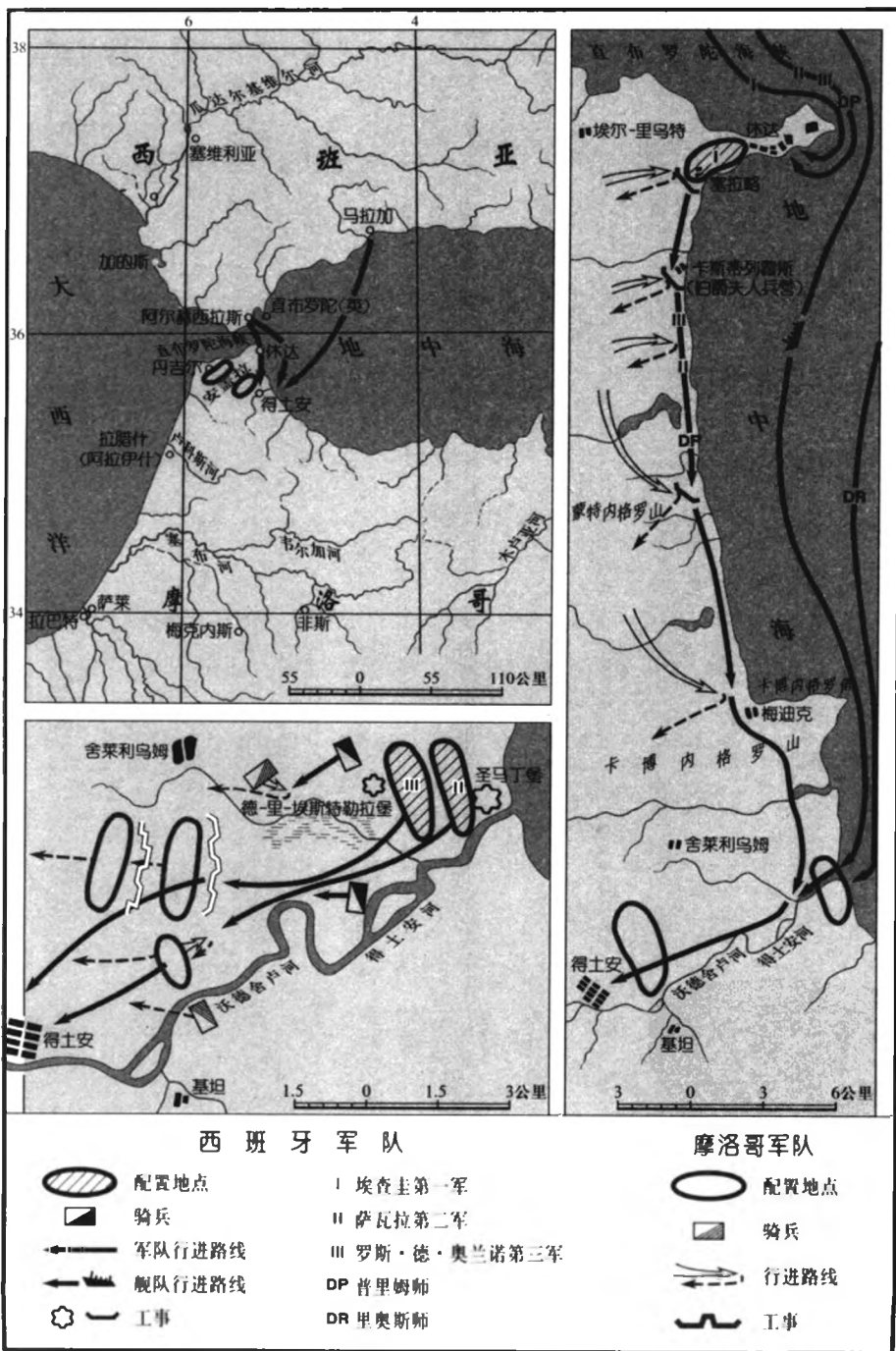
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⁴⁶

我们早就一直等待着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采取某种坚决行动，以便结束战争的第一阶段即准备阶段。⁴⁷但是，事与愿违。奥当奈尔元帅似乎并不急于离开他在塞拉略高地上的兵营，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他的作战行动尚未开始之际加以评述。

11月13日，埃查圭将军指挥的西班牙作战部队第一师在阿尔赫西拉斯上船，几天以后在休达登陆。17日，该师开出休达，占领了塞拉略（或称白宫），即休达阵地前方约1.5英里的一座大建筑物。这一带的地形很不平坦、起伏很大，非常有利于非正规的散兵战。当天夜间，摩尔人试图夺回塞拉略，没有成功，于是就退却了。西班牙人则开始构筑有壕沟防护的兵营，作为以后的作战基地。

22日，塞拉略遭到了休达附近地区的摩尔族部落安盖拉人的攻击。从这一次战斗开始，整个战局到目前为止全是一连串毫无结果的战斗，而且每一次战斗同所有其余战斗都一模一样。摩尔人用或大或小的兵力攻击西班牙人的阵地，试图靠突然袭击或声东击西来夺取部分阵地。据摩尔人报道，他们的这些行动通常是成功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火炮，只得放弃所夺得的多面堡。西班牙人则说，摩尔人从未看见过西班牙多面堡内部是个什么样，摩尔人所有的攻击

1859-1860年摩洛哥战争图



都完全没有成效。在第一次攻击时,安盖拉人不超过 1 600 名,第二天他们得到了 4 000 人的援军,于是立即重新发起进攻。22 日和 23 日全是小规模战斗,但是在 25 日,摩尔人全力进攻,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埃查圭将军在战斗中手部负伤。摩尔人的这次攻击如此厉害,以致使奥当奈尔这位熙德·康佩亚多尔从他在开战以来一直保持着的朦胧睡意中稍稍清醒过来。他立刻命令萨瓦拉将军指挥的第二师和普里姆将军指挥的预备师上船,并且亲赴休达。27 日夜间,西班牙的作战军队全部在休达附近集中。29 日,摩尔人发动另一次攻击,30 日再次攻击。在这以后,西班牙人开始设法改变他们所处的局限于一隅的地位;他们第一个行动的目标是休达南面约 20 英里、离开海岸 4 英里的得土安。他们开始修筑一条通往该城的道路;摩尔人在 12 月 9 日以前一直没有进行任何抵抗。12 月 9 日晨,摩尔人突袭了两个主要多面堡的守军,但是,像往常一样,到日终又离开了多面堡。12 日,在离休达约 4 英里的西班牙兵营前面发生另一次战斗;20 日,奥当奈尔发出电讯说,摩尔人再度攻击两个多面堡,但是像往常一样被胜利地击退了。可见,12 月 20 日同 11 月 20 日相比,战况毫无进展。西班牙人仍然采取守势,而且,同两三个星期以前的预告相反,看不出有任何前进的迹象。

西班牙军队的数量,包括 12 月 8 日以前所得到的全部援军在内,约有 35 000—40 000 人,有 30 000 人可用于进攻。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夺取得土安应当是容易的。诚然,没有好的道路,而且军队的给养全部要从休达运去。但是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英国军队在印度是怎样做的呢?何况西班牙的骡子和挽车马并没有被它们本国的好路娇惯到不肯在摩尔人的土地上行走。不管奥当奈尔怎样辩解,这样继续按兵不动是绝对解释不通的。西班牙人现在拥有的兵

力一般估计该是他们在本次战争中任何时候要派出的最多的兵力了,除非意外受挫要求他们作出超常的努力。相反地,摩尔人一天比一天强大。由哈吉·阿布杜-萨里姆指挥的、曾于12月3日派出部队进攻西班牙人阵地的得土安兵营,其军队已经扩充到了1万人,城内的守军还不算在内。另外一个由穆莱·阿巴斯指挥的兵营设在丹吉尔,而且援军源源不断地由内地开来。单是这一情况,就应当使奥当奈尔一等到天气许可便发动进攻。但是,虽然有好天气,他却没有进攻。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当断不断的表现,这表明,摩尔人不是像他所预计的那种不堪一击的敌人。无疑地,摩尔人作战非常出色;西班牙兵营里纷纷抱怨摩尔人在休达前面占据有利地形,就证明了这一点。

西班牙人说,摩尔人在丛林和山谷中是十分厉害的,而且他们对每一寸土地都很熟悉;但是,一旦走进平原,西班牙步兵的坚强力量很快就会迫使摩尔人的非正规部队掉头逃跑。这样一种辩解在当今条件下,即在每次战斗都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用来在起伏地上进行散兵战的条件下,是大可怀疑的。如果说西班牙人在休达附近停留了6个星期以后还不能像摩尔人一样熟悉那里的地形,那他们就够糟糕了。起伏地比平原更有利于非正规部队,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即使是在起伏地上,正规的步兵也应当比非正规部队优越得多。在链式伸展的散兵线后面配置支援队和预备队的现代散兵战方法,军队运动的正规性,保持对部队的指挥并且使它们相互支援以便倾全力来达到共同目标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使正规部队远比非正规部队优越,以致在最适合于散兵战的地形上,非正规部队即使以二对一,也抵挡不住正规部队。但是在休达,力量的对比正好相反。西班牙人数量上占优势,但是他们却不敢进攻。惟一的结论是,西班牙军

队完全不懂散兵战,由于士兵个人对这种作战方法缺乏素养,这就抵消了纪律和正规训练理应给予他们的优势。事实上,大概他们不得不经常使用长剑和刺刀来进行白刃战。摩尔人在西班牙人相当接近的时候,就停止射击,拿着刀剑向他们冲杀,像土耳其人所常做的那样,而这对于像西班牙这样由新兵组成的军队来说,确实是很不愉快的。但是经常发生的战斗,应当使他们熟悉摩尔人作战的特点和找到对付它的合适办法;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位统帅仍然迟疑不决,继续滞留在自己的防御阵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对他的军队作出很高的评价了。

根据现有事实来推测,西班牙人的作战计划似乎是把休达作为作战基地,而把得土安作为第一个进攻目标。西班牙海岸对面的那一部分摩洛哥的地方,形成一个半岛似的地带,宽约 30—40 英里,长约 30 英里。丹吉尔、休达、得土安和拉腊什(阿拉伊什)是这个半岛上的主要城市。占领了这 4 个城市(其中休达已在西班牙人手中)就很容易征服这个半岛,并使它成为进一步进攻非斯和梅克内斯的基地。所以,夺取这个半岛可以说是西班牙人的目标,而攻占得土安则是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这个计划看来是相当明智的;它把作战行动限制在一块不大的地区内,这个地区三面环海,第四面为两条河(得土安河和卢库斯河)所环绕,因此夺取这个地区要比夺取它南面的地区容易得多。这个计划也避免了进入沙漠的必然性,而如果把摩加多尔或拉巴特作为作战基地的话,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沙漠了;同时,这个计划使战场接近西班牙的国境,其间只有直布罗陀海峡之隔。但是不论这个计划有什么优点,如果计划不能实现,优点就毫无用处。如果奥当奈尔继续像现在这样行事,那么,不管他在公报上说得多漂亮,他也会使自己和西班牙军队的名誉蒙受耻辱。

弗·恩格斯写于 1859 年 12 月
20 日—29 日之间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1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4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法国的状况⁴⁸

1860年1月17日于巴黎

路易-拿破仑皈依了自由贸易,并且正准备宣布和平新纪元的到来。他差不多可以被接受入教友会⁴⁹了,因而1860年将作为千年王国⁵⁰第一年载入欧洲史册。这些轰动整个伦敦报界的非同寻常的消息,来源于发表在1860年1月15日《通报》上的路易-拿破仑致国务大臣富尔德先生的一封信。发表这封信的第一个效应就是国家证券在巴黎下跌,在伦敦上涨。

首先,有必要稍许详细地研究一下犯罪构成,也就是那封应该成为新纪元的整个大厦基石的皇帝的信。路易·波拿巴告诉富尔德先生说:“必须设法进一步发展国民财富的各个部门,这样的时机已经来到。”极其相似的声明^①在1852年1月份的《通报》上出现过,那时,政变开创了动产信用公司⁵¹、土地信用公司⁵²和其他的游荡银行⁵³的纪元。但这还不是全部。从这个多事之秋起,在法国独裁者庇护下公布的每个年度财政报告,一直都用大量官方数字极力强调

① 路·波拿巴《以法国人民的名义》,载于1852年1月15日《总汇通报》第15号。——编者注

一个事实，即帝国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它的悉心治理之下，国民生产的各个部门已经取得大发展。

这样一来，我们便不知可否。要么是政变时期所作的声明为时过早，而政变之后发表的财政报告是捏造；要么是现在的声明纯属欺人之谈。

无论如何，根据新的皇帝宣言的自供，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法国社会从波拿巴制度的复活中所应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们且看一看，这些美妙的经济革新将借助于什么样的新发明来实现。

首先，路易·波拿巴告诉富尔德先生说：“我国的对外贸易应当通过产品交换来发展”——真是了不起的至理名言，富尔德大概也会因自己主子的这个大发现而有点吃惊了。既然对外贸易是以本国产品交换外国产品，所以为了发展法国的对外贸易，就必须扩大法国产品的交换，这是无法否认的。路易-拿破仑从他设想的法国对外贸易的新发展中所预期的主要结果，是“在劳动阶级中普及福利”；劳动阶级的状况，正如政变英雄所默认的和现代法国作家（例如，参看已故的科兰先生的著作^①）所指出的，近10年来已明显恶化。不幸得很，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使最肤浅的观察家也为之震惊。从1848年到1860年，法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1848年它达到87500万法郎，而1859年就增加了一倍多。在短短的10年间，贸易增长100%以上，这几乎是空前的现象。这种增长的原因，可以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合众国等地找到，在土伊勒里宫⁵⁴的档案

^① 让·吉·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6—1857年巴黎版和《社会科学》1857年巴黎版。——编者注

库里当然是找不到的。尽管法国的对外贸易近 10 年来急剧增长——其原因在于整个世界市场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远在法国警察的琐屑监督的范围之外——可是，人们看到，法国人民群众的状况并没有改善。可见，有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使贸易增长的自然成果化为乌有。如果说，法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说明第二帝国为什么能够那样轻松地恣意挥霍，那么，尽管出口增加一倍，而民生依然凋敝的事实就暴露了这种轻松愉快的帝王生活是谁付出了代价。如果说，没有法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帝国就不可能存在下去，那么，反过来说，在帝国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不可能带来所期望的结果。

奥地利皇帝用一道命令在本国消灭了赤字，为什么路易-拿破仑不也发一道命令实现增加法国的对外贸易呢？不过，他担心在自己的道路上有障碍。

他说：“我们必须首先改善我国的农业，并且使我国的工业摆脱使之处于较低阶段的那些内部障碍。”

法国的农业状况亟须改善，这是法国经济学家们一直谈论的话题。但是路易-拿破仑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他将保证以不大的“利息”给农业贷款。大家知道，法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二强。路易-拿破仑会向其余三分之一的居民征税，以便给全国大部分人提供“利息不大”的贷款吗？这种想法确实太没有根据，不足置信。另一方面，他的土地信用公司公开声明的宗旨是把借贷资本送往农村。这个公司所达到的惟一结果，不是改善农业，而是使小自由农破产，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归根到底，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又是那个老牌的失效的万应灵丹——信用机构。谁都不会否认，第二

帝国标志着法国信用事业发展的一个时代。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在这方面帝国走得太远了,随着自己信用的丧失,它也失去了鼓励信用的能力。看来,这里惟一的新事物就是:半官方的信用机构绷得太紧了,对它的要求太过分了,所以路易·波拿巴现在梦想着把政府本身直接变成贷款事务所。由于每一个这样的企图总是带有巨大的危险,所以这一企图也必然要遭到失败,就像他囤积粮食以抬高粮价的企图失败了一样。排水、灌溉和整地——这些措施都很好,而且各有各的好处,但它们所带来的惟一可能的结果是增加农产品的数量。它们并不能提高也无意提高这些产品的价格。即使路易·波拿巴奇迹般地找到了在全国范围内这样来改善农业的办法,这些措施又如何才能消除近5年来法国农民一直苦于农产品不值钱的状况呢?此外,路易-拿破仑要着手逐步改善交通工具。提出这一建议时的冷酷心肠甚至超过了波拿巴的无耻。只要注意一下法国从1850年起的铁路发展就够了。这些“交通工具”的年度支出从1845年到1847年约17500万法郎,从1848年到1851年约12500万法郎;而从1852年到1854年几近25000万法郎(比1848—1851年的支出多一倍);从1854年到1856年几近55000万法郎;从1857年到1859年约50000万法郎。在1857年爆发了普遍的贸易危机的时候,由于正在建筑和已经批准建筑的铁路仍然需要巨额款项,法国政府曾经大受震动。它禁止铁路公司用发行股票、证券等方式每年吸引为数21250多万法郎的新资本,禁止成立新公司并且对年工程量规定出一定的限额。在所有这一切之后,路易·波拿巴说话的口气竟然像铁路、运河等等是现在才发明似的!他所暗示的强行降低运河航行税的办法,其结果无疑会破坏国家合同,吓跑这些企业的投资,而且,这个措施也根本不适于把新资本吸引到那些部门中去。最后,为

了找到农产品市场,必须刺激工厂工业的发展。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工厂工业在第二帝国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如此,尽管输出空前增长,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大发展,信用系统在法国极度扩充,法国农业仍然处于衰落之中,法国农民仍然日益破产。这种奇怪的现象究竟怎样解释呢?长期国债每年增加 25 500 万法郎,这个事实就对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回答,更不用说为陆海军抽血税了。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吸血鬼,是一种比法国民族的生产力增长得更快的重担。

路易·波拿巴给法国工业开的药方,如果撇开那些空话或远在天边的事不谈,归根到底只是取消羊毛和棉花的关税,逐步缩减糖和咖啡的关税。这些都很好,但是只有像英国自由贸易派⁵⁵那样轻信的人,才能把这类措施叫做自由贸易。每一个懂得政治经济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取消农产原料的关税乃是 18 世纪重商学派理论中的主要点。压在法国生产上面的这些“内部障碍”,同日用品入市税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后者把法国分成好些个独立区,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独立区,使产品的国内交换瘫痪,福利不能建立,因为这种日用品入市税是阻碍产品消费的。但是在帝国的制度下这种入市税增长了,而且还要进一步增长起来。降低羊毛和棉花的关税,准备以取消减债基金来补偿,这样一来,增加国债的最后一个哪怕往往是有名无实的障碍就将消除了。

另一方面,森林应砍伐,土丘须铲平,沼地要排水,其办法就是在三年之内拨出 16 000 万法郎(据说相当于最近的战时公债中尚可利用的余额),每年平均不到 5 400 万法郎。然而,帝国的卡利奥斯特罗⁵⁶五年前那样大吹大擂宣布的、从那时起人们已不再记起的卢瓦尔河筑堤的一项工程,用不了三个月就可以把这笔钱全部吃掉。在

这种情况下,宣言里还剩下什么呢?“和平纪元的到来”,——就好像以前没有在波尔多宣布过似的。“帝国就是和平”。⁵⁷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1 月
16 日—20 日之间

载于 1860 年 2 月 7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586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⁵⁸

摩洛哥的战事终于真正开始了,随着战事的开始,西班牙的报纸和热情的西班牙民众用来刻画奥当奈尔的一切浪漫色彩都消失了。奥当奈尔被降格为一个凑凑合合的普通将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是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的骑士,而是公主骠骑兵⁵⁹,打仗用的不是托莱多的刀剑,而是线膛炮和圆锥形炮弹。

12月20日前后,西班牙人开始修筑一条供炮兵和辎重队通行的道路。这条道路要经过丘陵地带通往休达城南的兵营。摩尔人从未试图破坏这条道路;他们有时攻击掩护筑路队的普里姆将军的那个师,有时也攻击兵营,但都未得手。这些战斗从未超出前卫散兵战的范围;12月27日的战斗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西班牙人的损失也不过是死6人伤30人。这条不过两英里长的道路在年底前修好了,但是一场新的暴风雨的袭击阻止了军队的行动。与此同时,好像是要把军队即将开始的调动通知摩尔人的兵营一样,由1艘帆力战列舰、3艘螺旋推进式巡航舰和3艘明轮式蒸汽舰组成,共有246门火炮的一支西班牙分舰队开到得土安河口,并且在12月29日炮击河口的堡垒。大约3个小时,这些堡垒被压制住了,它们的土质工事被摧毁了。不要忘记,这些正是法军大约在一个半月以前以小得多的火力

轰击过的堡垒。⁶⁰

29日天气转好，西班牙军队终于在1月1日开始前进了。最先在非洲登陆、由埃查圭指挥的第一军(2个师)，仍然留在休达前面的阵地上。这个军最初几个星期因疾病遭受很大损失，但现在已经能服水土了，并且由于以后获得了增援，人数已达1万，比第二军或第三军多得多。第二军由萨瓦拉指挥，第三军由罗斯·德·奥兰诺指挥，这两个军和普里姆的预备师一起，共21 000—22 000人，已在新年的第一天出动。每人随身携带6天的口粮，另有100万份口粮，即军队一个月的给养，由随同这支军队行动的海船载运。这支军队以普里姆师为前卫，由萨瓦拉担任支援，罗斯·德·奥兰诺殿后，通过了休达南面的高地。新辟的道路向下通往离兵营不足2英里的地中海，这里有一片相当大的半圆形平原，地中海形成它的弦，起伏地带构成它的圆周，这一地带走势越来越高，逐渐变成陡峭的山岭。普里姆师的大部分人刚刚离开兵营，散兵战就开始了。西班牙的轻步兵轻而易举地把摩尔人赶回平原，又从平原迫使他们退入西班牙军队行进路线侧方的山岗和丛林中去。在这里，公主骠骑兵的两个人数不多的连因误导而发起冲锋。他们进攻得很勇猛，穿过了摩尔人的战线而直插其兵营。但是四面都是起伏地，而在有利地形上又找不到可以攻击的骑兵或步兵，于是他们只得退回来，除了损失士兵以外，还损失了7个或者说差不多他们全部的军官。直到目前，战斗主要由成散开队形的步兵和一两个山炮连进行，有几艘炮艇和蒸汽舰在一些地方给予了火力支援，这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支援。看来，在没有稳固地占领这片平原南端的山岭以前，奥当奈尔想停留在平原上。然而，为了保证夜间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奥当奈尔命令普里姆把山岭北坡上的摩尔散兵赶走，夜色降临时再撤回。但

是, 普里姆这位西班牙军队中最勇猛的将军, 却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结果占领了整个山岭, 当然他自己也损失不小。他的前卫在山岭上宿营, 并沿正面一线筑起工事。这一天西班牙人的损失共计死 73 人, 伤 481 人。

这一天夺取的阵地就是因两座白色建筑物而得名的卡斯蒂列霍斯——双堡, 其中一座在靠近平原的内山坡上, 另一座在普里姆白天占领的山岭上。但是这个兵营的正式名称大概是伯爵夫人兵营。同一天, 摩尔人攻击休达城下兵营最右端一个多面堡和最左端两个多面堡之间的空隙地, 试图对这个兵营进行一次小规模牵制战。但是埃查圭的步兵和炮兵火力轻易地击退了他们。

作战军队在伯爵夫人兵营停留了 3 天。野炮和 1 个火箭连以及余下的骑兵(整个骑兵旅, 包括 8 个骠骑兵连、4 个无胸甲的胸甲骑兵连和 4 个枪骑兵连, 共 1 200 人)都来到了这个兵营。只有攻城炮兵纵列(其中有 1 个十二磅线膛炮连)还未到达。1 月 3 日, 奥当奈尔向南面的一道山岭即蒙特内格罗山方向侦察。天气仍然晴朗, 午间很热, 夜间有重露。霍乱仍在一些师里严重流行, 有一些部队因疾病而损失严重。例如, 受疾病危害特别严重的两个工兵营, 各连人数已由 135 人锐减到 90 人。

到此刻为止, 我们掌握有详细的报道, 至于以后的情况, 我们就只有根据内容贫乏而且互有出入的电讯来叙述了。5 日, 军队向前推进。6 日, 军队“通过了山口, 没有遇到抵抗, 然后在内格罗谷地的北面”^①宿营。这是不是说军队已经越过了蒙特内格罗山, 并且在它

^① 《全军宿营……[电讯]1 月 7 日于马德里》, 载于 1860 年 1 月 10 日《泰晤士报》第 23512 号。——编者注

的南坡宿营，还不清楚。9日，据报道军队距离得土安1里加^①，并且击退了摩尔人的一次攻击。13日，夺取了卡博内格罗山的全部阵地，大获全胜，已兵临得土安城下；只等火炮运到，就开始攻城。14日，原在马拉加集结的里奥斯将军的师（有10个营的兵力）在得土安河口登陆，占领了两星期前被舰队击毁了的堡垒。16日，有报道说，这支军队即将渡河攻打得土安。

为了说明这一切情况，必须指出，军队由休达到得土安要通过四道分立的山岭。第一道就在兵营的南面，通向卡斯蒂列霍斯平原；第二道在这个平原的南面。这两道山在1日被西班牙人占领。再往南，与地中海海岸垂直的是蒙特内格罗山，和这一道山岭平行而位于更南面的，则是另一道更高的山岭，它一直延伸到卡博内格罗海角，卡博内格罗的南面就是得土安河。摩尔人在1月1日紧逼入侵军的翼侧，后来改变了战术，继续向南面移动，企图从正面堵住通往得土安的道路。预计争夺这条道路的决战将在最后一道山岭即卡博内格罗山的一些山口发生，而这一会战大概就在1月13日发生了。

在这些战斗中，从战术部署来说，双方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对于摩尔人，除了以半野蛮人的勇猛和机灵进行非正规的战斗以外，我们不能再期望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他们看来也还不够强。他们似乎没有表现出阿尔及利亚海岸山区和里夫山区的卡比尔人⁶¹所具有的那种反抗法国人的狂热。在休达附近的多面堡正面进行的长时间的、没有成功的散兵战，似乎已使大多数部落最初的锐气和兵势丧失殆尽。再者，在战略部署上，他们也不能同阿尔及利亚人相比。经过第一天战斗，他们便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计划，即袭扰

^① 西班牙的1里加约等于5.5公里。——编者注

进攻纵队的翼侧和后卫，并且切断或威胁它和休达之间的交通线。他们不这样做，却竭力赶到西班牙人的前面，想从正面堵截西班牙人前往得土安的道路，这样便引起了他们本应避免的一场对阵战。也许他们还会懂得，对于他们所拥有的这样的士兵来说，在像他们所居住的这样的国土上，小型战争⁶²才是用来拖垮敌人的最适当的斗争方法，——尽管这个敌人在训练和装备上占有优势，但是它的一切行动都被摩尔人所没有的那种庞大辎重所拖累，在一个没有道路并且对他们抱有敌意的国家里，运送这些辎重并非易事。

西班牙人继续像开始时那样作战。在休达按兵不动两个月之后，他们在16天内推进了21英里，速度是每4天5英里！即使把道路上的所有困难都估计进去，这种缓慢的速度仍然是现代战争中前所未闻的。看来，西班牙的将军们已经完全不习惯于指挥大部队、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调遣一支按人数来说未必能够同上次意大利战争中法国的一个军相比的军队。否则怎能出现这种延宕呢？1月2日，奥当奈尔把所有的炮兵（除攻城炮兵纵列以外）都调到了卡斯蒂列霍斯阵地，但他还是等了两天，直到5日才出发。行军看来还组织得不错，但这么短程的行军也算不上怎么高明。西班牙人在受到攻击时，战斗中能表现出很蔑视敌人，这是严格训练和一连串成功战斗的必然结果；但是，当气候和战争（它必将转化为消耗性的小规模军事行动）的疲劳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士气和体力的时候，这种对胜利的信心是否还能保持，人们将拭目以待。至于指挥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说的还很少，因为除了第一次战斗以外，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整个战况的详细报道。但是，这第一次战斗就暴露了两个明显的错误，即骑兵的攻击和普里姆将军的推进超过了预先奉命的范围。如果这种事情成为西班牙军队中常有的现象，那么他们就更糟糕了。

得土安的防御很可能是短暂的, 而不是顽强的。工事无疑是不好的, 但是, 摩尔人在要塞围墙掩护下作战时却是出色的战士, 在君士坦丁⁶³和阿尔及利亚的其他许多城镇中的战斗已表明了这一点。下次的邮件可能给我们带来得土安被攻陷的消息。如果确实如此, 我们可以预期战斗会暂时停息, 因为西班牙人需要时间来改善得土安和休达之间的道路, 以及把得土安变成第二个作战基地, 并等候援军。然后再从这里开始下一步行动, 即进攻拉腊什或丹吉尔。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60 年

1 月 18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2 月 8 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6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的政治⁶⁴

在议会关于回奏书⁶⁵的辩论中,最引人注意的问题是:第三次对华战争⁶⁶、对法商约⁶⁷和意大利形势的复杂化。应当看到,中国问题不仅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且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宪法问题。帕麦斯顿勋爵独断下令进行的第二次对华战争⁶⁶,先是导致下院对他的内阁投不信任票,接着是他强行解散下院;而新的下院虽然是由他一手包办选举出来的,但从来没有人要求撤销上一届所通过的判决。直到此时此刻,帕麦斯顿勋爵的第二次对华战争,还受着一个议会裁决案的谴责。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

1859年9月16日,英国接到在白河被击退⁶⁸的报告。帕麦斯顿勋爵不是召开议会,而是致书路易·波拿巴,同这个独裁者商谈派一支新的英法远征军去打中国。如格雷勋爵所说,

“3个月来,英国的港口和军械库一片忙碌之声,进行着各种准备,以便向中国运送大炮、军需品、炮艇,以及在海军之外加派不下1万人的陆军。”^①

一方面由于同法国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由于事先不通知议会

① 亨·乔·格雷《1860年1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60年1月25日《泰晤士报》第23525号。——编者注

而花费的大笔开支,这两件事已经把国家不折不扣地卷入一次新的战争,而议会召开时,却被无礼地要求“感谢女王^①陛下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和为远征中国而正在进行的准备通知了他们”。这与路易-拿破仑本人对他自己的立法团⁶⁹说话的方式,或者皇帝亚历山大^②对他的参议院说话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1857年在下院关于回奏书的辩论中,现任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先生谈到波斯战争⁷⁰时曾经愤慨地大声疾呼:

“我不怕反对,我要说,不事先通过议会就开战的做法,是同我国的惯例完全抵触的,这种做法危及宪法,为了使这样危险的事完全不可能重演,绝对需要下院加以干涉。”^③

帕麦斯顿勋爵不仅重演了一回“这样危及宪法”的事;他这一次不仅是在伪善的格莱斯顿先生的赞同下重演的,而且,好像是想试试内阁不负责任的做法有多大威力似的,他利用议会的权利对付国王,利用国王的君权对付议会,利用二者的特权对付人民,居然肆无忌惮地在同样的活动范围内重演这种危险的事。他的一次对华战争还在受着议会的谴责,他就置议会于不顾又进行另一次对华战争。然而在两院中却还有一个惟一鼓足勇气反对内阁这种越权行为的人。说也奇怪,这惟一的一位并不是立法机构里的民主派,而是贵族派。此人就是格雷勋爵。他对答复女王演词的回奏书提出了修正案,说没有听取议会两院的意见就发动远征是不应该的。

① 维多利亚女王。——编者注

② 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③ 转引自格雷勋爵《1860年1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60年1月25日《泰晤士报》第23525号。——编者注

执政党的发言人和女王陛下反对派的领袖对待格雷勋爵修正案的方式,都清楚地说明英国代议机关正在迅速走向什么样的政治危机。格雷勋爵承认,形式上国王享有宣战的特权,但是,既然大臣们事先不经议会批准不得在任何事情上花费一分钱,所以在没有事先通知议会、没有提请议会为支付这些可能的花费做好准备以前,国王的责任代表们决不允许发动军事远征,这就是宪法的法律与惯例。因此,只要国民的参政机关认为适当,它在一开始就可以制止大臣们所策划的任何不正当或不明智的战争。为了说明过去是怎样严格遵守这些规章的,勋爵阁下举了几个例子:1790年,当几艘英国船在美国的西北海岸遭西班牙人劫持时,皮特曾向两院下达国王咨文^①,要求两院通过一项拨款,以备支付可能的花费。另一次,在1826年12月,当西班牙的斐迪南七世为了援助唐·米格尔而打算入侵葡萄牙,唐·佩德罗的女儿向英国求援时,坎宁下达了同样的咨文^②,把问题的性质和可能需要的费用通知议会。⁷¹最后,格雷勋爵清楚地暗示,政府胆大妄为,不经议会同意而向全国征了税,因为已经造成的大笔支出,必定已设法偿付,如果没有挪用完全留作他用的拨款,那是偿付不了的。

格雷勋爵到底从内阁方面得到了什么样的回答呢?曾经带头否认帕麦斯顿第二次对华战争的合法性的纽卡斯尔公爵的回答是:第一,“近年来树立了非常良好的惯例,即对回奏书决不提出任何修正

① 乔治三世《关于西班牙人在努特卡海湾夺取船只的电文。1790年5月5日》,载于《截至1803年止的英国议会史》1816年伦敦版第28卷。——编者注

② 乔治四世《关于葡萄牙的电文。1826年12月11日》,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27年伦敦版第16卷。——编者注

案,除非有某种重大的政党目的要争取实现”。因此,格雷勋爵既然不是出于派别性的动机,也不是想要把大臣们赶走以便自己挤进来,那么,纽卡斯尔公爵至死也想不通,他破坏这个“近年来非常良好的惯例”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竟然荒唐到以为人家会为了重大的政党目的以外的什么别的事情而争斗起来吗?第二,皮特和坎宁如此热心遵守的宪法惯例被帕麦斯顿勋爵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吗?这位高贵的子爵不是曾经自作主张,于1831年在葡萄牙⁷²、1850年在希腊⁷³,以及像纽卡斯尔公爵还可能补充的,在波斯⁷⁰、阿富汗⁷⁴和其他许多国家进行过战争吗?怎么,议会既然30年来一直让帕麦斯顿勋爵僭越宣战、媾和和征税的大权,那它为什么要突然一下子打破自己长期俯首听命的传统呢?宪法可能在格雷勋爵一边,但时效⁷⁵无疑是在帕麦斯顿勋爵一边。既然以前他从未因这类“明智的”革新而受过惩罚,那么,时至今日为什么一定要责问这位高贵的子爵呢?事实上,格雷勋爵企图打破帕麦斯顿勋爵随意处理自己财产——英国的军队和钱财——的时效特权,而纽卡斯尔公爵没有指控格雷勋爵造反,似乎已经够宽容大度的了。

纽卡斯尔公爵竭力要证明远征白河的合法性,他采取的方式也同样别出心裁。根据1843年的英中条约³⁴,英国享有天朝给予最惠国的一切权利。而俄国在最近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规定了白河的航行权。⁷⁶因此,按照1843年的条约,英国也享有这样的航行权。纽卡斯尔公爵说,这一点他是能够坚持的,“不需要什么有力的专门论证”^①。可是他未必能够!一方面,这里有一个颇为尴尬的情况,即

① 亨·纽卡斯尔(1860年1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60年1月25日《泰晤士报》第23525号。——编者注

俄国的条约是在白河惨败以后才批准,从而才开始实际存在的。这自然不过是一种不值一提的倒逆论法。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在战争状态中,一切现行条约都暂停生效。如果英国人在远征白河时同中国人是处于战争状态,那么不言而喻,他们既不能援用 1843 年的条约,也不能援用其他任何条约。如果他们不是处于战争状态,那就是帕麦斯顿内阁不经议会批准擅自发动了新的战争。为了回避这种两难局面的后一难题,可怜的纽卡斯尔断定,自从炮击广州⁷⁷以来,最近两年当中,“英国从来没有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因此,政府只是继续进行敌对行动,而不是重新开始敌对行动,因此,纽卡斯尔也就可以不用专门的论证而援用只是在和平时期才有效的条约。而内阁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为了使这种奇怪的辩术更加精彩,与此同时在下院断言,整个这一时期,英国“从来没有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①。两国现在也是这样。自然,发生过炮击广州、白河惨败以及英法远征等事件,但是没有发生过战争,因为从来没有宣战,因为直到现在中国皇帝^②还允许在上海照常做生意。帕麦斯顿在对中国人的关系上把战争的所有国际法准则破坏无遗。正是这个事实,却被他用做理由,为自己在对英国议会的关系上不遵守宪法准则的行为辩护,而他在上院的代表格兰维尔伯爵则轻蔑地宣称:“关于中国问题”,“政府征求议会的意见”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政府征求议会的意见竟然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那么,英国的议会和法国的立法团还有什么区别呢?在法国,至少是一个被当作民族英雄继承者的

① 亨·约·帕麦斯顿(1860年1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0年1月26日《泰晤士报》第23526号。——编者注

② 咸丰帝。——编者注

人明目张胆地取国家而代之,同时公开承担这一僭越行动的全部风险。而在英国,则是所谓的内阁中一个二等发言人,一个腐朽衰颓的官迷,一个无名的废物,这些人利用议会的低能,靠着一家平庸报刊蛊惑人心的胡言乱语,一声不响地,毫无风险地,悄悄地窃取了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权力。如果一方面拿一位苏拉掀起的骚动⁷⁸,另一方面拿股份银行经理、慈善会秘书或教区委员会执事的招摇撞骗惟利是图的手段来比较一下,你就会了解法国皇帝的僭越行动和英国内阁的僭越行动有什么区别了!

德比勋爵充分认识到保持内阁的无能与不负责任对两派都同样有利,他自然“不能同意高贵的伯爵〈格雷〉对政府的失职所作的严厉指责”。他不能完全同意格雷勋爵所表示的不满,即“政府本该召开议会,征询它对中国问题的意见”,而“如果格雷勋爵坚持要求把修正案提付表决”,那他“决不投赞成票”。^①

结果,修正案没有提付表决,而两院关于对华战争的全部辩论,也就消失在两派对光荣地使英军葬身污泥的舰队司令贺布的一片奇怪的颂扬声中了。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1 月
27 日

载于 1860 年 2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6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① 爱·德比《1860 年 1 月 24 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 1860 年 1 月 25 日《泰晤士报》第 23525 号。——编者注

卡·马克思

法英之间的新条约⁶⁴

1860年1月28日于伦敦

对法商约⁶⁷提交下院审查不会早于2月6日。可是,根据辩论回奏书⁶⁵时的揭发,根据法国报纸的披露以及伦敦和巴黎的传闻,不管格莱斯顿先生怎样郑重警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给这个“可爱的换来儿”⁷⁹作一个总的评价了。1月23日,星期一,条约在巴黎正式签字,充当它的法国教父的是贸易大臣鲁埃和代理外交大臣巴罗什;英国方面扮演这种角色的是考莱勋爵和科布顿先生。以下的一则新闻,即前圣西门主义者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曾为此事出了一臂之力,整个法国都惋惜路易-拿破仑处理不当,没有让这位名人(即舍伐利埃先生)有可能同他的“英国同事”一道在条约上签名,——已经由“名人”自己慨然向伦敦作了报道,并且在各个自由贸易派机关报上登载了。但报界并不知道,法国方面的主角是前圣西门主义大祭司安凡丹天父。这些圣西门主义者,从安凡丹天父到伊萨克·贝列拉和米歇尔·舍伐利埃,都已变成了第二帝国经济上的主要支柱,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不过,还是让我们再来谈谈舍伐利埃先生的“英国同事”吧。这位兰开夏郡的前工厂主对于能亲笔签署国际条约,当

然感到不胜荣幸。如果注意到,互惠条约和一般商约(同野蛮人签订的条约除外),都曾被以科布顿先生为首的英国自由贸易派⁵⁵痛斥为最坏的和最无信义的保护关税形式;如果再注意到,现在的条约,即使从互惠观点来看,似乎也是一个相当荒唐的协定;最后,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权衡一下用条约做掩护的政治目的和任务,那么,人们大概就会可怜理查·科布顿先生成了帕麦斯顿的一个诡计的无辜牺牲品了。但事情还有它另外的一面。大家知道,科布顿先生因从事反谷物法运动⁸⁰有功,曾得到感恩的厂主们约6万英镑的奖赏。科布顿先生用这笔钱的绝大部分买了美国股票,由于1857年的危机,几乎损失殆尽。他启程去合众国旅行时还抱有的希望化为泡影。科布顿先生回到英国时已经是一个破了产的人。为了安排一次国民捐献,就必须有一种国民性质的借口,必须有一桩可供吹嘘的事情,好再一次把科布顿先生描绘成联合王国的守护天使,“能保障千百万普通家庭的富裕和安适”^①。英法条约恰好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而且,正像诸君从省报上获悉的那样,用来补偿自由贸易的伟大使徒在美国亏损的为数4万英镑的新捐献已在进行,并且得到很大的“同情”。毫无疑问,如果是迪斯累里向下院提出这样的条约,自由贸易派的首领科布顿先生就会站出来,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说内阁企图使立法机关重犯过去不文明时代的最愚蠢的错误。

从附表^②中可以看出1858年英国对法国商品征收的保护关税

① 引自《国外来信》,载于1860年1月28日《经济学家》第857期。——编者注

② 附表引自《商务条约和自由贸易》,载于1860年1月28日《经济学家》第857期。——编者注

的数额：

商 品	关 税 (英镑)
篮筐	2 061
黄油	7 159
各种瓷器具	1 671
挂钟	3 928
咖啡	4 311
蛋类	19 934
刺绣品	5 572
假花	20 412
水果	7 347
花边	1 858
皮靴、皮鞋及其他皮革制品	8 883
手套	48 839
乐器	4 695
工业用油	2 369
壁纸	6 713
编帽草等	11 622
丝织品	215 455
白兰地及其他酒类	824 960
糖	275 702
茶叶	14 358
烟叶	52 696
手表	14 940
葡萄酒	164 855

这样征收的关税,多数是保护关税,如篮筐、挂钟、花边、皮靴、手套、丝织品等的关税都是。其他如白兰地税等等,要高于英国国产酒类的消费税,因此也带有保护关税的性质。甚至如葡萄酒税这样纯粹的财政关税,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也认为是保护关税,因为,如果

不同时保护国内市场的同类商品以至同样的商品,是不可能对外国商品征税的。所以,对外国葡萄酒征收的财政关税,对当地啤酒等等来说,就可以看做是保护关税。由于新签订的条约,英国对法国制成品的全部税收将立即取消,而白兰地税、葡萄酒税及其他商品税将同英国的消费税或同目前征收的从不列颠殖民地输入的同类商品(如葡萄酒)的关税拉平。另一方面,法国税率的改变,在1861年10月以前不会彻底实现,这可以从一份法国政府机关报的下列报道中看出:

1860年7月1日——废除棉花和羊毛进口税。

1860年7月1日——对英国煤和焦炭采用比利时税率。

1860年10月1日——将现行铁税改为每100公斤收税7法郎。

1860年12月31日——降低机器进口税。

1861年6月1日——废除对麻线和麻制品输入的禁令,规定关税不超过30%。

1861年10月1日——废除其余一切有关输入的禁令,采用5年为期的从价税的保护关税制度,5年期满后不得超过25%。

除英国煤税降低到与目前征收的比利时煤税相等之外,法国所做的一切表面上的让步,显然是极端模棱两可的。例如一号生铁(威尔士的)每吨价格目前是3英镑10先令,而法国对它将征收近3英镑的关税。伦敦的《经济学家》承认,对迄今禁止输入的物品征收的30%的从价税,实质上就是保护关税。就降低英国商品税——不管是真降低还是假降低——要拖下去而言,英国政府实质上起一个保险公司的作用,保证在这个时期内保住路易-拿破仑的权力。这个商约的真正秘密正是在于,“这完全不是商约”,而纯粹是一个骗局,是要迷惑约翰牛的商业头脑和掩盖不可告人的政治计划。这个秘密在辩论回奏书时被迪斯累里先生巧妙地揭发出来了。他的揭发要点

如下：

“几年以前，法国皇帝作过声明，这个声明同不久前他写给国务大臣的那封信^①相似。在这个声明中，他建议完全取消保护关税制度，采取类似他在不久以前的宣言中提到的那些措施。1856年，根据这个精神拟定的法案被提交给了立法团，但在通过以前，它被提交法国86个省议会审查，除6个省议会外，各省议会都赞同这个法案，条件是新制度应该再过一些时候施行。结果，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一份公开文件表明他实行这个制度的决定并把生效的日期规定在1861年7月。因此，法国根据所签订的条约答应在1861年7月实行的一切，已经在法国通过法律程序规定好了。”^②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1月
28日

载于1860年2月14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5868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8卷翻译

① 《拿破仑第三给国务大臣的信》，载于1860年1月15日《总汇通报》第15号。——编者注

② 本·迪斯累里《1860年1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0年1月25日《泰晤士报》第23525号。——编者注

弗·恩格斯

德国的军事改革⁸¹

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¹⁸与克里木战争¹⁷相比,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一个事实:法国的军事组织为全欧之冠。除法国军队以外,奥地利军队无疑是欧洲军队中最好的;诚然,在1859年的短暂战役中,全军没有能够打一次胜仗,虽然它的士兵赢得了荣誉。即使把将军的无能,指挥的不统一和皇帝的瞎干涉都估计在内,奥地利各团的军官和士兵仍然一致认为:这支军队未获胜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的组织不像他们敌人的组织那样适合于实战的需要。如果说,仅仅几年以前才彻底改组过的奥地利军队尚且有所欠缺,对其他在组织上还要老式的军队,难道还能期望些什么呢?

法国人在这方面是超群的,这一点毫不足怪。任何一个略有军事能力的国家,以阿尔及利亚战争⁸²那样大的规模进行了25年的小型战争⁶²,都不会不因此而使自己军队的战斗素质得到空前提高。当英国在印度和俄国在高加索主要是用专为这个目的而派出的军队进行战争的时候,大部分法国军队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经过锻炼了。法国的确从这次锻炼中获取了最大的益处,这次锻炼虽然在人员和金钱方面付出昂贵的代价,但在取得宝贵的战争经验方面是卓有成效的。继之而来的克里木战争是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锻炼,使士兵更

增强了信心,因为这次战争向他们表明,他们从历次对游牧部落和非正规部队进行的战役中所取得的经验,在对付正规部队时是同样有益和适用的。

在这种充满机遇的情况下,一个对于当兵打仗具有特殊才能的国家,应该说已使自己的战斗组织达到完善程度,超过其邻邦已取得的一切成就——这是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⁸³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的事实——,尽管如此,它仍然引起了惊讶,特别是在德国。这个国家的军事学究们太自以为是,相信自己比轻浮的、无常的、无纪律无道德的法国人高明,以致这一打击简直使他们目瞪口呆了。另一方面,奥地利和德国其他各邦军队的一些一贯反对马丁内特制度⁸⁴的比较年轻、比较有教养的一部分人,马上坚决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刚刚在马真塔打完仗的奥地利军官们首先道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们说,法国人战斗中不背背包,他们既没有领带和竖领,也没有瘦上衣和瘦裤子;他们穿的是肥裤子和肥大的折领上衣,脖子和胸部非常自在,头上戴着法式轻便军帽,子弹放在裤袋里。奥地利士兵每走到一个地方,总是疲惫不堪,气喘吁吁,而法国人却生气勃勃,歌声不绝,体力充沛。刚刚从战场上归来的奥地利军官们在书信中报道过这种情况,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其他军官们紧接着也是这样说。一个可怕的事实摆到了眼前。士兵们真的大胆地不在身上带大量累人的东西就跟敌人干起来了,这些东西差不多全是为了阅兵式和装门面用的,它们加在一起对一个士兵来说简直就是一件紧束衣。而且,尽管没有这件紧束衣,他们还是打一仗胜一仗。这个事实是这样严重,连德国各邦政府都不能闭眼不看了。

因此,军事改革在德国就摆到日程上了,这使一般的老保守们大为恐慌。最革命的军事理论提出来讨论不但不受制裁,而且甚至受

到各邦政府的重视。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士兵的服装，因为它造成了战场上两军间的最突出的差别。这个问题讨论个没完没了，就像众口难调一样。种种发明才能在军服问题上脱颖而出。制帽、头盔、高筒军帽、棉帽、上衣、短上衣、大衣、衣领、袖口、裤子、护腿和靴子，——所有这一切都争论不休，激昂慷慨，雄辩滔滔，真好像仅仅是这些东西决定了索尔费里诺会战的命运。奥地利人的军服式样最为过火。他们从差不多完全模仿法国样式(颜色除外)开始，经过了所有的过渡阶段，一直弄到短上衣和软宽边帽为止。不妨想像一下，一个呆头呆脑、保守拘谨的奥地利帝国士兵穿上法国猎兵的俏皮服装，或者还要糟糕，穿上1848年革命的德国志愿兵的短上衣和戴上他们的细毡帽，是副什么模样！这种对每一个极端都要加以认真考虑的做法，的确是对奥地利军事制度现状的莫大讽刺。通常的情况是：争论得精疲力竭而毫无结果；军事上的老保守们收回了一部分失去的阵地，整个说来，至少在奥地利会在军服方面搞些微不足道的改变，而在德国其他各邦军队中不见得会有什么改变，只有一点除外：普鲁士的头盔，这个浪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心爱的发明，看来势必先于它的发明者进坟墓。

其次一个大问题是背包。法国人不带背包进入战斗是有些轻率的；只不过因为他们走运，另外还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才说得过去。但是，如果这成了他们的习惯，那么，一旦天气骤然变冷或下起雨来，他们就会为此大吃苦头。实际上，普遍地采取这种做法，只不过意味着，在每次战斗中战败的军队不但会丢掉枪炮、军旗和备用品，而且会丢掉步兵个人的全部行装。因此，既然步兵轻装到使每个士兵所穿的只是他身上的那点东西，那野营时碰上几个雨天，就会使步兵的队伍完全紊乱。不过，真正的问题显然在于怎样才能把每个

士兵的个人行装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对行装中所包括的东西只从它们在一个战役中的实际用处来考虑，这个重要问题本来是能够很容易令人满意地解决的；但是在德国，辩论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除军服问题和背包问题以外，军队的各种分队的编制也在详加讨论。应当多少人组成一个连，多少连组成一个营，多少营组成一个团，多少团组成一个旅，多少旅组成一个师，等等。这又是一个可以一本正经和煞有介事地说出一大堆废话的题目。在每一支军队里，基本战术体系把连和营的定员和数目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旅和师定员的上限和下限取决于各邻国军队所实行的定员，以便在冲突时各个较大的战术单位之间差别不会太大。不从现有事实所决定的实际条件出发，而企图规定基本原则，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纯属胡说，这或许对德国的哲学家们合适，而与现实的人是不相称的。减少营的数目，把奥地利步兵团的数目从 63 个增加到 80 个，这同实行穿肥裤子和折领一样，保证不了他们“下一次走好运”^①。

但是当军服式样和关于旅的定员和编制的深奥见解吸引着全部注意力的时候，德国军事制度的大缺点和症结却被忽视了。军官们对一条裤子或一条衣领的式样争论得不可开交，而对德意志联邦军队⁸⁵中有 20 来种不同的野炮口径和差不多数不清的各种小型火器口径却安之若素，对于这样的军官们，老实说，我们应该作何感想呢？采用线膛枪是统一全德国的口径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是非但搞得马马虎虎丢人现眼，反而把事情搞糟了。有必要稍微谈谈口径的这种混乱情况。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有一种口径：0.53 英寸。它们用南德意志人在许多场合下表现出的实

^① 贺拉斯《颂诗》。——编者注

际的健全理智进行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改革,为5个联邦军规定了同一口径。普鲁士有两种口径:一种是所谓针发枪(Zündnadelgewehr)的口径,约0.60英寸,另一种是不久以前按照米涅原理嵌上膛线的旧式滑膛枪的口径,约0.68英寸。前者应当尽快地代替后者。第九军有3种不同的步枪口径和两三种滑膛枪口径;第十军至少有10种口径,而在预备师中几乎有多少营就有多少口径。现在可以想见在战斗行动时这支五花八门的军队的情形了。适用于每个部队的弹药总是在需要的时候随手可取,这可能吗?如果这不可能,那么这个部队岂不是一筹莫展和毫无用处吗?除奥地利、南德意志各邦和普鲁士以外,仅仅由于这一情况,没有一支部队在长时间的战斗中能真正顶用。炮兵也是一样。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巴伐利亚人,不直接去研究哪怕是适合于旧式六磅炮的一个共同口径,从而使之逐渐成为线膛野炮的共同口径,他们现在却各自铸造线膛炮,这只能加剧目前的口径不统一的情况。军队有这许多重大缺点,本来应该做一些比花时间去争论衣领和裤子以及旅和营的定员更为重要的事情。

在德国,只要上层人士一心想着建立军队是为了检阅而不是为了打仗,在军事上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种学究气一度被奥斯特利茨⁸⁶、瓦格拉姆⁸⁷和耶拿⁸⁸以及1813—1815年的人民热潮打下去,但很快就又抬头了;它一直主宰到1848年,看来,至少在普鲁士,在最近10年间还达到了顶点。假如普鲁士被卷入了意大利战争,佩利西埃差不多一定会给它的军队布置一个新的耶拿,只有莱茵的要塞才可能拯救它。这支军队已陷入如此境地,虽然就其士兵的素质而言,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支别的军队。一旦法国人和德国人未来发生冲突,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等待着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的特征再现。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 月
27 日—2 月 2 日之间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2 月 2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7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萨瓦与尼斯⁸⁹

尽管尚贝里省长明确地宣称，撒丁国王从来无意把萨瓦让给法国，而英国外交大臣却于本月2日在下院断然声明，去年夏天瓦列夫斯基伯爵以法国皇帝的名义拒绝了这个方案。然而，约翰·罗素勋爵的声明谈的是几个月以前的情况，那时被否定了的事，可能现在已经接近于实现了。当然，要使人相信在萨瓦居民中最近发展起来的拥护并入法国的运动纯粹由当地人发起，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个运动大概是由法国代理人煽动起来的，而维克多-艾曼努埃尔国王的政府则批准了这个运动，或者至少对它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萨瓦像瑞士西部各州一样，是法兰西民族占有完全的和决定性的优势的一个省份。人民都操南法兰西方言（普罗旺斯方言或利穆赞方言），书面的和正式的语言到处都是法语。可是这丝毫也不能证明萨瓦人愿意并入法国，特别是并入波拿巴的法国。据一位于1859年1月为了军事目的曾经在这个地区旅行的德国军官的见闻录记述，除了尚贝里和下萨瓦的其他几个城市以外，亲法派无论在哪里都毫无影响，而上萨瓦、莫列讷和塔朗泰斯认为最好是保持现状，沙布莱、福西尼和热内瓦这3个北部地区则认为最好是加入瑞士联邦，组

成它的一个新的州。但是,既然萨瓦居民完全是法兰西人,它无疑会日益倾向于法兰西民族的基本中心,并且最后会并入这个中心,这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尼斯的情况却不同,伯爵领地尼斯的人民也操普罗旺斯方言,但是这里的书面语、教育、民族精神都是意大利的。北意大利方言和南法兰西方言非常接近,几乎无法说明某种方言止于何地,某种方言起于何地。甚至皮埃蒙特和伦巴第的方言按其词尾变化来说也完全是普罗旺斯语,而具有拉丁语词根的词构成法实质上与意大利语相同。以这种方言为依据要求尼斯并入法国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在只是根据设想中的尼斯对法国的同情要求它并入法国,然而是否存在这种同情,那还大成问题。即使有这种同情,即使有特殊的方言,尼斯也完全是意大利的一个省份。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就是尼斯养育了杰出的意大利军人朱泽培·加里波第。而那种认为加里波第会成为法国人的看法简直是笑话。

单纯从财政观点来看,把这两个省割让出去并不会使皮埃蒙特受到很大损失。萨瓦是一个穷省,虽然能为撒丁军队提供优秀的士兵,但是它自己的行政费用从来都入不敷出。尼斯的财政状况也好不了多少,而且只是那么一小块地方。损失显然是不大的。尼斯虽然是意大利的一个省份,但为了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的统一可以把它牺牲,而失去像萨瓦这样一个外族人居住的省份甚至可以认为划得来,因为这样能促使意大利的统一。但是,如果从军事观点看这个问题,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现在法国和撒丁从日内瓦到尼斯这一段疆界几乎是一条直线。南面的海和北面中立的瑞士把通向意大利的一切道路都切断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发生战争,交战双方的处境看

来是一样的。但是，萨瓦和尼斯都位于以宽广的半圆包围着皮埃蒙特的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后面，而且这两省都向法国敞开着。所以，在皮埃蒙特和法国的疆界线上双方各占有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斜坡，而在疆界的北部和南部，意大利却占有阿尔卑斯山的两个斜坡，因此它完全控制着各个山口。

此外，由于交通往来很少，由皮埃蒙特经阿尔卑斯山通往法国的一切道路全都秽塞不堪，而由皮埃蒙特经塞尼山通往萨瓦的道路和由皮埃蒙特经滕达山口通往尼斯的道路却是欧洲交通的干线，维修得非常好。所以，在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历次战争中，如果进攻的方面是意大利的话，尼斯和萨瓦都是意大利入侵法国的天然作战基地，而如果进攻的方面是法国的话，它就必须夺取这两个省，才能向阿尔卑斯山后面的意大利发动进攻。纵然意大利人面对着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不能守住尼斯和萨瓦，这两个省仍然使他们有可能及时把意大利的兵力集中到皮埃蒙特平原，从而保证意大利免遭突然袭击。

如果意大利占有萨瓦和尼斯所得到的军事上的优势仅限于这些积极方面，那么牺牲这两个省份，仍然不致有什么严重损失。但是负面影响却非常之大。我们假定勃朗峰、伊斯拉山、塞尼山和滕达山口都是标示法国疆界的一个个大界桩。在这种情况下，疆界就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条直线，而是以一个巨大的圆弧包围着皮埃蒙特了。尚贝里、阿尔贝维尔、穆捷这样一些主要道路的汇合点就会变成法国的兵站。法国人会在塞尼山的北坡构筑防御工事并保卫北坡；两个国家的前哨就将在距离都灵只有两天行程的这个山脉的各个山顶上遭遇。在南面，尼斯将会成为法国各个兵站的中心，而前哨将设置在距离热那亚只有四天行程的奥内利亚。这样一来，即使在和平时期，法国人也是待在意大利西北部两个最大城市的门口，而且由于他们

的领土几乎从三面包围了皮埃蒙特，法国人将使意大利军队无法在波河上游谷地集结。把意大利兵力集中到亚历山德里亚以西的任何企图，都可能使军队在集中尚未完成以前就遭到攻击的危险——换句话说，可能使他们遭到被各个击破的一连串失败。这样一来，皮埃蒙特的防御中心便会立即从都灵移到亚历山德里亚；换言之，皮埃蒙特本身将无法进行认真的防御，而处于法国人的控制之中。路易-拿破仑正是把这一点称为

“自由的和感恩图报的意大利，它的独立只能归功于法国”。^①

我们如果转向北面就可以看出，那个对意大利长期存在的威胁，对瑞士来说也可能会成为致命的打击。当萨瓦成为法国的领土时，从巴塞尔到大圣伯纳德山口的整个瑞士西部就会四面都受法国领土的包围，一旦发生战争，连一天也守不住。这一点是这样明显，以致维也纳会议决定让北萨瓦和瑞士一样中立化，一旦发生战争瑞士有权占领并防御这个地区。只有400万人口的小国撒丁不可能反对这个决定，但法国是否可能并愿意让它的一部分领土因此在军事方面归属于一个别的而且还是较小的国家呢？一旦发生战争，瑞士能不能够试图占领法国的一个省份并把它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呢？当然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会在任何它觉得合适的时候像吞并萨瓦和尼斯一样，轻而易举地吞并整个瑞士法语区——伯尔尼汝拉山区、纳沙泰尔、沃州、日内瓦以及弗里堡和瓦莱的那些它认为合适的地区；而在这个时刻尚未到来以前，瑞士会一直处于法国强有力的控

^① 《拿破仑第三告驻意大利军队书。7月12日于瓦莱焦》，载于1859年7月14日《总汇通报》第195号。——编者注

制和影响之下,好像只是法国的一个卫星国罢了。至于说到瑞士在战时保持中立,其实只要一宣战这种中立就将不复存在。一旦有一个强大的和好战的国家随时都可能击溃它的中立的邻邦,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中立。

这个表面看来是无害的吞并萨瓦和尼斯的计划无非是要在意大利和瑞士建立法国的统治——使法国雄踞于阿尔卑斯山巅。在这个小步骤实现以后,到我们亲眼看到法国还企图雄踞在莱茵河上以前,难道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吗?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1 月
29 日—2 月 3 日之间

作为社论载于 1860 年 2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7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福格特先生⁹⁰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2 月
—11 月

1860 年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
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Herr Vogt.

Von

Karl Marx.



London,

H. Petzsch & Co., deutsche Buchhandlung

73, FENCHURCH STREET, E.C.

1860

卡·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 1860 年伦敦第 1 版的扉页



前 言

在柏林《人民报》、汉堡《改革报》以及德国其他报纸上，我发表了一项注有“1860年2月6日于伦敦”字样的声明。声明开头说：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起诉，因该报第37号和第41号社论^①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保留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的权利。”

我为什么决定用文字回答卡尔·福格特，而对《国民报》却要在法庭上予以回答呢？这一点，从这一著作可以看出来。

1860年2月间，我向法院控告《国民报》进行诽谤。案件经过四级预审以后，我在今年10月23日收到普鲁士王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该决定剥夺了我在终审法院的起诉权；因此，这一案件还未进行公开审理就被撤销了。如果真的进行了公开审理，像我有权期待的那样，那么本书的前三分之一就可从略，而光转载法院审理的速记记录就够了，这样也就免得我用极不愉快的写作来回答对我的人身攻击，从而也就用不着谈我自己了。我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自

^① 指弗·察贝尔《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载于1860年1月22日《国民报》第37号；《怎样伪造激进传单》，载于1860年1月25日《国民报》第41号。——编者注

己,以致福格特指望他的造谣诽谤会取得某些效果。但是,一切总归有个度^①。福格特在他那本内容拙劣的书里,——《国民报》用它所特有的手法叙述了该书的内容,——指责我干了许多丑事,现在,当我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在法庭上公开地驳斥这类货色的时候,就只有用文字予以驳斥了。但是,既然我要这么做,那么,除了上述别无选择的考虑之外,我还有要更详尽地揭露福格特对我和我党同志所发表的奇谈怪论的其他理由:一方面是德国的所谓“自由派”报刊对福格特捏造的揭露发出了几乎异口同声的胜利叫嚣和欢呼;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的分析,可以对这位代表了整个流派的人物作一论定。

对福格特的答复,使我不得不在某些地方对流亡者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面有所揭露。我在这里只不过是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可是,对流亡者(少数几个人除外)所能责难的,只不过是他们曾经抱过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的产生多多少少是当时各种情况所使然;此外,他们还干了一些蠢事,这些蠢事也是他们所面临的意想不到的特殊环境所必然引起的。当然,我这里所谈的不过是流亡者最初几年的情况。如果把大约从1849年至1859年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的历史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跟同一时期流亡者的历史加以比较,那就会是给流亡者所能写出的一部最出色的辩护书。

我早就料到,在福格特的内容拙劣的书出版时,因他的“揭露”的重要性而疑虑地摇头的那些聪明人,现在将无法理解我怎能耗费时间去驳斥这一类胡说;而那些曾经幸灾乐祸地在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急急忙忙散布福格特的庸俗蠢话和无聊谎言的“自由

^① 贺拉斯《讽刺诗集》。——编者注

派”文丐们，却会认为我对付他们和他们的英雄的一套办法是心怀叵测和粗鄙无礼的。但是这也无所谓！

对于本书的政治部分和法律部分，无须加以特别的说明。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只指出下面一点：那些早在 1848 年以前就已一致同意维护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独立不仅是维护这些国家的权利、而且也是维护德国和欧洲的利益的人，在 1859 年意大利战争¹⁸中德国对路易·波拿巴所应采取的策略问题上，却表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这种相反的观点是由于对**事实前提**所作的相反判断产生的，而对这些前提作出最后结论则应留待将来。至于我本人，在这一著作中只准备分析一下**福格特**及其同伙的观点。甚至那些他扬言要加以维护、而且在一群没有判断力的人的想像中已经加以维护的观点，实际上都不在我的批判之列。我只论述他**真正**代表过的观点。

在我撰写这一著作的过程中，给我以热情帮助的，不仅有党内的一些老朋友，而且还有许多过去与我疏远的、一部分素昧平生的栖身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流亡者，在此谨向所有这些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卡尔·马克思

1860 年 11 月 17 日于伦敦

硫 磺 帮⁹¹

克拉林：他胡说八道；
……他给自己擦上
硫磺膏。（卡德龙）^①

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赫尔曼**律师委婉地把他的那个长得像球一样圆的当事人、疑虚堡的世袭州官⁹²称之为“**圆满的人物**”^②；这位“圆满的人物”是这样开始他的长篇历史故事的：

“在 1849 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知名，或者也以**制刷匠帮**这一同样别致的名字著称；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看得见的首领。这伙人的政治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卡尔·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 年 12 月日内瓦版第 136 页）

载有这一重要消息的这本“主要著作”⁹³，出版于 1859 年 12 月。

① 卡德龙《神奇的魔术师》。——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圆满的人物”原文为 abgerundete Natur，既可理解为“身体肥胖的人物”，也可理解为“智力成熟的人物”；赫尔曼律师用的是后一意义。——编者注

但在8个月前,即在1859年5月,这位“圆满的人物”在《比尔商业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①,这篇文章应当看成是上述的冗长历史故事的纲要。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原始文字:

比尔“推销员”^②这样写道:“从1849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有一帮流亡者逐渐在伦敦聚集,其成员当时(!)在瑞士流亡界以‘制刷匠帮’或‘硫磺帮’著称。他们的首领是马克思,即科隆《莱茵报》的前编辑,他们的口号是‘社会共和国、工人专政’,他们的活动是四下串连、策划密谋。”(这段话又转载在“主要著作”第三编,文件第7号第31、32页)

这帮“在瑞士流亡界”以“硫磺帮”著称的流亡者,过了8个月以后,在更多的公众面前,竟变成了“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的一大伙人,而且“在流亡者中间”都以“硫磺帮”著称了。这是卡尔·福格特的老祖宗、不朽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兴高采烈地讲述的那个关于草绿色麻布衣的老故事^③。这位爵士现在又借卡尔·福格特的肉身还魂了,而且丝毫未减当年的风韵。从比尔“推销员”的原始文字中可以看出,无论“硫磺帮”或者“制刷匠帮”,都是瑞士的土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它们的发展史吧。

我从朋友们那里得知,在1849年到1850年间,的确有一个取名“硫磺帮”的流亡团体曾在日内瓦盛极一时;并且得知,伦敦西蒂区有一位地位显赫的商人西·路·波克罕先生能够提供有关这个独特团体的发生、发展和瓦解的详情细节,于是我就在1860年2月写信^③给这位我当时还不相识的先生,会面之后,我真的从他那里得到了下

① 指福格特《警告》一文。——编者注

② 对《瑞士商业信使报》的讽刺性称呼。——编者注

③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准确日期无从考证。——编者注

列扼要材料，现照抄如下：

“1860年2月12日于伦敦
万兹沃斯路18号林苑协会

尊敬的先生：

尽管我们9年来都同住一国，而且大部分时间还同住一城，但是直到3天以前我们还互不相识。不过您的设想是完全对的：我不会拒绝向您这位流亡中的难友提供您所希望获得的材料。

现在就来谈谈‘**硫磺帮**’。

1849年，我们起义者撤离巴登以后，有一些年轻人很快就聚到了日内瓦，其中有的是被瑞士当局遣送到那里去的，有的是通过自愿选择居留地去的。这是一些大学生、士兵或者商人，有的在1848年以前在德国就是朋友，有的是在革命时期互相认识的。

流亡者的心情很不愉快。所谓的政治领导者彼此推卸失败的责任。军事领导者为了退却中的进攻、侧敌运动和进攻中的退却而相互责难。流亡者彼此骂对方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大家都发传单，这种传单丝毫无助于使人平静下来。仿佛到处都是奸细。除此而外，大多数人的衣着都破烂不堪，许多人面带饥色。上述年轻人，就在这悲惨的境况下，结成亲密的友谊。这些人：**爱德华·罗森布卢姆**，出生在敖德萨，父母是德国人；曾在莱比锡、柏林和巴黎学过医；

麦克斯·科恩海姆，弗劳施塔特人，店员，革命爆发时是近卫军炮兵里为期一年的志愿兵；

科尔恩，柏林的化学技师、药剂师；

贝克尔，莱茵区的工程师；还有**我本人**。我于1844年在柏林维尔戴中学毕业以后，就在布雷斯劳、格赖夫斯瓦尔德和柏林上大学；1848年革命时，我在故乡（格洛高）当炮手。

我想，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24岁。我们彼此住得很近，有一个时期，甚至全住在大草地街的同一家房子里。在这个小国家里，很少有谋生的机会，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要因流亡者的普遍贫困和政治上的懊丧而苦恼和麻木不仁。气候和自然景色都非常宜人，——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勃兰登堡的过去，认为这个地方是天堂。我们当中谁要有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共有的，如果我

们全都一无所有，那我们就会找到一些好心肠的小饭馆老板，或者别的好心人，他们一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乐观的面孔，都乐于赊一点东西给我们。大概我们这些人都显得既非常老实又如痴如狂的缘故吧！在这里，应当以感激的心情提到‘欧罗巴’咖啡店老板贝尔坦，他不仅真正是源源不断地‘借贷’给我们，而且还‘借贷’给德国和法国的其他许多流亡者。1856年，在离开6年以后，我从克里木回来的途中访问了日内瓦，这只不过是为了怀着我这个善心的‘浪子’的谢意去偿还我欠他的债务。这位好心的又肥又胖的贝尔坦感到很惊奇，他要我相信，我是给他这种愉快的第一人，虽然他曾借给流亡者一两万法郎，而这些人早已被放逐到四面八方去了，可是他一点也不懊悔。他非常真情地打听我的密友的情况，却不提债务问题。可惜我能告知他的很少。

言归正传，现在还是回头来谈1849年。

我们开怀畅饮，尽情高歌。我记得，我们的座上有过政治色彩各异的流亡者，其中包括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种甜美的欢笑中度过的愉快夜晚，大家都觉得是整个流亡生活荒漠上的绿洲。有些当时已经是日内瓦大会议员或者后来成了议员的朋友们，时而来参加我们的酒宴，借以休息一番。

目前正在此地的李卜克内西，9年中我只在街上偶然碰见过三四次，当时也常同我们在一起。有些大学生、博士、过去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在假期旅行期间，往往同我们举杯共盏，喝下不少杯啤酒和好几瓶物美价廉的马康葡萄酒。我们有时竟整天整天地、甚至整周整周地在日内瓦湖上遨游而不登岸；我们高唱情歌，手弹吉他，在萨瓦或瑞士一侧的别墅窗前‘讨取欢心’。

毋庸讳言，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有时不免干出荒唐的越轨事情来。在这样的时候，那位一脸和善、现已去世的阿尔伯·加莱尔——法济在日内瓦公民中的颇有名气的政敌，就对我们好言相劝。他说：‘你们都是些棒小伙子。不过说实在的，要在这种毫无乐趣的流亡生活中保持心情愉快，就不应是身心两方面的弱者——这可需要韧性啊。’这算是这位好心人对我们最严厉的责备了。他当时是日内瓦州大会议员。

至于决斗，据我所知，只有过一次，那是我同一位R...n先生用手枪进行的。但是，决斗的原因根本不是政治性的。我的助手是日内瓦的一位只会讲法语的炮兵，公证人则是年轻的奥斯卡尔·加莱尔，上述那位大会议员的弟弟，可惜他此后在慕尼黑上大学时，因患神经炎而英年早逝了。罗森布卢姆和一位巴登的流亡者——冯·F...g中尉之间，本来也有一次决斗，但也不是政治性的；这个冯·F...g中尉后来很快就返回祖国，大概又参加了重建的巴登军队。由于

恩格斯先生——大概就是那位据说目前住在曼彻斯特、而我从那以后就不曾见过面的恩格斯先生，——的调解，这次纠纷在决斗的当天早晨、没有开始行动以前就友好地解决了。这位恩格斯先生当时路过日内瓦，他为人豪爽，我们在同他的交往中喝了不少瓶酒。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同他会面之所以感到特别开心，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支配他的钱袋。

我们既没有附和所谓蓝色的或者红色的共和主义政党首领，也没有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政党首领。我们让自己自由而独立地去判断——我并不认为这种判断始终是正确的，——那些帝国摄政、法兰克福议会议员以及其他清谈馆成员、那些革命的将军和军士或者共产主义的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我们甚至为此目的，也为了寻开心，创办了一家周报，报名是：

《喧 声》

游民群^①机关报

这家报纸只出了两期。后来，当法国把我抓起来要驱逐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法国警察当局没收了我的全部文件和日记本，因此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报纸是被当局查禁的还是因缺少经费自行停刊的。

‘凡夫俗子们’——他们之中有所谓资产阶级共和派分子，也有所谓共产主义工人队伍中的人，——给我们起了‘硫磺帮’这样一个绰号。有时候，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这样称呼自己。无论如何，我们团体仅仅采取了这个德文名词的敦厚意义。我现在还同一些被驱逐出来的同志——福格特先生的朋友，还同其他一些曾经是、也许现在还是您的朋友的流亡者，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从来没有从任何一方听到过有人轻蔑地谈起我所提到的‘硫磺帮’的成员，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私生活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我所知道的惟一存在过的‘硫磺帮’。它在1849—1850年存在于日内瓦。1850年年中，这个危险团体的寥寥无几的成员，除科尔恩外，都被迫离开瑞士，因为他们被列为应被驱逐的一类流亡者。从此我们的‘硫磺帮’就不再存在

①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绰号是送给德国的任何一个小议院中或者法兰克福议会中的所有自由主义政党的。我们想永远保存这个绰号。”（波克罕）

了。至于其他地方是否有过别的硫磺帮，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它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则一无所知。

科尔恩大概留在瑞士，在那里当药剂师安家落户了。科恩海姆和罗森布卢姆，在伊德施泰特战役前夕去了荷尔斯泰因。他们两人大概都参加了这场战斗。后来，他们于1851年漂洋过海到美国去了。罗森布卢姆于同年年底回到英国，于1852年前往澳大利亚；从1855年起，我就再没有从该地得到过有关他的点滴消息。据说，科恩海姆已经在《纽约幽默家》担任了一个时期的编辑。贝克尔早在当时，即在1850年就到美国去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可惜我说不准。

我本人是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度过1850年—1851年冬季的。上面已经提到，1851年2月法国警察当局用暴力把我驱逐到英国，此前，在3个月当中，把我转移了25个监狱，在途中，经常给我加上沉重的铁镣铐。我把在英国居住的第一年用来学了英语，接着就经商。我对祖国的政治事件时刻都兴趣盎然，但我始终不参与政治流亡团体的任何图谋。我日子过得还不错，或者像英国人所说的：‘好极了，先生，谢谢！’如果您一定要把这段冗长的而且绝不是很重要的历史看上一遍，那就得怪您自己了。

顺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西吉斯蒙德·路·波克罕”

这就是波克罕先生的信。也许“硫磺帮”预感到自己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预先就采取措施，用木刻把自己的户籍登记表镶进历史书中，也就是说，在《喧声》报的第一号上刊登了它的各位创办人的肖像。

“硫磺帮”的出类拔萃的先生们，曾经参加1848年9月司徒卢威领导的共和派起义⁹⁵，后来被关进布鲁赫萨尔监狱，一直到1849年5月，最后当兵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⁹⁶的战斗，结果被赶到瑞士境内。1850年，“硫磺帮”的两位主角——科恩海姆和罗森布卢姆到了伦敦，“聚集”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先生的周围。我不曾有幸同他们本人结识。从政治上说，他们同我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们企图在司徒卢

威领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同当时由我、恩格斯、维利希等人所领导的伦敦流亡者委员会⁹⁷相抗衡。他们的委员会发表的敌视我们的声明,是由司徒卢威、罗森布卢姆、科恩海姆、博布钦、格龙尼希和奥斯瓦尔德签署的,除其他报刊外,也曾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过。

在神圣同盟鼎盛时期,烧炭帮(烧炭党人)⁹⁸曾经是警察活动和贵族幻想的渊藪。我们帝国的高亮都亚^①,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起见,是否想按照利用烧炭帮的方式去利用“硫磺帮”呢?要是再有一个硝石帮多好,那就可以完成警察的三位一体了。卡尔·福格特也许不喜欢硫磺,因为他闻不得火药味。或者他就像某些病人一样,憎恨他自己的特效药吧?大家知道,神医拉德马赫⁹⁹是按照治病的药来区分疾病的。如此说来,赫尔曼律师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对他的当事人的称呼——“圆满的人物”,拉德马赫所说的“绷得像一面鼓似的肚子”,而更为伟大的医生菲沙尔特叫做“来自法国的大肚子”^②的东西,都该归入硫磺病之列了。这样一来,一切福斯泰夫式的人物就不止是在一个方面受到硫磺病的折磨了。或许福格特的动物良知提醒过他:硫磺对疥虫来说就意味着死亡,因而特别厌恶频频改变自己表皮的疥虫吧?因为,正如最新的研究证明,只有经过蜕皮的疥虫才有繁殖力,从而达到自觉。一方面是硫磺,另一方面是达到自觉的疥虫,真是妙不可言的矛盾!但不管怎样,福格特有责任向他的“皇帝”^③和德国自由资产者证明:“从1849年革命发生转折时起”,一切

① 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中的人物,这里借指福格特。——编者注

② 引自同上书。——编者注

③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不幸的始作俑者都是日内瓦的**硫磺帮**，而不是巴黎的**十二月帮**¹⁰⁰。为了惩罚我多年来对“十二月十日帮”¹⁰¹首脑和成员的粗暴攻击，他得把我本人封为被他搞得非常臭的、在他的“主要著作”问世以前我一无所知的**硫磺帮**的头目。为了使“令人喜欢的交谈者”的义愤易于为人理解起见，我在这里从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引述有关“十二月帮”的某些片断（见该书 1852 年纽约版第 31、32 页和第 61、62 页）。

“这个帮在 1849 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由波拿巴的代理人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①。在这个帮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贵族中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做短工的、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帮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

这个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一阶级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惟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甚至到后来，当他成了全能者，还把他的一部分昔日的共谋者同革命者一起流放

① 让·皮·皮亚。——编者注

到卡宴去，从而还清了欠他们的债，这个时候，也仍然是这个样子。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¹⁶，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洛涅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¹⁰²在他的十二月十日帮中，他搜罗了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要他们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顿扮演狮子^①一样……

十二月十日帮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场¹⁰³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¹⁰⁴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这个帮的成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装做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帮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秘密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帮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

①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1幕第2场。——编者注

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斯公爵在弗伦特运动¹⁰⁵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设施,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机关、法庭、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司令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购买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购买手段。

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买卖过程中流到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和成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莱·伯爵夫人,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①,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毋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加尔都西会修士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按分钟来计算。

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

①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了一个注,说明飞翔这个词也有盗窃的意思。——编者注

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俨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人们注意到，维隆-克勒维尔^①是十二月十日帮的道德说教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么人们对这个帮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好评：‘C’ est le roi des drôles’——‘这是丑角之王’^②。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和亲属拿来跟摄政时期¹⁰⁶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③……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像个魔术师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湮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¹⁰⁷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有朝

①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了一个注：“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韦隆博士为模特描摹出来的。”——编者注

② 埃·杜邦《内部纪事》。——编者注

③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加了一个注：“德·日拉丹夫人的话。”——编者注

一日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¹⁰⁸顶上倒塌下来。”^①

① 引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84—186和238—240页。——编者注

二

制 刷 匠 帮^①

“可是，坏蛋，在你的胸膛里，
没有信义、忠诚和正直的地位，
它只是充满了脏腑和横隔膜。”(莎士比亚)^①

我们在比尔的原始福音书中读到：“制刷匠帮”或“硫磺帮”（“主要著作”，文件，第31页）。我们在“主要著作”中读到：“硫磺帮”或者也称“制刷匠帮”（第136页）。

从这两种说法来看，“硫磺帮”和“制刷匠帮”是同一个帮。我们已经知道，“硫磺帮”在1850年年中已死亡了，消逝了。那么，“制刷匠帮”也该消逝了吧？“圆满的人物”是十二月帮的文明传播者，而文明同野蛮的区别，用傅立叶的话来说，就在于用复杂的谎言代替简单的谎言。^②

这位“复杂的”帝国的福斯泰夫同我们谈到了（“主要著作”第198页）一位阿布特，把他叫做“卑鄙中的最卑鄙的”。福格特对自己

① 《亨利四世·上篇》第3幕第3场。——编者注

② 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1841—1843年巴黎第2版。——编者注

用的是形容词原级,对他的阿布特用的却是形容词最高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把阿布特升为自己的奈元帅了,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谦逊!当福格特的原始福音书^①在比尔“推销员”上出现的时候,我曾请《人民报》编辑部转载这一原始诽谤书,并且不加任何评论。但编辑部仍然给它加了下列附注:

“上载诽谤书,出自一个名叫阿布特的堕落家伙之手。8年前,日内瓦德国流亡者公意法庭一致判定他干过各种不名誉的勾当。”(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第6号)

《人民报》编辑部认为阿布特是福格特的原始诽谤书的作者;它忘记了瑞士在战场上有两个里士满¹⁰⁹,——除了阿布特以外,还有一位福格特。

可见,这位“卑鄙中的最卑鄙的”在1851年春发明了他的“制刷匠帮”,福格特在1859年秋从他的元帅那儿把它偷了过来。他本能地把他那可爱的剽窃习气,从编纂博物学转移到警探式的著书立说。有一个时期,领导日内瓦工人协会的是一个制刷匠[Bürstenmacher]绍恩海默[Sauernheimer]。阿布特截取了绍恩海默的职业的一半和姓氏的一半——即职业的前一半和姓氏的后一半——,用这两个半截巧妙地拼凑成一个名词:“制刷匠帮”[Bürstenheimer]。起初他除了用这个绰号称呼绍恩海默以外,还用它来称呼绍恩海默的密友:波恩的康姆,职业是制刷匠;宾根的拉尼克尔,职业是装订帮工。他把绍恩海默封为制刷匠帮的将军,把拉尼克尔封为副官,把康姆直截了当地封为一名制刷匠帮成员。后来,当身为日内瓦工人协会会员的

① 卡·福格特《警告。5月23日于伯尔尼》,载于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特刊。——编者注

两个流亡者**伊曼特**(现在邓迪一所师范学校里任教)和**席利**(先在特里尔当律师,现在巴黎当律师)促使协会的公意法庭把**阿布特**开除的时候,阿布特发表了一篇满纸谩骂的诽谤文章^①,把整个日内瓦工人协会都升格为“制刷匠帮”。这样,我们便看到了泛指**的制刷匠帮**和特指的**制刷匠帮**。属于泛指的“制刷匠帮”的有日内瓦工人协会,走投无路的福格特曾经从它那里骗取了一份发表在《总汇报》上的贫困证明书^②,并且在**席勒**纪念会¹¹⁰上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1859年)对它顶礼膜拜。属于特指的“制刷匠帮”的有我提到过的那位我素不相识、从未到过伦敦的**绍恩海默**;被逐出日内瓦、后来经伦敦赴美国的**康姆**(然而他在伦敦探望过的并不是我,而是**金克尔**);最后是那位**非驴非马的拉尼克尔**,他作为制刷匠帮的副官留在日内瓦,“聚集”在“圆满的人物”的周围。事实上,他亲自充当了福格特的无产阶级。以后我还得回过头来谈这位**拉尼克尔**,所以这里只初步提供一些有关这个怪物的情况。**拉尼克尔**是**黑克尔**的进军失败之后由**维利希**指挥的**贝桑松流亡者兵营**¹¹¹中的一员。他在**维利希**的率领下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⁹⁶,后来同**维利希**一起逃往瑞士。**维利希**是他的共产主义的**穆罕默德**,后者原要用火和剑来建立一个千年王国。**拉尼克尔**是一个爱慕虚荣、夸夸其谈、忸怩作态的花花公子,比暴君还要残暴。在日内瓦,他在盛怒时曾疯狂地反对过“议员们”,他还作为新的退尔,特别威胁要“杀死州官”。但是,当**瓦洛特**,这个 30

① 阿布特《卡尔·福格特和卡尔·马克思或制刷匠帮》,载于 1861 年《时代呼声》第 39 期附刊。——编者注

② 《1859 年 8 月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载于 1859 年 8 月 23 日《总汇报》第 235 号。——编者注

年代的流亡者和福格特的总角之交,把他引荐给福格特的时候,拉尼克尔的凶残的情感却一变而为“人情的乳臭”^①。像席勒所说的:“这小子是州官手下的”^②。

制刷匠帮的副官成了福格特将军的副官;福格特将军之所以在军事上未享盛名,只是因为普隆-普隆认为那不勒斯的乌洛阿大尉(出于礼貌也被称为将军)在执行他的“旅行团”在意大利远征中承担的任务方面,是够糟糕的,而把他的巴洛留作后备,以便在莱茵河畔进行一场寻找“失去的战鼓”的大冒险¹¹²。1859年,福格特把他的拉尼克尔从无产者等级提升为资产者等级,帮他搞了一家商店(经营艺术品、装订、文具),此外还保证他得到日内瓦政府的光顾。制刷匠帮的副官成了福格特的“打杂的女仆”、义务听差、密友、莱波雷洛、心腹、采访员、造谣家、告密者,而尤其在脑满肠肥的杰克^③堕落之后,又是他的暗探和波拿巴在工人中间的招募人。据瑞士一家报纸^④不久前报道,有人发现了第三种刺猬,即兰刺猬或莱茵刺猬,它具有狗刺猬和猪刺猬的双重特性,是在阿尔沃河畔的巢穴中、洪堡-福格特的田庄上发现的。这种兰刺猬就是指我们的拉尼克尔吧^⑤?

请注意:惟一同我有过联系的日内瓦的流亡者,是《新莱茵报》前

① 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1幕第5场。——编者注

② 《威廉·退尔》第1幕第4场。——编者注

③ 在莎士比亚笔下,酒友们把约翰·福斯泰夫爵士叫做杰克。这里借指福格特——编者注

④ 《联邦报》。——编者注

⑤ 这是无法翻译的文字游戏:一方面,“兰刺猬”的德文是 Ran-Igel, 这个词同 Ranickel(拉尼克尔)这一名字的语音近似;另一方面,“猪刺猬”的德文是 Schweinigel, 这一个字还有另一种意思:卑鄙的东西。——编者注

编辑部同仁、目前在利物浦经商的恩斯特·德朗克博士，他对“制刷匠帮”是采取否定态度的。

我对伊曼特和席利的下列信件，只想谈这么几句：伊曼特在革命爆发时离开大学，当志愿兵参加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¹¹³。1849年，在席利和伊曼特领导下袭击了普吕姆军械库¹¹⁴；他们带着夺得的武器和自己的队伍从那里到了普法尔茨，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1852年夏初，他们被逐出瑞士，来到了伦敦。

“1860年2月5日于邓迪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不明白，福格特怎么能把你同日内瓦的事件扯在一起。那里的流亡者都知道，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只有德朗克同你有联系。碗礮帮在我去以前就已存在，我惟一记得属于这个帮的一个人是波克罕。

制刷匠帮就是日内瓦工人协会。这个名称是阿布特取的。协会当时是维利希秘密同盟的苗圃，我是这个同盟的主席。有许多流亡者参加工人协会，在协会根据我的建议宣布阿布特无耻，不配同流亡者和工人们交往以后，他急忙发表了一篇诽谤书，攻击我和席利犯有极其荒唐可笑的罪行。在这以后，我们在另一个地方，而且在完全另一些人的参加下重新提出这件事情。我们要求阿布特对他所写的诽谤书拿出证据来，他拒绝了。登策没有要我或席利进行任何辩护，就提议宣布阿布特是个无耻的诽谤者。这个提议再次获得一致通过。参加这次流亡者会议的，几乎全是议员。很抱歉，我写的材料很不完全，但8年来我回忆这件肮脏事还是第一次。我不愿受罪去写它，如果你居然能插手这盆脏水，那我将不胜惊奇。

再见！

你的 伊曼特”

有一位俄国名作家^①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同福格特先生过从甚

① 尼·伊·萨宗诺夫。——编者注

密,他用上封信结尾的精神给我写了一封信。

“1860年5月10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从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爱德华·西蒙的文章¹¹⁵中看到了诽谤您的谰言,深感愤怒。特别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原认为既不愚蠢也不凶恶的福格特,道德上竟堕落到了像他在他的小册子里所暴露出来的那样深的地步。我不需要任何证明,就深信您是不会玩弄卑鄙齷齪的阴谋的;而且,尤其使我感到痛心的是,他发表这些谰言,正好是在您赐给学术界一部杰出著作^①的第一部分的同一时刻,而您的著作的使命是改造经济科学,使之建立在新的更坚实的基础上……亲爱的马克思,请别理会这类下贱勾当;一切严肃认真的人、一切有良心的人都站在您一边,但他们期待于您的不是徒劳无益的论战,而完全是别的东西,——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地读到您的出色著作的续篇。您的成就在有思想的人中间享有崇高威望;如果有关您的学说在俄国得到回响的消息能使您感到愉快,那我愿意告诉您:今年年初,某教授在莫斯科举行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公开讲演^②,第一次讲演就是介绍您最近发表的著作。给您寄上一份《北方日报》,您可以看出您的名字在我的祖国受到何等尊重。再见了,亲爱的马克思,请多多保重,像往常一样地工作以开导世界,而不要去理会那些琐碎的蠢事和卑劣的行为。请相信一个忠实于您的人的友谊……”^③

匈牙利前部长瑟美列也写信对我说:

“您是否值得去理睬这类流言飞语呢?”

-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07—582页。——编者注
- ② 伊·康·巴布斯特《政治经济学报告集》,载于1860年1月24日《莫斯科消息报》第19号。——编者注
- ③ 萨宗诺夫和下引的瑟美列的信都是用法文写的,在手稿里马克思引用的是法文原文。——编者注

尽管有这些劝告以及类似的劝告，我为什么还要去插手——用伊曼特的那句粗话来说，——福格特的这盆脏水呢？这一点，我在本著作的前言中已经简单地谈到了。

现在还是回头来谈制刷匠帮。我把席利的信照录如下，包括同“本案”无关的东西。但是我删节了有关硫磺帮的部分，因为我们从波克罕的信中已经知道一些；还有几处我留做以后叙述使用，因为我必须把“我的心爱的题目”搞得相当巧妙，不想一下子就把全部秘密都道破。

“1860年2月8日于巴黎拉斐德路46号

亲爱的马克思：

很高兴从你上月31日的来信中得知有关你的直接消息。我本来就打算主动地给你写信，把你所要了解的关于有争议的日内瓦那些事告诉你，现在我就更加乐于这样做了。你写道，福格特把你同与你毫不相识的人搅在一起了，这一点不仅我一上来就这样看，而且此间所有在日内瓦的熟人偶然谈到此事时也都这么个看法。因此，为了维护真理，我应当把有关‘制刷匠帮’、‘硫磺帮’等等的情况告诉你。这样一来，你就会明白，你提出的两个问题：‘（1）制刷匠帮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干什么的？（2）硫磺帮是什么，由什么样的人组成，他们是干什么的？’提得正好。但是首先，我要责备你颠倒了前后次序，因为按照次序，硫磺帮应在前面。如果福格特想用魔鬼去吓唬德国的庸人，或者用硫磺去烧灼他们的脑袋，同时借此‘寻开心’，那他确实应该去找一些比这帮心地善良、情绪愉快的酒馆常客更吓人的魔鬼来充当这类角色。我们老一代的日内瓦流亡者毫无恶意地把这帮酒馆常客戏称为硫磺帮，而他们也非常善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这是一帮快活的大学生，他们在德国南部的各次起义和后来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应过考试并进行了实习，失败以后，便同他们的红色主考官和教官一道在日内瓦聚集力量，以便东山再起……不言而喻，根本没有到过日内瓦的人或在硫磺帮垮台以后才到日内瓦的人，是决不能加入这个帮的。这个帮纯粹是当地的而且是转瞬即逝的一朵花（其实可以把硫华称做升华物），但是，大概由于它的《喧声》所散发的革命气息，对瑞士联邦的神经来说是过于强烈的一种

气味吧,因此德律埃吹了一口气,这朵花就四处飞散了。很久以后,阿布特才到了日内瓦,又经过好几年,舍尔瓦尔也到了那里,他们‘各行其是’地散发着芳香,但决不是如福格特所说的那样,是在那早已凋零、早已枯萎和早已忘却的花束中散发着芳香的。

硫磺帮的活动大致可归纳为这样一句话:在主人的葡萄园里劳动^①。此外,他们还编辑自己的《喧声》,报上的题词是:‘留在这片土地上,靠微红的东西过活吧’^②。他们在报纸上巧妙而幽默地嘲笑上帝和世人,揭露虚伪的预言家,鞭笞议员们(由此招怒^③),同时,无论对自己或是对我们这些客人都不留情面,并且以值得称道的认真和公正,把一切的一切,朋友或敌人都加以漫画化。

他们同你毫无关系,也不曾穿过你的鞋会¹¹⁶的鞋,这是用不着对你说的。但是我也不能对你隐瞒,这种鞋不会合他们的心意。他们这帮革命的雇佣兵,暂时趿拉着战事沉寂的拖鞋四处游荡,等待革命把他们重新激发起来,并把革命的厚底靴(坚决前进¹¹⁷的千里靴)再发给他们。而谁要是敢于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工人专政等等去打搅他们的午休,那他准会大倒其霉。天啊!他们所干的那件工作,至多需要一个主持狂饮的人,而他们的经济学研究就是围着酒瓶和它所装的微红的东西团团转。有一次,一个客居此地的奥登林山的可敬的铁匠巴克菲施曾经说过:‘劳动权利当然是好事情,但让劳动义务见鬼去吧!’

……

因此,还是让我们把那块被如此不恭地掀开了的硫磺帮的墓碑放回原处吧。说实在的,为了防止以后再有人玷辱硫磺帮的陵墓,本应有一位哈菲兹出来歌唱‘愿它得到安息’^④。由于没有这样一个人来唱这样一支歌,在此就让‘他们全都闻过火药味’这句悼词作为他们的挽歌和墓志铭吧,而他们的那位亵渎神圣的历史编纂者却只不过嗅到了硫磺味而已。

当制刷匠帮出现的时候,硫磺帮的成员只不过在传说中,在日内瓦市侬们的注册簿上和日内瓦美人儿的心上照老样子继续活着。制刷匠和装订工绍

① 引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了《旧约全书·诗篇(第37篇)》上的说法:原意是“诚实地过活”,现把“诚实的”的原文 redlich 改成 rötlich(微红的、微红的东西)。——编者注

③ 据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1首诗。——编者注

④ 《旧约全书·诗篇(第4篇)》。——编者注

恩海默、康姆、拉尼克尔等人同阿布特吵了架；因为伊曼特、我和其他人热烈支持他们，于是我们就引起了阿布特的仇视。为此，阿布特被邀参加一次全体会议，流亡者和工人协会作为贵族法院甚至作为最高法院参加了这一会议。他出席了这一会议，在会上他不仅不坚持他对许多人的攻击，而且直截了当地声称攻击是他捏造的，作为对他的敌手们同样是捏造出来的指控的报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复维系着世界！’——他这样说。在阿布特勇敢地对这一套报复手法进行了辩护，并一再企图使高等贵族们相信这套手法的实际作用之后，有人提出了控告他的证据；在这以后，会议断定他进行了恶意诽谤，并且揭露他犯了其他过错，因此判决把他开除。为了报复，他就把高等贵族——最初只是上述那几个手工业者，——取名为‘制刷匠帮’。你知道，这是上述那个绍恩海默的职业和姓氏的一种成功的结合，因而你应当把绍恩海默尊崇为制刷匠帮的老祖宗，但是，你却无权把你自己算做这一族的成员或者归附这一族，不管它是行会或是贵族等级。要知道，他们当中从事‘组织革命’的那些人，并不是你的信徒，而是你的敌人。他们把维利希尊崇为天父，或者至少尊崇为教皇，而把你诬蔑为敌基督或敌对教皇，因此，那个被认为是你在日内瓦教区的惟一拥护者和特使的德朗克，除了酒会（他在这种场合在同辈中数第一），被排除在一切会议之外。但是，制刷匠帮和硫磺帮一样，纯粹是昙花一现的东西，也被德律埃一口大气吹散了。

阿加西斯的这位学生^①竟能陷入这类日内瓦流亡者的化石中，并且从中取得了在他的小册子中已提供的那类博物学方面的臆造，这事对制刷匠帮种来说是格外奇怪的，因为在他的动物研究室里就有一个原始制刷匠帮成员拉尼克尔，正好是从那里搞来的反刍类中的乳齿象的绝妙标本。显然，反刍得不正常，或者是上述那位学生对反刍的研究是错误的……

这就是你所要求的一切，甚至还超过了。现在我也想向你提出一点要求，就是我想知道你对扣除部分遗产以利于祖国，换言之，以利于国家，把它当作国家主要财政来源这样一个问题有何看法；不言而喻，这只是对大宗遗产而言，并要废除由无财产阶级负担的一切赋税……除了遗产税这个问题以外，我还在思考德国的两个法规：‘土地合并’和‘抵押保险’。我想把这两个法规介绍给法国人，他们对于这些法规简直一无所知，除少数人以外，他们只看到莱茵河对岸

① 福格特在 1840—1844 年曾给瑞士自然科学家阿加西斯当助手。——编者注

的浓雾和酸白菜。不久前,《联盟报》倒是一个例外;它在抱怨地产过分分散时正确地指出:‘最好是立刻采取在一部分德国土地上已行之有效的坚决措施,即在十分之七的土地占有者都要求重分土地的所有村社中,强制重分土地。重分土地将有助于排涝、灌溉、合理耕作以及田间道路的修建’。《世纪报》也谈到这个问题;这家报纸本来就有些目光短浅,在观察德国问题时更是如此,由于它像第欧根尼炫耀自己的破烂外套那样自鸣得意地炫耀它的沙文主义,因而格外饶舌;它竟把这道菜冒充爱国主义,每天加一加热以飨读者。这家沙文主义的报纸在向它的 *bête noire* [骇人的怪物,令人憎恨的东西]①——《联盟报》客气地说了一声早安之后,就叫了起来:‘土地占有者,听从这个劝告吧!赶快要求强制重分土地;为了大所有者的利益抢光小所有者。啊,最幸运的乡下人,——要是他们知道强制重分土地的好处该多好!’好像在按所有者的人头投票时,大所有者会战胜小所有者似的。

其他方面,诸事听其自然,帝王的我给帝王,上帝的我给上帝②,‘魔鬼的一份’③也是如此。谨向你致老朋友的敬礼。

你的 席利”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既然日内瓦在 1849—1850 年有过“硫磺帮”,而在 1851—1852 年有过“制刷匠帮”,这两个团体不论彼此之间或者同我之间,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么,我们的议会小丑所发现存在过的“硫磺帮或制刷匠帮”,不过是他的非分之想,弥天大谎,“大得同臆造它的人一个样”。试想有一个历史学家竟会这样恬不知耻地断言: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有过一帮人,他们以“社会小组”¹¹⁸知名,或者也以“雅各宾党人”这一同样别致的名字著称。

至于他所制造的“硫磺帮或制刷匠帮”的生活和活动,那我们的这位小丑老兄避免为此花任何生产费用。我只举出一个例子:

① 直译是:“黑色的野兽”。——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编者注

③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第 1 幕第 2 场。——编者注

这个圆满的人对他的惊讶的庸俗读者说：“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不得再反抗敲诈的企图，并拿出钱来（“他们不得再反抗敲诈的企图”——也是个好地方^①），以便这个帮对败坏他们名誉的那些事实保密。这些人（即福格特一手制造出来的人）向德国寄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公开威胁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主要著作”第139页）

为什么福格特连“一封”信都不公布呢？因为“硫磺帮”写了“几百封”。即令恐吓信贱得像乌莓子^②，福格特仍然会赌咒发誓地说：我们连一封信也不应当看见。如果明天叫他出席格吕特利联盟¹¹⁹的公意法庭，要他对“几百封”“恐吓信”给以说明，那他会从腰里掏出酒瓶，但不是信件，会把舌头弹得一响，用手指打一个榧子，并且会因锡仑式的哈哈大笑而抖动肚子，同他的阿布特一起喊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复维系着世界！”

① 这句话出自一件轶事。一个妇女想安慰一位在莱比锡大战(1813)阵亡的士兵的母亲，于是就说：“那也是个好地方”。——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了福斯泰夫的话(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第2幕第4场)。——编者注

三

警 察 作 风

“州官想出了多么新奇的花样!”

(席勒)①

“我公开宣布”，——福格特摆出一副小丑姿态，一本正经地说，——“我公开宣布：凡随马克思及其同志参与任何政治阴谋的人，迟早将落入警察之手；这类阴谋已为秘密警察知悉，他们一开始就得到有关这类阴谋的密报，并将在适当时机孵出这类阴谋来（看来阴谋是鸡蛋，而警察是孵蛋的母鸡）。马克思之流主谋犯当然将逍遥法外，稳坐伦敦（而警察则坐在鸡蛋上）。要为这种论点提出证据，我现在并不为难。”（“主要著作”第166、167页）

福格特现在并不“为难”，福斯泰夫则从来都不“为难”。“撒谎”——你们爱怎么撒就怎么撒吧，但是“为难”②吗？那么，你的“证据”，杰克，你的“证据”呢③。

① 《威廉·退尔》第1幕第3场。——编者注

② 撒谎的德文原文 verlogen 和“verlegen”（为难）这两个形容词发音近似。——编者注

③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第2幕第4场。——编者注

1. 自 供

“马克思自己在他 1853 年出版的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第 77 页上说过：‘1849 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 1848 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 1849 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诅咒它们，监狱冲散它们；而形势又总是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马克思在这里把自己委婉地（福格特如是说）称为‘形势’。”（“主要著作”第 167 页）

总之，马克思说：“警察当局从 1849 年以来破获了一系列秘密的联合会”，但是形势又使它们恢复起来。福格特说：不是“形势”，而是马克思“恢复了秘密的联合会”。于是福格特便证明：每当巴登格¹²⁰的警察当局破获了玛丽安娜¹²¹的时候，马克思便按照他同皮埃特里的协议又把它恢复起来。

“马克思自己说的！”现在我不妨引证一下上下文，看一看马克思自己是怎么说的：

“从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即政党组织的合法手段。尽管反动派猖獗，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还是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了通过某种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条件。1849 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 1848 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 1849 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诅咒它们，监狱冲散它们；而形势又总是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这些秘密团体中有一部分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这在

法国是正当的…… 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 不容置疑,在这里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会重新参加反对现状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 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¹²²并不是一个密谋团体……”(《揭露》波士顿版第 62、63 页)¹²³

但是,即使仅仅是“宣传”也被残酷无情的州官痛斥为罪行,当然,由皮埃特里和莱蒂操纵的宣传不在此例。州官甚至准许“宣传鼓动、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活动的大本营要设在罗亚尔宫¹²⁴,设在他所心爱的亨利、海利奥加巴尔、普隆-普隆那里。可是“宣传”竟在无产者中间进行!呸,见鬼去吧!

在《揭露》中,在上引的、为检察官福格特巧妙歪曲了的那一段文章下面,我接着说:

“不言而喻,这种秘密团体(如共产主义者同盟)^①,对于某些人来说,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用密谋活动的那种戏剧外衣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而首先是打算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上捞到一份战利品,博得民主主义叫卖者的拥戴。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也可以说,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即使不是要求真正的密谋,至少要求密谋的外表,因而要求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结成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

① 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后加的。——编者注

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维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公债¹²⁵的活动中是以承揽人的身份出现的。”（第 63、64 页）^①

而福格特究竟怎样把这一段话“委婉地”译成他的不知所云的警察行话呢？请听：

“只要两个〈党〉还共同行动，它们就像马克思自己说的那样，从事组织秘密团体和败坏大陆上的团体和个人的名誉。”（第 171 页）

不过，这个脑满肠肥的浑蛋忘记指出，这是马克思在《揭露》的哪一页上“自己说的”。

“他是骗子和一切谎言之父”^②。

2. 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

“大胆查理”，“勇敢的卡尔”，俗称卡尔·福格特，现在给我们讲穆尔滕的失败。¹²⁶

“很多工人和流亡者都被〈即被李卜克内西〉花言巧语说服了，因此终于决定在穆尔滕召开革命代表大会。各地方分会的代表都应秘密前往该地，他们打算在那里讨论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事的最终日期。全部准备工作都绝对保密，通知只由李卜克内西先生的心腹和他的通讯员送发。代表们或步行、或乘船、或坐车从四面八方方向穆尔滕集中，但旋即落入宪兵手中，宪兵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用这种办法抓到的这一伙人，在弗赖堡的奥古斯丁寺院里拘押了一个时候，后来被送到英国和美国去了。李卜克内西先生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535 页。——编者注

②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 23 首歌。——编者注

受到了特别关照。”（“主要著作”第168页）

“李卜克内西先生”参加过司徒卢威领导的1848年9月暴动⁹⁵，后来在巴登坐牢，一直到1849年5月中，巴登爆发武装起义¹²⁷时才获得自由，接着参加了巴登国民炮兵队当普通兵，后来被福格特的友人布伦坦诺当作造反者再度投入拉施塔特的要塞囚室。第二次获释后，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参加了由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率领的师团，最后同司徒卢威、科恩海姆、科尔恩和罗森布卢姆一起越过法国边境，前往瑞士。

当时，我对“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瑞士“革命代表大会”的了解，比对伯尔尼凯斯勒大街本茨酒馆老板那里举行的酒馆代表大会的了解还要少。在酒馆里，满桌的议会豪杰们再次兴高采烈地嘟囔他们在圣保罗教堂¹²⁸发表的演说，把未来的帝国席位编成号码相互分配，并且听取大胆查理的那一套大吹大擂、粗野笑话、淫词秽语和夸夸其谈来消磨流亡生活中的难熬夜晚；这位大胆查理当时略带幽默并仿照德国一个古老传说，亲手为自己开出一份“帝国酒鬼”的特许证。

“传说”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喝酒本属常事，
酒徒却当儿戏；
令人眼花缭乱，
倒也不足为奇。
大高脚杯何用之有，
孟形缸也不中意，
大腹杯怎能解忧，
拿大桶来吧，
真不愧为酒鬼天下第一；

就是大鹿和水牛
也从来不那么大口大口喝着争高低。”^①

然而，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吧。“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起事的日期！”“绝对保密的准备工作！”“或步行、或乘船、或坐车绝对秘密地从四面八方集中”。这位“勇敢的卡尔”钻研我在《揭露》中戳穿的施梯伯的那一套手法，显然没有白费力气。

实际情况很简单：李卜克内西在1850年初担任日内瓦工人协会主席。他建议当时在瑞士的彼此毫无联系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联合起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于是便决定向24个不同的工人协会发出书面通知¹²⁹，邀请它们到穆尔滕集会，讨论拟议中的组织问题和创办共同机关报问题。日内瓦工人协会内部的辩论，通知书的分发，其他24个工人协会内部有关此事的讨论，都是公开进行的，举行穆尔滕代表大会的日期也是公开的。如果瑞士当局想禁止这个大会，那它在开会前一个月就能办到。但是自由派分子德律埃先生的计划，却是玩弄戏剧性的警察手腕，他在物色一个他可以一口吞下去的人，以便让当时正在火头上的神圣同盟消消气。作为工人协会主席在代表大会通知书上署名的李卜克内西，获得了主谋者的荣幸。人们把他同其他代表隔离开，在弗赖堡塔楼顶上给了他一处免费住所，他能在那里极目远眺，自得其乐，甚至享有每天在塔楼平台上散步一小时的特权。对待他的惟一独特之处，就是把他隔离监禁。他曾多次请求把他同其他代表关在一起，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绝。但福格特懂得，警察当局对

^① 引自13世纪德国的一首打油诗《酒鬼》。——编者注

自己的“moutons”^①是不予隔离的，反而要把这些“令人喜欢的交谈者”掺进人堆里去。

两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同一位姓格贝尔特的人一起被弗赖堡警察局长遣送到贝桑松，在那里，他像他的这位盟内同志一样，得到了法国当局强制前往伦敦的通行证，并被警告，要是他们不按照指定路线前往，就要把他们发配到阿尔及尔。由于这次出乎意料的旅行，李卜克内西失去了他在日内瓦的大部分什物。不过，也应当对卡斯泰拉先生、沙勒先生以及当时弗赖堡政府的其他委员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对待李卜克内西，也像对待穆尔滕的所有囚徒一样，是非常人道的。这些先生们还记得：不过是几年以前，他们自己也蹲过监狱或者流亡过，因而公开对大科夫塔¹³⁰·德律埃强加于他们的那种看守职责表示厌恶。对被捕的流亡者的待遇，并不像流亡的“议员们”所想的那样。因此，目前还在瑞士的一个家伙，H某人，议员们的同志，认为有责任出版一本抨击性小册子，来痛骂所有被捕的人，特别是被捕的李卜克内西，因为他们的“革命”思想超出了议会健全理智的界限。而“大胆查理”对于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特别关照”似乎还耿耿于怀。

我们这位“大胆者”的全部蹩脚文章的特点，就是剽窃。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瑞士自由派习惯于对他们的牺牲者散布流言飞语，说他们犯了间谍罪，以便使自己的粗暴驱逐令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法济驱逐了司徒卢威，公开宣布他是“俄国间谍”。同样地，德律埃宣布布瓦绍是法国间谍。图尔特下令在日内瓦大街

① 意为“公羊”，指专门放进被捕者中间去的密探，旨在刺探必要的情报。——编者注

上突然把席利抓起来要送往伯尔尼监狱塔楼以后，也是用同样手法对付他的。当席利提出为什么这样粗暴对待他时，权大无边的图尔特回答说：“联邦委员、市长凯伦先生要求驱逐您。”席利说道：“那就让我见见凯伦先生。”图尔特却说：“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先生扮演日内瓦警察的角色。”这一回答的逻辑，跟同一个图尔特在担任瑞士驻都灵公使时所表现的绝顶聪明相比，可说是毫无逊色；在萨瓦和尼斯的割让已是既成事实之后，他写信告诉瑞士联邦主席说：加富尔拼命反对这种割让。然而，也许是同铁路有关的外交问题当时把图尔特的正常机敏弄迟钝了。席利刚刚被极其严格地单独监禁在伯尔尼，图尔特就着手给他的粗暴的警察行动点缀“自由主义的性质”，就向德国的流亡者，例如芬克博士，窃窃耳语：“席利同凯伦秘密勾结，向他密告日内瓦的流亡者……”甚至日内瓦《独立报》当时也认为：“把系统地诽谤流亡者提高为国家原则”是日内瓦政府的恶名昭著的罪孽（见附录1）。

德国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瑞士的自由派便把所谓的“首领”驱逐出境，从而破坏了避难权，——它本来以革命军残部不在巴登土地上作最后一战为条件答应了避难权。后来也轮到了“盲从者”。成千的巴登士兵受到愚弄和欺骗，接受了回国护照，可是他们一回国就落到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宪兵们手里。随后是神圣同盟¹³¹的威胁，随威胁而来的是穆尔滕的警察手腕。但是，“自由主义的”联邦委员会¹³²还不敢像“勇敢的卡尔”走得那么远。它只字未提“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事的最终日期”。为了面子关系而不得不进行的侦查，结果是一无所获。

外国的“战争威胁”和“政治宣传倾向”，——这就是“为难的”联邦委员会为了给自己辩护而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闪烁其词地提到的一

切(见附录2)。“瑞士自由主义”警察的丰功伟绩,决不因造出了“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而达到顶点。1851年1月25日,我的朋友威廉·沃尔弗(“议会的羊群”给他取名为“议会的狼^①”)从苏黎世写信告诉我:

“联邦委员会通过迄今所采取的措施,已使流亡者从11 000人减少到500人,但是,它在没有把不拥有相当财产或特殊关系的一切人都赶出去以前,是不会罢休的。”

不言而喻,为革命奋斗过的流亡者是敌视圣保罗教堂的英雄好汉们的,因为后者以无休止的空谈断送了革命。这班英雄好汉竟然毫无顾忌地让他们的对手落入瑞士警察当局手中。

福格特的心腹——拉尼克尔这个怪物,在席利到了伦敦之后曾亲自写信告诉他说:

“请设法在某一家比利时报纸上搞几栏来刊登声明,并请不要放过机会来使那些卑鄙的德国狗(议员们)在美国不得安生,因为他们已把自己出卖给那个大脖子外交官(德律埃),成了他的工具。”

现在,大家就懂得“大胆查理”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了:

“我竭尽全力限制流亡者的革命奔波,并为他们在大陆上或海外寻找栖身之所。”^②

在《新莱茵报》第257号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读到以下一段话:

“海德堡1849年3月23日。我们的友人福格特,左派的先锋战士,帝国当代的幽默家,帝国未来的巴罗,防止革命的‘可靠报警器’,正在同——一些志同

① 文字游戏:“沃尔弗”的德文是Wolff,“狼”的德文是Wolf。——编者注

②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日内瓦版。——编者注

道合的人？不！——同一些真正的反动分子联合起来。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把逗留在斯特拉斯堡、贝桑松和德国边境其他地方的‘人物’发送到美国去，换言之，就是流放到美国去……卡芬雅克的军刀制度当作惩罚强加于人的东西，这班先生们却想以基督之爱的名义来得到……大赦死了，流放万岁！当然，在这里少不了虔诚的欺骗^①，如竟说什么流亡者自己希望迁移等等。但是，有人从斯特拉斯堡给《湖滨小报》写信说，这种渴求流放的传言在所有流亡者中间掀起了真正的怒潮，等等。他们全都希望很快回到德国，即令像福格特先生所动人地指出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因此而冒参与某种‘疯狂大胆的行动’的风险。”

关于“大胆查理”的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已经说得够多了。

3. 舍尔瓦尔

“这场玩笑的妙处，是在听听这个肥胖的无赖会向我们讲些什么海阔天空的谎言。”^②

在我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舍尔瓦尔的密谋¹³³。我在那里指出，施梯伯怎样同舍尔瓦尔（克雷默的假名）这一工具，怎样同卡尔利埃、格赖夫和弗略里这些产婆，捏造了所谓巴黎德法九月密谋¹³³，以便弥补引起“科隆检察院”不满的对科隆被捕者的控告所缺乏的“客观犯罪构成”。^③

科隆案件¹³⁴期间，我所提出的辩护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舍尔瓦

① 纳·奥维狄乌斯《变形记》。——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第1幕第2场。——编者注

③ 在我的《揭露》印成之后，我才知道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以及普鲁士警探贝克曼（当时是《科隆日报》记者）和佐默尔也都参与了这件事。

尔为一方同我和科隆被告们为另一方没有任何关系,以致同一个施梯伯在10月18日(1852年)还发誓作证,说他的舍尔瓦尔同我们是一伙,而在1852年10月23日(《揭露》第29页^①)就又否认了这项证词。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他只好放弃把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我们扯在一起的打算。施梯伯总归是施梯伯,但施梯伯毕竟还不是福格特。

我认为在这里重复我在《揭露》中所援引过的关于所谓九月密谋的说明,是完全不必要的。1852年5月初,舍尔瓦尔回到了伦敦。他原是在1850年夏初,出于业务上的原因从伦敦移居巴黎的。1852年2月,他被判刑,没过几个月,巴黎警察当局就放他逃跑了。回到伦敦之初,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¹³⁵(我和我的朋友们在1850年9月中就已退出了该协会)把他当作政治蒙难者来欢迎。但是这场骗局的寿命并不长。舍尔瓦尔在巴黎的丰功伟绩很快便真相大白,于是也就在1852年5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无耻之徒赶出了协会。1851年5月初被捕的科隆被告们,仍然在审前羁押之中。从密探贝克曼由巴黎寄给他的机关报《科隆日报》的一篇简讯^②中,我了解到:普鲁士警察当局企图事后捏造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科隆被告们有关系。因此,我开始寻找有关舍尔瓦尔的材料。结果我发现,舍尔瓦尔曾在1852年7月向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前大臣和著名折中主义哲学家冯·雷·^③先生表示甘愿充当奥尔良派⁴⁴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01页。——编者注

② 《对舍尔瓦尔等人的指控。2月25日于巴黎》,载于1852年2月28日《科隆日报》第51号。——编者注

③ 沙·弗·玛·雷缪扎。——编者注

密探。冯·雷·先生同巴黎警察局保有联系，这使他得以从那里的舍尔瓦尔档案中弄到一些摘要。在警察局的法文报告中，舍尔瓦尔就是通称为弗兰克的舍尔瓦尔，他的真姓是克雷默。档案上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曾经是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哈茨费尔特公爵的密探，在法德密谋中是一个叛徒，目前还是法国的密探，等等。科隆案件期间，我把这些材料通知了一个辩护人——律师施奈德第二先生，并授权他在必要时说出这些材料是我提供的。当施梯伯在10月18日开庭时发誓说爱尔兰人舍尔瓦尔——他自己说1845年曾因伪造票据在亚琛坐过牢，——仍然被关在巴黎的时候，我立即经当次邮班通知施奈德第二先生：莱茵普鲁士人克雷默化名舍尔瓦尔“仍然”住在伦敦，每天同普鲁士警监格赖夫接头，而这个已被判刑的普鲁士罪犯，英国立即会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把他引渡的。如果把他弄到科隆去当证人，施梯伯的把戏就会被彻底戳穿。

在施奈德第二穷追不舍之下，施梯伯终于在10月23日宣称，他听说舍尔瓦尔好像已从巴黎逃跑，但他又庄严发誓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位爱尔兰人现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他同普鲁士警察当局有合作关系。实际上，舍尔瓦尔当时已被调到伦敦格赖夫那儿去做临时工作，每周领取固定薪俸。我的材料在科隆陪审法庭上引起的关于“舍尔瓦尔的秘密”的辩论，迫使舍尔瓦尔逃离伦敦。我听说他到泽西岛执行警务去了。我好久不知道他的行踪，直到从纽约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的一篇日内瓦通讯^①中，才偶然得知舍尔瓦尔于1853年3月化名纽金特潜入日内瓦，1854年夏天又从日内瓦跑走了。可见，

^① 《所谓的密谋……[通讯]1854年4月16日于日内瓦》，载于1854年5月27日《工人共和国报》第22期。——编者注

他在日内瓦会见福格特时,是在我的那本使他名声扫地的《揭露》由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几周之后。

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福斯泰夫式的历史故事吧。

福格特硬说他的舍尔瓦尔假装逃出巴黎以后马上就到日内瓦去了,可是在这以前他也曾硬说:舍尔瓦尔在九月密谋被发现前“几个月”,已由共产主义秘密同盟(同上,第172页)从伦敦“转送”到巴黎去了。这样一来,从1852年5月到1853年3月这段时间便完全不见了,而从1850年6月到1851年9月这段时间则被缩短成“几个月”。只要有一位福格特能在科隆陪审法庭上向施梯伯发誓说,“共产主义秘密同盟”是在1850年6月“从伦敦”把舍尔瓦尔派到巴黎去的,施梯伯就会什么都干;只要能看到福格特同他的施梯伯一起坐在证人席上冒汗,我也会不惜付出一切!发誓的施梯伯同他的鸟儿格赖夫、他的维尔穆特以及他的小家伙戈尔德海姆,同他的 *Bettelvogt* ——^①这是多可爱的一帮人啊!福格特的舍尔瓦尔到日内瓦去时,“给马克思及其同伙的所有熟人”带去了“介绍信,很快纽金特先生便与这些人形影不离”(同上,第173页)。他“在《总汇报》的一位记者家里住了下来”,并且找到了——大概是由于从我这里得到的介绍信(《揭露》)——接近福格特的机会,后者给了他一份石印工作(同上,第173页),而且同他,就像从前同约翰大公、接着又同普隆-普隆那样,发生了某种“学术上的联系”。“纽金特”有一天在帝

^① 格赖夫、维尔穆特和戈尔德海姆是科隆案件中涉及的几位警官的姓,外文分别是:Greif, Wermuth 和 Goldheim(小称是 Goldheimchen)马克思用它们作文字游戏:Greif 有“兀鹰”的意思, Wermut 有“苦痛”和“苦艾”的意思, Goldheimchen 有“金黄色的蟋蟀”的意思; Bettelvogt 直译是:“乞丐总管”,在这里则指福格特。——编者注

国摄政²⁹的“办公室”里工作，一位“熟人”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并暗示他是个“奸细”。事实上，纽金特在日内瓦不仅同福格特打交道，而且忙于“建立秘密团体”。

“舍尔瓦尔-纽金特主持会议、做记录、负责同伦敦通信。”(同上，第175页)“他骗取了一些不太聪明的、但一般说来是好样的工人人们的信任”(同上)，但是，“在团体的成员当中，还有马克思集团的一个喽啰，大家都认为他可疑，是德国警察当局派来的密探”(同上)。

舍尔瓦尔-纽金特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的“所有熟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喽啰”。而这一个喽啰又分成“留在日内瓦的马克思的喽啰们”(第176页)，后来纽金特不仅“从巴黎”同这些喽啰们“继续通信”，而且他还像磁铁一般，把他们“吸引到”巴黎“他的身边”来(同上)。

又是麻布“衣服”“换成”草绿色衣服的老故事！

舍尔瓦尔-纽金特要建立他的团体的目的是：

“大量制造和发放假银行券和假国库券，借以破坏专制者的信用和搞垮他们的财政”(同上，第175页)。

看来舍尔瓦尔是在模仿著名的皮特，大家知道，这位皮特在反雅各宾战争³⁶时期曾在伦敦附近建立了一家印制法国假指券^①的工厂。

“纽金特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刻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已经指定秘密同盟的一些轻信成员，要他们带上一包包这些”——石版和铜版吗？不对，——

① 指券(Assignat)是1789—1796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法国作为通货发行的纸币。——编者注

“这些假银行券(自然,银行券是在印出以前就包好了的)动身到法国、瑞士和德国去”(第175页),

可是,西塞罗—福格特已经手握出鞘之剑站在舍尔瓦尔—卡提利纳的身后。福斯泰夫式的人物的特征是,不仅他们本身是被吹起来的,而且又全都吹嘘。瞧,把“革命奔波”限制在瑞士并用一批轮船使流亡者远涉重洋的我们那位大嗓门,瞧,他怎样在舞台上露面,演出什么样的传奇剧,又怎样把施梯伯在巴黎同舍尔瓦尔打拳击的趣闻留诸后世(见《揭露》^①)! 他就这样站着,这样舞他的剑^②!

“这个密谋计划(同上,第176页)订得极其可鄙。”“因为每个工人协会都要对舍尔瓦尔的计划负责。”已经“出现了来自外国使团方面的秘密询问”,已经打算“败坏瑞士、特别是日内瓦州的名声”。

但是州官警觉了。他对瑞士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进行了一种后来多次重复而且成效日增的实验。

“我不否认”,——这位重量级的人物叫道,——“我不否认,我为粉碎这些鬼域伎俩作出了我的重大贡献;我不否认,我为此请日内瓦共和国的警察当局帮过忙;我至今还感到遗憾(无法得到安慰的西塞罗):某些受骗者的热心,竟成了给诡计多端的主谋的预警,使他逃脱了逮捕。”

但是,不管怎样,西塞罗—福格特已“粉碎了”卡提利纳的密谋,拯救了瑞士,给他随时准备着作出贡献的地方“作出了”他的重大贡献。几个星期以后,——像福格特说的,——舍尔瓦尔又出现在巴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85—500页。——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了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上篇》第2幕第4场中福斯泰夫的话。——编者注

黎，“在那里，他根本不是躲躲闪闪的，而是像任何一个公民那样公开生活的”（同上，第176页）。大家都明白，仿造的帝国的巴黎公民们是怎样公开生活的。

舍尔瓦尔如此“公开”在巴黎游荡，而可怜的福格特在访问巴黎时却每次都要躲藏在罗亚尔宫里，躲藏在普隆-普隆的桌子下面！

实在很抱歉，为了同福格特的有力的察哈里埃之歌¹³⁶唱对台戏，我不得不援引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如下一封信。德国流亡界的老兵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革命活动，从汉巴赫大会¹³⁷到他以第五基干师师长身份为之战斗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柏林军事周刊》发表的一种无疑并非偏袒的意见，证明了他的军事成就），早已家喻户晓了，因此用不着我对写信人再作任何介绍。我只想指出：他的信是写给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德国商人莱^①的；我本人同约·菲·贝克尔并不相识；他同我从来没有过政治上的联系；最后，我删去了信前面谈到的事务性问题，也删去了有关“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大部分内容，因为我们已经从前面的叙述中知道了。（原信现已归入柏林我的案件档案）

“1860年3月20日于巴黎

……前几天我看到了福格特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这一著作完全歪曲了所谓硫磺帮的历史和臭名远扬的舍尔瓦尔的历史（我当时住在日内瓦，对这类历史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极不公正地把它们同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政治活动搅在一起，因而使我感到格外不快。我本人不认识这位马克思先生，同他也从来没有任何接触；相反，福格特先生和他的家庭，我在20多年前就认识了，因此我同后者的关系要亲近得多；对福格特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的轻率和不讲良知，我只能表示极大的遗憾和极坚决的谴责。在斗争中，使用歪曲的甚至无中

① 格·弗·莱茵兰德尔。——编者注

生有的事实是一个男子汉所不齿的。即使可以把福格特从说他为拿破仑效劳的责难中完全解脱出来,那么,他自杀般地用以毁灭美好前程、破坏和辱没自己地位和声誉的轻率举动,也还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我多么希望他用正当方法光明正大地来推翻这种严厉的责难。鉴于迄今他在这件不愉快事情上的所作所为,我觉得有必要同您谈谈所谓的硫磺帮和无可非议的舍尔瓦尔先生是怎么回事,从而使您能够亲自作出判断:马克思对硫磺帮和舍尔瓦尔先生的存在和活动究竟有多少责任。

那么,我就来简单谈一下硫磺帮的产生和消亡。关于这个帮,未必有谁能比我提供更确切的情况了。我当时住在日内瓦,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不仅能够从一开始就了解流亡者的所作所为,而且能够看到全局;作为一个长辈,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关心这些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以便在必要时能够事先告诉和劝阻流亡者,使他们放弃某些荒诞的图谋,虽然这种图谋是由于不幸所激起的、往往是绝望的心境所造成的,是情有可原的。根据 30 年的经验,我毕竟明白,任何流亡生活都充满了幻想。”

(接下去的部分,大都已在波克罕和席利的信中叙述过了。)

“……这个多半是由无业游民组成的团体,被戏称为硫磺帮。这是由偶然聚在一起的年轻人结成的小团体,事先并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主席和纲领,也没有章程和教义。他们对秘密同盟或者需要有计划地达到的任何政治目标或其他目标,连想也没想过;他们仅仅公开地、甚至过分公开地和坦率地追求效果,达到了无节制的地步。他们同马克思更没有什么联系,马克思对他们的存在肯定也一无所知,同时他们当时同马克思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此外,这帮小伙子当时表现了一种自命不凡、我行我素的倾向,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未必会服从某个权威;他们会嘲笑福格特的那种国父般的训诫,会嘲笑马克思的那种带倾向性的指示。由于我的大儿子每天都同他们的头儿们来往,因此他们当中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得格外清楚……这个无拘无束的帮和它的一套把戏,其存在时间不超过 1849—1850 年冬季;环境迫使我们的这些英雄们天各一方了。

谁能想到,早就被人遗忘的硫磺帮会在蛰居 10 年之后被福格特教授先生重又点燃,用令人窒息的烟味来反对假想的进攻者;谁能想到,一些阿谀逢迎的报棍子,竟像电磁交感导体一样,幸灾乐祸地把这种烟味传播得更远。要知道,

甚至真正自由主义的冯·芬克先生，在讨论意大利问题时竟也谈到了硫磺帮，并且用它来描绘谦虚的普鲁士议会。而总的说来名声很不错的布雷斯劳的市民们，竟突发奇想，为了纪念硫磺帮，搞了一次狂欢游行，并且为了表示志同道合，还用硫磺熏了城市。

可怜而无辜的硫磺帮啊！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在你安然去世之后化成一座真正的火山，扮演魔鬼用警察吓唬胆小的庸人，把全世界的笨伯都硫磺一番，把燃烧的头脑焦化；我觉得，福格特自己也被你永远烧坏了喉咙。

现在来谈克雷默，即舍尔瓦尔。这个政治社会方面的骗子，卑鄙的骗子，于1853年在日内瓦露面，化名为英国人纽金特。这是跟随他的那位冒名老婆的姓，她是一个地道的英国女人。纽金特的英语和法语讲得都很流利，但长期避免讲德语，因为他大概很想让别人把他当作真正的英国人。纽金特自夸地说，他是熟练的石印工人和彩色石印工人，他把彩色石印术带到了日内瓦。他长于交际，善于在人群中突出自己和卖弄自己。他很快便接受了大学教授们的许多订货，为博物学和古代艺术制插图。最初，他深居简出，后来几乎只同法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往来。我当时设了一个问事处，办了一家日报——《莱芒湖信使报》。一位名叫施泰歌的巴登流亡者，过去做过实科中学校长，在我那儿当编辑。此人在绘画方面天赋很高，想在彩色石印方面得到培训以后，来改善自己的境况；他拜英国人纽金特为师。施泰歌经常告诉我关于这位能干、热心而又慷慨的英国男人和那位可爱而又娇媚的英国女人的种种好事。施泰歌又是工人教育协会的音乐教员，他偶尔也把他的老师纽金特带到协会去；我在那儿有幸同他初次结识，他破格地讲起德语来，而且用的是下莱茵区方言，讲得很流利，以致我对他说：‘您从来不是英国人。’但他坚持己见，并且解释说，他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就把他送进波恩的一所学校里，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8岁，因此学会了那里的方言。直到最后一刻还对这位‘可爱的’人钦佩莫名的施泰歌，也帮助纽金特使人相信他是英国人。相反，这件事使我对阿尔比昂的这位假儿子大加怀疑，并且提醒协会的会员们对他要多加小心。过了不久，我在法国流亡者协会碰到了这位英国人，我来得很凑巧，他正好在吹嘘他在巴黎起义时期的英雄业绩。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他也在搞政治。这使我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我对他在作战时所表现的‘狮子般的勇猛’——用他的话来说，——开了点玩笑，让他有机会当着法国人在我面前维护他的勇猛，但是因为他以狗一般的温顺接受了我辛辣的嘲笑，使我又瞧不起他。

从那以后，只要有可能，他就竭力回避我。同时，他在施泰歌的协助下，在

德意志工人协会里组织跳舞晚会，他们无偿地找来几个乐师——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法国人。我在这些舞会上又遇到的这位英国人，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欢乐大师了，完全得心应手；因为狂欢和向女士们献殷勤，比表现狮子般的勇猛更为他所胜任。但是在工人协会中他并不搞政治；他在这儿只是纵情地跳跳蹦蹦、欢笑、饮酒和唱歌。然而，我从符腾堡的一个首饰匠弗里茨那里得知：这位‘彻底革命的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同盟，由他（弗里茨）以及另一个德国人、几个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总共大约7个成员组成。我要求弗里茨不要参与同这位政治上走钢丝的演员有关的任何重大事情，要他本人立即退出同盟，并说服他的同伴们也这样做。过了不久，我的书商给我寄来一本马克思写的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舍尔瓦尔已被揭穿是克雷默，并且已被谴责是一个骗子和叛徒。我立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纽金特也就是舍尔瓦尔，尤其因为按照小册子所载，他出生于莱茵——这同他所说的方言相吻合，而且跟一个英国女人同居，这也符合事实。我立刻把我的想法告诉施泰歇、弗里茨等人，并且要他们传阅这本小册子。对纽金特的怀疑很快就传开了，马克思的小册子起了应起的作用。弗里茨很快就来找我，对我说，他已退出了这个‘小同盟’，其他人也会起而效仿。他同时也向我公开了该同盟的秘密目的。这个‘英国人’打算伪造国家证券来破坏欧洲各国的信用，并准备用换得的款子发动欧洲革命，等等。就在这时，有一位曾在巴黎当过律师的法国流亡者莱亚先生，在讲授社会主义。纽金特也来听课；在巴黎案件中作过纽金特的辩护人的莱亚，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而且向他本人说了。纽金特恳求不要暴露他。我是从一位法国流亡者、莱亚的友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而且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纽金特竟然厚颜无耻地又到工人协会去，但人们揭穿他就是德国人克雷默和法国人舍尔瓦尔，并把他赶了出去。据说，宾根的拉尼克在这件事上对他的指责最为严厉。此外，日内瓦警察当局想追究他组织上述小同盟一事，但是，国家证券的伪造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在巴黎干过瓷器绘画工作，我在这儿也干这一行，所以我们在业务上有所接触。但他仍然是那样浮躁、轻佻得不可救药。

我实在不明白，福格特怎么竟敢把这个流氓在日内瓦的行径同马克思这样人物的活动胡扯在一起，竟敢把他称做马克思的同志或工具，尤其是因为这事涉及的时期，正是马克思用上述小册子痛斥这个骗子的那个时候。要知道，正是马克思用自己的小册子揭穿了他，把他赶出了日内瓦，而福格特竟说什么他在日内瓦是为马克思效劳的。

当我思考自然科学家福格特怎能误入这种歧途时,我简直莫名其妙。眼见福格特何等轻率地、何等徒劳地、何等自我耗损地在毁坏他那由于各种情况的偶然凑合而取得的强烈影响,难道不觉得可惜吗!在这以后,如果大家对福格特的自然科学研究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怀疑他的科学结论也是浮皮潦草地、敷衍塞责地根据虚假的观念、而不是根据肯定的、经过对事实深入研究而得出的,难道会使人感到奇怪吗?

要成为政治家和学者,光有虚荣心是不够的,否则,甚至克雷默也可能成为政治家和学者了。遗憾的是,福格特由于他的硫磺帮和他的舍尔瓦尔,自己也堕落到舍尔瓦尔那步田地了。的确,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似之处,突出地表现在:追求生活幸福、人身安全和交际乐趣,而对严肃认真的事情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希望很快能收到您的友好回信,请接受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约·菲·贝克尔

又及:我刚才又翻了翻福格特的小册子^①,使我再一次感到惊奇的是:我看到‘制刷匠帮’也获得了这种殊荣。不久您也会知道,这个帮是怎么一回事……

……其次,我在这本小册子中还读到:福格特硬说什么纽金特-舍尔瓦尔-克雷默是受马克思之托来日内瓦的。因此,我认为必须作如下补充:在日内瓦逗留的最后一分钟还冒充英国人的那个纽金特,从来不让人有一丝一毫的觉察:他在何时何地曾经同某一个德国流亡者有过联系;因为这对他的化名是根本不利的。甚至目前在这儿,尽管这种做法对他已经没有像当时在那儿一样重要,但他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点,并且否认以往曾经结交过德国人。

在这以前,我总以为福格特是轻率地遭到了别人的愚弄,但是现在,他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令我感到他是心怀叵测。我并不怎么为他感到遗憾,但是我可怜他那善良而正直的年迈父亲,毫无疑问,这件事还会给他带来一些不愉快的时刻。

我不仅允许您,甚至在此请求您,为了真理和善举,把我告诉您的这些东西在您的熟人中传开来。

忠实于您的 约·菲力浦·贝·”(见附录3)

^① 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日内瓦版。——编者注

4.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我们且从日内瓦帝国摄政的“办公室”来到科隆普鲁士王国陪审法庭。

“马克思在科隆案件中起了杰出的作用。”毫无疑问。

“科隆审讯了他的盟内同志们。”供认不讳。

科隆被告们的审前羁押竟长达一年半之久。

普鲁士警察局和使馆，欣克尔代及其全班人马，邮局和地方当局，内务部和司法部——所有这些人在这一年半中都使出了浑身解数，要弄出个犯罪构成来。

因此，福格特在侦查我的“行动”中，一定程度上动用了普鲁士国家的辅助手段，他甚至拥有我1853年巴塞尔出版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的真凭实据；这本书是他在日内瓦工人协会里找到的，他把它借去进行了“研究”。这一次卡尔这小子准不会放过使我害怕的机会了。其实不然！这一次福格特“为难”了，他放出了几个他特有的、带恶臭的、窒息性的炮弹^①，然后一边仓皇退却，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科隆案件对我们并没有特殊意义。”（“主要著作”第172页）

在《揭露》中，除了其他人以外，我还难免不敲打一下奥·维利希先生。维利希在1853年10月28日《纽约刑法报》上的自我辩护

^① “窒息的或带恶臭的炮弹主要用于坑道战。它的制造用普通照明弹的原料，但其中包括较多的硫磺和尽可能多的羽毛、兽角、毛发以及其他废物，把它们放入弹壳内，用信管发射弹丸。”（J.C.普吕米克《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1820年柏林版第1部分）

书^①，是从把我的著作评论为“对德意志联邦中央警察局的骇人听闻行动的杰出批判”^②开始的。我的著作的出版者雅·小沙贝利茨收到我的手稿以后，1852年12月11日从巴塞尔写信告诉我说：

“您对警察当局的卑劣行为的揭露是无与伦比的。您给普鲁士的现存制度树立了一座永存的纪念碑。”

他还补充说，一些行家也同意他的看法，而这些“行家”的头儿就是卡尔·福格特先生目前在日内瓦的一位朋友。

我的小册子出版7年之后，它使与我毫不相识的柏林的艾希霍夫先生——大家知道，艾希霍夫被控诽谤施梯伯而受到起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仔细研究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因此，我不仅必须完全维持我最初对施梯伯作伪证的控告，而且必须加重对施梯伯的控告，即控告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全部证词都是捏造的……对科隆被告们的判决，仅仅是根据施梯伯的证词作出的……施梯伯的全部证词彻头彻尾都是伪证。”（1860年5月9日柏林《福斯报》附刊1）

福格特本人也承认：

“他（马克思）煞费苦心地向被告们的辩护人提供材料，向他们发出如何进行诉讼的指示……”

大家知道，在那里（即在科隆），施梯伯、弗略里等密探提出了亲自伪造的假文件作为‘证据’，而且在那里，揭露出这帮警察败类所干的种种极端卑鄙下流的勾当，令人不寒而栗。”（“主要著作”第169、170页）

① 我在1853年纽约出版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¹³⁸里作了答复。

②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载于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和34期。——编者注

如果福格特用有利于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来证明他对政变的仇恨,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用揭露秘密警察当局的极端卑鄙下流来证明“我”同它的“默契”呢?如果警察当局已经掌握了真凭实据,那为什么还要造假的呢?

但是,——福格特教授教训说,——

“然而打击只是打败了科隆马克思同盟的盟员,只是打败了马克思派。”

的确如此,普隆涅斯!难道打击最初不是打败了巴黎的另一个派,接着又打败了柏林的又一个派(拉登多夫案件¹³⁹),然后又打败了不来梅的其他一个派(死人同盟¹⁴⁰)等等吗?

至于说到对科隆被告们的判决,那我不妨引证一下我的《揭露》中与此有关的几段: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创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纯粹的倾向性。泽特(检察官)在宣布审讯开始时说:‘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表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倾向性的案件。’而现在(在审理末)他强调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的揭发置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要客观的犯罪构成,以期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

在演了5个星期的警察滑稽戏之后,陪审员们又需要‘纯粹的倾向性’,以期从实际材料的污秽中解脱出来。因此,泽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检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一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他企图证明,惩治密谋的法律根本不要求犯罪构成,而是纯粹倾向性的法律,可见,密谋的概念只不过是合法手续烧死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了被告被捕以后颁布的新的普鲁士刑法典,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奴才法庭借口这个法典有减

轻惩罚的条款,允许把它当作具有回溯效力的法律来加以应用。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纯粹倾向性的案件,那么一年半的审前侦查是为了什么呢?这是由于倾向。”(同上,第71、72页)^①“随着普鲁士警察当局亲自伪造并强加于人的记录本的真相大白^②,案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告有罪还是无罪,这已经不再由陪审员来决定了;现在他们必须确认被告有罪还是政府有罪。

宣判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同上,第70页)^③

欣克尔代在科隆案件时期发给普鲁士驻伦敦使馆的一封信,证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正是这样估计局势的;他在这封信里说:“**政治警察的整个命运,都系于这一案件的结局。**”因此,他要求找到一个人,能在法庭上扮演已经逃之夭夭的证人豪^④,领取出场费1000塔勒。当收到欣克尔代的另一封信时,这样的人的确已经找到了;信中说:

“国家检察官指望:在陪审团组成顺利的情况下,即使不进一步采取非常措施,也将作出认定有罪的判决,因此,他(欣克尔代)要求不要作进一步的努力了。”(见附录4)

事实上,正是科隆陪审团的这种顺利组成,开创了普鲁士的欣克尔代—施梯伯制度。“要是科隆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惊雷”,——附属于普鲁士驻伦敦使馆的警察败类在1852年10月就已经了解这一点,虽说警察地雷到1853年3月底才在柏林爆炸(拉登多夫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42页。——编者注

② 这句话中,“普鲁士警察当局亲自伪造并强加于人的”是马克思在此处后加进的。——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40—541页。着重号是马克思后加的。——编者注

④ 海·威·豪普特。——编者注

密谋)(见附录4)。

由于自由派的怯懦,使得反动派在许多年中横行无阻;这种怯懦表现得越无止境,自由派事后对反动时代的叫骂也就越加响亮。因此,科隆案件时期,我想在普鲁士自由派报刊上揭露施梯伯欺骗制度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失败。这些报刊在自己的旗帜上用大字写着:安全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而且你将在这种标志下——生存。¹⁴¹

5.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洛桑盛会

(1859年6月26日和27日)

我们的英雄每次都怀着新的满意心情逃回到——阿卡迪亚。我们又在“瑞士偏远的一隅”,在洛桑,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于6月底举行的一次“盛会”上发现他。卡尔·福格特在这里再一次拯救了瑞士。卡提利纳坐在伦敦,而西塞罗则穿着五颜六色的茄克衫在洛桑大发雷霆:

“现在你会看到,我关心国家的得救,比你关心它的灭亡还要热心。”^①

关于上述“盛会”和“圆满的人物”在节日期间所干的英雄业绩的原本报告,偶尔保存下来了。格·洛默尔先生在福格特协助下编写的报告的题目是:《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盛会(1859年在洛桑举行)》,1859年日内瓦金十字街马尔库斯·瓦尼书店出版。我们不妨把这个原本报告和5个月之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比较一下。报告中包括西塞罗—福格特“亲自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的开头一语

^① 引自西塞罗《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第1篇第4章。——编者注

道破他出现在这一场合的秘密。他出现在工人中间，向他们发表演说，是因为

“最近有人对他提出了严厉的责难，如果这些责难是真实的，那就必然会根本动摇对他的信任，必然会完全破坏他的政治活动”。“我来到这儿”，——他接着说，——“我来到这儿，是为了要在这儿发表演说，公开反对〈上述的〉阴谋诡计”。（报告第6—7页）

有人指控他搞波拿巴主义的阴谋，他应当拯救他的政治活动，按照自己的习惯用舌头来保护自己的一张皮。在摇唇鼓舌一个半小时之后，他想起了狄摩西尼的劝告：“辞令的灵魂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①。

然而什么是行动？在美洲有一种叫做臭鼬的小兽，它在极度危险的时刻只有一种防御手段，即进攻性气味。它在遭到攻击时，便从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喷射出一种液体，非把你的衣服烧坏不可；要是这种液体落在你的皮肤上，那你在一个时期内便无法同任何人接触。这种气味进攻性极强，以致一旦猎狗惊起一只臭鼬，猎人们就得逃之夭夭，比狼或者老虎跟在后面时跑得还快，吓得还厉害。对付狼和老虎可以用火药和铅弹，但对付臭鼬的屁股却一筹莫展了。

这就是行动！——这位归化于〈动物群体〉¹⁴²的演说家自言自语地说，并且把类似臭鼬气味的东西向他的假想的迫害者喷去：

“但是，我要极其强烈地警告你们，谨防一小撮卑鄙家伙的诡计，他们的全套计谋是在使工人丢下自己的职业，卷入种种密谋和共产主义诡计中去；他们在靠工人的汗水过活以后，就冷酷无情地〈当然是在工人流完了汗水之后！〉置工人于死地。现在这一小撮家伙又力图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尽可能多的手段〉

① 狄摩西尼〈论金冠〉。——编者注

把工人协会拖进他们布下的阴险的罗网。无论他们说些什么(即关于福格特的波拿巴主义的阴谋诡计),你们都要确信,他们一心向往的只是利用工人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最后让工人听凭命运去摆布。”(报告第18页。见附录)

“臭鼬”是不知耻的,他竟然说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些一贯牺牲自身利益、大公无私地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人“靠工人的汗水过活”,不过,这种无耻也毫不新奇。不仅十二月的间谍们曾经在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等人的背后散布过这类恶毒的诽谤,而且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点都有统治阶级的告密者们以同样无耻的方式对捍卫被压迫阶级利益的先进文学战士和政治战士造谣中伤。(见附录5)

不过,在这一行动之后,我们的“圆满的人物”就无法再保持自己的严肃了。这个小丑把他的处于自由状态的“迫害者”比做“在措恩多夫附近被俘的俄国人”,而把他本人比做——请猜猜看,比做谁?——弗里德里希大帝。福斯泰夫-福格特记得,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他所参加的第一次战役中临阵脱逃。他却没有任何战役就临阵脱逃了,岂不更加伟大!①

这就是根据原本报告所载,在洛桑盛会上发生的事。而“在这之

① 在雅科布·费奈迭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特》(1860年汉诺威版)中,科贝斯第一¹⁴³叙述说:“他亲眼看到,当我们大家,连同其他4个帝国摄政,强迫符腾堡政府动用武力帮助议会有个光荣的结局的时候,身为帝国摄政的卡尔·福格特竟没有出面。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其他4个摄政坐上车子,准备按约定向会议地点出发,要在那儿同残阙议会²⁹一道对着刺刀挺起胸膛(大家知道,残阙议会是没有脑袋的)时,卡尔·福格特竟推上车门,向车夫喊道:‘喂,发车吧,车里已经坐满了,我随后就去!’当各种危险都已过去的时候,卡尔·福格特来了。”(同上,第23、24页)

后,请欣赏一下(用菲沙尔特的话来说)这个黏糊糊的、讨厌而笨拙的、肮脏的厨子和食客吧”,^①看一看他在5个月之后竟给德国庸人熬出了一锅多么可笑的警察烂粥来。

“有人想不惜任何代价在瑞士制造纠葛,准备给……中立政策以决定性打击。我得到消息说:他们打算利用……工人教育协会的盛会来把工人们驱回到工人早就坚决拒绝了的道路上。他们想利用……美好的节日来组织秘密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同德国的志同道合者接触,采取上帝才知道(福格特尽管得到了消息,但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一些措施。他们散布关于工人积极干预德意志祖国的政治的各种混乱流言和秘密通告。我立即决定出面反对这类诡计,……再一次请求工人们……无论如何不要听信这类建议。我在上述演说结尾公开提出了警告,等等。”(“主要著作”第180页)

西塞罗—福格特忘记他在演说开头曾当众泄露了究竟是什么驱使他参加盛会,——不是瑞士的中立,而是拯救他自己的一张皮。他的演说对存心坑害瑞士的行为、对利用盛会的密谋计划、对秘密委员会、对工人们积极干预德国政治以及“这一类”或任何别“类”建议,都只字未提。对所有这些施梯伯之歌只字未提。他最后的警告不过是诚实的赛克斯的警告,这个赛克斯在老贝利^②法庭上警告陪审员,不要听信揭穿他干了盗窃勾当的那些“卑鄙的”暗探们的话。^③

福斯泰夫—福格特说(“主要著作”第181页):“紧跟着发生的事件证实了我的预感。”

-
- ① 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3章。——编者注
- ② 老贝利是伦敦新门监狱的守护楼的名称。中央刑事法庭设于此处。——编者注
- ③ 这个故事取自查·狄更斯《奥列佛尔·特维斯特奇遇记》。——编者注

怎么,预感?但是福斯泰夫又忘记了,他在这句话前面的几行字里并不曾“预感”,而是得到了“消息”,——得到了关于密谋者的计划的消息,而且消息颇为详细!而紧跟着发生的事件,又究竟是——“你真不愧是想像丰富的天使呀,你!”^①——什么样的事件呢?

“《总汇报》的一篇文章^②强加给盛会和工人生活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它们(即盛会和生活)根本不曾想到过的。(这完全同福格特把这种倾向强加给穆尔滕代表大会和所有工人组织一样。)在这篇文章发表和它在《法兰克福报》上被转载以后,一位南德意志邦的公使就以此为据提出了秘密质问,使盛会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总汇报》的文章和它在《法兰克福报》上的转载强加给盛会的吗?根本不是,——“这种意义,按照硫磺帮的被挫败的计划来看,是盛会本来应该具有的。”

原来如此!本来应该具有的!

诚然,为了戳穿西塞罗—福格特再一次拯救瑞士的秘密,只要把“主要著作”同记载盛会的原本报告略加比较就够了;但是我仍然希望查明:是否有什么事实,哪怕是被歪曲了的事实,给福格特提供了发力的物质¹⁴⁴。因此,我写信给原本报告的编写人,日内瓦的格·洛默尔先生。洛默尔先生同福格特想必交情不错,因为他不仅在编写关于洛桑盛会的报告时得到过福格特的帮助,而且在后来出版的关于日内瓦席勒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的小册子^③中,掩盖福格特在这里又遭到的惨败。洛默尔先生同我并无一面之交,他在

① 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16场(《玛尔特的花园》)。——编者注

② 《1859年在洛桑举行的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盛会》,载于1859年8月3日《总汇报》第215号附刊。——编者注

③ 《日内瓦席勒纪念会。附本年的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1859年日内瓦版。——编者注

1860年4月13日的回信中写道：

“福格特说什么他曾在洛桑挫败了一次危险的密谋，这种说法纯粹是臆造或谎言。他在洛桑只不过要寻找一个场所，借以发表演说并在事后把演说印出来。他在一个半小时的演说中，对说他是被收买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指责，作了辩护。这一讲稿现在还由我完整地保存着。”

一个住在日内瓦的法国人，在被问起福格特的这同一个密谋时，简短地回答说：

“必须认清这个家伙”（即福格特），“这个人首先是一个阴谋家，妄自尊大，自然和诚实同他始终是格格不入的”。

福格特本人在他的所谓《研究》第99页上说，他“从来没有夸口说自己有预言家的素质”。但是人们从旧约^①中知道：驴子看到了预言家所没有看到的東西。这样一来也就清楚了：为什么福格特看到了他在1859年11月才对之有预感的密谋，而在1859年6月就已把它“挫败了”。

6. 其 他

“要是我没有记错”，——议会小丑说，——“那么，通告（即虚构的1850年告无产者的伦敦通告）无论如何是由马克思的党徒、所谓议会的狼草拟的，并被偷偷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当局。现在，在《祖国之友告哥达党人》的通告这一事件中，这条渠道又露出来了。”（“主要著作”第144页）

渠道露出来了！大概是脱肛了吧，自然科学的打诨者？

至于谈到“议会的狼”，——我们在下面就会知道，为什么议会的

① 《旧约全书·摩西四经（民数记）》。——编者注

狼就像噩梦一样缠着议会小丑，——那么，他曾在柏林《人民报》、《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上发表过下列声明：

“声明。1860年2月6日于曼彻斯特：

我从一位友人的信中得知，《国民报》（今年第41号）在根据福格特的小册子写成的一篇社论中，向公众发表了下列意见：

‘1850年曾从伦敦发出另一个告德国无产者的紧急通告，这个通告（福格特确信）是由议会的狼，或者说被囚的狼草拟的，同时被偷偷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当局。’我既不曾看到这一号《国民报》，也不曾看到福格特的小册子，因此，我只能对上面的引证作如下答复：

(1)1850年我住在苏黎世，而不住在伦敦，1851年夏天我才移居伦敦。

(2)我平生既没有草拟过告‘无产者’的紧急通告，也没有草拟过告其他人的紧急通告。

(3)至于用汉诺威警察当局诋毁我一事，那么，我要以鄙视的态度把这种无耻的攻击回敬给它的制造者。如果福格特小册子的其他部分也像涉及我的那部分一样丑恶和虚伪，那它真堪与谢努和德拉奥德之流的拙劣作品^①媲美。

威·沃尔弗”

由此可见，正像居维叶根据一根骨头就能恢复动物的整个结构一样，沃尔弗按照抽出的一段引文就能正确地复原出福格特的全部拙劣作品。事实上，把卡尔·福格特同谢努和德拉奥德并列，他就显得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了。

我的妻子是前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先生的妹妹。这成了“并不为难的”福格特的最后一个“证据”，证明我同秘密警察当局之间的诚意协商，“证明我特别同《十字报》派之间的关系”（“主要著作”第194页）。怎样打退肥胖的福斯泰夫的这类卑鄙攻击呢？要是这

① 阿·谢努《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律·德拉奥德《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位小丑知道我的妻子有一位苏格兰祖先^①，因参加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解放斗争而被当作叛乱者在爱丁堡市场上丢掉了脑袋，那他也许会原谅她有普鲁士大臣这样一个亲属。大家知道，福格特自己仅仅由于偶然性还在肩膀上留着一个脑袋。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于日内瓦举办的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1859年11月13日)上，他报告说：

“法兰克福议会左派曾好久决定不了派谁去维也纳，派勃鲁姆去还是派他去。于是最后就抽签，抽出来的一根小棍作出了有利于，或者更确切些说，不利于勃鲁姆的决定。”(《日内瓦席勒纪念会》1859年日内瓦版第28、29页)

10月13日，罗伯特·勃鲁姆从法兰克福去维也纳。10月23日或24日，法兰克福议会极左派的代表团在去柏林参加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途中，到了科隆。我会见了代表团的先生们，其中有几个议员同《新莱茵报》关系甚密。这几个议员中有一个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被战地法庭枪决了，另一个在流亡中死了，有一个还活着；他们就福格特对罗伯特·勃鲁姆在维也纳的使命玩弄的诡计，告诉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

叫我别说话，叫我装哑巴，
因为要保密，我的责任大！^②

在上述的日内瓦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1859年11月)，“圆满的人物”遭到了冷遇。当他像个毕恭毕敬的奴仆跟着他的庇护人詹姆斯·法济，醉汉般地摇摇晃晃走进纪念会会场的时候，有一个工

① 阿·坎·阿盖尔伯爵。——编者注

② 歌德《迷娘》。——编者注

人喊道：瞧，亨利来了，后面跟着福斯泰夫！当福格特在他的彬彬有礼的笑谈中把自己说成是罗伯特·勃鲁姆的第二个“我”的时候，人们好不容易才把几个怒火冲天的工人劝住，没有让他们冲上讲台去。最后，当他——他忘记自己在6月就把革命挫败了，——又亲自“再一次号召走向街垒”（《席勒纪念会》第29页）的时候，场内响起了一阵嘲笑的回声：“街垒！——牛屎堆！”^①但是，国外十分清楚福格特的那一套革命空谈究竟值多少钱，因此，这次甚至没有随之出现通常的“一位南德意志公使的秘密质问”，而且在《总汇报》上也没有出现任何文章。

福格特的全部施梯伯之歌，从“硫磺帮”到“前大臣”，不禁使人想起了但丁所说的那类诗歌能手：

Ed egli avea fatto del cul trombetta.^②

① “街垒—牛屎堆”的德文 *Barrikaden—Fladen* 这两个字的尾音相同。——编者注

② 他把他的臀部也变成了喇叭。（康内吉塞尔）¹⁴⁵

四

泰霍夫的信

“圆满的人物”又从

“tristo sacco Che merda fa
di quel, che si trangugia.”

(Dante)①

中取出了什么东西呢？

泰霍夫的信，1850年8月26日寄自伦敦。

“我能用来评定这类〈即‘硫磺帮’的〉勾当的最好方法，就是在这里引用一个人的信；这个人，凡是认识他的〈！〉，都说他是一个正人君子；我所以敢于公布〈公布正人君子呢，还是公布信？〉，因为这本来就是专供通知〈通知谁呢？〉用的，而以前妨碍公布的那些顾虑〈谁的顾虑？〉，已经不复存在了。”（“主要著作”第141页）

泰霍夫于1850年8月底从瑞士移居伦敦。他的信是寄给前普鲁士中尉席梅尔普芬尼希（当时住在伯尔尼）“通知朋友们”的，即通知“集中”的成员们的；“集中”是一个近10年前就宣告结束的秘密团体，由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建立，成员极为复杂，其中有大批议会

① “把吞咽的食物变成大粪的臭皮囊。”¹⁴⁶

议员。泰霍夫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但福格特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那么，泰霍夫的信怎么会落到福格特手里，又是谁授权他公布的呢？

1860年4月17日，泰霍夫本人从澳大利亚写信告诉我说：

“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理由授权卡尔·福格特先生去干这件事情。”

在泰霍夫这封信本应通知的“朋友们”中间，只有两位还在日内瓦。现在就让这两位自己来说吧：

埃^①致席利。1860年4月29日于格劳宾登州上恩加丁。

当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出版时，因其中载有泰霍夫1850年8月26日给他的瑞士朋友们的一封信，我们这些现在还在瑞士的泰霍夫的朋友，便决定致函福格特，对他未经允许擅自发表泰霍夫的信表示不满。这封信是寄给在伯尔尼的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并让他转抄给朋友们……我感到高兴的是，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泰霍夫的朋友中间，即有权持有8月26日这封信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像这位意外得到这封信的人那样，把这封信传出去。1月22日，我们给福格特写了一封信，对他未经允许擅自公布泰霍夫的信表示不满，抗议他以后继续滥用这封信的任何行为，并要求把该信寄回。大约是1月27日，福格特回信说：“泰霍夫的信本是用来通知朋友们的；得到这封信的一位朋友特地把信交他发表……他只能把信交还给他信的那个人。”

博^②致席利。1860年5月1日于苏黎世。

给福格特的信是同埃事先商定而由我执笔写的……拉^③不是泰霍夫的信要通知的“朋友们”之一；然而福格特从信的内容知道信也是给我的，但他不愿征得我同意发表这封信。”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从上引的席利的信中留了一段话备用。这

① 埃默曼。——编者注

② 博伊斯特。——编者注

③ 拉尼克尔。——编者注

段话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提到这位拉尼克尔，是因为泰霍夫的信想必是通过他而落到福格特手里的；你问起的这一点，我差点儿把它忽略了。这封信是泰霍夫写给同他一起在苏黎世生活过的朋友们——席梅尔普芬尼希、博、埃等人的。我作为这些朋友的朋友和泰霍夫的朋友，后来也得到了这封信。当我突然被粗暴地驱逐出瑞士（事先我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就在日内瓦的街上被捕，并立即被架走了）的时候，连回住所整理一下东西都不允许。因此，我从伯尔尼监狱写信给在日内瓦的一个可靠的人，即鞋匠师傅图姆，请他拜托还留在那儿的我的任何一个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谁在当时也同我一起被粗暴地撵走了）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把其中最贵重的给我寄到伯尔尼来，其余的则暂时代管一下，并请他仔细挑选一下我的文件，千万不要把不能通过法国的东西给我寄来。事情就这样办了，但是泰霍夫的信没有给我寄来。在留下的文件当中，有几份同议员们当时反对日内瓦流亡者救济金地方委员会有关，该委员会由3个日内瓦公民（其中包括图姆）和两个流亡者（贝克尔和我）组成；拉尼克尔由于拥护这个委员会而反对议员们，对这些文件是很熟悉的。因此，我请求作为委员会会计和档案保管员的图姆通过拉尼克尔的协助，从我的文件中把上述文件找出来。拉尼克尔既然被邀协助整理我的文件，可能他就以某种方式，说不定是从一位整理我的文件的人手里搞到了泰霍夫的信。我对于从我手到他手的这种占有的转移（应把它同所有权的转移加以区别）丝毫不加反对；但是我坚决保留我对这封信的所有权。于是我马上从伦敦写了一封信给拉尼克尔，要他把信寄给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从这时起，他的明显的罪过也就开始了，最初还是轻微的，但后来，随着他共谋未经许可擅自发表此信而变本加厉了，以致发展成极严重的罪过，甚至发展到心怀叵测的地步。我从不怀疑发表此信是未经允许的，未经任何收信人的授权；不过，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要写信给埃问一下。至于拉尼克尔插手公布此信一事，由于大家都知道他同福格特关系密切，也就无可怀疑了。虽然我丝毫不想去评论这种密切关系，但也不能不在这儿指出它跟过去情况是多么不同。要知道，拉尼克尔不仅是最大的议会野心家之一，而且特别对这位帝国摄政流露出嗜血的情绪。‘我非掐死这个坏蛋不可’，——他喊道，——‘即使我因此不得不到伯尔尼去。’为了制止他刺王杀驾的行为，差一点要给他穿上精神病患者的拘束衣了。可是现在，当看来他已恍然大悟，从扫罗一变而为保罗的时候，我倒很想看一看，他在另一方面，即作为欧洲复仇者，

将怎样脱身。在他究竟是选择美洲还是欧洲而犹豫不决时，他曾说，我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已经顺利结束了，我留下来了——我要复仇!! 让拜占庭发抖吧!①”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

可见，拉尼克尔是从席利的流亡者档案中探出②泰霍夫的信的。尽管席利从伦敦提出要求，但他还是把信留住。“朋友”拉尼克尔把窃取来的信转交给“朋友”福格特，而“朋友”福格特则以他所固有的软心肠宣称，他有权公布这封信，因为福格特和拉尼克尔是“朋友们”呀。这样一来，谁写信“通知朋友们”，也就必然是写信给“朋友们”福格特和拉尼克尔——两个阿卡迪亚人③。

我很遗憾，这种别致的法学竟使我想起了遗忘差半、尘封已久的往事。但是拉尼克尔既然已经开了头，那我也就不得不奉陪了。

“共产主义者同盟”¹²²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用的是另一个名称。它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机构：一定数目的成员组成一个“支部”，同一城市的各支部组成一个“区部”，数目多少不等的区部组成一个“总区部”；整个组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由所有区部的代表参加的大会选出，但它有权自行补充其委员，也有权在紧急情况下任命自己的临时继任者。中央委员会起初设在巴黎，从1840年到1848年初改设在伦敦。支部、区部的领导人和中央委员

① 这句话出自加·唐尼采蒂《贝利萨留》。——编者注

② “探出”的德文是 aufstiebern，它的词干同警探施梯伯(Stieber)的名字发音相同。——编者注

③ 这是拜伦在其小说《唐璜》(第4首歌第93节)中用过的维吉尔《牧歌》的话，意思是“两个坏蛋”、“彼此彼此”；这一用语已成了谚语。——编者注

会的委员全是选举出来的。这种民主制度,固然完全不适用于一个策划阴谋的秘密团体,但至少同一个宣传协会的任务是不矛盾的。“同盟”的活动,首先是建立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这类协会至今还存在于瑞士、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它们大部分是直接由“同盟”建立的,或者是由同盟以前的盟员创办的。因此,这类工人协会的组织到处都如出一辙。每星期当中规定一天讨论,一天社会娱乐(唱歌、朗诵等等)。到处都建立了协会的图书馆,而且,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开班给工人讲授基本知识。在这些公开的工人协会后面进行领导的“同盟”,既把协会用做公开宣传活动的极为方便的场所,另一方面,又从中吸收非常能干的成员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由于德国手工业者过着流动的生活,中央委员会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需要派遣特使。

至于“同盟”本身的秘密学说,它经历了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德国变种(例如魏特林的幻想)所经历过的各种变化。从布伦奇里的报告^①中可以看出,自1839年以来,除了社会问题,宗教问题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从1839年到1846年这一时期内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在这些工人团体内部受到了极其热心的关注。这个团体的秘密形式起源于巴黎。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在德国工人中间进行宣传,这种目的要求它在后来也保持这种形式。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在布鲁塞尔(是基佐把我放逐到那里去的),

^① 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依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1843年苏黎世版。——编者注

我同恩格斯、威·沃尔弗等人成立了一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¹⁴⁷，该协会至今还存在。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①；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法英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的混合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混合物，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认识作为惟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在我们的活动的影·响下，伦敦中央委员会同我们建立了通讯联系，并在1846年年底派了一个中央委员、钟表匠约瑟夫·莫尔（他后来作为一个革命士兵在巴登战场上阵亡了）到布鲁塞尔来，邀请我们加入“同盟”。我们对这种建议存有疑虑，但是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宣言中提出来；他又说，为了同保守派和反对派作斗争，我们必须亲自参加大会，而这这就要求我们加入“同盟”。于是，我们就加入了。代表大会举行了，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瑞士、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同盟盟员，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辩论以后，通过了由恩格斯和我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于1848年初问世，后来又出版了英文、法文、丹麦文和意大利文的译本。二月革命¹⁴⁸爆发时，伦敦中央委员会委托我领导“同盟”。在德国革命时期，同盟的活动自行中断，因为已经有了更有效的途径来实现它的目的。1849年夏末，当我再次被赶出法国来到伦敦的时候，我发现那

① 在石印的小册子中，仅保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编者注

里残缺不全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重整旗鼓，并且同恢复起来的德国各区部重新建立了联系。过了几个月，维利希来到了伦敦，根据我的建议，他被吸收参加中央委员会。他是由恩格斯介绍给我的，恩格斯曾担任他的副官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为了对同盟的历史作出全面介绍，我还要指出：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裂。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恩格斯和我领导下，把中央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科隆，该地早就是德国中部和南部的“总区部”所在地；除了伦敦以外，科隆也是同盟的知识分子的最重要集中地。

我们同时退出了伦敦工人教育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在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下，成立了宗得崩德¹⁴⁹，它不仅同工人教育协会保持联系，而且还同瑞士和法国恢复了从1848年起就已中断的关系。1852年11月12日，科隆案件的被告们被判罪。过了几天，根据我的提议，同盟宣告解散。一份关于同盟解散的文件（注明日期是1852年11月），我已经附在我对《国民报》的诉讼案的文件里。这份文件指出，同盟之所以解散，是因为从德国展开逮捕以来，即从1851年春天以来，同大陆上的一切联系实际上都已经中断，加之这类宣传协会已不再合时宜。过了几个月，即1853年初，维利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也寿终正寝。

引起上述分裂的根本原因，我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已经叙述过了，该书转载了1850年9月15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摘要。而最直接的实际原因，则是维利希想把“同盟”卷入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革命儿戏中去。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截然相反使分歧更加尖锐。我只举一个例子。比如，维利希妄想，普鲁士和奥地利在黑森选帝侯国和德意志联邦⁸⁵问题上的争执¹⁵⁰会引起严重冲突，从而给革命派提供实际干预的机会。1850年11月10日，

即“同盟”分裂以后不久，他发表了一个用这种精神拟就的宣言：《告各国民民主主义者书》，由宗得崩德中央委员会以及法国、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签署。相反，恩格斯和我则主张——这一点可以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5—10月合刊，汉堡版第174、175页）上看到——，“所有这一切喧嚣是不会有结果的……斗争的双方——奥地利和普鲁士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²⁸里，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忌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不和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①

维利希由于他的个性（不过他无疑是一个能干的人），也由于当时（1850年）记忆犹新的贝桑松事件的影响，对于因意见对立而成为不可避免的、日复一日的冲突，能否“公正地”加以处理，请根据下列文件来判断。

“南锡德国纵队

致德国‘自救’武装协会¹⁵¹主席——

比尔的约·菲利浦·贝克尔公民

公民：

我们谨向你这位由德国全体共和主义流亡者选出来的代表报告，我们已在南锡成立了一个德国流亡者纵队，名叫‘南锡德国纵队’。

组成这支纵队的流亡者，一部分是以前沃苏勒纵队的成员，一部分即这里的流亡者是曾参加贝桑松纵队的成员。他们离开贝桑松，纯粹是出于民主的考虑。

问题是，维利希干什么事情，很少同纵队商量。因此，贝桑松纵队的基本规章根本不是经全队讨论所决定的，而是由维利希事先拿出来，未经纵队同意就执行了。

^① 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16页。——编者注

此外，维利希事后的一系列命令，也向我们证明了他的独断专行；这些命令由耶拉契奇或文迪施格雷茨来发布倒是合适的，而对一个共和主义者是完全不相称的。

维利希竟下令要从一个即将离队的名叫雪恩的队员的脚上脱下用纵队的储蓄给他买的一双新鞋，却不考虑这项储蓄也有雪恩的一份，因为它主要是靠每人每天从法国得到的10个苏的津贴里积累起来的……他想把鞋穿走，维利希却下令把鞋脱下来。

维利希因为一点小事——比如点名或操练时缺席啦、(晚间)迟到啦、口角啦，——竟不问一下纵队就把几个能干的队员从贝桑松赶走了，赶走时还对他们说，他们可以到非洲去，因为再不允许他们待在法国；要是他们不去非洲，他就下令引渡他们，而且是引渡到德国去，因为法国政府给了他处理这事的全权。后来有人向贝桑松省政府问起这件事情，得到的回答是此事并非属实。维利希几乎每天点名时都说：谁要是不乐意，愿意走就走，而且越快越好，可以到非洲去，等等。有一天，他甚至笼统地威胁说：谁不服从他的命令，要么到非洲去，要么就得送到德国去；为了这件事也有人向省政府提出质问。由于每天都有这类威胁，许多人对贝桑松的生活感到厌烦了，因为在那里，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每天都有人叫他们卷铺盖。他们说：要是我们愿意做奴隶，我们可以到俄国去，或者当初就根本不必在德国干一番什么事业。他们说，够了，要是在贝桑松再待下去，就得同维利希大闹一场，因此他们就走了。但是，因为当时哪儿也没有一个能够收容他们的纵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不能靠10个苏活命，所以，除了应募到非洲去以外，别无他途，他们也就这样办了。维利希就这样使30个出色的公民陷于绝望境地，由于他的过错，使祖国永远失去了这批力量。

其次，维利希非常不明智，在点名时总是夸奖他的旧部，而贬低新来的人。这种做法经常引起纠葛。维利希有一次在点名时甚至说，普鲁士人在头脑、心灵和体格方面，或者如他所说的，在体力、德性和智力方面都比南德意志人强得多。而南德意志人的特点则是无拘无束，其实他想要说的是愚蠢，但他没有这个胆量。这样一来，维利希就把占大多数的南德意志人都惹火了。最后，他竟粗暴到极点。

两个星期以前，第七连让一个被维利希亲自下令赶出兵营的名叫巴罗焦的队员再住一夜，这个连不顾维利希的禁令，把他留在连的驻地，并且不让维利希的拥护者、狂热的裁缝们走近这个驻地。于是维利希就下令拿绳子把这群造反的人绑起来。绳子真的拿来了，但是，要彻底执行这一命令，维利希却心有余而

力不足了…… 这就是他们离开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写了这些事,并不是要谴责维利希。维利希的品格和用心是好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尊重他,但是,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维利希的用心是善良的。然而他自以为是智慧和最高理性的化身,他把每个即使在小事情上同他对立的人,都当作蠢材或者叛徒。总之,维利希除了自己的意见以外,不承认任何别的意见。他在精神上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暴君,如果他想干什么,那他是不择手段的。但是够了!我们现在已认清维利希了。我们认清了他的长处和短处,因此我们就离开了贝桑松。此外,所有人在离开贝桑松的时候都说,他们离开维利希,但他们并不退出德国‘自救’武装协会。

沃苏勒人也是如此……

最后,顺致崇高的敬意,并代表南锡纵队致兄弟般的敬礼和握手。

1848年11月13日由全体大会通过。

代表纵队并受纵队委托

秘书 B.

1848年11月14日于南锡”

现在回过头来谈泰霍夫的信。像某些爬虫一样,他的信的毒也在尾巴上,也就是在9月3日(1850年)的附笔中。那里谈到我的一位英年早逝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同维利希先生的决斗。1850年9月初在安特卫普进行的那场决斗中,泰霍夫和法国人巴泰勒米充当维利希的助手。泰霍夫在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中说:

“他们(即马克思及其党羽)放出他们的骑士施拉姆来反对维利希,后者用一大堆极其粗野的话痛骂了他(泰霍夫想要说的是:他痛骂后者)一顿,最后要求决斗。”(“主要著作”第156、157页)

对于这种愚蠢的谣言,我已经在7年前出版的、上面引证过的抨击文章《高尚意识的骑士》(1853年纽约版)中驳斥过了。

那时施拉姆还活着。他和维利希都住在美国。

当时维利希的助手巴泰勒米还没有被绞死；施拉姆的一名助手、出色的波兰军官米斯科夫斯基还没有被烧死，而泰霍夫先生也还不会忘记他那封“通知朋友们”的信函。

在上述抨击文章中，载有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53年11月23日从曼彻斯特发的一封信，信的结尾说：

“在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闹到要求决斗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¹⁵²上，我（恩格斯）似乎（按照维利希的说法）犯了罪，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我和施拉姆一起‘离开房间’，因而是事先策划了这件事。以前，似乎是马克思（按照维利希的说法）‘唆使’施拉姆，现在轮换了，我充当了这个角色。一个老练的擅长使用手枪的普鲁士尉官同一个可能从来没有摸过手枪的商人之间的决斗，确实是把这个尉官‘除掉’的绝妙办法。朋友维利希不顾这一点，还到处诉说——口头上和书面上——，我们想枪杀他…… 施拉姆仅仅是被维利希的无耻行径所激怒。他提出同维利希决斗，使我们都大吃一惊。在几分钟之前，大概施拉姆本人也不会料到事情有如此的变化。这个行动是十分不由自主的…… 施拉姆只是应马克思的个人请求才离开（会议室）的，因为马克思希望不要再胡闹下去。

弗·恩格斯”（《骑士》第7页）^①

从我这方面来说，泰霍夫竟会成为这类愚蠢谣言的传播者是怎样出乎我的意料，可以从同一篇抨击文章的下面一段看出来：

“正如泰霍夫本人返回伦敦后向我和恩格斯所说的，最初，维利希坚信，我想假施拉姆之手打发他去见上帝，他还用书面形式向全世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72—573页。——编者注

界披露了这个想法。但是,经过三思之后,他又肯定,像我这样魔鬼般老谋深算的人,不会考虑通过与施拉姆的决斗来收拾他。”(同上,第9页)^①

泰霍夫在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通知朋友们”的信里所胡说的东西,都是他道听途说来的。在同盟后来发生分裂时站在维利希一边的卡尔·沙佩尔,是掀起决斗一事的目击者,关于这件事他这样写信告诉我:

“1860年9月27日于贝德
福德广场彼尔西街5号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的丑闻,奉告如下:

这件丑闻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闹出来的,由他们俩在讨论时偶然发生的一场激烈争论所引起。我记得很清楚,你本人曾竭力使他们平静下来,要他们言归于好;而且,你就像我本人以及其他在场的中央委员一样,看来对这一突然爆发的冲突感到震惊。

祝好

你的 卡尔·沙佩尔”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施拉姆本人在决斗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即在**1850年12月31日**的一封信里,指责我偏袒维利希。决斗前后,恩格斯和我对决斗一事曾公开向他表示不赞同,这使他当时很生气。他的这封信,以及我从他和米斯科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关那次决斗的其他文件,他的亲属都可以查看。这些东西不宜公布。

1857年7月中,当康拉德·施拉姆从美国回到伦敦再来看我时,他那英俊而高大的年轻人形体,已经被不治的肺结核病拖垮了,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77页。——编者注

不过,这种病却使他意志坚强的漂亮的头脑熠熠生辉。他以他固有的、从未失去的幽默,笑嘻嘻地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自己的讣告,这是他的一个冒冒失失的朋友听信了谣言而在纽约的一家德文报纸^①上发表的。经医生的劝告,施拉姆到泽西岛的圣赫利尔去了,恩格斯和我是在那里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施拉姆死于1858年1月16日。在安葬他的时候,圣赫利尔的整个自由资产阶级和居住在那里的全体流亡者都到齐了。致悼词的是乔·朱利安·哈尼,他是英国最优秀的人民演说家之一,以前是知名的宪章派领袖,在施拉姆逗留伦敦期间,他们俩很要好。施拉姆不但生性热情,敢想敢干,有如一团烈火,从不为日常琐事分心,而且明辨是非,见解独到,机灵诙谐,天真善良。他是我们党的泼息·霍士泼。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泰霍夫先生的信。他到伦敦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曾同恩格斯、施拉姆和我在我们招待他的一家酒店里有过长时间的会晤。他在1850年8月26日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里,叙述了这次会晤。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在这以后,也许还见过他两三次,但都是非常短暂的。然而,他立刻就看透了我与我的朋友,看透了我们的头脑、心和肾,并且背着我们连忙把对我们心理特征的描述寄到瑞士去,同时极其谨慎地嘱咐“朋友们”把它秘密复制出来,并且散发出去。

泰霍夫下了一番功夫来研究我的“心”。本人宽大为怀,不想在这方面学他的样。就像巴黎的浪漫女郎那样,当她的朋友一谈到政治时,她就说:“咱们别谈道德吧”。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8月26日那封信的收信人、前普鲁士中尉席

^① 《新时代》。——编者注

梅尔普芬尼希。我并不认识这位先生，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是根据两封信来说明他的。我只摘要发表的 1853 年 11 月 23 日的第一封信^①，是我的朋友、前普鲁士中尉和师团学校教官威·施特芬从切斯特寄给我的。信里说：

“有一次维利希派来这里（即科隆）一位名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副官。这位副官给我莫大荣誉，邀我到他那里去，并且坚决地相信，他能够预测整个形势，比天天直接注视事实的人更为准确。我告诉他，普鲁士军队的军官们决不会认为在他和维利希的旗帜下战斗是一种幸福，他们根本无意于匆忙地宣布成立维利希式的共和国，这时，他对我就很看不起了。使他更为恼火的是，没有物色到一个缺少头脑的人愿意翻印他随身带来的告军官书，号召军官们马上公开表示拥护他称之为民主制的‘那个东西’。

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被马克思奴役的科隆’（他对我这样写的），在别的地方翻印了这篇废话并散发给许多军官。因此，《十字报》的‘观察家’得以揭穿这种变普鲁士军官为共和派的巧妙方式的纯洁秘密。”

在出现这类趣闻时，我还根本不认识施特芬，他是 1853 年才来到英国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在下引的、写给后来被揭穿是法国警探的赫弗尔的信里，把自己的嘴脸刻画得更加清楚了；赫弗尔是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黑弗纳尔以及当时金克尔的其他朋友们于 1850 年年底在巴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灵魂；赫弗尔也是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两员大将的密友。

“席梅尔普芬尼希致赫弗尔（1851 年寄往巴黎）：

这里（即伦敦）目前发生了如下事情…… 我们已经就准备公债（金克尔公债）一事，向那里（向美国）我们认识的每个有影响的熟人写了信，建议他们首先在一定时期内亲自出面，在报刊上谈谈密谋组织的威力，并且指出，无论德国、

① 马克思在《高尚意识的骑士》中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587 页。——编者注

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积极力量,都永远不会离开战场。〈难道历史没有任何日期吗?〉^①…… 我们的工作现在进展得很顺利。如果把那些冥顽不灵的人置之不顾,随后他们就会作出让步,乐于接受向他们提出的种种条件。明天,我把工作料理妥当之后,就同卢格和豪格联系一下…… 我的社会地位同你一样,很困难。我们的事〈即金克尔的革命公债一事〉急需尽快办理。

你的 席梅尔普芬尼希”

席梅尔普芬尼希的这封信,被收进了阿·卢格在《西方先驱报》(1853年9月11日路易斯维尔出版)上发表的《揭露》中。席梅尔普芬尼希在《揭露》发表时已在美国了,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这封信的真实性。卢格的《揭露》成了“来自柏林警察总局档案”这一文件的翻版。该文件是用欣克尔代写在页边的批注和其他一些证件编成的;这些东西要不是法国警察当局从巴黎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和赫弗尔那里搜去的,就是从来不来梅的杜朗牧师那里“探出”的,要不然,就是在卢格的鼓动者协会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之间大打“老鼠与青蛙之战”¹⁵³的时候,由同室操戈的弟兄们自己泄漏给美国的德文报刊的。欣克尔代曾谈到席梅尔普芬尼希“以为警察在跟踪他”,因而匆忙地中断了为宣传金克尔革命公债的主张所作的普鲁士之行;他说这番话时的讽刺口吻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同一《揭露》中,还有“巴黎委员会〈即赫弗尔、黑弗纳尔、席梅尔普芬尼希等人〉驻伦敦的代表”卡

① 马克思为了嘲笑席梅尔普芬尼希上面一句话的文法错误,在括号里套用了他稍加改动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反动议员利希诺夫斯基公爵所说的一句话,这位公爵在一次会议上说:“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Für das historische Recht gibt es *kein Datum nicht.*”),就是说,他用错了德语语法上的双重否定。(见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第7章)席梅尔普芬尼希犯了同样的错误。——编者注

尔·叔尔茨的一封信，信里说：

“居留这里的流亡者昨天决定，吸收布赫尔、弗兰克博士、维也纳的雷茨和即将来这里的泰霍夫参加会商。注意：在泰霍夫来到这里以前，暂勿用口头或书面向他透露这一决定。”（卡·叔尔茨给巴黎“亲爱的人们”的信，1851年4月16日于伦敦）

泰霍夫 1850 年 8 月 26 日“通知朋友们”的信，是寄给这些“亲爱的人们”之一——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首先他把我的一些见解通知这位“亲爱的人”，这些见解原是我严格保密，而他在我们惟一的一次会晤时，借助所谓“酒醉吐真言”从我这里很快探出来的。

“我”，——泰霍夫先生对“通知朋友们”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说，——“我……最后声明，我一直设想他们（马克思、恩格斯等）要比卡贝式的共产主义幸福马廐这种谬误高明一筹”……。（“主要著作”第 150 页）

设想啊！可见，泰霍夫虽然丝毫不了解我们的观点，但他还真是够宽宏大量、谦逊温和的了，没有把我们的观点设想为“谬误”。

姑且不谈学术著作，他只要读一下他在后面称之为我的“无产者问答书”的《共产党宣言》，他就会看到题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这样详尽的一章，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一节里写道：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

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 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 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①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第21、22页)^②

最后一句话把卡贝的伊加利亚——或者如泰霍夫所说的“幸福马厩”,——直截了当地称为“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

恩格斯和我的观点,在我们同泰霍夫会晤前许多年就已公开发表了,而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些观点,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误解。至于他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且看几个

①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伦斯泰尔是沙尔·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共产主义的模范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卡贝在《伊加利亚旅行记》(1840年巴黎版)中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这里以及下面均引用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1版。——编者注

例子：

“他(马克思)嘲笑那些跟在他后面死板地重复他的无产者问答书的蠢材,就像嘲笑维利希式的共产主义者,就像嘲笑资产者那样。他惟一尊重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知道自己身价的贵族。为了剥夺他们的统治,他需要力量,而这种力量他惟独在无产者身上找到了;因此,他就为他们剪裁了他的一套体系。”(“主要著作”第152页)

因此,泰霍夫就“设想”我编写了一本“无产者问答书”。他指的是《宣言》,其中批判了,如果泰霍夫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嘲笑了”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和批判的空想主义。不过,这种“嘲笑”却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而是需要花一番力气的,这一点,他可以从我那部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里看出来。泰霍夫还“设想”我“剪裁了”一套“体系”,哪儿的话,我甚至在直接为工人们写的《宣言》里,也抛弃了一切体系,而代之以“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但是,这样一种“了解”,既不能跟在别人后面死板地重复,也不能像做一条子弹带那样来“剪裁”。泰霍夫所“设想”的、并背地塞给我的对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的那种看法,是天真得出奇的。

我“尊重”贵族;“嘲笑”资产阶级;我给无产者“剪裁了一套体系”,以便通过他们来“剥夺”贵族的“统治”。在《宣言》的题为《资产者和无产者》(见《宣言》第11页)的第一章里,详细地阐明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从而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政治统治,无论对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来说,或者对创造“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来说,都是基本的

^① 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2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编者注

条件。“一般说来,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见1850年1月《新莱茵报评论》第15页)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惟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①因此,我在同一《评论》里宣称,没有英国参加的任何无产阶级运动,都是“杯水风波”^②。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已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因而,在那些首先必须把大陆意义上的贵族(泰霍夫正是这样理解“贵族”的)的“统治推翻掉”的国家里,在我看来,还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也就是还没有全国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

特别是,我对德国工人对待资产阶级运动的态度看法,泰霍夫可以在《宣言》里看到非常明确的阐述。“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等等。(《宣言》第23页)^③当我被控“造反”而站在科隆资产阶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我用同样的精神宣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可是已

① 引自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40—141页。着重号是后加的,文字稍有改动。——编者注

② 这个用语出自西塞罗《论法律》。——编者注

③ 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4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编者注

不再有等级了。它的发展就在于这些阶级的斗争,可是这些阶级却联合起来反对等级及其天赋王权。”(《两个政治审判案。由科隆二月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版第59页)¹⁵⁴

自由资产阶级从1688年到1848年向无产阶级发出的号召,除了“剪裁体系和词句”,以便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剥夺贵族的统治,还做了些什么呢?因此,泰霍夫先生从我的“秘密”理论中剥离出来的最本质的东西,不就是最平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为一个煎鸡蛋吵吵嚷嚷!^①但是另一方面,既然泰霍夫知道,“马克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得到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全部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他的个人统治”。“我的全部活动”,——把我同泰霍夫先生的惟一一次谈话说得多么客气啊!

其次,泰霍夫在写给由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里还透露说,我曾谈了下面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看法:

“这个可怜的欧洲是否要毁灭(如果没有社会革命,这是在短时间内一定要发生的),美国到那时是否将牺牲欧洲的利益而利用旧制度,归根到底,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主要著作”第148页)

我同泰霍夫的谈话是在1850年8月底进行的。在1850年2月号《新莱茵报评论》上,也就是泰霍夫从我这里探听出这个秘密前8个月,我曾向德国读者揭示了下面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来谈谈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比二月革命¹⁴⁸更重要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¹⁵⁵。仅仅过了差不多18个月,现在就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带来的后果甚至将比美洲大陆的

^① 这句话出自法国作家雅·瓦·巴罗。——编者注

发现还要大得多…… 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 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欧洲的文明国家要避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前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惟一的可能就是进行社会革命”等等(1850年2月《时评》第2期第77页)。^①

旧欧洲“在短时间内将要毁灭”,美国第二天就会登上宝座之类的话,都只是泰霍夫先生说的。我当时对美国最近的将来认识得如何清楚,可以从同一《时评》的下面一段看出来:“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入……纽约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并像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时评》1850年5—10月合刊第149页)^②我在1850年给美国作的这种预测,已由1857年的商业大危机完全证实了。关于“旧欧洲”,我描绘了它在经济上的蓬勃发展以后,倒是这样写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大陆秩序党¹⁵⁶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一切想

① 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75、276页。——编者注

② 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2页。着重号是后加的。——编者注

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同上,第153页)^①

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1857—1858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有一种急迫的、也可以说是革命的性质。事实上,恰好是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反动时期,工商业在大陆上得到了空前大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也随之加强了。事实上,在那个时期,“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都被经济关系碰得粉碎了。

泰霍夫把我们谈话中认真的东西理解成玩笑,而对玩笑却更加认真了。他摆出一副哭丧面孔,告诉他的“通知朋友们”的那位席梅尔普芬尼希说:

“马克思又说,在革命中,军官一向是最危险的因素……从拉斐德到拿破仑,这是一大批叛徒和一连串叛变。应当随时准备好匕首和毒药对付他们。”(“主要著作”第153页)

关于“兵老爷们”叛变的一套老生常谈,甚至泰霍夫也不会认为是我的独创思想。独创之处显然在于要求随时准备好“匕首和毒药”。泰霍夫难道当时不知道,真正革命政府,例如救国委员会¹⁵⁷曾给“兵老爷们”准备好了虽然能奏奇功异效但喜剧性较小的手段吗?匕首和毒药至多适用于威尼斯的寡头政治。如果泰霍夫把自己写的信再细看一遍,他就会从“匕首和毒药”这些字眼里看出讽刺来。福格特的同谋者、著名的波拿巴派密探爱德华·西蒙,在《现代评论》(1860年巴黎版第8期第528页,在他的《福格特先生的诉讼》一文

^① 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6页。着重号是后加的。——编者注

中)上转载了泰霍夫的信中的上引的一段,并加了如下按语:

“马克思不很喜欢在他的帮里有军官。在革命中军官是太危险了。

应当随时准备好匕首和毒药对付他们!

泰霍夫本人是一个军官,他听到了这种话,于是又乘船回瑞士去了。”

爱德华·西蒙让可怜的泰霍夫被我准备好的“匕首和毒药”吓得魂不附体,以致他立刻躲开,乘船回瑞士去了。而帝国的福格特用黑体字转载“匕首和毒药”这一处,用以吓唬德国的庸人。然而,同是这个丑角在他所谓的《研究》里却写道:

“西班牙人的刀子和毒药今天放射出奇光异彩——因为问题涉及一个民族的独立。”(同上,第79页)

附带提一下:西班牙和英国有关1807年至1814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材料,早已驳倒了法国人杜撰出来的关于毒药的神话。但对空谈政治的人来说,这类神话当然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

最后,我来谈谈泰霍夫信中的“流言蜚语”,并将就一些例子来证明他在历史上的不偏不倚态度:

“首先谈的是他们同我们之间,即瑞士同伦敦之间的竞争……用他们的话说,他们应当维护旧同盟的权利,这个同盟由于它的明确的党派立场,当然不能容忍在同一范围(无产阶级)内的另一同盟与之友好并存。”(“主要著作”第143页)

泰霍夫这里谈的瑞士竞争团体就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革命集中”,泰霍夫作为这个团体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我们的。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领导该团体的主席是一位律师^①,1848年

^① 赛·埃·奇尔纳。——编者注

曾任某个小议会的副议长,1849年曾是德意志某临时邦政府的委员。1850年7月,德朗克来到苏黎世,在那里,这位律师先生把一份类似公证的协议交给他这个伦敦“同盟”的成员,叫他“通知”我。协议的全文如下:

“鉴于有必要把所有真正革命的人士联合起来,同时,尽管不是革命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能无条件地同意伦敦提出的纲领(1848年的《宣言》),但全都承认下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此,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革命集中之间达成了如下协议:

(1)双方同意继续并行不悖地工作——革命集中通过联合一切革命人士来为下一次革命作准备,伦敦协会通过组织主要是无产阶级分子来为无产阶级统治作准备;

(2)革命集中指示它的代表和特使,要他们在德国成立支部时,使那些他们认为适合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注意到有一个主要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而建立的组织;

(3)和(4)至于瑞士,其领导权则只应交给‘革命中央委员会’中真正拥护伦敦宣言的人。双方相互交换报告。”

从还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里可以看出:这里谈的并不是“在同一范围”(无产阶级)内的两个秘密团体,而是在不同范围内的和具有不同倾向的两个团体的联盟。其次,还可以看出:“革命集中”除了实现它本身的目的以外,还表示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某种分支。

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因为接受这种建议是与“同盟”的“原则”性不相容的。

“接着轮到了金克尔……他们回答说……他们从来没有追求过廉价的荣誉,恰恰相反!……至于金克尔,如果他安分守己的话,他们会竭诚地让他享有他的廉价的荣誉。但是,当他在柏林《晚邮报》上发表了那个拉施塔特的辩护词以后,他就不可能平安无事了。他们早已知道各方面都会发出一阵号叫,而且他们已想像到,他们这样做就把自己现有的报纸《莱茵报评论》的存在孤注

一掷。他们的这种担心果然证实了。他们因这一事件破了产，失去了莱茵省的所有订户，而不得不使报纸停刊。但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同上，第146—148页）

首先，让我们来更正一下事实：当时《评论》还没有停刊，3个月以后还出了一期新的合刊，也没有失去一个莱茵省的订户，这一点，我的老朋友约·魏德迈——前普鲁士炮兵中尉、当时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的编辑能出面证明，因为他尽心尽力地替我们收报费。此外，只是从道听途说中知道恩格斯和我的写作活动的泰霍夫，至少也该读过他本人批评过的我们对金克尔的辩护词所作的批评。要不然他给瑞士“亲爱的人们”的秘密通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要向他们“揭露”我们早在5个月以前就已向读者揭露了的东西呢？上述的批评这样指出：

“我们预料得到，我们向我们的党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这篇辩护词，会引起感伤主义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普遍愤懑。我们对此毫不在乎。我们的任务是无所顾忌地批判……我们坚持我们的这种立场，甘愿放弃在民主派当中享有的廉价声望。我们的抨击丝毫也不会使金克尔先生的处境恶化；我们的揭露会使他得到赦免，因为我们证实了他的表白，即他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种人，并且我们还宣告，他不仅应该受到赦免，而且甚至应该担任普鲁士公职。况且，他的辩护词已经公布了。”（1850年4月《新莱茵报评论》第70、71页）¹⁵⁸

泰霍夫说我们在“败坏”革命的小伟人的“名誉”。然而，他并不是从福格特先生的警察意义上理解这种“败坏名誉”的。相反地，他所指的是我们从披上革命狼皮的羊身上撕掉那有失体统的包装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这样就预先使这些羊免遭普罗旺斯的著名抒情诗

人¹⁵⁹的那种命运,原来这位诗人披上狼皮去打猎,猎犬真以为是一只狼,就把他撕得粉碎了。

泰霍夫特别举出恩格斯的著作《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1850年3月《评论》第70—78页)^①中偶尔对济格尔将军的评论作为例子,来说明我们进行不光彩的攻击。

那么,不妨把恩格斯的有案可查的批评跟那些议论同一位济格尔将军的心怀叵测的废话比较一下,这类废话是我们同泰霍夫见面大约一年以后,由泰霍夫、金克尔、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亨·伯·奥本海姆、爱德华·梅因等人领导的伦敦“流亡者协会”印出来的,而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济格尔赞同卢格的“鼓动者协会”,而不赞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¹⁶⁰

1851年12月3日,《巴尔的摩通讯员》,这在当时类似金克尔的《通报》¹⁶¹,在一篇题为《伦敦鼓动者协会》的文章里对济格尔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把其余一切人都看做‘不成熟的政治家’的非凡人物,究竟是个什么人。这里有总司令济格尔。如果你问历史的缪斯,这个微不足道的平庸之辈是怎样爬到总司令的地位的,那她就会比低能的拿破仑被问到时更加为难。拿破仑至少是‘他伯父的侄子’,而济格尔只是‘他弟弟的哥哥’。他的弟弟由于行为有失检点而时常坐禁闭,这就引发了他的反政府的怨言,从而成为知名的军官。年轻的济格尔认为这是在革命起义之初的混乱时期宣布自己是总司令和陆军部长的充分理由。在经常证明自己具有优良品质的巴登炮兵队里,有足够的年长的和可靠的军官,在他们面前,年轻的、毫无经验的尉官济格尔不能不感到低人一等,而当他们必须服从这个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才能的无名小辈的时候,他们感到气愤不已。但是这里有个布伦坦诺,他是十分愚

①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4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99—107页。——编者注

蠢而又背信弃义的人,可以做出任何必然毁灭革命的事情。不错,这尽管是可笑的,但毕竟是事实:济格尔宣布自己是总司令,而布伦坦诺事后承认了他……

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在拉施塔特城下和黑林山中的绝望的殊死战中,济格尔把共和国军队的极其英勇的士兵们丢下不管,不给他们派出他答应派去的增援部队,而同时他自己却佩戴着肩章,坐着菲尔斯滕贝格公爵的轻便马车在苏黎世城里环游,还以引人注目的败军之将的角色自我炫耀。这位成熟的政治家的众所周知的伟大就是如此,他由于‘自认’以往有英雄的业绩,所以又一次把自己钦定为鼓动者协会的总司令。我们这位伟大的熟人^①,‘他弟弟的哥哥’就是如此。”^②

为了公正起见,我们也不妨听一下卢格的“鼓动者协会”通过它的发言人陶森瑙是怎么说的。陶森瑙 1851 年 11 月 14 日在伦敦写的《致泽登施提克尔公民》的公开信中,提到了由金克尔、泰霍夫等人领导的“流亡者协会”以及其他问题:

“……他们表示相信,为了革命的利益,把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是一种爱国义务和当务之急。德国鼓动者协会赞同这种想法,它的会员们已身体力行了,他们作了长期的努力试图团结金克尔及其拥护者。可是,政治合作的任何基础看来刚刚形成,便又消失了,新的失望随着旧的失望不期而至。恣意破坏以往的协议,在和解的面具下坚持分立的利益,一贯对多数进行欺骗,不知名的大人物以做组织工作的党派领袖的身份出现,企图钦定一个秘密的财务委员会,以及形形色色不可告人的鬼蜮伎俩,不成熟的政治家们总是想通过这些手法在流亡中支配祖国的命运,可是,革命的烈火一燃烧起来,这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就化为过眼烟云了……金克尔的拥护者公开和正式地攻击我们;在我们难于接近的德国反动报刊上,对我们不利、而对金克尔有利的通讯连篇累牍;最后是金克尔到美国去,以便用他在那儿筹备好的所谓德国公债来迫使我们接受联合,或者更确切些说,接受从属和依赖关系,而这是每一个从财政上使党合并的发起

① 这里套用了《旧约全书·约伯记》。——编者注

② 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合写的《流亡中的大人物》中也引用了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404 页。——编者注

人所期待的。金克尔的离开是严格保密的,以致我们只是从美国报纸上读到 he 到达纽约的消息时才知道这件事…… 这个事实和其他许多东西对于那些严肃的革命者——他们并不过高估计自己、但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功绩,可以毫无愧色地说:至少人民中有划分得很清楚的阶层是支持他们的——来说,就是加入一个按自己方式努力为革命利益服务的同盟的决定性理由。”

此外还指责金克尔说,他所募集的款项是只供“一个集团”使用的,“他在这儿(伦敦)和在美国的全部行动都证明这一点”,由“金克尔本人所提出的多数保证人”也证明这一点。

结尾说:

“我们既没有答应我们的朋友们要给他们的爱国捐款付息,也没有答应他们要偿还捐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用积极的成果(实际的服务?)和认真的会计制度来证明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我们也知道,将来当我们公布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可以期待博得祖国的感谢。”(1851年11月29日《巴尔的摩警钟报》)

这就是“鼓动者协会”和“流亡者协会”的民主主义英雄们3年当中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开展的一种“创作活动”,后来由戈克建立的“新旧大陆革命联盟”¹⁶²也参加了这种活动。(见附录6)

顺便提一下,流亡者在美国报刊上闹无谓纠纷,是由厄尔斯的两个议员齐茨和律斯勒之间的一场纸上比武开始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它能说明泰霍夫的“亲爱的人们”的特性。

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位泰霍夫的“通知朋友们”一信的收信人,在1850年底同赫弗尔、黑弗纳尔、戈克以及其他(后来卡·叔尔茨也参加了)一起,在巴黎建立了(如前所述)一个所谓的革命委员会。

几年以前,有人把该委员会的一个前委员写给这里一个政治流亡者的一封信转交给我,由我随意处理。这封信还保存在我这里。

信里有这样的话:

“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把持了整个委员会。类似列席者被吸收进来的其他委员,只不过是為了装装门面而已。这两位先生当时认为,很快就能让已完全被他们控制的金克尔去主管德国的事务。特别使他们感到深恶痛绝的,是卢格的嘲讽以及马克思的批评和魔鬼般的活动。这两位先生有一次同他们的列席者会面时,给我们把马克思妙趣横生地描绘一番,使我们对来自马克思方面的恶魔般的危险产生了夸大的看法……叔尔茨—席梅尔普芬尼希提出了消灭马克思的建议。猜疑和阴谋、无耻透顶的诽谤都被拍出来当作手段。为此进行了表决,并获得通过,还作出一项相应的决议,如果对这种儿戏可以这样称呼的话。1851年初,在《汉堡消息报》的小品文栏里发表的、由莱·黑弗纳尔根据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上述描绘而编造出来的对马克思的评论^①,算是执行这项决议的最直接的一步。”

无论如何,黑弗纳尔的小品文同泰霍夫的信之间存在着极为明显的亲和力,尽管它们二者都不能同福格特的“劳斯之歌”媲美。不应当把这一“劳斯之歌”同卡蒙斯的《卢兹之歌》混为一谈。相反地,本来的《劳兹之歌》是彼得·平达的一部英勇而滑稽的史诗¹⁶³。

^① 莱·黑弗纳尔《流亡者》,载于1851年2月28日《汉堡消息报》第51号。——编者注

五

帝国摄政和普法尔茨伯爵

Vidi un col capo sì di merda lordo,
 Che non pareva s'era laico o cherco,
 Quei mi sgridò: Perchè se 'tu sì 'ngordo
 Di riguardar più me, che gli altri brutti?
 (Dante)①

福格特遭到谴责后,迫不及待地想要证明:为什么恰好是他这个 bête noire[骇人的怪物,令人憎恨的东西]②引起了“硫磺帮”的注意。因此,关于舍尔瓦尔和洛桑盛会上“遭到挫折的密谋”这一类逸事,又由“流亡的帝国摄政”这种同样逼真的奇闻来补充。不应该忘记,福格特曾是议会岛巴拉塔里亚的总督。¹⁶⁵他说:

“科拉切克的《德国月刊》是从 1850 年年初起出版的……第一期出版之后,

-
- ① 我看到一个脏鬼满头污粪,
 分辨不出他是僧侣还是俗人,
 他向我咆哮:“你为什么老盯着我,
 难道我比别人更污秽!”(康内吉塞尔)¹⁶⁴
- ② 直译是:“黑色的野兽”。——编者注

硫磺帮就立即通过它的一个成员(他在这以后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了),发表了一本抨击性小册子,名为《流亡的帝国摄政福格特及其党羽和阿道夫·科拉切克的〈德国月刊〉》。这本小册子《总汇报》也曾提到过……硫磺帮的整个体系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表现出来了。”(同上,第163页)

接下去便是冗长的叙述:在上述小册子里有一篇由哈根教授写的论加格恩的匿名文章,把它“硬说成是”流亡的帝国摄政福格特写的,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硫磺帮知道”,哈根

“当时住在德国,正受到巴登警察当局的迫害,只要提到他的名字,便会给他增加极大的麻烦”(第163页)。

席利在2月8日从巴黎寄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

“格赖纳——据我所知,他从未到过日内瓦,——被列入硫磺帮,是由于他写了一篇悼词献给‘流亡的帝国摄政’;议会方面认为它是德斯特尔写的,因而咒骂他,一直骂到我写信给福格特的一个朋友和同事^①,澄清了事实真相为止。”

格赖纳曾经是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委员。格赖纳的统治是“一片恐怖”(见福格特《研究》第28页),特别对我的朋友恩格斯来说是如此,因为格赖纳曾制造借口下令在基希海姆逮捕他。这一整个悲喜交集的事件,恩格斯本人已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2月号第53—55页)^②上详细地叙述过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有关格赖纳先生的一切。在流亡的帝国摄政无中生有地把我牵连进他同“普法尔茨伯爵”之间的冲突这一点上,这位天才的发明家据以编排“硫磺帮”

^① 路·西蒙。——编者注

^② 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3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63—65页。——编者注

的生活和行动的“整个体系”“又一次”表现出来了。

使我得到补偿的是他的真正福斯泰夫式的幽默，他居然让普法尔茨伯爵“马上”动身到美国去了。在普法尔茨伯爵像射出一支帕尔芬人的暗箭一样出版了反对“流亡的帝国摄政”的抨击性小册子之后，一片恐怖包围了格赖纳。恐怖把他从瑞士赶到法国，又从法国赶到英国。渡过了海峡他也并不感到十分安全，于是他登上一艘丘纳德公司的轮船，继续前往利物浦；他一上船，就气喘吁吁地向船长喊道：“快点越过大西洋！”而“严峻的水手”却回答他说：

“我一定教您摆脱州官的暴力！

且让别人把您从大风大浪中救起。”^①

^① 席勒《威廉·退尔》第1幕第1场。——编者注

六

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他的忧愁多种多样。”^①

福格特本人声明，他在“主要著作”里“必须”（同上，第162页）“阐明他本人对这个集团（马克思之流）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他所谈的冲突，都是他从未经历过的，而他所经历过的冲突，却又是他从来不谈的。因此，我不得不把他的荒诞故事同少许的真情实况对照一下。如果翻阅一下《新莱茵报》合订本（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那就会发现，在1848年，除了惟一的一次例外，福格特的名字既未见于《新莱茵报》的社论中，也未见于该报的通讯中。他的名字只是出现在有关议会辩论的日常报道中，而且，法兰克福的记者为了讨福格特先生的欢心，从来都不忘记认真地记录下“他本人发表的演说”所博得的“掌声”。我们看到，当法兰克福议会右派拥有像利希诺夫斯基那样的喜剧小丑和像冯·芬克那样的马戏团小丑的联合力量时，左派却只好满足于福格特一个人扮演的孤零零的滑稽剧。我们了解，他需要鼓励——

^① 这里套用了博内留斯《宝石》中的寓言《一个博学的傻神父的故事》。——编者注

“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孩子们的活宝——潘奇内洛先生，”^①

因此，我们就让那位法兰克福的记者为所欲为。1848年9月中旬以后，报道的调子发生了转变。

在辩论马尔默停战协定¹⁶⁶中用夸张的革命空谈来煽动起义的福格特，在紧要关头却竭力阻挠接受那些由普芬斯特魏德人民集会提出并得到一部分极左派分子赞同的决议。在街垒战失败，法兰克福变成一座公开的兵营，并在9月19日宣布戒严之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却同意**紧急讨论**察哈里埃提出的关于赞同帝国内阁迄今采取的各项措施并向帝国军队致谢的建议。在福格特登上讲台之前，甚至连**费奈迭**也反对“**紧急讨论**”这些建议，他宣称：在这样的时刻进行这类辩论，是同议会的尊严不相容的。但是福格特**胜过了**费奈迭。为了惩罚这种做法，我在议会的报道中，在“福格特”这几个字上加了“空谈家”几个字，这是对法兰克福记者的一种言简意赅的暗示。

在紧接着的10月，福格特不仅不再在当时蛮横无礼、反动透顶的多数派面前逞强，——这是他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敢在施潘道的**威美尔曼**10月10日代表大约40名议员提出的反对保卫国民议会法¹⁶⁷的抗议书上签名。威美尔曼说得很对，这一法律是对三月革命¹⁶⁸所争得的各项人民权利——集会权、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极端无耻的侵犯。甚至**艾森曼**也提出了类似的抗议。但福格特**胜过了艾森曼**。当他后来在建立“中央三月同盟”¹⁶⁹期间又开始大摆架子时，他的名字终于在《新莱茵报》(1848年12月29日的一号)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这篇文章把“三月同盟”称做“反革命的不自觉的

^① 彼·平达《劳兹之歌》第1章。——编者注

工具”，把它的纲领驳得体无完肤，而把福格特描绘成一位两面派人物的一半，另一半是芬克。十多年以后，这两位“未来的大臣”看出了他们的血缘关系，便把瓜分德国当作他们团结的座右铭。

不仅是“三月同盟”后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对它的估计是正确的。海德堡“人民同盟”、布雷斯劳“民主同盟”、耶拿“民主同盟”等等都轻蔑地拒绝了它那纠缠不休的拍马拉拢手段，而曾经加入该同盟的那些极左派成员于1849年4月20日发表的退盟声明，也都证明我们在1848年12月29日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然而，心平气和、举止高雅的福格特却要用他的大度使我们惭愧得无地自容，这一点可从下列引文中看出：

“《新莱茵报》第243号，科隆1849年3月10日。所谓‘帝国议会’的‘法兰克福的所谓三月同盟’，竟厚颜无耻地给我们寄来了如下一封石印信件：

‘三月同盟决定编制一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我们支配的所有报纸的名单，并分发给和我们有联系的一切同盟，以便在这些同盟的协同下，使上述报纸优先得到有关广告。在把这份名单通知你们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有偿广告对一家报纸来说是整个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的意义。

中央三月同盟理事会

1849年2月底于法兰克福’

《新莱茵报》也被列入随信附来的报纸名单，——据说这些报纸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三月同盟支配，而三月同盟的拥护者则把‘有关广告’优先供给这些报纸刊载，——并且还加了一个光荣的星标。现在我们特作如下声明：我们报纸的版面从来没有提供给这个所谓三月同盟支配……因此，既然三月同盟也把我们的报纸列入确实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它支配的报纸的石印名单，并称为它的机关报

之一,那么这简直是对《新莱茵报》的诬蔑,是三月同盟的庸俗吹嘘……

对于财迷心窍、耽于竞争的爱国志士们关于有偿广告对一家报纸来说是**整个事业的资金来源**的意义这个醒聩的意见,我们当然不予回答。《新莱茵报》在一切方面都始终和爱国志士们不同,而尤其和他们不同的是,它从来没有把政治运动看做投机勾当或资金来源。”^①

在《新莱茵报》断然拒绝了福格特之流提出的资金来源之后不久,在这个中央商务同盟^②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泪流满面地说该报是“纯德国式争吵”的典范。在我们回答这种哭诉的那篇文章的结尾(《新莱茵报》第248号),我们把福格特叫做“一个在省的大学区的小饭馆中高喊的人和一名不称职的帝国的巴罗”^③。诚然,在皇帝问题上,他当时(3月15日)还没有走上极端。可是我们一眼就看穿了福格特先生,因而能够把他未来的叛变活动——他本人对这种活动暂时还不清楚,——看做既成事实。

不过,在这以后,我们就把福格特及其同伙交给那位年轻的、既有才智又有胆略的施勒弗尔去摆布了。施勒弗尔是3月初从匈牙利来到法兰克福的,从此以后就向我们报告帝国蛙池里的风波。

在这段时间里,福格特竟堕落到这步田地,——当然,这种情况

① 引自马克思1849年3月10日为《新莱茵报》写的《三月同盟》。——编者注

② 这是发音近似的文字游戏:“中央商务同盟”的德文是Central-Commerzverein,“中央三月同盟”的德文是Central-Märzverein。——编者注

③ 引自马克思1849年3月15日为《新莱茵报》写的《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编者注

与其说是《新莱茵报》造成的，不如说是他自己造成的，——以致巴塞尔曼敢于在1849年4月25日的会议上斥之为“变节分子和叛徒”。

《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弗·恩格斯，由于参加埃尔伯费尔德起义而不得不逃亡¹⁷⁰。一再想通过法律手续迫使我保持沉默的企图在陪审法庭上遭到失败，而政变内阁¹⁷¹的机关报《新普鲁士报》一再揭发“《新莱茵报》的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①”，——“同这种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比较起来，1793年的《通报》也要黯然失色”（见《新莱茵报》第299号）^②，——在这以后，我本人也很快被驱逐出普鲁士了。这种“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在普鲁士的一个要塞城市里，在得胜的反革命势力企图用无耻的残暴来炫耀一番的时候，是适得其所的。

1849年5月19日，出版了《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号（红色油墨号）。在《新莱茵报》存在期间，福格特一直保持忍耐和沉默。一般说来，如果某个议员要提出抗议，总是用彬彬有礼的方式来表示，大致这样：

“阁下！我对贵报提出的尖锐批评颇为重视，因为它对所有政党和所有个人都是同样严格的。”（见1849年2月11日第219号，韦森东克的抗议）

《新莱茵报》停刊一个星期以后，福格特终于认为，在议会不可侵犯这面盾牌掩护下，可以抓住这等待已久的机会，把长期积聚在内心深处的“物质”转变为“力”¹⁴⁴了。《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威廉·沃

① 钦博拉索山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也是无比庞大的代名词。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意即粗鲁无礼到了极点。——编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1849年5月15日为《新莱茵报》写的《十字报》一文。——编者注

尔弗,代替一位退出议会的西里西亚议员^①,进入“已处于不断瓦解中”的法兰克福议会。

要了解下面叙述的在1849年5月26日议会会议上出现的情景,就不应忘记:当时德累斯顿的起义和莱茵省其他地区的局部运动已被镇压下去,巴登和普法尔茨正面临帝国的干涉,俄国的主力部队正开赴匈牙利,最后,帝国内阁断然宣布议会的一切决议无效。议事日程上有两篇《告德国人民书》¹⁷²:一篇是乌克兰德根据多数派的意图草拟的,另一篇则出自三十人委员会¹⁷³中属于中间派的成员们之手。会议主席是达姆施塔特人雷^②,他后来成了兔子,并且也“脱离”了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议会。我来引证一下圣保罗教堂开会的官方速记记录(第229、228号)。¹⁷⁴

布雷斯劳的沃尔弗^③:

“诸位先生!我之所以报名发言反对多数派草拟的并在这里宣读过的告人民书,是因为我认为它根本不适合当前的局势,因为我觉得它太软弱无力了,只能用来当作一篇文章拿到起草这篇告人民书的那个党的日报上发表,但是不能把它当作告德国人民书。既然刚才还宣读了另一篇告人民书,那我就顺便指出:我要更强烈地反对这一篇,至于反对的理由,我觉得用不着在这里说明。(中间派有人问:为什么用不着?)我谈的只是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实际上,它写得非常温和,甚至连布斯先生都说不出很多的反对意见,而这当然是对一份告示的最坏的介绍。不,先生们,如果你们还想对人民多少起一点影响,那你们就不应该像在告人民书里那样对人民说话;你们不应该谈合法性、法制基础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应该像各国政府那样、像俄国人那样谈非法性,而我所指的

① 古·阿·施滕策尔。——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雷”是姓,它的德文 Reh 也有“小鹿”的意思。——编者注

③ 威·沃尔弗《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莱比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9卷。——编者注

俄国人是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场内骚动和笑声)我把他们全都冠上一个共同的名称——俄国人。(全场活跃)是的,诸位先生,就是在这个议会里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们必须对他们说:‘正如同你们站在合法的立场上一样,我们也站在合法的立场上。’这就是暴力的立场,你们也要顺便说明,对你们来说,合法性就是用暴力、用组织精良的强攻纵队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真的需要发表一篇告人民书,那你们就发表这样一篇: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①这个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不受法律保护。(喊声:守秩序!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宣布所有大臣也不受法律保护。(骚动又起)喂,别打断我的话;他是天字第一号人民叛徒。”

主席:“我认为,沃尔弗先生违背和破坏了尊重他人的准则。他不能面对这个议会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叛徒。因此,我必须叫他守秩序。同时,我最后一次要求旁听席上的人不要像刚才那样参与我们的辩论。”

沃尔弗:“我本人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我声明:我就是要破坏秩序;他和他的大臣们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守秩序,真是鲁莽无礼!)

主席:“我必须剥夺您的发言权。”

沃尔弗:“好吧,那我抗议;我是想代表人民在这里讲话,讲人民所想的话。我抗议用这种精神草拟的任何告人民书。”(全场骚动)

主席:“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话。诸位先生,刚才发生的事件,我可以说是议会在这里开会以来的第一个事件(的确,它是在这个辩论俱乐部里发生的第一个也是惟一个事件)。在这里,还不曾有一个发言人说过:他存心想破坏秩序,破坏本议会的根基。(施勒弗尔在4月25日的会议上,在同样叫他守秩序时说道:“我接受叫我守秩序的要求,而且乐意这样做,因为我希望,由其他方面要求本议会守秩序的时刻即将到来。”)”

“诸位先生,我很遗憾,刚当上议员的沃尔弗先生竟这样地初次登台(雷是把一切事情都当作喜剧看待的)。诸位先生!我叫他守秩序,是因为他竟敢粗暴地破坏我们对帝国摄政王大人应有的尊敬和关怀。”

会议继续进行。哈根和察哈里埃发表了长篇演说,一个赞成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另一个反对。最后站起来的是

① 约翰大公。——编者注

福格特(吉森):“诸位先生!请允许我讲几句话,我不想使你们听得昏昏欲睡。议会今天已不是去年开会时的那个样子了,先生们,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要感谢上苍(“盲从”①的福格特在感谢上苍!),因为议会已将变成这个样子”(是的, *geworden wird!* ②),因为那些不再相信本国人民,并在决定关头背叛人民事业的人已同议会分道扬镳了!先生们,我请求发言(这就是说,刚才这套表示谢意的祈祷只不过是一堆废话),是为了保护从诗人心灵中(福格特变得富于灵感了)涌入这篇告人民书里去的水晶般清澈的激流(保护激流),反对投进它的或为了堵塞它而向它扔去的~~不体面的肮脏的东西~~(然而激流不是早已被告人民书所吸收了吗?);我这样做,为的是保护这些话(激流就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在福格特那里都变成话),反对在最近这次运动中聚集起来并威胁着要把那里的一切都淹没和弄脏的~~垃圾~~。是的,诸位先生!这(即垃圾)也就是垃圾和肮脏的东西(垃圾就是肮脏的东西!),有人用这种方式(哪种方式?)把肮脏的东西向所有只要能认为是干净的东西投去,我对这类事(什么事?)竟能发生,表示极大愤怒。”③(极大愤怒的福格特,多妙的一幅图画啊!)

他所说的——都是垃圾④。

沃尔弗对乌兰德草拟的告人民书只字未提。主席一再要求他守秩序,他之所以掀起这一场轩然大波,是因为他宣布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所有大臣们都是人民叛徒,并且要求议会宣布他们是人民叛徒。但是,这位“大公——帝国摄政王”、这“老迈无用的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福格特《研究》第28页)和“他的所有大臣们”,对于福格特来说,都是“所有只要

① 影射卡·福格特的著作《盲从和科学。一篇反对格丁根的枢密官鲁道夫·瓦格纳的论战文章》1855年吉森版。——编者注

② 马克思嘲笑福格特用错了助动词。——编者注

③ 卡·福格特《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莱比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9卷。——编者注

④ 这里套用了乌兰德所写的诗《歌手的诅咒》中的一行(原诗是:“他所说的——都是鞭策”)。——编者注

能认为是干净的东西”。他同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一齐歌唱：

“奥地利的君主，乐善好施，
有如柔和的丝丝细雨，
抚摩着人民和大地。”^①

福格特是不是那时就已经同约翰大公有“科学关系”，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见“主要著作”，文件，第25页）

10年以后，同一个福格特在他的《研究》里（第27页）说：

“无论如何，下列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就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首领们低估了约翰大公的才干一样，法国国民议会和它的首领们也曾低估过路易-拿破仑的才干；这两个狡猾的家伙，每一个都在自己范围内使[他的低估者]因所犯的~~错误~~付出很高的代价。当然，我们决没有把这两个人等量齐观。（路易·波拿巴的）令人惊异的肆无忌惮等等，等等。——这一切都使他显得比老迈无用的哈布斯堡皇室成员大为优越。”

在同一次会议上，沃尔弗曾通过锡格马林根的议员维尔特转告福格特，要同他用手枪决斗，可是当上述的福格特决定为了帝国要保下自己的人皮时^②，沃尔弗就以体罚来威胁他。但是，当沃尔弗从圣

① 瓦尔特（福格尔魏德的）《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诗集》1828年柏林第3版。——编者注

② 科贝斯第一¹⁴³在我们已经提过的雅科布·费奈迭写的抨击性小册子里叙述说：“在圣保罗教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即在加布里埃尔·里瑟尔发表了关于皇帝的演说以后受到加格恩的拥抱的那次会议上，当卡尔·福格特虚情假意地、大喊大叫地去拥抱议员威美尔曼时，我向他喊道：‘别耍这一套野孩子的鬼把戏了。’于是，福格特认为必须用挑衅性的骂人话来侮辱我一顿；可是当我要求他予以解释时，他却通过一位朋友的长期斡旋，厚着脸皮收回了对我的侮辱。”（同上，第21、22页）

保罗教堂走出来,看见大胆查理由两位妇人左右护驾的时候,他不禁捧腹大笑,便听之任之了。虽然沃尔弗也是一只有狼牙和狼心的狼,可是他在女性面前却成了一只羔羊。他所采取的惟一的、而且是不痛不痒的报复手段,就是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4月号第73页)上的一篇题为《帝国追记》的文章,该文在谈到前帝国摄政时说:

“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中央三月同盟表现得异常勤奋。他们在撤离法兰克福之前,就向各地的三月同盟以及德国人民号召说:‘同胞们!敲11点钟了①!’为呼吁建立国民军,他们又从斯图加特发布了一篇《告德国人民书》,——然而,中央三月同盟时钟的指针却停在老地方不动,或者时钟上的刻度XII就像弗赖堡大教堂时钟上的刻度一样被弄掉了。总之,告人民书里又一次说:‘同胞们!敲11点钟了!’啊,如果这个钟点早一些敲响,至少在那时,即在中央三月同盟的英雄卡尔·福格特为了满足他本人的需要和为了满足庆贺他的那个抱怨派¹⁷⁵的需要而在纽伦堡②葬送法兰克尼亚革命¹⁷⁶时敲响,那该多好;啊,如果它向你们敲,而且敲穿你们的脑袋,那该多好!……摄政政府在弗赖堡政府大楼内设了办公室。卡尔·福格特摄政(他同时是外交大臣和其他许多部的首脑)在这里也非常关切德国人民的幸福。在经过长时间的不分昼夜的研究之后,它完成了一项非常适时的发明:‘帝国摄政政府的护照’。护照很简单,是石印的,但很漂亮,可以免费领取,份数随意。这些护照只有一个小缺点:它们只在福格特的办公室里才有效,才受到尊重。也许,某一份护照以后会在某一位英国人搜集的古董堆里找到一席之地。”

沃尔弗没有学格赖纳的样。他并没有在《评论》“出版之后”“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而是又在瑞士待了一年之久,等待州官的报复。

① 在德语中,“敲11点钟”意指最后时刻、危机时刻。——编者注

② 福格特后来为他的纽伦堡英雄业绩辩解说,因为“他本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七

奥格斯堡战役

在图尔高州公民结束他的意大利战争之后不久，伯尔尼州公民¹⁷⁷就开始了他的奥格斯堡战役。

“那里(在伦敦)很早以前就有一个马克思集团，(《总汇报》的)绝大部分通讯是他们供给的，而且从 1849 年起经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主要著作”第 194 页)

尽管马克思本人从 1849 年底，即从他第二次被逐出法国后才居住在伦敦，但“马克思集团”却好像很早以前在伦敦就有了。尽管马克思集团很早以前就“供给《总汇报》绝大部分通讯”，可是“从 1849 年起”才同它“经常保持联系”。总之，福格特的年表分为两大时期，即“很早以前”到 1849 年为一时期，从 1849 年到“这一”年为另一时期，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位男子汉在 1848 年以前“还没有想到从事政治活动”。(同上，第 225 页)

我在 1842—1843 年编辑过旧《莱茵报》，这家报纸同《总汇报》进行过殊死的斗争。1848—1849 年，《新莱茵报》重新展开了论战。由此可见，除了马克思“很早以前”就同《总汇报》作斗争，而福格特从 1844—1847 年是该报的“常任撰稿人”这一事实以外，在“很早以前到 1849 年”这一时期中还能有什么呢？(见“主要著作”第 225 页)

现在我们来谈谈福格特的世界史的第二时期。

我从伦敦“经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即“从1849年起经常”同《总汇报》保持联系，因为“从1852年起”有一位奥利是《总汇报》驻伦敦的主要通讯员。实际上，无论在1852年以前还是以后，奥利同我都没有任何联系。我一生从未见过此人。他在伦敦流亡者当中是以金克尔流亡者协会会员的身份出现的。但是，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事情本身，因为：

“我的〈福格特的〉小同乡，淡黄头发的奥利曾是学过英文的老巴伐利亚人阿尔滕赫弗尔过去的先知，他企图从共产主义的基础出发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获得更高的诗的观点。最初他是《总汇报》驻苏黎世的主要通讯员，从1852年起直到他最后死于疯人病院为止，一直是该报驻伦敦的主要通讯员。”（“主要著作”第195页）

密探爱德华·西蒙把这首福格特之歌变成了如下的法语：

“En voici d'abord un qui de son point de départ communiste, avait cherché à s'élever aux plus hautes conceptions de la politique.”[“这里首先就有一个人，他从他的共产主义观点出发，企图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政治观点。”]（“政治方面更高的诗的观点”，甚至像爱德华·西蒙这样的人也无能为力。）“A en croire M. Vogt, cet adepte fut l'oracle de la Gazette d'Augsbourg jusqu'en 1852, époque où il mourut dans une maison de fous.”[“如果相信福格特先生说的，那么这个魔术师直到1852年死于疯人病院为止，一直是《奥格斯堡报》的先知。”]（《现代评论》1860年巴黎版第13卷第529页）

关于自己的“主要著作”和自己的奥利，福格特可以高喊一句：“枉费了功夫和油”^①。他本人说他的“小同乡”从1852年起一直到

① 普劳图斯《迦太基人》第1幕第2场；这是一个女侍说的一句话，她抱怨自己枉然抹了芬芳的油。这里是文字游戏：“奥利”这个名字的外文“Ohly”和拉丁字“oleum”（油）的发音相似。——编者注

“最后死于疯人病院”，都从伦敦为《总汇报》写通讯，而爱德华·西蒙却说，“如果相信福格特说的，那么奥利直到1852年死于疯人病院为止（附带说一句：他还健在），一直是《总汇报》的先知”。但是，爱德华·西蒙了解他的卡尔·福格特。爱德华知道，既然决定“相信”他的卡尔，那么，相信他什么，是相信他所说的，还是相信他所说的反面，都完全一样。

卡尔·福格特说，“李卜克内西先生代替他（即奥利）去做《总汇报》的通讯员”。“直到李卜克内西被公开宣布为马克思派的成员以后，他才被《总汇报》接受为通讯员。”（同上，第169页）

这次宣布发生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¹³⁴期间，即1852年底。

事实上，李卜克内西在1851年春成为《晨报》的撰稿人，他给该报写了伦敦工业博览会的情况。通过《晨报》的关系，他于1855年9月成为《总汇报》的通讯员。

“他的（马克思的）同志们所写的东西，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告诉了他的。”（同上，第194页）

证据很简单：“他（马克思）无条件地控制着自己的人”（第195页），而福格特却是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的法济那一帮人。我们在这里碰上了福格特神话创作的特点：处处流露出吉森或日内瓦的鼠目寸光、小市镇的狭隘和瑞士酒馆的气味。他把土里土气的习俗，天真地从日内瓦搬到了世界都市伦敦，他让李卜克内西在西头所写的东西，“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告诉了”住在4英里外的汉普斯特德的我；而且我每天都要为散居在全伦敦的、同世界各地通讯的其他许多“同志”作拉盖罗尼埃式的效劳。这是多么令人精神焕发的终身职业啊，而又多么有利可图！

福格特的良师益友爱德华·西蒙,虽则不熟悉伦敦的情况,但至少对巴黎的情况是熟悉的,因此,他以无可争辩的艺术家的敏感,在他那笨拙的“乡下朋友”的图画上挥抹了大城市的色彩:

“Marx, comme chef de la société, ne tient pas lui-même la plume, mais ses fidèles n'écrivent pas une ligne sans l'avoir consulté: *La Gazette d'Augsbourg* sera d'autant mieux servie”(同上,第529页)。即:“马克思作为集团的首领,自己是不执笔的,而他的信徒所写的,没有一行不是事先同他商量过的。(奥格斯堡报)被利用得更好了。”

福格特感觉到这种修改的全部妙处了吗?

我同李卜克内西从伦敦写给《总汇报》的通讯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我同福格特从巴黎写给《总汇报》的通讯没有任何关系一样。顺便提一下,李卜克内西的通讯是很值得称赞的,他在《总汇报》上对英国政治所作的批判性论述,和他在同一时期为激进的美国德文报刊所写的通讯的精神完全一致。福格特本人煞费苦心地翻阅了《总汇报》的许多全年合订本,搜寻李卜克内西通讯中的漏洞,但他对这些通讯的内容的批评,却仍然限于指出,李卜克内西的通讯标志是“两条细的斜杠”(“主要著作”第196页)。

杠画得斜自然证明通讯也写得坏^①,何况还是“细”的!李卜克内西如果不用两条“细杠”而是画上两个肥油油的圆点作他的通讯标志就好了!既然通讯中除了“两条细的斜杠”外没有任何其他污点,那就值得想一想,这些通讯为什么能登在《总汇报》上。但是,为什么又不能登在《总汇报》上?大家知道,《总汇报》刊登各种不同观点的

^① 文字游戏:“斜”的德文是 *schief*,它同某些动词连用时有“坏”的意思。——编者注

文章,至少在英国政治这类中立性的问题上是这样,此外,这是惟一超出地方意义的为国外所知的德国报纸。在海涅发表过《巴黎来信》,法耳梅赖耶尔发表过《东方来信》¹⁷⁸的这同一家报纸上,李卜克内西当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发表他的伦敦来信。福格特写道,在《总汇报》撰稿人当中也不乏卑劣之徒。大家知道,他本人从1844年到1847年就是该报的撰稿人。

至于我本人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我提到恩格斯是因为我们两人根据共同计划和事先取得的一致意见进行工作),那么,在1859年我们的确同《总汇报》有某些“关系”。这就是,我于1859年1、2、3月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社论^①,其中有的文章详细地批评了《总汇报》所宣扬的“中欧大国论”及其认为奥地利继续统治意大利是对德国有利的论点¹⁷⁹。在战争爆发前不久,经我的赞同,恩格斯发表了《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是专门针对《总汇报》而写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柏林版第4页),是从军事理论的观点来证明:“德国为了自己的防御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块领土;如果仅仅从军事观点出发,那么法国要求占有莱茵河的理由无论如何要比德国要求占有明乔河的理由充分得多”。¹⁸⁰但是,我们在反对《总汇报》及其关于奥地利有必要用暴力统治意大利的理论的同时,也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宣传。例如,我在《论坛报》上(参看1859年2月)详细地表明,“衰落帝国”¹⁸¹的财政状况和国内政治状况已经达到了危急关头,只有对外战争才能延长法国政变制度的统治,并从而延长欧洲反革命的统治¹⁸²。我指出,波拿巴式地解放意大利只不过是一种借口,目

① 马克思这里尤其指他的《普鲁士的战争前景》一文。——编者注

的是要维持对法国的奴役，使意大利屈服于政变制度，把法国的“自然疆界”移向德国，把奥地利变成俄国的工具以及把各国人民卷进正统反革命同非正统反革命的战争中去。这一切早在前帝国的福格特在日内瓦大发议论以前就已发生了。

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发表了沃尔弗的文章^①以后，我已经把“圆满的人物”完全忘掉了。1859年春天，4月的一个晚上，当弗莱里格拉特把福格特的一封信以及随信附来的政治“纲领”¹⁸³拿给我看的时候，使我又想起了这个快活的汉子。这并不是泄露机密，因为福格特的信本来是“为了通知”朋友们而写的，但不是福格特的朋友，而是收信人的朋友。

当问到我在这个“纲领”中发现了什么，我的回答是：“政客的空谈”。他请求弗莱里格拉特争取布赫尔先生担任计划在日内瓦出版的宣传性报纸的政治通讯员，从这件事情上，我立刻又认出了这个老诙谐家。福格特写信的日期是1859年4月1日。大家知道，从1859年1月起布赫尔在他为柏林《国民报》写的伦敦通讯中，表示了同福格特纲领绝对矛盾的观点；但是，这位讲求“批评的率直”的人物是青红皂白一概不分的。

在这一件我认为非常不值得向人道及的事情发生以后，我接到了福格特的《欧洲现状研究》这本可怜的著作，它使我确信，福格特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有联系。

1859年5月9日晚，戴维·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开了一个公开的群众大会，当时我在主席台上。大会开始以前，有一位神情严肃的人物傲慢地走到我跟前。从他脸上那哈姆雷特式的表

^① 威·沃尔弗《帝国追记》。——编者注

情,我立刻就明白了,“丹麦国里恐怕有些不可告人的坏事”^①。这就是政治活动家卡尔·布林德。在几句开场白以后,他就说到福格特的“阴谋”,而且富于表情地摇晃着脑袋,向我保证说:福格特从波拿巴政府领取津贴搞宣传;福格特想用3万盾来收买一个南德作家,这个人的名字“可惜”他不能告诉我(我真看不出,有哪一位南德作家能值3万盾);而且在伦敦已经有过收买的企图;早在1858年,当普隆-普隆、法济之流在日内瓦会晤的时候,就讨论了意大利战争的问题,他们并指定俄国康斯坦丁大公为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福格特也曾敦促他(布林德)参加自己的宣传工作;他手头有福格特叛国活动的证据。后来,布林德回到主席台另一端他自己的位子上,靠近他的朋友尤·福禄培尔;大会开始了,戴·乌尔卡尔特在他的详尽演说^②中力图说明,意大利战争是俄法阴谋的产物^③。

当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晨星报》(曼彻斯特学派⁵⁵的机关报)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4场。——编者注

② 《乌尔卡尔特先生呼吁中立》,载于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闻》第5期。——编者注

③ 福格特当然要把马克思集团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攻击归之为我敌视他这位自命不凡的人物和他的“朋友们”(“主要著作”第212页)。因此,看来应当适当地谈一下我同戴·乌尔卡尔特及其政党的关系。乌尔卡尔特关于俄国的和反对帕麦斯顿的著作使我感到兴趣,但没有使我信服。为了取得对问题的确定看法,我下了番功夫分析了《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¹⁸⁴和1807—1850年的外交蓝皮书³³。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系列社论(1853年底)。在这些文章中,我根据帕麦斯顿同波兰、土耳其、切尔克西亚等等的会谈,证明他同彼得堡内阁有联系。此后不久,我把这些文章转载于由厄内斯特·琼斯编辑的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并且又新增了关于帕麦斯顿活动的几段¹⁸⁵。同时,《格拉斯哥哨兵》也转载了这些文章中的一

国际栏的编辑孚赫博士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有一家新的伦敦德文周报《人民报》刚刚发行;由安·谢尔策尔先生出版、埃德加·鲍威尔编辑的工人报纸《新时代》,由于《海尔曼》周报的出版者金克尔耍弄阴谋而垮台了;迄今为止一直是《新时代》通讯员的比斯康普知道这件事以后,放弃了他在英国南部的教员职位,以便在伦敦出版《人民报》来同《海尔曼》周报相对抗。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其他几个团体都支持《人民报》,这家报纸当然也像所有同类的工人报纸一样,编辑和写稿都是无偿的。虽然孚赫本人属自由贸易派,跟《人民报》倾向不同,但他不愿意有人垄断伦敦的德文报刊,于是就跟伦敦的一些熟人共同建立了一个支援该报的财务委员会。比斯康普已经写信给至今他还不认识的李卜克内西,请求他供稿,等等。最后孚赫要求我参加《人民报》的工作。

篇(《帕麦斯顿和波兰》¹⁸⁶),这篇文章引起了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注意。在我同他的一次会面之后,他说服了塔克尔先生在伦敦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些文章的一部分。这些反对帕麦斯顿的小册子,后来以不同的版本共出了15 000—20 000册。鉴于我对论述卡尔斯陷落的蓝皮书进行了分析(载于1856年4月伦敦的宪章派报纸)¹⁸⁷,设菲尔德的外交事务委员会¹⁸⁸曾来信对我表示感谢(见附录7)。在翻阅英国博物馆收藏的外交手稿时,我发现了一些从18世纪末一直上溯到彼得大帝时代的英国文件,这些文件揭露了伦敦内阁和彼得堡内阁不间断的秘密合作,而彼得大帝时代看来是这种关系的起点。到目前为止,我只发表过详细论述这一题目的著作中的一篇导言,标题是《18世纪外交内幕》。这篇导言曾先后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以及伦敦的《自由新闻》这两种乌尔卡尔特创办的刊物上发表¹⁸⁹。自《自由新闻》创办时起,我就偶尔为它写点稿子。由此可见,我在研究帕麦斯顿和整个英俄外交活动时,丝毫也没有想到,帕麦斯顿勋爵的背后还站着位卡尔·福格特先生。

虽然比斯康普从 1852 年起就住在英国,但我们那时还不认识。在乌尔卡尔特召开群众大会的次日,李卜克内西把他带到我家里来。由于时间有限,最初我没有满足为《人民报》撰稿的要求,但答应请求我在英国的德国朋友订阅、资助并供稿。谈话中我们说到乌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接着又说到福格特。比斯康普已经知道福格特的《研究》,并且给了正确的评价。我向他和李卜克内西介绍了福格特的“纲领”和布林德所揭露的内容,但是我就布林德的揭露指出说,南德人总是喜欢浓墨重彩。使我惊异的是,我发现《人民报》第 2 期(5 月 14 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作为帝国叛徒的帝国摄政》的文章(见“主要著作”,文件,第 17、18 页),比斯康普在该文内提到了布林德说过的两件事,即 3 万盾(但他给降到了 4 000 盾)和福格特的活动费用来自波拿巴。此外,文章充满了俏皮话,风格同他于 1848—1849 年同海泽一起在卡塞尔出版的《大胡蜂》报一样。同时,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委托它的领导人之一谢尔策尔先生号召在瑞士、比利时和美国的工人教育协会支持《人民报》,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作斗争,这件事我是在“主要著作”出版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见附录 8)。比斯康普本人把上面提到的 1859 年 5 月 14 日刊登在《人民报》上的文章寄给福格特,福格特同时也经自己的拉尼克尔之手接到了安·谢尔策尔先生的通告。

福格特立刻以他著名的“批评的率直”,把我捏造成反对他的阴谋的策划者。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把后来发挥成他的“历史故事”的一篇纲要发表在前面好几次引证过的《瑞士商业信使报》第 150 号特刊上。这篇原始福音书第一次公开了硫磺帮、制刷匠帮和舍尔瓦尔等人的秘密,上面注明 1859 年 5 月 23 日于伯尔尼(所以,该书比摩门教¹⁹⁰福音书还要新),标题是《警告》,就其内容来说,很像译自臭

名远扬的埃·阿布小册子^①中的一段文字^②。

前面已经提到,《人民报》根据我的请求转载了福格特匿名的原始福音书《警告》。

6月初我离开伦敦到曼彻斯特拜访恩格斯,在那里为《人民报》收集了约25英镑预订费。这笔钱是由弗·恩格斯、威·沃尔弗、我以及在我寄到柏林的一个司法文件中提到过名字的3位住在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③提供的,但“好奇的”福格特却把“视线越过拉芒什海峡”投向奥格斯堡和维也纳去找它的“来源”(“主要著作”第212页)。关于原财务委员会在伦敦募集的捐款,福格特可以向孚赫博士去打听。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225页上教导我们说:

“但是,要求民主派无代价地做一切事情,一向就是反动派的诡计,而他们自己(不是指民主派,是指反动派)却要求得到索取工资和报酬的特权。”

可见,《人民报》不但让人无代价地编辑和撰稿,而且还要编辑和撰稿人向它付酬,它的诡计是多么反动啊!如果这不足以证明《人民报》与反动派有关,那么卡尔·福格特就惶惑莫解了。

当我在曼彻斯特逗留的时候,伦敦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李卜克内西在霍林格尔(《人民报》的承印人)印刷所里发现了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的校样。他匆匆看了一遍,立刻认出是布林德

① 埃·阿布《罗马问题》1859年布鲁塞尔版。——编者注

② 这里稍微谈谈比尔“推销员”,即“流亡的帝国摄政”的地方小《通报》。《比尔商业信使报》的出版者和编辑是一个叫恩斯特·许勒尔的人,1838年的政治流亡者,曾作过驿站长、酒商,破过产,但现在又发了财,因为他的在克里木战争¹⁷期间领取英国—法国—瑞士新兵招募处津贴的报纸,眼下拥有1200个订户。

③ 路·博尔夏特、爱·龚佩尔特、马·黑克舍尔。——编者注

所作的揭露,此外,还听排字工人奥·费格勒说,布林德把他亲笔写的手稿交给霍林格尔印刷。校样上的修改也是布林德的手笔。两天后李卜克内西收到霍林格尔寄来的校样,他把这份校样转寄给了《总汇报》。传单的活字版保留了下来,后来当《人民报》第7号(1859年6月18日)转载这份传单时又利用了这个活字版。

《总汇报》发表了《警告》^①之后,前帝国的福格特就发起了奥格斯堡战役。他控诉《总汇报》转载了传单。

在“主要著作”(第227—228页)中福格特模仿了缪尔纳:“我是,我是,我是强盗雅罗米尔。”^②只是他把“我是”改成了“我已”。

“我已提出控诉,因为我事先就知道,自命为‘标准德语文化的代表’的那个编辑部的空虚、渺小和卑鄙,必然会全部被揭露出来,我已提出控诉,因为我事先就知道,这个可敬的编辑部和被它捧上了天的奥地利政策同硫磺帮和革命的残渣之间的联系,必然会大白于天下。”

接着还有4个“我已提出控诉”。

已提出控诉的福格特变得高大起来,要么就是朗金说得对,再没有比水肿病人更干瘪的了^③。

这位“圆满的人物”喊道:“我的控诉动机极少个人考虑。”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牛犊在屠宰台上也不会像卡尔·福格特在被告席上这样觳觫挣扎。当他的“密”友拉尼克尔、赖纳赫(曾

① 卡·布林德(卡·福格特和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载于1859年6月22日《总汇报》第173号附刊。——编者注

② 这句话出自格里尔帕尔策《女始祖》第3幕。——编者注

③ 卡·朗金《论崇高》。——编者注

写过非常流行的关于福格特的丑闻录)和埃斯林根的饶舌的残阙议会议员迈尔在助长他对法庭的恐惧心理的时候,苏黎世那边却再三催促他“控诉”。在洛桑工人节上,皮毛商罗斯当众向他宣称,如果他不提起诉讼,就不再尊敬他了。但是,福格特坚持己见:他根本不想理会奥格斯堡和伦敦的硫磺帮,他将保持缄默。不过,他还是突然开口说话了。各报刊登了关于他的诉讼消息,而拉尼克尔声明说:

“斯图加特人不让他(福格特)得到安宁。但是他(拉尼克尔)不同意这一点。”

其实,既然这位“圆满的人”受到两面夹击,最合适的手法无疑是控告《总汇报》了。福格特就雅·费奈迭的抨击(说福格特从事波拿巴主义的阴谋活动¹⁹¹)发表的自我辩护书刊登在1859年6月16日的《比尔商业信使报》上,因而在伦敦是在匿名传单^①出现以后看到的。传单在结尾时威胁说:

“但是,如果福格特想否认这一点——他未必敢于这样——,揭露之二将接踵而至。”

福格特出来否认了,而揭露之二却没有接踵而至。这样一来,他在这方面就安全了,只有亲密的熟人那方面还可能找他麻烦,但他对这些人了解得很清楚,知道他们都胆小怕事、瞻前顾后。他满有把握地估计到,他的控诉使自己越加公开地暴露,他们就会越加守口如瓶,因为揭露“流亡的帝国摄政”,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揭露整个“残阙”议会。

① 卡·布林德《警告》[传单]。——编者注

议员雅科布·费奈迭在他的小册子《保卫自己和祖国，反对卡尔·福格特》(1860年汉诺威版)第27—28页上失口说：

“除了福格特用来叙述他的案件而披露的那些信件以外，我还读了福格特写的另一封信，这封信比他给勒宁博士的信把福格特的立场揭露得更为清楚，说明他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想使战争局限于意大利的人的帮凶。为了个人的需要，我把这封信作了摘录，只可惜我不能在这里发表，因为收信人是在我许诺不拿去发表的前提下才给我看这封信的。出自个人的和对党的考虑，有人力图掩盖福格特在这件事情上的所作所为，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无论从党的角度还是从公民对祖国的义务的角度来看，我都认为是不正确的。许多方面所采取的谨慎态度使福格特依然故我，竟敢厚颜无耻地以德国的党魁自居。但是，我认为，正因为如此，福格特所属的党应当替他的行为负一定的责任。”^①

所以，一方面，控告《总汇报》并不冒太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朝这个方向转入进攻还会为福格特将军提供极其有利的作战基地。是奥地利通过《总汇报》来诬蔑帝国的福格特，是奥地利同共产党人结成联盟！这样，帝国的福格特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敌人之间的古怪联盟的有趣受害者。小德意志派¹⁹²报刊本来就因为帝国的福格特是帝国缩小者¹⁹³而对他抱有好感，这样一来就更该把他捧上天了！

1859年7月初，我刚从曼彻斯特回来，布林德因为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情来找我。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菲德利奥·霍林格爾和李卜克

^① 并见上引小册子的第4页，那里写道：“出自对党的考虑而对福格特加以‘宽容’；由于道德上的不坚定，虽然在小范围内承认福格特对祖国干了可耻的勾当，却又容许这个福格特公开指控一些人为诬蔑，这些人仅仅说了他们大家都知道、都想过、并且握有证据的话；这一切使我厌恶”等等。

内西。在这次会面的时候我对他说，我确信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他矢口否认。我逐点复述了他在5月9日对我说的话，事实上那就是传单的全部内容。这种说法他完全同意，尽管如此，他仍然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

大约一个月以后，即1859年8月，李卜克内西给我看了《总汇报》编辑部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坚决要求他对传单《警告》中列举的罪状提出证据。应他的请求，我决定陪他一起去圣约翰伍德的布林德家，因为布林德即使不是传单的作者，他总归是在5月初就已经知道了6月初的传单的内容，此外，他还可以“证明”他所知道的东西。布林德不在家，他到某个海滨浴场去了。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他我们拜访的目的。布林德未作答复。李卜克内西又写了一封信。最后收到了下面这样一份俨然是一位政治家写的文件：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先生：

我几乎同时接到您的两封来信(都写错了地址)。您可以理解，我决不想介入一家对我完全陌生的报纸的事务。这次尤其如此，因为正如我以前已经说过的，我与所说之事毫无关系。至于您提到的那些在私下谈话中流露出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显然完全被误解了；这里发生了某种误会，有机会时我愿对此作口头说明。使您同马克思徒劳往返，对此我表示遗憾。

十分尊敬您的 卡·布林德

9月8日于圣伦纳兹”

说布林德与揭发福格特“毫无关系”的这份冷冰冰的外交照会，使我想起了1859年5月27日伦敦《自由新闻》上的一篇匿名文章，译成德文如下：

“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

一个在信中附有名片的通讯员向我们写道：

‘阁下！我出席了最近在音乐厅举行的群众大会^①，听到了关于康斯坦丁大公的演说。我可以向您提供另外一件事实。远在去年夏天，日罗姆·拿破仑亲王在日内瓦向他的几个亲信陈述了进攻奥地利的计划和预计重新绘制欧洲地图。这位亲王曾经同一位瑞士议员详细谈过这个题目，我知道这位议员的名字。日罗姆亲王当时宣称，根据拟定的计划，康斯坦丁大公应当成为匈牙利国王。

我还知道，今年年初曾有人企图为俄国一拿破仑计划争取一些流亡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在德国国内的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用大量金钱来收买他们（large pecuniary advantages were held out to them as a bribe）。我很高兴地告诉您，这种提议被愤然拒绝。’”（见附录9）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福格特的名，但对伦敦德国流亡者来说则一望而知，它实际上表达了后来发表的传单《警告》的主要内容。《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由于爱国心切而匿名指责福格特，自然应当迫不及待地抓住奥格斯堡案件提供到手的大好时机，在法庭上向整个欧洲揭露这种背叛行为。但是，《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一文的作者又是谁呢？是卡尔·布林德公民。早在5月间，我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现在，当我向《自由新闻》的编辑科勒特先生说明此项悬而未决的争论的意义并把布林德的外交照会的内容告诉他时，他又正式加以证实。

1859年9月17日，排字工人奥·费格勒先生给我一个书面声明（刊登在“主要著作”中，文件，第30、31号），其中他决未断定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但却证明是他本人（奥·费格勒）和他的老板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为传单排版的，原稿是布林德的手笔，并且霍林格尔偶尔提到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

根据费格勒的声明和《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这篇文章，李卜克内

^① 指上面提到过的5月9日由戴·乌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

西又给布林德写了一封信,要这位政治家为他在《自由新闻》上所宣扬的事实提出“证据”;同时向他说明,现在已经掌握了他参与出版传单《警告》的物证。布林德没有答复李卜克内西,却派科勒特先生来找我。科勒特先生来的目的,是代表布林德求我不要公开他是《自由新闻》登载的上述文章的作者。我回答说,我不能承担任何义务。我的缄默要同布林德的勇气步调一致。

这时奥格斯堡案件开庭的日子临近了。布林德保持缄默。福格特在他的各种公开声明中,企图把我当作是传单的秘密作者并要我证明传单中所举的事实。为了反击这种伎俩,为了替李卜克内西辩白,为了维护我认为由于揭露福格特而做了一件好事的《总汇报》,我经李卜克内西转告《总汇报》编辑部,只要编辑部向我提出书面要求,我准备向它提供有关传单《警告》的来源的材料。这样就如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194页上所说的,开始了“目前恰恰是马克思同科尔布先生的频繁通信”^①。所谓我“同科尔布先生的频繁通信”,就是奥尔格斯先生给我的注明同一日期的两封信,要我把答应给的材料寄给他,后来寄这份材料时我附了简短的几句话^②。

奥尔格斯先生的两封信,其实是同一封信的两种版本,于1859年10月18日寄到伦敦,而奥格斯堡案件预定在10月24日开庭审理。因此,我立刻写信给费格勒先生,约他于次日在马尔伯勒街治安

① 科尔布先生的确在《总汇报》第319号上提到关于“他没有刊登的马克思先生的一封非常详细的信”。但是,这封“详细的信”刊登在1859年11月19日的汉堡《改革报》第139号附刊上。这封“详细的信”是我向公众发表的一个声明,我把这个声明也寄给了柏林的《人民报》。¹⁹⁴

② 我的附函¹⁹⁵和费格勒的声明均包括在“主要著作”中,文件,第30、31页,奥尔格斯先生给我的信见附录10。

法庭内会晤，要他对传单《警告》的声明提出合乎法律形式的 Affidavit^①。我的信他没有及时接到。因此，在10月19日^②我不得不违背初衷，给《总汇报》寄去了前面提到的9月17日的书面声明以代替 Affidavit^③。

大家知道，奥格斯堡的诉讼案变成了一出真正的错中错喜剧。当作犯罪构成的，是威·李卜克内西寄给《总汇报》并由该报转载的传单《警告》。但是，传单的出版者和作者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李卜克内西无法把他在伦敦的证人派往奥格斯堡的法庭，《总汇报》的编辑们在法律上不知所措，大发了一通乏味的政治妙论，赫尔曼博士让法庭饱享了一顿“圆满的人物”关于硫磺帮、洛桑节等等的奇谈，最后是法庭驳回福格特的诉讼，因为原告找错了法院。当奥格斯堡案件结束，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随《总汇报》到达伦敦的时候，混乱达到了顶点。在这以前，布林德一直像一位英明的政治家那样保持缄默，这时却被我从排字工人费格勒那里得来的证据惊动了，突然出现在公开场合。费格勒没有说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而只说过：菲德利奥·霍林格尔曾对他说布林德是作者。然而费格勒坚决声明，传单的原稿是他所熟悉的布林德的笔迹并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的。即使

-
- ① Affidavit 是向法庭作的声明，以代替宣誓，如有虚假，负伪证的一切法律责任。
 - ② 由于我字迹潦草，在奥格斯堡法庭上，把我注明10月19日的信看成10月29日。福格特的律师赫尔曼博士、福格特本人、值得尊敬的柏林《国民报》以及整个这一伙讲求“批评的率直”的人毫不怀疑，10月29日在伦敦写的信竟能于10月24日在奥格斯堡出现。
 - ③ 从费格勒后来于1860年2月11日提出的 Affidavit 可以看出，这个 quid pro quo[代替品，转意是：误会、混淆]的产生纯属偶然，是由于他接到我的信太晚了。

传单不是布林德的笔迹,也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的,布林德仍可能是传单的作者。反之,即使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传单也可能是布林德的笔迹,并由霍林格尔承印。

《总汇报》第313号载有注明11月3日于伦敦的一项声明(见“主要著作”,文件,第37、38页),公民兼政治家布林德在该声明中宣称,他不是传单的作者,并且“公布”“下面的文件”以作证明:

(a)“排字工人费格勒在《总汇报》第300号上断言,传单《警告》系在我的印刷所印刷,并认为卡尔·布林德先生是传单的作者,这纯系恶意捏造,特此声明。

菲德利奥·霍林格尔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

(b)“本人11个月以来一直在利奇菲耳德街3号居住和工作,可以证明霍林格尔先生所言属实。

排字工人 约·弗·维厄

1859年11月2日于伦敦”

费格勒没有在任何地方断言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所以,菲德利奥·霍林格尔是先臆造出费格勒的断言,然后再说它是“恶意捏造”。另一方面,既然传单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这位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又从哪里知道卡尔·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呢?

排字工人维厄为什么根据“11个月以来”(从1859年11月2日追溯)一直在霍林格尔那里“居住和工作”,就能证明“菲德利奥·霍林格尔所言属实”呢?

我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对布林德这个声明的回答^①(《总汇报》

① 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

第 325 号, 并见“主要著作”, 文件, 第 39、40 页): “若是把案件从奥格斯堡移到伦敦, 布林德—福格特的全部秘密就都揭穿了。”

布林德怀着了一颗受了伤的美丽心灵, 带着满腔义愤, 在“1859 年 12 月 11 日的《总汇报》附刊”又转入进攻:

“我再一次(请记住)引用由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先生和排字工人维厄签名的文件, 并最后一次声明, 武断地认为(现在只不过是含沙射影地说)我是经常提到的传单的作者, 这是明显的谎言。对我的其他说法则包含最粗暴的歪曲。”^①

《总汇报》编辑部在对这一声明所加的按语中指出, “广大读者对于这种争论已经不感兴趣”, 因此编辑部请求“与此有关的各位先生不再继续争论”; 对于这一点, “圆满的人物”在“主要著作”的末尾是这样评述的:

“换句话说: 《总汇报》编辑部要求被揭露出来的彻头彻尾的撒谎者马克思、比斯康普^②、李卜克内西等先生不要再让自己和《总汇报》继续丢丑。”

① 引自卡·布林德《声明》, 载于 1859 年 12 月 11 日《总汇报》第 345 号附刊。——编者注

② 比斯康普于 10 月 20 日从伦敦寄给《总汇报》编辑部一封关于福格特事件的信, 在信的末尾他提出要做该报通讯员。¹⁹⁶ 这封信我是从《总汇报》那里才知道的。福格特创造了一种道德论, 根据这种理论, 我既然支持过已经停刊的报纸, 就得为该报编辑后来的私人信件负责。那么, 福格特应当为科拉切克的《时代呼声》负大得多的责任, 因为他是科拉切克的《月刊》的有酬撰稿人。比斯康普在出版《人民报》的这一期间, 作了极大的牺牲。为了担任该报编辑, 他放弃了多年的职位; 在极其窘迫的条件下, 无偿地进行编辑工作; 最后, 他为了能按自己的信念行动, 牺牲了在例如《科隆日报》这样的德国报纸上发表通讯的机会。其他一切事情, 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与我无关。

奥格斯堡战役就这样暂时宣告结束。

福格特又重弹起他的劳斯之歌的老调,断言“排字工人费格勒”向我和李卜克内西提供了“伪证”。(“主要著作”第195页)而他是这样说明传单的来源的:布林德

“可能起了疑心,并到处乱讲。硫磺帮由此就炮制出传单以及后来的文章,并把它们硬说成是被逼入困境的布林德写的”(同上,第218页)。

帝国的福格特尽管受到挑战,仍然没有在伦敦重开他的未决胜负的战役,这一方面是由于伦敦是“偏僻地方”(“主要著作”第229页),同时也是由于有关各方“互相指责对方捏造”(同上)。

这位讲求“批评的率直”的人,只有当各方不为真理而争论的时候,才认为法庭的干预是适当的。

我跳过3个月,从1860年2月初继续讲下去。那时福格特的“主要著作”还没有到达伦敦,但柏林《国民报》的文摘^①业已到达,文摘中有这样一段:

“由于布林德在同马克思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想法,所以后来马克思派能轻而易举地硬说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作品一样。”

正像福斯泰夫认为保密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②一样,布林德把全部外交艺术归结为沉默,他又一声不响了。为了要他开口,我发表了一封英文通告信,签署我的名字,注明日期是:1860年2月4日于伦

① 弗·察贝尔《怎样伪造激进传单》,载于1860年1月25日《国民报》第41号。——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第5幕第4场。——编者注

敦(见附录 11)。

这封通告信寄给了《自由新闻》的编辑,其中写道: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必须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声明:布林德、维厄、霍林格尔证明匿名传单并非在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 3 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可耻的谎言。”^①

我在提出证据以后,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

“据此,我再一次指出上述卡尔·布林德是可耻的撒谎者(*deliberate liar*)。如果我说的有失实之处,那他可以轻易地向英国法院上诉来反驳我。”

1860 年 2 月 6 日,伦敦的一家报纸(《每日电讯》)以“*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为题重刊了——回头我还要来谈这一点——《国民报》的文摘。于是,我就控告《国民报》诽谤,告知《电讯》,我将对该报进行类似的控告,并开始收集必要的诉讼材料。

1860 年 2 月 11 日,排字工人费格勒向弯街治安法庭提供了一份 Affidavit。这份文件重复了他 1859 年 9 月 17 日声明的主要内容,即传单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并且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部分由他本人(费格勒),部分由菲·霍林格尔排版的(见附录 12)。

排字工人维厄的 Affidavit 是更为重要的,布林德再一次地、而且是自信心越来越大地在《总汇报》上引证他的证词。

因此,除了附上原文(见附录 13)以外,在这里还把它逐字逐句

^① 我用英文写的是:“*Deliberate lie*”。《科隆日报》译成“可耻的谎言”。我接受了这种译法,虽然译成“蓄意的谎言”更切合原文。

地翻译如下：

“去年11月初(确切的日期我不记得了)的一天晚上九十点钟,菲·霍林格尔先生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当时我住在他家并给他当排字工人。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内容是说:我在过去的11个月中一直受他雇用,在这期间,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并没有排印一份标题为《警告》的德文传单。我当时感到迷惑,又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把这份文件重抄了一下并在上面签了名。霍林格尔先生答应给我钱,但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的妻子后来告诉我,在进行这宗交易的时候,卡尔·布林德先生就等在霍林格尔先生的房间里。几天以后,霍林格尔太太在我吃饭时把我叫去,领我走进她丈夫的房间,我发现只有布林德先生一个人在那里。他把以前霍林格尔先生曾经给过我的那份文件递给我,恳求我(entreated me)再抄一份并且签上名,因为他需要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交给报刊发表。他还说,他将非常感谢我。我又抄了一份并在上面签了名。

我在此声明:上述经过确系实情,并补充下面几点:

(1)文件提到的11个月中,我有6个星期没有在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而是在埃尔曼尼那里工作;

(2)在传单《警告》发表的时候,我正好不在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里工作;

(3)当时我听到正在霍林格尔先生处工作的费格勒先生说,他(费格勒)曾经同霍林格尔先生本人一起为上述传单排版,并且说,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

(4)当我回到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时候,传单的活字版还保留着。由于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先生承印的德文报纸《人民报》需要转载传单《警告》,我本人又把它重新排了一次。该传单刊登在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第7期上;

(5)我曾看见霍林格尔先生把有卡尔·布林德先生亲笔改正了四五处排印错误的传单《警告》的一张校样交给住在索霍区教堂街14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霍林格尔先生曾犹豫要不要把校样交给李卜克内西先生,而李卜克内西先生刚一离开,霍林格尔就向我和我的同事费格勒表示后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约翰·弗里德里希·维厄

今天,1860年2月8日,弗里德里希·维厄在弯街治安法庭上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并签名。

上述法庭(弯街治安法庭)法官 托·亨利”

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厄的两个 *Affidavits* 证明,传单的原稿是布林德的笔迹,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版并且由布林德本人校对清样。

这位政治活动家在 1859 年 7 月 4 日由伦敦写给尤利乌斯·福禄培尔的信中说:

“这里出现了说福格特被购买的尖锐指责,我不知道这是谁搞出来的。其中列举一些我们过去从未听到过的所谓事实。”

这同一位政治活动家在 1859 年 9 月 8 日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他

“与所说之事毫无关系”。

公民兼政治家布林德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除此以外,他还靠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答应的金钱和自己答应的将来的感谢,诱骗排字工人维厄签名,制造了一份假声明。

他不仅把骗取签名的他自己的作品连同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伪证寄给《总汇报》,而且在第二次声明中“再一次地”“引用”这些“文件”,他还根据这些“文件”义愤填膺地指责我的话是“一派谎言”。

我把费格勒和维厄的这两份 *Affidavits* 的副本交给各界人士传阅,接着,布林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和布林德的密友医学博士卡尔·沙伊伯勒先生(一个规规矩矩、文质彬彬的人,他在布林德的政治活动中或多或少扮演了一个温顺的配角)就在布林德家里会晤。

1860 年 2 月 15 日的《每日电讯》发表了一则简讯,后来德国报纸又加以转载,译文如下:

“有关福格特的小册子

致《每日电讯》编辑！

阁下！鉴于近来谣诼纷纭，我感到有责任向布林德先生和马克思先生正式声明，他们两人谁都不是不久前出现的反对日内瓦福格特教授的传单的作者。这个传单出自我手，我应当对此负责。出于我对马克思先生和布林德先生的尊敬，我深感遗憾，因为不以本人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使我未能及早发表这一声明。

医学博士 卡尔·沙伊伯勒

1860年2月14日于伦敦”

沙伊伯勒先生把这项声明寄给了我。为了答谢他，我立即给他寄去了排字工人费格勒和维厄的 Affidavits，同时给他写道，他的（沙伊伯勒的）声明既改变不了布林德寄给《总汇报》的伪证，也改变不了布林德伙同霍林格尔为伪造文件骗取维厄签名的阴谋。

布林德感到他这一次不是站在《总汇报》的牢靠立足点上，而是站在令人害怕的英国法庭上。如果他想使这两份 Affidavits 和以它们为根据的我的通告信中的“粗暴侮辱”失去作用，那么他和霍林格尔就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 Affidavits，但是，欺诈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艾塞勒-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因为柏塞勒-沙伊伯勒公开声明自己是作者。布林德只是抄写了传单的原稿，只是把原稿交给了霍林格尔去印刷，只是亲笔校改了清样，只是同霍林格尔制造了伪证并寄给《总汇报》，以便对上面的事实加以反驳。尽管如此，他还是无辜地被人误会了，因为他不是传单的作者或主谋。他只是柏塞勒-沙伊伯勒的抄写员。正因为如此，1859年7月4日他不知道传单是“谁”搞出来的，而在1859年9月8日他“与所说之事毫无关系”。所以，为了使她安心，就这样说：柏塞勒-沙伊伯勒是传单的文字意义上的作者，而艾塞勒-布林德根据英国法律是技术意义上的作者并

且根据一切文明法律是**责任出版者**。随他的便！^①

最后还想对柏塞勒-沙伊伯勒先生说一句告别话。

福格特发表在《比尔商业信使报》上攻击我的诽谤书(日期是：1859年5月23日于伯尔尼)的标题是：《警告》。沙伊伯勒于1859年6月初写就，再由他的秘书布林德誊抄并出版的传单的标题也是《警告》，其中列举一些完全肯定的事实，揭露了福格特是“收买”他人的和“被人收买的”路易·波拿巴的代理人，此外，文章的署名是X。虽然X在代数学上代表未知数，却也正好是我的姓的最后一个字母。沙伊伯勒的传单《警告》采用这样的标题和签名，或许是为了使人得到一种印象，以为这是我对福格特的《警告》的回答吧？沙伊伯勒保证，如果福格特敢于否认揭露之一，他将发表揭露之二。福格特不仅否认了，而且控告沙伊伯勒的《警告》是在诽谤。而沙伊伯勒先生的揭露之二直到此时此刻也没有出现。沙伊伯勒在传单刊头印有“请代为传布”的字样。可是当李卜克内西满足了这种“请求”，通过《总汇报》“传布”这个传单时，“不以本人意志为转移的情况”却在1859年6月到1860年2月这一期间束缚了沙伊伯勒先生的舌头，只有弯街治安法庭的 Affidavits 才使他开了口。

不管怎样，原本是揭发福格特的沙伊伯勒现在公开声明，对传单中所提的事实负责。因此，奥格斯堡战役并没有以捍卫者福格特的胜利而告终，而是以进攻者沙伊伯勒终于在斗争舞台上的出现而结束。

① 《旧约全书·摩西一经(创世记)》。——编者注

八

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

“Sine studio.”^①

意大利战争爆发前大约一个月，福格特的所谓《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版)问世了。对谁有利？

福格特知道：

“英国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仍将保持中立。”(《研究》第4页)

他知道：俄国

“定将与法国取得一致，采取各种手段来损害奥地利，但不超出公开敌对的界限”。(《研究》第13页)

他知道：普鲁士——还是让他本人说说他所知道的普鲁士吧。

“连目光最短浅的人现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鲁士政府同法国皇帝政府之间存在着谅解；普鲁士不会为了捍卫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份而剑拔弩张；它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土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但同时，它将阻止联邦或联邦的个别

① “Sine studio”的意思是“不偏不倚”；马克思标上这一副标题，用以讽示福格特的《研究》(Studien)的偏颇态度。——编者注

成员以任何方式倾向奥地利，以便此后，即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酬劳。”(同上，第19页)

总之，结论是：在波拿巴即将对奥地利发动的十字军征讨中，英国将保持中立，俄国将对奥地利采取敌对行动，普鲁士将压制好战的联邦⁸⁵成员，同时，欧洲将尽力把战争局部化。就像过去对俄国作战一样，路易·波拿巴现在将赋有最高权力，可谓充当欧洲同盟的秘密将军对意大利作战。那么，福格特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呢？既然福格特知道英国、俄国和普鲁士将采取反对奥地利的行动，那么是什么东西迫使他去为波拿巴著书立说呢？但看来除了以“变成老小孩的阿恩特爹爹和无赖汉杨的幽灵为首”(同上，第121页)的要一口吞掉法国人的老一套之外，仿佛还有某种民族运动震撼了“德国人民”；这一运动在各个“议院里和报纸上”都有反应，“而各邦政府却只是犹犹豫豫地、不无抵触地附和了这一占主流的思潮”(同上，第114页)。看来“对即将发生危险的深信不疑”，引起德国“人民”“发出了采取共同措施的呼声”(同上)。法国的《通报》(可参看1859年3月15日的一号)是以“又焦虑又惊奇的心情”看待这一德国运动的。

它喊道：“在德意志联邦的某些邦议院里和报刊上，正在鼓吹对法国发动一次类似的十字军征讨。它们谴责法国抱有野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它已否认过有此类计划；它们谴责法国在策划侵略——实际上它并不需要侵略”等等。

《通报》针对这些“诽谤”指出：“相反地，皇帝”在意大利问题上的表现，应当“赋予德国人最大的安全感”；德意志的统一和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十二月政变¹⁹⁷的法国所求之不得的，等等。然而，《通报》承认(见该报1859年4月10日的一号)，德国人的某些忧虑，看来可能是由巴黎的某些小册子“挑拨起来的”；这些小册子说，路易·

波拿巴正处心积虑地给自己的人民一个“瞞望已久的机会”，让他们“pour s'étendre majestueusement des Alpes au Rhin”（威风凛凛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莱茵河）。

《通报》写道：“但是，德国忘记了，法国是受立法保护的，不允许政府预行监督。”

《通报》的这类声明，就像向马姆兹伯里伯爵所作的报告一样（见1859年1—5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①），引起的效果恰恰适得其反。但是，《通报》未能达到的目的，卡尔·福格特也许达到了。他的《研究》只不过是《通报》上的文章、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和十二月帮的未来地图的德文版汇编。

福格特关于英国的一套酒馆里的政治闲话只有一种意义，就是使他的《研究》的手法昭然若揭。他按照他的法文原著，把英国海军上将查理·纳皮尔爵士变为纳皮尔“勋爵”（《研究》第4页）。尾随十二月帮¹⁰⁰的一伙耍笔杆子的朱阿夫兵，从圣马丁门剧场的演出¹⁹⁸中得知：每一位气度不凡的英国人至少是个勋爵。

福格特写道：“英国从来就未能同奥地利和睦相处得长久一些。即使暂时的利益一致使它们结合一段时间，政治上的必要性也总是紧接着又使它们分离。相反地，英国同普鲁士倒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等等（同上，第2页）。

果真如此！英国和奥地利反对路易十四的共同斗争，除了少有的几次间断外，从1689年起一直持续到1713年，也就是说，几乎持

①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函件。1859年1—5月。根据女王陛下的命令提交议会两院》1859年伦敦版。——编者注

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¹⁹⁹中,英国同奥地利一起,对普鲁士和法国斗争了近6年。只是在七年战争²⁰⁰中,英国才同普鲁士结盟去反对奥地利和法国,但在1762年,布特勋爵就已背叛弗里德里希大帝,时而向俄国大臣哥利岑提议“瓜分普鲁士”,时而又向奥地利大臣考尼茨提议“瓜分普鲁士”。1790年,英国同普鲁士缔约²⁰¹去反对俄国和奥地利,但这项条约同年即化为乌有。在反雅各宾战争³⁸时期,普鲁士尽管接受皮特的资助,仍然签订了巴塞尔条约²⁰²而退出欧洲同盟。相反地,奥地利由于受到英国的唆使,却把这一斗争从1793年继续到1809年,其间只有几次短期中断。拿破仑刚被废黜,英国还在维也纳会议¹⁹期间就马上同奥地利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秘密条约²⁰³(1815年1月3日)。1821年,梅特涅同卡斯尔雷在汉诺威缔结了一项反对俄国的新协定²⁰⁴。因此,当不列颠人自己——历史编纂学家和议会演说家——多半把奥地利当作英国的“ancient ally”(老盟友)来谈论时,福格特却在他的原著——丹屠出版的法文小册子里发现,奥地利和英国,如果撇开它们的“暂时一致”不谈,总是分道扬镳,相反地,英国和普鲁士却一贯亲密无间,大概正因为如此,林德赫斯特勋爵在对俄作战期间当谈到普鲁士时对上院高喊:“提防它,啊,罗马人!”^①新教的英国厌恶天主教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的英国厌恶保守的奥地利,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厌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奥地利,有支付能力的英国厌恶破了产的奥地利。但是,感情的因素在英国历史中却总是陌生的。帕麦斯顿勋爵在他统治英国的30年当中,的确一有机会就表现出对

① 这里套用了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4首中的一行诗。——编者注

奥地利的厌恶,借以粉饰自己对俄国的奴颜婢膝。例如,由于“厌恶”奥地利,他竟然拒绝了奥地利在 1848 年提出并得到皮埃蒙特和法国赞同的由英国出面调解意大利事件;条件是:奥地利退至埃奇河一线和维罗纳,如果伦巴第愿意的话,可以并入皮埃蒙特,帕尔马和摩德纳划归伦巴第,而威尼斯则在一位奥地利大公的管辖下组成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并自行制定宪法(见《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第 2 部分,1849 年 7 月,第 377、478 号)。无论如何,这些条件要比维拉弗兰卡条约²⁰⁵的条件有利。在拉德茨基把意大利人全线击溃之后,帕麦斯顿提出了他本人早先拒绝过的那些条件。但是,在匈牙利独立战争²⁰⁵时期,当俄国的利益要求相反的做法时,帕麦斯顿就不顾自己对奥地利的“厌恶”,拒绝了匈牙利人根据 1711 年条约²⁰⁶向他提出的求援;他甚至拒绝对俄国的干涉提出任何抗议,因为

“欧洲的政治独立和自由,是同作为欧洲大国的奥地利的存在和完整息息相关的”(在 1849 年 7 月 21 日举行的下院会议上)。

福格特往下说:

“联合王国的利益……处处都同它(奥地利的利益)敌对。”(同上,第 2 页)

这个“处处”立即变成了地中海。

“英国不惜一切代价想在地中海及其沿岸各国确立自己的影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马耳他和伊奥尼亚群岛,叙利亚和埃及,都是英国针对东印度的政策的据点;奥地利在这些据点上处处给英国设下强有力的障碍。”(同上)

巴黎丹屠出版的十二月帮的原著小册子中的东西,有什么是这位福格特不相信的呢!英国人迄今一直是这样设想的:他们时而同俄国人、时而又同法国人争夺马耳他和伊奥尼亚群岛,但决不同奥地

利人争夺这些岛屿。是法国，而不是奥地利，以前曾派遣远征军前往埃及，目前又在苏伊士地峡加强自己的地位；是法国，而不是奥地利，侵占了非洲北部海岸，并同西班牙结盟，企图从英国人手里夺取直布罗陀；英国订立有关埃及和叙利亚的 1840 年七月条约²⁰⁷，这是反对法国的，却是同奥地利一起签订的；英国在执行“针对东印度的政策”时，处处遇到来自俄国方面的，而不是来自奥地利方面的“强有力的障碍”；在英国同那不勒斯之间发生的惟一一次严重争端中，即在 1840 年的硫磺争端中，是法国公司，而不是奥地利公司对西西里岛硫磺贸易的垄断成了引起摩擦的导火线²⁰⁸；最后，在拉芒什海峡彼岸，的确一有机会就说要把地中海变为“法国的内海”，但是从来不说要把地中海变为“奥地利的内海”。不过，在这里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情况。

这就是：1858 年，在伦敦出现了一张欧洲地图，名为“*L'Europe en 1860*”（《1860 年的欧洲》）。这张地图是由法国使馆出版的，它包含某些对 1858 年而言带有预言性的暗示，例如，伦巴第和威尼斯被并入皮埃蒙特，而摩洛哥则被并入西班牙；这一地图改画了全欧洲的政治地理，只有法国例外，法国好像仍然保留自己的原有版图。该地图用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嘲弄把预定给法国的领土分送给一些不可思议的主人。比如说，埃及被划归奥地利，并在地图上加印的边注中指明：“François Joseph I., l'Empereur d'Autriche et d'Egypte.”（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奥地利和埃及的皇帝。）

福格特面前摆着《1860 年的欧洲》地图，这是十二月帮的指南针。他的所谓英国和奥地利之间因埃及和叙利亚而发生冲突，就是由此而来。福格特预言：这一冲突“将以消灭敌对国之一而告终”，如果，——多亏他还及时想起了一个“如果”——“如果奥地利拥有一支

海军的话”(同上,第2页)。《研究》的独到历史知识,却是在下列一处登峰造极了:

“拿破仑第一曾经企图搞垮英格兰的银行,后者对货币采取点数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以往常用的过秤的办法,在一日之内就摆脱了困境²⁰⁹;奥地利的国库一年365天都处在类似的、甚至坏得多的境况中。”(同上,第43页)

大家知道,英格兰银行(“英格兰的银行”也是福格特式的幻影)从1797年2月到1821年曾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在这24年中间,英国的银行券根本不能兑换金属货币,不论按重量或者按点数都一样。当停止兑换黄金的时候,在法国还没有什么拿破仑第一(虽然当时有个波拿巴将军正在进行他的第一次意大利战役);而当针线街^①恢复银行券兑换的时候,拿破仑第一在欧洲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一类“研究”,甚至使拉盖罗尼埃所描绘的奥地利“皇帝”对蒂罗尔的征服^②也为之逊色。

克吕登纳夫人,这位神圣同盟的母亲,分得清善即“北方的白天使”(亚历山大一世)与恶即“南方的黑天使”(拿破仑第一)。福格特,这位新神圣同盟的养父,把两个人——沙皇和凯撒(亚历山大二世和拿破仑第三)都变为“白天使”。这两个人都命中注定是欧洲的解放者。

至于皮埃蒙特,福格特说:“它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同上,第71页)。

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对一个国家,还能再多说些什么呢?

① 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编者注

② 拉盖罗尼埃《拿破仑第三皇帝和意大利》1859年巴黎版。——编者注

在皮埃蒙特已经把维拉弗兰卡军港割让给俄国²¹⁰，而同一位福格特就普鲁士购买亚德湾一事²¹¹提出了下列警告以后，更是如此：

“一个地处异国境内的军港，同它所属的国家毫无有机的后方联系，这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因为这种军港的存在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做是未来努力的瞄准点，看做是为指引前进方向而升起的一面小旗。”（《研究》第15页）

大家知道，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力图在地中海上为俄国取得一些军港。

对于北方的“白天使”温情脉脉，使福格特过分粗暴地破坏了“天生的谦逊”，因为这种谦逊在丹屠出版的原著中还保持着。他在丹屠出版的《问题的实质，法国—意大利—奥地利》（1859年巴黎版）这本小册子的第20页上读到：

“当奥地利政府已经占据了克拉科夫，从而破坏了保证克拉科夫独立的1815年条约时，它还有什么权利侈谈这些条约的不可侵犯性呢？”^①

福格特把他的法文原著译成这样的德文：

“从迄今一直厚颜无耻地破坏条约的唯一的政府之口听到这类话，简直令人莫名其妙；它在和平时期，平白无故地向受到条约保证的克拉科夫共和国伸出罪恶的黑手，并且不由分说地就把它并入帝国的版图。”（同上，第58页）

当然，尼古拉废除了受到1815年条约¹⁹保证的波兰王国的宪法和独立，是由于对1815年条约的“尊重”。俄国在1831年派莫斯科

① 《De quel droit, d'ailleurs, le gouvernement autrichien viendrait-il invoquer l'inviolabilité de ceux (traités) de 1815, lui qui les a violés en confisquant Cracovie, dont ces traités garantissaient l'indépendance?》

的军队占领了克拉科夫，同样也是对这个自由市的完整性的尊重。1836年，克拉科夫又被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占领；他们对待它和对待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毫无二致，而它根据1815年条约在1840年还向英国和法国发出呼吁，但是毫无结果。最后，1846年2月22日，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又一次占领克拉科夫，以便把它并入奥地利。²¹²条约是遭到3个北方国家破坏的，而1846年奥地利的侵占，只不过是1831年俄国入侵的尾声。福格特出于对“北方的白天使”的柔情，竟忘记了波兰的被侵占，并且歪曲了克拉科夫被侵占的历史。^①

俄国“一贯敌视奥地利而同情法国”一事，使福格特对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倾向丝毫不加怀疑，就像“他的〈路易·波拿巴的〉政策现时同俄国的政策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30页）一事，使他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族解放倾向丝毫不加怀疑一样。

因此，应当把神圣的俄罗斯看成是东方的“争取自由”和“人民和民族的发展”的“朋友”，就像十二月政变的法国在西方那样。这一口号曾经散发给十二月二日的各个代理人。

“俄国”，——福格特在丹屠出版的《条约的信守，缔约的列强和皇帝拿破仑第三》（1859年巴黎版）这一小册子中读到，——“俄国属于斯拉夫大家庭，属于优等种族……有人对法俄两国之间突然产生的骑士协商感到惊奇。其实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原则相同，目标一致，政府和人民遵守神圣同盟法律，不是为了欺骗和强制，而是为了指导和帮助各民族神圣的运动。这种最充分的诚意（在路易-菲利浦同英国之间只有过诚意协商，但在路易·波拿巴同俄国之间

① 帕麦斯顿曾以引人发笑的抗议愚弄了欧洲，从1831年起，他非常卖力地参与了针对克拉科夫的阴谋活动。（见我的抨击性文章《帕麦斯顿和波兰》²¹³1853年伦敦版）

却存在着最充分的诚意)已经产生了极良好的结果:铁路、农奴解放、地中海上商船停泊场等等。”^①

福格特立刻抓住了“农奴解放”，并且暗示说：

“目前的这一推动……似可把俄国变成争取自由的朋友，而不是争取自由的敌人。”(同上，第10页)

他和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一样，也认为是路易·波拿巴推动了所谓俄国的农奴解放，为此目的，他把成为这种推动力的英、土、法对俄战争变为“法国战争”(同上，第9页)。

谁都知道，响亮而持久地要求解放农奴的呼声，开始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沙皇尼古拉毕生忙于农奴解放问题；为此，他在1838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有土地部，在1843年下诏这个部采取准备性步骤，而在1847年甚至颁布了一些对农民有利的关于出卖贵族领地的法律²¹⁵，到了1848年，只是由于害怕革命，他才又收回成命。因此，如果说农奴解放问题，在“好心的沙皇”——福格特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亚历山大二世的^②，——时期已有了长足进展，那显然是由于即使沙皇也奈何不得的经济关系的发展造成的。此外，按照俄国政府的

① 《La Russie est de la famille des Slaves, race d'élite ... On s'est étonné de l'accord chevaleresque survenu soudainement entre la France et la Russie. Rien de plus naturel: accord des principes, unanimité du but ... soumission à la loi de l'alliance sainte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 non pour leurrer et contraindre, mais pour guider et aider la marche divine des nations. De la cordialité la plus parfaite sont sortis les plus heureux effets: chemins de fer, affranchissement des serfs, stations commerciales dans la Méditerranée etc.》p. 33. 《La Foi des Traités etc. Paris 1859.》²¹⁴

② 卡·福格特《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第2版。——编者注

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略力量增强百倍。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完善专制制度;这类障碍就是大专制君主迄今所遇到的俄国贵族中以农奴制为依靠的众多小专制君主和自治的农民公社,这种公社的物质基础,即公社所有制,是要被所谓解放消灭的。

不巧,俄国农奴对解放的理解同政府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俄国贵族对解放又有另一种理解。因此,“好心的沙皇”发现,农奴的真正解放同他的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正如好心的教皇庇护九世曾经发现,意大利的解放同教廷的存在条件是不相容的一样。因此,“好心的沙皇”把发动侵略战争和执行俄国的传统对外政策(俄国历史编纂学家卡拉姆津说,这一政策是“不变的”^①)看成是推迟国内革命的惟一手段。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在《俄国真相》(1860年版)一书中,对所谓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下已出现一个千年王国的荒诞无稽的童话,给予致命的批判和驳斥;这类童话从1856年起由俄国的雇佣文人声嘶力竭地传遍全欧,1859年又由十二月骑士们大吹大擂地加以宣扬,而福格特也在他的《研究》中照搬过来。

按照福格特的说法,还在意大利战争爆发以前,“白沙皇”同“十二月英雄”⁶之间专门为了各民族的解放而订立的同盟,就已在多瑙河两公国经受了考验,在那里,罗马尼亚民族的统一和独立,由库扎上校被选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君主而得到了确认。²¹⁶

“奥地利拼命抗议,法国和俄国鼓掌欢迎。”(同上,第65页)

在俄国内阁于1837年给现在的沙皇草拟的备忘录(1855年的

① 见卡拉姆津《俄国史》1839年巴黎版第11卷。——编者注

《普鲁士周报》曾经转载过)中,我们看到:

“俄国不喜欢立即就把有异己分子的国家合并过来…… 无论如何,对已决定要取得的国家,让一些特殊的、但完全听命的执政者去治理一个时期,就像我们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所做的那样,是更为合适的,等等。”^①

俄国在把克里木合并之前,曾宣布克里木**独立**。

在1814年12月11日的俄国宣言中,我们看到:

“波兰人,你们的保卫者亚历山大皇帝向你们呼吁。为了保卫你们的祖国和维护你们的**政治独立**,你们自己武装起来吧。”

多瑙河两公国啊!从彼得大帝进入多瑙河两公国以来,俄国就为它们的“**独立**”操心尽力了。在涅米罗夫会议(1737年)²¹⁷上,女皇安娜要求苏丹让多瑙河两公国在俄国的保护下获得独立。在福克沙尼会议(1772年)²¹⁸上,叶卡捷琳娜二世坚持两公国在**欧洲的保护**下获得独立。

亚历山大一世继续这种努力,在他把比萨拉比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²¹⁹)以后,目的就达到了。尼古拉甚至通过基谢廖夫,用至今还有效的**组织规程**²²⁰为罗马尼亚人造福,它在全欧洲对这部自由法典的一片欢呼声中建立了极其丑恶的农奴制度。亚历山大二世使多瑙河两公国在库扎统治下实现的准统一,只不过是把他的前辈执行了一个半世纪的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福格特**发现:由于在一个俄国仆从统治下实行的这种联合,“两公国将成为阻挡俄国南进的一道屏障”(同上,第64页)。

① 《俄国政策的标志》,载于1855年6月9日《普鲁士周报》第23期。——编者注

因为俄国欢迎库扎当选(同上,第65页),所以非常明显:好心的沙皇不遗余力地堵塞了自己“南进的道路”,虽然“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俄国政策一贯追求的目标”(同上,第9页)。

叫嚷俄国是自由主义和民族意愿的保护者,这种转化并无新意。法国和德国的许许多多启蒙学者就曾把叶卡捷琳娜二世誉为进步的旗手。“高尚的”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把他鄙称为衰落帝国的希腊人^①)曾扮演过全欧自由主义的英雄。难道他不曾用俄国的文明财富为芬兰造福?难道除了宪法而外,他不曾还把一个俄国首相黎塞留公爵慷慨大度地赐给法国?难道他不是“赫特里”²²¹的秘密领袖,虽然他同时在维罗纳会议²²²上通过卖身投靠的夏多勃里昂怂恿路易十八讨伐西班牙的反叛²²³?难道他不曾通过斐迪南七世的听取忏悔的神父^②,唆使斐迪南七世征讨起义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而同时却答应北美合众国总统^③,支持他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进行的任何干涉?难道他不曾派遣伊普西朗蒂充当“神圣的希腊人义勇队的领袖”前往瓦拉几亚,并通过同一个伊普西朗蒂出卖了这支义勇队,同时谋杀了瓦拉几亚起义者的领袖弗拉基米列斯库?1830年以前,在各种语言中,无论诗歌和散文,也都把尼古拉吹捧为民族解放的英雄。当他在1828—1829年对马茂德二世开战要解放希腊人时,——也就是在马茂德拒绝俄军过境镇压希腊起义之后,——帕麦斯顿在英国议会宣称:俄国解放者的敌人,必然是世界上的那些庞然怪物——唐·米格尔、奥地利和苏丹——的“朋友”。难道尼古拉为

① 转义是:口是心非的奸诈汉。——编者注

② 维克多二世。——编者注

③ 詹·门罗。——编者注

了对希腊人表示慈父般的关怀,不曾给他们派一个俄国将军卡波·迪斯特里亚伯爵去担任总统?不过,希腊人并非法国人,他们杀死了高尚的卡波·迪斯特里亚。尽管尼古拉从1830年七月革命²⁶爆发时起,主要扮演的是正统派²²⁴的保护人,但他片刻也没有停止协助“民族的解放”。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1843年9月爆发的希腊宪法革命,是由俄国驻雅典公使卡塔卡济领导的,此人原先是纳瓦里诺惨败²²⁵时海军上将葛伊甸的总监军。1842年保加利亚骚乱的中心是俄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馆。俄国将军杜阿梅尔于1842年春在这里接见了保加利亚代表团,向它说明了总起义的计划。塞尔维亚应成为起义的后备力量,而俄国将军基谢廖夫则应成为瓦拉几亚的君主。在**塞尔维亚**起义时(1843年),俄国通过驻君士坦丁堡使馆怂恿土耳其对塞尔维亚人采用暴力,以便随后利用这个借口在反对土耳其人时争取欧洲的同情和狂热。沙皇尼古拉的解放计划也丝毫没有把**意大利**排除在外。一度是马志尼派的巴黎机关报《青年意大利》,在**1843年11月**的某一号上这样写道:

“罗马涅新近发生的骚动和希腊爆发的运动,多少是有些联系的……意大利的运动已遭到了失败,因为真正的民主派拒绝参加这一运动。共和派分子不愿支持由俄国发起的运动。为了在意大利发动总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运动应在那不勒斯开始,因为在那里,可望有一部分军队起来领导起义,或者直接投到爱国者方面来。那不勒斯的革命爆发以后,伦巴第、皮埃蒙特和罗马涅应群起响应;应当建立以欧仁·博阿尔奈的儿子、沙皇的女婿——洛伊希滕贝格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青年意大利》粉碎了这个计划。”^①

1843年11月20日的《泰晤士报》就《青年意大利》的这一报道

① 这段引文马克思转译自1843年11月20日《泰晤士报》第18458号上发表的《巴黎快讯》一文。——编者注

指出：

“如果这个伟大目标——建立以俄国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能够实现，那就更好了；但是，意大利的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得到另一种更直接的、即使不是那么巨大的好处：引起奥地利惶恐不安，转移它对俄国在多瑙河的一套可怕的(fearful)计划的注意力。”^①

尼古拉 1843 年与“青年意大利”²²⁶的接触毫无结果以后，便于 1844 年 3 月把布捷涅夫先生派往罗马。布捷涅夫代表沙皇把一项计划透露给教皇^②，计划规定，把俄属波兰割让给奥地利以换取伦巴第，后者应组成以洛伊希滕贝格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王国。当时罗马教廷的英文机关报《纪事报》，于 1844 年 4 月就这一建议写道：

“这项美妙的计划中抛给罗马宫廷的诱饵是：波兰落入天主教之手，而伦巴第仍然处于天主教皇朝治理之下。但是，罗马外交界的老手们懂得，奥地利仅能勉强保住自己的领地，同时，大概迟早又会失去自己的斯拉夫各省，所以，把波兰割让给奥地利——即使建议中的这一部分是当真的——，只不过是以后要偿还的一笔债款；一旦以洛伊希滕贝格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真的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很快也就必然接受俄国的统治。因此，这项被推崇备至的计划就暂时被束之高阁了。”

《纪事报》在 1844 年就是这样写的。

从 18 世纪中叶起奥地利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惟一因素，即它对俄国在东欧的推进的抵抗——这种抵抗是孤立无援的、不坚决的、胆怯的，但却是顽强的——，使福格特发现了“奥地利是东方一切

① 《巴黎快讯》，载于 1843 年 11 月 20 日《泰晤士报》第 18458 号。——编者注

② 格雷戈里十六世。——编者注

纷争的策源地”(同上,第56页)。他带着同他的肥胖外形十分相称的“某种童稚的天真”,把俄国同法国结盟反对奥地利的原由——“好心的沙皇”的解放倾向除外,——说成是因为奥地利对尼古拉在匈牙利革命时期所给予的帮助采取了以怨报德的态度。

“在克里木战争¹⁷时期,奥地利已经走到了武装的、敌对的中立的最后边缘。不言而喻,这一行动,况且是带有虚伪和狡诈印记的这一行动,必然激怒俄国政府凶狠地反对奥地利,从而把该政府推到法国一边。”(同上,第10、11页)

在福格特看来,俄国执行的是温情主义的政策。奥地利在1850年华沙会议期间损害德国利益并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进军²²⁷,它对沙皇所表示的这种感激,仍然不能使知恩图报的福格特感到满足。

俄国外交家波措-迪-博尔哥在他的1825年10月写于巴黎的著名紧急报告²²⁸中,在列举了奥地利反对俄国在东方的干涉计划的各种阴谋诡计之后,这样写道:

“因此,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对这个国家(奥地利)采取威慑态度,要求我们通过我们的准备使它确信:如果它敢动一动来反对我们,那么,一场它从未经受过的极可怕的风暴就会降临到它的头上。”

波措用外来战争和内部革命来吓唬奥地利,并提议由奥地利攫取向它“所许诺的”土耳其“省份”当作可能的和平解决,而把普鲁士简单地描绘成俄国的一个百依百顺的同盟者,在这以后,他接着写道:

“如果维也纳宫廷顺从我们的善良目标和意图,那么皇帝内阁的计划早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不仅涉及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和君士坦丁堡,而且还涉及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大家知道，尼古拉和查理十世于 1830 年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它规定了下列条件：法国允许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自己取得莱茵河各省和比利时作为补偿；普鲁士得到汉诺威和萨克森作为补偿；奥地利获得土耳其在多瑙河流域的一部分省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在俄国的推动下，同一个计划又由摩莱提交给彼得堡内阁。此后不久，布伦诺夫就带着这个文件去伦敦，把它当作法国背叛变节的一项证据交给英国政府，并利用它来组织 1840 年的反法同盟。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按照受巴黎原著启示的福格特的想法，俄国该怎样跟法国协同利用意大利战争。一个以“民族原则²²⁹为指路明星”的人，在俄国的“民族”构成，特别是“波兰民族”这样的问题上，看来会遇到些难题；可是：

“对于我们来说，民族原则是高贵的，但自由自决原则更高贵”（同上，第 121 页）。

当俄国根据 1815 年条约¹⁹兼并了绝大部分波兰本土的时候，它就获得了向西部挺进的阵地，它不仅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而且在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以致当时普鲁士的军官们（例如格奈泽瑙）就已经注意到，不能容忍与一个非常强大的邻邦有这样的边界关系。然而，只是在 1831 年把波兰人平定下去，使这个地区完全臣服俄国人时，这个楔子的真正意义才显示出来。必须使波兰俯首听命不过是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建筑强大工事的一种借口。建筑这类强大工事的真正目的，是在战略上完全控制魏克瑟尔河地区，建立向北、向南和向西的进攻基地。甚至连非常迷恋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以及一切俄国事物的那个哈克斯特豪森，也看出这是对

德国的显而易见的危险和威胁。俄国人在魏克瑟尔河上的设防阵地对德国的威胁，要比法国全部要塞的总和还要大，特别是波兰的全国性反抗一旦停止，而俄国一旦能够把波兰的军事力量当作自己的侵略力量来支配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福格特才这样宽慰德国说：**波兰是根据自由自决变成俄国的。**

“毫无疑问”，——他说，——“毫无疑问，由于俄国人民党的积极努力，波兰和俄国之间裂开的鸿沟已经大大缩小了，也许，只需要一种不大的推动，就可把它完全填平了。”（同上，第12页）

意大利战争应当提供这种不大的推动。（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在这场战争时期相信：波兰还没有达到福格特那样的高度。）在“自由自决”的基础上溶化于俄国的波兰，作为一个中心体，将会按照重力定律，把正在异族统治下受苦受难的前波兰帝国被肢解的部分吸引过来。为了使这个吸引过程进行得比较顺利，福格特劝告普鲁士抓住时机甩掉“斯拉夫人附属地”（同上，第17页），也就是甩掉波森（同上，第97页），或许也要甩掉西普鲁士，因为只有东普鲁士才被认为是“纯粹的德国土地”。从普鲁士分离出来的各个部分，当然马上就会同俄国所吞没的中心体合并，而“纯粹的德国土地”东普鲁士，将变成俄国的飞地。另一方面，至于说到在《1860年的欧洲》地图上也被划入俄国版图的加利西亚，那么要知道，使加利西亚脱离奥地利就是使德国摆脱奥地利的非日耳曼领地的战争的直接目的。福格特想起了：

“1848年以前，在加利西亚俄国沙皇的肖像要比奥地利皇帝的肖像更为常见”（同上，第12页），“俄国极其擅长玩弄这类阴谋，因此奥地利方面有充分理由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同上）。

但是，不言而喻，为了摆脱“内部敌人”，德国应当安然地允许俄国人把支持这类阴谋的“军队推进到边境”（第13页）。虽然普鲁士自己会放弃它的波兰各省，但是俄国应当利用意大利战争从奥地利手中夺走加利西亚，正如亚历山大一世在1809年只不过是戏剧性地支持一下拿破仑第一就已得到了加利西亚的一部分作为酬谢。大家知道，俄国成功地索回了原先归普鲁士和奥地利管辖的几块波兰领土，其中一部分是从拿破仑第一手中搞到的，一部分是在维也纳会议¹⁹上搞到的。按照福格特的意见，在1859年，整个波兰同俄国合并的时机已经成熟。福格特并不是要求从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手中解放波兰民族，而是要求先前的整个波兰帝国溶化并消失于俄国。波兰完了！“俄国”这种“恢复波兰”的观念，在沙皇尼古拉逝世以后立即传遍了全欧，1855年3月，戴维·乌尔卡尔特在其抨击性著作“*The new hope of Poland*”（《波兰的新希望》）中就曾加以揭露。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不够卖力气。

这位可爱的伙伴叙述说：“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者是异常迁就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这同奥地利人的行为适成鲜明对照，以致不能不产生自己的充分影响。俄国虽然镇压了党（注意：在福格特看来，俄国镇压的并不是匈牙利，而是党），但对待它还是既温和又礼貌的，这样俄国就为下面一种观点奠定了基础，这种观点可大致表述如下：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在目前场合下，俄国并不是较大的害。”（同上，第12、13页）

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是用“异常迁就、既温和又礼貌”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态度来伴送俄国人进入匈牙利的，并使自己变成了传播幻想的“渠道”；而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就失败在这种幻想上。戈尔盖的党当时散布要把一个俄国亲王当作匈牙利未来的国王

予以信赖,此举瓦解了匈牙利革命的反抗力量。^①

1848年以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在任何一个种族中都得不到特别的依靠,当然就把它对匈牙利的统治依托在统治的民族——马扎尔人身上。附带提一下,梅特涅倒是各民族最大的维护者。他迫使一个民族憎恨另一个民族,但是他需要这些民族,以便强迫它们这样做。因此,他维护它们。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波森和加利西亚。1848—1849年革命之后,在斯拉夫人帮助下击败了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哈布斯堡王朝,企图仿效约瑟夫二世,用暴力使德国成分在匈牙利居于统治地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害怕俄国,不敢投入他们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怀抱。他们这个联合国家的反动势力,在匈牙利与其说是针对他们的战败者——马扎尔人,不如说是针对他们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因此,奥地利反动势力在同它的拯救者的斗争中,就像瑟美列在其1860年于伦敦出版的小册子《1848—1860年的匈牙利》中所指出的,把斯拉夫人赶回到马扎尔人的旗帜下。可见,奥地利对匈牙利的统治,不论在1848年以前或者以后,都是同马扎尔人在匈牙利的统治并存的。至于俄国,不管它在匈牙利是直接还是间接统治,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按族系和宗教去统计同俄国相近的成分,那就会发现,俄国拥有占居民多数的非马扎尔人。马扎

① 在科莫恩投降以前曾在匈牙利革命军中、后来又在切尔克西亚和俄国人作过战的波兰上校拉品斯基说：“匈牙利人的不幸在于他们不了解俄国人。”（泰奥菲尔·拉品斯基《1849年匈牙利主力军的进军》1850年汉堡版第216页）。“维也纳内阁完全落到了俄国人手里……按照他们的建议，把首领们杀害了……俄国人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去博得同情，一方面迫使奥地利的所作所为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痛恨。”（同上，第188、189页）

尔种族在数量上少于按族系同俄国相近的斯拉夫人和按宗教同俄国相近的瓦拉几亚人。因此,俄国在匈牙利的统治就等于匈牙利民族的灭亡,也就是同马扎尔人的统治有历史渊源的匈牙利的灭亡。^①

福格特要波兰人通过“自由自决”溶化于俄国,要匈牙利人俯首听命于俄国的统治,从而在斯拉夫各民族中灭亡。^②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是不够卖力气。

-
- ① 在匈牙利革命战争中声名赫赫的莫里茨·佩尔采尔将军,在意大利战役时就已脱离了聚集在科苏特周围的在都灵的匈牙利军官们,他在一项公开声明中是这样解释他离去的动机的:一方面是由于科苏特不过成了波拿巴派的稻草人,另一方面是由于匈牙利未来将属于俄国这样一种前途。我曾写给他一封信,请他比较详尽地解释一下他的声明,他在回信(注有:1860年4月19日于圣赫利尔)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变成个工具,帮助匈牙利逃脱双头鹰的利爪,仅仅是为了随后又把它投入北方熊的致命的温柔怀抱。”
- ② 科苏特先生从来没有怀疑过上面发挥的看法的正确性。他知道,奥地利可能虐待匈牙利,但不可能消灭它。1851年2月15日,他从屈塔希亚写信给宰相路西德帕沙:“约瑟夫二世皇帝是哈布斯堡王朝出过的惟一英明人物,他用尽了他的罕有智慧和当时还流行的关于他的王朝威力的观点所提供的一切非凡手段,来使匈牙利日耳曼化,使它溶化于这个联合国家中。然而,斗争却使匈牙利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最近这次革命中,奥地利从灰烬中站起来,只不过为了向沙皇、向它的那个从来不给帮助、反而一贯出卖这种帮助的主子双膝下跪。奥地利必须为这种帮助付出高昂的代价。”(《科苏特通信集》第33页)另一方面,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写道:匈牙利和土耳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挫败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诡计。1851年1月17日,他从屈塔希亚写信给戴维·乌尔卡尔特说:“*We must crush Russia, my dear Sir! and, headed by you, we will! I have not only the resolution of will, but also that of hope! and this is no vain word, my dear Sir, no sanguine fascination; it is the word of a man, who is wont duly to calculate every*

在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份”中间，不仅有加利西亚、匈牙利和意大利，更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德意志联邦不应为它们“剑拔弩张”去反对法国和“完全站在法国一边”^①的俄国。

福格特说：“俄国是一个坚固的核心，斯拉夫各民族越来越渴望围绕在它的四周。”(同上，第9—10页)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居民属于“斯拉夫各民族”。就像莫斯科公国变成了俄国一样，俄国也应当变成泛斯拉夫国。“我们旁边有捷克人，我们就会败于任何敌人。”(同上，第134页)我们，即德国，应当竭力摆脱捷克人，也就是摆脱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对各个君主的非德意志领地不给任何保证。”(同上，第133页)“联邦内再不要任何非德意志省份”(同上)，可是要法国有德意志省份！因此，不仅应当“在当前的法兰西帝国没有侵犯德意志联邦的领土”时“对该帝国听之任之”(前言第9页)，而且应当在俄国只侵犯“联邦内非德意志省份”时也对俄国“听之任之”。俄国把军队推进到那些构成俄国“阴谋”的牺牲品的奥地利的“斯拉夫夫人附属地”，有助于发展德国的“统一”和“民族性”。当奥地利在意大利忙于应付路易·波拿巴，而普鲁士迫使德意志联邦之剑入鞘的

chance; of a man though very weak in faculties, not to be shaken in perseverance and resolution etc.”(同上，第39页)。“我们一定要摧毁俄国，亲爱的朋友！而且在您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摧毁它。我不仅充满决心，而且满怀希望——这并不是空话，亲爱的朋友，并不是一个爱激动的人的幻想：这是一个已习惯于对一切良机都加以深思熟虑的人说的话，此人虽然才非能薄，但是坚毅果断，不可动摇，等等。”)

① 卡·福格特《欧洲现状研究》(附《跋》)1859年日内瓦—伯尔尼增订第2版。——编者注

时候，“好心的沙皇”将“会用金钱、武器和弹药暗中支持”**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革命（同上，第13页）。

可是，“我们旁边有捷克人，我们就会败于任何敌人”！

“好心的沙皇”是多么宽宏大量，因为他竟使我们摆脱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及其捷克人，这些捷克人属于“斯拉夫各民族”，自然“必须围绕在俄国的四周”。

我们且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帝国的福格特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划入俄国以后，是怎样来保卫德国东部边界的。波希米亚成为俄国的波希米亚！但是，波希米亚位于德国中间，西里西亚使它同俄属波兰隔开，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摩拉维亚使它同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加利西亚和匈牙利隔开。这样一来，俄国就得到了长50德里^①、宽25—35德里这样一块德意志联邦的领土。它把它的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整整65德里。然而，由于从埃格尔河到阿尔萨斯的劳特堡按直线仅仅是45德里，因此，法国方面的楔子，尤其是俄国方面的楔子，就会把德国北部和南部完全切断，形成德国的被分割状态。从维也纳直达柏林的通道，甚至从慕尼黑直达柏林的通道，这时都得经过俄国。德累斯顿、纽伦堡、雷根斯堡和林茨就会成为我们同俄国毗连的边境城市；我国对斯拉夫人所处的地位，在南部至少会变得像在查理大帝以前那样（但在西部，福格特却不允许我们返回到路易十五时代），我们可以从我国的历史中勾销一千年了。

波兰所起过的作用，波希米亚能够更好地胜任。只要把布拉格变成一个筑垒阵地，并在莫尔多瓦河和埃格尔河流入易北河的汇流处建筑一些辅助堡垒，在波希米亚的俄军就能够从容地等待一开始

① 1德里=7420米。——编者注

就分散地从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勃兰登堡开来的德军，使其中较强的遭遇堡垒的迎击，而把较弱的各个击破。

我们来看一看中欧的语言分布图，比如，就拿斯拉夫的一个权威性资料——沙法里克的斯拉夫各国地图²³⁰来说吧。在这一分布图上，斯拉夫语言的界线从施托尔普附近的波美拉尼亚沿海地区起，经过雅斯特罗夫，向南通往内茨河上的霍杰日，然后向西直达梅泽里茨。但是从这里起，它向东南急转直下。在这里，德国的西里西亚大楔子深深地插在波兰和波希米亚之间。在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斯拉夫语言又远远地向西移——不过，它受到向前推进的德国成分多方面的侵蚀，同这里的德国城市和零星分散的德语区犬牙交错，正如在北方，整个魏克瑟尔河下游和东西普鲁士的得天独厚地区都是讲德语的，它们往波兰移动是不顺利的。在波兰语的最西点和捷克语的最北点之间，在德语区中间，有一个孤零零的劳西茨—文德语区，然而，这个地区几乎割断了西里西亚。

对拥有波希米亚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福格特**来说，无疑是知道斯拉夫帝国的自然疆界在哪里的。这条疆界从梅泽里茨直通利伯罗瑟和吕本，然后到达易北河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的交叉点以南，再往前通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西南部边境。这条线以东全是斯拉夫地区；混杂在斯拉夫地区里的几块德国飞地和其他外族的土地，不可能长久地阻碍大斯拉夫整体的发展；况且，它们对于它们所在的地方并没有权利。既然出现了这种“泛斯拉夫主义的现状”，那么不言而喻，在南部也必须对边界进行类似的修改。在南部，也有一个不受欢迎的德国楔子插在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中间，占据了多瑙河谷和施泰尔阿尔卑斯山脉。**福格特**不能容忍这个楔子，于是就坚定不移地把奥地利、萨尔茨堡、施泰尔马克和克恩滕山的德国部分并入俄

国。在用久经考验的“民族原则”的方法来建立斯拉夫—俄罗斯帝国的过程中,一些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连同各种土耳其人也落到俄国手里(要知道,“好心的沙皇”在征服切尔克西亚和消灭克里木的鞑靼人时,也是为了给“民族原则”增光!),作为对他们插入北方斯拉夫人和南方斯拉夫人之间的惩罚——福格特不管奥地利意下如何就是这样解释的。

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德国人失去的只不过是东西普鲁士、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一部分、整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奥地利(不包括蒂罗尔,因为它的一部分按“民族原则”应划给意大利),——失去的只不过是这一切加上我国的民族生存!

但是,我们不妨停留在最直接的一点:加利西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变成**俄国的!**

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的奥地利,德意志的西南部和德意志的北部便永远也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除非——必然会有这一天——在**俄国的领导下。**

福格特让我们德国人唱他的巴黎人在 1815 年唱过的歌:

“万岁! 亚历山大,
万岁! 王中之王,
你赐给我们法律,
却不要一点报答。”^①

这样,福格特在 1859 年曾想通过“北方的白天使”和“南方的白天使”之间的同盟来实现的福格特式的“民族原则”,按他本人的意

^① 《人民的呼唤和呼唤人民》,载于 1850 年 9 月 27 日《1850 年人民报》第 26 号。——编者注

见,首先应当表现在波兰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溶化,马扎尔民族在俄国内部的灭亡和德意志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消失。

这次我没有提到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因为我保留了一段惟一有说服力的引文,证明他在这里一半隐约其词一半道破底细的东西,都听命于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一个口号。在1859年5月2—16日的一期《思想和行动》上,马志尼预言了后来发生的事变,他并且指出:亚历山大二世和路易·波拿巴之间缔结的同盟的第一个条件就是:“*abbandono assoluto della Polonia*”(法国方面绝对放弃波兰,而福格特则译为:“最终填平横在波兰和俄国之间的鸿沟”。

《Che la guerra si prolunghi e assuma...proporzioni europee, l'insurrezione delle provincie oggi turche preparata di lunga mano e quelle del -l' Ungheria, daranno campo all' Alleanza di rivelarsi ... Principi russi governerebbo le provincie che surgerebbo sulle rovine dell' Impero Turco e del -l' Austria ... Constantino di Russia è già proposto ai malcontenti ungheresi.》(见1859年5月2—16日《思想和行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而且发展成欧洲规模的战争,那么,早已准备就绪的现今土耳其各省和匈牙利的起义,就会使同盟有机会公开登场…… 俄国的公爵们将治理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 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已被推荐给心怀不满的匈牙利人了。”²³¹

然而,福格特的亲俄仅仅是第二位的。在这一点上,他仅仅是遵照土伊勒里宫发出的口号行事,仅仅是竭力为德国设下圈套,这些圈套是路易·波拿巴和亚历山大二世商妥为应付反奥地利战争的某些突发事件用的;事实上他只是任奴颜婢膝地重复他的巴黎原著小册子中的泛斯拉夫主义腔调。他的本行就是唱《路易之歌》²³²:

“我知道有一个国王，人称路易先生^①；
他为上帝（即各民族）效劳，十分热诚。”

我们在前面听过了福格特对撒丁的颂扬，说它“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现在有这样一对比：

他说：“在〈普鲁士的〉声明里，没有谈到奥地利…… 如果北美和交趾支那之间发生战争，那么，语调也不过如此。可是声明里却特别强调了普鲁士的德意志使命，德意志职责，旧普鲁士。法国〈按他在第 27 页上所说法国是：“归根到底，法国现在不过是它的统治者的形体”〉随即通过〈通报〉和其他报刊滥加赞扬。——奥地利大为震怒。”（〈研究〉第 18 页）

“从路易·波拿巴通过〈通报〉和十二月政变的其他报刊对普鲁士滥加赞扬来看，普鲁士对自己的‘德意志使命’的理解是正确的。”^②真是恬不知耻！我们不禁想起了：福格特出于对“北方的白天使”的柔情，说只有奥地利破坏 1815 年条约而且只有奥地利侵占克拉科夫。他现在又同样友好地为“南方的白天使”效劳。

“卡芬雅克，这位保守的共和党代表人物和加格恩在军事上的同类货色（也是一个对比！），对这个教皇国的共和国（教皇国的共和国！）犯下了卑鄙的灭绝种族罪（对一个国家的共和国犯下了灭绝种族罪！），然而，灭绝种族罪并未能帮助他登上总统宝座。”（同上，第 69 页）

总之，是卡芬雅克，而不是路易·波拿巴对罗马共和国犯下了“卑鄙的灭绝种族罪”！卡芬雅克的确曾在 1848 年 11 月派遣一支分舰队前往奇维塔韦基亚充当教皇的私人警卫。不过，只是在第二年，

① 指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编者注

② 这里显然不是一句引文，而是从上面的引文中得出的结论。——编者注

只是在卡芬雅克离开总统宝座之后过了几个月,只是在1849年2月9日,教皇的世俗权力才被废除,罗马才成立共和国,可见,卡芬雅克不可能消灭在他执政时期还根本不存在的共和国。由于路易·波拿巴多次庄严地声明,说他远征罗马的目的只在于抵抗奥地利策划的对罗马国家的入侵,才从国民议会骗到了他所必需的费用,然后在1849年4月22日派乌迪诺将军率领14 000人前往奇维塔韦基亚。大家知道,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决定清算“对罗马共和国犯下的卑鄙的灭绝种族罪”——这同时是“对法国宪法的卑鄙破坏”和“对国民议会决议的卑鄙破坏”——,决定清算所有这一切卑鄙行径的祸首路易·波拿巴,即把他送上被告席,引发了1849年6月13日的巴黎大灾难²³³。我们看到,这位政变的可耻的造谣者卡尔·福格特,为了使“路易”先生解放各民族、特别是意大利民族的使命不致引起任何怀疑,竟多么“卑鄙地”、多么无耻地在伪造历史。

福格特记得,《新莱茵报》曾经写过:在法国,小农阶级同流氓无产阶级一起构成了衰落帝国¹⁸¹的惟一社会基础。他把这句话修饰成这样:

“目前的帝国在有教养的人中间没有拥护者,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间没有拥护者——支持它的只有两类群众:军队和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农村无产阶级。但是这二者构成居民的十分之九,本身就包含能够用来粉碎反抗的组织强大的工具。这是一群除了选票就一无所有的抵押债务的奴隶。”(第25页)

法国的非城市居民,军队也包括在内,不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二。福格特把少于三分之二变成了十分之九。他把法国的全部非城市居民,其中约有五分之一是富裕的土地所有者,而另外还有五分之一是无地和无财产的人群,统统变成了小农,“抵押债务的奴隶”。最后,他把城市之外的法国的读书写字全部废除。从前他伪造历史,现

在他又伪造统计数字,来为他的英雄加大宝座。现在,这位英雄本人正在被摆上这一宝座。

“因此,事实上,法国现在不过是它的统治者的形体,马松(也是一个权威)曾这样谈论过这位统治者:‘他有政治家和君主的伟大品质,有不可动摇的意志,他严守分寸,当机立断,有一颗刚强的心,有高尚勇敢的精神,而且铁面无情。’”(同上,第27页)

“他的所作所为
何等优雅高贵!
他的身材服饰
何等匀称华美!
他的举手投足
又何等端庄到位!”

(特里斯坦)①

福格特从他的马松手中夺过手提香炉,亲自挥舞起来。他在马松的德行表里又加上:“冷静筹划”、“审时度势”、“蛇一般聪明”、“坚忍不拔”(第28页),随后,像前厅的塔西佗那样嘟囔什么“这个统治权的起源是恐怖”,这无论如何是荒谬的。他必须首先把他的英雄的小丑形象,戏剧性地装扮成伟大人物,于是,“小拿破仑”²³⁴就变成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同上,第36页)。

福格特喊道:“如果目前的情况使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的)统治发生变化(说得多么谦虚:变化!),那么我们方面一定热烈地祝贺成功,虽然现今我们还看不出有这样的远景。”(同上,第29页)

这位满心祝贺成功的热情的伙伴装得怎样一本正经,可以从下

① 哥特弗里德(斯特拉斯堡的)(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编者注

面这段话看出来：

“但是，在持续和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将变得日益动荡不宁，因为法国军队同有教养的人的党派所保持的关系，就比例如在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存在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为正是这些党派能在军官中间得到响应，所以，有朝一日，皇帝所拥有的政权的惟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可能从他的手中溜掉。”（同上，第 27 页）

这样看来，在“持续和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已变得“日益动荡不宁”。因此，福格特应当竭力使路易·波拿巴易于破坏和平。军队，他的“政权的惟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有从他的手中“溜掉”的危险。所以，福格特证明：欧洲的任务在于借助意大利的“局部”战争，重新把法国“军队”拴在路易·波拿巴的手上。的确，1858 年底，巴登格，这位被巴黎人无礼地称之为“他伯父的侄子”的人所扮演的角色，看来要以可怕的结局告终。1857—1858 年的普遍商业危机，使法国工业瘫痪了。^① 政府为了制止危机尖锐化而采用的手段，使这场灾难变成了慢性的，因而法国的商业停滞状态一直拖延到意大利战争爆发。另一方面，1857—1859 年粮价暴跌，从而各种农户代表大会都开得怨气冲天，说由于粮价低税收高，法国农业将无法维持下去。路易·波拿巴发布命令，责成全国的面包房老板设置粮仓，企图用这种办法来人为地提高粮价，他的这种可笑企图只不过暴露了他的政府束手无策和仓皇失措。

政变制度的对外政策，只不过表现出一连串想扮演拿破仑的失

^① 事实上，正是工业繁荣使路易·波拿巴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发现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使法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一倍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二月革命¹⁴⁸归根到底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而遭到失败。

败尝试——挑起事端，却总以正式的退却告终。路易·波拿巴对美利坚合众国使用的阴谋，他想恢复奴隶贩卖所采取的手段²³⁵，他对英国的装模作样的威胁，就是如此。路易·波拿巴当时对瑞士、撒丁、葡萄牙和比利时——尽管在比利时他甚至无法阻挠安特卫普的设防，——擅自采取的无耻举动，只是使他的惨败在大国面前更加显眼。在英国议会里，“小拿破仑”已成了惯用语，而《泰晤士报》在1858年的年终文章中，则带着嘲笑的口吻把“铁人”改称为“树胶人”。其实，奥尔西尼的手榴弹已像闪电一般照明了法国的国内状况。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制度仍然像政变初期一样不巩固。“社会治安法”²³⁶暴露了他完全陷于孤立状态。他不得不把政权让给他自己的将军们。法国按照西班牙的方式分成了5个军区，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建立摄政制以后，佩利西埃实际上被认为是法国的最高掌权者。²³⁷再者，恢复恐怖手段已不再使人感到恐怖了。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²³⁸不是显得令人生畏，而是显得怪诞可笑了。蒙塔郎贝尔能在巴黎扮演汉普敦，贝里耶和杜弗尔能在他们的辩护词中道出资产阶级的希望，而蒲鲁东则能在布鲁塞尔附有补充条例地宣扬路易-菲力浦主义²³⁹，可是路易·波拿巴本人却向全欧洲承认了玛丽安娜的势力日益壮大。在沙隆起义²⁴⁰期间，军官们听到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消息后，不是去猛攻起义者，而是首先小心翼翼地向省政府打听巴黎成立共和国是不是真的，——这有力地证明，甚至军队也把复辟帝国看做是一出已演到最后一场的哑剧。巴黎傲慢无礼的军官们的可耻决斗，是和使十二月十日帮的大头目们声誉扫地的可耻的交易所生意同时并存的！英国的帕麦斯顿内阁由于同路易·波拿巴的结盟而倒台了！²⁴¹最后是，国库的状况，只有利用非常借口才能把它充实起来！在1858年底，衰落帝国的状况就是

如此。要么虚有其表的假帝国政权垮台，要么必须使由1815年条约所规定的疆界以内的拿破仑帝国的可笑丑剧收场。但是，为此就要求打一场局部战争。当时只要出现同欧洲开战的前景，就足以使法国发生爆炸。每一个小孩子都懂得**霍斯曼**在英国议会里所说的话：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动摇态度促使法国皇帝的对外政策得到成功时，法国将会支持它的皇帝，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我们对他进行坚决的反抗，法国就会抛弃他。”

一切都由能不能使战争局部化来决定，也就是说，进行战争要得到欧洲最高当权者的首肯。法国本身先要用一系列虚假的和平谈判和谈判的再三失败来逐步准备战争。但是，路易·波拿巴在这里也陷入了窘境。英国驻巴黎公使考莱勋爵带着路易·波拿巴提出的并得到伦敦（德比）内阁同意的建议前往维也纳。在那里（见上引的蓝皮书），这些建议在英国的压力下出乎意料地被接受了。考莱带着“和平解决”的报告刚刚返回伦敦，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路易·波拿巴已收回他自己的建议，而同意俄国提出的建议，即召开会议来商定制裁奥地利的措施。只是由于俄国的干预，战争才变成了可能。如果俄国不再需要路易·波拿巴执行它的计划，——或者是为了与法国共同实现这些计划，或者是为了通过法国的打击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变成它的驯服工具，——那路易·波拿巴当时就已被推翻了。但是，尽管有俄国的暗中支持，尽管有在贡比涅赞同普隆比耶尔密谋²⁴²的帕麦斯顿的许诺，一切仍然取决于德国何去何从，因为：一方面，在英国还是托利党内阁当政，另一方面，一有可能发生欧洲战争，就会使当时法国对波拿巴制度的无声的反抗突然迸发。

福格特自己失口说，他唱《路易之歌》，并不是由于热烈同情意大利，也不是由于害怕怯懦、保守、既束手无策又粗野无礼的奥地利专

制制度。相反地,他认为:如果奥地利——顺便说一说,它是被迫开始战争行动的,——甚至在意大利初战告捷,那么,

“在法国无论如何会爆发革命,帝国会被推翻,一个崭新的前景会到来”(同上,第131页)。他认为,“归根到底,奥地利军队在法国人民的解放力量面前将支持不住”(同上);还认为,“获胜的奥地利武装力量,在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中,会给自己树立敌人,这个敌人必定会把奥地利军队压倒”。

但是,福格特所看重的,并不是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桎梏,而是使法国俯首听命于路易·波拿巴。

难道还需要证据来证明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⁵⁴里能操腹语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吗?

人们会记得,正当路·波拿巴最初发现自己的解放各民族、特别是意大利民族的使命时,法国正在上演一幕史无前例的戏剧。整个欧洲都对法国拒绝接受“拿破仑观念”所表现的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感到惊讶。甚至立法团的“驯服的狗”用以欢迎莫尔尼的和平保证所表现的热情;《通报》时而斥责国民一味追求物质利益、时而斥责国民缺乏爱国的毅力、时而斥责国民怀疑巴登格统帅的天才和政治智慧等等所用的不满腔调;告法国各商会的官方安抚文告;皇帝的“研究问题不等于提出问题”的保证,——所有这些大家都还记忆犹新。英国报刊对这一出异乎寻常的戏剧感到惊讶,满纸都是好心的胡言乱语,说法国人的性格已发生和平主义的转变;交易所在议论“会不会打仗”的问题,把它看做是希望打仗的路易·波拿巴同不希望打仗的国民之间的一场“决斗”;人们在打赌谁将获胜,是国民还是“他伯父的侄子”。我只想从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引证几处来阐明一下当时的情况,这家杂志是西蒂区的机关报,是意大利战争的预言者,是威尔逊(不久前去世的印度财政大臣、帕麦斯顿的工具)的产业,它享

有很大威望。

“法国政府被它所引起的巨大激愤弄得惶惶不安，现在试用了安抚手段。”
(1859年1月15日《经济学家》)

1859年1月22日的一期《经济学家》，在一篇题为《法国皇帝的实际权限》的文章里写道：

“皇帝关于意大利战争的计划不论能否实现，至少有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他的计划遭到了非常强烈的、看来是出乎意料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在法国舆论对计划的冷漠态度，表现在对皇帝的计划根本不予同情……他提出要战争，而法国人民却只表现出惊慌和不满，国家证券贬值，对税吏的恐惧，扑灭了尚武精神和政治热情的每一道闪光，国家的商业部门陷入混乱状态，农业地区由于害怕又要征兵和增加捐税而流露出不满和消极情绪；把皇帝的制度看成是反对无政府状态的权宜之计而给以最有力支持的政界，也由于完全相同的原因表示反对战争；总之，很明显，路易·波拿巴发现各阶级居民都对打仗、甚至对为意大利打仗抱着普遍而强烈的反对态度，这种态度是他所始料不及的。”^①

面对法国人民的这种情绪，丹屠出版的“以人民的名义”向“皇帝”进言的那部分原著小册子出笼了，小册子要求皇帝：“帮助法国最终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莱茵河”，不再阻挠“尚武精神”和“人民要求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福格特竟同十二月的娼妇们一鼻孔出气。正当欧洲对法国坚定的和平意愿惊奇不已的时候，福格特却发

① 在考莱勋爵离职期间，在巴黎代替他的那位切尔西勋爵写道：“the official disavowal(载于1859年3月5日《通报》)of all warlike intentions on the part of the Emperor, this Imperial message of peace, has been received by all classes of Paris with feelings of what may be called exultation.”(《意大利事件(1859年1—5月)》，蓝皮书第88号)。(“官方否认皇帝方面抱有任何尚武意图，皇帝的这个和平信息，已为巴黎各阶级异常热烈地接受了。”)

现,“现在,这个好动的人民(法国人)看来充满了尚武情绪”(同上,第29、30页),发现路易先生不过是在紧跟“盛行的时代思潮”,而这种思潮恰好指向“各民族的独立”(同上,第31页)。他当然不相信他所写的任何一个字。他在号召民主派同他合作来宣传波拿巴主义的那个“纲领”中,详尽地说过:意大利战争在法国是不受欢迎的。

“我不认为开始对莱茵河有什么危险;但危险可能后来出现,在那里或者在英国作战也许会使路易·波拿巴变成几乎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可是在意大利作战却是不受欢迎的。”(“主要著作”第34页,文件)^①

如果说丹屠出版的那部分原著小册子竭力用传统的征服幻影把法国人民从“和平的昏睡状态”中惊醒,并竭力使路易·波拿巴的个人愿望借国民的嘴巴说出来,那么,以《通报》为首的另一部分小册子的任务,首先是使德国相信:皇帝厌恶攫取领土,他的理想使命是要成为解放各民族的救世主。一方面证明他的政策大公无私,另一方面证明他有解放各民族的意愿,这些证据都很容易背得烂熟,因为它们经常重复,而且老是围绕着两个基本点转来转去。表明十二月政策大公无私的证据就是克里木战争。表明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的证据就是库扎上校和罗马尼亚民族。在这里,调子是直接由《通报》定的。见1859年3月15日《通报》论克里木战争。1859年4月10日《通

^① 注意: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同《通报》和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一起再三地说:“命运的变幻无常迫使这个人(路易·波拿巴)不得不以民族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第一线”(第35页);“当这一政策在民族解放范围内运作的时候,必须协助它”,并且“必须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进行这种解放”(第36页)。相反地,福格特在写给民主派先生们的纲领中却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警惕这种人的帮助。”(“主要著作”第34页,文件)

报》是这样论述罗马尼亚民族的：

“它（法国）希望，不论在德国或者在意大利，经条约承认的民族能保存下来，甚至强大起来。——至于多瑙河两公国，那么，他（皇帝）曾不辞劳苦地帮助这些省份的合法愿望得到胜利，以便确保欧洲的这一部分也有建立在民族利益基础上的秩序。”

并见 1859 年初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罗马尼亚问题》。关于克里木战争：

“最后，法国对于它完全为了欧洲利益而在东方所流的鲜血和所耗费的千百万金钱又要求过什么补偿呢。”（丹屠出版的《问题的实质》1859 年巴黎版第 13 页）

福格特把这个在巴黎一再花样翻新的题目，用德文阐述得非常成功，以致埃·阿布，波拿巴主义的这只噙噙喳喳的喜鹊，竟好像是把福格特的德文译文倒译成了法文。见《1860 年的普鲁士》。在这本书里，我们又碰到了克里木战争和库扎上校治理下的罗马尼亚民族。

福格特紧跟《通报》和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是知道的：法国没有侵占过（克里木的）一寸土地；如果是伯父，在胜利的远征以后就不会满足于在军事艺术中确立的那种优势的区区成果。”（《研究》第 33 页）然而，这里正表现出“同旧的拿破仑政策的重大区别。”（同上）^①

① 其实，“小拿破仑”纵谈解放各民族的空话，也是从真拿破仑那里抄袭来的。例如，1809 年 5 月，拿破仑从申布伦发布了告匈牙利人书，其中就说：“匈牙利人！你们重新获得独立的时刻已经到了……我对你们毫无所求。我只希望看见你们成为自由而独立的人民。你们同奥地利的联合是你们的灾难，等等。”1797 年 5 月 16 日，波拿巴同威尼斯共和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它的第一条说：“今后法国同威尼斯共和国应

好像福格特要向我们证明：“小拿破仑”并不是真拿破仑！福格特可以用同样的权利在1851年预言：侄子——除了斯特拉斯堡冒险、远征布洛涅¹⁰²和萨托里的腊肠阅兵²⁴³之外，根本拿不出什么货色来同第一次意大利战争²⁴⁴和远征埃及²⁴⁵相比，——永远不会模仿

当和睦相处。”3天以后，他在一份秘密紧急报告中向法国督政府公开了他缔结这个和约的目的。该紧急报告是这样开头的：“兹送上我同威尼斯共和国所缔结的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已率领五六千名士兵占领了这座城市。我利用这个和约追求各种目的。”他在谈到最后一个目的时说：“压制在欧洲可能出现的一切议论，因为现在有人会觉得：我们占领威尼斯只不过是威尼斯人自己热烈要求的一种临时行动。”又过了两天，即5月26日，波拿巴写信给威尼斯市政委员会说：“在米兰签订的条约，此时可以由市政委员会签字，秘密条款由它的3个委员签字。我将始终不渝地竭尽全力，向你们证明我是希望巩固你们的自由的，并希望看到，不幸的意大利，将成为摆脱一切外国人的羁绊而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意大利，终于在世界舞台上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几天以后，他写信给巴拉盖·狄利埃将军：“接到此信后，即往访威尼斯临时政府，向它说明：根据现在使法兰西共和国同威尼斯共和国联合起来的各项原则，并为了法兰西共和国对威尼斯共和国予以直接保护起见，必须把共和国的海军提高到令人肃然起敬的水平。您要利用这一借口占有一切，同时不要忘记，应同威尼斯人和睦相处，并应争取共和国的所有水手为我们服务，同时您随时随地都要以威尼斯的名义讲话。简言之，您必须设法把威尼斯港的所有海军装备和军舰调往土伦。根据条约的秘密条款，威尼斯人有义务向法兰西共和国的土伦舰队提供价值300万法郎的装备，但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我意欲占有威尼斯的所有船只和它的全部海军装备供土伦使用。”（见《拿破仑的机密函件》（七卷集）1817年巴黎版）这些命令一字不差地被执行了；可是当威尼斯遭受掠夺而失去它的全部陆海军装备之后，拿破仑毫不犹豫地把他新盟国，他曾庄严宣誓要不顾一切危险予以保护的解放了的威尼斯共和国置于奥地利的专制桎梏之下。

雾月十八日²⁴⁶，更不会给自己加冕。然而，在这里却存在着“同旧的拿破仑政策的重大区别”。进行反对欧洲同盟的战争和在欧洲同盟的允许下进行战争，——这是另一个区别。

“光荣的克里木战争”¹⁷，在这场战争中，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联军历经两年“占领了”俄国的半个要塞，但为此却把土耳其的整个要塞(卡尔斯)丢给俄国，并且在巴黎会议上签订和约²⁴⁷时不得不谦恭地“请求”敌人“允许”他们能不受干扰地把自己的军队海运回国，——的确，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什么战争都可以，只是不能把它说成“拿破仑式的”。总而言之，它只在巴赞库尔的小说^①里才是光荣的。但是克里木战争暴露许多问题。路易·波拿巴出卖了假盟友(土耳其)，以便同假敌人结成同盟。巴黎和约的第一个结果是牺牲了“切尔克斯民族”，是俄国人完全消灭了克里木的鞑靼人以及使波兰和瑞典的民族希望破灭，这种希望原是寄托在西欧对俄国的十字军征讨上的。而从克里木战争中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路易·波拿巴不敢再进行第二次克里木战争，不敢失掉旧军队和欠下新国债，以换取大家承认法国有足够的财富来“为自己的光荣付出代价”，换取路易-拿破仑的名字在—项欧洲条约里出现，换取“欧洲保守的报刊和王朝的报刊”都照福格特的高度评价(同上，第32页)一致承认“皇帝圣上的美德、智慧和稳健”，换取当时整个欧洲把真拿破仑才受之无愧的全部荣誉都献给他，但有个明确的条件，就是路易·波拿巴要照路易-菲力浦的榜样在“实践理性的界限之内”^②，即在1815年条

① 巴赞库尔《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1857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② 显然是借用伊·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编者注

约规定的界限之内循规蹈矩,并且一刻也不忘记那根把小丑同他所扮演的英雄分开来的细线。政治上的鬼蜮伎俩、当权者和社会状况——这一切使十二月帮的头目能够起初在法国境内、然后在法国境外扮演拿破仑的角色,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时代所特有的,并不属于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编年史。

“但至少事实是这样:目前法国在东方的政策是符合一个民族(罗马尼亚民族)的统一努力的。”(《研究》第34、35页)

上面已经提到,库扎所保持的位置,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总督、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藩臣的。在《1860年的欧洲》地图上,作为藩属出现的是梅克伦堡大公。当然,俄国把罗马尼亚的这种解放的全部荣誉都归于路易·波拿巴,而它自己则捞取这一解放的一切实惠。阻碍俄国进一步实现其善良意图的是奥地利。因此,意大利战争应当把奥地利从一种障碍物变为一种工具。

早在1858年,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人就已利用他的无数传声筒,演奏了“罗马尼亚民族”这个题目。因此,福格特的权威人士科苏特先生于1858年11月20日在格拉斯哥的讲演中就能给以回答:

“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正在获得一部在秘密外交洞穴里炮制出来的宪法……实际上,它恰好是赏赐给俄国的一部宪章,让它在多瑙河两公国作威作福。”(“It is in reality no more nor less than a charter granted to Russia for the purpose of disposing of the Principalities.”)

因此,路易·波拿巴在多瑙河两公国里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掩盖他把两公国转赠俄国,正如奥地利政府在1848—1849年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借助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瓦拉几亚人等等来绞杀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革命一样。

罗马尼亚人民，——为他们操心的既有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又有利欲熏心的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的贵族流氓；其中多数流氓甚至不是罗马尼亚人，而是一群从外国跑来的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仿佛是一个东方的十二月帮，——罗马尼亚人民一如既往地在其丑恶的徭役制的桎梏下受苦受难，而这种徭役制**只有俄国人借助于组织规程²²⁰**才能组织起来，只有东方的半上流社会才会抓住不放。

福格特为了用自己的一套花言巧语去美化从丹屠出版的原著中汲取来的智慧，他这样说：

“南方的一个皮埃蒙特已经够使奥地利操心的了，它不需要东方再来一个。”(同上，第64页)

皮埃蒙特侵吞**意大利**的土地。那么，多瑙河两公国——土耳其的最不好战的地区——就应当侵占罗马尼亚土地？应当从俄国手中夺取比萨拉比亚、从奥地利手中夺取特兰西瓦尼亚、泰梅什堡的巴纳特和布科维纳？**福格特**不仅忘记了“好心的沙皇”。他还忘记了，匈牙利在1848—1849年间看来丝毫无意于让别人从自己手中夺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尼亚的土地，用出鞘的剑来回答他们“痛苦的哀号”；他还忘记了，相反地，正是**奥地利**发动这个“民族原则的宣传”去反对匈牙利。

但是，当**福格特**根据他从浏览过的一本应景小册子中得到的朦胧印象，心安理得地“认为，两公国的可悲状况……来自希腊人和法纳尔人的腐烂毒气”(同上，第63页)的时候，福格特的《研究》的渊博历史知识，便又光彩夺目地显露出来了。

他没有想到，**法纳尔人**(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市区得名)，就是从18世纪初起，在俄国人保护下在多瑙河两公国居住下来的那些**希腊**

人。有一部分就是君士坦丁堡的卖汽水小贩的后裔，他们如今又在俄国人的指使下扮演“罗马尼亚民族”。

我们看到，北方的白天使正从东方推进并为了斯拉夫种族的光荣在消灭各民族，而南方的白天使，作为民族原则的旗手，正从相反的方向推进，但

“必须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解放各民族”（《研究》第 36 页）；

在两位天使——“德国统一的两个最大外敌”“结成极其紧密的联盟”（《研究》第 2 版跋第 154 页）采取这些联合行动时，帝国的福格特（这位先生决不是“帝国扩大者”¹⁹³）分派给德国什么样的角色呢？

福格特说：“连目光最短浅的人现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鲁士政府同法国皇帝政府之间存在着谅解；普鲁士不会为了捍卫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份（当然包括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而剑拔弩张；它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土（“非德意志”省份除外）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但同时，它将阻止联邦或联邦的个别成员以任何方式倾向奥地利，以便此后，即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酬劳。”（《研究》第 1 版第 18、19 页）

由于福格特在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真正开始以前，就大肆宣扬土伊勒里宫透露给他的秘密，即普鲁士正在采取同“德国的外敌”“秘密一致”的行动，并将为此取得“北德平原”作为“酬劳”，所以，他当然就为普鲁士达到它的假目的大大地效劳一番。他使德意志其他各邦政府，无论对普鲁士在战争初期的中立意图或者对它在战争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军事准备和对最高指挥权的要求，都抱有了戒心。

福格特说：“德国在当前危机中不论选择什么道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应当毅然决然走一条确定的道路，然而现在有一个倒霉的联邦议会，等等。”（同上，第 96 页）

散布普鲁士的道路同“外敌”携手并进，并将导致北部平原的被吞没等等观点，显然是要建立起联邦议会所缺少的统一。特别要使萨克森注意：普鲁士已经一度使它“失去了它的某些最好的省份”（同上，第93页）。“购买亚德湾”²¹¹（同上，第15页）一事正在被揭露中。

“当荷尔斯泰因要成为普鲁士（在土耳其战争中）合作的代价时，声名狼藉的盗窃紧急报告事件突然使谈判发生根本转变。”（同上，第15页）“梅克伦堡、汉诺威、奥尔登堡、荷尔斯泰因以及同它们毗邻的……其他德意志兄弟之邦都成了钓饵”，——而且“一有机会”——“普鲁士就贪婪地向这些钓饵猛扑过去”（同上，第14、15页）。

福格特透露，路易·波拿巴这一次用这些钓饵使普鲁士上了钩。一方面，普鲁士由于同路易·波拿巴达成了秘密“一致”，“用牺牲它的德意志兄弟的利益将会取得”而且必然“取得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同上，第14页）。另一方面，

“只有当厄尔士山脉和菲希特尔山脉构成的分水岭沿着白美因河延伸，并进而顺美因河流域一直伸展到美因茨时，普鲁士才会取得自然疆界”（同上，第93页）。

德国腹地的自然疆界！而且还是以一条河作为分水岭构成的！自然地理领域中的这类发现——外露的渠道也应算做这类发现（见“主要著作”），——使得“圆满的人物”同亚·冯·洪堡齐名。福格特在这样向德意志联邦宣扬要信任普鲁士的领导权的同时，由于不满足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德意志等等领土上的旧竞争”，又发现了它们之间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在欧洲以外的领土上经常发生”（同上，第20页）。这块欧洲以外的领土显然是在月球上。

实际上，福格特不过是把法国政府于1858年刊印的《1860年的欧洲》地图变成语言而已。在这幅地图上，汉诺威、梅克伦堡、不伦瑞克、荷尔斯泰因、黑森选帝侯国以及各式各样的瓦尔代克、安哈尔特、

利珀河等等都并入了普鲁士，而“l'Empereur des Français conserve ses (!) limites actuelles”——法国人的皇帝却保持着自己的(!)旧疆界。“普鲁士直到美因河”同时也是俄国外交的口号(可参看上面已提到的1837年备忘录)。由于自然疆界、传统、宗教信仰、方言和种族差别，就会有一个奥地利的南德意志同一个普鲁士的北德意志相对立；德国的分裂为二就会由目前存在于德国内部的矛盾的简化而完成，从而也就会宣布持续不断的三十年战争²⁴⁸。

总之，按《研究》的第一版来看，普鲁士原应得到这种“酬劳”，以报答它在战争时期迫使德意志联邦之剑收入鞘内所作的一番“努力”。因为在福格特的《研究》和法国的《1860年的欧洲》地图上，借助法国对奥地利的战争来寻求并获得领土扩大和自然疆界的，根本不是路易·波拿巴，而是普鲁士。

然而，只是在奥法战争时期出版的《研究》第二版的跋中，福格特才揭示出普鲁士的真正使命。普鲁士应当发动“内战”(见第2版第152页)来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同上，第153页)，来使德国并入普鲁士君主国。当俄国从东面向前推进，而奥地利被路易·波拿巴拴在意大利的时候，普鲁士则应当在德国发动一场王朝“内战”。福格特向摄政王^①保证说：

“目前”在意大利“进行的鏖战，至少要占用1859年这一年”，“然而德国的统一，如果进展得迅速而坚决的话，只要几个星期就够了，但意大利战役却需要几个月”(同上，第155页)。

德国的内战只需要几个星期！除了奥地利军队不管有无意大利

^① 普鲁士的威廉。——编者注

战争都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普鲁士以外,就照福格特本人所说,普鲁士也会遇到“完全处于奥地利影响之下的……巴伐利亚”(《研究》第1版第90页)的抵抗,会遇到首先受到威胁、已没有任何理由掩饰自己“同情奥地利”(同上,第93页)的萨克森的抵抗,会遇到“符腾堡、黑森-达姆施塔特和汉诺威”(同上,第94页)的抵抗,简言之,会遇到“十分之九”(同上,第16页)的“德意志邦政府”的抵抗。而且,正如福格特进一步证明的,这些邦政府在这样的王朝“内战”中当然不会处于无援的境地,何况普鲁士是在德国受到它的“两个最大外敌”威胁的时候发动这场内战的。

福格特说:“〈巴登的〉宫廷会追随普鲁士,但是人民——对此不能有任何疑问,——当然不会附和统治家族的这类同情。如同上士瓦本一样,布赖斯高甚至由于同情的和宗教的纽带,也由于对前奥地利(布赖斯高曾经属于前奥地利)的往事的回忆,而仍然被拴在皇帝和帝国的身上,而且在经过如此长期的分离之后,拴得比料想的还要紧得多。”(同上,第93、94页)“除了梅克伦堡”,“也许”还除了黑森选帝侯国,“北德意志笼罩着一片不信任溶合论的气氛,对普鲁士的让步也作得极为勉强。南德意志对普鲁士抱着本能的厌恶情绪,甚至仇恨情绪……这种情绪也是皇党的一切大叫大嚷所无法压倒或消灭的。这种情绪活生生地蕴藏在人民当中,任何政府,甚至巴登政府,都无法长期与之相抗衡。这样一来,不管在哪里,无论在德国人民那里,还是在德意志联邦各邦政府那里,普鲁士都得不到真正的同情”(同上,第21页)。

福格特就是这么说的。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说法,正是因为这样,由普鲁士同“德国的两个最大外敌”“秘密一致”地发动的王朝“内战”,却只需要“几个星期”。但这还不是全部。

“旧普鲁士同政府并肩行动,而莱茵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则同天主教奥地利并肩行动。如果那里的人民运动不能迫使政府转到奥地利一边,那么,直接的后果将是在君主国的两部分之间造成新的鸿沟。”(同上,第20页)

因此,如果按照**福格特**的意见,即使普鲁士对奥地利仅仅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也会重新加深莱茵地区、威斯特伐利亚同旧普鲁士之间的鸿沟,那么,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看法,要是普鲁士为了把奥地利排除出德国而发动“内战”,自然就会使莱茵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完全脱离普鲁士。“但是,德国同这些罗马教会信徒有什么关系呢?”(同上,第119页)或者,就像他本来所想的那样,这些罗马教会信徒同德国有什么关系呢?莱茵地区、威斯特伐利亚,这都是教皇至上主义²⁴⁹的、“罗马一天主教”的土地,而不是“真正德国的”土地。因此,它们都应当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一样被排除出联邦的地界。**福格特**向普鲁士建议的王朝“内战”应当加速这一排除过程。的确,法国政府在其1858年出版的《1860年的欧洲》地图(它已成了**福格特**的《研究》的指南)上,已把埃及并入奥地利,而把莱茵河各省当作“天主教民族”的土地并入比利时,——这是法国并吞比利时以及莱茵河各省的讽刺公式。**福格特**比法国政府的地图更进了一步,并把天主教的威斯特伐利亚也献上了,这可以从流亡的帝国摄政与威斯特伐利亚前国王^①之子普隆-普隆的“科学关系”中得到解释。

总起来说: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将允许俄国经过波森染指波希米亚,经过匈牙利染指土耳其,而另一方面,他自己将使用武力在法国边境上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意大利,并且全都——pour le roi de Prusse^②,全都只是为了使普鲁士有机可乘,通过内战使德国归顺自己,并“保证莱茵河各省永远不受”法国“侵犯”(同上,第121页)。

① 日罗姆·波拿巴。——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pour le roi de Prusse”是一个成语,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转义是:“白白地”、“为了装装门面”。——编者注

“然而有人说，联邦的领土受到了威胁，世仇发出恐吓；世仇的真正目标是莱茵。让人们去保卫莱茵吧，去保卫联邦领土吧。”（同上，第 105 页）

保卫联邦领土，是通过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让给俄国，保卫莱茵，是通过在德国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目的之一是使莱茵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脱离普鲁士。

“然而有人说，路易-拿破仑……想满足拿破仑式的领土渴望，而且不惜采用任何方式！我们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眼前有克里木战争的实例！”（同上，第 129 页）

除了不相信拿破仑式的领土渴望和相信克里木战争之外，福格特心里还有另一个论据。奥地利人和法国人，将会像基尔肯尼的猫²⁵⁰一样，在意大利互相咬架，直到双方只剩下尾巴为止。

“这将是一场血流成河的顽强战争，其结局或许胜负不分。”（同上，第 127、128 页）“法国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同皮埃蒙特一起赢得胜利，但是要从这种精疲力竭状态中恢复过来，则需要几十年。”（同上，第 129 页）

意大利战争的旷日持久的前景，对交战双方都是一种打击。但是福格特用来延长奥地利抵抗在意法军的方法，用来削弱法国侵略力量的方法，的确是别出心裁。一方面，法国人在意大利得到 *carte blanche* [行动的全权]^①；另一方面，让“好心的沙皇”在加利西亚、匈牙利、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演习，在奥地利内部玩弄革命阴谋和在奥地利边境举行军事示威，来

“把奥地利的大部分兵力困在君主国的那些会受到俄军攻击或者便于俄国人玩弄阴谋的地区”（同上，第 11 页）。

① 直译是：“空白纸”。——编者注

而最后,由于普鲁士同时在德国发动王朝“内战”,奥地利将被迫从意大利调出自己的主力,来保卫它的德意志领地。在这种情况下,弗兰茨-约瑟夫和路易·波拿巴自然不会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¹⁰,而是——“两个人都将在意大利流血”。

奥地利既不会在东方向“好心的沙皇”作出让步,不会接受早已提出的把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作为赔偿,也不会保证法国取得莱茵河各省,不会同俄国和法国结盟进攻普鲁士。决不会!它将执拗地“在意大利流血”。但是,不管怎样,福格特的“左右未来的人物”会议愤填膺地拒绝把莱茵当作这类报酬。福格特知道:

“当前帝国的对外政策只遵循一个原则,即保存自己。”(同上,第31页)

他知道,路易·波拿巴

“只遵循惟一的一个观念,即保存自己(对法国的)这个统治权”(同上,第29页)。

他知道,“意大利战争不会给他在法国树立威望”,可是取得莱茵河各省既会使他又会使他的王朝赢得“威望”。他说:

“莱茵河各省实际上是法国沙文主义者最心爱之物,如果追根究底,也许就会发现,这个民族中只有极少数人不抱这种愿望。”(同上,第121页)

另一方面,“法国有远见的人们”知道,因而福格特式的“像蛇一般聪明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当然也知道:

“只有当德国还存在34个不同的邦政府,才有希望实现这件事(即法国取得莱茵河自然疆界)。让一个利益一致和组织巩固的真正的德国出现吧,——莱茵河疆界就会永远平安无事了。”(同上,第121页)

正因为如此,曾在维拉弗兰卡向奥地利皇帝提出以伦巴第换取获得莱茵河各省的保证(见金莱克于1860年7月12日在下院的声

明)的路易·波拿巴,会愤懑地拒绝奥地利提出的建议,即把莱茵河各省让给法国,作为对法国支援反普鲁士的报酬。

同时,福格特的丹屠出版的原著,不仅醉心于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①,而且用义愤填膺的语调,专门驳斥了覬覦莱茵河各省的种种暗示:

“莱茵!……莱茵是什么?是一条疆界。疆界将很快成为时代错误。”(《条约的信守》1859年巴黎版第36页)^②

在巴登格将要根据民族原则建立的千年王国⁵⁰里,谁会来谈论莱茵河疆界,或者还谈论疆界的事!

“法国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说它为了正义、为了施加公正的影响、为了欧洲的均势而准备作出的牺牲,要获得补偿吗?它要求得到莱茵河左岸吗?它对萨瓦和尼斯伯爵领地有一点儿覬覦之心吗?”(《问题的实质》1859年巴黎版第13页)^③

① “普鲁士是德国的希望……德国精神的中心在柏林……德国精神力求它的躯体的统一,力求邦联的真实性。普鲁士正是在这一热望的鼓舞下一跃而起的……当意大利要求完整和民族统一时,德国也在追求同一目标,那么,这个意大利为什么竟站在反对一切民族的那个化身——奥地利一边呢?……因为普鲁士还不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占据领导地位的是奥地利,奥地利利用各种力量去压制政治上的德国,使它同真正的德国处于矛盾状态。”(《条约的信守》第34页)

② 《Le Rhin! … Qu'est ce que le Rhin? Une frontière. Les frontières seront bientôt des anachronismes.》(l. c. p.36)

③ 《La France stipule-t-elle des dédommagements pour les sacrifices qu'elle est prête à faire dans un but d'équité, de juste influence, et dans l'inlérêt de l'équilibre européen? Demande-t-elle la rive gauche du Rhin? Elève-t-elle même des prétentions sur la Savoie et sur le comté de Nice?》(p. 13, 《La vraie Question etc.》)

法国放弃萨瓦和尼斯，这是它放弃莱茵的明证！福格特并没有把这一点译成德文。

战争爆发以前，虽然路易·波拿巴未能诱使普鲁士上钩，同他达成协议，但让德意志联邦至少相信他引诱过普鲁士，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福格特在他的第一版《研究》中竭力散布这一点。在战争时期，对路易·波拿巴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唆使普鲁士采取某些步骤，能向奥地利真真假假地证明存在着这种协议。因此，在战时出版的第二版《研究》中，福格特专门写了一篇跋，呼吁普鲁士征服德国并发动王朝“内战”；同时他在该书的正文里证明，这场战争将是“血流成河的、顽强的，其结局或许胜负不分”，它至少将牺牲莱茵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在同一篇跋里，他非常明确地宣称：战争“只要几个星期”。但实际上，福格特的声音并不是茜林丝的声音。因此，在干骗人勾当中得到帕麦斯顿撑腰打气的路易·波拿巴，不得不在维拉弗兰卡把他本人捏造的普鲁士建议给弗兰茨-约瑟夫看；奥地利必然把普鲁士要在军事上领导德国的谦逊要求作为缔结和约^①的借口，而路易·波拿巴必然为这个和约向法国辩解说：意大利战争有演变为全面战争的危險，而全面战争

“会导致德国的统一，因而完成一件从弗朗索瓦一世时代以来的法国政策一直

① 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以后不几天，《布拉格报》刊登了下列官方声明。“这个抗议（普鲁士抗议在联邦监督下接管联邦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明显地证明：普鲁士力争在德意志的霸权，也就是说，力争把奥地利从德意志排挤出去。因为背信弃义的伦巴第同保持我们在德意志的地位比较起来，其价值简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弃，以便缔结和约，鉴于普鲁士的态度，该和约对我们已成了迫切的需要。”

阻挠的大事”。^①

法国借助于意大利战争取得了萨瓦和尼斯，并从而取得了一块阵地，一旦莱茵区发生战争，这块阵地的分量要大过一个军，在这以后，“德意志在普鲁士霸权下的统一”和“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就成了十二月二日英雄⁶概率计算中两个可互换的变数。1860年出版的《和平的欧洲》（平息了的欧洲？）地图，对1858年出版的《1860年的欧洲》地图作了解释；在前一种地图上，埃及已经不再归属奥地利，而莱茵河各省加上比利时则并入法国，以补偿转让给普鲁士的“北部平原”。^②

最后，佩尔西尼在艾蒂安正式宣布：即便是“为了保持欧洲的均势”，德国的任何进一步集中，都必然会引起法国向莱茵推

① 巴黎《加利尼亚尼信使报》只是在例外场合和受到官方的特别委托才发表社论的，它在1859年7月22日的一号中写道：“为了再给皮埃蒙特国王一个省，不仅必须经受得住一场反对欧洲三分之二的战争，而且会导致德国的统一，因而完成一件从弗朗索瓦一世时代以来的法国政策一直阻挠的大事。”

② 普隆-普隆的专刊《民论报》在1860年7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凭借暴力提出要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方面，皇帝有非常灵活的手腕，对民心所向感觉非常敏锐……但是，难道普鲁士发过誓永远不考虑德国的统一吗？它能否保证永远不贪婪地窥伺汉诺威、萨克森、不伦瑞克、黑森、奥尔登堡和梅克伦堡？今天，君主们正在互相拥抱，而且当然是真诚的。但谁知道几年以后人民会向他们要求什么呢？要是德国在舆论的压力下联合起来了，那么，不允许法国牺牲自己的邻邦来扩张领土，是否公正，是否合理呢？……如果德国人认为有必要改变他们的旧政治制度，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去代替软弱无力的联邦，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法国有必要要求德国作出补偿和安全保证。”

进。^①但是,不论在意大利战争以前或者以后,还从来没有一个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说过比通过流亡的帝国摄政之口说出的更加无耻的话。

福格特,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²⁵¹日内瓦议员”(同上,前言),是用下列开场白(同上,第37—39页)来开始他的《研究》中的瑞士部分的。他在开场白中要求瑞士对于路易·波拿巴取代路易-菲利浦表示由衷的喜悦。不错,路易·波拿巴曾要求联邦委员会¹³²采取“整肃报刊的措施”,但是,“在这方面,拿破仑家族的人看来都有十分敏感的皮肤”(同上,第36页)。皮肤病,不过是皮肤病而已,但这个病老是纠缠这个家族,以致它不仅随着家族的血统遗传,而且——路易·波拿巴可以作证²⁵²,——只要冠以家族之名也遗传。当然,

“日内瓦对一些无辜者的迫害,是联邦委员会遵照皇帝的敕令行事的,这些可怜人的全部过错就在于他们是意大利人;设立领事馆;压制报刊;采取各种荒

① 皇帝的柏克司尼弗在丹屠出版的《英国政治》(1860年巴黎版)这一小册子中可谓更上一层楼。按作者的意思,必须劫取几百万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以便改善法国的道德面貌,因为法国南方的气质需要同北方的稳重有较多的混合。在论述了法国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理由而需要自然本身所赐予它的疆界之后,接着说:“这种兼并(对莱茵河各省和比利时的兼并)之所以必要,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法国喜欢而且要求合乎理性的自由(une sage liberté),南方气质构成它的公众团体的伟大气质。这种气质有妙不可言的特点……但是它缺乏韧性和坚毅精神。它需要我们北方弟兄们的顽强、冷静而不屈不挠的决心。因此,天意给我们确定的疆界,对我们的自由来说和对我们的独立一样必要。”

谬的警察措施；最后还有关于割让达普谷地的谈判，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瑞士把皇帝在诺因堡冲突²⁵³中真正帮过忙这一点忘记了，而且就是为现在掉过头来反对他最激烈的那个政党帮过忙”（同上，第 37、38 页）。

宽宏大量的皇帝，忘恩负义的政党啊！皇帝插手诺因堡冲突，决不是想要开破坏 1815 年条约¹⁹的先例，使普鲁士蒙受屈辱和对瑞士实行保护。路易·波拿巴，作为“新瑞士人、图尔高州公民和奥贝尔施特拉斯炮兵上尉”，是应该为瑞士“真正帮忙”的。福格特在 1859 年 3 月指责瑞士反波拿巴政党忘恩负义，而皇帝的另一个奴仆图沃奈尔先生则在 1860 年 6 月责备整个瑞士忘恩负义。在 1860 年 6 月 30 日《泰晤士报》上我们可以读到：

“几天以前，凯伦博士同冯·图沃奈尔先生在巴黎外交部举行了会晤，会晤时在座的有考莱勋爵。图沃奈尔向可敬的瑞士代表声明说，联邦政府的怀疑和抗议是带侮辱性的，因为它们看来是由于不信任皇帝陛下政府而产生的。如果想到拿破仑皇帝在许多场合，尤其在诺因堡冲突中给联邦帮过忙（rendered services），那么，这种行为就是极大的忘恩负义。不管怎样，既然瑞士已盲目到不信任自己的恩人，那就要它自己对后果负责。”

须知，福格特早在 1859 年 3 月就企图给瑞士盲目的反波拿巴政党做白内障手术了。一方面，他指出“皇帝真正帮过忙”。另一方面，“皇帝所引起的不愉快”，比起国王路易-菲力浦所引起的不愉快来，“简直就微不足道了”（同上，第 39 页）。例如，1858 年，联邦委员会“遵照皇帝的敕令”驱逐了“一些可怜人，他们的全部过错就在于他们是意大利人”（第 37 页）；1838 年，联邦委员会不顾路易-菲力浦的威胁，拒绝驱逐路易·波拿巴，后者的全部过错不过是：他在瑞士策划反路易-菲力浦国王的密谋。1846 年，瑞士不顾路易-菲力浦的“战争叫嚣”，决心同宗得崩德¹⁴⁹作战：对于爱好和平的国王来说，这就

意味着,威胁不足惧;1858年,当路易·波拿巴侵犯达普谷地²⁵⁴的时候,瑞士只不过稍稍虚张声势一番。

福格特自己说:“路易-菲力浦在欧洲苟延残喘;所有的人,甚至连正统主义²²⁴的小君主都瞧不起他,因为他不敢执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同上,第31页)但是,“皇帝对瑞士的政策,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大邻邦的政策,这个邻邦知道,归根到底它能够取得它想要取得的一切”(同上,第37页)。

于是,福格特用格朗吉约的逻辑得出结论:让瑞士有一个“知道可以对瑞士为所欲为的强大邻邦”,而不是一个“谁都瞧不起的路易-菲力浦”,“从纯瑞士立场来看,这种改变只能令人无比喜悦”(第39页)。

在这个酝酿必要情绪的开场白之后,接着就是联邦委员会1859年3月1日照会²⁵⁵的德译文。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联邦委员会在照会中引证了1815年条约,虽然同一位福格特把这种引证看成是“伪善”的,但他仍然对这个照会推崇备至。“带着你们的伪善滚开吧!”(同上,第112页)^①

福格特进而研究“对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同上,第84页),他提出了多余的证据,说这一次无须征服皮埃蒙特的法国军队,既不会通过辛普朗山口,也不会通过大圣伯纳德山口进军。同时他发现一条并不存在的“经塞尼山或经费内斯特雷莱到达

^① 实际上,保护瑞士中立的,并不是“条约”,而是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互钳制的利益。英国驻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同联邦主席弗雷-埃罗塞会谈以后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瑞士人懂得,……最近时期的事件,大大地改变了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力量对比,因为在诺因堡冲突之后,普鲁士态度冷漠,奥地利已丧失活力,而法国则较过去更强大无比了。”

施图拉河谷”(同上,第84页)的陆路。这个河谷其实叫做多拉河谷。这样说来,瑞士并不受到法国方面的威胁。

“不能同样泰然自若地期待奥地利方面会珍重瑞士的中立,而且种种迹象甚至表明,只要有机可乘,奥地利就想破坏这一中立。”(同上,第85页)“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军在布雷根茨和费尔德基希集中。”(同上,第86页)

在这里露出了贯穿《研究》的红线,它从日内瓦直引巴黎。

其实,德比内阁公布的1859年1—5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就说,“有一个奥地利军在布雷根茨和费尔德基希附近集中”的传闻,是瑞士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故意散布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上引蓝皮书的文件第174号,哈里斯上尉1859年3月24日从伯尔尼写给马姆兹伯里勋爵的信)。洪堡—福格特在这种场合也有了发现,仿佛布雷根茨和费尔德基希

“紧靠莱茵河谷,通向这个河谷的有3条可通行车辆的阿尔卑斯山大通道,即维亚马拉山口、施普吕根山口和贝纳丁;后者通向泰辛河,前两者通向科莫湖”(同上,第86页)。

实际上,维亚马拉山口首先是经过施普吕根山口,其次是经过贝纳丁,再其次便哪儿也不经过了。

“圆满的人物”在说了这一整套普隆涅斯式的胡言乱语(旨在把瑞士的怀疑从西部疆界转移到东部疆界)之后,终于接近了他的真正任务。

福格特说:“如果瑞士坚决拒绝承担不让军用列车走这条铁路线(从屈洛兹到艾克斯和尚贝里)的义务,并且在未来的事变中只限于为捍卫本国领土所必需才占领中立地区,那它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同上,第89页)

于是他要联邦委员会相信:“整个瑞士将像一个人一样来拥护委

员会在3月14日的照会中所暗示的这一政策”。

福格特是在3月底发表他的《研究》的。但是路易·波拿巴在4月24日才让军用列车利用上述铁路线，至于他宣战，就更要晚一些。由此可见，具体了解波拿巴作战计划的福格特，确切知道“对瑞士中立的首要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他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说服瑞士忍受对它的中立的首要破坏，这种破坏的逻辑后果就是十二月政变帝国¹⁹⁷兼并了中立的萨瓦地区。他一边拍着联邦委员会的肩膀，一边给3月14日的照会加上从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来看应该具有的意义。联邦委员会在自己的照会中说，瑞士将“一视同仁地”履行它按条约规定的中立“使命”。其次，它引用一条条文，根据该条规定，“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军队均不得（在中立的萨瓦地区）驻扎或通过该地区”。委员会只字未提它将允许法国人使用通过中立地区的铁路。除非作为“保障和维护自己领土的措施”，委员会才给联邦保留“用军队占领”中立地区之权。福格特在这里奉旨故意歪曲联邦委员会照会的内容，这一点，不仅照会本文可以作证，而且马姆兹伯里勋爵——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在1860年4月23日的上院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也可作证。

马姆兹伯里说：“当法国军队打算（在3月14日的联邦委员会照会发出一个多月以后）通过萨瓦开赴撒丁的时候，恪守中立的瑞士政府（瑞士的独立是以这种中立为基础的）首先表示反对，说这些军队无权通过中立地区。”^①

① “When the French troops were about to march through Savoy into Sardinia the Swiss Government, true to the neutrality upon which depends its independence, at first objected that these troops had no right to pass through the neutralised territory.”

路易·波拿巴同与之结盟的瑞士政党究竟用什么论据来打消联邦委员会的疑虑呢？福格特在 1859 年 3 月底就已知道法国军用列车要在 1859 年 4 月底破坏中立地区的中立，当然他在 3 月底也已预先料到路易·波拿巴要在 4 月底用来掩饰自己暴行的那种词句了。他怀疑“从屈洛兹到艾克斯和尚贝里铁路线的先头地段在中立地区范围内”（同上，第 89 页），并且证明“设立中立地区的目的，决不是要切断法国和尚贝里之间的联系”，因而上述铁路线，从道义上说，是避开中立地区的。^①

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来听听**马姆兹伯里勋爵**是怎样说的：

“后来，由于考虑到该铁路线是绕过萨瓦的中立部分的，瑞士政府放弃了反对意见，允许法军通过该地区。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I think that they were wrong in doing so）。我们认为，保持这个地区的中立，对欧洲利益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在 1859 年 4 月 28 日向法国宫廷提出抗议，反对军队通过该地区开赴撒丁。”

由于这一抗议，帕麦斯顿攻击**马姆兹伯里**同情“奥地利”，因为他“毫无必要地侮辱了法国政府”（had uselessly offended the French government），完全像**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 183 页）中攻击《人民报》一样，说它

“千方百计（当然是为了讨好奥地利）给瑞士制造困难……只要读一读《人民报》发表的有关中立问题和法国人通过萨瓦的文章，就会把这些为《总汇报》所

① 这条铁路在中立地区内，已由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和总理席斯在 1859 年 11 月 18 日给哈里斯上尉的照会中予以确认。照会中说：“涉及萨瓦中立的另一款，也可能发生问题……我们所指的是新近铺设的从屈洛兹到尚贝里的铁路，也许有人会问，它是不是将继续构成中立地区的一部分。”

完全同意的倾向弄得一清二楚”^①。

我们将要弄得“一清二楚”的是：在福格特的《研究》中有一整章是谈瑞士的，这一章的惟一任务就是预先为他的那位“左右未来的人物”首先破坏瑞士的中立地区辩解。这是兼并萨瓦的第一步，从而也是兼并瑞士法语区的第一步。瑞士的命运取决于瑞士用什么样的毅力去反对这第一步，用什么样的毅力去维护它本身的权利，在决定性时刻使用这种权利，并把权利问题提升为全欧洲的问题，——而且要在保证能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而刚刚发动局部战争的路易·波拿巴还不敢向瑞士提出挑战的时候做到。英国政府既已正式插手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再后退了。^②因此，“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就异常卖力地来把水搅浑，而把允许法军通过中立地区说成是瑞士应当使用的权利，说成是对奥地利的英勇示威。须知，他毕竟从卡提利纳—舍尔瓦尔手中拯救了瑞士啊！

福格特一方面加大力度重复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中对覬觎莱茵河疆界之说所提出的抗议，另一方面却避免对同一些小册子里所说的放弃萨瓦和尼斯作出哪怕是些微暗示。在他的《研究》中，

① 福格特别攻击《人民报》曾试图使“联邦同一些强大的邻国发生冲突”。当萨瓦实际上已被兼并的时候，波拿巴派的报纸《瑞士联邦报》攻击官方的《联邦报》，说“它对萨瓦和法国的看法是下列政策的微弱余音，这种政策从1848年起就力图把瑞士卷入欧洲的斗争中去”（见1860年3月12日伯尔尼《联邦报》第71号）。我们看到，在波拿巴主义者笔下，这类词句早就备齐了。

② 如果联邦军队占领了这些省份（沙布莱和福西尼）……那么，毫无疑问，它们直到此刻还会驻扎在那里。（劳·奥利芬特《普选权和拿破仑第三》1860年伦敦版第20页）

萨瓦和尼斯这两个名称甚至连提都没有提一下。可是,在1859年2月,萨瓦在都灵的代表,就已经抗议过意大利战争,因为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萨瓦是同法国结盟的代价。这一抗议从未钻到福格特的耳朵里去。这正像其他所有流亡者都熟知的、路易·波拿巴和加富尔于1858年8月在普隆比耶尔所达成的协议(发表在《人民报》头几期的某一期上)^①,没有钻到他的耳朵里去一样。马志尼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一期《思想和行动》(1859年5月2—16日)中,的确曾经预言过:

“但是,如果奥地利在战争一开始就遭到失败,因而提出它在1848年某一时期曾向英国政府提出过的那些建议,即保有威尼斯而让出伦巴第,那时和约将被接受。那时,只有下列条件会得到实现,即扩大撒丁王国并把萨瓦和尼斯让给法国。”^②

马志尼发表他的预言是在1859年5月中,福格特出版他的《研究》的第二版是在1859年6月中,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萨瓦和尼斯。还在马志尼以前,也在萨瓦的代表以前,早在1858年10月,即在普隆比耶尔密谋之后一个半月,瑞士联邦主席专门用急件通知英国内阁说:

“他有理由认为,路易·波拿巴和加富尔已签订了关于割让萨瓦的一项有

① 马克思在这里援用发表在1859年6月4日《人民报》第5期上的《马志尼和波拿巴老爷》一文。——编者注

② 《Ma dove l'Austria, disfatta in sulle prime, affacciasse proposte eguali, a quelle ch'essa affaciò per breve tempo nel 1848 al Governo Inglese, abbandono della Lombardia a patto di serbare il Veneto, la pace... sarebbe accettata: le sole condizioni dell'ingrandimento della Monarchia Sarda e della cessione della Savoia e di Nizza alla Francia, riceverebbero esecuzione.》

条件的协定。”^①

1859年6月初,联邦主席又把担心萨瓦和尼斯行将被兼并一事通知英国驻伯尔尼代办。^②不论是萨瓦代表的抗议,也不论是马志尼的揭露,还是瑞士联邦政府从1858年10月到1859年6月这一时期的担心,这些消息一点儿也没有传到福格特这位瑞士的职业救星的耳朵里去。我们以后会看到,甚至在1860年3月,当关于普隆比耶尔的秘密已为欧洲家喻户晓时,不知怎么福格特先生对此仍然一无所知。《研究》之所以选用了“沉默是奴隶的美德”^③这一格言,也许是由于它对迫在眉睫的兼并默不作声。但在《研究》中仍然有这样一个暗示:

福格特说:“可是,就假定发生了那难以置信的事情,胜利的代价要付出意大利的土地,不论是南部的或北部的土地……说实在的,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出发……可以真诚地希望法国狼的牙齿间得到一根意大利的骨头。”(同上,第129、130页)

意大利北部的土地,自然指的是尼斯和萨瓦。在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从纯瑞士的立场出发”(同上,第39页)号召瑞士由于与路易·波拿巴为邻“感到无比喜悦”之后,流亡的帝国摄政突然想起了:“说实在的,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出发”,他

① 马姆兹伯里勋爵在他的上述发言中这样说:“目前,在外交部有一份急件,注明的日期远在1858年10月……它是由瑞士共和国主席发来的,急件中说,他有理由认为,法国皇帝和加富尔伯爵已签订了关于萨瓦的一项有条件的协定。”

② 见《关于拟议中的萨瓦等地的兼并》第1部蓝皮书文件第1号。

③ 这里套用了海涅《旅途景色》第4部《意大利》第3章《卢卡城》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可以真诚地希望”法国狼的“牙齿间得到”尼斯和萨瓦“这块骨头”，从而得到瑞士法语区。^①

不久以前，巴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拿破仑第三》^②，不是《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或者《拿破仑第三和罗马尼亚问题》，也不是《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而是《拿破仑第三》，干脆就是拿破仑第三。这是拿破仑第三用夸张的口吻写给拿破仑第三的一篇颂词。这本小册子由一个名叫达-达的阿拉伯人译成他的母语。在该小册子的跋中，这位自鸣得意的达-达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火热的诗句跃然纸上。但在序言中，达-达还是够清醒的，承认他的著作是奉阿尔及尔地方当局之命发表，用来在阿尔及利亚国境那边的当地阿拉伯部落中间散发，以便使“在一个共同领袖领导下的统一理想和民族理想充满他们的想像”。这位要建立“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共同领袖，——

① 福格特的愿望是：“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出发”，把意大利的“骨头”塞进“法国狼”的喉咙里去，使狼苦于消化不良。这种愿望无疑将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实现。1860年10月15日的半官方杂志《现代评论》——附带提一下，这家杂志是专门庇护福格特的，——登载一篇10月8日发自都灵的通讯，其中写道：“热那亚和撒丁会成为争取意大利统一的一场新的〈法国的〉战争的合法代价。我补充说，占有热那亚会成为我们对半岛产生影响的必要工具，会成为防止由我们协助建立的海上强国有朝一日溜出我们的同盟而加入某个新同盟的惟一有效手段。只有把膝盖顶住意大利的咽喉，我们才能保证赢得它的忠心。奥地利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好裁判，它对这一点了如指掌。我们的压力没有奥地利那样粗暴，但是比它有力——这是惟一的区别。”

② 阿·德·拉盖罗尼埃《皇帝拿破仑第三的政治画像》，由达-达·路西德译成阿拉伯文，1860年巴黎版。——编者注

像达-达所透露的，——不是别人，正是“慈善的太阳、苍穹的荣誉——皇帝拿破仑第三”。福格特不是别人，正是德国的达-达，虽然他写的不是诗^①。

达-达·福格特把由慈善的太阳和苍穹的荣誉放射出来的《通报》上的文章、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和改绘的欧洲地图转述成德文，就称之为《研究》，这真是妙趣横生，在他快乐的生涯中还从未有过这样的风趣，这甚至比帝国摄政、帝国酒鬼以及他本人发明的帝国出境护照都更巧妙。这位“有教养的”德国市民在《研究》中谈到了奥地利因埃及而同英国争斗，奥地利同普鲁士在欧洲以外的土地上争吵，拿破仑第一强迫英格兰银行把它的黄金过秤，而不是点数，希腊人和法纳尔人是不同的种族，从塞尼山有一条陆路经过费内斯特雷莱通往施图拉河谷等等；而他把诸如此类的“研究”居然当真地看成是研究，这只是证明了：在反动的十年中，这位市民的自由主义脑壳上受到了什么样的高压。

奇怪的是，当埃德蒙·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1860年的普鲁士》（最初叫《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中，以智者的谨慎把达-达编纂的东西又译回法文时，同一位自由主义的德国懒汉，即欢迎把十二月帮的原著小册子译成福格特的非常夸张的德文译本的那位德国人，竟发疯似地从自己的安乐椅上跳了起来。顺便提一下，这只波拿巴主义的吱吱喳喳的喜鹊并未失去狡诈。例如，为要证明波拿巴同情德国，阿布指出，十二月政变帝国把达-达·福格特同洪堡等量齐观，

① 文字游戏：这句话的原文 *ungereimt schreiben* 意思是“无韵脚的写作”，即写的不是诗，同时也有写“胡说八道的东西”、“荒诞无稽的东西”等意思。——编者注

就像把拉萨里略-哈克兰德尔同歌德等量齐观一样。无论如何,福格特-哈克兰德尔的这种搭配,表现出阿布的研究比德国的达-达的《研究》更为深刻。

九

代 理 机 构

“因此，人人都必须参加战斗。
在这充满恐惧的时刻，
……伯尔尼的州官
则必须从这里撤走。”

（《哀诉》）^①

在达-达·福格特极其俏皮地注明日期是4月1日，即1859年4月1日的一个纲领中，他呼吁不同色彩的民主主义者为将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撰稿，这家报纸的任务是宣传他的《研究》一书中的十二月帮亲俄观点。纲领在拟定的时候自然经过深思熟虑，但是马脚还是穿过吸墨纸封皮不时露了出来。不过我们并不打算谈这个问题。

① 与此相反，**哈特曼**在《伊威恩》中显然为了暗示州官同伯尔尼的笨伯们意见分歧，而让他说了如下的话：

“纵然把我称为伯尔尼人，
我在那里也毫无所求。”

但是，不要把这个**哈特曼**同福格特的朋友，那位同姓的、柔情的、议会的软体动物混为一谈。²⁵⁶

在纲领的末尾,福格特请求他的收信人推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些人“愿意用同样精神为向他们敞开的报刊撰稿”。在洛桑盛会上,福格特宣称他已草拟了一个纲领,准备邀请

“愿意遵照这个纲领,按适当稿酬在供他们支配的报刊上撰稿的那些人”(《盛会等等》第17页)。

最后,在给勒宁博士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能否帮助我同一些能从法兰克福用这种精神来影响报刊的人们取得联系?如果他们文章校样给我寄来,我愿意对他们的文章稿酬从优。”(“主要著作”,文件,第36页)

· 纲领中的“志同道合的人”在洛桑盛会上变成了“那些人”,而“那些人”在给勒宁博士的信中又变成了“人们”,直截了当的人们。德国报刊的总财务员和总检查员福格特“所支配的基金”(同上,第36页),不仅用来支付“报刊上”文章的稿费,而且用来支付“小册子”(同上)的稿费。显而易见,处于这种地位的代理机构需要相当可观的“基金”。

“他向德国所有领主
分头派出使者,
一面向他们哭穷,
一面向他们提供黄金。”

(《帝国大事记》)257

但是,要那些人对报刊和小册子“施加影响”并把文章给福格特“寄来”,由福格特付给“从优的”稿酬,其目的究竟何在呢?“这涉及意大利”,仅此而已;因为,要使莱茵河沿岸摆脱危险,福格特先生“认为最好让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流尽鲜血”(同上,第34页,纲领)。

不,“这不涉及意大利”(给勒宁博士的信,同上,第36页)。“这涉及匈牙利”(给N城的H先生的信,同上)。不,这不涉及匈牙利。“这涉及……我不能讲的事情”(同上,文件,第36页)。

同上面涉及的事情一样,雄厚“基金”的来源也是矛盾百出的。它来自“瑞士法语区的一个偏僻角落”(“主要著作”第210页)。不,“来自西方的匈牙利妇女们”(《致卡尔·布林德》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第44号附刊)。恰恰相反,来自“德国的,特别是奥地利的警察辖区的”男人(《盛会》第17页)。他那基金的数目,同基金的目的和来源一样,也是变幻莫测的。这是“几个法郎”(“主要著作”第210页)。这是“不大的一笔基金”(《盛会》第17页)。基金足以向所有愿意福格特式地为德国报刊撰稿和写小册子的人付出优厚稿酬。最后,连筹集基金的方式也是含糊不清的。基金是福格特“千辛万苦地积攒起来的”(“主要著作”第210页)。不,是“提供他支配的”(同上,文件,第36页)。

这位“圆满的人物”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用金钱或别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违背他的信念,就是收买。”(同上,第217页)

因此,一个人的信念如果允许他出卖自己,那么这个人是不可能被收买的,而信念与此相矛盾的人也不可能被收买。例如,如果巴黎内阁的外国报刊处愿意以半价、半价的半价、甚至免费向瑞士报刊提供价值250法郎的巴黎的日报《石印通讯》,并提请“善意的编辑部”注意,他们一定还会以递增的比例“按成绩”每月领取50、100或150法郎的现金补贴,那这决不能说是收买。那些本身的信念同每天的《通讯》和每月的津贴相矛盾的编辑部,接受《通讯》和收受津贴并不是被强迫的。难道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或拉盖罗尼埃、或阿

布、或格朗吉约、或比利埃、或《世纪报》的茹尔当、或《立宪主义者报》的马丁和博尼法斯、或罗舍·达-达·阿尔伯特，是“被收买”的吗？难道在这些先生们的一生中有过什么得到报酬的言行是同他们的信念矛盾的吗？例如，福格特曾把几百本他的《研究》免费供给一家过去与他为敌的瑞士报纸的代理人，难道这就是收买吗？福格特邀请政论家依照自己的信念在供他们支配的报刊上撰稿，而由卡尔·福格特先生在日内瓦的机构支付稿费，无论如何，这种邀请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情况是一家报纸付给自己的撰稿人稿费，另一种情况是某个第三者用来历不明的钱秘密津贴一些同他毫无关系的报纸的通讯员，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报刊的通讯员，福格特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这种混乱证明，德国的达-达多么深刻地“领会”了十二月二日的道德。

男孩坐在泉源边^①。但他坐在什么样的泉源边呢？

后来在日内瓦出版的，不是福格特原计划的《新瑞士》周刊，而是达-达多年的朋友奥·布拉斯先生创办的《新瑞士报》。在一个清凉的11月的早上，布拉斯先生让整个日内瓦大吃一惊，他宣称，他“在给福格特的信中，拒绝了福格特想摆在他面前的法国食槽”。

同时他还宣称，他准备为这一指控负法律责任（1859年11月12日《新瑞士报》）。这只公鸡，或者更确切些说，这只阉鸡，以前一直啼叫得很欢，而一旦在自己拉的粪堆上被撕扯得羽毛乱飞之后，就再也不吭气了。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这

^① 引自席勒的诗《小溪边的男孩》。“坐在泉源边”作为习用语表示有门路的意思。——编者注

次就恰恰在日内瓦,被他的一个“著名的”朋友公开指责为企图用法国金钱进行收买。而这个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却默不作声。

不要设想福格特会摆出一副高傲的架势,而对《新瑞士报》置之不理。如上所述,对他的指控发表在1859年11月12日的该报上。此后不久,这同一家报纸又发表了一篇对普隆-普隆的辛辣的评述,而日内瓦独裁者詹姆斯·法济的机关报《日内瓦评论》立即在一篇占四栏篇幅的社论中提出抗议(1859年12月6日的《日内瓦评论》)。该报是“au nom du radicalisme genevois”,“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提出抗议的。詹姆斯·法济本人对《新瑞士报》也这样看重。从《日内瓦评论》的四栏社论中,不难看出福格特也助了一臂之力。社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替布拉斯本人辩白;说他不是攻击普隆-普隆的主谋,而只是受了蒙蔽。按照纯福格特式的手法,把犯罪构成推诿给莱·黑弗纳尔,福格特在“主要著作”(第188页)中也曾怀疑过这个黑弗纳尔,说他写作“皇帝与拿破仑亲王的令人作呕的私人丑史”;社论中也少不了在福格特那里照例必有的暗示,即“臭名远扬的巴登前少尉克洛斯曼”是《总汇报》驻伯尔尼的通讯员(参看“主要著作”第198页)。现在我们稍微谈一谈主子和奴才——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为了挽回普隆-普隆的名誉,“以日内瓦激进派的名义”于1859年12月6日在《日内瓦评论》上发表的抗议。

布拉斯被指控企图“以侮辱波拿巴王室的一位亲王来加强他那德国人对法国的看法”。在日内瓦,大家早就知道,普隆-普隆是一个纯而又纯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流放期间曾洁身自好,拒绝“扮演斯图加特宫廷甚至彼得堡宫廷内的角色”。说他想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小小的王权,比如像《新瑞士报》上刊登的那篇侮辱性文章所指称的,一个伊特鲁里亚王国,是再可笑不过的。

“拿破仑亲王坚信自己的天才和禀赋，他根本不把这些可怜的小王位放在眼里。”

他宁愿在法国，“这个高度文明和普遍首创精神的中心”，在他的德高望重的堂兄左右，“以亲王公民的身份”扮演波扎侯爵的角色。“不管别人怎么说，他的堂兄是尊重他、喜欢他的。”这位亲王不仅是波拿巴的波扎侯爵，他还是意大利、瑞士，一句话，各民族的“大公无私的朋友”。

“拿破仑亲王同皇帝一样，是一位大国民经济学家……如果政治经济学的健全原理有朝一日在法国取得胜利，那么，毫无疑问，拿破仑亲王也是功劳非小。”

他过去和现在都是“毫无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拥护者”，任何预防性的警察措施的反对者，“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广义的自由思想”的体现者。如果他发现皇帝的耳朵因为受到坏人的包围听不进他这个埃吉丽亚的声音，那你就体面地引退而“面无愠色”。这无非是“他的功勋引起了欧洲对他诽谤攻击”。

“法国的敌人害怕他，因为他依靠欧洲人民革命的支持，力图把欧洲人民的独立和自由归还欧洲人民。”

总之，未经公认的天才、波扎侯爵、埃吉丽亚、国民经济学家、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纯而又纯的民主主义者，并且——这会是可能的吗？——普隆-普隆“habile comme général et brave comme tout officier français”（干练如将军，勇敢如任何一个法国军官）。

“他在东方战争中的阿利马河会战之时和会战之后，都证明了这一点。”而在意大利战争中，“他出色地组织了一个5万人的军团（著名的旅行团，我几乎说成芭蕾舞团），并且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艰苦的山地行军，而他的军队一点也没

有感到供应不足”。

大家知道，在克里木的法国兵把害怕炮击叫做“普隆-普隆病”，而且很可能只是由于食品越来越缺乏，普隆-普隆才离开了这个半岛²⁵⁸。

《日内瓦评论》最后得意扬扬地说：“我们介绍了他（即普隆-普隆）是怎样一个人。”

乌拉，普隆-普隆将军！

因此，如果福格特说他的军费得自“民主主义者之手”，那是不足为奇的。普隆-普隆，这位红色亲王，是福格特和法济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民主派的具有魔力的亲王。福格特除了从普隆-普隆手中得到钱以外，不可能从更为纯粹的民主主义者手中得到钱了。即使有一部分钱是由普隆-普隆的德高望重的堂兄直接给科苏特先生的，然后经匈牙利人之手落到福格特手里，那么这“来源”仍然是“骇人听闻的”^①。但来自普隆-普隆之手，那就另当别论了！就算福格特在诺因堡冲突期间从克拉普卡的女友卡^②伯爵夫人那里得来的那些钱，也许是更娇嫩的手给的，但不是更纯粹的、更民主主义的手给的。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说：普隆-普隆像海利奥加巴尔一样好色，像伊万三世一样怯懦，又像真波拿巴一样虚伪。^③普隆-普隆干的最糟糕的事，就是把他的堂兄当作严肃的人。维克多·雨果关于路易·波拿巴还可以说：并非每一个想成为

① 套用福格特的话。——编者注

② 卡罗伊。——编者注

③ 维·雨果《小拿破仑》。——编者注

怪物的人都能成为怪物^①，但自从路易·波拿巴创造出普隆-普隆以后，皇帝的雅努斯脑袋的两面就成为：土伊勒里宫的那个人集中了事业的一面，罗亚尔宫的那个人集中了小丑的一面。这个假波拿巴，是他伯父的侄子而不是他父亲的儿子²³⁸，在这个真波拿巴面前倒显得是真的了；因此，法国人总要说：另一个更可靠些。普隆-普隆同时是衰落帝国¹⁸¹的唐·吉诃德和休迪布腊斯。哈姆雷特忧心忡忡地感到，亚历山大的遗骸大概注定要成为啤酒桶的塞子^②。假如哈姆雷特看到，拿破仑腐烂了的脑袋长到普隆-普隆的肩膀上，他会说些什么呢！^③

虽然福格特的军费的主要基金“来自法国食槽”，但是，为了掩盖这个食槽，他当然可以向他那帮多少有些民主主义情绪的朋友收集“几个法郎”来摆摆样子。这样，他的基金的来源、数量和收集方法等诸方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福格特的代理活动不仅限于《研究》、《纲领》和招募局方面。在洛桑“盛会”上，他向在瑞士的德国工人宣布了路·波拿巴解放各民族的使命，自然，这时他的观点比他替德国自由主义庸人写的《研究》更为激进。一方面福格特在《研究》中通过深入钻研“物质和力”¹⁴⁴的关系，得到了这样的信念：不能设想“现存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是可以动摇和瓦解的”（《研究》前言第7页），并且特别向“德国资产者”

① 维·雨果《小拿破仑》。——编者注

② 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5幕第1场。——编者注

③ 正如福格特所说的，早在1852年他就该同普隆-普隆一起作一次探险旅行（巴克科斯的出游？），一个“蒲鲁东主义者”热情地把福格特介绍给普隆-普隆，因为福格特“超乎人力所及”²⁵⁹“对自然历史作了惊人研究”（“主要著作”，文件，第24页）。

(同上,第128页)呼吁,要他们“铭记在心”:波拿巴“解放”意大利将会防止德国发生“革命”,而同时他又回过来教训德国工人:“奥地利是他们〈德意志各邦君主〉继续存在的惟一支柱”(《盛会》第11页)。

他说:“我刚刚对你们说过,对其他国家来说,德国并不存在,还需要把它建立起来,而且我相信,德国只能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联邦共和国。”(同上,第10页)。

这些话是他在(1859年)6月26日说的,可就在6月6日,他在《研究》第二版跋中还恳求过普鲁士摄政王^①,用武力和王朝内战迫使德国臣服于霍亨索伦王室。用武力实现君主集权,当然是建成一个“像瑞士联邦那样的”联邦共和国的最简便办法。接着,他还发挥了关于“外部敌人”(法国)的理论,认为德国必须追随外部敌人,以对付“内部敌人”(奥地利)。

他喊道:“如果我必须在魔鬼〈哈布斯堡〉和魔鬼的祖母〈路易·波拿巴〉之间选择,我会选择后者;因为她是个老太婆,就会死去。”

但是,福格特觉得,借口敌视奥地利,直接号召德国投入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的怀抱,未免太损害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名誉了,因此在刊印的演说中,他把这个号召作了如下修改:

“如果问题是要在魔鬼和魔鬼的祖母之间的斗争中表明立场,那我们认为最好是两者互相歼灭、互相吞掉,这样我们就省事了。”(《盛会》第13页)

最后,虽然福格特在《研究》中把路易·波拿巴吹捧为农民和士

① 普鲁士的威廉。——编者注

兵的皇帝，可是这次他却对工人听众说，

“恰恰是绝大多数的巴黎工人目前都已经”被争取到“路易·波拿巴方面”。

照法国工人看来，

“路易·波拿巴正在做共和国所应当做的一切，他给无产者以工作，使资产者破产，等等”（《盛会》第9页）。

总之，路易·波拿巴是工人专政者，而且由福格特把他当作工人专政者向瑞士的德国工人吹嘘，不过，这位福格特仅仅为了“工人专政”这一字眼，便在“主要著作”中带着资产者的义愤大发雷霆。

巴黎纲领为在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规定了在萨瓦兼并问题上的行动计划。这个纲领包括三点：（1）对于危险在即的谣言尽可能长久地完全置之不理，必要时把它说成是奥地利的捏造了事；（2）在较后的阶段，散布一种路易·波拿巴想把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的看法；最后，（3）在兼并实现以后，则把兼并作为要求瑞士同法国结盟的借口，即作为要求瑞士自愿接受波拿巴保护的借口。我们还将看到，主子和奴才，詹姆斯·法济和卡尔·福格特，日内瓦的独裁者和受他庇护的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多么忠实地执行了这个纲领。

我们已经知道，福格特在《研究》中绝口不谈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要为之策划战争的那种观念。在洛桑盛会上，在国民院²⁵¹里，在席勒和罗伯特·勃鲁姆纪念会上，在比尔“推销员”上，最后在“主要著作”里，都表现了同样的沉默。但是，这种“观念”甚至比普隆比耶尔密谋产生得还要早。早在1851年12月，政变后不几天，在《萨瓦爱国者》上就可以读到：

“爱丽舍宫前厅里已经在分配萨瓦的官职。它的报纸甚至以此开心取乐。”^①

1851年12月6日,法济先生就已经看出,日内瓦将落入十二月政变帝国之手。^②

1859年7月1日,当时的瑞士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同英国驻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进行了一次谈话。他重申了自己的忧虑:一旦撒丁扩张在意大利的统治,萨瓦被法国兼并则是铁定的。他强调指出,特别是北萨瓦的被兼并将使瑞士的一个侧翼完全**暴露**,并且很快就会导致日内瓦的丧失(见第一部蓝皮书《关于拟议中的萨瓦和尼斯的兼并》,No. I)。哈里斯把这一点报告给马姆兹伯里,后者则委托巴黎的考莱勋爵要求瓦列夫斯基说明皇帝的意图。瓦列夫斯基毫不否认

“法国同撒丁不止一次地商谈过兼并的问题,皇帝的意见是,如果撒丁扩展成一个意大利王国,那就有理由期望它向法国作出领土上的让步”(同上, No. II)。

瓦列夫斯基答复的日期是1859年7月4日,也就是在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⁴以前。1859年8月,巴黎出版了佩泰坦的小册子^③,其中让欧洲对兼并萨瓦一事有思想准备。也在这个8月,在瑞士国民议会的夏季会议结束后,福格特先生潜入巴黎,听取普隆-普隆的指示。为了掩饰这次旅行,他让他的同谋拉尼克尔一伙人在日内瓦

① 《On se partage déjà les places... de la Savoie dans les antichambres de l'Élysée. Ses journaux plaisantent même assez agréablement là-dessus.》

② “这位图尔高公民,我们曾经很好地保护过他,使他不受路易-菲力浦的威胁,他或许会大献殷勤地出来充当中间人,以便把日内瓦从我们手里再次拿走。”(1851年12月6日《日内瓦评论》)

③ 昂·佩泰坦《论萨瓦的被兼并》1859年巴黎版。——编者注

散布谣言,说什么他到四森林州湖休养去了。

“巴黎住了好几天,
聪明没有长一点,
狼吞虎咽功夫现……
笨伯一个山羊一头,
来到巴黎原形毕露。”^①

1859年9月,瑞士联邦委员会看到兼并的危险日益迫近(同上, No. VI);11月12日,委员会决定向各大国提交一份备忘录,说明这种看法,11月18日,施坦普弗利主席和席斯总理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送交一份正式照会(同上, No. IX)。10月,詹姆斯·法济从托斯卡纳回来,他这趟奔走一无所获,为普隆-普隆的伊特鲁里亚王国进行的活动纯属徒劳。回来后,他又像往常那样,装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大骂兼并是谣言,说什么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撒丁,都没有人想到兼并的事。随着危险的日益迫近,《日内瓦评论》的信任也日益增长,1859年11月和12月,该报对拿破仑后裔的膜拜(参看前面引证过的关于普隆-普隆的文章)达到了柯利班式的狂热劲头。

1860年,兼并的交易进入第二阶段。

置之不理和矢口否认已经不再符合十二月帮的利益了。现在,已经到了引诱瑞士听任兼并,让它陷入尴尬境地的时候了。这时必须实行土伊勒里宫纲领的第二点,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大声宣扬准备把中立地区送给瑞士。在这件事情上,瑞士的十二月分子们当然会得到巴黎同时玩弄的权术的支持。例如,1860年1月初,内务部

^① 乌·博内留斯《宝石》中的一篇寓言《一个博学的傻神父的故事》。——编者注

长巴罗什向瑞士公使凯伦博士宣称，

“如果萨瓦的占有发生变化，根据 1815 年条约，同时也应该让给瑞士一条良好的防线。”（见上述蓝皮书，No. XIII）

在 1860 年 2 月 2 日，即图沃奈尔向英国公使考莱勋爵声称“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那天，图沃奈尔还告诉考莱：

“法国政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沙布莱和福西尼永远归属于瑞士是理所当然的。”（同上，No. XXVIII）

散布这种幻想的目的，不仅是要引诱瑞士听任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萨瓦，而且要削弱它以后抗议兼并的效力，败坏它的名誉，让欧洲人认为它是十二月政策的同谋者，虽然是受骗的同谋者。1860 年上任的联邦主席弗雷-埃罗塞并没有上圈套，反而向哈里斯上尉声称，他对于把中立地区划归瑞士的所谓好处表示怀疑。哈里斯也从自己方面对联邦政府提出警告，要它当心波拿巴主义的阴谋，以便

“瑞士不要因此也好像是一个具有兼并野心并力图扩张领土的国家”（同上，No. XV）。

与此相反，英国驻都灵公使詹姆斯·赫德森爵士在同加富尔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后，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瑞士也渴望兼并萨瓦的部分土地。因此，不要给自己制造任何幻想，如果法国由于有兼并野心而受到谴责，那么瑞士也有同样的罪过……既然这个问题被这种双重攻击弄得复杂化了，撒丁的态度倒是可以谅解的。”（同上，No. XXXIV）

最后，路易·波拿巴一撕掉假面具，图沃奈尔也就毫无顾忌地透露了瑞士兼并中立地区这句口号的秘密。他在给法国驻伯尔尼代办

的急电中,公开嘲笑瑞士对法国兼并萨瓦的抗议。根据什么来嘲笑呢?根据巴黎强加给瑞士的“瓜分萨瓦的计划”(见1860年3月17日图沃奈尔的急电)。

在这期间,瑞士的十二月代理人是怎样参与编织这张欺骗的罗网的呢?1860年1月,詹姆斯·法济最先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表示:沙布莱和福西尼之划归瑞士,并不是路易·波拿巴的承诺,而是瑞士和中立地区居民自己的愿望(同上, No. XXIII)。福格特在这以前从未想到过法国可能兼并萨瓦,这时却突然充满预言家的灵感了,而《泰晤士报》自创刊以来从未提到过福格特的名字,也突然在注明日期为1月30日的一篇通讯中报道:

“瑞士教授福格特声称,他知道,如果共和国的联邦委员会把辛普朗让给法国自由使用,法国准备使福西尼、沙布莱和热内瓦山等萨瓦的中立地区归属瑞士。”(1860年2月3日《泰晤士报》)

不仅如此!1860年1月底,詹姆斯·法济向英国驻伯尔尼代办保证说,加富尔(两个月前他曾经同这个人在日内瓦作过长谈)坚决反对向法国作出任何领土上的让步(见上述蓝皮书, No. XXXIII)。可是,当法济向英国担保加富尔的时候,加富尔却说法济有兼并野心,以便在英国面前开脱自己(同上, No. XXXIV)。最后,瑞士驻都灵公使图尔特在1860年2月9日还特意去找英国公使赫德森,向他保证,

“在撒丁同法国之间决不存在关于将萨瓦转让给法国的协议,撒丁根本不同意同法国交换萨瓦或把萨瓦转让给法国”(同上)。

但是决定性的时刻迫近了。1860年1月25日,巴黎《祖国报》在一篇标题为《萨瓦的愿望》的文章中已在为兼并萨瓦制造舆论。在

该报1月27日的另一篇文章中,即用十二月帮¹⁰¹风格写的《尼斯伯爵领地》一文中,已经露出将要兼并尼斯的阴影。1860年2月2日,图沃奈尔向英国公使考莱通报说,法国同撒丁在战前就已达成有关“可能”兼并萨瓦和尼斯的协议。但是,关于法国实际决定兼并萨瓦和尼斯的正式照会,在2月5日才提交考莱勋爵(见1860年4月23日考莱勋爵在上院的演说),2月6日才提交凯伦博士,并且向这两个人——英国和瑞士的公使明确声明,中立地区要划归瑞士。在这些正式声明以前,詹姆斯·法济就已经从土伊勒里宫获悉,撒丁已经根据秘密条约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条约中没有任何有利于瑞士的条款。在图沃奈尔向考莱勋爵和凯伦博士正式声明以前,法济就得把帝国的药丸裹上糖衣给他的日内瓦臣民服用。因此,2月3日,法济让他的驯服工具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国民俱乐部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而他则装做是偶然出席这次大会的,因为:

“他刚才听说(je viens d'entendre),大家正在谈论法国同撒丁签定割让萨瓦的条约。遗憾的是,撒丁政府已于1月27日在这样的条约上签了字;但是还不应根据这个确定的事实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安全真正受到威胁……固然,关于我们对撒丁的中立地区的权利问题,条约中并没有任何书面的保留条件;但是,我们不知道在缔约双方的心目中是否也不存在这样的保留条件……这种条件可以看做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包含在内(sous-entendue comme allant de soi)……我们万不可过早地表示不信任……我们应〈对政变帝国〉保持同情……我们应当克制,不发表任何含有敌意的言论。”(见法济的“充满信任的”演说,这是一篇蛊惑人心的杰作,载于1860年2月4日《日内瓦评论》)

英国驻伯尔尼代办认为法济的具有先知之高见的讲话十分重要,遂立即电告约翰·罗素勋爵。

关于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的正式条约,原定在1860年3月24日签订。所以,不能浪费一点时间。在正式宣布兼并萨瓦以前,

还必须正式证实一下日内瓦的十二月分子们的瑞士爱国心。因此,3月初,福格特先生在克拉普卡将军的陪同下(他可能是诚心诚意地)前往巴黎,以便对罗亚尔宫¹²⁴的埃吉丽亚、未经承认的天才普隆-普隆施加他的影响,并且当着整个瑞士,利用他个人的威望,促使中立地区划归瑞士。在普隆-普隆的豪华宴席上,——大家知道,在讲究饮食方面,普隆-普隆可以同鲁库鲁斯和康巴塞雷斯媲美,而且,如果布里亚-萨瓦兰能够死而复生,那他对普隆-普隆在这方面的天才、国民经济学、自由思想、统帅才能和个人勇敢,也会惊叹不已,——福斯泰夫-福格特作为“令人喜欢的交谈者”勇敢地大吃大喝一番之后,竟要求瑞士表现出勇敢来。(见他的巴黎通信,载于1860年3月8日比尔“推销员”附刊)瑞士应当让世人看到,

“它的民兵不仅仅是为了检阅和做士兵游戏才存在的”。“把中立地区割让给瑞士”是一种幻想。“把沙布莱和福西尼让给法国只是第一步,跟着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踩着民族和自然疆界这副高跷,可以从日内瓦湖走到阿尔河,最后走到博登湖和莱茵河,——只要两腿足够硬实。”

但是,福斯泰夫-福格特——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至今还不相信,法国大臣图沃奈尔本人在一个月以前已经正式透露的、而整个欧洲现在已尽人皆知的事情,即割让萨瓦和尼斯,早在1858年8月就已经在普隆比耶尔成了法国参与反对奥地利的交换条件了。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倒是现在才受神父的驱使违心地投入了沙文主义怀抱,并被迫夺取中立地区。

“显然”,——我们的陷入窘境的辩护人喃喃地说,——“显然,领导集团中有人寻找反对日益发展的教权主义运动的抗衡力量,并且认为在所谓的沙文主义中,即在除了取得某一小块(!)土地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愚顽不化的民族意识中找到了这种力量。”

福格特被普隆-普隆的厨房蒸汽熏陶,在比尔“推销员”上显示了这般勇气,以后从巴黎返回,不久又用同一个传声筒胡诌什么尼斯人对法国人绝对友好;由此,他同意大利民族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尼斯民族》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维吉齐-鲁斯卡拉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这位在普隆-普隆的宴席上扮演温克尔里德角色的英雄,到了在伯尔尼国民院发言的时候,他的耀武扬威的号声却一变而为外交式的笛奏:建议同这位一向同瑞士友好的皇帝平心静气地继续谈判,并特别坚决地警告不要同东方结成联盟。联邦主席弗雷-埃罗塞针对福格特说了某些出奇的话,另一方面,福格特也满意地看到,他的演说受到《沃州新闻》的赞扬。《沃州新闻》是布朗舍奈先生、德拉腊日阿兹先生和瓦特州的其他政治巨头们的机关报,一句话,瑞士西部铁路的机关报,就像《新苏黎世报》是苏黎世的波拿巴派和东北部铁路的机关报一样。在那次出名的奥朗铁路之争²⁶⁰中,有5位瓦特州的州政府成员多次受到反对方面报纸的指责,说他们每人从巴黎的动产信用公司⁵¹——瑞士西部铁路的主要股东那里得到1万法郎的股票(20股),而他们并未受到惩罚,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沃州新闻》的老板们是何等人物。

福格特在克拉普卡的陪同下去拜访罗亚尔宫的埃吉丽亚不几天以后,詹姆斯·法济也在约翰·佩里埃的陪同下去拜访土伊勒里宫⁵⁴的斯芬克斯。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喜欢斯芬克斯这个角色,他给自己的奥狄浦斯们发薪俸,就像过去的法国国王给自己的宫廷小丑发薪俸一样。在土伊勒里宫,法济置身于瑞士和斯芬克斯之间。如上所述,约翰·佩里埃是他的旅伴。这位约翰是自己的詹姆斯的影子;他所做的全是那个人所希望的,凡是那个人不希望的他就不做;他靠那个人活着也为那个人而活着,他通过那个人成了日内瓦大

会议议员，他替那个人安排酒宴和准备祝酒词，他是那个人的莱波雷洛和菲阿兰。他们俩回到日内瓦时，就瑞士的处境来说一事无成，但就法济本人地位受威胁来说，却成绩惊人。法济在公开发言中怒气冲冲地声称，他现在算是恍然大悟，今后他将痛恨路易·波拿巴，就像以前热爱他那样。共和主义者法济竟对一个扼杀过两个共和国的刽子手爱了9年，真也爱得古怪！法济以极深的造诣扮演一个受骗的爱国志士的角色，使整个日内瓦都沉浸在法济式的热情中，而失掉法济式的幻想几乎比失掉中立省份更令人感到痛苦。甚至多年来一直与他作对的贵族反对党的首领泰奥多尔·德·索绪尔也承认，对詹姆斯·法济的瑞士爱国热忱不能再有怀疑。

这位日内瓦的暴君，在当之无愧地接受了人民的欢呼之后，急忙上伯尔尼国民院去了。在他出发后不久，他的亲信，即他的巴黎旅伴，一句话，他自己的约翰·佩里埃，作了一次非常独特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²⁶¹。由法济的民主禁卫军——“干酪制造者”协会中挑选出来的一帮日内瓦醉鬼（至少伦敦的《泰晤士报》这样称呼他们），在佩里埃的率领下手无寸铁地坐船去托农，要在中立地区的这个点上举行一次反法示威。为什么举行这次示威或者为什么要举行这次示威，亚尔古船英雄们能否获得金羊毛，或是丢掉自己的小命，至今谁也不能断定，因为佩里埃的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既没有奥菲士陪伴，也没有阿波罗尼乌斯为之歌唱。显然，这不过是以约翰·佩里埃及其同伙为代表的瑞士，对中立地区作的一种象征性的占领。而真正的瑞士，却不得不由于约翰·佩里埃的象征性地占领托农，无休止地忙于外交上的道歉，向人保证忠诚和对该事表示愤慨，这样一来，当路易·波拿巴仅限于真正地占领托农和其他中立地区的时候，他倒还显得很慷慨大度了。

约翰·佩里埃在日内瓦被捕，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数千法郎。由于佩里埃的供词，副秘书长兼《日内瓦评论》编辑杜科曼先生也被逮捕。他是一个没有私产的青年，在上述两个职位上全都听命于州政府主席兼《评论》的老板詹姆斯·法济。他承认给过佩里埃钱，那是从为建立一支志愿军而设的基金中挪用的，而日内瓦的激进主义者直到如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笔基金。法院侦讯的结果是，首先释放了杜科曼，然后释放了佩里埃。

3月24日，维克多-艾曼努埃尔正式把尼斯和萨瓦连同中立地区割让给波拿巴。3月29—30日，同法济一起从巴黎回到日内瓦的约翰·佩里埃发动了他的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在这决定性关头，这种滑稽的示威恰好妨碍了一切严肃的示威。詹姆斯·法济在伯尔尼保证说：“他对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①莱蒂在前中立地区夸口说，如果瑞士人真要在这一手，他的皇帝会立即派3个师进驻日内瓦。最后，福格特丝毫不知道这次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的秘密，因为

① 由于北萨瓦被兼并以后，使人觉得日内瓦处在法国领土的包围中，加以法国在托农湾的设防，这就在近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大大加强了旧共和国反十二月帮的情绪。但是，在这种人民情绪真正爆发的同时，也出现了巴黎操纵的、部分为法国警察本身制造的假骚动。例如，在1860年9月22日的《星期六评论》上可以看到：“一个笨拙的宪兵由于过分热心公务，在托农拦住了一帮所谓的瑞士人，要求他们出示护照，这些所谓的瑞士人就粗暴地侮辱帝国。这些带着完全合格的证件的瑞士人原来是法国人……在这些人为的冲突中，最为严重的事实是，法济的一个亲信（朋友佩里埃），明显地卷入到一次最早的和最糟糕的冲突中。”（“The gravest fact relating to these artificial collisions is, that in one the earliest and the worst of them a close adherent of Mr. Fazy was prominently implicated.”）

在发生这事的前几天，他已预先向日内瓦警察局告密，说日内瓦有人策划在萨瓦边界发动一次冲突，——但是给警察局提供的线索是假的。关于这一点，我这里有流亡在日内瓦的福格特旧友给住在伦敦的一个流亡者的一封信可以说明。信里说：

“福格特散布谣言，说我不断地在瑞士西部和萨瓦之间窜来窜去，目的是要制造一次对瑞士不利而对敌视瑞士的国家有利的革命。这件事发生在佩里埃发动阴谋前不几天，这一阴谋，福格特肯定知道，而我却同您一样，毫无所知。显然，他企图嫁祸于我，糟蹋我。幸而他也向警察局长杜伊告发了我，杜伊把我叫去，当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时，我立即笑着打断他说：‘哈哈，这显然是福格特的阴谋！’，这使他吃惊非小。他让我详细地叙述我同福格特的关系。我的供述同时受到一个政府秘书的支持，这人是海尔维第²⁶²的成员，第二天他就到伯尔尼去参加中央会议，在那里他向福格特的弟弟表示他不满意卡尔的行为。古斯塔夫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从卡尔的信中早已看出卡尔搞的政治活动是什么。”

如果说最初的沉默和否认以及宣传信任路易·波拿巴，是为了转移瑞士对危险的注意力；如果说后来关于要把福西尼、沙布莱和热内瓦同瑞士合并的叫嚣，是要给法国兼并萨瓦造舆论；最后，如果说托农的滑稽剧，是要破坏一切真反抗；那么现在，按照巴黎纲领，业已真正发生的兼并和变得不容否认的危险，归根到底则应成为瑞士自愿缴械，即成为同十二月政变帝国¹⁹⁷结盟的动因。

这样微妙的任务只有詹姆斯·法济本人才能着手解决。他的仆从福格特可以提出警告，防止同东方的联盟，但是，只有法济本人才能够鼓吹同西方的联盟。他最初是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了这种联盟的必要性。1860年4月18日，日内瓦流传一封伦敦来信的摘要，其中谈到：

“请劝告我们有势力的同胞们，当心詹姆斯·法济可能向瑞士提出放弃自己的

中立的建议。这个主意很可能来自法国政府本身，詹姆斯·法济时至今日一直是它殷勤的代理人……现在他摆出一副善良的瑞士人的姿态抵制法国的计划，但是，一个一向消息灵通的人士向我保证说，这是个圈套。只要瑞士声明它既不愿、也不能继续恪守中立时，法国政府就会像第一帝国时期那样，采取行动迫使它结盟。”

法济让《日内瓦评论》对此作了回答：

“从萨瓦归并于法国的那天起，瑞士的中立就自行终止了，因此，法济的这种建议也就是多余的。”

3个月以后，即7月10日，詹姆斯·法济在瑞士国民院发表演说，他

“一面怒骂咆哮、握紧拳头，反对波拿巴主义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们（他指责他们是地下政府），一面走进了波拿巴主义阵营”。

因此，尽管他似乎极其粗暴地攻击了苏黎世—瓦特的公开亲法的政党，这个政党还是听任他随意叫嚣。

“欧洲，特别是德国，抛弃了瑞士。中立由此已不可能；瑞士必须寻找联盟，但是，到哪里去找呢？”

于是，这位老蛊惑家含糊其辞地提到了：

“近邻、近亲的法国，只要它认识到并改正了非正义的行为，或许仍会成为共和国，等等。但是，新政策不应由那些老不死的金融巨头和联邦的男爵来开创，而应当由海尔维第、由人民来实行。等着吧，即将举行的选举会教会你们如何行事。联邦军队在日内瓦极受欢迎。但是，如果他们的存在会使人对日内瓦现行政权机构产生丝毫的怀疑，那就让他们走开。日内瓦会自助、自卫的。”

于是，7月10日詹姆斯·法济便在国民院陈述了他4月18日

在《日内瓦评论》上暗示过的东西——“新政策”，瑞士同法国的联盟，也就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兼并瑞士。消息灵通的瑞士人士认为，揭开法济从土伊勒里宫回来后戴上的反波拿巴主义的假面具，为时尚早。但是，在玩弄故意信口开河的技巧方面，法济恰好达到了足以与帕麦斯顿媲美的高深造诣。

大家知道，声名狼藉的“地下政府”的代表们向国民院提交过一项对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因为他作为联邦主席，了解局势，一度作出过由联邦军队占领中立地区使其不受法国侵犯的正确决定。这项弹劾案被压倒多数否决，但其中并无福格特的一票。

当时有人从瑞士写信对我说：“对卡尔·福格特来说，他没有出席瑞士联邦院讨论对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的弹劾案，是很能说明他的为人的。福格特是日内瓦州的代表，而当这个州受到波拿巴的威胁时，他为形势所迫必须投票赞成坚决捍卫该州利益的施坦普弗利。此外，他本人同这个人有私交并且受过他的恩惠。福格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靠在伯尔尼州供职维持生活；他的另一个兄弟新近借施坦普弗利的帮助得到了待遇优厚的联邦一等统计员的职位。因此，福格特当然不可能在唱票表决的情况下出面去反对一位朋友、恩人和众望所归的人。另一方面，一位普隆-普隆主义者更不可能公开赞同与波拿巴主义的侵略进行殊死斗争的政策。所以，要溜掉并把脑袋藏起来，但是肥大的屁股仍然露在外面挨揍；现代福斯泰夫惯用的巧计和尘世的命运就是如此。”

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刺人字眼——“奥地利主义”，詹姆斯·法济在《日内瓦评论》上，他的仆从福格特在比尔“推销员”、《研究》和“主要著作”等等上大声重复的这个字眼，终于反弹回来打到瑞士自己身上。大约在4月中旬，米兰的所有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告示：“拿破仑和瑞士之间的争执”。其中写道：

“看来，萨瓦对瑞士是一小块美味，因而瑞士在奥地利的怂恿下，急忙出来在一件仅仅同意大利和法国有关系的事情上阻碍拿破仑第三的计划……英国

和北方的一些大国,除奥地利外,丝毫不反对兼并萨瓦;只有瑞士,因为受到力图在撒丁的所有联合领地上制造不安和骚动的奥地利的煽动,才表示反对……瑞士是一个反常的国家,它不可能长期抗拒伟大的民族原则的冲击。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无法服从同一法规。如果瑞士知道这点,那它就该想到,在泰辛州人们讲的是福斯柯洛和朱斯蒂的语言,那它就不该忘记,瑞士相当大一部分人属于自称为法国人的那个伟大而慷慨的民族。”

看来,瑞士完全是奥地利的发明。

福格特本人在如此不遗余力地把瑞士从奥地利的魔爪中拯救出来的同时,还委托他的最亲密的同谋者之一、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喜欢充大的家伙——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现在是一家首饰工厂的老板)去拯救德国。在圣布莱斯“王冠”酒店中举行的诺因堡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授旗仪式上,致祝词者、“残阙”议会议员、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号召德国

“干脆让法国人通过莱茵,因为否则德国的情况就永远不会好转”。

参加授旗仪式的日内瓦工人协会的两个代表在新年(1860年)后回到日内瓦时,叙述了这件事。在他们的报告得到瑞士西部的其他一些协会的代表们的证实以后,日内瓦协会的领导机关分发了一个通告,要求大家警惕正在瑞士的德国工人中进行的波拿巴主义阴谋。

我不妨引用一下手头的一份备忘录:“回忆第一帝国,甚至那时就有些德国人竭力促使建立拿破仑的世界统治,希望这个巨大的帝国随着它的统治者的没落而灭亡,那时至少可以由法兰克帝国分崩离析的各省组成一个统一的德国,于是德国就能够较容易地为自己争得自由,——这就是所谓政治上的庸医:为了使活的躯体神奇地再生出健康血液,就把原有的血液放尽;此外,那些干脆否认一个伟大的民族有力量自助并拥有自决权的人遭到了谴责;最后还指出,德国期望的救世主刚刚在意大利表明,他所理解的民族解放是什

么，等等，等等。通告指出，它只是为那些目的良好而手段不当的德国人印发的；同时通告中声明拒绝同那些**卖身求荣的政论家和沽名钓誉的旧人物**发生联系。”

就在那时候，**海尔维第的机关报《阿尔高消息报》**抨击了这样的

“逻辑：应该让刺猬先跑到鼯鼠洞里，这样才便于抓住它并把它从洞里再甩出来；根据这种完美的逻辑，为了使莱奥尼达斯们出现，也就应该让埃菲阿尔特们为所欲为。有这么一位教授很像本末倒置的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这位公爵在骑士的马靴不想再理睬他以后，就想靠鞋会的‘鞋’¹¹⁶从流放地回到家乡；不过，这位教授同鞋搞坏了关系，因而就同马靴搞上了关系等等”。

对**福格特教授**先生的这种指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刊登在**海尔维第的机关报**上。可是，他却因此受到了**《希望报》**的更为热情的接待。**《希望报》**是法国国库出巨资于1859年在日内瓦创办的一家大型报纸。**《希望报》**的特殊性任务是宣传兼并萨瓦和莱茵区，一般性任务是颂扬路易·波拿巴解放各民族的救世主使命。在日内瓦尽人皆知，**福格特**是**《希望报》**编辑部的常客，是它的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我手头就有详细材料，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无可怀疑。**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所暗示的，以及他让他的同谋者、饶舌的士瓦本人、“**残阙**”议会议员、珠宝商人**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在诺因堡公开宣布的东西，在**《希望报》**上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例如，1860年3月25日那一期就这样说：

“如果德国爱国者把惟一的希望建立在对法战争上，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想去削弱那个国家的政府，阻止它形成自己的自然疆界呢？也许，德国人民根本不赞同这样仇恨法国吧？不管怎样，确实有一些极其真诚的德国爱国者，特别在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中间（即帝国的**福格特**、**拉尼克**、**埃斯林根的卡尔·迈尔**之流的人物），他们并不认为丧失莱茵河左岸是巨大的不幸；相反地，他们确信，只有在丧失这一地区之后，依靠同欧洲西部的联盟并同欧洲西部的

文明合为一体，复兴的德国的政治生活才会开始。”^①

《希望报》从福格特那里如此确切地了解到最进步的德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之后，就在5月30日的社论中宣称：

“莱茵河左岸的全民投票即将表明，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倾向于法国的。”

瑞士的讽刺性小报《波斯特伊里》此刻对《希望报》大加嘲弄，说它是匹“病弱的驽马”，除了必须驮着巴克科斯普隆-普隆的轻巧的月桂冠以外，还得载上他的锡仑的“沉重肚子”。

十二月帮的报刊策略是如何被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由下列事件可以看出。5月30日，日内瓦《希望报》让莱茵河左岸通过全民投票落入十二月政变的法国；5月31日，路易·茹尔当在巴黎《世纪报》上展开了兼并莱茵的阵地战，6月初，《北部各省和加来海峡通报》把自己的重炮对准了比利时。在日内瓦的喉舌发难前不久，埃德蒙·阿布在《民论报》上声明，撒丁的扩张迫使皇帝不得不“占领萨瓦……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他接着说，如果德国统一的努力

① 《Si la seule espérance des patriotes allemands est fondée sur une guerre avec la France, quelle raison peuvent-ils avoir de chercher à affaiblir le gouvernement de ce pays et l'empêcher de former ses frontières naturelles? Serait-il que le peuple en Allemagne est loin de partager cette haine de la France? Quoi qu'il en soit, il y a des patriotes allemands très sincères, et notamment parmi les démocrates les plus avancés, qui ne voient pas grand malheur dans la perte de la rive gauche du Rhin, qui sont, au contraire, convaincus que c'est après cette perte seulement que commencera la vie politique d'une Allemagne régénérée, appuyée sur l'alliance et se confondant avec la civilisation de l'Occident européen.》(L'Espérance, 25 Mars 1860.)

导致普鲁士的类似扩张，“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我们的安全并占领莱茵河左岸，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紧跟着这个轻率的关门人上场的是头行动迟缓的笨牛——《比利时独立报》的通讯员 AA，约瑟夫·普律多姆和坐镇土伊勒里宫的“天意”^①御用的皮蒂娅一类人物。不过，《希望报》对德国统一所表示的与众不同的欢欣鼓舞，对那些卖身给奥地利的反对十二月帮的德国人所作的愤怒揭露，竟达到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以致詹姆斯·法济不得不作某种外交上的考虑，加之他正打算把他的《日内瓦评论》改为《瑞士民族报》，便特意在《评论》上慷慨大度地宣布，不是奥地利人也可以反对波拿巴主义。

但是，卡尔·福格特——德国的达-达、为德国报刊设立的十二月帮招募局的老板、法济下属的代理人、罗亚尔宫的“令人喜欢的交谈者”、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拉尼克尔的“朋友”、比尔“推销员”的提词人、《希望报》的撰稿人、埃德蒙·阿布的门徒、《劳斯之歌》的歌手——堕落得还要深一层。在巴黎，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在《现代评论》上同爱德华·西蒙先生亲密合作。让我们来看看，《现代评论》是什么货色，爱德华·西蒙先生又是何等人物。

《现代评论》本来是十二月帮的官方杂志，是同《两大陆评论》尖锐对立的，后者的撰稿人是一些文笔优美的人，即《辩论日报》的一些人、奥尔良派⁴⁴、融合派²⁶³，特别是法兰西学院²⁶⁴教授和法兰西研究院²⁶⁵院士。既然无法把这些头面人物直接调给《现代评论》，那就得设法把他们调离《两大陆评论》，以这种迂回办法迫使他们为十二月帮的《评论》效劳。但是，这一策略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效果。《现代评

^① 指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论》的所有者甚至认为无法同拉盖罗尼埃先生强加于他们的编辑委员会共事。由于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人需要有发出各种声音的喉舌,所以《现代评论》变成了半官方的《评论》,而由拉盖罗尼埃强加的编辑委员会所编的《欧洲评论》则成了官方的《评论》。

现在来谈谈爱德华^①·西蒙先生。他的出身是莱茵普鲁士的犹太人,名叫爱德华^②·西蒙,但他总是扮无比滑稽的鬼脸,把自己装成地道的法国人;不幸得很,他的风格却时刻都在暴露出他是个译成法文的莱茵普鲁士的犹太人。

在席勒纪念会(1859年11月)以后不久,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那里碰到一个在巴黎住了多年的非常体面的商人,他详细叙述了巴黎的席勒纪念会¹¹⁰、席勒协会²⁶⁶等等。我插嘴问他,巴黎的德国协会和集会怎么同波拿巴的警察相包容?他含着幽默的微笑回答我说:

“自然,没有密探不出席的集会,没有密探不参加的团体。为了避免麻烦,我们采取了一个一劳永逸的简单策略,并且已经奏效——我们找来一个熟悉的密探,立刻把他选入委员会。在所有这类场合,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爱德华·西蒙最为合适。您知道,过去替拉马丁跑腿,替埃米尔·德·日拉丹写乏味文章的拉盖罗尼埃,现在成了皇帝的宠臣,皇帝的机要文书,同时又是法国书报总检查官。而爱德华·西蒙是拉盖罗尼埃的哈巴狗,而且(他特意皱了一下鼻子又补充说)是一只臭气熏天的野狗。爱德华·西蒙不想白白地工作——这您当然不会怪罪他——,他认为,他投靠十二月政变制度,就是对他本人和文明作出的无可估量的贡献。这是一个头脑简单、性格卑劣的家伙,但是在策划低级阴谋方面的能力并不差。拉盖罗尼埃已叫他的爱德华·西蒙也去撰写《祖国报》的社论。这就证明这位机要文书颇有谋略。《祖国报》的老板、银行家德拉马尔

① 原文为 Edouard。——编者注

② 原文为 Eduard。——编者注

是一个傲慢、固执、狂躁的暴发户，在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善于谄媚的奴才，他容不下任何人。我们的爱德华·西蒙，尽管他有毒鼠药，但能够像安哥拉猫那样温顺，因此适得其所。如您所知，《祖国报》在共和国时期是普瓦捷街²⁶⁷的最无耻的机关报之一。从十二月政变开始，它就同《国家报》和《立宪主义者报》争夺作为土伊勒里宫的半官方报纸的荣誉，从信号发出时起，它就在兼并的狂热中大显身手。您当然知道，有些乞丐为了从过路人那里骗取几个苏，就躺在街上装发羊痫风。《祖国报》确实享有获准首家报道萨瓦和尼斯将被兼并一事的荣誉。兼并刚一实现，该报就扩大了版面，因为，按德拉马尔先生所作的天真的解释：‘萨瓦和尼斯伯爵领地划归法国的必然结果是祖国^①的扩大’。谁都会由此想起巴黎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的戏谑，他在回答‘什么是祖国’这一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说：‘一家晚报’。一旦莱茵河各省也被兼并，《祖国报》和它的版面以及爱德华·西蒙的工资，还不知要扩大到什么地步呢！在国民经济学方面，《祖国报》认为废除交易所行情表是拯救法国的办法，这样可以使交易所的、从而使全国范围的交易重新跃上预期的高峰。爱德华·西蒙也热衷于废除交易所行情表。但是，我们的爱德华·西蒙不仅是《祖国报》社论的作者和拉盖罗尼埃的哈巴狗。他是新耶路撒冷的、或者说警察总局的、尤其是帕莱斯特里那先生的最忠实的朋友和告密者。总之，先生们，〈讲述人最后说〉只要有爱德华·西蒙先生参加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就会发出浓郁的警察气味。”

先生这时发出了格外刺耳的笑声，仿佛在臭名昭著的地方发出的气味和爱德华·西蒙先生之间存在某种难以名状的秘密关系。

金莱克先生曾经要下院注意十二月代理人的特色：他们高高兴兴地把外交政策、警察和报刊混在一起（1860年7月12日的下院会议）。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不应当把福格特的远近闻名的^②爱德华同福格特的温存的库尼贡达，或者说特里尔的路德维希·西

① 文字游戏：“祖国”的原文 Patrie，也是《祖国报》的名称。——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远近闻名的”原文 rüchbar，也有“发出气味的”意思。——编者注

蒙^①混淆起来，——爱德华·西蒙先生，即拉盖罗尼埃的哈巴狗、德拉马尔的狮子狗、帕勒斯特里纳的密探和到处乱跑的野狗，显然即使不属于乳脂，无论如何也属于十二月十日的林堡的干酪，属于第二圈的人物，那里

“廉集着
 伪善者，谄媚者，妖术惑众者，
 盗窃者，买卖圣职者，诡计多端者，
 欺诈者，诱奸者等等诸如此类之徒”。^②

卡尔·福格特在出版“主要著作”好多个星期以前，就吩咐他的爱德华·西蒙在法国报刊上对该书加以评论。爱德华·西蒙是擅长扮演双重角色的。首先他私下给拉盖罗尼埃先生介绍了“主要著作”的内容，然后趁此机会由他的庇护人把他委派给《现代评论》。《现代评论》编辑部毕恭毕敬地提出请求，希望爱德华·西蒙在该报发表文章时至少要匿名，但请求落了空。拉盖罗尼埃是毫不容情的。爱德华·西蒙在1860年2月15日的《现代评论》上，以宣传他的朋友福格特的文章初露头角，文章的标题是“*Un Tableau de Moeurs Politiques de l'Allemagne. Le Procès de M. Vogt avec la Gazette d'Augsbourg*”（《德国政治风俗画。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绘画人——爱德华·西蒙。

这个“罗曼人”爱德华·西蒙不认为：他“为要当一个善良的法国

① 通过温存的库尼贡达的介绍，我的故乡特里尔的一家小报上出现了某种福格特式的攻击我的东西，其中谈到我同《总汇报》的“交媾”。对纯洁的库尼贡达来说，这是什么样的联想啊！真是有伤风化！

②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11首歌。——编者注

人,就必须辱骂高贵的日耳曼种族”(《现代评论》,同上,第531页),但是,作为“善良的法国人”和“天生的罗曼人”,他至少必须表现出对德国事物是天生的无知。他在论及他的卡尔·福格特时这样说:“他曾经是短命帝国的三摄政之一。”^①爱德华·西蒙先生当然想不到,有名无实的^②帝国在五巨头²⁶⁸的统治下呻吟,相反地,“作为法国人”,他以为,既然科隆有三个圣王²⁶⁹,为对称起见,就要配上斯图加特的三个议会帝国摄政。“朋友”福格特在“主要著作”中使用的俏皮话,“常常是太过分了,不符合法国人的口味”^③。法国人爱德华要补救这一点,并且“要尽力筛选”^④。“朋友”福格特生来就喜欢“刺目的色彩”,“在用语方面就不是那么字斟句酌”^⑤。当然啰!“朋友”福格特本来只是一个被兼并了的德国人,就像达-达是一个被兼并了的阿拉伯人一样,而爱德华·西蒙则是一个天生的“善良的法国人”和纯种的“罗曼人”。奥尔格斯先生和迪策尔先生在诋毁“罗曼种族”时,也曾达到过这等地步吗?

爱德华·西蒙先生为了使他的上司开心,在巴黎读者面前展示了德国的“三个”残阙圣王之一,并且在这个德国的残阙圣王的同意和委托之下,把他装扮成跟在加西莫多帝王的凯旋战车之后的志愿

① 《Il fut un des trois régents de l'empire éphémère.》(l. c. p. 518.)

② “有名无实的”原文为 in partibus,它出自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异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头衔上附加这种字样。——编者注

③ 《Il dépasserait le but au goût des français.》(l. c. p. 519.)

④ 《Nous nous efforcerons de choisir.》(l. c.)

⑤ 《M. Vogt aime beaucoup les couleurs tranchantes, et il n'est pas précisément un gourmet en matière de langage.》(l. c. p. 530.)

战俘。爱德华·西蒙在引证了福格特的“主要著作”的一段文字之后说：

“可见，福格特先生很少关心促进德国统一的帮助来自何方，只要有人帮助就行了；在他看来，法兰西帝国甚至特别适宜于加速他所希望的解决。也许福格特先生在这种情况下廉价(?)出卖了他的过去，而法兰克福议会中跟他一同坐在极左席的老同事们也必然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位一切统一政权的死敌，这位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位国君表示如此热烈的同情。”①

爱德华把“流亡的帝国摄政”从法兰克福议会的不“坚定的”左翼换位到极左翼。投票赞成“德国世袭帝王”的人变成了“一切统一政权的死敌”，在法兰克福的形形色色的酒馆党之间宣传不惜任何代价保证“秩序”的中央三月同盟¹⁶⁹的成员则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切都是为了恰到好处地突出十二月十日制度在“流亡的帝国摄政”身上猎取到的东西。福格特先生对“在法国打败了无政府主义的那个人”的“如此热烈的同情”就更加可贵了，他现在的认识，即“法兰西帝国特别适宜于缔造德国统一”就更加有价值了，“朋友”西蒙的笨拙暗示，即“朋友”福格特“也许廉价(de bon marche)出卖了他的过去”，就是说，十二月英雄无论如何没有为他付出“太高的

① 《On le voit, M. Vogt se souciait peu d'où vint le secours en faveur de l'unité allemande, pourvu qu'il vint; l'empire français lui semblait même singulièrement propre à hâter le dénouement qu'il désire. Peut-être en cela M. Vogt faisait-il bon marché de ses antécédents, et il dut paraître étrange, à ses anciens collègues qui siégeaient avec lui à l'extrême gauche dans le Parlement de Francfort de voir ce fougueux antagoniste de tout pouvoir unique, ce fervent zéléateur de l'anarchie manifester de si vives sympathies envers le souverain qui l'a vaincue en France.》(l. c. p. 518.)

代价”，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了。为了让上峰毫不怀疑“朋友”福格特现在像“朋友”西蒙一样忠实可靠，爱德华·西蒙先生搓着手，眨着左眼，微笑着说：“如果他对福格特先生了解正确的话”，福格特在维护秩序的热望之中，“甚至向日内瓦当局告发过革命的阴谋”^①，这同爱德华·西蒙先生向帕莱斯特里那先生和拉盖罗尼埃先生所作的“告发”别无二致。

大家都知道，阿布、茹尔当、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博尼法斯、霍夫曼博士；《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骑士、《民论报》的怂恿者、《独立报》、《纪事晨报》、《沃州新闻》等的不值钱的文人[penny-a-liner]^②；拉盖罗尼埃和西蒙之流的人物、文书、文明传播者、十二月骑士、普隆-普隆主义者、丹屠主义者和牙匠^③——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同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于是我们发现，达-达福格特并不是一个孤军作战、自行其是的党徒，而是一个接受津贴、受人教诲、整编入伍、沦为流氓、与爱德华·西蒙沆瀣一气、归服于普隆-普隆、并且跟他一同被捕一同被吊起来的人物。剩下的问题是：可否有人付给卡尔·福格特代理人活动费呢？

“如果我没有弄错，用金钱或别的好处促使人的言行违背他的信念，这就是收买。”（“主要著作”第217页）

普隆-普隆主义就是福格特的信念。因此，即使支付给福格特

① 《Si nous l'avons bien compris, il a même appelé l'attention des autorités de Genève sur ces menées.》(l. c. p. 529.)

② 直译是：每行挣稿费一便士的文人。——编者注

③ 文字游戏：“丹屠主义者”的原文 Dentusten 和“牙匠”的原文 Dentisten 发音相近。——编者注

的是现金，那他也决不是**被收买**。不过，硬币上的花纹并不能像支付方式那样花样翻新。

谁知道，普隆-普隆是否已答应他的福斯泰夫担任宾根之穴的鼠塔²⁷⁰的指挥官呢？或者，当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1860年的普鲁士》里让法国自然科学家争辩同活着的**福格特**和死去的**迪芬巴赫**同时通讯的荣誉之后，已答应任命他为**研究院**的通讯院士？或者，许诺恢复福格特的帝国摄政职位？

我确实知道，传闻常把事物说得平淡得多。例如，“随着1859年以来发生的转变”，据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不久前还是一个因彻底破产而受到刑事侦查的股份公司的合伙经营人）的境况也发生了转变；谨小慎微的朋友们企图用下面的话来解释这件事，即意大利的一个矿业股份公司，鉴于福格特在“矿物学方面”的功勋，赠给他数额相当可观的股票，他第一次在巴黎逗留时，就把这些股票兑换成现金。一些彼此素不相识的知情人，几乎同时从瑞士和法国写信对我说，“令人喜欢的交谈者”担任着尼翁（在瓦特州）近郊的“拉·贝尔热里”庄园（原属于一位寡妇，普隆-普隆为都灵的伊菲姬妮亚^①买下来）的总管，领取一定报酬。我知道有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一位在“1859年的转变”后很长时间还同**福格特**过从甚密的“新瑞士人”^②，在1860年初向“伦敦芬切尔奇街78号P. B. B.”先生开列一笔很大的款项，说这笔款项是他过去的的朋友从巴黎中央金库领取的，不是用**做贿赂**，而是作为**预支**。

① 指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的女儿萨瓦公主克洛蒂尔达。——编者注

② 奥·布拉斯。——编者注

这类传言和更坏的传言流到伦敦，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传言有什么意义。我宁愿相信福格特亲口说的话：

“我（福格特）从何处拿到钱，与任何人无关。我今后仍努力谋取达到我的政治目的所需要的钱，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美好事业，我今后仍将从我能够拿到钱的地方拿钱”（“主要著作”第 226 页），

可见，也包括从巴黎中央金库拿钱。

政治目的！

“你写的满纸胡言乱语，秃子，
而且搭拉着你那鼓出 3 尺远的肚子。”^①

美好事业！这无疑是德国人对庸俗唯物主义的英国人称之为“这个世上的好东西”的唯心主义说法。

福格特在同一本“主要著作”中，在结束他的关于硫磺帮等等的荒诞故事时同样庄严地宣称：

“现代史的这一段时期就此告一段落。这里我所讲的决不是空洞的幻想；这纯粹是事实！”（“主要著作”第 182 页）

不管医学博士沙伊伯勒怎么想，福格特这样说，人们为什么不该相信他的话呢？为什么他的代理人活动，不应当像他在“主要著作”中所谈到的事实那样纯粹呢？

可是我却坚信，与十二月帮的所有其他搞写作的、搞鼓动的、搞政治的、搞阴谋的、搞宣传的、搞吹牛皮的、搞普隆-普隆活动的、搞害人毁己的那些成员不同，只有福格特才独一无二地把他的皇帝看

① 柏西阿斯《讽刺诗集》第 1 首诗。——编者注

做一个“人们为了自己才喜欢的人”。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说：“谁不相信，谁就犯罪”^①；或者像现代歌曲中所唱的：“谁不相信，谁就犯错”。

^①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帕威法耳》第9册。——编者注

十

庇护人和同谋者

博取权贵欢心，并非无上荣光。^①

作为自己“品行端正”的见证人，前帝国的福格特提出了

“科苏特”和“另外两个人——日内瓦的复兴者法济和科莫恩的保卫者克拉普卡”，他“自豪地称他们为自己的朋友”（“主要著作”第213页）。

我称他们为他的**庇护人**。

在科莫恩战役²⁷¹（1849年7月2日）之后，**戈尔盖**违抗匈牙利政府已把他撤职的命令，篡夺了匈牙利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拉品斯基上校在还是科苏特的追随者时所写的书中说：“如果有一位铁腕人物领导政府，那么，戈尔盖的一切阴谋当时就完蛋了。科苏特只需去军营向军队讲几句话，戈尔盖的威望就挽救不了自己的垮台……但是，科苏特没有去，他缺乏公开出面反对戈尔盖的勇气，他在密谋反对这位将军的时候，却企图向世人为对方的过失辩解。”（**泰·拉品斯基**《匈牙利主力军的进军》第125、126页）

科苏特自己承认，戈尔盖的蓄谋叛变，是**盖昂**将军在若干时日之后正式向他告发的。（见**戴维·乌尔卡尔特**《屈塔希亚的匈牙利流亡

^① 引自**贺拉斯**《书信集》第1册第17封信。——编者注

者访问记))

“诚然，科苏特在塞格丁发表的一篇漂亮演说里讲过，如果他知道有叛徒，他会亲手杀掉他，他指的大概就是戈尔盖。但是，他不仅没有实行这个多少有些戏剧性的威胁，甚至没有向他的任何一个部长提过他所怀疑的人；他一方面同少数几个人制定反对戈尔盖的可怜计划，另一方面又总是怀着极大的敬意谈起他，甚至于给他本人写信，且措辞极为温和。既然认识到只有推翻一个危险人物才能拯救祖国，却又力图用颤抖的手把他收拾掉，而与此同时又扶持他，用自己的信任给对方招徕追随者和崇拜者，从而自己把全部权力都交到对方手里——这一点有人能理解吗？反正我不能。就在科苏特以这种可怜的方式时而赞助、时而反对戈尔盖的时候……戈尔盖却比他更彻底更坚决地在实现他那阴险的计划。”(泰·拉比斯基，同上，第163—164页)

1849年8月11日，科苏特按照戈尔盖的命令发表一份公开的辞职声明(据称是在阿拉德要塞发表的)，把“政府的最高军政权力”交给戈尔盖，并且宣称：

“最近几天，上帝惩罚了我国人民，使我们在战争中失利，在此之后，我们对联合起来的两大强国继续进行自卫斗争已无获胜的希望。”

科苏特在声明的开头就如此这般地宣布匈牙利的事业已无可挽救地失败了，——并且说成是上帝的惩罚，接着便在声明中要戈尔盖“利用”科苏特拱手相让的权力，“向上帝负起拯救”匈牙利的“责任”。他把匈牙利交给戈尔盖，对他可谓信任之至，但是不把自己托付他，对他可又算信任无几。他本人对戈尔盖是极不信任的，因而他安排好，在戈尔盖收到他的辞职声明时，他也正好踏上了土耳其国土。所以，他的声明是用这几句话结束的：

“如果我的死能对祖国有所裨益，那我将欣然献出我的生命。”

他在祖国的祭坛上当作祭品送到戈尔盖手里的，是执政者

的权力，然而他立即在土耳其人的保护下重新篡夺了执政者的称号。

在屈塔希亚，这位有名无实的执政者阁下收到了帕麦斯顿提交议会的关于匈牙利惨剧的第一部蓝皮书^①。他在给戴·乌尔卡尔特的信中写道：他研究了这些外交文件之后确信，“俄国在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安插有自己的奸细，甚至还有自己的代理人”，而帕麦斯顿为了俄国的利益出卖了亲爱的匈牙利。^②不过当他在南安普敦踏上英国土地时，他向公众说的第一句话却是：“Palmerston, the dear friend of my bosom!”（帕麦斯顿，我亲爱的挚友！）

科苏特在土耳其被解除拘留以后，就搭船前往英国。在途经马赛时（不过，他没有被允许上岸），他发表了一篇以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和风格写的声明^③。踏上英国领土之后，他立即否认了

“这种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学说，这一学说无论正确与否，人们都认为它是同社会秩序和财产安全不相容的。匈牙利同这些学说没有也不想有任何瓜葛，原

①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函件。1847—1849年。根据女王陛下的命令于1850年8月15日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编者注

② 科苏特当时不理解：帕麦斯顿所玩弄的敌视俄国的把戏，怎么“能够”欺骗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怎么能够相信——即令是瞬间相信——，一位曾经听任俄国干涉匈牙利的部长，会下令进攻俄国呢？”（1850年12月17日发自屈塔希亚的信。《科苏特通信集》）

③ 拉·科苏特《致马赛民主派。〈1851年9月29日于密西西比号船上〉》，载于阿尔文斯莱本《在维拉戈什投降后的拉·科苏特》1852年魏玛版。——编者注

因极其简单：在匈牙利没有它们存在的条件和丝毫理由。”^①（请把这番话同马赛通信比较一下）

他在英国逗留的头两个星期里，每接见一次人，他的信念就改变一次。卡希米尔·鲍蒂扬尼伯爵是这样说明他当时与科苏特公开决裂的理由的：

“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不仅是科苏特获得自由后的两个星期内所犯的过失，还有我积累的全部经验以及我先在匈牙利后在流亡中所看到的、所宽容的、所应允的、所忍受的、以及——正如您能想起来的——所掩盖的、所隐瞒的一切，一句话，是我对这个人形成的看法决定了我这样做…… 请允许我指出，科苏特先生在南安普敦、威斯贝奇或伦敦，简言之在英国，曾经说的话或者可能说的话，都不能使他在马赛说过的话化为乌有。在‘年轻的巨人’之国（美国），他又会唱另一种调子，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是毫无气节的（unscrupulous），而且像一根芦苇，风势一大就弯下腰，因此他满不在乎地背弃自己说的话，并且毫不迟疑地用他所断送的死者的伟大名字，例如用我可怜的堂兄路易·鲍蒂扬尼的名字来掩饰自己…… 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科苏特还未离开英国之前，由于你们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a most undeserving hert）滥加尊敬，你们将因此而感到遗憾。”（《科苏特通信集》，鲍蒂扬尼伯爵给乌尔卡尔特先生的信，1851年10月29日于巴黎）

科苏特在美国的时候，到北部他表示反对奴隶制，到南部他表示赞成奴隶制，他那巡回演出遗留下来的，除了异乎寻常的失望和300具演说的残骸外，别无他物。抛开那些奇闻轶事不谈，我只想指出，他向侨居美国的德国人，而主要是向德国的流亡者，大力推荐成立一个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之间的同盟，但不要法国（不仅不要改变政府，而且根本不要法国，甚至不要法国流亡者及其所代表的法国政

^① 拉·科苏特《1851年11月3日在哥本哈根大厦的演说》，载于《匈牙利执政者路易斯·科苏特阁下的真实生活》1851年伦敦版。——编者注

党)。他在回伦敦之后,立刻企图通过一位阴阳怪气的人物——西尔莫伊伯爵和在巴黎的基什上校,同路易·波拿巴接触。(见1852年9月28日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信和1852年11月16日我在该报的声明^①)

1853年,当米兰发生马志尼策划的暴动时²⁷²,这座城市的墙上到处张贴了致当地匈牙利驻军的告示^②,号召他们参加到意大利起义者的行列里来。告示的署名是:路德维希·科苏特。可是,当起义者失败的消息刚一传到伦敦,科苏特就急忙通过《泰晤士报》和其他英国报纸声明说,这一告示是伪造的,这样他就向公众揭露他的朋友马志尼在说谎。可是,告示是真实的。马志尼从科苏特那里收到这一告示,有科苏特亲笔写的告示手稿,并且是在科苏特的赞同下才张贴的。马志尼确信,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意大利和匈牙利必须统一行动,所以,他起初想用一個更忠实可靠的匈牙利领袖来代替科苏特;但是,当他的企图由于匈牙利流亡者内部不和而告失败之后,他原谅了这位不可靠的盟友,并且宽大为怀,没有揭露事实真相,否则,科苏特在英国定会身败名裂。

大家知道,俄土战争¹⁷也爆发于1853年。1850年12月17日,科苏特从屈塔希亚写信给戴维·乌尔卡尔特说:

“没有土耳其君主的统治权,土耳其将不复存在。而在现时情况下,土耳其

① 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和《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765—768、552—553页。——编者注

② 拉·科苏特《以匈牙利民族的名义致驻扎在意大利的士兵》,载于1853年2月10日《泰晤士报》第21348号。——编者注

对世界自由来说是绝对必要的。”^①

他在1851年2月15日写给土耳其宰相路西德帕沙的信里，亲土耳其的情绪更加高涨了。他夸夸其谈，表示愿为土耳其政府效劳。1852年1月22日，当他在美国旅行时，他写信给戴·乌尔卡尔特说：

“您最理解，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您是否愿意在君士坦丁堡为我的事业奔走呼号？我在土耳其逗留期间，土耳其政府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英国和美国对我的接待以及机遇，我甚至想说天意使我现在得到的地位，或许可以向土耳其政府表明：我是土耳其及其未来的一位诚挚的、也许不无影响的友人。”

1853年11月5日，他向克劳谢先生（乌尔卡尔特分子）书面自荐，作为土耳其人的同盟者到君士坦丁堡去，不过“不是空着手去”（“not with empty hands”），因此，他请求克劳谢先生

“采取私下请求那些乐于相助的自由派人士的办法”，

为他募集款项。

他在这封信里说道：“我憎恨并蔑视制造革命的伎俩”（“I hate and despise the artifice of making revolutions”）。但是，他在乌尔卡尔特分子面前倾泻对革命的憎恨和对土耳其人的热爱时，又同马志尼一道发表宣言，要求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把土耳其变成“东方的瑞士”，而且在所谓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²⁷³的呼吁书上签名，号召普遍革命。

^① 引自《评价科苏特的材料》，载于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闻》第5期。

——编者注

由于科苏特不到 1853 年底就把他于 1852 年在美国用匈牙利名义招摇撞骗弄来的钱挥霍一空,同时,克劳谢先生对他的恳求又置若罔闻,所以,这位执政者放弃了他预定对君士坦丁堡的侠义拜访,然而,他派了他的代理人约翰·班迪亚上校^①带着他全力的推荐信到那里去。

- ① 我本人于 1850 年在伦敦认识了班迪亚和他当时的一位朋友——现在的蒂尔将军,他把科苏特亲手签发的证明书给我看,这样他就轻而易举地打消了我由于他同各式各样的党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等——玩弄骗局以及同各个“民族”的警察交往而对他产生的怀疑。按照这份证明书,他这位从前曾是克拉普卡手下的科莫恩临时警察总监,现在被任命为有名无实的警察总监。他身为为革命服务的警察局的秘密首长,自然应当保有一条“公开的”门路通向为各国政府服务的警察局。1852 年夏天我发现,他把我托他转交给一个柏林书商的手稿²⁷⁴扣压下来,并把它偷偷摸摸地交给一个德意志邦政府。当我把这件事以及这个人的其他一些早已引起我注意的特点写信告诉了住在巴黎的一位匈牙利人²⁷⁵,以及班迪亚之谜由于有消息相当灵通的第三者²⁷⁶介入而被彻底破解以后,我便于 1853 年初给《纽约刑法报》寄去一篇我的署名文章,公开揭露他²⁷⁷。在我至今还保存着的一封辩护信中,班迪亚说,我把他看成间谍是最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一直(这也是事实)避免同我谈论有关我党内部的问题。尽管科苏特和他的追随者当时没有抛弃班迪亚,然而,我在《刑法报》上的揭发毕竟对他在伦敦的进一步行动有所节制,因而,他就更加乐于抓住东方的混乱提供给他机会,以便在另一个天地中施展他的天才。巴黎和约(1856 年)缔结后不久,我在英国报纸上看到,土耳其军队的一个上校穆罕默德贝伊,即从前以约翰·班迪亚的名字而广为人知的一个基督教徒,同一些波兰流亡者从君士坦丁堡乘船前往切尔克西亚,他在那里当上塞弗尔帕沙的总参谋长并且似乎成了切尔克斯人的“西蒙·玻利瓦尔”。我在伦敦《自由新闻》上点出这位解放者的历史²⁷⁸,这家报

1858年1月20日,军事法庭在切尔克西亚的阿杰尔比开庭。尽管法庭“根据穆罕默德贝伊,即前伊洛施法耳瓦的约翰·班迪亚的招认和证人的证词,确认其犯有叛国罪和通敌(俄国将军菲利浦逊)罪”,一致判处其死刑,然而,这丝毫没有妨碍他直到此刻仍旧安然无恙地住在君士坦丁堡。班迪亚在他以书面形式交给军事委员会的自供里这样说:

“我的政治活动完全受我国的领袖路德维希·科苏特指挥…… 1853年12月22日,我带着我的政治领袖的介绍信来到君士坦丁堡。”

他往下叙述他后来成了伊斯兰教徒,并参加土耳其军队当了上校。

“根据(科苏特)给我的指示,我必须设法打进派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作

纸在君士坦丁堡有很大销路。如正文所指出的,1858年1月20日,班迪亚因图谋叛变切尔克西亚,被泰·拉品斯基上校指挥的波兰军团的军事法庭在阿杰尔比判处死刑。由于班迪亚是土耳其的上校,塞弗尔帕沙认为执行这一判决同对土耳其政府应有的尊重是不相容的,因此,他把这个罪犯用船运到特拉布宗,不久以后,罪犯从该地获释又返回君士坦丁堡。在此期间,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流亡者激烈地为班迪亚辩护,攻击波兰人。由于俄国使馆的保护,班迪亚没有受到土耳其国务会议的追究(而且它还得把他当作“上校”连同他的妻妾一起供养起来),由于他的同胞们对波兰人所持的偏见给他的保障,他极为冷静地在《君士坦丁堡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辩护书。然而很快来了一个切尔克西亚代表团,把这出戏收了场。匈牙利流亡者正式抛弃了他们的被保护者,尽管很不情愿。阿杰尔比军事法庭的全部公文,其中包括班迪亚的自供和后来在君士坦丁堡交换的文件,都由那里的波兰流亡者寄到了伦敦,并摘要登载在伦敦的《自由新闻》(1858年5月)上。我把这些文件比较详细地发表在1858年6月16日《纽约论坛报》上²⁷⁹。

战的部队。”

在那里，他的任务是设法阻止切尔克斯人参加反对俄国的战争。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在战争快结束时从君士坦丁堡“寄给科苏特一份有关切尔克西亚情况的详细报告”。他在同波兰人一起再度出征切尔克西亚以前，接到科苏特的一项命令，要他同明确指定给他的那些匈牙利人，其中有施泰因将军（费尔哈德帕沙），共同行动。

他说：“俄国公使的军事秘书弗兰奇尼上尉，参加过我们的几次会议。我们的目的是用和平、缓慢然而可靠的方法把切尔克西亚拉到俄国人一边。在远征军离开君士坦丁堡以前（1857年2月中），我接到了科苏特的来信和指示，他赞同我的行动计划。”

在切尔克西亚，由于截获了班迪亚给俄国将军菲利浦逊的信件，他的叛卖活动败露了。

班迪亚说：“根据给我的指示，我必须同这位俄国将军建立联系，我很久都

年11月20日)上看出来。1859年初,当路易·波拿巴暴露了自己的意大利计划时,科苏特在**马志尼**的《思想和行动》上揭发了他并且要“所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意大利人、匈牙利人、乃至德国人,不要为这位加西莫多帝王火中取栗。1859年2月,科苏特查明,早就属于罗亚尔宫红色宫廷奸党的基什上校、泰列基伯爵和克拉普卡将军伙同普隆-普隆炮制了密谋在匈牙利发动起义的计划。科苏特威胁说,如果不让他加入这一“秘密同盟”,他就要在英国报刊上发起一场公开辩论。普隆-普隆满心愿意为他敞开教皇选举会议的大门。5月初,科苏特带着英国护照,化名布朗先生前往巴黎,他急匆匆地赶赴罗亚尔宫,向普隆-普隆详尽地叙述了他的匈牙利起义计划。5月3日晚上,红色亲王用自己的专车陪同这位前执政者进入土伊勒里宫,要在那里把他介绍给社会救主。在同路易·波拿巴会晤时,科苏特一向能言善辩的舌头突然失灵了,以致普隆-普隆只得做他的代言人,在某种程度上向堂兄陈述了他的纲领。科苏特后来对普隆-普隆几乎一字不差的忠实转述大加赞许。路易·波拿巴聚精会神地听完了堂弟的陈述之后说:只有一个障碍使他不能接受科苏特的建议,即科苏特的共和主义原则及其同共和派的联系。作为答复,前执政者郑重其事地把共和主义信念咒骂了一通,同时信誓旦旦地说,他现在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共和主义者;仅仅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和错综复杂的形势,才使他不得不与欧洲流亡者的共和派结盟。为了证明自己反对共和主义,科苏特以他的国家的名义表示愿意把匈牙利的王位奉献给普隆-普隆。这个王位当时还没有废除。尽管科苏特并不享有经过公证的拍卖王位的全权,不过,谁要是对他国外的表现稍加留意的话,谁就会知道:他早已习惯于像土容克谈论自家的庄园那样谈论他的“亲爱

的匈牙利”。^①

科苏特否认他的共和主义信仰一举，我认为是真心诚意的。他在佩斯要求发给他 30 万弗罗伦年俸来维持他的行政权的显赫；把从前属于一位奥地利女大公^②的医疗机构交给他自己的妹妹掌管；企图使几个团队用科苏特的名字命名；力求成立一个宫廷奸党；到了国外却死死抓住他在危险时刻所放弃的执政者头衔；他后来的全部言行，与其说像一个流亡者，倒不如说像一个王位追求者——所有这一切倾向都是同共和主义格格不入的。

洗去科苏特先生身上的共和主义嫌疑的好戏收场之后，照协议付给他 300 万法郎。这样一个协议本没有什么令人难堪之处，因为，既然要把匈牙利流亡者在军事上组织起来，那就得花钱，既然欧洲所有专制国家在整个反雅各宾战争³⁸中都有权接受英国的资助，那为什么这位执政者就无权接受他的新盟友的资助呢？作为个人开销的预支，科苏特立刻得到 5 万法郎，此外，还议定另付相当数量的款项，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万一战争提前终止时的保险费。财政上的远见和传奇式的敏感是决不相互排斥的。早在匈牙利革命期间，科苏特不是就已采取了——他的前财政部长杜舍克当然知道这件事——防范措施吗：不让用科苏特纸币，而要用银币或奥地利钞票支付他的薪俸。

科苏特离开土伊勒里宫⁵⁴以前，就商定了他要在英国掀起一个

① 这种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因为参与其事的至少有两方面的饶舌的人。而且，科苏特在伦敦逗留期间（1859 年夏末），英国报纸就已经披露了这些事实。

② 玛丽-泰莉莎。——编者注

争取中立的运动,使据称有“亲奥地利倾向”的德比内阁中立化。众所周知,辉格党和曼彻斯特学派的自愿支持,使他极为顺利地执行了协定中的初步条款。他从伦敦的市长官邸到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厅的巡回讲演,同他在1858年秋天的英格兰——苏格兰的周游恰成对照,那时他向每个听众收费一先令,兜售他对波拿巴和瑟堡的憎恨,把这二者说成是“对英国的持久威胁”。

欧洲的匈牙利流亡者,大部分从1852年底起就陆陆续续离开科苏特。由于出现了靠法国的帮助入侵亚德里亚海沿岸的前景,大多数人又回到他的麾下。他和新争取过来的追随者中的军事人员的谈判,不乏“十二月的”余味。为了把大部分的法国钱交给他们,科苏特提升他们的军衔,例如把中尉晋升为少校。首先,每人得到一笔去都灵的旅费,接着就是一套华丽的军服(一套少校军装价值达150英镑),最后是预支6个月的军饷,并许诺在和约签订后发一年的军饷。一般地说,薪俸不是太高的:总司令(克拉普卡)1万法郎,将军6000法郎,准将5000法郎,中校4000法郎,少校3000法郎等等。在都灵集合的匈牙利军队几乎全是军官,没有士兵,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见匈牙利流亡者的“下层群众”为此发出的沉痛怨言。

莫里茨·佩尔采尔将军在看透了这场外交把戏之后,像上面已经提过的,就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克拉普卡不顾路易·波拿巴的反命令,坚决在阜姆登陆,但是科苏特却将匈牙利流亡者军团圈在剧院经理指定的舞台界限之内。

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⁴的传言刚到都灵,科苏特害怕把他引渡给奥地利,就背着他手下的军队,急急忙忙、偷偷摸摸溜到日内瓦。当时在都灵的匈牙利兵营里,无论是弗兰茨-约瑟夫,也无论是路易·波拿巴,都没有像路德维希·科苏特的名字那样招来那么多唾

骂。只是由于他这次逃跑过于滑稽，才略微平息了对他的批评。科苏特在回到伦敦以后，发表一封写给他的驯服大象——格拉斯哥的某位麦克亚当的信，声明他感到失望，但没有受骗；他在信的结尾用充满感伤的语气说，他已没有安枕之处，因此给他的信都请寄到为他这个亡命者提供了栖身之处的他的朋友费·普尔斯基的寓所。伦敦报界以超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粗鲁，敦促科苏特，要他务必用波拿巴的津贴在伦敦租赁一所公馆；这件事使他明白了，他在英国暂时已没有什么戏可唱了。

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每当听众对他表现出明显的不悦或者他理屈词穷时，他还有噤若寒蝉的天才。像太阳一样，他也懂得亏蚀。他新近给加里波第的信证明，他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做到了前后一致。他在这封信里警告加里波第不要进攻罗马，以免侮辱法国人的皇帝，这位“被压迫民族的惟一靠山”。

像18世纪上半叶人们把阿尔贝罗尼叫做了不起的红衣主教一样，也可以把科苏特称做了不起的朗根施瓦茨。实质上，他是一个即兴诗人，每次都从现场的听众那里受到影响，而不是一个硬要世界接受自己新奇思想的作家。布朗丹在自己的钢丝上跳舞，而科苏特则在自己的舌头上跳舞。他同本国人民的气息隔绝了，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蜕化成为圆滑的老手，并且染上这种人的恶习。即兴诗人的特点是思想飘忽不定，这必然要表现为行动模棱两可。如果说科苏特曾经是个风奏琴，人民的风暴使它发出过巨大的音响，那他现在只不过是狄奥索斯的耳朵，用来传达罗亚尔宫和土伊勒里宫密室的窃窃私语而已。

如果把福格特的第二个庇护人克拉普卡将军同科苏特等量齐观，那是非常不公正的。克拉普卡是匈牙利最优秀的革命将领之一。

他同 1859 年在都灵集合的多数军官一样,对路易·波拿巴的看法无异于弗兰茨·拉科西对路易十四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路易·波拿巴代表法国的军事威力,这种威力可以用来为匈牙利谋利,但是,仅仅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也永远不会对匈牙利有害^①。但福格特为什么要引用克拉普卡的话呢?克拉普卡从未否认过他属于普隆-普隆的红色宫廷奸党。为了让“朋友”克拉普卡来做“朋友”福格特的保人吗?克拉普卡的择友之道并不特别在行。阿塞尔曼上校是他在科莫恩另眼相看的朋友之一。拉品斯基上校在放弃科莫恩以前曾在克拉普卡手下效力,以后在切尔克西亚的反俄战斗中曾屡建奇功。让我们听听他对这位阿塞尔曼上校说些什么吧。

拉品斯基说:“维拉戈什的叛变²⁸³,在科莫恩的为数众多而又无所事事的参谋部军官当中,引起极度的恐惧…… 这些衣领绣金、满身香水的先生们,其中很多人既不会拿枪也不能指挥 3 个士兵。他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想方设法只图逃命。他们利用种种借口脱离了主力部队,躲进舒适安全的、难以攻破的要塞之内,除了每月签字如数收到薪俸之外,别无他事。他们一想到要进行殊死的防御战就怕得发抖…… 正是这些坏蛋向将军撒谎,给他描绘出一片内

① 虽然我理解克拉普卡方面的这种立场,但当我在上引的瑟美列著作里发现类似的情绪时,我却感到惊奇,我把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坦率地告诉了他。他最近关于奥地利的让步的声明²⁸¹使我更为不解。我知道,瑟美列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不会为个人动机所左右,而且他的声明有十分重要的根据:匈牙利人用维也纳给的东西便能够在佩斯获得一切;从外部策划的匈牙利起义,尤其是在法国援助下的起义,必然导致俄国以维护或反对奥地利为口实干涉匈牙利;最后,给予特兰西瓦尼亚、斯拉沃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及伏伊伏丁那的自治权,在此刻会像在 1848—1849 年那样,使维也纳内阁获得这些“民族”的协助来反对马扎尔人。这一切都不错,但是,如果不令人据此认为你承认“in usum delphini”²⁸²残缺不全的维也纳版的匈牙利宪法,才能这样说。

部混乱、兵变等等的恐怖景象,为的是只要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促使他尽快交出要塞。很多人对保全财产特别关切,因为他们在整个革命中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发财致富,而某些人也确实如愿以偿。这种发财致富对于某些人来说很容易,因为往往要过半年时间才清算收款账目。这为欺诈和蒙骗大开方便之门,因此,有些人盗窃金库的能力大概要比他们补充金库的能力大得多……停战协定缔结了;现在人们怎样来利用它呢?要塞内存有足够用一整年的食物,其中有相当数量毫无必要地被运往农村;相反地,从周围地区却没有运进任何食物;附近村庄的农民存有干草和燕麦,尽管他们请求收购这些饲料,然而无人理睬,几星期之后,哥萨克人的马吃光了农民的东西,而我们却在要塞里埋怨缺乏饲料。要塞中供屠宰用的牲畜,在饲料不足的借口下大部分卖到城外。阿塞尔曼上校或许不知道,鲜肉可以做成腌肉。有一大部分谷物也以发霉为借口被卖掉;这些事情是公开进行的,但更多是暗地进行的。在阿塞尔曼以及几个诸如此类的家伙的包围中,克拉普卡自然不得不立即放弃他的任何一个好念头;那帮先生们所关注的就是这一点……”(拉品斯基,同上,第202—206页)

戈尔盖和克拉普卡的回忆录^①都同样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克拉普卡缺乏坚毅性格和政治远见。在科莫恩保卫战中,他所犯的全部错误都渊源于此。

“如果克拉普卡除了他的知识和他的爱国心以外,还有自己的坚毅不拔的意志,并且按照他自己的见解行事,而不是按他身边的那些蠢货和懦夫的怂恿行事,那么,科莫恩的保卫战就会在历史中像流星一样灿然一闪。”(同上,第209页)

8月3日,克拉普卡获得一次辉煌的胜利,彻底击溃了围攻科莫恩的奥地利军团,使它长时间丧失战斗力。紧接着他攻克了拉布,甚至可以不费力气地占领维也纳,但是,他不知所措,无所事事地在拉布停留了一个星期,随后又返回科莫恩,得到戈尔盖缴械投降的消息

① 阿·戈尔盖《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48—1849年》1852年莱比锡版。格·克拉普卡《回忆录。1849年4—10月》1850年莱比锡第1版第1卷。——编者注

和他的一封信。敌人请求停战，以便使被击溃的奥地利军团和正从里马索姆巴特开来的俄国军队在科莫恩附近集结，然后从从容容把要塞包围起来。克拉普卡没有对正在集结的敌方部队各个击破，反而又不知所措，犹豫起来，不过，他到底拒绝了奥地利和俄国军使们提出的停战。于是，——拉品斯基讲道，——

“8月22日，尼古拉皇帝的一位侍卫官来到科莫恩……但是，——这位俄国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用甜言蜜语说道，——将军先生，您是会恩准我们两星期的停战的，我仁慈的皇帝陛下为此向您请求。这一席话像一剂烈性毒药立即奏效了。奥地利军使们的一切努力和俄国军使们的一切劝说都未能取得的东西，这奸滑的俄国人只花三言两语就到手了。克拉普卡经不住这番巧妙的恭维，签署了两周的停战。科莫恩的陷落从此就注定了。”

如上所述，在克拉普卡姑息下，阿塞尔曼上校利用停战，在两周内从要塞中运走足够用一整年的军粮。停战期满之后，格拉贝从瓦格河方面包围了科莫恩，已逐渐增至4万人的奥地利军队则在多瑙河右岸驻扎下来。科莫恩的守军却因整天懒懒散散地待在工事里而弄得军心涣散。克拉普卡对包围要塞的俄国军团从未发起过一次出击，这个军团还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并且只有19 000人。敌人包围城市的准备工作从未受到过干扰。从接受停战的那一天起，克拉普卡所准备的一切，实际上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投降。他发挥的全部精力都具有警探活动的性质，也就是用来对付那些反对投降的勇敢的军官们。

拉品斯基说道：“到最后，只要谈起奥地利人一点什么就有危险，因为那可能被关禁闭。”

9月27日，终于投降了。

拉品斯基说道：“如果考虑到现存力量和把自己的最后希望寄托于科莫恩的我们国家的绝望处境，考虑到欧洲的总形势，以及考虑到可能为科莫恩付出极大牺牲的软弱无力的奥地利，那么可以说，投降的条件是分外苛刻的。”

这些条件“只是有助于那些人迅速逃出科莫恩到国外去”，但是，不论对匈牙利，甚至对落在奥地利人手中的革命将领们，都没有取得任何保证。此外，这些条件是在异常仓促之中制定的，措辞含混不清，模棱两可，这就为后来海瑞破坏这些条件大开方便之门。

这就是**克拉普卡**。如果说福格特本来就没有“性格”，那么，克拉普卡也不能供给他这类货色。

第三个庇护人是“詹姆斯·法济——日内瓦的复兴者”，他的宫廷小丑福格特就这么称呼他。**约翰·菲利浦·贝克尔**下面的两封信（同前面引过的信一样，也是寄给同一位收信人的^①）对法济的品评恰如其分，任何增添都会使之减色。因此，我只预先作一点儿说明。福格特的所谓《研究》一书最令人作呕之处就是：路德教派，甚至加尔文教派对“**教皇至上派**”²⁴⁹的那种伪善的恐惧。例如，他给德国提出了乏味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让**路易·波拿巴**放手大干，或者受奥地利宗教条约支配，而且“老实说，我们宁愿再一次经受民族屈辱的时期”（《研究》第52页）。他用清教徒的鼻音呼天抢地，反对

“教皇至上派，这个吮吸全人类骨髓的世敌，这个妖孽”（同上，第120页）。

显然，他从未听说过甚至**大杜班**在十二月帮的参议院里所透露的东西，即：

“在**路易·波拿巴**制度下，直接听命于耶稣会的各种各样联合会、协会和团

① 见本卷第114—118页。——编者注

体比在旧制度下规模大增；十二月帮的立法和行政机关，已有系统地取消了国家在1789年以前就给教皇至上派的宣传机构所加的种种限制。”

但是，有一点福格特无疑是知道的，那就是：他的本地波拿巴——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统治，是建立在所谓激进派和教皇至上派之间多年联合的基础上。当维也纳会议把加尔文教派的老巢日内瓦并入瑞士联邦时，也就把信奉天主教的农村居民和教皇至上派僧侣的精华连同某些萨瓦区一起并入日内瓦领土。同“人类的这个世敌，这个妖孽”结成的同盟，使法济成了日内瓦的独裁者，使福格特成了法济的联邦院议员。这就是要预先说明的。

“1860年7月2日于巴黎

莱朋友：

我到底要满足您的愿望，把我对詹姆斯·法济先生的看法告诉您……

关于国家的科学如果没有实际运用的艺术就毫无用处，同样，管理国家的艺术如果不以科学和哲学思想为基础，也是毫无结果的。一个所谓的政治家，光靠科学是不能吸引群众的，而他的无能很快就会清楚地暴露出来。相反地，一个只是片面地具有管理国家艺术的人，倒更易于把自己知识和精神创造力的不足掩饰起来，被当作一个实际的政治家，获得众多庸人的拥护。人民在这样一位人物的统治下，能否在文化史上向前迈进，能否有顺利发展的必要保证，是盲目赞赏的人群无力判断的。对他们来说，只要看起来事物在前进，一切顺顺当当，一切都是为了自由和文明，那就很不错了！

我们的詹姆斯·法济先生，就是您面对的这种类型的政治艺术家的绝好样品。确实，这个圆滑的家伙显露出的不仅是管理国家的艺术，而且是这方面的一整套艺术，每当‘公共福利’需要的时候，他还会耍弄各种各样的戏法并表演杂技艺术，不过，每次他都以惯有的谨慎避免致命的一跳。这是一个幕后分配角色的内行，机灵的导演和提词者，意大利喜剧演员的最完美的典范。他的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坚定精神’，假如不是出于他那目的的肮脏，倒是很值得赞扬的。但是，当人们知道了这个人毫无原则、毫无节操的时候，对他在选择手段时的机灵和运用手段时的圆滑就不会再感到惊奇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

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或萌芽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位政治艺术家厚颜无耻地攫为己有，然后他以自己的名义把它献给广大群众，致使他们相信并赌咒发誓地说，这一切都是‘法济老爹’做的或者只有靠了他才能出现的。他善于施用同样的狡诈推卸责任，把他干的坏事和不得人心的事转嫁到别人头上。他在他的政府里容不下任何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随意否决他的同僚们说的话，并让他们为他的种种失败分担责任。他们在饱受他的无限制的专横暴虐的同时，还必须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幸福和他们主席的声誉甘当替罪羊和挨鞭子的顽童。就如一位加了冕的统治者，采取每项重大措施的时候，即使非常符合人民的利益，在陛下‘颁行’之前，总是首先要自问这种措施是否对王朝不利；法济老爹也是如此，他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也要自问：‘这是否会动摇我的主席宝座？’因此，我们的这位英雄总是使自己的政策适应当前形势，过一天算一天：今天他在州政府里扮演喜剧，明天在大会里来一套魔术杂耍，后天又在某个群众集会上故作惊人之举。至于那些被他的花言巧语所笼络的群众，也乐意有这样一尊偶像，使他们能耳闻目睹、崇拜景仰；他们变得轻信起来，把暴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当作热锅里煎鸡蛋。我并不是要说，日内瓦人是不开化的，是没有理智的；正相反，我相信，除了这里，除了莱芒湖畔，很少有更为活跃的社会生活，很少见更为强烈的精神努力，去发展公民的自由。以后我还要谈到，既然如此，法济先生怎么总还是能为自己确保多数票。

精力充沛的一代近 15 年来在日内瓦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被法济本人或通过他的走卒和崇拜者算做他执政的功劳。例如，平毁城防工事、大规模扩建和美化州首府，都记在他的功劳簿上。其实，任何一届政府，包括法济先生的政府在内，如果对居民坚持要求平毁无用的要塞设施和扩大因人口过密而变得越来越不健康的城市一举稍加反对，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推翻。因此，这一问题同时也是法济的生存问题，所以他——论功行赏——下大力抓住并且干了不少深得人心的事。但是，整整一代人顺应时代的强烈要求以不懈的努力共同创造出来的业绩，如果一个人不是极端的自负，是不会把首倡和创建这些业绩的功劳归之于己的。只有整个社会才能创造出某种完整的——而且也只是相对而言——东西，对此社会的每个成员则是按其力量和地位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盲目相信权威不过是一种迷信，和其他任何的迷信一样，它对于任何健康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法济先生同其他人间儿女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所做的只是他不能放弃的，而他所放弃的只是他做不到的；他追求个人的绝对突出，就像动物界里所发生的一切，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不能要求他是另一个

样子，正像不能要求猫自愿跳进水里或者要求马爬上树一样。否则，他就不成其为詹姆斯·法济了，如果他不成为法济，那也许就会成为路易·波拿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说利用自己的权威任意摆布人民，用诡计蒙骗人民，不是促使人们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迅速提高，而是让自己身后留下一个腐化堕落的社会也叫做伟大的话，那么，法济无疑是伟大的，而且不失为那些更为强有力的暴君所嫉羨的对象。

我们这位英雄非常善于在各种矛盾中间蜿蜒前进，而且把这些矛盾变成他的玄妙的罗盘，用来操纵他的国家小舟。有时激进主义给他提供船员，而教皇至上主义向他提供装货，有时则与此相反，——这要看怎样才能使舵手更为方便而定。这样一来，国家机器始终处于运动中，总是走来走去，就像怀表一样摆个不停。多幸运的结局啊！激进派发誓说事物在前进，教皇至上派却相信它们在后退。二者都是正确的；二者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怡然自得，法济也就仍然作为我主上帝执掌着舵轮。

亲爱的朋友，这一次就写到这里。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约·菲利浦·贝克尔”

“1860年7月20日于巴黎

亲爱的莱：

那么说，您认为我也许把法济的面貌描绘得太过分了。绝对没有，我亲爱的朋友！而且，谁也不能凭主观愿望去论人论事，只能按照他的认识和他的内在经验合乎逻辑地去推断。在这类事情上，谁要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谁就是对自己不忠实，就是流氓。

法济是在新维德的一所兄弟会教徒学校里接受启蒙教育的，讲得一口漂亮的德语，现在已经65岁了，可是，看来还在照搬他从这所模范学校得来的印象判断德国和它的人民。凡是德国的东西，即便是来自瑞士德语区的也好，都不合他的口味，能获得他赏识的只是极难得的例外。他既是一个天生的日内瓦人，又曾长期住在北美合众国，因此对于共和制度、宣传方法，特别是对于符合他本性的阴谋诡计，都非常精通。与其说他是民主主义者，还不如说是蛊惑家。他的主要治国准则和招牌是“自由放任”²⁸⁴。如果他能克制自己，不往社会人士希望不靠国家恩典而有所建树的地方插上一手，从中掠取荣誉，或者不因掠取不成而从中破坏，像他对付迈尔先生等人筹办的信贷交换银行和对付设立商

品陈列馆的事那样,那么,他的准则和招牌倒并不是那么糟糕。在1846年日内瓦革命期间,詹姆斯先生是按照‘老兵离枪子远’这句话行事的,他考虑如何潜逃要比考虑如何取胜更为煞费苦心。当阿尔伯·加莱尔,这位整个运动的灵魂,用最后一搏解决了这场长期的拉锯战,告诉他已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他正准备秘密离开日内瓦。加莱尔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从不计较个人名誉,他至少在当时是坚信法济真心热爱人民的,因此,当他看到那位幸而没有仓皇逃跑的英雄在胜利后立即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俨然以战胜者自居的时候,并没有丝毫不快。加莱尔当时并不会想到,革命刚一胜利立即在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因为他不是日内瓦人,而是伯尔尼州的公民,根据那时通行的联邦法律,他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诚然,不久以后他取得了公民权,接着被选进大会议,而且得到国家公文翻译官的职务。作为血气方刚的日内瓦青年的中心,他成了激进派政府的坚强支柱。由于他,法济在平民中越来越得人心。詹姆斯·法济用路易·菲利浦时代他在巴黎《国民报》任编辑时学会的那一套法国激进派辞藻,在报刊和讲坛上大肆宣扬他经过伪装的真实图谋和愿望。然而,尽管他善于招摇撞骗,一年过后,各阶层的人士就已严正地谴责他暗中勾结教皇至上派首脑,不久以后又谴责他有亲法情绪。在瑞士德语区,人们判断事物比较沉着和冷静,看来很快就识破他的奸诈。1847年底,宗得崩德¹⁴⁹战争刚一结束,詹姆斯·法济先生立即来到陆军部办公室,求见奥克辛本将军;当时奥克辛本和其他军官都到医院探望伤员去了,只有我一人在办公室。当奥克辛本回来,我向他报告法济先生来访一事时,他以轻蔑的表情甩出一句话:‘嘿,这个装腔作势的伪君子!’这位前瑞士联邦主席和伯尔尼州政府主席奥克辛本将军先生,几年来一直在瑞士从法国皇帝那里领取退休金,现在对他的这位无疑处于相同地位的旧同僚,或许怀有较为宽容的感情。始终引人注意的一件事是:法济先生还从没有被瑞士国民议会选进过联邦委员会,尽管他和他的朋友为此作了极大的努力,尽管在这个议会里盛行着一种倾向(甚至达到狭隘的程度),即要保证重要的各州轮流在中央政府里有代表权。法济在联邦政府内无任何权力可行使,联邦政府总是限制着合他心意的州的主权,因此,他对联邦政府总是别别扭扭的并尽可能给它制造障碍。

1849年初,由于我组织西西里军团²⁸⁵,联邦警察局认为对我加以追究在政治上是明智的;于是我前往日内瓦,法济在这里对我说,我可以任意从事组织工作,不必理睬联邦委员会。我清楚知道,无论什么人,只要一遇到难关,即使法律是在他那一边,法济先生也会立刻把他当作牺牲品抛出去。后来有一件事使

我亲身领略了这种滋味，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反正联邦委员凯伦博士先生和特罗格先生可以说明其中原委。

在对待流亡者问题上，他打着人道主义的招牌，执拗地违抗联邦委员会采取的措施，但是又残酷而专横地迫害那些不合他本人心意的流亡者。他特别无情地迫害那些与加莱尔关系密切的优秀人物，因为他把加莱尔看成是他未来的对手。马志尼对他比对联邦警察局更具戒心。高个子海因岑在他看来是个怪物，必须立即离开日内瓦州。‘他脚步那样重，仿佛这块土地属于他似的’——这就是法济举出的惟一理由，天真啊！没有联邦委员会的任何指令，司徒卢威同他的妻子在散步时被逮捕了，并被当作俄国间谍押解出日内瓦州，送往瓦特州。加莱尔及时赶到法济那里，要法济改正错误。结果引发一场声色俱厉的争吵，因为法济认为他喊得越凶，装得越怒不可遏，就显得越正确。司徒卢威不得不继续背着俄国间谍的黑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场丑戏是在贝尔格旅馆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先生那里演出的，日内瓦州政府主席很喜欢与赫尔岑先生一起进餐。不管怎样，这位先生同司徒卢威所遭到的不体面的怀疑是不相干的。毫无疑问，法济比司徒卢威更亲俄；我曾经听他在一次宴会上发言，他说：‘让·雅克·卢梭的著作，在俄国比在德国流传得更为广泛、理解得更为透彻。’显然，他说这番话主要是想嘲弄一下加莱尔的德国友人和一切德国人。

这以前，加莱尔在政治问题上与法济是患难之交。在他同法济由于司徒卢威事件发生冲突之后，我立即同他谈了谈，他沉痛地对我说：‘法济算是完了，坦白说，我再也不能同他共事了；这个人是一个地道的政治怪物，十足贪婪的畜生；再同他一起，那就是帮助他从内部毁灭人民的事业。只有用一个具有坚定的自由思想的反对党来同他对抗，他才会为了挽救自己的地位不得不高举激进派的旗帜。因为他早已向教皇至上派暗送秋波，所以，光是旧贵族反对他，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妙，他有可能为所欲为。此外，从思想上看，他不像瑞士人，他对巴黎比对伯尔尼更感兴趣。我早已有足够的理由同他分道扬镳了，不过，我曾长期把他看做是一个干练的人物，仅仅由于这种习惯，我没有这样做。不停的内部斗争和今天的公开冲突终于促成我同他一刀两断。’

聚集在加莱尔身边的都是些具有独立性格的人，特别是属于青年政治经济学派的人；这样‘联合起来的’坚定的激进派分子和社会主义分子很快便被人称为民主派。从此以后，激进派的实质，除了少数例外，只不过是有意或无意识地对法济的膜拜而已，法济现在则在从1815年起就并入日内瓦的萨瓦天主教农村地区内找到了真正的多数。该地万能的教皇至上派僧侣同这个‘激进派’——法济

的产儿结成了同盟。加莱尔遭到极其卑鄙的诽谤、迫害并被革职。夹在贵族派、联合起来的老激进派和教皇至上派之间的年轻的民主派，对即将来临的选举还不能提出自己独立的名单。虽然詹姆斯·法济先生拒绝在自己的名单里容纳几个民主派的名字，加莱尔和他的朋友还是鄙弃了贵族派的一切建议，决定这次仍然投票赞成法济的名单，而把自己的胜利寄望于未来。如果法济真心诚意关心进步和大力改善公民的生活，那他就无须抓住总是向后看的教皇至上派的臭尾巴。为了把恶意诽谤和迫害加莱尔搞得更有成效，‘激进派的’主席阁下的仆从们创办了一张专事诽谤的小报，使他们的聪明主子和大师无须乎用自己的骂街来玷污自己的《通报》——《日内瓦评论》了；这种骂街到了他的替罪羊办的小报上，小报就越发显得丰富多彩了，至于这些替罪羊，他是随时可以将其牺牲的。体质本来很弱的加莱尔，经受不住这场下流无耻的攻击，就在那年（1851年）死去了，年仅35岁。我在日内瓦常常听人说：‘我们善良而高尚的加莱尔是我们耶稣会的暴君残酷复仇的牺牲品！’在下一届政府选举中，加莱尔的朋友们欣然接受了贵族派的结盟建议，因为后者表示，如能推翻法济，他们只要有寥寥数人参加政府就心满意足了。要是坚持原则的加莱尔还活着，现在大约也会拒绝这种联盟的；但是他的党的同志们说，反正法济先生已给我们看了他同教皇至上派联盟的好榜样了；既然法济不以教皇至上派的不体面的尾巴为耻，为什么我们倒要因贵族派的体面的尾巴害羞呢？既然法济先生找借口同无知的教皇至上派携起手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有教养的贵族派至少是同样并肩前进呢？

在选举（大概是在1853年11月举行的）中，很多激进派分子，甚至有法济的同僚，都倒向民主派，我们1846年的英雄便被压倒的多数推下主席的宝座。于是，这位前主席因负债累累而窘态毕露。在这方面，我必须首先叙述一下他生活中的若干细节。

詹姆斯·法济先生还在进入政府以前就把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在花天酒地中挥霍一空，并且债台高筑，遭到债权人的无情催逼。他在登上主席宝座之后，力图尽快废除负债人拘捕法，——当然是‘为人身自由起见’。因此，1856年有一个因欠债叫苦不迭的日内瓦人对我说：‘我们选一个负债人当州政府主席，倒也不错，即使他不能宣布废除债务，至少可以废除债务监狱。’

然而，50年代初，法济先生在经济上却陷入异常的困境，以致‘感恩的人民’不得不急急忙忙来救助他，在平毁城防工事后的空地上划出一大块建筑用地送给他。这又有什么不应该呢？他在清除这块地上的城防工事方面也是出了力的，当更有权势的人物都在毫不犹豫地‘兼并’这块土地时，他为什么就不能为自

己‘兼并’那么一块呢？现在，法济先生可以大量出卖地皮，并为自己盖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但是很可惜，他随即又为新的债务所累，无力支付为他建房的工人的工钱。1855年初，一个木工因法济欠了他几千法郎在大街上追着法济叫骂：‘给我工钱，你这个流氓，我好给孩子们买面包！’就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他丢掉了主席宝座，而且祸不单行，他还遭遇一件更倒霉的事。那就是激进派的信贷机构——贴现银行不得不停止支付。法济在这一机构中的朋友们也同样身负重债，他们违反规章，给法济和他们自己发放了超过银行资金的贷款。银行经理（此人至今仍在狱中）竟然——坏榜样毁了好风尚——挪用了银行的更多资金。这样一来，贴现银行就面临着一次严重的不幸——破产。上百户节俭的工人家庭的积蓄处于危险之中。无论如何，必须千方百计挽救局势，否则，法济的全部事业就会因资金亏空而化为泡影。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直接用贴现银行的名义去弄钱。但是，刚好这时日内瓦新成立一个信贷机构——瑞士通用银行。必须为这个银行搞到大笔款项，使它能够挽救贴现银行的资金的退潮，而使法济先生摆脱债务的涨潮。为了被搭救，法济就得装成搭救者。人们担保事成之后给他一笔百分之几的优厚佣金，给贴现银行一笔活命的补助资本。于是，法济先生抱着这种目的，既为了自己也为了瑞士通用银行前往巴黎。在这里盘桓数周之后，传说他在‘圣上’仁慈的支援下，从动产信用公司弄到了数百万法郎的救命钱。那时恰好在准备新的政府选举（1855年11月），因此，搭救者在到达日内瓦以前就写信说，他将在最近带来数百万巨款。这对于贴现银行的股东们受伤的心来说，是一贴特效膏药；对于教皇至上派—激进派的选民们来说，是一把魔幻火炬。那时有一幅漫画，惟妙惟肖地把他画成一只大天鹅，背着一些金口袋从湖上游进日内瓦港口。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当时对我说，他在喝啤酒时听人说，法济带回来5000万法郎，喝葡萄酒时听人说——带回来1亿法郎，喝苦艾酒时又听人说——带回来2亿。法济老爹具有创造奇迹的力量的声誉，在他孩子们的心目中又完全恢复起来了。民主派满以为自己在选举中胜券在握，因而没有作任何特殊的努力。成立已有一些时日的一帮强壮的年轻人——干酪制造者——团体，表现得完全像法济的禁卫军一样，他们在选举活动中用最粗暴的恐怖手段对付选民，因而他们的偶像又一次登上了主席宝座。

但这一次很快就明显地暴露了：教皇至上派不是白白地提供大量选民的，他们也要得到胜利的回报。有一天，在宗得崩德战争之后被逐出瑞士的弗赖堡主教——终身为煽动者和骚乱制造者的马里耶先生，在法济先生的恩准下，从法国回到了日内瓦，并且开始做‘神圣的’弥撒。这时不满的呼声传遍全城，很

快整个瑞士都起来响应。这事甚至在那些极端盲从的激进派看来,在最忠顺的干酪制造者看来,也太过分了。立刻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对州政府主席先生的不信任案。他的同僚、州政府成员图尔特先生,尽管他也只是法济的信徒和弟子之一,居然想解脱自己,便毫不留情地向他的主子和大师发难。但是,法济先生在主教先生到达以前就到外地去了。他历来这样行事:拉了屎,让同事们去打扫。不言而喻,马里耶先生不得不即刻离开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而法济老爹则从伯尔尼写信来,把他的图谋不轨的孩子们暂且申斥一顿,并说他被误解了,政府没有把事情做好,他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宗教自由’允许主教来日内瓦看看而已。第一场风波平息之后,蒙受奇耻大辱的法济老爹回来了。他用几句先知的预言——这套预言到处适用,而且似乎总是真理——轻而易举地恢复了他那备受伤害的威信,使人又相信他对自由和祖国的纯真的热爱;何况他的同事先生们已乖乖地为他承担了主要的罪责。于是,法济如愿以偿了,他向他那些教皇至上派的朋友们表明:他时刻准备尽一切可能为他们效劳。近几年来,詹姆斯·法济先生已成为家财万贯的阔老了。不仅瑞士通用银行保证他终身分享一定的利润,而且,作为州政府主席,他也没有忘记在他的州内修建铁路等方面照顾自己的利益。在他那富丽堂皇的住宅里(法济在芒勃朗街上的私邸),上流社会同外国人士穿梭往来。自皮埃蒙特认为萨瓦浴场的‘赌窟’同它的国家道德不相容时起,深表同情的日内瓦共和国主席颇受感动,他像安置流亡者那样,在自己宽敞的大厅里设了这样一个赌窟。自由万岁!自由放任!上我这里来压上你的赌注吧!

亲爱的,你还需要什么?①

您的 约翰·菲利浦·贝克尔”

让我离开福格特的庇护人,转而谈谈他的同谋者。

Peace and goodwill to this fair meeting,

I come not with hostility, but greeting. ②

① 引自海涅的诗集《还乡曲》。——编者注

② 向在座诸君致和平与善意,
我为问候而来,并无恶意。286

在同谋者当中,我只想讲几个较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我们在这个队伍里首先看到的是在弗·察贝尔先生指挥棒下面的柏林《国民报》。如果把爱德华·西蒙先生在福格特亲自授意下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对“主要著作”的书评同《国民报》、《布雷斯劳日报》等发表的相应文章^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圆满的人物”发布了两个纲领,一个是为准备意大利战役的,另一个是为准备奥格斯堡战役的。究竟是什么驱使弗·察贝尔先生,驱使这位《国民报》的平素如此枯燥无味和小心谨慎的钻营之徒和脑满肠肥的胖汉,逾越常轨,把福格特的街头小调化为社论的呢?

在1849年1月26日《新莱茵报》第205号的社论中,第一次详细地提到了《国民报》。这篇社论开头的話是:“通往席尔达的路标”²⁸⁷。然而,路标太长了,不便把它在这里重新刊印出来。1849年2月17日《新莱茵报》第224号上的社论说:

“柏林《国民报》是空洞无物的充实表现。这里举几个新例子。谈的是关于普鲁士的通告…… 虽然和但是!能够和愿望和似乎!认为和希望普鲁士政府希望!每个句子都像一个苦役犯,双脚戴着上百斤的大镣,非常沉重,每一个‘如果’,每一个‘虽然’,每一个‘但是’,是有血有肉的两种法律的^②法学博士。《国民报》谨慎地用基督教日尔曼人的又臭又长的废话掩盖起它的智慧,如果你们也同样谨慎地把这些破烂货掀开来,那还会留下些什么呢?……政客的空谈,白纸黑字,作为柏林的社论,大肆渲染…… 《国民报》显然是为善于思考的读者出版的,就像罗泰克的世界史²⁸⁸一样…… 法国人对这一类纯粹用文字表现的思维有一种恰如其分的说法:‘Je n’ aime pas les épinards et j’ en suis bien aise; car si je les aimais, j’ en mangerais beaucoup, et je ne peux pas les souffrir.’ ‘我

① 弗·察贝尔《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怎样伪造激进传单》,载于1860年1月22和25日《国民报》第37和41号。——编者注

② 教会法律和世俗法律。——编者注

不喜欢菠菜,这很好;因为如果我喜欢菠菜,我就会吃不够,可我受用不了。’……《国民报》希望普鲁士幸福,因此它希望——换一个内阁。但是有一个内阁——这是它无论如何所希望的。这也是《国民报》的庇护人惟一明确并抱有十足信心的一件事。”

《新莱茵报》第 296 号这样说:

“柏林,1849年5月9日……观察一下柏林的报刊对萨克森革命的态度是很有趣的。《国民报》只有一种感情——害怕被查禁。”

不过,害怕是一剂长生不老药,在曼托伊费尔统治的 10 年²⁸⁹当中,《国民报》证明了这一点。

《国民报》证实了蒲柏的话的正确性:

Still her old empire to restore she tries,
For born a goddess Dulness never dies^①.

蒲柏的 Dulness 王国和《国民报》的国王的区别仅仅在于:那里“现在的统治者是邓斯第二,从前的统治者是邓斯第一”^②,而在这里进行统治的仍然是那个老傻瓜邓斯第一。

紧步《国民报》后尘的是《布雷斯劳日报》,它现在崇拜霍亨索伦王朝的内阁,正像从前崇拜曼托伊费尔内阁一样。1860年初,我收到如下一封信:

“1860年2月27日于布雷斯劳

① 她至今还想使她那古老的帝国复兴,
天生的女神 Dulness 永远不会去世。²⁹⁰

Dulness 这个字是无法译成德文的。它的意思比无聊更重,是上升到原则高度的无聊、死气沉沉、迟钝愚蠢。作为文体上的特点,Dulness 也就是《新莱茵报》称之为“空洞无物的充实表现”的东西。

② 亚·蒲柏《邓斯之歌》第 1 册。——编者注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人民报》上读了你对《国民报》的回答和声明。^①《布雷斯劳日报》也登载过一篇像《国民报》上的类似文章，出自该报每日撰稿人施泰因博士。就是这位施泰因博士，在柏林国民议会里同德斯特尔并肩坐在极左翼，并且提出过反对普鲁士军官的著名建议。这个身材矮小的伟大的施泰因被革掉了自己的教员职位。从新内阁成立的那天起，他就给自己提出了替新内阁宣传的任务——不仅在去年选举时，而且现在还在宣传——，为的是把西里西亚的民主派同立宪主义者联合起来。尽管如此，他要求准许他私人授课的请求却被现内阁拒绝，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上届内阁对于他从事私人授课予以默认，现内阁却把这当作违法而加以禁止。为了获准授课，他去过柏林，但是毫无结果，你可以从登载你的声明的那一号《人民报》上了解到这件事的详情。可是现在，根据施泰因博士的授意，布雷斯劳资源协会在狂欢节游行队伍里又演出了硫磺帮。尽管如此，施泰因博士、施莱安、森劳以及他们的同伙，还是要遭到立宪主义者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不过，这帮家伙是不容许别人怀疑他们的爱国心的。你对这批宝贝能说什么呢？”

对我的同事施泰因我能说什么呢？他的确同我共过事。我有整整半年时间（1855年）是《新奥得报》的通讯员，这是我在国外时供稿的惟一德国报纸。显然，施泰因的心是石头^②做的，不准许他私人授课也不能使之软化。《新莱茵报》对这块石头曾精雕细琢过，想把他雕成个半身塑像。例如，第225号上就这样说：

“科隆 1849年2月16日…… 关于施泰因先生，我们还特别地记得这样的事情：他曾经作为狂热的立宪主义者起来反对共和主义者，他曾经在《西里西亚报》上公然告发工人阶级的代表，并指使一个同他意气相投的教师告发，这个人现在是‘法律制度拥护者同盟’的盟员。协商派议会²⁹¹的所谓民主派，也像这个议会本身一样可怜。

① 见本卷第431—433、485—487页。——编者注

② 此处和下文均为文字游戏：“施泰因”的德文Stein是多义词，既是姓，也有“石头”的意思。——编者注

可以预料：为了再度当选，这班先生现在将承认钦定宪法²⁹²。这班先生的观点的特征尤其表现在：在选举以后，他们会在民主俱乐部中否认他们在选举以前在竞选大会上所承认的东西。这种狡猾的自由主义小聪明从来不是革命者的外交本色。”^①

当曼托伊费尔重又罢黜钦定议院²⁹³的时候，施泰因证明了：《莱茵报》对他的雕琢没有白费力气。那时，尤利乌斯·施泰因博士在“布雷斯劳民主总同盟”里宣称：

“我们（柏林的极左派）一开始就认为德国的事业完了……现在必须承认，只要德意志的君主们还存在，德国的统一就不可能。”（《新莱茵报》第290号）

就是这位施泰因，尽管他不再是一块绊脚石，什未林却总不愿把他当成一块建筑石材使用；这确实是一件使顽石也得撕心裂肺的事。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是否亲眼见过《笨拙》^②杂志，——我指的是伦敦的《喧声》。在杂志的封面上坐着潘奇，他的狗托比站在他的对面，闷闷不乐、愁眉苦脸，耳朵上夹着一枝笔；二者象征着托比是个天生的 penny-a-liner[不值钱的文人]^③。如果允许以小比大的话，那就或许可以把福格特同潘奇相比，特别是从潘奇丧失了幽默以后，——潘奇的这一不幸是在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⁸⁰发生的。但是，他的同伴托比狗只能同自己相比，或同爱德华·梅因相比。如果爱德华·梅因某一天真的死了，他并不需要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世。托比已经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安排好这件事了。我并不想武断地说，爱德华·梅因在画家创作封面图案时做过模特儿。但是，无论如

① 见马克思《施泰因》一文。——编者注

② 《笨拙》的英文名是：Punch，即下文的潘奇。——编者注

③ 直译是：每行挣稿费一便士的文人。——编者注

何,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和狗竟如此相似。不过,这并不奇怪,爱·梅因生来就是 penny-a-liner,而 penny-a-liner 生来就是托比。爱·梅因一向喜欢把他咄咄逼人的文笔下的丰富产品献给组建完毕的党组织书籍出版机构。由于有了钦定的纲领,而免除了独立思考的劳累,由于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组织的群众相联系,而不再意识到自己还有欠缺;由于想到有一笔军费,而暂时甚至忘记了托比职业上的郁闷。于是我们发现,爱德华·梅因曾经混入不幸的民主派中央委员会——这个在 1848 年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²⁹⁴产生出的有名无实的委员会。在流亡伦敦期间,他是石印传单最积极的生产者,金克尔用来发行制造革命的公债的钱,一部分就耗费在石印传单上了;当然,这丝毫不妨碍这位爱德华·梅因带着他的全部家私投奔到摄政王门下,哀求大赦,事实上是乞求恩准他从万茨贝克写些有关外交政策的文章给汉堡《自由射手》,让它左右为难。福格特,这位把愿意“遵循他的纲领”、为他提供文章的“那些人”都招募起来,并在他们面前挥动他的装满军费的钱袋的人,对于我们的爱德华·梅因,这位由于世道艰难无人愿付狗税而成了丧家之犬的人来说,真是来得正是时候。托比一听有传言说我打算破坏福格特的党组织书籍出版机构的信用,剥夺它的哈巴狗们的粗制滥造作品的酬金,就恶狠狠地吼叫起来。多么可怕的事!福格特给了他的爱德华·梅因一份指示,同给他的爱德华·西蒙的指示一样详尽,责成他修改“主要著作”。爱德华·梅因也确实使连续 5 号的《自由射手》(1860 年第 17—21 号)塞满了“主要著作”中晦涩艰深的废话。^①但

① 爱·梅因《卡尔·福格特与奥格斯堡〈总汇报〉和马克思派的斗争》,载于 1860 年 2 月 9、11、14、16 和 18 日《自由射手》第 17—21 号。——编者注

是，差别多大啊！一方面，爱德华·西蒙在修订原稿，另一方面，爱德华·梅因却在歪曲它。客观理解已有材料的最起码才能，无疑表现在有抄录印刷品的本事，然而，即便是抄对一行字，我们的爱德华·梅因也无能为力。在托比的本性上，甚至缺乏抄袭所必不可少的力量，让我们听一听：

《自由射手》第17号：“现在有人揭穿这家报纸《总汇报》……也……得到过被福格特痛斥为德国共和派硫磺帮的一个革命政党的帮助。”

福格特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编造过德国共和派硫磺帮呢？

《自由射手》第18号：“正是李卜克内西在《总汇报》上对福格特提出了指责，因为他在该报上重复比斯康普在伦敦《人民报》上发起的攻击；但是，这些攻击直到马克思把一份伦敦出版的、他硬说是布林德写的传单转寄给《总汇报》后，才充分发挥作用。”

福格特尽可以撒许多谎，但是他的律师赫尔曼就已禁止他撒这样的谎：《总汇报》上不曾刊印过的比斯康普的文章，被李卜克内西在该报“重复”了。同样地，福格特也没有想到要说是我把传单《警告》转寄给《总汇报》的。恰恰相反，他明确地说：“正是李卜克内西先生……把诽谤性的传单转寄给了《总汇报》。”（“主要著作”第167页）

《自由射手》第19号：“布林德明确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而印刷所的老板也证实，传单不是布林德交给他付印的。不过，肯定无疑的是：诽谤书立即用同一个活字版在《人民报》上转载出来了；马克思促使它在《总汇报》上发表等等。”

福格特在“主要著作”里一方面转载了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声明，说传单不是在他的印刷所排版的，另一方面又转载了我的反声明，说当诽谤书再次在《人民报》上刊出时，它原来的活字版还在霍林格尔那里放着。倒霉的托比写得真是乱七八糟啊！

《自由射手》第19号：“至于那些人（根据泰霍夫的信件，似乎恩格斯和我都说过），他们都是些纯粹理性的人，不理解任何民族性。”

不理解任何温情，最可爱的托比，不理解任何温情——在福格特的书里，泰霍夫是这样写的。

《自由射手》第20号：“马克思……让决斗者到奥斯坦德去互相射击。泰霍夫当维利希的助手等等。这件事发生以后，泰霍夫就同马克思和他的同盟分手了。”

爱德华·梅因不满于把安特卫普念成奥斯坦德。他大概在伦敦听说过，在西头的一个法国人抱怨说，英国人写的是伦敦，可是读成君士坦丁堡。泰霍夫写信时只见过我一次，而且明确地写着，起初他想同我和我的同盟联手。可是爱德华·梅因却说泰霍夫同我和他从未加入的我的同盟分手了。

《自由射手》第21号：“由于这个事件（洛桑工人盛会），福格特遭到伦敦《人民报》的猛烈攻击。”

福格特自己在“主要著作”里说，《人民报》上对他发动“猛烈攻击”的日期是——1859年5月14日。（传单发表于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而洛桑盛会是在1859年6月26日和27日举行的，也就是在梅因说它引发“猛烈攻击”很久之后才举行的。

列举托比的这些读书心得已经够了。托比在福格特的书里读到的是其中没有的东西，毫不奇怪，他还读到了：

“福格特的这本书将被列入我国文学最勇敢、最机智、最有益的论战性著作之内。”（《自由射手》第17号）

现在，请想像一下这个倒霉的托比吧，他连从印就的书上正确地

抄下两行字都无能为力；请想像一下这个托比吧，他注定要每天坐在万茨贝克读世界史²⁷¹，一刻不停地从中摘出那些只用模糊的头一个字母草率标明的大事记，并且把现代的渐隐画面按原尺寸映现在《自由射手》上！不幸的万茨贝克的使者！幸福的汉堡《自由射手》的读者！

几天前，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奇特的短评。短评不脛而走，传遍英国报刊，题目叫做：《被狗枪杀的人》。看来，托比也懂得射击，因此，如果爱德华·梅因在《自由射手》上唱道：“我是受雇于摄政的射手”^①，那是不足为奇的。

《科隆日报》只限于发表几篇有利于福格特的恶意的短评和琐碎的诽谤。“主要著作”出版之后一星期，该报在它的版面上散布谣言说，该书业已销售一空，——也许是为了不用亲自去评论这本书了吧。人间趣事真不少啊！

1848—1849年《新莱茵报》时期，当我们由于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而整天同我们科隆邻居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怎么能料到：这家《科隆日报》会在1859年以民族原则的骑士面貌出现，而那位平凡的约瑟夫·杜蒙先生竟摇身一变而为朱泽培·德尔蒙泰先生！但是，当时自然还没有一个会把更高的精神自由之神恩赐给各民族的路易·波拿巴，而《科隆日报》永远也不会忘记是路易·波拿巴拯救了社会。《新莱茵报》第144号曾指出过，它那时是如何怒不可遏地攻击奥地利。

“科隆11月15日(1848年)。当人们获悉奥地利匪帮的嗜血成性的奴仆，一个叫做文迪施格雷茨的人，竟敢像杀一只狗那样下令枪杀议员罗伯特·勃鲁姆的时候，一片愤怒的吼声响彻整个德国，在这样的时刻是该谈谈两家德国报

① 康·克罗伊策《格拉纳达宿营地》(歌剧)。——编者注

纸了。其中一家报纸以罕见的背信弃义竭力玷辱死者在世的最后时日，另一家报纸则以自己可笑的愚蠢一直迫害他走进坟墓。我们所指的就是《科隆日报》和《莱茵国民大厅》（俗称傻瓜天堂）……《科隆日报》第292号写道：‘本月（10月）22日，民主派兴高采烈的领袖们离开了维也纳；其中有……罗伯特·勃鲁姆。’《科隆日报》登这则消息时，没有加任何补充，但是，诽谤勃鲁姆的话是用黑体字排的，以便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在以后的几号里，《科隆日报》干得愈加出色。它甚至满不在乎地转载宫廷奸党的黑黄小报上的文章，转载所有奥地利报纸中最下流的报纸——大公妃索菲娅的机关报上的报道……（以下继续用引文，其中写道：）‘罗伯特·勃鲁姆在维也纳没有获得声誉……事情是这样的：他在大礼堂里说内部敌人是软弱的，缺乏勇气和耐性；他说，如果除去这些内部敌人，还存在别的敌人——他希望他们并不存在——或者如果在城市里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宁愿军人取胜而不愿自由取胜，那么，我们歼灭聚集在城下的敌军的战斗也应当毫不留情地转而指向这些人……在勃鲁姆先生的演说里，充满了九月党人²⁹⁵的癫狂；如果勃鲁姆先生说了这些话，那他可就——恕我们直言不讳——大失体面了。’关于《科隆日报》就谈这些。”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人工的隐蔽管道把人体的脏物排到泰晤士河里。同样地，这座世界首都也通过一系列鹅毛笔管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污纳垢大中心——《每日电讯》里。李比希正确地谴责了前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它污染了泰晤士河水，又夺走了英国土地的肥料。但是，掌管纸制的藏污纳垢中心的莱维，不仅精通化学，甚至精通炼金术。他把伦敦的社会脏物一变而成报上的文章，再变而成铜，又把铜最后变成金。在通向纸制的藏污纳垢中心的大门上，用黑颜色写着：“此处……随意便溺！”^①，或者像拜伦生动地翻译的那样：“行人，停下来小便吧！”^②

像哈巴谷一样，莱维也是无所不能。他能够单就一件强奸案写

① 这里套用了柏西阿斯《讽刺诗集》第1首中的一行诗。——编者注

② 拜伦《墓志铭》。——编者注

一篇占满三栏的社论。今年年初，他用臭气熏天的小块焖肉来款待他的众多美食家读者。这块焖肉是用一桩诉讼案件的肮脏得使人作呕的细节精心炮制而成的，这些细节使法官都不得不把法庭上的妇女儿童打发走。不幸的是，莱维把一个无辜者拉扯进去，当作烹制焖肉的胡椒。由此引来了一桩控告他诽谤的诉讼，结果是英国法庭判他有罪并公开谴责他的报纸。大家知道，在英国，诽谤案件的诉讼也同其他诉讼一样，费用高得惊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 *coffre fort*^① 的特权。但是，西蒂区一群空闲无事的律师很快发现莱维是一棵摇钱树；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为每一个打算控告莱维诽谤的人无偿效劳，以进行投机。因此，莱维本人在自己的报纸上叫苦不迭，说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敲诈勒索，即控告莱维诽谤。从此以后，控告莱维就成了一件麻烦事。这引起了双关的解释；因为正像伦敦的墙壁上可以读到：*Commit no Nuisance* 一样，在英国法庭的大门上可以读到：*Commit Levy*^②。

政治家们称《每日电讯》为“帕麦斯顿的黄色小报”，然而莱维的粪车装运政治只不过是当作压车物而已。而《星期六评论》杂志却一语道破了莱维的卖价一便士的报纸的特质，说它是“cheap and nasty”（便宜加恶心）。

这家杂志还这样写道：“致命的症状是，莱维执意要肮脏的东西，不要干净的东西；为了给一篇齷齪的文章腾地方，他可以毫无顾虑地删去最重要的报道。”

① 意为钱柜，也就是富翁。——编者注

② 难以翻译的文字游戏，英文动词“to commit”有几种意思，“Commit no Nuisance”是“禁止小便”，“Commit Levy”是“捉拿莱维”。——编者注

然而,莱维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假正经。比方说,他对于戏剧中的猥亵描写严加指责,并且攻击——他简直成了监察官卡托的化身——女芭蕾舞演员们的服装上面太往下,下面太往上。由于这一类涉及道德的攻击,莱维甫出狼窝又入虎穴。啊,一贯性!——伦敦的一家戏剧杂志《演员》喊道,啊,一贯性,你的羞赧何在?可不是,这个流氓(the rogue)一定在暗中窃笑!……《电讯》成了主张舞台上妇女服装要得体的宣扬者!神圣的丘必特,往下会出现什么呢?地震和耀眼的彗星在预料可能发生的事中都微不足道。礼貌!“I thank thee, Jew, for teaching me that word(谢谢你,犹太人,你教会我这个词儿)。”^①像哈姆雷特劝告莪菲莉霞那样,《演员》劝告莱维躲进修道院,而且是躲进女修道院。“到女修道院去吧^②,莱维!”莱维在一座女修道院里!大概“nunnery”只不过是 Nonaria 的印刷错误吧^③,因此应该是:“到荡妇那里去吧,莱维”,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

“由衷地发笑,

当荡妇抓住昔尼克派的《昔尼克派莱维的》胡子撒娇”。^④

《每周邮报》断言:莱维[Levy]虽然没有告诉自己的读者 X 是 U,但他却把 I 写做 Y。的确,摩西在通过沙漠时数点过的 22 000 个利未人²⁹⁶中,没有一个人用 Y 写自己的名字。正像爱德华·西蒙不顾一切要把自己算做罗曼种族一样,莱维一心想把自己当成盎格鲁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 4 幕第 1 场。——编者注

②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 3 幕第 1 场。——编者注

③ 马克思把英语中的 nunnery(女修道院),同与它发音相似的拉丁字 nonaria(荡妇)连在一起。——编者注

④ 柏西阿斯《讽刺诗集》第 1 首第 1 篇。——编者注

撒克逊种族。因此,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非英国政策他每月至少要攻击一次,因为迪斯累里这个“亚洲之谜”(the Asiatic mystery)不像《电讯》那样,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但是,当大自然母亲已把他的谱系用大号字母写在他脸的正中的时候,攻击迪斯累里先生并把 I 写成 Y 于莱维又有何用呢?那位从鼻岬给自己弄到一只极其灵敏的鼻子神秘陌生人斯洛肯贝尔吉的鼻子(见《特利斯屈兰·善第》),在斯特拉斯堡只不过作了一周的笑料^①,而莱维的鼻子却成为伦敦西蒂区一年的笑料。一位希腊的讽刺诗作者描写某一位卡斯托尔的鼻子,说这只鼻子什么都能替他干:当铲子、喇叭、镰刀、锚等等。他用下面的诗句结束自己的描写:

“Οὕτως ευχρηστου σχευουζ Καστωρ τετξχηχε,

Ρτνα φερων πασηξ αρμενου εργασιζ.”^②

然而,卡斯托尔并没有料到,莱维用自己的鼻子做什么。一位英国诗人写的这几行诗更为接近些:

“And’ tis a miracle we may suppose,

No nastiness offends his skilful nose.”^③

实际上,莱维的鼻子本事之大在于对臭气情有独钟,百里之外就能把它嗅出并吸引过来。这样一来,莱维的鼻子就作为象鼻、触角、灯塔和电讯替《每日电讯》效劳。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莱维是用鼻子写他的报纸的。

① 劳·斯特恩《特利斯屈兰·善第先生的生平和见解》第4卷。——编者注

② “卡斯托尔有一个万能工具,他的鼻子能干各种活计。”²⁹⁷

③ “任何臭气都无损于他那灵敏的鼻子,谁能认为这不是个奇迹。”

自然,这家干净的《每日电讯》,是可以而且应该登载福格特的“劳斯之歌”的惟一英国报纸。在1860年2月6日莱维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长达二栏半的文章,标题是:“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奥地利的报界帮凶》),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柏林《国民报》两篇社论的臭气熏天的英译。为了故弄玄虚,文章上注明:“from an occassional correspondent. Frankfort on the Main, February 2.”(“临时通讯员,2月2日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我当然知道,《电讯》只有一个通讯员住在柏林,他是被莱维的鼻子以惯有的绝技在那里发现的。因此,我即刻写信给在柏林的一位朋友^①,问他是否能告诉我莱维报纸通讯员的尊姓大名。但是,我的朋友(甚至亚·冯·洪堡都承认他有学问)却硬说:在伦敦并没有什么《每日电讯》,因而在柏林也就没有它的什么通讯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再去问住在施普雷河城^②的另一位熟人^③。回答是:《每日电讯》驻柏林通讯员确有其人,名字叫——阿贝尔,我认为这个名字是恶意的故弄玄虚。显而易见,阿贝尔只不过是察贝尔的简写而已。察贝尔不会用英文写东西,这种情况迷惑不了人。如果阿贝尔作为察贝尔,不会写德文就能编辑《国民报》,那么,察贝尔作为阿贝尔,不会写英文为什么就不能给《电讯》做通讯员呢?那么,是察贝尔——阿贝尔,还是阿贝尔——察贝尔?怎样从这种巴贝尔^④中解脱出来呢?我再一次把柏林的智慧报纸同莱维的报纸作了比较,发现《国民报》第41号上有这样一段:

① 斐·拉萨尔。——编者注

② 即柏林,施普雷河流经该市。——编者注

③ 爱·费舍尔。——编者注

④ 巴贝尔作为名词在这里含有语言混乱的意思。——编者注

“李卜克内西出人意外地补充说：‘我们想让市政府(?)认证我们的签字。’”

这句有“市政府”和察贝尔在市政府后面加的表示惊讶的问号的话，使人不禁想起那个士瓦本人，他“刚走下海船登上亚洲大陆就问：‘这里有没有一个贝宾根来的好小伙子？’”^①

莱维的报上不仅没有这一整句话，甚至也没有问号，显而易见，莱维的通讯员不同意弗·察贝尔认为伦敦的治安法官(magistrates)就等于柏林市政府²⁹⁸的看法。因此，察贝尔不是阿贝尔，阿贝尔也不是察贝尔。这期间，我在柏林的其他熟人知道了我苦苦探索的问题。其中的一位写信给我说：“在摩西四经里的22 000个利未人中也有一个阿贝尔，但是写成亚比亥[Abihail]。”另一位写道：“这一次是亚伯[Abel]杀死了该隐，而不是该隐杀死了亚伯。”这样，我就愈加陷入“迷途”，直到终于有一家伦敦报纸的编辑以英国人的枯燥的严肃使我确信，阿贝尔绝不是子虚乌有，而是柏林的一位犹太作家，他的全名是卡尔·阿贝尔博士；这位可爱的小伙子很长一段时间在施塔尔和格尔拉赫手下效力，积极地为《十字报》看家护院，但是，随着内阁的更迭，他即使没有改头换面，也改变了色彩。无论如何，变节者纠缠不休的热情总能够说明，为什么莱维的柏林通讯员认为，英国新闻出版自由的发明是专门为了他能公开地、癫狂地兜售他对于霍亨索伦王朝内阁的赞叹。因此，可以假定，除了伦敦有一个莱维，柏林还有一个阿贝尔，——一对高贵的兄弟^②。

阿贝尔从一切可能的地方——从柏林、维也纳、美因河畔法兰克

① 这是马克思凭记忆从约·维·舍弗耳的诗《斯特劳宾兄弟在耶稣纪元1848年的命运何如》中摘引的一句话。——编者注

② 贺拉斯《讽刺诗集》第2卷第3首。——编者注

福、斯德哥尔摩、彼得堡、香港等地同时向莱维提供他的货色，这把戏玩得比德·梅斯特尔的《环绕我的房间的旅行》更令人叫绝。但是，阿贝尔给莱维写的东西不管标上什么地名，他总是用螃蟹作标志。同进两步退一步的埃希特纳赫的游行²⁹⁹不同，阿贝尔的文章是进一步退两步的。

“No crab more active in the dirty dance,
Downward to climb, and backward to advance.”

(Pope)^①

阿贝尔具有向他的莱维通报大陆国家秘密的无可争辩的才能。例如，《科隆日报》上随便刊登了一篇社论，假定是谈俄国财政的，又假定是从《波罗的海月刊》上抄来的。阿贝尔等过了一个月，突然把《科隆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从彼得堡寄到伦敦，同时当然免不了要暗示出，即使不是沙皇本人，即使也不是俄国财政大臣，至少也是国家银行的一位经理在抽两支雪茄之间向他透露的秘密统计数字，于是他得意地高呼：“I am in a position to state etc.”（“我有能力报道，等等”）。或者官方的《普鲁士报》伸出了内阁的触角，比方暗示了冯·施莱尼茨先生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私人观点。这次阿贝尔片刻也不等待，当天就公开从柏林向他的莱维报告关于黑森选帝侯国的问题。一星期以后他报道说：内阁机关报《普鲁士报》刊登了如下一篇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文章，而“I owe to myself”（“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提请大家注意，我在一星期以前就已……或者他翻译《总汇报》上的一篇文章，注明地点比如说是斯德哥尔摩。接着必然要加

① “向下是攀登，向后是前进，
螃蟹在污泥中跳舞也不能这样欢腾。”³⁰⁰

上这么一句：“I must warn your readers”，“我必须向您的读者们提出警告”，不是要他们警惕从《总汇报》上抄来的文章，而是警惕某篇没有抄来的文章。当阿贝尔不得不谈到《十字报》的时候，他就画十字，祈求自己不要被认出来。

至于阿贝尔的文风，只能形象地说它是施泰恩·盖沙特^①、伊西多尔·贝林涅尔勃劳^②和雅科布·维森里斯勒^③风格的翻版。

请阿贝尔同意，暂时离题一下。施泰恩·盖沙特的原型是福格特的另一个同谋者，名叫路·班贝格尔。1848年他曾经是美因茨一家小报^④的编辑，目前在巴黎“靠全薪”过活，通过攀龙附凤，成了“狼形人妖”和“最简单意义上的”十二月帮的民主主义者。为了解这个“简单的意义”，必须熟悉巴黎交易所殿堂的那些江湖暗语。施泰恩·盖沙特的“简单的”民主，也就是伊萨克·贝列拉称之为“la démocratisation du crédit”，即信用民主化的东西，这种信用民主化不是要把国家的某些地区，而是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赌窟，以便对它全面欺诈。如果说，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寡头的交易所之狼目光短浅，只知道猎取集中在上层资产阶级手中的国民财富，那么，在路易·波拿巴的庇护下，在民主主义的交易所之狼看来，一切都是鱼。他们同罗马皇帝一起高呼：non olet^⑤，同施泰恩·盖沙特—班贝格尔一起补充说：“大众应当做这件事。”这就是施泰恩·盖沙特的最“简单”

① 指路·班贝格尔。——编者注

② 指亨·伯·奥本海姆。——编者注

③ 指斐·拉萨尔。——编者注

④ 《美因茨报》。——编者注

⑤ 意为：金钱没有臭味。据说这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在谈到厕所捐时讲的话。——编者注

的民主。施泰恩·盖沙特—班贝格尔最近以《去意大利，好啊！》³⁰¹一书出了名。与此相反，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⁹⁶中，他曾倾听过这样的呼声：“哎哟，离开基希海姆博兰登！”这个逃离基希海姆博兰登和欺骗过莱茵—普法尔茨志愿军的施泰恩·盖沙特—班贝格尔（我得到一份关于他的英雄功勋的有价值的手稿）真是太机灵^①了，他怎能嗅不出，十二月政变的浸透鲜血的肮脏土层，对机灵的探宝人来说，竟含有金子。于是他到了巴黎，他的朋友伊西多尔·贝林涅尔勃劳（又称亨·伯·奥本海姆）说得好，“在那里，你感觉自己比你知道的更为自由”。当十二月政变的肮脏土层上突然闪耀出崇高思想的鲜明色彩的时候，认为1858年“流通”开始“停滞”（见法兰西银行关于1858—1859年货币流通统计表）^②的施泰恩·盖沙特眉开眼笑起来。既是鲜明的民主主义者而又机灵的施泰恩·盖沙特了解，巴黎的洪水在冲走十二月的土层时，还会冲走他的主要著作的Pro，只留下Contra^③。大家知道，施泰恩·盖沙特—班贝格尔扩大了希腊缪斯的数目，增加了第十缪斯，希伯来缪斯——“当代缪斯”，即他所说的交易所行情表。

现在回过头来谈阿贝尔。在阿贝尔的文风中，充满了世界首都的纸制藏污纳垢中心——《每日电讯》不可或缺的特殊气味。当阿贝尔的通讯的香气、阿贝尔的学识及其从20个不同纬度上同时写作的

① 文字游戏：“盖沙特”Gescheidt是姓，它与“机灵”gescheit同音。——编者注

② 《法兰西银行》，载于1859年1月14日《泰晤士报》第23203号。——编者注

③ Pro和Contra是从班贝格尔的一本著作的标题中借用来的两个词，意为：赞成和反对。——编者注

事业心使莱维特别感动的时候，莱维便把阿贝尔亲切地、爱抚地称做他的：“勤勉的臭虫”^①。

单是诗人的正义感就要求“圆满的人物”在喜剧结尾时不要同阿贝尔一起陷在伦敦的粪堆里不能自拔，但是，谁该把他从粪堆里拉出来呢？谁是拯救者呢？拯救者应该是个脏鬼，即冯·芬克男爵^②，红色土地^③的容克，笑容骑士，无畏又无瑕的骑士³⁰²。

如前所述，《新莱茵报》早在1848年就已经透露了福格特和芬克的对立统一^④，而福格特本人在1859年也预感到这一点，那时他在他的《研究》中写道：

“冯·芬克先生作为新的国家自由的宣传者……确实已接近可笑的领域”（同上，第21页），

即接近了福格特的领域。但是，1860年3月1日，芬克公开讲了和解的话，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说法，他“用硫磺帮来描绘谦虚的普鲁士议会”^⑤。大约在这前一年，他曾经向该议会推荐过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由于他没有莱维的鼻子，当然嗅不出这本小册子的来源有硫磺味。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扮演意大利人，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侮辱波兰人，当芬克像福格特一样地要求瓜分德国的时候，这一对势不两立的兄弟就永远互相拥抱在一起了。

① 引自亚·蒲柏《邓斯之歌》第1册。——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芬克” Vincke 是姓，它与“脏鬼” Mistfinke 的后半部分同音。——编者注

③ 威斯特伐利亚。——编者注

④ 参看本卷第164—166页。——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

大家知道,同极势必互相排斥。所以,福格特和芬克曾长期互相排斥。两人都有夸夸其谈的毛病,谁都认为对方不让自己说话。

根据拉尼克尔的证明,福格特是一个大动物学家,芬克也是,他在伊克尔恩养猪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西班牙戏剧中,每一个主人公都得配上两名丑角。在卡德龙的剧作^①中,甚至给圣基普里安这个西班牙的浮士德也配备了莫斯康和克拉林。同样地,反动将军冯·拉多维茨在法兰克福议会中也有两名滑稽副官:他的喜剧小丑利希诺夫斯基和他的马戏团小丑芬克。福格特这名自由主义的反丑角却必须独自去做一切事情(这就必然触怒他去反对芬克),因为雅科布·费奈迭只懂得潘塔隆这一角色的温情方面。芬克有时喜欢挥动他的小丑的尖帽。例如,他在1848年6月21日的议会会议上声言:

“他有时觉得,好像他不是在这样的会议上,而是在戏院里。”

在法兰克福议会的托利党人举行的一次隆重聚会上,他以**托恩公爵**的身份为宾客们解闷,坐在酒桶上唱道³⁰³:

“我当选托恩的公爵,
为的是享用美味佳肴。”

这也使他的对手感到不快。此外,福格特和芬克谁也吓唬不了谁,因而他们认为彼此攻击最为稳妥。福斯泰夫-福格特知道,无畏又无瑕的骑士非等闲之辈,反之亦然。威斯特伐利亚的巴亚尔曾经在德国大学里学习过法律,而对于罗马的《民法大全》³⁰⁴则研究较

① 卡德龙《神奇的魔术师》。——编者注

少,因为他认为,红色土地的祖先没有白白把瓦鲁斯打败。于是他更加勤奋地研究条顿法,也就是**大学生章程**,他从各个方面衡量它的基础,然后取名**法律基础**,使它闻名遐迩。由于受到这种诡辩钻研大学生章程的影响,后来他在每一次决斗中都碰上了邓斯·司各脱的头发,这根头发在决定性关头成为骑士和流血之间不可克服的诡辩障碍,就像新婚床上横在公主和代替者之间的一把脱鞘的剑。这种诡辩障碍总是按照周期性发热有规律地出现,从1847年联合议会³⁰⁵时代他同上诉法院陪审员本达的冒险事件³⁰⁶开始,直到1860年在下院同普鲁士陆军大臣^①的同样引人注目的冒险事件为止。由此可见,不久前有人指责这位容克丧失了他的法律基础,纯属造谣诽谤。如果说他的法律基础完全由陷阱构成,那并非他的过错。而且,由于大学生章程仅仅适用于更高级的法律辩论,我们机灵的容克在日常的议会实践中就以**木樨章程**去代替它。

有一次,芬克在法兰克福蛙池中异常愤怒地把自己的对手福格特骂做“**未来的大臣**”。当他在伊克尔恩得悉,福格特因为记住了这句俗话:

“只要搞到个一官半职,
一年到头当老爷”^②,

不仅成了帝国摄政,甚至成为有名无实的外交大臣的时候,他感到震惊,并且对未被公认的按职晋升权愤愤不平。要知道,在1847年联合议会上,芬克就作为弗伦特党人¹⁰⁵出来反对内阁,作为贵族代表

① 阿·罗昂。——编者注

② 引自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4章。——编者注

出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因此,当三月革命¹⁶⁸爆发时,他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负有拯救王位的使命。但是,他的对手们都成了现任的大臣,而他本人却只得到了“未来的大臣”的职位,这是他至今一直顺利地担任的职位。

为了报复,他抖掉了自己脚上的柏林尘土,到了法兰克福,坐到圣保罗教堂的极右翼,以便作为拉多维茨将军的小丑、捧场者和打手在这里活动。

只要上峰赞许,芬克^①就是一个狂热的忠诚的奥地利人,他疯狂攻击各民族。

“左翼依次热衷于所有一切民族——意大利人、波兰人,现在甚至还有马扎尔人。”(1848年10月23日的会议)

三骑士——芬克、利希诺夫斯基和阿尔宁——上演了一场音乐三重唱:

“公牛嚎,母牛叫……
驴子唱低音奏热闹”,

他们以这样高深的艺术造诣来反对替波兰人辩护的演说者(1848年6月5日的会议),使得主席的小铃都嘶哑了;而当拉多维茨由于军事上和地理上的考虑,甚至要求把明乔河划归德意志帝国的时候(1848年8月12日的会议),芬克为了讨好整个旁听席和博取福格特的暗自叹赏,来了个头顶地,用双脚鼓掌。法兰克福蛙池通过一些决议来为王朝奴役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打上德国民意的印记;当德意志民族由

① 原文是 Fink,而不是 Vincke。Fink 有放荡者和讨厌鬼的意思,马克思在下边多次混用这两个词。——编者注

于屈辱的马尔默停战协定¹⁶⁶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要求时,这些决议的主要捧场者、红色土地的容克喊叫得更加滑稽可笑了。为了确保在批准停战协定时获得多数票,外交人员和其他列席者从旁听席上溜到了右翼席位上。骗局被揭穿了,拉沃要求重新表决。芬克激烈地反对说,问题不在于谁进行表决,而在于表决什么(1848年9月16日的会议)。在批准马尔默停战协定而引起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威斯特伐利亚的巴亚尔消失得无影无踪,以便后来在宣布戒严时,进行猛烈的反动攻击,为他所受的谁也无法补偿的恐惧复仇。

由于不满足自己对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唇枪舌剑的攻击,他建议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848年6月21日的会议),但是附带一个毕恭毕敬的条件,即要德意志议会的哈布斯堡王朝执行机关无须执行,无须宣布,甚至根本无须理睬议会的平民决议。当他的多数派伙伴,仅仅是为了换换花样,投票赞同帝国摄政王——至少在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同外国签订条约时——应屈尊事先取得议会的同意时,他竟然暴跳如雷(1848年6月27日的会议)。为了迫使德意志议会举行对帝国大臣施梅林及其同伙的信任投票,以奖励他们和帝国摄政王参与卑鄙的、流血的维也纳背叛³⁰⁷(1848年10月23日的会议),芬克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这篇演说成功地驳斥了菲沙尔特的诬蔑:

哦,威斯特伐利亚人的嘴脸,
多么冷酷的嘴脸!①

可见,芬克一向对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友好的睦邻关系,直到突然

① 约·菲沙尔特《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第3章。——编者注

间在议会撒哈拉大沙漠的上空出现了小德意志¹⁹²的海市蜃楼，而我们的容克满以为他从中看到腋下夹着一个大小与原物相等的内阁大臣公文包的芬克。由于圣保罗教堂墙上有非同寻常的长耳朵，所以他能聊以自慰的是：他在法兰克福对霍亨索伦王朝大喊大叫表忠心，在柏林听起来是很舒服的。1848年6月21日他不是在人满为患的圣保罗教堂里这样声明过吗：

“我的选民们派我来这里，不仅是为了代表人民的权利，而且也代表各邦君主的权利。我一直赞赏伟大的选帝侯^①的话，他有一次曾把马尔克的居民称做他的最忠诚、最恭顺的臣民。住在马尔克的我们以此为荣。”

马尔克的巴亚尔在那次著名的讲坛战役中从动口转向动手，这次战役为他赢得了骑士马刺（1848年8月7日和8日的会议）。事情是这样的：当布伦坦诺在为弗里德里希·黑克尔请求大赦而在讲台上对霍亨索伦王室的一个亲王说了某些模棱两可的话时，芬克像一头真正忠顺的狗一样狂怒了。他离座冲向布伦坦诺先生，对他高喊：“滚开，流氓！”试图把他拉下台来。但是，布伦坦诺巍然不动。不久，这位容克又一次向他冲去，并且向他投下了骑士的挑战手套（当然，保留进一步成熟地考虑在法律基础上可能产生的困难），布伦坦诺拾起手套说：

“在教堂外面，您想对我说些什么，悉听尊便；但在这里，您别打扰我，不然，当心吃我耳光。”

这个容克在自己的词汇仓库中翻腾了一遍，从中又掏出几句脏话甩向左翼，直到赖沙特向他喊道：“冯·芬克，您是个恶棍！”（1848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年8月7日的会议)芬克想用直接转入日常事务的提案,来取消关于勃兰登堡内阁和柏林协商派议会之间冲突的辩论。

他说,“自从弗兰格尔胜利地进入柏林,局势已经平静,证券的价格已经上涨……柏林议会无权发布告人民书,等等。”

协商派刚被驱散,这位无畏又无瑕的骑士就更加恶毒地攻击他们了。

在1848年12月12日的会议上,他喊道:“对共和国来说,我们缺少起码的政治教育;前柏林议会的代表们向你们表明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决议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卑鄙的虚荣心。”

话音刚落,风暴顿起。为了平息风暴,他说了下面的话:

“他准备反对任何人,骑士般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位小心翼翼的骑士补充说,“他指的不是本议会的成员,而是被驱散的柏林议会的成员”。

马尔克的巴亚尔就这样傲慢地向已被驱散的协商派³⁰⁸全体战士们发出了挑战。其中一位听到了挑战的声音,他抖擞精神,做出了一件确实闻所未闻的事情:迫使这位红色土地的容克亲临爱森纳赫战场。当巴亚尔在紧要关头找到了邓斯·司各脱法律上的诡辩的时候,流血看来已经不可避免了。他的对手叫格奥尔格·荣克,可是荣誉法要求我们的无畏又无瑕的骑士与龙搏斗,但决不是与同名的降龙者^①搏斗。芬克不能把这种固定观念从自己头脑中铲除。他庄严宣誓,宁愿像日本的大名³⁰⁹那样切腹自杀,也不愿触动这位名叫格

① 圣乔治(胜者乔治)。乔治与格奥尔格分别是英文和德文人名 Georg 的两个不同译法。——编者注

奥尔格、对决斗来说还太年轻^①的人的一根毫毛。但是在圣保罗教堂内，这位顽强的决斗者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攻击紧锁在明斯特监狱里的泰梅和其他反政府人物（1849年1月9日的会议）。如果说他为了迎合上层而不嫌烦琐，那么，他在建立小德意志和大普鲁士王国的巨大努力中所表现的忠诚则达到了顶峰。国王制造者沃里克同皇帝制造者芬克比较起来简直太幼稚了。

马尔克的巴亚尔认为，他已经以自己的高尚行为使1848年三月事件¹⁶⁸中的那些忘恩负义之徒深感羞愧。行动内阁³¹⁰垮台的时候，芬克曾一度从圣保罗教堂消失，但随时整装待命。冯·普富尔内阁垮台的时候，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是，由于高山不会走向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决定走向高山。在某个腐败的城镇选区³¹¹当选后，红色土地的骑士突然以钦定议院议员的身份出现在柏林，迫切希望他在法兰克福的作为获得奖赏。此外，在不剥夺他的任何非议会自由的戒严中，这位骑士感到非常舒服。当他同钦定议员一起在宫殿前等候白厅接待的时候，柏林居民用嘘声和嘲笑来欢迎他。由于曼托伊费尔曾经委婉地暗示过；似乎上面——哪怕是为了留一个大臣的空缺以资奖赏某些功勋——倾向于从法兰克福的皇帝制造者们手中接受小德意志皇冠，因此，他竖起耳朵更加贪婪地听取这些嘘声和嘲笑。芬克陶醉于这种甜蜜的希望之中，企图暂时作为内阁的清洁工以示效劳。他按照《十字报》的指示，草拟一份呈上国王的奏折，大声疾呼反对大赦，声明只有在一个明确的保留条件下他才同意接受钦定宪法²⁹²，这个条件就是：宪法要由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来重新审查和删削；他辱骂备受戒严之苦的左翼议员等等，同时等待着自

① 文字游戏：“荣克”Jung是姓，它与“年轻”jung同音。——编者注

己的胜利。

灾难临近了。法兰克福皇帝代表团到了柏林，4月2日(1849年)芬克提出了一项无限效忠皇帝的修正案，曼托伊费尔天真地投了赞成票。会议一结束，芬克就发了疯似地三步并作两步跑进邻近的一家旧货店，要在那里亲手选购一个公文包——红色天鹅绒装饰的、金边黑硬纸面的公文包。第二天早上，这位笑容骑士像孚恩神那样怡然自得，含着胜利的微笑坐在议会中央他的席位上，但是，突然响起一阵“永远不、永远不、永远不”的喊声。曼托伊费尔的嘴唇嘲弄地抽搐着，而我们的这位无畏的容克却嘴唇发白，由于内心的激动像一条电鳗一样颤抖着，向他的朋友们狂叫道：“拦住我吧，否则我要闯祸了。”为了拦住他，《十字报》(许多月来芬克都兢兢业业地按照该报的指示行事，而该报的议院奏折草案也是出自他的手笔)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在危险中》的文章，其中说道：

“内阁仍然存在，国王^①在回答芬克先生及其同伙时说，他们不必为与他们无关的事情操心。”

这位受了骗的无畏又无瑕的骑士蹒跚地从柏林前往伊克尔恩，他所受到的愚弄比莱维曾经受到的更甚，当然，也只有未来的大臣才会这样被人牵着鼻子走！

红色土地的辛辛纳图斯在伊克尔恩苦苦研究了多年实践动物学之后，某一天早上醒来时已经成了普鲁士下院反对派的正式首领。他因右的论调在法兰克福不走运，便在柏林唱起左的论调来。究竟他代表的是信任的反对派，还是反对派的信任，那就弄不清楚了。不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管怎样,他在这里又把他的角色演过了头。不久他甚至成了对内阁来说是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再也不让他离开这个位子。这样,红色土地的容克就依然是未来的大臣。

在这种情况下,芬克感到了厌倦,缔结了他的著名的伊克尔恩条约。福格特白纸黑字地向他保证:只要普隆-普隆征服了德国大陆上的第一议会岛巴拉塔里亚¹⁶⁵,把醉鬼们移民到那里去,并且让他的福斯泰夫出任该岛的摄政,福格特就会立即把威斯特伐利亚的巴亚尔任命为自己的内阁首相,把所有决斗中的最高裁决权交给他,此外还提升他担任真正的秘密筑路总监^①,授以托恩公爵的头衔,提高到公爵等级,最后,让人在他管辖的岛屿上用来代替货币流通的白铁^②上刻铸出一对暹罗双生子——右面是普隆-普隆的摄政福格特,左面是福格特的大臣芬克,大幅双人像的四周是由葡萄藤环绕的题词:

“我和你嘴靠嘴
向我的世纪挑战。”^③

① 见小册子《对自由派议员冯·芬克的又一评论和施普罗赫费耳-埃尔伯费尔德的道路建筑的有教益的历史》1849年哈根版。

② 文字游戏:“白铁”Blech也有“胡言乱语”的意思。——编者注

③ 此处套用了席勒剧本《唐·卡洛斯。西班牙王子》第1幕第9场中的话。——编者注

十一

一件诉讼案

1860年1月底,伦敦收到两号柏林《国民报》,报上有两篇社论,第一篇的标题是《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国民报》第37号),第二篇的标题是《怎样伪造激进传单》(《国民报》第41号)。弗·察贝尔用这两个不同的标题发表的两篇社论,不过是对福格特的“主要著作”加过工的 in usum delphini²⁸²版本。这一著作本身是过了很久才到伦敦的。我决定马上在柏林对弗·察贝尔的诽谤提起诉讼。

10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的谩骂堆积如山,我只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即在像科隆共产党人案件那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用文字的形式予以回敬。据我看来,报刊有权冒犯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公众人物。如果我认为攻击是值得注意的,那么,我这时所遵循的格言是:à corsaire corsaire et demi(魔高一尺,道高一丈)。^①

这一次,情况并非如此。察贝尔攻击我进行了一系列犯法的和可耻的活动,而且是在那些怀有党派偏见从而轻信荒唐透顶事情的读者面前攻击我的。另一方面,由于我离开德国已有11年之久,这

① 法国谚语,直译是: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编者注

些读者根本缺乏判断我的为人的依据。撇开政治上的考虑不谈,就是为了我的家庭,为了妻子儿女,我也有责任使察贝尔破坏我名誉的攻击受到法庭审理。

我提起的诉讼方式,一开始就排除了像福格特反对《总汇报》诉讼中出现过的那一类错中错的法庭喜剧。即使我异想天开,想在由于袒护福格特而撤销了一个刑事案件的法济法庭上控告福格特,那么具有决定性的重要问题也只能在普鲁士、而不能在日内瓦解决;相反地,察贝尔提出的惟一论点(他可以在福格特那里为这个论点找证据),依据的是一些假文件,而这类文件,察贝尔在柏林能够像他的朋友福格特在日内瓦一样轻而易举提供出来。对察贝尔的“控诉”包括下列几点:

(1)察贝尔在1860年1月22日《国民报》第37号上的一篇题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的文章里说:

“福格特在136页及以下几页上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个群体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明显的首领。这些同行们的政治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这种蛊惑人心的幻想开始不仅迷惑了一些比较优秀的流亡者,而且还迷惑了维利希志愿军中的一些工人。他们在流亡者中间继续《莱茵报》^①的事业,该报1849年曾劝阻参加运动,并一贯攻击所有议员,因为据说运动仅仅是以帝国宪法为内容。硫磺帮对它的信徒们严加管束。在他们中间,谁企图用某种方式取得一点社会地位,谁就会因为想闹独立而被认为是革命的叛徒;必须预料到革命随时都会重新爆发,因此必须把革命的士兵准备好,以便投入战斗。在这一伙精心保存下来的二流子堆里,经常因为散布流言和散发书信等等而发生纠纷、殴打和决斗。这个人怀疑那个人是间谍和反动分子,谁也不相信谁。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

① 应为《新莱茵报》。——编者注

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根据‘谁要不是无条件地赞成我们，他就是反对我们’这个原则，对任何反对这些阴谋的人，不仅要在流亡界中，而且要借助报刊‘搞垮’他。‘无产者’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版面，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为了作进一步的说明，福格特还引证了前中尉泰霍夫 1850 年 8 月 26 日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无产者’的原则、活动、纠纷和钩心斗角的秘密同盟，从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他那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严密地控制着硫磺帮。”

为了便于理解下一部分，应当即刻指出：察贝尔在上面引证的摘录中自称是转述了福格特的“报道”，往下他为了更好地说明硫磺帮，则以自己的名义接二连三地搬出巴黎的舍尔瓦尔案件¹³³，科隆的共产党人案件¹³⁵，我写的有关该案件的小册子，李卜克内西的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和通过我建立起来的李卜克内西同《总汇报》的关系，奥利“也是硫磺帮的一个渠道”，最后还有 1859 年 10 月 20 日比斯康普给《总汇报》的信，然后他用下面的话来结束：

“在比斯康普写信以后过了一个星期，马克思也写信给《总汇报》，表示愿意向该报提供一份‘司法文件’作为反对福格特的证据，这件事我们也许下次还会谈到。《总汇报》的通讯员就是如此。”

从第一号整篇社论中，我只把作为第(1)点加以转载的摘录拿来当作起诉材料，而且只从那里拿来下面这几句：

“〈由马克思操纵的〉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

我在这里当然要求察贝尔提出**真凭实据**，来证明他的论点。我在给我的律师、柏林的法律顾问韦伯先生的第一个情况通报中说，我向察贝尔不是要“几百封恐吓信”，甚至也不是一封信，我只要他哪怕是提供出一行字，能揭发我党的某一个著名同志参与过察贝尔所指的可耻行径。察贝尔只要去找一下福格特即可，福格特会即刻通过邮局给他寄来成打的“恐吓信”。万一福格特不能从几百封恐吓信中提供出一行字，那他总该能说出遭到过上述勒索的几百个“住在祖国的人”的名字。既然这些人是住在“德国”，那么，这些人去柏林的法院无论如何要比去日内瓦的法院容易些。

总之，我控告察贝尔的第一号社论仅限于一点——**用在政治上败坏住在德国的人的名誉的办法，来勒索他们的钱**。同时，为了反驳他的第一号社论的其余论点，我列举了一些事实。在这里我没有要求**真证据**，而是引用了假证据。

关于**硫磺帮或者也称做制刷匠帮**的问题，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已讲得够清楚了。要弄清**共产主义者同盟¹²²**的性质和我参加同盟的情况，可以把科隆的亨·毕尔格尔斯，即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判刑者之一，传到柏林去做证人，要他在法庭上发誓作证。其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文件中找到了一封写于1852年11月的信，这封信的**真实性**以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邮戳为凭。我在信里通知他，根据我的建议同盟已被解散，同时谈到在解散决议中所列举的理由：自从科隆的被告被捕以来，同大陆上的一切联系都已断绝；这样一个宣传协会根本不再合时宜了。至于察贝尔无耻地说我“同德国和法国秘密警察”有联系，这一点应该由科隆的共产党人案件来证实，一部分应该由巴黎的舍尔瓦尔案件来证实。我以后还要回过头来谈谈后一案件。关于前一案件，我已把我在1853年出版的《揭

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寄给我的律师，并提请他注意：可以把科隆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传到柏林，要他发誓作证，证明我曾参与过揭露警察的可耻行径。察贝尔断言，我和我党同志曾以对“不尊重”我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版面”。我对这种断言提出了相反的事实：除了《新奥得报》惟一例外，我从来没有——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从国外向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寄过通讯。我在这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必要时还有该报的编辑之一埃尔斯纳博士的证词，可以证明，我从来都认为值得提及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名字。至于谈到《总汇报》上李卜克内西的通讯，那么，他给该报撰稿开始于1855年春天，即在“同盟”解散3年之后，而且我事先一无所知；此外，在这些通讯中——《总汇报》的许多全年合订本可作证明，——对英国政策作了符合他的党的观点的报道，但是只字未提“民主主义者”。如果说李卜克内西当我不在伦敦时给《总汇报》寄去过一份伦敦出现的反对“民主主义者”福格特的传单，那他是充分权利这样做的；因为他知道，这份传单的出版者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福格特曾亲自邀请他参加他的“民主主义者”宣传，也就是说，把他看成是跟他本人平起平坐的“民主主义者”。察贝尔把我变成“《总汇报》通讯员”，这种可笑的捏造，奥尔格斯先生已在奥格斯堡案件开始前几天写给我的一封信（附录10）中予以令人信服的反驳；他在这封信中还试图纠正他所假想的我对《总汇报》的“自由主义”偏见。最后，察贝尔说“在比斯康普写信以后过了一个星期，马克思也写信给《总汇报》”的谎言是不攻自破的，因为比斯康普的信是在1859年10月20日写的，而我根据奥尔格斯的请求转寄“文件”时所附去的短笺，1859年10月24日已提交到奥格斯堡地方法院了，那就是说，这一短笺不可能是1859年10月29日在伦敦

写的。

为便于法庭审理,我认为有必要给我提出的证据补充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将把“民主主义者”察贝尔企图对我在流亡者中间的地位和我在国外的“活动”所进行的下流无耻的诬蔑,奉还诬蔑者。

从1843年底到1845年初,我第一次居住在巴黎,直到基佐把我驱逐出境。为了说明我居住巴黎期间我在法国革命党内所处的地位,我把弗洛孔的一封信寄给了我的辩护人,他以1848年临时政府名义收回了基佐的驱逐令,并且邀请我从比利时回到法国(附录14)。从1845年初到1848年2月底,我居住在布鲁塞尔,直到罗日埃把我从比利时驱逐出境。后来,布鲁塞尔市政当局把因驱逐我出境而逮捕我和我的妻子的那个警官撤了职。在布鲁塞尔有一个国际民主协会³¹²,协会的名誉主席是抵抗荷兰人而拯救了安特卫普的老迈将军梅利奈。主席是担任过比利时临时政府委员的律师若特兰;波兰人的副主席是前任波兰临时政府委员列列韦尔;法国人的副主席是1848年二月革命¹⁴⁶以后成了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的安贝尔;德国人的副主席则是我,我是在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工人协会¹⁴⁷会员和全体德国流亡者参加的一次公开集会上被选上这个职位的。若特兰(若特兰属于共和主义者的所谓美国学派,这是我不熟悉的派别)在《新莱茵报》创办时期写给我的一封信和我的朋友列列韦尔写的便笺,都足以说明我在布鲁塞尔民主派中间的地位。因此,我把它们都附在辩护文件里(附录14)。

1849年春我被赶出普鲁士,1849年夏末被赶出法国,随后我到了伦敦,在那里,在同盟解散(1852年)和我的多数朋友都离开伦敦以后,我避开了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团体,甚至避开了所有社交活动,虽然——经“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的许可——有时还向一部分优

秀工人作政治经济学的义务讲演。我是在1850年9月15日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¹³⁵的，它在1860年2月6日庆祝成立20周年；我应邀参加这次庆祝会，会上一致通过决议，“谴责”福格特指控我“剥削”德国工人，特别是“剥削”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是“诽谤”。担任工人协会主席的弥勒先生，1860年3月1日请弯街治安法庭确证这项决议真实有效。除了这一文件，我还给我的律师寄去英国律师、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的一封信（附录14），他在信里对《国民报》上的“infamous articles”（无耻文章）表示愤慨（厄内斯特·琼斯是在柏林出生和受教育的，他比察贝尔更懂得德文），同时他还提起我曾多年无酬为宪章派在伦敦出版的一些机关报撰稿。我在这里也不妨提一下，当英国工人议会³¹³1853年底在曼彻斯特开会时，伦敦的流亡者当中只有路易·勃朗和我收到了作为名誉会员出席会议的邀请函。

最后，因为正直的福格特硬说我“靠工人的血汗过活”（我从来没有拿过工人的一个生丁，或者向他们要过一个生丁），因为“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硬说我在政治上“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所以我请求《纽约论坛报》——这是美国第一流的英文报纸，拥有20万订户，因而几乎同比尔“推销员”或察贝尔的《民主派机关报》一样广为传播，——的副主编查理·安·德纳先生，对我10年来给《论坛报》和《美国百科全书》等等有酬撰稿一事提出书面证明。他写给我的那封使我深感荣幸的信（见附录14），是我认为有必要寄给我的律师用以回击福格特一察贝尔的第一号臭气弹的最后一个文件。

（2）我们在察贝尔的第二号社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1860年1月25日《国民报》第41号）中读到：

“天知道，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即《人民报》）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如果把这一段话孤立起来看，似可当成情不自禁的惊叹，就如我说：“有一个胖子，我在柏林念大学时就知道他是一个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已经堕落了蠢材——他办过一家托儿所，他在1848年革命以前的文学成就仅限于给一个小地方的文学小报发几篇剽窃来的文章——，这个胖子怎么会变成了《国民报》的主编、股东和‘有多余的钱的民主主义者’，只有天知道。而读过巴尔扎克的某一本小说^①和研究过曼托伊费尔时代²⁸⁹的人们，可以悟出这一点。”

察贝尔的上一段文字，是在他说我同法国和德国的秘密警察有联系，说我同警察当局勾结写了许多勒索钱财的恐吓信之后紧接着写的，并且把它同下述第(3)点中提到的“大量制造假钞”这句话直接挂钩，因而他的那段话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恶毒含义。它显然在暗示，我是用不名誉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的。

从曼彻斯特得到的1860年3月3日的 Affidavit^②，可以用来在法庭上驳斥察贝尔。这一 Affidavit 中说，由我转交给《人民报》的全部钱都不像福格特所说的是“从拉芒什海峡彼岸”弄到的，而是从曼彻斯特，从我的朋友们的腰包里弄到的，我本人付出的同等数量这部分除外（见《奥格斯堡战役》）。

(3)“为了说明”“在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的“策略”，弗·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说：

① 指巴尔扎克的《失去的幻想》。——编者注

② 向法官作的声明，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1852年,对瑞士的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的极端可耻的密谋(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等等。”

察贝尔就这样把福格特关于舍尔瓦尔的冒险事件¹³³的说法加以改造,把我变成“大量制造假钞”的道义上的祸首和有罪的同谋者。我所掌握的用来驳斥“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的这种说法的证明材料,包括了从舍尔瓦尔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到他在1854年逃出日内瓦的整个时期。卡尔·沙佩尔1860年3月1日在弯街治安法庭上提出的 Affidavit 证明,舍尔瓦尔先于我加入伦敦的同盟;他从1850年夏到1852年春一直住在巴黎,他在巴黎不是同我而是同敌视我的沙佩尔和维利希的反同盟有联系;在他被安排逃出圣佩拉日耶监狱和重返伦敦(1852年春)以后,参加了当地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从1850年9月起已不再属于该协会),一直到他在那里终于被揭发、被宣布为无耻之徒并被开除为止。其次,科隆的律师施奈德尔第二能够发誓作证,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期间,对舍尔瓦尔所进行的揭露,即他同伦敦的普鲁士警察有联系等等,是由我发起的。我在1853年发表的《揭露》证明,我在案件结束以后公开揭发了他。最后,约·菲利浦·贝克尔的信提供了有关舍尔瓦尔在日内瓦时期的材料。

(4)“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以大笨蛋的逻辑,对反福格特的传单《警告》胡诌了一大堆废话,并且多方怀疑我寄给《总汇报》的费格勒关于该传单来源的证词,此后他是这样结尾的:

“他(布林德)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把他当成替罪羊,对于该派来说并非难事,而为了对福格特提出的控告有分量,就必须把控告归结到某个应对此承担责任的人身上。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事先在同马克思的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

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作品……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马克思或者布林德看成是传单的作者”，等等。

察贝尔在这里指控我用布林德的名义伪造了文件，即传单《警告》，指控我后来寄给《总汇报》一份假证词，把布林德说成是我所伪造的传单的作者。从司法上对“民主主义者”察贝尔的这些说词加以反驳，既是致命的又是简单的。这些反驳就是上引的布林德致李卜克内西的信、布林德在《自由新闻》上发表的文章、维厄和费格勒的两份 Affidavits(附录 12 和 13)以及印出来的医学博士沙伊伯勒的声明。

大家知道，在《研究》里嘲笑巴伐利亚政府的这位福格特，1859年8月底对《总汇报》提起诉讼。《总汇报》9月就已设法使法庭对案件的公开审讯延期，然而，尽管延期，案件仍然在1859年10月24日审理了。既然在黑暗的王国巴伐利亚发生了这类事，那么，在光明的王国普鲁士又有何事是不可以预料的呢，“柏林有的是法官”这句谚语当然更不用提了。

我的律师、法律顾问韦伯先生是这样草拟我的起诉书的：

“《国民报》编辑察贝尔博士在登载于该报本年第37号和第41号的社论里，一再公开地诽谤我，并且特别攻击我：(1)用不名誉的和犯罪的手法敛钱并已收敛到钱；(2)伪造匿名传单《警告》，违背良知，不仅向《总汇报》谎称某位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而且企图用一份我不得不确信其内容虚假的文件来为此作证。”

法律顾问韦伯先生起初选择了刑事追究的途径，就是说，他把察贝尔的诽谤通知检察官，要当局对察贝尔提出追究。1860年4月18日下达了如下“决定”：

“原件由法律顾问韦伯先生退回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并通知:此案不存在使我有理由提出追究的公众利益(1851年4月14日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

王国市法院检察官

签名:利珀

4月18日于柏林”

我的辩护人向检察长上诉,并于1860年4月26日收到第二个“决定”,全文如下:

“致王国法律顾问韦伯先生,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在此地的受托人。兹退回您今年4月20日在本院呈递的控告察贝尔博士进行诽谤的起诉书以及所附文件,并说明:毫无疑问,检察官在行使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所授予的自行决定权时,他所遵循的惟一考虑是,是否有某种明显的公众利益使之有必要提出追究。我在本案中必须与王国检察官一致对这个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因此驳回您的起诉书。

王国上诉法院检察长

签名:施瓦尔克

1860年4月26日于柏林”

我认为检察官利珀和检察长施瓦尔克的这两个驳回,是完全合理的。在各国,当然也包括普鲁士国家,所谓公众利益也就是政府利益。普鲁士政府,在追究“民主主义者”察贝尔对我诽谤一事上,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某种明显的公众利益”。普鲁士政府的利益倒是在相反的方面。加之,检察官没有法官的那种加以判断的权利;他必须盲目服从——甚至违反自己的信念和观点——他的上司的命令,归根到底是司法大臣的命令。因此,事实上我完全同意利珀和施瓦尔克两位先生所作的决定,但是我对利珀援引1851年4月14日刑法典施行法规第十六条存有法律上的疑问。普鲁士法典中没有一条责成检察机关说明它为什么不使用它的追究权。在利珀援引的第

十六条中,对这一点也只字未提,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援引它呢?

于是我的律师按**民事**起诉,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普鲁士政府没有公共利益要追究弗·察贝尔,那我就更有重大的个人利益来自卫。现在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出现。只要能使弗·察贝尔受到公开审判,至于**判决**如何,对我无所谓。但是,当我得知问题根本不是从司法上来审查我的起诉,而是从司法上来审查我有没有**权利**对弗·察贝尔**起诉**时,请想一想,我感到多么惊讶啊!

我惊奇地获悉,根据普鲁士的法院规程,在法官办理控告以前,即在对实际宣判进行准备以前,任何原告都必须在向法官呈交的案件中使他能够看出你是否有**起诉权**。在预先审查案卷的这一过程中,法官可以要求提出新证据,或者不接受一部分旧证据,或者认定根本没有**起诉权**。如果法官愿意承认被告有起诉权,那他就办理起诉,开始进入法庭辩论的程序,而案件将由作出的判决解决。如果法官否定起诉权,那他就简单地用命令、用**决定**的方式驳回原告。这种诉讼程序不仅是诽谤诉讼所固有的,而且是一般民事诉讼所固有的。因此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诽谤诉讼也像其他一切民事诉讼一样,由各审级用这类官方的**决定**驳回,也就是说,永远不予受理。

应当说,不承认私人在他个人的私事方面有**起诉权**的法律,也就是对市民社会最起码的根本法还认识不清。起诉权由独立的私人的理所当然的权利变成了国家通过它的司法官员所赋予的特权。在每次法律争论中,国家就置身于私人 and 法庭之门中间,法庭之门已成国家的**私有财产**,任它随心所欲地打开或关上。法官首先作为官吏来作出**决定**,以便随后作为法官来**判决**。一个法官,他没有审问被告,不经过法庭辩论的程序,就**预先**作出是否有**起诉权**的**决定**,他,比如说,站在原告一边,即作出在某种程度上认定控告合法,也就是在某

种程度上对被告不利的决定，——这同一个法官在后来真正开庭审讯时应该不偏不倚地作出有利原告或被告的判决，也就是说，应该对他自己的预先决定作出判决。乙打了甲一记耳光。在甲没有彬彬有礼地从司法官员那里得到起诉的许可以前，他不能对这个打人者起诉。甲拒绝还给乙一块土地，乙为了能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所有权，需要取得预先的许可，而这种许可是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的。乙在报刊上公开诽谤甲，而司法官员也许悄悄“作出决定”，认为甲无权对乙提出控告。不难理解，这样一种诉讼程序，就是在纯粹的民事诉讼中也会闹出什么样的咄咄怪事来。至于各个政党在报刊上相互诽谤，那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知道，在所有国家，甚至在普鲁士，法官也是同其他人一样的人。要知道，甚至普鲁士王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之一格策博士先生也曾在普鲁士贵族院说，1848年、1849年和1850年的内乱，使普鲁士的司法陷于混乱状态，需要一些时间来定向。谁能担保格策博士没有算错定向需要的时间呢？在普鲁士，起诉权——例如对诽谤者的起诉权——要靠一个官员的预先“决定”，而这个官员又会由于所谓“渎职”（见1849年7月10日暂行条例和1851年5月7日纪律法³¹⁴）而受到政府惩罚，即予以警告、罚款、强行调离或者甚至带有侮辱性地撤销其司法职务。这样的事，不用说向英国人解释清楚，就是要他们大致相信，也难上加难！

问题是，我打算出一本关于我反对弗·察贝尔的诉讼案件的英文小册子。埃德蒙·阿布在写他的《1860年的普鲁士》时，如果知道并能写出这样一个注解，即整个普鲁士君主国内，除了受拿破仑法典³¹⁵“恩施的”莱茵省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存在起诉权，他会不惜付出一切！人们到处都得受法院的苦，但是，只有少数国家才不许人们向法院提出控告。

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明显，我向普鲁士法院提出对察贝尔的诉讼，必然私下变成我越过察贝尔而同普鲁士法院打官司了。姑且不谈立法在理论上如何冠冕堂皇，还是让我们看看它在应用中的实际妙处。

1860年6月8日，王国柏林市法院作出如下“决定”：

“关于1860年6月5日马克思控告察贝尔进行侮辱一案的决定

1860年第三十八号案件

(1) 起诉因缺乏犯罪构成而予以驳回，因为此间《国民报》的两篇被指控的社论，只以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政治态度和匿名传单《警告》一事作为讨论对象，而两篇社论中所包含的言论和见解，既然是作者本人的，并不是简单地引证别人的，那它们就没有越过批评所允许的界限，因而根据刑法典第一五四条的规定，不能认为是应受惩罚的，因为不论从这些言论所采取的形式，或者从产生这些言论的情况来看，也都没有侮辱的意图。

王国市法院刑事庭

处理侮辱案件问题第一委员会(盖章)

1860年6月8日于柏林”

这就是说，市法院禁止我对弗·察贝尔起诉，并且解除了察贝尔的烦恼，使他不必要对自己的公开诽谤负责！为什么呢？“因缺乏犯罪构成”。检察机关拒绝为我出面反对察贝尔，是因缺乏任何明显的公众利益，而市法院禁止我自己出面反对察贝尔，是因缺乏犯罪构成。为什么没有犯罪构成呢？

首先，“因为《国民报》的两篇社论只同《总汇报》的政治态度有关”。

因为察贝尔事先无中生有地把我变成了“《总汇报》的通讯员”，所以他也有权把我变成他同《总汇报》吵吵闹闹的竞争中的替罪羊，而我甚至无权对权大无边的察贝尔的这一“决定”提出控告！硫磺

帮,制刷匠帮,法德密谋,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在日内瓦制造假钞,“《莱茵报》的事业”,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只同《总汇报》的政治态度”有关。

其次,弗·察贝尔并“没有侮辱的意图”,当然没有!这位好心肠的小子有的只是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用谎言杀害我的意图。

如果“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在《国民报》上说大量制造假钞,说我以第三者的名义伪造文件,说我在政治上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用揭发相威胁来勒索他们的钱等等,——那么,从法律上讲,察贝尔这时的目的只能是二者必居其一:不是诽谤我就是揭发我。如果是前者,察贝尔就应受到法庭的惩罚;如果是后者,他就有责任在法庭上拿出真凭实据!“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的其他私人意图同我有什么相干呢?

察贝尔进行诽谤,但没有“侮辱的意图”。他破坏我的名誉,其手法与那个土耳其人如出一辙,这个土耳其人砍掉一个希腊人的脑袋,但没有使他疼痛的意图。

察贝尔“侮辱的”特殊“意图”,——“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给我胡编乱造出累累劣迹,仅此一端就足以证明“侮辱”和“侮辱的意图”,——这位好心肠的察贝尔的恶毒意图,从他的第一号和第二号社论的字里行间全部流露出来了。

福格特的“主要著作”连同附录在内,不下278页。而习惯于“胡诌比说理更高明”^①的弗·察贝尔,废话连篇的弗·察贝尔,愚蠢的察贝尔,居然能把这278页压缩成报纸上的大约五小栏文字,而没有漏掉福格特对我和我党的任何一点诽谤。弗·察贝尔把该书最肮脏

^①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第5幕第1场。——编者注

的部分编成文选,从不那么粗俗的部分中作出内容摘要。弗·察贝尔习惯于从两个思想分子中拉出来 278 页,现在则把 278 页压缩成两篇社论,而在这一过程中,卑鄙的原子一个也没有丢掉。愤怒出诗人^①。要把察贝尔的水肿病脑袋像变魔术一般变成具有如此巨大压力的水压机,需要多少愤恨啊!

另一方面,愤恨遮住了他的目光,使他只要能再增加一点卑鄙的诋毁,就不惜把神奇的力量,真正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中从描述由我操纵的硫磺帮开始,并使我和我党同志有幸成为“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同时,他还说,“这些人”痛恨福格特,因为福格特同他们相反,经常拯救瑞士,然后,他继续写道:

“当福格特去年对《总汇报》提起诉讼的时候,该报收到伦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克普的一封信……写信人无耻透顶地自荐愿做李卜克内西先生之外的第二个通讯员。在比斯克普写信以后过了一个星期,马克思也写信给《总汇报》,并提供一份‘司法文件’作为反对福格特的证据,关于这个〈文件,证据还是福格特?〉,我们也许下次还要谈到。”

察贝尔 1 月 22 日许下这个诺言,1 月 25 日就在《国民报》第 41 号上兑现了,他写道:

“因此,布林德不承认自己是传单的作者;比斯克普在 10 月 20 日致《总汇报》的信中第一次……说他是传单的作者……为了继续坚持布林德是作者,马克思于 10 月 29 日写信给《总汇报》。”

由此可见,弗·察贝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先是在 1 月 22 日,后来在 1 月 25 日,即在经过三天考虑之后,——把神奇的力量加

① 这里套用了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在我的身上,使我有可能是1859年10月29日在伦敦写了一封信,而它在1859年10月24日就摆在奥格斯堡地方法院里了。而且,这两次他把这种神奇的力量加在我的身上,都是为了要说我寄给《总汇报》的“文件”同比斯康普致《总汇报》的不光彩的信之间有联系,为了让我的信看起来是比斯康普的那封信的续篇。除了愤恨、咬牙切齿的愤恨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使这位弗·察贝尔变成相信奇迹的、愚蠢无比的大傻瓜呢?

但是,市法院“继续辩护”说,察贝尔的第二号社论“只以匿名的传单《警告》一事”作为“讨论对象”。作为对象?应该说是借口。

艾塞勒—柏塞勒^①,这一次用“祖国之友”³¹⁶的名义作掩护,看来在1859年11月寄给“民族联盟”一封“公开信”³¹⁷,反动的《新汉诺威报》转载了这封信。“公开信”破坏了察贝尔的“民主”尺度,这种民主用对霍亨索伦王朝的卑躬屈节来平衡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狮子般勇猛。“公开信”使《新普鲁士报》乘机作出了决非独创的发现:如果民主一旦开始,它不一定就在弗·察贝尔身上和他的《民主派机关报》上结束。察贝尔大动肝火,写了第二号社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

这位了不起的察贝尔说道:“在我们邀请《十字报》同我们一起根据福格特所指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来审查传单《警告》一事时,我们希望该报最终承认:当我们在两个月以前说,给民族联盟的公开信适用于该报而不适用于我们,写这封信是为该报的篇幅而不是为我们报纸的篇幅时,我们毕竟是说得对的。”

所以,深知福格特激进主义秘密的“民主主义者”察贝尔,愿意从自己方面教会《十字报》也知道“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的秘密,或者像市法院所说的,“只以传单《警告》一事作为讨论对象”。弗·察贝尔

① 指卡·布林德和卡·沙伊伯勒。——编者注

究竟是怎样着手的呢？

他是从“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的“策略”开始的。他先讲“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隐藏在一个工人协会的背后，但以该协会名义从伦敦同国外的各工人协会通讯，“打算败坏这些协会的名誉”，从事“阴谋活动”，组织秘密同盟等等，最后还让起草一些“必然要引起警察”对各协会进行“追究”的“文件”，“打算败坏这些协会的名誉”。于是，为了开导《十字报》“怎样伪造激进传单”，察贝尔首先教给它，“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怎样伪造警察性质的“信件”和“文件”，但决不是“传单”。为了叙述“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他继续叙述说，“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1852年在日内瓦怎样“大量制造假钞”，即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为了叙述“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他说，“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1859年在洛桑盛会上怎样采用一些敌视瑞士和败坏工人协会名誉的“手腕”，即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他说，“比斯康普和马克思”怎样用只有“天”知道其来源的钱出版《人民报》，仍然不是“激进传单”，而是周报；在这一切以后，他为福格特招募局的清白说了句好话，但仍然不是“激进传单”。他就这样占用了《怎样伪造激进传单》这篇文章的三又四分之一栏中的两栏。这样一来，对他的文章的三分之二栏来说，匿名传单一事，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便于叙述“朋友”和同谋者弗·察贝尔在《总汇报》的政治态度》这一标题下还来不及告诉世人的那些福格特的劣迹。只是在最后，这位邓斯第一才谈到“伪造激进传单”的艺术，即谈到关于传单《警告》“一事”。

“布林德不承认自己是传单的作者；比斯康普在10月20日致《总汇报》的信中第一次厚颜无耻地说他是传单的作者……为了继续坚持布林德是作者，马克思于10月29日写信给《总汇报》说：‘因为布林德拒绝证实他对我和其他

人所说的话,我弄到了随信附去的文件。’”

察贝尔也觉得这一文件的真实性可疑,特别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出人意料地”补充说:“我们想让市政府(?)〈这是察贝尔的原文中的问号〉认证我们的签字”,因为察贝尔一劳永逸地决定,除了柏林市政府以外,不承认其他市政府。察贝尔接着谈到了费格勒声明的内容,这个声明促使布林德把霍林格尔和维厄的证明寄给《总汇报》作证,证明传单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排印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布林德写的,同时他还说:

“一向随机应变的马克思 11 月 15 日在《总汇报》上作了答复。”

察贝尔列举了我的答复中的各点,马克思说了这……马克思说了那……“除此以外,马克思引证”。这就是说,既然我“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说,那察贝尔当然是把我的答复中的各点告诉给了他的读者?那你们可就认识到你们的察贝尔了!他故意不提、掩盖和隐瞒了我的答复中的主要一点。我在 11 月 15 日的声明中列举了不同的各点,并标上了号码,即(1)……(2)……最后,(3)“……《人民报》上转载的”(传单)“用霍林格尔印刷所还保存的活字版排印,是偶然的。这样一来,也不用证词,只要把传单同《人民报》转载的传单稍加对照,就可以在法庭上证明,传单出自菲·霍林格尔印刷所”。这一点决定整个问题,察贝尔对自己说。这一点我的读者们不应该知道。他就这样巧妙地隐去了我的答复中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反而硬说我强词夺理。可见,察贝尔在叙述“传单一事”时,进行了两次捏造——头一次是日期,另一次是我在 11 月 15 日发表的声明内容。他通过双重捏造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伪造了”传单,而且伪造成“看起来像是”布林德的“作品”;我还给《总汇报》寄去了一份假证词,冒充费格

勒的证词,而且是故意这样做的。攻击别人伪造文件,并把伪造文件的责任诿罪于第三者,在柏林市法院看来,“没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更不包含“侮辱的意图”。

察贝尔在他的《怎样伪造激进传单》这个处方的结尾,突然想到他还没有把福格特的一个无耻臆造奉献出来,于是即刻在他的第二号社论的结尾赶紧加了这样一个注解:

“1850年曾发出另一个告德国‘无产者’的紧急通告,这个通告(福格特确信)是议会的狼,或者说被囚的狼草拟的,同时被偷偷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当局。”

察贝尔这个脑满肠肥的胖汉和民主主义者,报道了《新莱茵报》一位前编辑的这一警探趣闻以后,就笑嘻嘻地向他的读者告别了。“或者说被囚的狼”这几个字并不属于福格特,而属于弗·察贝尔。他的西里西亚的读者想必知道得很清楚,这里所谈的是他们的同乡、《新莱茵报》的前编辑之一威·沃尔弗。这位好心肠的察贝尔为了编造出《新莱茵报》同法国和德国警察当局之间联系的详情细节,真是挖空心思啊!他的西里西亚人或许会以为,这里所谈的是察贝尔自己的伯·沃尔弗,是察贝尔的天然上司(natural superior),大家知道,这个人同两位制造假情报的名家——伦敦的路透和巴黎的哈瓦斯——结成“秘密同盟”,按自己的一套方式用电报传播世界大事。但是,著名的秘密警探西格蒙德·恩格兰德尔是路透社的灵魂,也就是伯·沃尔弗—路透—哈瓦斯这个三位一体的活生生的统一。

尽管有这一切,尽管民主主义者察贝尔没有侮辱的意图,柏林市法院还是声称,在察贝尔的两篇社论里到底还是“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的言论和见解”,因而是“应受惩罚的”,无论如何是可以成为起诉对象的。那么,察贝尔就出来吧!把察贝尔交给我,让他在法庭

面前发抖吧！别动！——市法院喊道。市法院说，两篇社论里所发表的“言论和见解，既然是作者〈察贝尔〉本人的，并不是简单地引证别人的”，那就没有越过“批评所容许的界限”，不是“应受惩罚的”，因此，不仅不能惩罚察贝尔，而且不能向法庭对他提出控告；“案件应当终止，费用应由原告负担”。总之，察贝尔的“言论和见解”的诽谤性部分是“简单的引证”。我们走着瞧吧！

你们记得，这一章的开头就说，我对诽谤的控告是以察贝尔的两篇社论中的4点为基础的。在关于〈人民报〉的钱的来源一点中（即上述控告各点的第二点中），察贝尔本人并没有说他是引证，而且的确也不是引证的：

察贝尔（〈国民报〉第41号）：

“天知道是从哪里为这家慷慨分发的报纸〈〈人民报〉〉弄到钱的；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比斯康普都没有多余的钱。”

福格特（“主要著作”第212页）：

“〈总汇报〉的常任通讯员是这家报纸〈〈人民报〉〉的撰稿人，该报是用来路不明的款项创办起来的，因为不论比斯康普或者马克思，都没有为此所必需的资金（即为了用来路不明的款项创办报纸吗？）。”

在第二个被指控的地方（上面第四点），即攻击我以布林德的名义伪造文件的地方，察贝尔甚至明确地声明，他是以自己的，即察贝尔的名义说话的，而不是以福格特的名义说话的。

“我们”，——身为 Dulness 王国的统治者，察贝尔当然要用至尊的复数，——“我们觉得，把他〈布林德〉当成替罪羊，对于该派〈马克思派〉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

〈布林德的〉作品一样。”(《国民报》第 41 号)

我应当把我所指控的第三个地方(上面第三点)重新全部“引证”一下:

“因此,1852 年,对瑞士的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的极端可耻的密谋;这个密谋如果不被及时揭发,那就会给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麻烦。”

难道这就像市法院断言的那样是“简单的引证”,或者这到底是不是引证?这部分地是从福格特那儿抄袭来的,但决不是引证。

首先,察贝尔本人说他不是引证,而是以自己的名义讲话的,他在括号里向他的读者说:“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地方吧!日内瓦人知道:舍尔瓦尔 1853 年春才到日内瓦,他的“密谋”和逃亡是在 1854 年春发生的。因此,福格特在日内瓦不敢说“密谋”是在“‘1852 年’……策划”的。他把这个弥天大谎留给了柏林好心肠的察贝尔。此外,福格特说:

“纽金特(舍尔瓦尔)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制造假银行券等等)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主要著作”第 175 页)

可见,已经为制造假钞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但是还没有伪造出银行券和国库券来。与此相反,在察贝尔笔下,已经“制造了”,而且“大量”“制造了假银行券”。福格特说,按照章程,舍尔瓦尔密谋的“目的”是:

“通过他自己的手段,即通过大量制造假银行券和假国库券,来同专制作斗争。”(同上)

察贝尔抹去同专制作斗争,只留下“大量制造假钞”。在察贝尔

笔下,这便成了普通的公民犯罪,甚至没有用政治目的的虚伪借口在“秘密同盟”盟员面前稍加掩饰。察贝尔就是用这种手法“引证”“主要著作”的。福格特不得不把他的荒诞故事写成一本书。因此,他详加铺叙,造谣诽谤,东拉西扯,胡乱涂沫,大肆渲染,任意篡改,信口雌黄,随便发挥,存心搅乱,引经据典,无中生有,把臀部也变成了喇叭¹⁴⁵。这样一来,福斯泰夫的灵魂也就透过这些虚构的事实到处现形,而福格特则通过自己的叙述,又无意识地把这些事实变成原来的子虚乌有了。察贝尔本来要把这本书压缩成两篇社论,并力图不漏掉一点儿卑鄙齷齪的东西,现在除了每一个虚构的“事实”的残渣[caput mortuum]^①以外,他抛掉了一切,把这些诽谤的枯骨一颗接一颗地联成一串,然后用伪善者的热忱向这个玫瑰花环祈祷。

我们不妨以下面这件事做例子。我首先揭发出来的事实是:舍尔瓦尔是一名受雇于几个外国使馆的秘密警探,一名奸细,而福格特竟把自己的臆想同这一事实搅在一起,他的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纽金特(舍尔瓦尔)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制造假钞)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已经指定秘密同盟的一些轻信成员,要他们带上一包包(还没有制造出来的)假钞动身到法国、瑞士和德国去;但是接着就发生了向警察局的告密,同时可耻地把各工人协会牵连进去,等等。”(“主要著作”第175页)

因此,在福格特笔下,当舍尔瓦尔才仅仅准备好了为图谋制造假钞所必需的铜版和石版的时候,当他的密谋目的还没有达到,还缺乏犯罪构成的时候,当除了他本人以外,谁的名誉也还没有受到败坏的时候,舍尔瓦尔就已经把他自己的行动向警察局告密了。焦虑不安使福格特的舍尔瓦尔“可耻地”把“各工人协会”牵连到他的“密谋”中

① 直译是:骷髅。——编者注

去。利用舍尔瓦尔的几个外国使馆,就像舍尔瓦尔一样愚蠢,一样迫不及待地

“在秘密询问中要瑞士警察当局注意工人协会正在进行政治阴谋活动,等等”。

同时,这帮愚蠢的公使们,没有耐心等待他们委托舍尔瓦尔孵出的密谋成熟起来,而且出于幼稚般的急躁,竟白白地暴露了自己的代理人;他们在“边境上”布下宪兵,以便——“如果事情发展到”他们不让它发展的“地步”——“迎接”这帮携带他们曾经阻止制造的“假银行券”的舍尔瓦尔的特使们,

“并利用这一事件来一次大搜捕,在搜捕时,大批无辜者不得不为几个坏蛋干的勾当受过”。

当福格特往下说到“这整个密谋计划订得极其可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同意他:这个计划是订得极其愚蠢的,而当福格特大言不惭地结束说:

“我不否认,我为粉碎这些鬼域伎俩作出了我的重大贡献”

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懂得这番话的要害,并且一定会对我们这位快活的魔鬼捧腹大笑。现在把察贝尔僧侣式的编年史流水账同这比较一下吧!

“因此,1852年,对瑞士的各工人协会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银行券(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的极端可耻的密谋;这个密谋如果不被及时揭发,那就会给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麻烦。”

在这里,一大堆同样索然寡味的、同样可耻的事实都被装在一个短句里。这些事实是:“极端可耻的密谋”,日期是1852年;“大量制造假银行券”,即普通的公民犯罪;蓄意败坏“瑞士各工人协会”的名

誉,即背叛自己的党,可能给“瑞士当局”带来“莫大的麻烦”,即奸细为了大陆上暴君们的利益而反对瑞士共和国;最后是“密谋被及时揭发”。批评在这里失去了福格特叙述中所提供的一切支点,——它们纯粹被巧妙地去掉了。只有相信或者不相信。察贝尔用这种方式把整个“主要著作”中只要涉及我和我党同志的地方都一一加了工。海涅说得对:没有那个人像一头发狂的驴子那么危险。

最后,察贝尔在我指控的第四个地方(上面第一点),即第一号社论中开头揭露“硫磺帮”的地方,是这样写的:“福格特在第 136 页及以下几页上说。”察贝尔在这里不说他是否在归纳或引证。他避免使用引号。事实上,他不是**在引证**。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无可置疑,因为察贝尔把“主要著作”的第 136、137、138、139、140 和 141 页压缩在每行由大约 48 个字母组成的 51 行句子里,不留一点空白,这些句子倒是一个个排得密密麻麻,挤压得就像荷兰青鱼一样,加之还要在这 51 行句子中为自己的创作找到地盘。他要是碰到一个特别齜齜的句子,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塞进他的那一大堆东西里。此外,他把这些摘录杂乱无章地摆在一起,不按“主要著作”的页码顺序,而照他的目的所需要的那样排列。他把福格特一个句子的末尾按在福格特另一个句子的开头。为了构成一个句子,他又利用十几个福格特句子中的关键词。凡是福格特笔下有碍鲜明地表现诽谤的那些修辞学上的废物,察贝尔都给清除了。比如福格特说:

“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不得反抗敌诈的企图,并拿出钱来。”

察贝尔却说:

“败坏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

在其他场合，察贝尔认为在福格特缺少文采的叙述里是**模棱两可的东西**，都加以改动了。例如**福格特说**：

“……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对败坏他们名誉的那些事实保密。”

察贝尔则写道：

“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

最后，**察贝尔整句整句地加进自己制造的句子**，比如：

“**硫磺帮硬要它的信徒们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同时“他们”——即“**这些在流亡者中间继续《莱茵报》事业的同行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

可见，在我提出指控的四个地方，**根据察贝尔本人的说法**，就有3个地方属于**察贝尔**，而第四个所谓的“引证”，尽管它同其他引证混在一起，但**决不是引证**，更不是像**市法院**所说的是“**简单的引证**”，尤其不像同一个**市法院**所说的是引证“**别人**”（多数）的。相反地，在**察贝尔**所有谈及我的“**言论和见解**”里，没有一行包含（“容许的”或“不容许的”）“**批评和判断**”的话。

但是，我们姑且假定**市法院的事实前提**的真实性，同它的虚假性一样；假定**察贝尔**对我的诽谤只是引证，难道这种情况真使**市法院**有**合法权利禁止我对弗·察贝尔提出起诉**吗？在我下面即将引证的“**决定**”里，**普鲁士王国上诉法院**相反地解释说：

“无论上述文章提出的事实是**作者本人**说的话，还是从**第三者**说的话中引证出来的，均不能使**刑法第一五六条**规定的**犯罪构成问题**有任何改变。”

因此，是引证或者不是引证，“**民主主义者**”**察贝尔**都要对他“说的话”负责。**市法院**已经解释说，**察贝尔**对我说了本身就“**应受惩罚**”

的”话,不过这些话是引证,因此就保了险。让这种法律上虚假的借口见鬼去吧!——上诉法院喊道。这样,我终于能够把察贝尔抓住了,法院的大门就要敞开了,到意大利去,到意大利去!①

我的律师从市法院告到了上诉法院,而在1860年7月11日收到了如下的“决定”:

“今年1月22日和25日《国民报》第37号和第41号发表的题为《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怎样伪造激进传单》这两篇社论,不能看成是对原告、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诽谤。无论上述文章提出的事实是作者本人说的话,还是第三者说的话,均不能使刑法第一五六条规定的犯罪构成问题有任何改变。虽然如此,仍不能阻止报刊讨论和批评党派的活动及其政论性的争论,只要论战形式中没有侮辱的意图,而本案中是不能认为有侮辱意图的。

上述文章主要说明了:卡尔·福格特博士为一方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为另一方,在最近战争引起的支持意大利人利益或支持奥地利人利益问题上的观点冲突;支持奥格斯堡《总汇报》反对福格特的所谓伦敦德国流亡者参加了这一冲突;这些流亡者内部的分派结党和互相倾轧!

如果在叙述过程中,把原告对这些党派的态度和他部分地参加这些党派的活动,特别是他提供证明材料来竭力帮助奥格斯堡《总汇报》同福格特论战都纳入所议论的范围之内,那么,两篇社论中的有关各点,按原告本人的起诉书里所举的事实来看,与其说遭到了原告所希冀的反驳,不如说得到了证实。如果他进一步断言,说上述文章以侮辱他名誉的形式把他同党派阴谋等量齐观(诚然,文章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无原则的和不得体的),那么,这种断言不能认为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如果第一篇文章根据福格特的叙述指出说,‘1849年的流亡者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明显的首领’,而在谈到泰霍夫的信时说:‘……从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他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那么,这里实际上只是对福格特所称的‘硫磺帮’作一评定,而不是对马克思的攻击,在

① 这句话出自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册,在这里引申的意思是:(我们)已做好战斗准备。——编者注

这里反而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善于驾驭别人和具有优越性的人；文章更没有把他个人同那些被指斥为勒索和告密的人联系在一起。同样地，第二篇文章根本没有提到原告违背良知，硬说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也没有提到原告把第三者分明不可靠的证件转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至于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是值得争议的，原告在起诉书里引证了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和排字工人维厄的相反说法，自己也就承认这点。此外，根据原告自己的记述，后来有一位叫沙伊伯勒的人承认自己是这个传单的作者，而且是在《国民报》发表两篇文章以后。

因此，必须认为上月21日对王国市法院于同月8日所作的否决决定提出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兹予以驳回。由于没有根据的控告被驳回，应立即——为了避免强制追缴，——向本地市法院收费处缴纳25个银格罗申。

王国上诉法院刑事庭第二处

古特施米特 舒尔采

1860年7月11日于柏林

由此地法律顾问韦伯先生转交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

当我从我的律师先生那里收到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初看时忽略了开头和结尾；由于我不熟悉普鲁士法律，竟认为摆在我面前的是“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递交上诉法院的一份为自己辩护的文件的副本。我自言自语地说，察贝尔关于“卡尔·福格特博士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看法”（见附录15）和“意大利人利益和奥地利人利益”所说的那些话，一定是偶然地从供《国民报》用的一篇社论中错放进他的辩护词里去了。

“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写的两篇社论还不到六栏，然而，他在专谈我的四栏中只字未提这些看法和利益。察贝尔在他的辩护词中说我

“提供证明材料帮助奥格斯堡《总汇报》同福格特论战”。

他把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诉讼称之为《总汇报》同福格特的论

战。如果诉讼和论战是同一个东西,那么,难道我需要得到检察官、市法院和上诉法院等等的允许来展开同察贝尔的论战吗?但是,察贝尔甚至要人相信,他的两篇社论谈到我对《总汇报》的关系的“有关各点”,按我本人“所举的事实来看,与其说遭到我所希冀的反驳,不如说得到了证实。”与其说——不如说?!法律只知道:非此——即彼。察贝尔的“有关各点”究竟是些什么呢?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中指出我同《总汇报》的关系的“有关各点”是:

(1)李卜克内西是由于我给他正式签发一项证明文件,才成了《总汇报》通讯员的。我给法院的起诉书已揭发了察贝尔的谎言,我认为再举出其他“事实”来证明这种荒谬是完全多余的。(2)察贝尔说我在10月29日从伦敦寄给《总汇报》一项“司法文件”,这项文件在10月24日就呈交到奥格斯堡地方法院了,他并且在我举出的“事实”中找到了这“一点”的证明!察贝尔从我给法院的起诉书里举出的事实中看出来:的确,不问政治动机如何,福格特在还没有提出诉讼以前就企图公开地把传单《警告》的作者加在我的头上,在此以后,我寄出有关传单来源的文件就成为必需的了。(3)察贝尔说我是《总汇报》通讯员的那“一点”,我已用确凿的文件驳倒了。察贝尔的第二号社论《怎样伪造激进传单》,像早已指出的,谈到我同《总汇报》的关系时,只有以下“相关各点”,即说我自己伪造了《警告》,把它嫁祸于布林德,并企图通过费格勒的假证词来证明是布林德的粗劣作品。这些“有关各点‘按我的起诉书里’所举出的事实来看”是不是“与其说遭到了我所希冀的反驳,不如说得到了证实”呢?察贝尔本人所承认的则与此相反。

察贝尔能够知道沙伊伯勒是传单《警告》的作者吗?察贝尔必须

相信,根据我自己也承认“值得争议的”排字工人费格勒的证词是可靠的吗?但是,我到底在什么地方硬说察贝尔知道这些和相信这些呢?“相反地”,我的起诉书倒同察贝尔的“有关各点”有关——即说我“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说我后来企图通过费格勒的证词来证明它是布林德的粗劣作品。

最后,我发现察贝尔提出来给自己辩护的一个论点,至少在我看来颇为有趣。

“如果”,——他说,——“如果他(原告马克思)进一步断言,说上述文章以侮辱他名誉的形式把他同(硫磺帮的)党派阴谋等量齐观(诚然,文章(察贝尔的社论)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无原则的和不得体的),那么,这种断言不能认为是根据的……文章更没有把他个人同那些被指斥为勒索和告密的人联系在一起。”

罗马人据说是:“但愿在失去声音的时候也失去记忆”,^①显然,察贝尔不是这样的罗马人。他失去了记忆,但没有失去舌头。察贝尔不仅使硫磺,而且也使硫磺帮从晶态变成液态,从液态变成气态,以使用这种红色气体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他说硫磺帮是一个“党”,他从来没有把我同它的“阴谋”“等量齐观”,他甚至从来没有把跟我“有联系的”人同它的“勒索和告密”联系在一起。势必要把硫气变成硫华。

察贝尔在第一号社论(1860年《国民报》第37号)里,是从称“马克思”为硫磺帮的“明显的首领”开始他关于硫磺帮的“有关各点”的。察贝尔为了对硫磺帮“作进一步说明”,诚然没有点出硫磺帮第二名成员的名字,但他指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因为他引证的那封

^① 塔西佗《维塔·尤利·阿格里科拉》。——编者注

信,正是泰霍夫谈他同弗·恩格斯、康·施拉姆以及同我的会晤的。察贝尔说前面两个人是“硫磺帮”的样板。他接着又把舍尔瓦尔说成是驻伦敦的特使。然后就轮到李卜克内西了。

“这个李卜克内西,‘姓名已说明一切’^①,是马克思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内西一到达,就为马克思效劳,并且博得了他主子的一片欢心。”

紧跟李卜克内西后面的是“奥利”,“也是硫磺帮的一条渠道”。最后是“伦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这类说法接连不断地在第一号社论里出现,但是在第二号社论的结尾,又给硫磺帮追加了一个成员,威·沃尔弗——“议会的狼,或者说被囚的狼”,——他受托办理“发布紧急通告”这件要事。总之,根据察贝尔的“有关各点”,硫磺帮是由以下成员组成的:硫磺帮的首领——马克思;硫磺帮的样板——弗·恩格斯;硫磺帮的伦敦特使——舍尔瓦尔;马克思的“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李卜克内西;“也是硫磺帮的一条渠道——奥利”;伦敦的“另一个同伙”——比斯康普;最后是硫磺帮的紧急通告撰写人——沃尔弗。

如此这般拼凑起来的这个硫磺帮,在察贝尔社论的前51行里,以各种不同的名称交替出现:“硫磺帮或者也称制刷匠帮”;“在流亡者中间继续《莱茵报》事业的同伙们”;“无产者”,或者像第二号社论所说的“在马克思操纵下的‘无产者’的党”。

这就是硫磺帮的成员和名称。察贝尔在他的“有关各点”中对硫磺帮的组织作了简短中肯的描述。“马克思”是“首领”。“硫磺帮”形成他的“亲近”信徒的小圈子,或者像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所说的,

^① 李卜克内西这个姓的前一半——“李卜”的德文 Lieb 意为亲爱的、听话的,后一半——“克内西”的德文 Knecht,意为奴隶、仆从。——编者注

形成“亲马克思派”。察贝尔甚至提出了一个特征，可以根据它来识别“亲马克思派”。这就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一生中必定至少见到比斯康普一次。

“他”，——察贝尔在第二号社论里说，——“他〈布林德〉声明，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比斯康普，他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

因此，“亲马克思派”，或者本来的硫磺帮，——是这个帮的贵族，应当把它同第三等人区别开来，同一群“信徒”或同“那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一伙二流子”区别开来。就是说，首先是首领马克思，其次是本来的“硫磺帮”或“亲马克思派”，最后才是一群“信徒”或“一伙二流子”。分成这三等人的硫磺帮，是在纯斯巴达式的纪律环境中生活的。察贝尔说：“硫磺帮要它的信徒们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而另一方面，“马克思……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不言而喻，在一个组织如此完善的“帮”里，它特有的“阴谋”，它的“主要职业”，它作为一个帮所干的事情——所有这些都是按照它的首领的命令进行的，并被察贝尔着意地刻画成非常严酷地对待该帮的首领干的事情。究竟什么是这个帮的所谓正式职业呢？

“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以便这个帮保密，不败坏他们的名誉。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任何反对这些阴谋的人，不仅要在流亡者中败坏他的名誉，而且要遭到报刊的危害。‘无产者’对不尊重他们的那些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的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等等。”（《国民报》第 37 号）

察贝尔关于硫磺帮的这些“有关各点”，是从说我是硫磺帮的“明显的首领”开始的；接着他逐一列举了硫磺帮的“主要职业”，即勒索

金钱和进行告密等等,在此以后他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对硫磺帮的一般描述:

“……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福格特为了作进一步的说明,引证了前中尉泰霍夫 1850 年 8 月 26 日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他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

察贝尔描述硫磺帮时,开头是“推崇”我为该帮“明显的首领”,后来他又担心读者可能以为在明显的首领的后面还有一位不明显的首领,或者可能以为我因被“推崇”为达赖喇嘛而心满意足了。因此,他在描述的结尾,把我(是用他自己的话,而不是用福格特的话)由“明显的”首领变成非常严酷的首领,由达赖喇嘛变成“硫磺帮”的拿破仑。而他在他的辩护词中,正好提出这个地方作为证明,证明他没有把我同硫磺帮的“党派阴谋”(他在文章里把这些阴谋“尖锐地斥之为反常的,或者是无原则的和不得体的”)“等量齐观”。不,不完全是这样!他把我“等量齐观”了,但不是“以侮辱我的名誉的形式”。“相反地”,他给了我荣誉,把我提升为勒索者、写恐吓信的人、间谍、奸细、假钞制造者等等的拿破仑。察贝尔的荣誉概念,显然是从十二月帮¹⁰⁰辞典中借来的。那里也有“拿破仑式的”这个形容词。但是,我对他提出起诉,正好因为他给了我这种荣誉!我在我的起诉书中提出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地令人信服,以致察贝尔怎么也不愿跟我对簿公堂,——我证明了:他的关于硫磺帮的“有关各点”全是福格特的捏造和谎言,察贝尔“引证”这类东西不过是为了有可能把我“推崇”为这个硫磺帮的拿破仑。但是,难道他不是把我描绘成一个“具有优越性和善于驾驭”别人的人吗?难道他不是让我使这个帮服从纪律吗?他自己叙述了这种驾驭、优越性和纪律表现在

哪里。

“硫磺帮硬要它的信徒们服从一种极其严格的纪律。在他们中间，谁企图用某种方式取得一点社会地位，谁只要有一点点想要成为独立的人的愿望，就被认为是革命的叛徒…… 在这一伙细心保存下来的二流子里面，经常因为散布流言和散发书信等等而发生纠纷、殴打和决斗。”

但是，对于硫磺帮的“党派阴谋”（承蒙他把我同这些阴谋“等量齐观”），察贝尔并不满足于这种一般的描述。

“马克思派的著名成员”、“马克思最奴颜婢膝的信徒之一并博得了主子一片欢心的”李卜克内西，蓄意用“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来败坏瑞士工人们的名誉，在那里他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交到”正在蹲守的“宪兵手里”。“科隆案件期间”，这“某一位李卜克内西被说成是假记录本的编写人”（察贝尔当然忘记说，施梯伯的这个捏造，在案件审理期间就被公开地证明是施梯伯的谎言）。《新莱茵报》前编辑之一沃尔弗，从伦敦寄出一份“告无产者的紧急通告”，这个通告“他同时偷偷塞给了汉诺威警察局”。

察贝尔一方面把如此“著名的”同我有联系的一些人描绘成秘密警察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把我同一个“著名的”秘密警探、奸细和假钞制造者，即舍尔瓦尔牵连在一起。他对硫磺帮作了一般描述以后立刻叙述说，“有几个人”，其中包括舍尔瓦尔，“以工人的革命煽动家和秘密警察的同盟者这种双重身份”从伦敦去巴黎，在那里制造“所谓共产党人案件”等等。他在第二号社论里继续写道：

“因此，1852年，策划了一个大量制造假钞（详情见福格特的著作）的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

如果《国民报》的读者依照察贝尔命令式的要求，看看福格特著

作里的详情，那他们会找到些什么呢？那就是：舍尔瓦尔是由我派到日内瓦去的，在我的直接领导下策划了“大量制造假钞的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被察贝尔引向福格特那里去的读者还会找到下列东西：

“然而，马克思的个人态度在这种场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已经指出过，有些事情不管是马克思自己干的，还是他让自己帮里的某个成员干的，都完全无所谓，他反正无条件地统治着他的人。”

但是，察贝尔对自己之所为仍嫌不足。他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两篇社论的结尾，低声地对读者讲出他最后的话。他说：

“他（布林德）声明，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比斯康普；他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把他（布林德）当成替罪羊，对于后者（亲马克思派）来说并非难事……马克思派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把传单说成是布林德写的，正是由于……后者在同马克思的谈话中和在《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表示过类似的想法；利用布林德的这些意见和说法，就可以把传单伪造成像是他的（布林德的）作品一样。”

那么，这就是说，是“马克思派”，或者是“亲马克思派”，或者说是硫磺帮把传单“伪造成”像是布林德的作品一样的？察贝尔叙述了这种假定之后，就用下面一句话干巴巴地概括它的意思说：“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马克思或者布林德看成是传单的作者。”

那就不是马克思派或者布林德，也不是布林德或者亲马克思派，俗称硫磺帮，而是布林德或者马克思，干脆就是马克思。马克思派，亲马克思派，硫磺帮等等都不过是对马克思、马克思其人的泛神论称呼。察贝尔不仅把马克思同硫磺帮这个“派”“等量齐观”，他还把硫磺帮化为马克思这样一个人。这位察贝尔竟敢在司法机关面前说，他在他的社论里……没有以“侮辱荣誉的形式”把“原告”马克思同硫磺帮的“阴谋”“等量齐观”。他捶胸顿足地发誓说，他“更没有”把我

个人同被他“指控为进行勒索和告密的人联系在一起”！我心里想，察贝尔在法庭当众开庭时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什么样的角色啊！我舒畅地喊了一声，再次拿起我的律师寄给我的文件重新看了一遍；在末尾我觉得看到了弥勒、舒尔采一类的名字，但我马上就找到自己的错误。我手中的材料根本不是察贝尔的辩护词，而是由古特施米特和舒尔采签署的上诉法院的“决定”，这项决定剥夺了我对察贝尔的起诉权，而且，因我提出“申诉”，罚我 25 个银格罗申，并应立即交给柏林市法院收费处，以免强制执行。我真是大吃一惊。但是，当我重新细看“决定”时，我就不再感到惊奇了。

例 一

察贝尔在 1860 年《国民报》第 37 号社论中写道：

“福格特在第 136 页及以下各页说：在 1849 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这些人起初散居在瑞士、法国和英国，后来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明显的首领。”

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在 1860 年《国民报》第 37 号社论上读到：

“实际上，如果第一篇文章从福格特的叙述引证说：‘1849 年的流亡者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马克思先生推崇为他们的明显的首领’。”

察贝尔说：在 1849 年的流亡者中间，一群以硫磺帮、或者也以制刷匠帮知名的人逐渐聚集在伦敦，并在那里把我推崇为他们的明显的首领。在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笔下，察贝尔却是这样说的：1849 年的流亡者逐渐聚集在伦敦（这实在是不正确的，因为大部分流亡者都聚集在巴黎、纽约和泽西岛等地），并把我推崇为他们的明显的首领，人们没有给过我这种荣誉，察贝尔和福格特也没有强加

给我这种荣誉。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在这里决不是在归纳,而是在引证,他们把察贝尔不曾在任何地方发表过的词句放在引号内,当作他第一号社论中“从福格特的叙述”引证的一句话。显然,摆在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面前的是一份我和读者都不知情的《国民报》第37号秘密版。这就是产生这一切误解的原因。

《国民报》第37号秘密版同该号公开版的区别,不仅是个别句子中的异文。公开版的第一号社论的全部内容同该社论秘密版的内容,除几句话以外,毫无共同之处。

例 二

察贝尔在把我推崇为硫磺帮的首领以后,在《国民报》第37号上写道:

“这些同行们〈硫磺帮〉……在流亡者中间继续〈莱茵报〉的事业……硫磺帮的主要职业之一,是败坏住在祖国的人的名誉,使他们拿出钱来……‘无产者’……所进行的告密,塞满了德国反动报刊各栏,他们成了法国和德国秘密警察的同盟者。福格特为了进一步说明〈说明这个“硫磺帮”还是“无产者”〉,引证了……泰霍夫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无产者’的原则、阴谋等等;从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他的那种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

在察贝尔把我推崇为1849年流亡者的首领以后,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在《国民报》第37号上读到:

“如果它〈《国民报》的第一篇文章〉往下谈到泰霍夫的信说:‘从信中可以_。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他的那种拿破仑式的高傲态度和智力上的高人一等来非常严酷地对待硫磺帮’。”

如果法官们在法律上拥有给予或剥夺私人起诉权的大权,那么,古特施米特先生和舒尔采先生不仅有权利,而且甚至有义务不承认

我有对察贝尔起诉的权利。因为他们简略报道的《国民报》第 37 号**秘密版**社论的内容,完全排除了任何犯罪构成。察贝尔在**秘密版**上究竟发表了什么呢?首先,他给予我不应得的荣誉,让 1849 年聚集伦敦的全体流亡者把我“推崇”为他们的“明显的首领”。难道我是因为这一点“控告”他的吗?其次,他给予我同样不应得的荣誉,让我“非常严酷地对待”某一个同我毫无联系的**硫磺帮**,比如说,就像我在 1848—1849 年非常严酷地对待察贝尔之流那样。我是因为这一点“控告”察贝尔的吗?

可见,如果立法允许司法官员“决定”,而且是秘密“决定”某个人是否有权控告另一个人(比如因在《国民报》上进行诽谤),那会造成怎样的混乱。原告根据发行量也许有一万份的《国民报》第 37 号公开版**提出控告**,而法官则根据为他单独准备的一份该号《国民报》**秘密版**作出**决定**。用这种程序,甚至连犯罪构成的同一性也很少有保证了!

普鲁士立法在每个案件中都使私人的起诉权服从于法官的裁定。因此,它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即国家是父亲般的政权,应当保护并管理国家的孩子们的私人生活。但是,甚至从普鲁士立法的观点来看,上诉法院的“决定”也是令人诧异的。普鲁士立法显然是想消除琐碎无聊的控告。因此,——如果我对普鲁士立法精神的理解是正确的,同时有理由假定它的目的并不是系统地拒绝起诉权,——因此,它给法官以驳回起诉的权利,但是,这只是对一眼看去**没有起诉的对象**,因而起诉一眼看去是琐碎无聊的而言。这是否适用于本案呢?市法院承认,察贝尔的社论**实际上**含有针对我的一些“侮辱荣誉的”,因而是“应受惩罚的”话语。它保护**弗·察贝尔**免受我的合法报复,仅仅是因为**弗·察贝尔**“简单地引证了”自己的诽谤。上诉法院说,不论是引证的或者不是引证的,侮辱荣誉的言论在法律上

一律应受惩罚；但是另一方面，它否认察贝尔的社论中有任何侮辱荣誉的言论——引证的或者不是引证的、侮辱我个人的言论。因此，市法院和上诉法院对犯罪构成本身的看法不仅是不同的，甚至是直接对立的。一个发现有侮辱我的言论，另一个却说没有。法官在对犯罪构成本身的看法上的这种矛盾，确凿证明了在这里一眼看去起诉对象是有的。如果帕庇尼亚努斯和乌尔皮安努斯说，这些刊出的言语是侮辱荣誉的，可是穆西乌斯·赛沃拉和马尼利乌斯·布鲁土斯却相反地说，这些刊出的言语是不侮辱荣誉的，那么，奎里特³¹⁸的人民将会怎样想呢？为什么人民不应该同乌尔皮安努斯和帕庇尼亚努斯一起相信，察贝尔在《国民报》第37号和第41号发表的东西是侮辱我的荣誉的呢？如果我要奎里特的人民相信，穆西乌斯·赛沃拉和马尼利乌斯·布鲁土斯给了我一份秘密证词，从这一证词来看，察贝尔的“侮辱荣誉的”言论和见解根本不是说我的，那么，奎里特的人民就会耸耸肩，说上一声：你讲给别人听吧！

因为上诉法院是决定犯罪构成的最后一个审级，也就是说，它应当最终决定：察贝尔的两篇社论事实上是不是侮辱了我的荣誉，有没有侮辱我的意图，因为上诉法院否认这种犯罪构成，所以，就只留下一个问题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即上诉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否存在法律的错误？上诉法院自身在“决定”中事实上认定：察贝尔硬说硫磺帮进行“无原则的、不体面的密谋”、“告密和勒索金钱”；这个硫磺帮，就是同一个察贝尔在同一篇社论里直截了当地称做“马克思派”或者“亲马克思派”的，而马克思则被认为是该派明显的和非常严酷的“首领”。上诉法院是否有合法的权利不认为这是侮辱我的荣誉呢？我的律师、法律顾问韦伯先生在递交最高法院的起诉书中对这一点指出：

“诚然，(察贝尔)在哪儿也没有直接说马克思勒索金钱，从事告密和制造假钞。但是，难道在下面一句话里这点说得还不够清楚吗：马克思是追求上述犯罪和不道德目标的一个派的首领？任何没有成见、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否认，要是某一个团体的目标和主要活动违法乱纪，这样一个团体的首领就不仅会赞同该团体的阴谋诡计，而且会亲自布置和指导这类阴谋诡计，并享受它的成果；毫无疑问，这个首领不仅作为参加者，而且作为出谋划策者，负有双重责任，即使没有一件事能证明他直接参加了某项确定的违法乱纪行动。在(上诉法院的)被抗辩的决定中表明的观点，可能造成如下的结果：一个人的好名声在想要败坏它的人们面前是没有保障的。诽谤者为了诽谤甲，不必说甲杀了人，只需说某处有一个干杀人勾当的帮，而甲是这个帮的头子就够了。上诉法院的观点保障这个诽谤者逍遥法外。按照正确的观点，无论诽谤者违背事实地把第三者诬称为强盗，或者诬称为强盗头子，他都同样应受到诽谤罪的惩罚。”

从人的健全理智来看，诽谤事实上是存在的。从普鲁士法律的观点来看，这种诽谤是否存在呢？上诉法院说：不存在，我的律师说：存在。如果上诉法院不顾市法院的意见而作出决定说：引证形式不能使诽谤者免受追究，那么，为什么最高法院不应当不顾上诉法院的意见而作出决定说：缘虫式的诽谤形式也不能使他免受追究呢？我的律师就这个法律问题，就上诉法院在认定犯罪构成上所犯的这一法律的错误，上告到最高法院，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上告到阿雷乌泊果斯^①。最高法院作出如下“决定”：

“(一)您今年8月23日对王国上诉法院刑事庭于今年7月11日就《国民报》编辑察贝尔博士侮辱卡尔·马克思博士一案所作决定提出的控告，经审查有关文件后，认为理由不足而予以驳回。(二)王国上诉法院并不认为《国民报》的两篇被指控的社论在客观上有侮辱起诉人名誉之处，也没有发现其中有侮辱起诉人的意图，因此，驳回对侮辱的起诉是正确的。确定客观上是否侮辱荣誉，是否有侮辱的意图，本质上是对事实的认定，只有当上诉法官在这方面的决定

^① 阿雷乌泊果斯是古代雅典的最高法院，意指最权威的审判。——编者注

犯了法律的错误时,才能向王国最高法院对他的认定提出控告。(三)但本案中
没有这种错误。(四)您须将这项决定的费用 25 个银格罗申在一周内缴纳本地
王国市法院收费处。

王国最高法院

冯·施利克曼

1860 年 10 月 5 日于柏林

交本地法律顾问韦伯。”

为了一目了然,我把最高法院的“决定”的各个组成部分编上号:
在这一点中,冯·施利克曼先生说,对上诉法院的控告已被“驳
回”。在第二点中,冯·施利克曼先生就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之间的
职权范围讲了一通显然同案件无关的官话。在第四点中,命令韦伯
先生在一周内把 25 个银格罗申交柏林市法院收费处,这是“决定”的
结果,当然不是决定的原因。

那么,决定“驳回”的理由是什么呢?对我的律师极其详尽的起
诉书的答复是什么呢?这就是:

第三点:“但本案中**没有**这种错误(法律的错误)。”

如果把第三点这句话里的“没”字去掉,那理由就是:“在本案
中有这种错误(法律的错误)。”这样一来,上诉法院的决定就会被推翻。
因此,这项决定之所以能维持,仅仅因为上面一句话里插了一个“没”
字,而冯·施利克曼先生就借助这个字代表最高法院“驳回”法律顾
问韦伯先生的申诉。

他本人亲自说的^①:**没有!**冯·施利克曼先生**没有**反驳我的律

① 据阿里斯托芬《云》(第 125 首诗)的记载,毕达哥拉斯的弟子们在援引
老师的学说时,经常这样讲。——编者注

I.
Die Schwefelbände.

Die „abgerundete Natur“, wie Abbotat Hermann vor dem Bezirksgericht in Augsburg seinen kugelrunden Klienten, den Erb-Bogt auf Nüdlingburg, partionnig kanzelnete, die „abgerundete Natur“ beginnt ihre Kampfgeschichtliche Geschichtsklitterung wie folgt:

„Unter dem Namen der Schwefelbände, oder auch unter dem nicht weniger charakteristischen der Dürfenheimer, war unter der Flüchtlingsschaft von 1849 eine Anzahl von Leuten bekannt, die anfangs in der Schweiz, Frankreich und England zerstreut, sich allmählig in London versammelten und dort als ihr sichtbares Oberhaupt Herrn Marx verehrten.“ Politisches Prinzip dieser Gefellen war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x.“ (p. 138. „Mein Prolog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von Karl Vogt.“ Genf. December 1850.) Das „Hauptbuch“, worin diese wichtige Mitteilung unterläuft, erschien im December 1850. Acht Monate vorher, Mai 1850, hatte jedoch „die abgerundete Natur“ im Vieler „Dauelscourler“ einen Artikel veröffentlicht, der als Grundriß der weitläufigeren Geschichtsklitterung betrachtet werden muß. Hören wir den Urtext: „Bei dem Umschlage der Revolution von 1849,“ so scheidet der Vieler Comissogeur auf, „hat sich nach und nach in London eine Lique von Flüchtlingen gesammelt, deren Glieder unter der schweizerischen Emigration unter dem Namen der „Dürfenheimer,“ oder der „Schwefelbände“ seiner (?) Zeit bekannt waren. Ihr Chef ist Marx, der frühere Redacteur der Rheinischen Zeitung in Köln — ihr Losungswort Sociale Republik. Arbeiterdiktatur — ihre Beschäftigung Anspinnen von Verbindungen und Verschwörungen.“ (Wieder abgedruckt in dem „Hauptbuch.“ Dritter Abschnitt. Documente No. 1, pag. 31, 32.)

Die Lique von Flüchtlingen, die „unter der schweizerischen Emigration“ als „Schwefelbände“ bekannt war, verwanzelt sich 3 Monate später einem geborenen Publicum gegenüber in eine über „die Schweiz, Frankreich und England zerstreute Masse“ die „unter der Flüchtlingsschaft“ überhaupt als „Schwefelbände“ bekannt war. Es ist die Geschichte von den Zeileisenmen in Kendall Green, so heißt er erzählt von Karl Marx, dem unsterblichen Sir John Falstaff, der in seiner epistolischen Wiederkehr keinesfalls an Stoff eingebüßt hat. Aus dem Urtext des Vieler Comissogeur ergibt sich, daß „Schwefelbände“ wie „Dürfenheimer“ Schwefel: Localgewächse waren. Sehen wir uns nach ihrer Naturgeschichte um.

Von Breunern belehrt, daß in dem Jahre 1849—50 allerdings eine Flüchtlingssgesellschaft unter dem Namen „Schwefelbände“ zu Genf blühte und Herr S. S. Dorkheim, wohlbestallter Kaufmann in der City von London, nähere Auskunft über Ursprung, Wachstum und Verfall jener genialen Gesellschaft geben konnte, wandte ich mich schriftlich im Februar 1860, an den mir damals unbekanntesten Herrn, und erhielt in der That, nach einer persönlichen Zusammenkunft, folgende Stizze, die ich unverändert abdrucken lasse.

London, den 12. Februar 1860.

18, Union Grove,
Wandsworth Road.

„Geehrter Herr!

Obgleich, trotz neunährigen Verweilens in demselben Lande und meistens in derselben Stadt, wir, bis vor drei Tagen, persönlich nicht mit einander bekannt waren, haben Sie doch nicht mit Unrecht vorausgesetzt, daß ich Ihnen, als einem Ritterfürden, die gewünschten Mittheilungen nicht versagen würde.

Wohlan dem zur „Schwefelbände.“

Im Jahre 1849, halb nachdem wir Russischen aus Baden hinabgejagelt waren, fanden sich, theils von den Schweizer Behörden dorthin ver-



师所阐明的法律理由，他**没有**讨论它，他甚至**没有提到**它。当然，冯·施利克曼先生有作出他的“决定”的充足理由，但是他避而不谈。**没有！**这个词的证明力仅仅依靠了权威，即依靠说这个词的人的等级地位。“没有”本身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没有！**”他本人亲自说的。

就这样，**最高法院也禁止我控告**“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

就这样，**我同普鲁士法院的官司宣告结束了。**

十二

附 录

1. 席利被驱逐出瑞士

席利关于他被驱逐出瑞士的信,说明非议员流亡者所受待遇之一例;可惜限于篇幅,我只能加以摘录。信的开头叙述两个德国流亡者,席利的友人比和伊^①离开日内瓦之后,在瑞士旅行时被捕;随后德律埃使他们重获自由,他们又返回日内瓦。

席利接着写道:“我受他们的委托,去访问法济,想弄清他们是否还会遭到缉捕,法济安慰我说:从州的角度来说,他不会泄露他们的化名,联邦当局也没有发来涉及他们的任何命令;不过,如果我以他的名义去找一下司法和警务部门的首长日拉先生,并转达他的话,那就更好。我照办了,取得了近乎同样的效果,我留下了住址,以备应付联邦当局有什么命令下达。数周之后,一位警吏来找我,要我说出比和伊的地址。我拒绝了,跑去找上述的日拉。他威胁说,如果我不说出他们的地址,就要驱逐我。我回答说,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你们可以把我当作调停人,但决不能把我当作告密者来传讯。于是他对我说:‘您似乎想承担一位大使的职责,在我和这些流亡者之间调停,就像是两个国家间举行谈判一样。’我回答说:‘我没有在您这儿当大使的奢望。’确实,我也没有受到任何大使的礼遇,便被撵出门了。在回来时,我得知比和伊二人刚被找到,遭到逮捕

① 比斯康普和伊曼特。——编者注

而且被带走了,既然如此,我可以认为上述的威胁已经消除。但是我没有考虑到4月1日^①,在1852年的这个倒霉的日子,一位警吏在街上请我陪他到市政厅走一趟,说有人要问我什么事。在那里,州政府成员、管理驱逐流亡者事务的日内瓦委员(当时驻日内瓦管理同样事务的联邦委员特罗格的助手)图尔特先生对我说,我已被驱逐,因此他应当立即把我送到伯尔尼,他表示非常遗憾,因为州当局对我没有任何恶感,但是联邦委员坚持要驱逐我。我请求引我去见联邦委员,他回答说:‘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干这儿的警务。’这同他先前的话自相矛盾,而且把他的日内瓦州政府成员的角色演糟了,因为这个角色在于用自由派的姿态抵制联邦当局的驱逐要求,而只在暴力下让步,但同时甚至高兴地或者恭顺地听命于轻微的压力。这个角色的另一特点是:背着被驱逐的人说他是奸细,为了‘正义事业’不得不加以驱逐……图尔特便是这样事后对流亡者们说,他不得不把我赶走,因为我同联邦委员勾结,而且同他一起反对他的(图尔特的)旨在保护流亡者的措施,也就是说,我同那位——使图尔特非常遗憾——下令驱逐我的委员进行秘密活动!真是胡说八道!什么样的谎言和矛盾啊!而且这一切都是为了赢得‘少许的人心’。当然,这位先生之所以官运亨通,只是由于能随风转舵。这位日内瓦大会议员和日内瓦州政府成员、瑞士联邦院或国民院的议员、天生糊涂的议员,所差的就只是坐镇联邦委员会来确保瑞士的安宁;难怪这样写着:神的意志和人的迷惘拯救了瑞士。”

席利到达伦敦之后,向雷辛(下面要谈到这个人)影响下的日内瓦《独立报》寄去一项抗议图尔特诽谤的声明,这家报纸不久前尖锐地抨击过“自由派耍花招的家伙们在驱逐流亡者出瑞士时”所使用的愚蠢的诽谤攻击,这项抗议没有被刊登。

席利继续写道:“从日内瓦市政厅出来,就进了监狱,第二天,在警察的押送下,乘邮车去伯尔尼,德律埃先生把我关在伯尔尼的所谓古塔内,严密监禁了两星期……”

德律埃在同被监禁的席利的通信(往下将谈到这些信件)中,把

^① 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编者注

全部过错都推给日内瓦州，而图尔特则保证说全是联邦当局的过错，日内瓦州当局对席利决没有任何恶感。不久前，日内瓦的检察官雷辛向他作过同样的保证。关于这位先生，席利这样写道：

“趁 1851 年夏天日内瓦举行联邦射手节的机会，雷辛当上了用法文和德文出版的《联邦射手节通报》的编辑，并聘请我为撰稿人，答应给我 300 法郎报酬；我的工作之一是现场记录委员会主席图尔特的德文欢迎词和欢送词。这个任务（我要对图尔特表示感谢，虽然是过迟的感谢）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因为他差不多每次都用同一套热烈的话语向不同的射手代表团致词，只是根据他所要恭维的是伯尔尼的熊、还是乌里的牛^①或是联邦的其他组织而稍加变换；因此当他重弹‘一旦发生危险，我们将如何如何’的老调时，我可以安然搁笔。雷辛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时，我就回答：‘这个关于危险的老调我已经背熟了。’但是我并没有从雷辛那里拿到我辛辛苦苦应得的 300 法郎，而是连吵带闹地要回 100 法郎，不过他要我继续为他准备在日内瓦创办的政治性刊物撰稿，他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不依赖任何现存党派，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的’法济—图尔特政府进行斗争，尽管他本人也属于这个政府。他非常适合于这样的事情，像他自己经常吹嘘的，能够‘剥掉任何人的皮’……为此目的，当我由于联邦射手节的劳累在瑞士旅行的时候，他委托我为这一事业四处拉关系，我照办了，回来后还向他作了书面汇报。但是，在这期间刮起了完全不同的一股风，把他全速从海盗航行中吹进现政府的安静港湾。这样，我就得自己承担一笔花销和失去一笔报酬，我一直要他偿付这笔报酬，但都白费劲，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个富翁……在我被捕前不久他还向我发誓说，他的朋友图尔特向他保证，根本谈不到我会被驱逐的问题，因此我不必采取措施来防备日拉的威胁等等……我身陷囹圄，绝望中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还我一点欠账，并请他解释发生的事（我的被捕等），尽管他向送信人保证满足我的要求，但一直音信全无。

……数月后，康^②（一个可靠的、没有成见的人）写信告诉我，我被驱逐是流亡的议员们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已由拉尼克爾在信的附言中确凿地证实了。许

① 熊和牛分别是伯尔尼州和乌里州的州徽图案。——编者注

② 弗·康姆。——编者注

多深知底蕴的人也表示了这种看法,后来我有机会亲自向他们了解过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然而我可不是鬣狗赖纳赫那样的专吃议员的妖魔,每天把已经归天的帝国摄政福格特从帝国的坟墓中拉到伯尔尼的餐桌上,使他像‘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的化身那样陪坐着,而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便把木乃伊及其化身贪婪地吞下去,引起满堂震惊。诚然,我不是议会功勋的崇拜者。恰恰相反!但是,难道这些先生们因此就想通过把我驱逐出帝国——瑞士也包括在帝国之内,因为在瑞士埋葬了帝国宪法和最后一次帝国国会闭幕式——来对我施加报复吗?我倒是认为,他们要迫害我,恐怕是如我前信中说的^①:议员们反对由我、贝克尔和几个日内瓦公民组织的日内瓦流亡者委员会……究竟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要夺取流亡者救济金的分配权,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包括巴登小议会的登策尔)采取的办法同我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是打算用这些钱来帮助特别困难的工人,而是想主要用来安抚职业受难者、革命英雄、过惯好日子的祖国儿子们……手工工人们说得好,对谁有利谁就干。由于我的活动确实给这些先生们造成不便,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怀疑:是不是他们利用了自己在领导层中的影响来清除我。大家知道,他们利用过上司的耳朵,不管怎样,他们离这只耳朵很近,可随时往里吹一些我如何不安分的话,特别是,首领图尔特不止一次地把他们拉拢在自己的周围……”

席利讲述了他从伯尔尼监狱古塔出来经过法国边境被押送到巴塞爾之后说:

“至于流亡者的放逐费用,我希望这笔费用不是由联邦国库负担,而是由神圣同盟支付。在我们踏上瑞士国土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奥丽珈公主同俄国驻伯尔尼代办^②在当地一家饭店共进午餐。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同可怕的赖纳赫不能相比),公主问她的同餐者:‘哦,男爵先生,这里还有很多流亡者吗?’那一位回答说:‘不少,公主,虽然我们已经送回去许多。德律埃先生正在尽力而为,如果我们得到新的经费,我们还会送很多人走。’这段话是当时侍候他们的一个侍役听到后转告我的,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他曾经是我指挥下的一名志愿兵。”

^① 见本卷第133—135页。——编者注

^② 帕·阿·克吕登纳。——编者注

在遣送席利的途中，他的行李神秘地不见了，再也没有找到。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阿弗尔从德国移民列车的混乱行李堆中突然失踪（我们在巴塞尔由移民局代办克伦克关进这趟列车，克伦克受联邦当局委派，把我们遣送到阿弗尔，而且流亡者的行李同移民的行李是完全混放在一起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只有借助流亡者的名单和他们的物品清单才能发生。或许瑞士驻阿弗尔领事——商人瓦纳更清楚这事，我们是先到他那里再继续被遣送的。他答应赔偿全部损失。后来德律埃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证实了这一诺言，为了在联邦委员会辩护我的起诉，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伯尔尼的律师福格特^①。但是他至今没有寄还这封信，也没有对我寄给他的任何信件作出答复。相反，1856年夏天我却遭到联邦委员会的坚决驳回，而且对这个决定没有作任何说明……

但是，所有这一切以及即使有很多宪兵押送和戴着手铐等等的驱逐，如果同遣送巴登人中的所谓较轻罪犯回国相比，同在睦邻协议的幌子下以特殊关切进行的遣送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后者领有特制通行证和回国后立即去地方当局登记的命令，回到家后，他们并不能如自己所想像的那样，重操旧业，而是要用各种始料未及的方法为自己赎罪。用这种办法引渡过来的这些人（因为引渡这个词恰如其分）所默默忍受的痛苦，还有待历史学家来记载和复仇者来报复。

瑞士的塔西伦在谈到瑞士的时候说，‘如果可以指出一个人的缺点而仍不失其为伟大’，这对于那个人来说就是一种赞扬。值得这样赞扬的材料并不缺乏；对瑞士给予这种赞扬并不会损害它一根毫毛……爱之深责之切。实际上，我这方面总是对瑞士怀有始终不渝的倾慕之情。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和人民。瑞士人随时准备熟练地使用保存在家里的火枪，以维护光荣的历史传统，维护精巧的家庭手工业的现代成果，因而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非常值得尊敬。他们理应得到别人的同情，因为他们自己同情别人争取美好命运的斗争。瑞士的一个农场主为南德起义失败感到懊恼，他说，‘我宁愿让我们上帝的那一对最好的天使死掉也比这好’。也许，他不会用他自己的马车为这事去冒险，宁可拿他自己的生命和火枪去冒险。因此，瑞士人即使由于有自己的世袭产业和为了保卫

^① 福格特的弟弟古·福格特。——编者注

这些产业而保持中立，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不是中立的。况且包藏着他们美好内核的中立的旧壳，显然受不了外人的这一切践踏——这正是中立的实质——，它很快会破碎，于是气氛也就澄清了。”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他在伯尔尼监狱的塔楼中，未能同德律埃会面，但是同这位先生通了信。席利写信问他被捕的理由，并要求允许他向伯尔尼的律师维斯进行法律上的咨询，德律埃在1852年4月9日这样答复说：

“……日内瓦当局决定把您驱逐出该州，命令逮捕您并把您解送到伯尔尼由我部处理，因为您是最不安分的流亡者之一，企图窝藏伊和伯，而您是有责任向当局报告这两个人的行踪的。由于以上原因，并且由于您继续留在瑞士将损害瑞士联邦的国际关系，联邦委员会决定把您驱逐出瑞士国境等等……由于逮捕您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您提交刑事法庭或违警法庭，而是考虑国家安全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所以您没有必要向律师咨询。此外，在按照您的请求允许您同律师维斯先生会晤以前……我想知道这次会晤的目的。”

席利经过再三申请才被允许给他在日内瓦的朋友们写的信件，每一封事先都须交德律埃先生过目。席利在一封信中用了这样的话：“呜呼，战败者”^①。于是，德律埃在1852年4月19日给他的信中写道：

“您给雅^②先生的信中说：‘呜呼，战败者’……您是否想说，联邦当局以对待战败者的态度对待您？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一种诬陷，我必须对此提出抗议。”

席利在1852年4月21日答复大权在握的德律埃说：

① 普劳图斯(虚假)。——编者注

② 雅科比。——编者注

“联邦委员先生，我不认为这样形容对我采取的措施就应当被指责为诬陷；至少这种指责不能使我放弃我是受到残酷对待的想法；恰恰相反，一个被监禁者从监禁他的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是倍加残酷。”^①

1852年3月底，在席利被捕和其他非议员流亡者被驱逐以前不久，反动的《日内瓦报》刊登了各色各样关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策划共产主义密谋的谣言：特罗格先生正在忙于清剿窝藏84条共产毒龙的德国共产分子的巢穴等等。除了这家反动的日内瓦报纸以外，还有属于议会帮的伯尔尼一个文丐——可以设想是卡尔·福格特，因为他在“主要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曾经从共产主义流亡者手中拯救过瑞士——，用笔名“ss”在《法兰克福报》上散布诸如此类的谣言。例如，他写道，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日内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由于不合理地分配救济金而垮台，已由一些正派人（议员）所取代，这些人将很快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其次，日内瓦的独裁者看来终于开始服从联邦委员们的命令，新近有两个属于共产主义派别的德国流亡者被捕，并已从日内瓦解送到伯尔尼，等等。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国民报》在1852年3月25日第72号上刊登了日内瓦的答复，其中提到：

“任何不怀成见的人都知道，正像瑞士仅仅致力于巩固和根据宪法发展自己的政治成果那样，本地留下的少数德国流亡者所做的，只是赚取每日的面包和一些毫无危害性的职业，关于共产主义的神话，只是庸俗的幻想家和政治上或本身有利害关系的告密者的臆造。”

文章指出《法兰克福报》驻伯尔尼议会的通讯员就是一个这样的告密者，然后以下面的话结束：

^① 席利和德律埃通信的原文是法文。——编者注

“本地的流亡者认为，他们中间有一些像昔日‘帝国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①的所谓‘正派人’，他们由于怀念祖国的肉锅³¹⁹，企图以这种反动的卑鄙勾当乞求本国君主的宽恕；但愿他们立即成行，免得再败坏流亡者和让他们避难的政府的名声。”

流亡的议员们知道，席利是这篇文章的作者。3月25日的巴塞尔《国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4月1日席利就无缘无故地被捕了。“神灵的怒火竟这样强烈？”^②

2. 穆尔滕革命代表大会

在穆尔滕的丑闻之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不包括流亡的议员）“向联邦最高司法和警务部”提交一份抗议书。我只引证其中的一段：

“……君主们并不满足于他们迄今所取得的外交成就。为了清除瑞士的流亡者，他们对瑞士磨刀霍霍，用军事占领相威胁；联邦委员会至少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表明了它对这种危险的忧虑。试看，紧随着又发生了驱逐事件，这次驱逐是以著名的穆尔滕代表大会为理由，宣称由于为此而进行的侦查，发现了政治宣传的倾向。这种说法受到现有事实的坚决驳斥……在法律上，必须确认，凡是存在法治的地方，只有法律规定应受惩罚的行为才能施以法律惩处；这一点也适用于驱逐出境，如果这种驱逐没有公开变成警察暴行的话。或许有人在这里又要抬出外交来反对我们，说什么出于尊重强邻和维护国际关系而不得不这样做吧？果真如此，那就让瑞士联邦的十字躲在土耳其的新月^③后面吧，新月会在逮捕流亡者的密探敲土耳其政府的大门时向他亮出它的双角，而不是蜷缩成十字；要是这

①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两个议员：弗·卡·比德曼和弗·丹·巴塞尔曼。——编者注

②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册。——编者注

③ 十字和新月分别是瑞士和土耳其的国旗图案。——编者注

样,那就发给我们去土耳其的护照吧,等大门在我们背后关上,把打开瑞士自由堡垒的钥匙当作采邑从属关系的标志交给神圣同盟吧,以便往后把这些钥匙当作神圣同盟侍卫官的勋章来佩带,上面的铭文是:瑞士的末日!”

3. 舍尔瓦尔

我从约·菲·贝克尔的信中看出,帝国的福格特所提到的“马克思的战友”或舍尔瓦尔的“战友”,除了现在居住在伦敦的施泰歇先生以外,不可能是别人。虽然我已经听到过不少对他的卓越而全面的艺术天才的赞扬,但这以前我还没有认识他本人的荣幸。由于贝克尔的信,我们才得以会面。下面就是我的“战友”写给我的一封信。

“1860年10月14日于伦敦

西中心区萨谢克斯街17号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承蒙您寄给我福格特小册子中有关纽金特(舍尔瓦尔-克雷默)文章的摘要,我非常乐意就此向您提供一些说明。1853年3月,我从意大利旅行回来时到了日内瓦。纽金特差不多同时也到了日内瓦,我是在一个石印厂认识他的。我那时刚开始从事石印工作,由于纽金特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又是一个非常热情、能干、勤劳的人,所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同他在一个工场工作。如果撇开小品文或小册子作者惯用的夸张手法不谈,福格特所提到的纽金特在日内瓦的活动,同我所听到的差不多。成绩是非常小的。我只认识这伙人中的一个,这是个和蔼、勤劳但又草率、轻浮的年轻人;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之一,所以很容易理解,纽在这伙人中主宰一切,别的人不过是好奇的听众罢了。我相信,既没有制成石版也没有制成铜版,但是我听到纽谈起过这样的事。我的熟人多半是日内瓦人和意大利人。我知道,后来福格特和其他我不认识的德国流亡者把

我看做奸细。但是,我并不介意——真相迟早会大白的;我甚至不责怪他们,因为当时确实有不少奸细,而且识破他们并不总是容易的,因此就易于引起怀疑。我几乎可以肯定,自从纽金特被逐出日内瓦以后,他没有同那里的任何人通过信。后来我接到他两封信;他邀请我去巴黎完成一件关于中世纪建筑学的工作,这工作我也做了。我在巴黎见到纽金特的时候,他完全不问政治,也不同别人通讯。根据上述情况,至少可以作出结论说,所谓‘马克思的战友’可能指的是我,因为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纽金特曾邀请其他任何人到巴黎去过。福格特先生当然不会知道,我从来也没有(无论间接也好或者直接也好)同您接触过,如果我不迁居伦敦,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认识您和府上的人,或许永远不会同您接触。

向您和您尊贵的眷属致衷心的问候

H.C. 施泰歇”

4.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我在本节内引用的关于科隆案件¹³⁴期间普鲁士驻伦敦使馆和它同大陆上普鲁士当局通信的论述,依据的是奥·维利希在《纽约刑法报》(1853年4月)上发表的《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威廉·希尔施的辩护书》³²⁰。这是现在被监禁在汉堡监狱的希尔施的自供;希尔施是警监格赖夫及其代理人弗略里的主要工具,并在他们的委托和领导下伪造了由施梯伯在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提出的假记录本。这里我摘录希尔施回忆录中的几段话:

“德意志各协会(在工业博览会期间)受到警察三巨头——普鲁士警务顾问施梯伯、奥地利的一位库贝什先生和不来梅警察局长洪特尔的共同监视。”

由于希尔施表示愿意当密探,因而同普鲁士驻伦敦使馆秘书阿尔伯茨有了第一次会晤。希尔施对这次会晤描写道:

“普鲁士驻伦敦使馆同它的密探们指定的接头地点安排在一家适合接头的酒馆。庙关弗利特街的‘雄鸡’酒店是不引人注意的，如果入口处没有一只金公鸡招牌，不是专门要找这家酒店的人就很难发现它。通过狭窄的入口我进到这家古老的英国酒店内部，当我问到查理先生时，一位大腹便便的人物出来说他就是，他和蔼地微笑着，就像我们两人已经是老相识了。这位使馆代表显得心情非常愉快，而白兰地和水使他的情绪更加高涨，以致一时间他似乎忘掉了我们会见的目的。查理先生或者使馆秘书阿尔伯茨（他立刻给我讲了他的真实姓名），首先声明他本来同警务毫无关系，但是他准备起中介作用……第二次是在黄金广场布鲁尔街39号他当时的住处会面的，在这里，我初次认识了警监格赖夫；这是个道地的警察型人物，中等身材、深色头发以及同样颜色的按官吏式修剪的连鬓胡——上唇髭同颊须连在一起，下巴剃得精光。他两眼无神，但由于经常同小偷和骗子打交道而习惯地显得非常凸出……格赖夫先生也像阿尔伯茨先生一样，最初对我说他叫查理。但这位新的查理先生至少态度更为严肃；他认为首先必须考验考验我……我们的初次会晤结束时，他分派我的任务是，向他详细报告革命流亡者的一切活动……第二次会面时，格赖夫先生向我介绍了一个人，他称之为‘他的左右手’，并补充说：‘即他的密探之一’。此人年纪很轻，身材高大，服饰雅致，介绍时又自称为查理先生；看来全体政治警察都用这个化名。于是，我现在就得同3个查理打交道。新来的这个人好像更引人注意些。他说‘他以前也是革命者；但是，只要我跟他一起走，什么都可以办到’”。格赖夫有一个时期离开了伦敦，他同希尔施告别时“直截了当地说，新查理先生总是按照他的委托办事的，即使有些事我觉得奇怪，也可以毫无顾虑地相信他；我不应当因此而感到不安。为了解释得更清楚，他补充说：‘内阁有时需要这种或那种东西，主要是文件；搞不到文件，就必须想出办法来！’”

希尔施继续说，最后一个查理是弗略里，他

“以前从事路·维蒂希主编的《德累斯顿日报》的发行工作。在巴登，根据他从萨克森弄来的介绍信，临时政府派他到普法尔茨组织战时后备军等等。当普鲁士人进入卡尔斯鲁厄时，他被俘，如此等等。1850年底或1851年初他突然又在伦敦出现。他一到伦敦就使用德·弗略里这个姓，并且用这个姓混入流亡者中间，至少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很苦。他同其他流亡者一起被安置在流亡者委员会建的住地，并领取救济。1851年初夏，他的生活状况突然好起来，他住进一

套相当好的住宅,年底同一个英国工程师的女儿结了婚。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巴黎当警探…… 他的真姓是克劳泽;他的父亲是鞋匠克劳泽,在大约15—18年前由于在德累斯顿刺杀雪恩贝格伯爵夫人和她的侍女,同巴克霍夫和贝泽勒尔一起在当地被判处死刑…… 弗略里-克劳泽常常对我说,他从14岁起就为一些政府工作”。

施梯伯在科隆法庭公开审判时承认,就是这个弗略里-克劳泽,直接在格赖夫手下任普鲁士秘密警探。在我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关于弗略里我是这样说的^①: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②,但他毕竟是一枝花,他将要开放,哪怕仅仅是开出一枝百合花^③。”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应验了。在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几个月,弗略里在英国由于造假被判处几年 hulks^④。

希尔施继续说,“弗略里作为警监格赖夫的左右手,当格赖夫不在时,直接同普鲁士使馆联系。”

同弗略里保持联系的有麦克斯·罗伊特,此人曾经从沙佩尔—维利希集团当时的档案保管员奥斯瓦尔德·狄茨那里偷窃过信件。

希尔施说:“施梯伯从普鲁士驻巴黎公使哈茨费尔特的密探,即臭名远扬的舍尔瓦尔那里得知舍尔瓦尔本人写往伦敦的信件,并通过罗伊特打听出这些信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27页。——编者注

② 玛丽花是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一个妓女的名字,而“弗略里”(Fleury)和“花”(Fleur)发音相似。——编者注

③ 恩格斯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在法国土语中,把在犯人身上所烙的字母 T.F.(travaux forcés,即劳役)称之为‘百合花’。”——编者注

④ 意为:在作监狱用的船上服苦役。——编者注

的下落,于是弗略里受施梯伯的委托在罗伊特的帮助之下进行了偷窃。就是这些偷来的信件,施梯伯先生在科隆陪审法庭上恬不知耻地以‘原件’提出来作证…… 1851年秋,弗略里同格赖夫和施梯伯同在巴黎;这以前,施梯伯通过哈茨费尔特伯爵的介绍同这位舍尔瓦尔,或确切些说,同约瑟夫·克雷默,打通了关系,他希望借助这个人来策划一件密谋。为此目的,施梯伯、格赖夫、弗略里等先生以及另外两个在巴黎的警探贝克曼^①和佐默尔,同著名的法国密探律西安·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进行了磋商,并且向舍尔瓦尔作了指示,要他根据这些指示制造他的信件。弗略里常常在我面前取笑施梯伯和舍尔瓦尔之间的那次寻衅;以斯特拉斯堡和科隆的一个革命联盟书记的身份,在舍尔瓦尔按警察局命令建立的协会里出现的施米特,不是别人,正是弗略里先生…… 毫无疑问,弗略里是伦敦惟一的普鲁士秘密警察局的密探,向普鲁士使馆提出的一切建议都要经过他的手…… 格赖夫和施梯伯两位先生在许多场合都听信他的意见。”弗略里通知希尔施说:“格赖夫先生已经告诉您应当如何行动…… 法兰克福中央警察局的意见是,首先必须保证政治警察局的存在,至于我们采取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那是无关紧要的;巴黎九月密谋已经使这方面前进了一步。”

格赖夫回到伦敦,对希尔施的工作表示满意,但是,他提出进一步要求,要关于“马克思派的同盟的秘密会议”的报告。

这位警监最后说:“无论如何要提供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您怎么做,悉听尊便,只是任何时候都不要超出情理。我本人太忙。德·弗略里先生将代表我同您一起工作。”

如希尔施所说,格赖夫当时正忙于同莫帕通信(通过德拉奥德-杜普勒),以便安排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从圣佩拉日耶监狱假逃,由

① 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75年第2版上加了注:“这就是在案件中作为阿尔宁出现的那个人物。”本附录4作为补遗收入该书。

恩格斯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第3版上对马克思的注作了补充:“他在当时以及后来许多年曾担任《科隆日报》驻巴黎记者。”——编者注

于希尔施肯定：

“马克思在伦敦没有建立同盟的任何新中央协会…… 格赖夫同弗略里商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时只有自己作出关于同盟会议的报告，格赖夫自愿负责使这些文件真实可信，而他提交的东西总是会被接受的。”

这样，弗略里和希尔施就着手工作。照希尔施说，他们关于由我召开的同盟秘密会议的报告“内容”是，

“举行了各种讨论，接纳了同盟新盟员，在德国某个角落建立了一个新支部，设立了某种新组织，在科隆马克思被监禁的朋友们有无获释希望，收到某人信件等等。至于最后一点，弗略里通常都借用那些在德国由于政治侦查已经被怀疑的人，或者进行过某种政治活动的人；然而还得经常靠幻想来帮忙，于是有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同盟盟员，他的名字世界上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格赖夫先生认为报告很好，无论如何必须把它搞出来。一部分报告由弗略里单独起草，但多数场合我都得帮助他，因为就是细小的记载他也不能用正确的文体写出来。报告就这样写成了，格赖夫先生毫不犹豫地担保报告的真实性”。

希尔施往下谈到，他和弗略里如何拜访了在布赖顿的阿·卢格和爱德华·梅因(托比的纪念物)，如何偷窃了他们的信件和石印的通讯。不仅如此，格赖夫—弗略里在斯坦伯里的印刷所(费特尔巷)里租用了一台石印机，同希尔施一起自己动手伪造起“激进传单”。其中有些东西对“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是有教益的。请他听吧：

“由我(希尔施)拟定的第一个传单，根据弗略里的建议，叫做《致农村无产阶级》；有许多份数印得不坏。格赖夫把这些印好的传单当作马克思派的东西散发出去，为了做得更像一些，他在用上述方法伪造的所谓同盟会议的公告中，还加上了几句有关散发这种传单的话，以说明传单的来源。类似的伪造还有一次，标题是《致人民的儿女》；我不知道，这一次格赖夫先生是用什么字号把它寄出去的。这种把戏后来停止了，主要是因为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

舍尔瓦尔在从巴黎假逃出去以后，到了伦敦，起初以每周 1 镑

10 先令的工资为格赖夫工作；

“他的任务是提供关于德法两国流亡者交往的报告。”

但是，在工人协会被公开揭露是个密探而且被赶出协会的

“舍尔瓦尔，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把德国流亡者和他们的机关报说得根本不值得注意，因为在这方面他实在无法提供点滴消息。但是，他却为格赖夫提供了一个关于非德国的革命政党的报告，他作这个报告的本领赛过了明希豪森”。

随后，希尔施又转回到科隆案件。

“格赖夫先生委托弗略里完成的同盟报告，其中凡是涉及科隆案件的，已经有人不止一次地询问过格赖夫先生这些报告的内容…… 为这件事也规定了明确的任务。据说有一次马克思用‘酒馆’的地址同拉萨尔通信，而国家检察官先生希望对此加以侦查…… 国家检察官先生的另一要求看来更为天真，他希望确切了解拉萨尔从杜塞尔多夫给科隆被监禁的勒泽尔的经济援助…… 因为这些钱本应来自伦敦。”

在第三章第四节里已经提到，弗略里受欣克尔代之托应当在伦敦搜罗一个人，以便在科隆陪审法庭上扮演失踪的证人豪^①等等，在详细叙述了这个插曲以后，希尔施继续写道：

“这时，施梯伯先生强烈要求格赖夫尽可能搞到他寄来的同盟会议记录的原本。弗略里说，只要给他配备几个人，他就能够搞出原本记录来。但是，这就必须弄到马克思的一些朋友的笔迹。我利用后一句话从我这方面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个问题弗略里只再提过一次，以后就没有再谈起。这时候，施梯伯先生突然带着伦敦召开的同盟中央协会会议记录本在科隆出现…… 当我从报纸报道的记录摘要中认出这同格赖夫委托弗略里捏造的报告几乎丝毫不差的时候，感到了更大的惊异。这就是说，格赖夫先生或施梯伯先生本人用某种办法制造

① 豪普特。——编者注

了一个副本，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原本记录中有签名，而在弗略里呈递的记录中则从来都没有签名。关于这个令人惊异的现象，我从弗略里本人那里只听到这样说：“施梯伯什么都会干，这事会取得轰动效应！”

当弗略里得知，“马克思”把所谓在记录上签了名的那些人(李卜克内西、林格斯、乌尔默等)的真实笔迹在伦敦治安法庭立了案的时候，他起草了下面这封信：

“致柏林王国警察总局。即日于伦敦。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企图证明同盟记录上的签名系伪造，他们打算在这里把这些签名立案，以后作为真实签名向陪审法庭提出。凡是熟悉英国法律的人也都知道，那些法律在这方面是可以多方利用的，为真实性作保证的人，实质上并没有提出真正的保证。报道这件事情的人，在事关真伪时并不害怕签上自己的名字。贝克尔，利奇菲耳德街4号。”“弗略里知道贝克尔的地址，这是一个德国流亡者的地址，他同维利希住在一所房子里，所以后来很容易使人怀疑这封信是马克思的敌人维利希写的……弗略里事先就为即将由此产生的丑闻感到高兴。他以为人们读到这封信时一定已经很晚，等到搞清这信的真伪时，案件早已结束了……用贝克尔署名的这封信的收件人是柏林警察总局，但是没有寄往柏林，却送给‘科隆法兰克福旅馆警官戈尔德海姆’了，这封信的信封寄到了柏林警察总局，里面附了一张字条：‘科隆的施梯伯先生将对此事详尽说明’……施梯伯先生没有利用这封信；他之所以不能利用是因为他被迫放弃了整个记录本。”

关于记录本，希尔施说：

“施梯伯先生(在法庭上)说，两星期前他已经得到这个记录本，并且在使用它以前慎重考虑过；他继续说道，记录本是他通过一个名叫格赖夫的信使得到的……就是说，格赖夫把他自己的作品带给了他；但是，这怎么能同戈尔德海姆先生的书信吻合呢？戈尔德海姆先生向使馆写道：‘记录本所以提供得这样晚，是为了不让因怀疑它的真伪而可能提出的质询起作用’……10月29日星期五，戈尔德海姆先生到了伦敦。施梯伯先生已意识到无法继续替记录本的真实性辩护；因此他派了一个使者同弗略里就地商谈这个问题。他们讨论能否用某种办法搞到一个证明它的真实性的证据。商谈毫无结果，他两手空空就离开

了，留下弗略里陷入绝望之中。为了不致损害高级警官们的名誉，施梯伯只好决定出卖他。施梯伯先生不久以后发表声明，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弗略里惶恐不安的原因。弗略里先生感到不知所措，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他给我带来一份手稿，要我照它临摹一项声明，并签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然后向伦敦市长宣誓，说我是李卜克内西……弗略里告诉我，手稿出自写记录本的那个人，是戈尔德海姆先生（从科隆）带来的。但是，如果施梯伯先生的记录本是通过信使格赖夫从伦敦得到的，那么，戈尔德海姆先生怎么能够在格赖夫重回伦敦的时候从科隆带来所谓的记录员的手稿呢？……弗略里交给我的仅仅是几句话和签名……”希尔施“尽量精确地照着笔迹拟出一项声明，说签名人（即李卜克内西）声明，马克思及其同伙所立案的他的签名是伪造的，只有现在这个签名才是惟一真实的。当我结束了我的工作，手上拿着幸而现在还在我这里的手稿（指弗略里交给他临摹的手稿）的时候，我向弗略里说明了我的顾虑，不容分说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使他颇感惊异。起初他很难过，后来他说要自己去宣誓……为了更可靠起见，他想要普鲁士领事证明他的签名是真的，因此他首先去领事馆。我在一个小酒馆等他。他回来的时候，证实签名的事已经办妥，接着他去市长那里办理宣誓手续。但是，这里事情办得并不顺利；市长要求更多的保证人，而弗略里却找不出来，于是宣誓的事便搁浅了……夜间很晚我还见到德·弗略里先生一次，这也是最后一次。正好在这一天，他遭遇了一件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在《科隆日报》上读到施梯伯先生牵涉到他的声明！德·弗略里先生以充分的哲理自慰：‘但是我知道，施梯伯没有别的办法，否则他就得自败名声了’……德·弗略里先生在我们最后几次见面的一次中对我说：‘要是科隆人被判罪，柏林就将响起一声巨雷。’”

弗略里同希尔施的最后几次会面是在1852年10月底；希尔施的自供注明的日期是1852年11月底；而1853年3月底就响起了“柏林的巨雷”（拉登多夫密谋¹³⁹）^①。

① 恩格斯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第3版上，给马克思在1875年第2版增加的这个附录4添了下面一段话：

“（读者看一看施梯伯本人给他的两个同谋者弗略里-克劳泽和希尔

5. 诽 谤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结束以后，有人大肆散布——特别是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福格特式的诽谤，说我“剥削”工人们。我的几

施下的评语，那是很有趣的。‘黑书’³²¹上关于头一个人（第2部第69页）是这样说的：

‘Nr. 845。克劳泽，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德累斯顿人，1834年由于在德累斯顿参加谋杀雪恩贝格伯爵夫人而被处死的前管事、以后（处死以后？）为粮食经纪人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和现在还活着的他的未亡人约翰娜·罗津（父姓居尼茨）的儿子；他于1824年1月9日生在离德累斯顿不远的科斯维希附近的葡萄园里。1832年10月1日进入德累斯顿的贫民学校，1836年被德累斯顿附近的安东城孤儿院收容，1840年受坚信礼。后来在德累斯顿的商人格鲁勒那里当学徒，但是次年就因多次偷窃而受到德累斯顿市法院的侦讯和判刑，审前羁押期间也计入刑期之内，获释后，住母亲处，无业。1842年3月，由于撬锁行窃又被抓，解送法院并判处4年徒刑。1846年10月23日出狱后回到德累斯顿，同一些惯盗来往。后来为被释人员收容所收留，把他安置在雪茄烟工场做工。他在那里连续工作到1848年3月，表现一般。但是，很快他又游手好闲起来，开始寻访政治团体（充当政府密探，如他本人在伦敦向希尔施说的；见上面）。1849年初，任德累斯顿共和主义者文人恩·路·维蒂希（现住美国）编辑的《德累斯顿日报》的送报员，1849年5月，参加德累斯顿起义，任索菲街街垒指挥员，起义被镇压后，逃往巴登，在那里，他带着巴登临时政府1849年6月10日和23日的全权委托书组织战时后备军并为起义者募集给养。后被普军俘虏，1849年10月8日从拉施塔特出逃。（完全同后来舍尔瓦尔从巴黎“出逃”一样。但是往下才是真正的芳香的警察花束，——不要忘记，这是在科隆案件两年后付印的。）据1853年5月15日柏林《政论家》第39号刊登的摘自纽约印行的汉堡商店伙计威廉·希尔施的著作《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的报道（施梯伯，你真是个

个住在美国的朋友——约·魏德迈先生、阿·雅科比博士先生(纽约的私人开业医生,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和阿·克路斯先生(华盛顿合众国海军部职员)发表了一篇文章^①(注有:1853年11月

有预见的天使!),1850年底或1851年初,克劳泽化名为**查理·德·弗略里**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出现于伦敦。他最初颇为贫困,但自1851年起,景况好转,当他被共产主义者同盟接收为盟员之后(施梯伯臆想的接收),开始充任各国政府的代理人;但屡遭责难,说他多方行骗。’

施梯伯就这样酬谢他的朋友弗略里;此外,上面已经说过,科隆案件结束后几个月,弗略里因伪造罪在伦敦被判几年徒刑。

关于可敬的希尔施,同书第58页上说:

‘Nr.265。威廉·希尔施,汉堡店员。他大概是出于自愿而不是作为流亡者去伦敦的。(这种毫无目的的谎言是为了什么呢?要知道,戈尔德海姆曾经想在汉堡逮捕他!)不过,在伦敦同流亡者来往甚密,特别是参加了共产党。他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参加革命党的活动,另一方面又为大陆各国政府效劳,充当对付政治罪犯和假钞制造者的密探。他在后一种职责中采用**极卑鄙的欺詐、撞騙、甚至伪造**等手段,因此必须对他严加防范。他甚至伙同一帮臭味相投的人自己**伪造纸币**,目的不过是为向警察当局谎报有人伪造货币,以取得优厚的奖赏。双方(警察方面的和非警察方面的假银行券制造者?)逐渐看出他的原形来了。他从伦敦转到汉堡,现在生活极为穷困潦倒。’

施梯伯关于他伦敦的助手们就是这样写的,他还会不遗余力地发誓保证他们“诚实和可靠”。而特别有趣的是:这个典型的普鲁士人绝对不可能说出简单的真情。他完全无法克制自己,不得不在从文件中引来的真假事实之间插入一些毫无目的的谎言。根据这种职业谎言家——现时这种人比任何时候都多——的证词,成百上千的人被判处监禁。这也就是现时人们所谓的拯救国家。)——编者注

① 指约·魏德迈、阿·雅科比和阿·克路斯《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声明》,载于1853年11月2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7期。——编者注

7日于纽约),详细反驳这种荒唐诽谤,同时指出,如果问题是要博得小市民的欢心,那我有权对自己的私事保持沉默。“但是,当自己应该面对恶棍、小市民和堕落的游荡者时,我们认为沉默对事业是有害的,因此,我们打破了沉默。”

6. 老鼠与青蛙之战

在我过去引证过的小册子《高尚意识的骑士》的第5页上,可以看到:

“……1851年7月20日建立‘鼓动者协会’,1851年7月27日成立德国‘流亡者俱乐部’¹⁶⁰。正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大洋两岸展开,这是伟大的老鼠与青蛙之战。

谁赐我文字,谁赐我声音,
来为这场战斗的伟大崇高写真?
亘古未见比之更自豪的战斗,
充满着狂野的愤怒与喧嚣;
其他战役激烈而残酷,
却不过玫瑰紫罗兰之貌。

当战斗篇章中

勇敢与荣誉之光交相辉映,我的笔亦变得笨拙。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27首歌)^①

我并不想在这里细述“战斗篇章”,也不想详谈代表流亡者协会

① 参看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67—568页。——编者注

的**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和代表“新旧大陆革命联盟”¹⁶²的**阿·戈克**于1852年8月13日达成的“同盟条约的初步协议”(以这个招牌全文发表在所有美国的德文报刊上)。我仅仅指出一点,双方的全体议员工流亡者,除了少数例外(当时每个政党为了顾全体面,都避开**卡·福格特**之流的名字),都参加了化装舞会。

德国庸人的西番莲**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在结束他的周游美国为革命而乞讨的愉快旅行的时候,发表了《关于德国国民促进革命公债的札记(1852年2月22日于纽约州埃尔迈拉)》,其中表示的观点的可取之处,至少是极其简单。**哥特弗里德**认为,搞革命就像建铁路一样。只要有钱,要铁路就有铁路,要革命就有革命。国民的胸中应当怀有革命的热望,而搞革命的人的口袋里则应当装着现金,因此,一切都取决于“一支不大的、装备精良的、有大笔金钱的队伍”。不难看到,英国重商主义之风把这些庸俗的头脑吹到多么荒唐的思路上去。既然这里的一切,甚至“舆论”,都是靠股份制造的,那为什么不来一个“促进革命”的股份公司呢?

科苏特当时也正巧在美国为革命乞讨,**哥特弗里德**在同他公开会面时,颇为文雅地说:

“赠送的自由,即使来自执政者您的纯洁之手,对我来说也是一块干硬的面包,我将用我的羞愧的眼泪来湿润它。”

因此,这个对礼物如此挑剔的**哥特弗里德**向执政者保证,如果执政者用右手把“来自东方的革命”奉送给他,那么他,**哥特弗里德**,将用右手把“来自西方的革命”作为等价物交给执政者。7年后,这个**哥特弗里德**在他自己创办的《**海尔曼**》周报上说,他是一个罕见的始终如一的人,正如他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曾宣布摄政王是德国皇

帝,他一贯遵守着这句格言。

原来的三摄政之一、革命公债的出纳员奥斯卡尔·赖辛巴赫伯爵,于1852年10月8日在伦敦公布了一份收支清单,并附一纸声明,说他将摆脱这一事务,并且说:“无论如何,我不能也不会把钱移交给金克尔等公民”。同时,他建议股东们把公债的临时收据兑换库存现金。他说,辞去出纳员职务等等

“是出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考虑……公债的设想所依据的前提落空了。只有而且必须着手公债才能兑现的两万美元因而没有筹到……创办一种杂志以作思想宣传的建议,没有得到响应。只有政治骗子和革命狂人才会认为现在公债可以完成,认为目前有可能对各党派同样公正地、从而大公无私地、真正革命地把钱加以应用”。

但是,哥特弗里德的革命信念不是这样容易动摇的,他为此搞到了一个“决议”,使他能够打出另一种招牌来继续他的事业。

赖辛巴赫的那份清单中包含着有趣的材料。

他说:“后来由委员会付给别人而不是付给我的那些款项,不能让保证人负责,这一点我提请委员会在凭据兑现和结账时注意。”

根据他的结算,收入共有1587镑6先令4便士,其中有伦敦2镑5先令,有德国9镑。支出共计584镑18先令5便士,开支项目如下:金克尔和希尔盖特纳的旅费220镑;其他人的旅费54镑;石印机11镑,印制临时收据14镑;石印通讯、邮费等106镑1先令6便士;根据金克尔的指示等支出100镑。

革命公债最后余下1000镑,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把它存入威斯敏斯特银行以备第一任德国临时政府作保证金之用。尽管如此,为什么临时政府始终没有成立呢?或许德国认为,现有的36个正式

政府已经够它受用的了。

未落入伦敦中央金库的个别美国公债,至少在某些场合找到了爱国用途,例如,1858年春天哥特弗里德·金克尔交给卡尔·布林德先生100镑,要他把这笔钱变成“激进传单”等等。

7. 反对帕麦斯顿的论战

“1856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会议厅

博士:

您在《人民报》上发表了对卡尔斯文件的卓越叙述,鉴于您对公众的这一巨大贡献,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委托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谨致

敬礼

书记 威·赛普尔斯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①

8. 安·谢尔策尔先生的声明

安·谢尔策尔先生自30年代起就参加工人运动,享有声誉,1860年4月22日他从伦敦写信给我:

“尊敬的公民:

在福格特小册子的卑鄙谎言和无耻诽谤中,有一处涉及我个人,我不能不对此提出抗议。在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150号附刊上刊印的文件第7

^① 原著所附的这封信是英文。——编者注

号中这样说：‘我们知道，目前伦敦正在采取新的步骤。有安·谢·……签名的信件从该地寄给各个团体和个人等等’。看来，这些‘信件’促使卡·福格特先生在他的书中的另一个地方这样写道：‘今年(1859)年初似乎出现了政治宣传的新地盘。这一机会立刻被利用来尽可能地重新赢得一些影响。这方面的策略多年来未曾改变。像一支古老的歌曲所唱的“谁都一点也不知道”的一个委员会，通过同样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主席或书记四处分发信件，等等，等等。用这种方法对地盘摸摸底之后，有几个“旅行的弟兄”便潜入那个国家，并立即着手组织秘密团体。别人准备损害其名誉的那个协会，却丝毫不知道有几个人正在搞分裂阴谋；甚至以协会名义发出的通讯，协会多半也一无所知；但是，信中总是说“我们的协会”等等。后来不可避免的、根据截获的文件进行的警察侦讯，也总是针对整个协会的等等。’

为什么卡尔·福格特先生不把他在文件第7号中所暗示的信件全部转载出来呢？为什么他没有把他所根据的来源‘摸摸底’呢？他本来不难了解，公开的伦敦工人教育协会在公开的会议上指定了一个通讯委员会，我曾经荣幸地被选入该委员会。既然福格特先生谈到不为人所知的书记等等，那么我是很乐于不为他所知的，但是，我可以满意地说，成千的德国工人都知道我，这些工人从福格特现在所诽谤的人们那里获得科学知识。时代变了。秘密结社的时期已经过去。当工人协会内公开讨论各种问题而每次会议都有局外人作为来宾列席的时候，再谈论秘密会社或小团体就荒谬了。由我签名的信件总是起草得无损任何人一根毫毛。对我们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来说，重要的只是了解大陆上的工人协会的情绪，创办一家能够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并同受外国人雇佣的文丐作斗争的报纸。当然，没有一个德国工人会想到去为波拿巴的利益活动，能够这样做的只有福格特之流的人物。我们对奥地利专制制度的憎恨，肯定比福格特先生的装模作样要认真得多，但是，我们并不期望由外国专制君主来使它崩溃。各国人民都应当自己解放自己。福格特先生认为自己有权采取的手段，恰恰是我们用来反对他的阴谋而被他看做是犯罪行为的那种手段，这不是怪事吗？如果福格特先生断言，他没有从波拿巴那里领取薪金，办报的钱是从民主派手中得来的，并且想以此洗刷自己，那么，像他这样有学识的人，怎么能够愚蠢到去指责和怀疑那些关心自己祖国的幸福和为创办报纸作宣传的工人们呢？

顺致

崇高的敬意

安·谢尔策尔”

9. 刊登在 1859 年 5 月 27 日《自由新闻》上的布林德的文章

“*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 to be King of Hungary.* ①

A Correspondent, who encloses his card, writes as follows:—

Sir,—Having been present at the last meeting in the Music Hall, I heard the statement made concerning the Grand - Duke Constantine. I am able to give you another fact:—

So far back as last summer, Prince Jerome Napoleon detailed to some of his confidants at Geneva a plan of attack against Austria, and prospective rearrangement of the map of Europe. I know the name of a Swiss senator to whom he broached the subject, Prince Jérôme, at that time, declar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plan made, *Grand - Duke Constantine was to become King of Hungary.*

I know further of attempts mad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year, to win over to the Russo - Napoleonic scheme some of the exiled German Democrats, as well as some influential Liberals in Germany. Large pecuniary advantages were held out to them as a bribe. I am glad to say that these offers were rejected with indignation.”

10. 奥尔格斯先生的信

“尊敬的先生：

我今天得到李卜克内西先生的通知，说您愿把关于反对福格特的那份传单的产生经过的司法文件友好地提供我们使用。我恳切地请求您尽速把这一文件寄来，以便我们能够把它印制出来。寄时请挂号，一切费用当由我们负担。此外，尊敬的先生，自由党有时对《总汇报》是认识不清的；我们（编辑部）在忠实

①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文章的英文原文，由他本人翻译的译文见本卷第 187—188 页。——编者注

于政治信念方面经受了各种考验。如果您的判断不是根据我们的片段的工作、个别的文章,而是根据我们的全部活动,那您就会确信,没有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像我们这样从容不迫而又坚持不懈地为德国人民的统一和自由、强盛和文明、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进步,为提高他们的民族感和道德水平而努力,也没有一家报纸获得比我们更大的成果。您必须根据效果来评估我们的活动。再次恳求您盛情地满足我的要求。

顺致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海尔曼·奥尔格斯

10月16日于奥格斯堡”

注明同一日期的第二封信只是第一封信的摘要,如奥尔格斯先生所说,“为更加慎重起见,也已寄走”;并同样要求把“李卜克内西先生所说的、您愿提供我们使用的关于反对福格特的著名传单的来源的文件立即寄来”。

11. 反对卡·布林德的通告信

这里只引用我在1860年2月4日写的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信^①的最后一段: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要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宣布,布林德、维厄、霍林格尔证明匿名传单不是在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蓄意的谎言。第一,以前在霍林格尔那里当过排字工人的费格勒先生准备宣誓证明,上述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布林德先生亲笔写的,并且有一部分是霍林格尔亲自排版的。第二,通过法律手

^① 见本卷第431—433页。——编者注

续可以证实,这个传单和《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是用同一个活字版印出的。第三,将会证实,维厄并没有在霍林格尔那里连续工作 11 个月,尤其是印这个传单时他没有在那里工作。最后,还可以传唤一些证人,维厄本人曾当着他们的面承认,是霍林格尔要他在《奥格斯堡报》上发表的分明是虚假的声明上签名的。据此,我再一次宣布:上述卡尔·布林德是蓄意的撒谎者。

卡尔·马克思”

摘自 2 月 3 日的伦敦《泰晤士报》^①

“Vienna, January 30 th. - The Swiss Professor Vogt pretends to know that France will procure for Switzerland Faucigny, Chablais and the Genevese, the neutral provinces of Savoy, if the Grand Council of the Republic will let her have the free use of the Simplon.”

12. 费格勒的 Affidavit^②

“特此声明如下:

经《人民报》(当时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后来在 1859 年 6 月 18 日第 7 号上转载并再次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奥格斯堡报》)上转载的德文传单《警告》,部分是伦敦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 3 号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排版的,部分是当时在菲德利奥·霍林格尔先生那里工作的我本人排版的,而且这一传单是在伦敦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 3 号菲·霍林格尔先生的印刷所印刷的。上述传单的原稿是卡尔·布林德先生的亲笔。我曾看到,菲·霍林格尔先生把传单《警告》的校样交给住在伦敦索霍区教堂街 14 号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先生。菲·霍林格尔先生最初曾犹豫是否要把校样交给威·李卜克内西先生,在李卜

① 见本卷第 274 页。——编者注

② 参看本卷第 188—190 页。——编者注

克内西先生离开以后，他就向我和我的同事约·弗·维厄表示后悔，说不该把校样交出去。

1860年2月11日在米德尔塞克斯郡弯街治安法庭当面对我作以上声明。
首都治安法官托·亨利。

盖 章

阿·费格勒”

13. 维厄的 Affidavit^①

“One of the first days of November last - I do not recollect the exact date - in the evening between nine and ten o' clock I was taken out of bed by Mr. F. Hollinger, in whose house I then lived, and by whom I was employed as compositor. He presented to me a paper to the effect, that, during the preceding eleven months I had been continuously employed by him, and that during all that time a certain German flysheet 'Zur Warnung' (A Warning) had not been composed and printed in Mr. Hollinger's Office, 3. Litchfield Street, Soho. In my perplexed state, and not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transaction, I complied with his wish, and copied, and signed the document. Mr. Hollinger promised me money, but I never received anything. During that transaction Mr. Charles Blind, as my wife informed me at the time, was waiting in Mr. Hollinger's room. A few days later, Mrs. Hollinger called me down from dinner and led me into her husband's room, where I found Mr. Charles Blind alone. He presented me the same paper which Mr. Hollinger had presented me before, and entreated me to write, and sign a second copy, as he wanted two, the one for himself, and the other for publication in the Press. He added that he would show himself grateful to me. I copied and signed again the paper.

I herewith declare the truth of the above statements and that:

1) During the 11 months mentioned in the document I was for six weeks *not*

① 译文见本卷第195—196页。——编者注

employed by Mr. Hollinger, but by a Mr. Ermani. 2) I did not work in Mr. Hollinger's Office just at that time when the flysheet: 'Zur Warnung' (A Warning) was published. 3) I heard at the time from Mr. Voegele, who then worked for Mr. Hollinger, that he, Voegele, had, together with Mr. Hollinger himself, composed the flysheet in question, and that the manuscript was in Mr. Blind's handwriting. 4) The types of the pamphlet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I returned to Mr. Hollinger's service. I myself broke them into columns for the reprint of the flysheet (or pamphlet) 'Zur Warnung' (A Warning) in the German paper 'Das Volk' published at London, by Mr. Fidelio Hollinger, 3, Litchfield Street, Soho. The flysheet appeared in No. 7, d. d. 18th June, 1859, of 'Das Volk' (The People). 5) I saw Mr. Hollinger give to Mr. William Liebknecht, of 14, Church Street, Soho, London, the proofsheets of the pamphlet 'Zur Warnung', on which proofsheets Mr. Charles Blind with his own hand corrected four or five mistakes. Mr. Hollinger hesitated at first giving the proofsheets to Mr. Liebknecht, and when Mr. Liebknecht had withdrawn, he, F. Hollinger, expressed to me and my fellow workman Voegele his regret for having given the proofsheets out of his hands.

Declared and signed by the said Johann Friedrich Wiehe at the Police Court, Bow Street, this 8th day of February, 1860, before me *J. Henry, Magistrate of the said court.*

L.S.

Johann Friedrich Wiehe"

14. 诉讼文件摘编

“临时政府。法兰西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以法国人民的名义

1848年3月1日于巴黎

勇敢而正直的马克思：

法兰西共和国的土地是所有自由之友的避难所。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向所有为各国人民的神圣事业和友好事业而斗争的人们重又敞开大门。法国政府的每一代表都应当以这种精神来理解自己的职责。

致兄弟般的敬礼

临时政府委员 斐迪南·弗洛孔^①

“1848年5月19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先生：

我非常高兴地从我们的朋友维尔特那里获悉，您准备在科隆出版《新莱茵报》，该报的简介他已经寄给我了。让这一报纸使我们能在比利时随时了解到德国民主事业的情况是极为必要的，因为从《科隆日报》、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我们在布鲁塞尔得到的德国其他贵族报纸以及从我们的《比利时独立报》（该报的所有特约通讯都是以符合我们的资产阶级贵族利益的观点写成的）上都不可能了解到关于这方面的可靠消息。维尔特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去科隆同您一起参加创办《新莱茵报》的工作。他以您的名义答应把该报寄给我，由我寄《社会辩论报》给您作为交换。我也非常希望就我们两国的共同事业和您交换信件。为了两国的利益，必须使比利时人和德国人彼此不致生疏，因为正在法国酝酿的事件将在近期提出有关我们两国的问题。我在巴黎待了10天之后刚刚回到这里，在那期间我尽最大努力去了解这个大都会的形势。在那里逗留的最后几天，我正遇上五月十五日事件³²²。我甚至出席过国民议会的会议，在开会时人民涌进会场里来了……我观察了巴黎人民所采取的立场，听到了法兰西共和国当前的主要活动家的讲演，于是我明白，资产阶级情绪中将出现对二月事件的强烈反应；毫无疑问，五月十五日事件将会加速这种反应。但是，这又无疑将很快引起新的人民起义……法国不久就会求助于战争。为了对付这一情况，我们应当考虑在这里和在您那里我们的共同行动。如果战争首先向意大利发动，我们将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如果战争的矛头立刻指向我们的国家，那么我还不知道我们应当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听取德国人的建议……

现在我准备在星期日的《社会辩论报》上发表您即将出版新报纸的消息……

我打算6月底去伦敦。如果您有机会给您在伦敦的朋友写信的话，劳驾请他们接待我。

最忠实于您的

吕·若特兰律师^②

① 原著所附弗洛孔的这封信是法文。——编者注

② 原著所附若特兰的这封信是法文。——编者注

“1860年2月10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很久没有得到您的消息了，所以，接到您最近的来信非常高兴。您抱怨事情进展缓慢和我不大急于答复您向我提出的问题。怎么办呢？岁数越大就越懒得动笔了。但是，我希望您相信我的观点和感情是始终如一的。我看到，您的最近一封信是由您口授而由您的亲近的秘书，您的可爱的夫人笔录的，那么，马克思夫人还没有忘记这个布鲁塞尔的老隐士。请向她转达我衷心的问候。

亲爱的同志，请保持您对我的友谊。

致兄弟般的敬礼

列列韦尔”①

“1860年2月11日于伦敦肯辛顿剑桥广场5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国民报》上读到一连串反对您的卑鄙龌龊的文章，文章作者的谎言和恶意使我深为震惊。我认为，每个认识您的人都有义务——尽管这种证明多么多余——对您的高尚、正直和大公无私的品德给予应有的评价。我感到自己有双重义务这样做，因为我记得，您多年来曾经毫无报酬地给我的小杂志《寄语人民》、后来又给《人民报》写过许多文章，这些文章对人民的事业十分重要，对报纸非常宝贵。请允许我表示这一希望：请您毫不留情地惩罚这些谤文的卑鄙而又怯懦的作者。

亲爱的马克思，请接受我最衷心的敬意

厄内斯特·琼斯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②

“1860年3月8日于纽约《论坛报》编辑部

尊敬的先生：

在答复您的要求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地向您确认，您同我个人所知道的美国各种出版物有联系。大约在9年前，我邀请您为《纽约论坛报》撰稿，从那时

① 原著所附列列韦尔的这封信是法文。——编者注

② 原著所附琼斯的这封信是英文。——编者注

起这种撰稿工作就没有间断。就我记忆所及,您经常为我们写稿,从没有一星期间断。您不仅是我们报纸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报酬最优厚的经常撰稿人之一。我可以指出的您的惟一缺点是,您有时表现了对一家美国报纸来说是过于强烈的德国人的感情。这一点在关于俄国和法国问题上都有所表现。在涉及沙皇制度和波拿巴主义问题时,我有时感到,您对德国的统一和独立表现了过多的关心和过大的忧虑。在最近的意大利战争问题上,这一点大概表现得比在其他场合更加明显。在同情意大利人民方面,我和您完全一致;我和您一样不信任法国皇帝的诚意,一样不相信他会给意大利自由,但是,我并不像您和其他德国爱国者那样,认为德国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安。

我必须补充一点,您在所有经过我手的您的文章中,对劳动阶级的幸福和进步一直表示最深切的关怀,您的许多文章都是直接论述这个目标的。

近五六年来,我不止一次地充当中间人,把您的作品交给《普特南氏月刊》³²³(一家高水平的文学刊物)以及《美国新百科全书》(我也是它的编辑,您曾经给它寄来过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章)。

如果您还需要其他的说明,我乐意为您效劳。

始终忠实于您的

《纽约论坛报》副主编 查理·安·德纳

致卡尔·马克思博士”^①

15. 丹屠出版的小册子

我已经指出,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成了德国的达-达汲取世界史方面的智慧,特别是汲取“拿破仑的救世政策”方面的智慧的源泉。“拿破仑的救世政策”是“民主主义者”弗·察贝尔最近一篇社论中的用语。法国人自己怎样评价和认识这些小册子,可以从巴黎周刊《星期日邮报》1860年10月14日第42期的一段摘录中看出:

① 原著所附德纳的这封信是英文。——编者注

“至于当前情况，您随便拿起10本小册子，就会看到其中至少有9本的构思、整理和写成……是经过谁呢？经过职业小说家、写歌曲的、作轻歌剧的和教堂杂役！”

报上谈论起北方各大国之间的秘密会晤，谈论起正在复活的神圣同盟¹³¹了吗？那好，于是便有一位令人喜欢的、文艺性相当高的、甚至（在当时）是相当自由主义的歌曲作者跑到丹屠先生那里，给他一本按格朗吉约先生的文章改写出来的又臭又长的小册子，用了个响亮的标题《联合》。利梅拉克先生对同英国结盟也许表示过不满吧？那好，立刻便有一位得过格雷戈里大帝勋章的骑士沙特莱先生（从他的风格判断，他必定是某个教堂的杂役）登载了或者转载了一篇关于‘英国对法国的罪行和过失’的可笑的长篇故事。《吉耳里教父》^①的作者（埃德蒙·阿布）早就认为，必须用普鲁士君主制度的政治秘密来教育我们，他在剧院遭到惨败后又来向柏林议会提出明智的建议。已发出通告说，克莱维尔先生最近将澄清被贝利先生弄得非常混乱的巴拿马地峡问题，毫无疑问，在10月21日的王公会晤³²⁴之后数日，我们所有书店的橱窗里都会出现一种华丽的玫瑰色小册子，标题是《由歌剧院芭蕾舞班写的华沙会见记》。

文学小神们之侵入政治领域，初看不可理解，却是同许多原因有联系的。这里只举一个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

在精神和情感几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这些从事使读者开心的可悲职业业的先生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震动和唤醒他们的读者。他们总是不断重复他们诗歌和故事中那老一套的笑料。他们自己也像他们要为之解闷的那些人一样受到苦闷、悲伤和无聊的煎熬。正是由于他们已经无计可施，才在绝望中有的去写交际花回忆录，有的去写外交小册子。

然后，某位从未花费过一小时认真研究政治和内心根本没有任何信念影子的耍笔杆的冒险家突然站了出来，并对自己说：‘我得大干一场！等着瞧吧！要使那些本能地不愿理睬我的公众都来注意我，我该做些什么呢？写一本关于莱奥塔尔事件的小册子还是关于东方问题的小册子？应当向惊异的世界揭露我从来没有登过门的女客厅的秘密，还是揭露我更不熟悉的俄国政治问题的秘密？应当用伏尔泰的风格来表露自己对堕落的女人们的忧伤，还是用福音书的风格来表达对于受到狂热的伊斯兰教的迫害、掠夺和屠杀的不幸的马龙派民众的悲哀？应当为里戈尔博谢小姐唱一首赞美诗还是为世俗政权发表一份辩护

① 埃·阿布的三幕喜剧《吉耳里》。——编者注

书？我坚决选择政治。我用国王和皇帝来娱乐我的读者，比用荡妇好得多。’我们的名士派的编外人员在说过这番话以后，就去翻阅《通报》，在交易所的柱廊下转悠了几天，拜访了几个官吏，终于摸清了首都的好奇心或宫廷的兴致的风向；然后就选择这股风足以吹满的一个标题，于是他就心满意足地躺在他的桂冠上休息了。现在他把一切必要的事都已安排就绪，因为说到小册子目前只有两种东西是重要的：一是标题，一是作者和‘上等人物’之间可能有的那种关系。

知道了这些情况，还需要对充斥市场的小册子的价值加以说明吗？如果有一天你能鼓足全部勇气把它们从头到尾读一遍，你会为它们的作者所表现的闻所未闻的无知、不可容忍的轻率、甚至道德堕落而惊异不已。这里我所说的还不是其中最坏的…… 每年水平都有所降低，每年都暴露出精神退化的新迹象，每年都增加一些已使我们感到羞愧的文学上的耻辱。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甚至最乐观的人有时也对前景表示怀疑，并忧心忡忡地自问：我们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吗？”

上面我引用了《国民报》上的“拿破仑的救世政策”这一用语。《曼彻斯特卫报》——它以发表的消息多半准确可靠而在全英国享有盛誉——驻巴黎通讯员以独特的方式报道这样一则趣闻：

“巴黎，11月8日。… Louis Napoleon spends his gold in vain in supporting such newspapers as the National-Zeitung”. (“路易-拿破仑白白浪费自己的金钱，去支持像《国民报》这样的报纸”。)(1860年11月12日《曼彻斯特卫报》)

不过，我认为一向消息灵通的《曼彻斯特卫报》通讯员这一次却弄错了。据说，弗·察贝尔为了证明他没有被奥地利收买，已投入波拿巴派的阵营。至少柏林来的消息是这样说的，同邓斯之歌非常匹配。

16. 补 遗

(a) 卡尔·福格特和“水泥”公司

正当最后几个印张付印的时候，我偶然得到了《时代呼声》10月号(1860年)。流亡议员的机关报《德国月刊》前出版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流亡的帝国摄政”的文化上司阿·科拉切克，在第37页上谈到他的朋友卡尔·福格特时说：

“日内瓦‘水泥’股份公司(参加理事会的不是别人，正是卡尔·福格特先生本人)建立于1857年，而1858年股东们就已经一文不名，检察官立即以欺诈罪监禁了一位理事。施行逮捕的时候福格特先生正在伯尔尼，他急急忙忙赶了回来，被捕者获释了，案件压下了，‘以免出丑’，但股东们却赔个精光。照这个例子来看，似乎不能说财产在日内瓦受到足够保护，卡尔·福格特先生在这方面的错误就显得更出奇了，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是上述公司的理事之一；即使在法国，遇有这类案件，也是到理事中间去寻找罪犯，把他们关进监狱并用他们的财产来满足股东们在民事诉讼中的要求。”

约·菲·贝克尔在他的信中(第十章)谈到把詹姆斯·法济先生投入十二月怀抱的银行事件，那就拿它来同这事比较一下吧。这种细节极有助于解决“小拿破仑”何以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人物之谜。大家知道，“小拿破仑”本人曾不得不在政变和克利希³²⁵之间作出选择。

(b) 科 苏 特

下面摘录的同科苏特谈话的备忘录确凿地证明，科苏特对俄国是匈牙利的主要危险这一点了解得多么清楚。这篇备忘录出自现在

EXHIBITION OF THE AUGSBURG GAZETTE.

To the Editor of the "Free Press."

3, Grosvenor Terrace, Notland Park, Haverstock Hill,
London, 24th February, 1869.

You will remember that *The Free Press* of May 27th, 1859, published an article headed: "*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 to be King of Hungary.*" In that article *Mr. Vogt*, of Geneva, although not named, was pointed at, in a manner intelligible to the German refugees, as a Bonapartist agent, who, on the outset of the Italian war, had offered "*large bribes*" to Liberals in Germany, and German Democrats in London. The writer gave vent to his intense delight at the indignant repulse those attempts at bribery had met with. *Mr. Charles Blind* I assert to be the author of that notice. You can correct me if I am in error. Some time later, there circulated in London an anonymous *German* pamphlet, entitled, "*Zur Warnung* (a warning), which, in point of fact, may be considered a reproduction of the article of the *Free Press*, only that it gave fuller details and *Vogt's* name. Having been reprinted in a German London paper, entitled "*Das Volk*" (The People); thence the anonymous pamphlet found its way to the columns of th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The Augsburg Gazette), which, consequently, was sued by *Mr. Vogt* for libel. Meanwhile I had obtained from *Mr. Voegle*, a compositor then employed by *Mr. Hollinger*, the publisher of "*Das Volk*," a written declar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the pamphlet was printed in *Hollinger's* office, and drawn up by *Mr. Charles Blind*. This declaration, as I told you at the time, was sent over to the *Augsburg Gazette*. The Augsburg tribunal having declined to decide the case, *Mr. Blind* at last came out in the *Augsburg Gazette*. Not content with a point-blank denial of his authorship of the anonymous pamphlet, he, in terms most positive, declared the pamphlet not to have been drawn from *Hollinger's*

下院一个最有名的激进派议员之手。

“1854年5月20日晚在……同科苏特先生谈话的备忘录

……恢复匈牙利的严格法制(他说,即科苏特说),可以重建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联盟并将阻止俄国在匈牙利找到同盟者。他(科苏特)将丝毫不反对恢复法制。他准备劝告他的同胞,如果这能办到,就要充满信心地接受它,他保证自己决不会妨碍这种转变。他本人不打算返回匈牙利。他本人不想促使奥地利采取这种方针,因为他不相信奥地利将回到法制,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他允许我说这就是他的观点,必要时,他将公开加以证实,但是由于他不指望奥地利会自愿放弃它那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他不会提出任何建议……要是1848年,他是会同意派遣匈牙利军队去击退皮埃蒙特人的攻击的(科苏特先生在1848年走得更远,他靠在佩斯议会中的一篇激烈讲话,促成派匈牙利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叛乱者”),但是,他不会利用这些军队去强占奥地利的意大利,就像他不会允许外国军队进入匈牙利一样。”^①

一切时代,人民创造神话的幻想力都表现在发明“伟人”上面。最有说服力的这类例子毫无疑问是西蒙·玻利瓦尔。至于科苏特,例如,他被人颂扬为消灭匈牙利封建制度的人。然而他同三大举措(实行普遍征税、废除农民的封建义务、无偿地取消教会什一税³²⁶)毫无关系。普遍征税的法案(贵族以前是免税的)是由瑟美列提出的;废除徭役等等的法案由索博尔奇的议员博尼什提出,而什一税则是教会通过它的议员叶凯尔法鲁希主教自己放弃的。

(c)埃德蒙·阿布(1860年的普鲁士)

我在第八章末尾表示了这种看法:埃·阿布的小册子《1860年的普鲁士》或如最初用的标题《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是重新译回法文的达-达·福格特用德文编写的丹屠小册子的摘要。对这种看法

^① 同科苏特会谈的备忘录原文是英文。——编者注

所能提出的惟一怀疑是,这位遭受失败的喜剧作家埃·阿布根本不懂德文。但是,难道吉耳里教父不能在巴黎找到一位德国教母吗?谁是这位教母,依旧是考据学研究的对象。大家知道,《1860年的普鲁士》这一小册子是作为路易·波拿巴的巴登-巴登之行³²⁷的袖珍指南发表的,旨在把波拿巴的心愿预先昭示给摄政王并向普鲁士说明,像小册子的结束语中所说的,普鲁士有十二月二日制度¹⁹⁷这个“非常有用的同盟者,也许,这个同盟者的职责就是替它〈普鲁士〉大力效劳,只要它迁就一些”。“只要它迁就一些”这句话,用德文说就是:“只要普鲁士把莱茵省卖给法国”;这个秘密已被埃·阿布在1860年春天用法文(见第九章《代理机构》)在《民论报》上透露。在这种足以加重别人罪过的情况下,我不可以根据简单的猜测,就指名道姓地称某某是埃·阿布这位失败的喜剧作家和丹屠小册子的作者的德国提词人。但是,现在我有权声明,吉耳里教父的德国教母不是别人,正是福格特的温存的库尼贡达——特里尔的路德维希·西蒙先生。对阿布的小册子写过著名回答的那位伦敦的德国流亡者^①未必猜到了这一点!³²⁸

① 西·路·波克罕。——编者注

卡·马克思

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³²⁹

致《自由新闻》编辑

1860年2月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您一定记得，《自由新闻》在1859年5月27日曾发表一篇题为《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却用德国流亡者所熟悉的形式指明日内瓦的**福格特先生**是波拿巴的代理人；他在意大利战争爆发时，向德国的自由派和伦敦的德国民主派表示愿提供“巨额贿赂”。作者为这种行贿企图遭到愤怒的反击感到非常高兴。我肯定，这篇短文的作者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如果我弄错了，您可以指正。不久以后，在伦敦流传一个德文的匿名传单，标题是《警告》。这个传单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自由新闻》上那篇文章的翻版，只是提供了较详尽的细节并点了福格特的名字。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转载了这个传单，后来它又被**奥格斯堡《总汇报》**（《奥格斯堡报》）刊登，结果福格特先生认为该报诽谤他而提出控告。与此同时，我接到当时在《人民报》的承印人霍林格尔

先生那里工作的排字工人费格勒先生的书面声明,声明说,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并且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写的。我当时已经通知您,这份声明已转寄给《奥格斯堡报》了。在奥格斯堡法院拒绝审理这一案件之后,布林德先生终于在《奥格斯堡报》上出现了。他不仅断然否认匿名传单是他写的,而且郑重其事地**宣称,传单根本不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为了证实后面这一点,他向公众提供了霍林格尔本人和自称在霍林格尔印刷所连续工作了11个月的一个名叫维厄的排字工人签署的声明。我已经在《奥格斯堡报》上^①对布林德、霍林格尔和维厄的联合声明作了答复,但是布林德再一次否认并且又举出霍林格尔和维厄作证。一开始就从个人目的出发把我看做是传单的**秘密作者的福格特**,当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对我进行最下流的造谣中伤。

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我要揭穿那些显然是同福格特暗中勾结的家伙。因此,我公开宣布,布林德、维厄、霍林格尔证明匿名传单**不是在索霍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的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声明是蓄意的谎言**。第一,以前在霍林格尔那里当过排字工人的费格勒先生准备宣誓证明,上述传单是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印刷的,是布林德先生亲笔写的,并且有一部分是霍林格尔亲自排版的。第二,通过法律手续可以证实,这个传单和《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是用同一个活字版印出的。第三,将会证实,维厄并没有在霍林格尔那里连续工作11个月,尤其是印这个传单时他没有在那里工作。最后,还可以传唤一些证人,维厄本人曾当着他们的面承认,是霍林格尔要他在《奥格斯堡报》上发表的**分明是虚假的声明上签名的**。据此,我再一次宣

^① 见本卷第13—14、191页。——编者注

布:上述卡尔·布林德是蓄意的撒谎者。

如果我说的有失实之处,那他可以轻易地向英国法院上诉来反驳我。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2 月
2 日

1860 年 2 月 4 日以传单形式印
发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萨瓦、尼斯与莱茵³³⁰

弗·恩格斯写于 1860 年 2 月
4—20 日

1860 年 3 月底以小册子形式在
柏林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Savoyen, Nizza

und

der Rhein.

Vom Verfasser von „Po und Rhein.“



Berlin, 1860.

G. Behrend (Falkenberg'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Blindenstraße Nr. 33.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柏林版扉页

自从波拿巴、皮埃蒙特、俄国三者之间的阴谋开始暴露于公众面前，已经一年了。起初是新年谈话³³¹，接着是向“意大利的伊菲姬妮亚”求婚³³²，然后是意大利的哀鸣，最后是哥尔查科夫承认他对路易-拿破仑负有**书面义务**³³³。而在这中间，则是扩军备战，调动军队，威胁恫吓和调解的尝试。当时，在最初的时刻，整个德国都本能地感觉到：现在问题不在于意大利，而是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利害。事端将起于泰辛河，但最后将在莱茵河结束。一切波拿巴战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重新占领法国的“自然疆界”——莱茵河疆界。

但是，因为法国人对于莱茵河这一自然疆界的隐蔽要求而陷于不可言状的恐怖中的那一部分德国报纸，即以奥格斯堡《总汇报》为首的报纸，却以同样不可言状的狂热替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作辩护，所持的理由是：明乔河与波河下游是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自然疆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奥尔格斯先生发动了他的全部战略机构来证明：没有波河和明乔河，德国就要灭亡，放弃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就是背叛德国。

这样，事情就被弄颠倒了。非常明显，说莱茵河受到威胁只不过是借口，目的在于保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暴力统治。所谓莱茵河受到威胁，就是要唆使德国一致拥护奥地利对北意大利的奴役。这时还出现一种滑稽的矛盾：同样的理论，用在波河他们就加以维护，用

在莱茵河他们却加以非难。

本文作者当时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波河与莱茵河》^①。正是为了民族运动的利益,这本小册子反驳了明乔河疆界论;它试图从军事理论的观点来证明:德国为了自己的防御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块领土;如果仅仅从军事观点出发,那么法国要求占有莱茵河的理由无论如何要比德国要求占有明乔河的理由充分得多。总而言之,作者想使德国人能以洁白之身投入当前的斗争。

作者的目的是究竟达到了多少,可以让别人去判断。我们没有见到有任何人试图本着科学精神驳倒那本小册子所作的分析。小册子最初所指向的目标——奥格斯堡《总汇报》曾答应要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论文,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它只是从《东德意志邮报》转载了三篇他人的论文^②,而这些论文的批评也仅仅限于宣称《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是“小德意志派”¹⁹²,因为他想放弃意大利。无论如何,据我们所知,奥格斯堡《总汇报》从此以后就不再提明乔河疆界论了。

然而,这种迫使德国一致拥护奥地利对意大利的统治和政策的企图,却为北德意志的哥达派庸人们造成反对民族运动的求之不得的借口。最初的运动是真正的民族运动,它比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圣弗朗西斯科的一切席勒纪念会¹¹⁰都具有更强烈得多的民族性质;这个运动是自然地、本能地、直接地发生的。至于奥地利对意大利是否享有权利,意大利是否有权要求独立,明乔河线是否需要,——这一切在当时对这个民族运动来说都无所谓。既然我们之中的一个遭

① 恩格斯写于1859年2月底—3月初。——编者注

② 三篇论文分别载于1859年4月19、21和22日《总汇报》第109、111和112号附刊。——编者注

到攻击,并且是遭到与意大利毫无关系而对于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却有很大兴趣的第三者的攻击,那我们就应当联合起来反对他,反对路易-拿破仑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传统。人民本能地而且是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但是,哥达自由派的庸人们老早就不把德意志的奥地利看做是“我们之中的一个”了。战争正合乎他们的心意,因为战争可以削弱奥地利,从而最后促成小德意志帝国或大普鲁士帝国的产生。北德意志的庸俗民主派有许多人附和他们,这些人指望路易-拿破仑能毁灭奥地利,然后让他们把整个德国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有一小部分住在法国和瑞士的德国流亡者也附和他们,这些人竟恬不知耻地公开和波拿巴主义勾结。但是,我们坦白地说,他们最有力的同盟者是那些永远不敢正视危险的德国小市民阶层的怯懦性;为了哀求把自己的死刑缓期一年执行,他们会背弃自己的忠实同盟者。这样一来,没有了同盟者,他们自己今后的失败就更加确定无疑了。和这些怯懦之辈携手同行的是某些过于聪明的人,他们经常有千百个决不采取任何行动的理由,但是却有更多的借口来高谈阔论。除了对上述借口之外,他们对一切都表示怀疑。对于规定把莱茵河左岸地区让给法国的巴塞尔和约²⁰²表示欢迎、而当奥军在乌尔姆³³⁴和奥斯特利茨败北⁸⁶时又暗中庆幸的,就是这班过于聪明的人,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耶拿⁸⁸的来临,柏林是他们的大本营。

这伙人的同盟胜利了。德国背弃了奥地利。然而,奥军在伦巴第平原上打得非常英勇,使敌人为之惊讶,使所有的人都为之赞叹,只有哥达党人及其追随者除外。操场上的刻板操练、驻地内的严酷管教、军士的棍棒,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从他们身上磨灭掉德意志人所固有的无穷无尽的战斗力的。虽然服装简陋、装具沉重,但这些未经战

火考验的年轻部队面对着久经战斗、服装轻便、装备灵巧的法军，表现得像老兵一样；只是由于奥军指挥的极端无能和步调不一，才使这样的部队打了败仗。但这是怎样的败仗呢？敌人没有得到战利品，没有得到军旗，几乎没有得到火炮，也几乎没有俘虏；敌人所缴获的惟一的军旗是在战场上尸体堆中捡来的，而未受伤的俘虏也只是意大利或匈牙利的逃兵。奥军从普通兵到少校都获得了荣誉，而这个荣誉差不多完全属于德意志奥地利人。意大利人是不能用的，他们大部分已被遣散，匈牙利人不是成群结队地投降，便是非常不可靠，克罗地亚人在这次战争中比平时的表现差得多^①。只有德意志奥地利人才完全有资格享受这个荣誉，尽管他们因为指挥不良而首当其冲地蒙受了耻辱。

这种指挥是地道的旧奥地利式的。久洛伊一人的无能所无法做的事，却由于权奸和弗兰茨-约瑟夫的存在而造成的指挥不统一所完成了。久洛伊向洛梅利纳进攻，刚一到卡萨莱—亚历山德里亚地区，便立即停止前进；结果进攻全部失败。法军毫无阻挡地和撒丁军队会合了。为了充分表明他确已束手无策，久洛伊命令在蒙特贝洛附近侦察，就好像他从一开始就想证明，在军事指挥上那种试探摸索和疑虑重重的旧奥地利精神至今依然旺盛，犹如在已寿终正寝的宫廷军事会议³³⁶时代一样。他把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他把自己的军队由皮亚琴察一直摆到阿罗纳，以便按照惯用的奥地利方式，做到各地都有直接掩护。拉德茨基的传统仅仅过了10年就被遗忘了。

① 参看《泰晤士报》记者自奥军兵营发出的关于索尔费里诺会战的报道。在卡夫里亚纳，以志愿者资格参战的老炮兵总司令努根特，曾尽一切努力派遣一些边屯营³³⁵投入战斗，但枉费心机。

当敌人在帕莱斯特罗进攻的时候，奥军各旅进入战斗却十分缓慢和分散，以致每一个旅总是在其他旅还未到达以前便被逐出阵地。而且，当敌人真正进行机动（这一机动的可能性使洛梅利纳的整个阵地具有了应有的意义），即由韦尔切利向博法洛拉侧敌行军的时候，当终于有机会向诺瓦拉攻击，以阻止敌人这个大胆的机动，并利用敌人所处的不利态势的时候，久洛伊却惊慌失措，急忙回头渡过泰辛河，想绕一个弯从正面拦阻进攻的敌人。6月3日晨4时，正在退却的时候，赫斯出现在罗萨泰的大本营。在维罗纳重新恢复了的宫廷军事会议，看来恰好在这个决定性时刻对久洛伊的能力产生怀疑。因此，现在这里便出现了两个总司令。根据赫斯的提议，所有纵队都按兵不动，一直到他确信对诺瓦拉攻击的时机已经错过而不得不让事态自然发展时为止。这期间几乎过了5小时之久，在这5小时当中部队中断了运动。^①在6月4日整整一天内，各纵队才零零散散地陆续到达马真塔，既疲倦又饥饿；但是他们仍然英勇作战并且获得卓越的胜利，直到麦克马洪违反下达给他的由图尔比戈直取米兰的命令，转向马真塔并袭击奥军翼侧时为止。这时，法国其余各军都来到了，但奥地利各军却迟迟不到，于是会战失败了。奥军的退却非常缓慢，以致有一个师在梅莱尼亚诺遭到法国整整两个军的攻击。其中一个旅抗击法国6个旅，坚守这个据点达数小时之久，直到人员损失过半才开始退却。最后，久洛伊被撤换了。军队由马真塔围绕米兰

^① 参看《泰晤士报》驻奥军的第一个记者布莱克利上尉在该报发表的声明，其中就这一事实做了报道。达姆施塔特的《军事总汇报》替久洛伊辩护，说行军中断5小时乃是由于一种从公务上考虑不便向外宣布的、不以久洛伊的意愿为转移的事件所致，而且把战斗的失利推到这一事件上。但是，布莱克利已经说明了这个事件是什么。

沿一个大圆弧行进,仍然来得及比沿较短的弦运动的敌人先期到达斯蒂维耶雷堡和洛纳托的阵地(根本谈不上追击!)。这个多年以来便被奥军周密勘察过的阵地,据说是弗兰茨-约瑟夫专门为他的部队选择的。事实上,这个阵地早已列入四边形要塞区¹²的防御体系,是一个可以用反冲锋的方法进行防御战的极好阵地。在这里,奥地利军队终于与现在开来的或在这以前一直留做预备队的增援部队会合了。但是当敌人刚到达基耶塞河的西岸时,又立刻发出退却信号,于是军队退到了明乔河东面。这个行动刚结束,奥军又回头渡过这条河,想从敌人手中夺回刚才自愿让给敌人的阵地。奥地利军队就是在这种朝令夕改、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在对统帅部已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在索尔费里诺投入战斗的。这是一场混战;无论在法军方面或者在奥军方面,都谈不上统帅部的战术指导。奥地利将军们更为严重的庸碌无能、惊慌失措和怕负责任,法军师旅长们更为坚强的信心以及法军所固有的并在阿尔及利亚达到了完善地步的那种成散开队形和在居民点作战的优越性,——这一切正是使奥军最后被逐出战场的原因。于是,战争便结束了。有谁能比可怜的奥尔格斯先生更欣喜若狂呢?他的责任就是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不顾一切地夸奖奥军的统帅部,而且用一些明智的战略理由替它的行为辩解。

路易-拿破仑也算满意了。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⁸³给予他的荣誉虽然不算很大,但已经比他有权期望得到的为多了;并且在险恶的四要塞之间,奥军不再由于自己将军的无能而挨打的时刻总会到来。此外,普鲁士也进行了动员,而无论是法国在莱茵的军团,或者是俄国军队都没有作战准备。简单地说,在直至亚德里亚海的地区内建立自由意大利的想法被放弃了。路易-拿破仑提议媾和,于是签订了维拉弗兰卡条约⁴。法国没有得到一寸土地;它把割让给它

的伦巴第慷慨地赠给了皮埃蒙特；它是为了观念而战，它怎么能考虑莱茵河疆界呢？

在这时候，中意大利暂时并入皮埃蒙特，北意大利王国成为当时颇为可观的力量。

大陆原有各省和撒丁岛共有人口	4 730 500 人
伦巴第(曼图亚除外)	约 2 651 700 人
托斯卡纳	1 719 900 人
帕尔马与摩德纳	1 090 900 人
罗马涅(博洛尼亚、费拉拉、拉韦纳与弗利)	1 058 800 人
<hr/>	
共计(根据 1848 年资料)	11 251 800 人

国家的面积由 1 373 平方德里^①增加到 2 684 平方德里。因此，如果北意大利王国最后能建成，它就是头等的意大利国家，除它以外，剩下的只有：

威尼斯	2 452 900 人
那不勒斯	8 517 600 人
教皇国的剩余部分	2 235 600 人
<hr/>	
共计	13 206 100 人

因此，仅仅北意大利拥有的人口就几乎相当于意大利其余各地区人口的总和。根据财政和军事力量以及居民的文明程度，这样一个国家在欧洲可以要求取得高于西班牙而仅次于普鲁士的地位，而且，因为它确信意大利其余各地对它的同情日益增长，所以它也无疑会要求这个地位。

^① 1 平方德里等于 55.063 平方公里。——编者注

但这却不是波拿巴政策所希望的。法国曾大声宣称,它现在不能容许,并且将来也不会容许意大利统一。法国人把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理解为在波拿巴庇护下以教皇为名誉首脑的意大利的莱茵联邦³³⁷之类的东西,理解为以法国霸权代替奥地利霸权。同时,在中意大利建立伊特鲁里亚王国,即为日罗姆·波拿巴的继承人建立意大利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³³⁸这种善良的想法也流传开来。但是北意大利王国的巩固把所有这一切计划都打破了。小日罗姆·波拿巴在周游各公国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甚至连一张选票也没有得到;建立波拿巴主义的伊特鲁里亚,和复辟一样,都是不可能的;除了并入皮埃蒙特以外,别无他途。³³⁹

但是,随着北意大利统一的不可避免性的日益明显,法国进行这次战争所追求的“观念”也就更加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就是把萨瓦和尼斯并入法国的观念。还在战争期间,便已经造出了舆论,声言这种合并是法国干预意大利事务的代价。但是没有人听。难道维拉弗兰卡条约不是驳倒这种说法吗?虽然如此,全世界还是突然得知:在温雅国王^①的民族的和立宪的制度下,有两个省在外国统治下呻吟,这是两个只是由于粗暴的力量才离开了祖国的法国省,它们以充满泪水和期望的双眼凝视着伟大的祖国;路易-拿破仑再不能对于由尼斯和萨瓦发出的痛苦呼号充耳不闻了。

无论如何已经非常清楚,尼斯和萨瓦是路易-拿破仑同意伦巴第和威尼斯归并于皮埃蒙特而要求的代价,他所以提出以这个为代价而同意中意大利并入皮埃蒙特,是因为目前不能取得威尼斯。现在,波拿巴在萨瓦和尼斯的代理人开始玩弄无耻的手腕,被收买的巴

^①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编者注

黎报纸也开始叫嚣说,皮埃蒙特政府在这两个省份中压制大声疾呼地要求与法国合并的人民的意志。现在,在巴黎竟有人公开地说,阿尔卑斯山是法国的自然疆界,法国有权占有这些山脉。

二

如果法国报纸说,萨瓦在语言上和风俗上同法国一致,那么这种说法至少用于瑞士法语区、比利时瓦隆区以及拉芒什海峡的英属诺曼底群岛也是同样正确的。萨瓦人民讲的是南法兰西方言;受过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和书面语到处都是法语。意大利语的成分在萨瓦是如此之少,以致法兰西民间语(即南法兰西或普罗旺斯民间语)甚至越过阿尔卑斯山渗入皮埃蒙特直到多拉里帕里亚河和多拉巴尔泰阿河上游地区。虽然如此,在战前并没有听到过任何同情并入法国的说法。只是在同法国有某些贸易来往的下萨瓦的个别人中间偶尔有过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对当地广大居民来说,就像在其他所有与法国接壤而操法语的地区一样,是毫不相干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792年到1812年期间曾合并到法国的那些地区中,没有一个有丝毫想要回到法国鹰的卵翼之下的愿望。虽然它们已尝到了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果实,但是它们从心底里厌恶严格的集权统治、地方长官的管辖以及巴黎派来的文明传教士永无过错的说教。七月革命²⁶和二月革命¹⁴⁸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法国的同情,但是波拿巴主义立刻又断送了这种同情。谁也不愿意输入拉姆贝萨、卡宴和嫌疑犯处治法²³⁶。此外,法国对一切进口贸易几乎都采取了中国式的闭关自守政策,这一点在边境地区感到特别厉害。第一共和国在各个边境地区遇到的都是被压迫的、民生凋敝的省份,都是四分五裂的、

被剥夺了普通的自然利益的民族，它使这些省份和民族的农村居民得到了解放，使那里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得到了振兴。但是，第二帝国在各个边境地区所碰到的情况却是，那里原来享有的自由比它本身所能给予的自由还要多；它在德国和意大利所碰到的是强烈的民族感情，在各个小国内所碰到的是巩固起来的个别利益，在这工业发展非常迅速的45年中，这种利益增长了，并且在各方面都和世界贸易交织在一起。除了罗马凯撒时代的专制统治，除了把商业和工业关闭在它那关税壁垒的大牢狱之内，第二帝国没有给它们带来任何东西，最多不过是发给它们一个远走他乡^①的通行证。

萨瓦与皮埃蒙特被阿尔卑斯山主脉隔开，因而萨瓦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差不多都是从北面的日内瓦和部分地从里昂取得的，正如位于阿尔卑斯山山口以南的泰辛州仰赖于热那亚和威尼斯一样。即使这种情形是使萨瓦和皮埃蒙特分离的理由，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萨瓦并入法国的理由，因为萨瓦的商业中心在日内瓦。这不仅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而且也是法国的关税立法过于聪明和法国海关吹毛求疵的结果。

但是，尽管语言上有共同性、种族上血统亲近，并且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萨瓦居民似乎并没有半点愿望想要人家用伟大的法兰西祖国的各种帝制设施去为他们造福。他们有一种传统的意识：不是意大利征服了萨瓦，而是萨瓦征服了皮埃蒙特。当时，全省强悍的山民以面积不大的下萨瓦为中心，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国家，后来又下山进入意大利平原，采用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依次兼并了皮埃蒙特、

^① 指法属海外殖民地圭亚那，首府卡宴，流放政治犯的地方。——编者注

蒙费拉、尼斯、洛梅利纳、撒丁和热那亚。这个王朝建都于都灵，成为意大利王朝，但是萨瓦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发源地，并且萨瓦的十字徽号到现在还是由尼斯到里米尼、由松德里奥到锡耶纳的北意大利的国徽。法国在1792—1794年的战争中征服了萨瓦，在1814年以前，该地被称为蒙勃朗省。但是在1814年，它根本不想再留在法国了；当时惟一的问题是：并入瑞士呢，还是与皮埃蒙特恢复旧关系。虽然如此，这个省仍然是法国的，一直到“百日”³⁴⁰终了时为止，它被归还给皮埃蒙特。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历史传统逐渐减弱了；萨瓦被忽视了，而皮埃蒙特的意大利各省却获得了压倒一切的地位；皮埃蒙特的政策越来越着重于关心南方和东方。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居民中那个自命为历史传统的主要代表的阶级——旧的、保守的教皇至上派²⁴⁹贵族，仍然抱有最多的分立主义倾向；当旧的寡头政治的贵族制度还在瑞士居于统治地位时，这个阶级一直企图使萨瓦并入瑞士；只是从瑞士普遍实行民主制时起，他们这种企图看来才改变了方向；在路易-拿破仑统治之下，法国已变成极其反动的、教皇至上主义的国家，因此它就成了萨瓦贵族逃避皮埃蒙特的革命政策的避难所。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一般说来，不存在想要使萨瓦与皮埃蒙特分离的要求。在萨瓦的上部地区，即在莫列讷、塔朗泰斯和上萨瓦，居民坚决主张维持现状。在热内瓦、福西尼和沙布莱，如果什么时候出现变动，居民宁愿并入瑞士。只是在下萨瓦的某些地方，以及在全省的反动贵族中间，有赞成并入法国的呼声。但是这种呼声是这样微弱，甚至在尚贝里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坚决表示反对，连反动贵族（见科斯塔·德·博雷加尔的声明）也不敢承认他们同情这种呼声。

这便是关于萨瓦民族性和民意的问题。

那么,从问题的军事方面来看,情形怎样呢?占有萨瓦对于皮埃蒙特有什么战略上的利益,而对于法国又有什么利益?萨瓦的易手,对毗邻的第三个国家——瑞士又有什么影响呢?

由巴塞尔到布里扬松,法国的疆界形成一个凹度很大的大圆弧;瑞士的很大一部分和萨瓦的全部都在这里嵌入法国疆界。如果我们在这个圆弧上作一弦,那么为它所切断的这一块弓形地将几乎完全为瑞士法语区和萨瓦所填满。如果法国的疆界推进到这个弦上,那么从劳特堡到弗雷瑞斯的一段疆界便会形成一条像从劳特堡到敦刻尔克那样的大体上的直线,不过这条线在防御上具有与劳特堡—敦刻尔克线完全不同的意义。北部疆界是完全暴露的,而东部疆界的北段则有莱茵河作掩护,南段则有阿尔卑斯山作掩护。事实上,在巴塞尔和勃朗峰之间的那段疆界,没有一处是用地形标志的;确切些说,这里的“自然疆界”是沿着到莱克吕兹堡的汝拉山脉这一条线走的,从那里起再经过阿尔卑斯山支脉,这些支脉从勃朗峰向南延伸,环绕阿尔沃河谷,最后也伸展到莱克吕兹堡附近为止。不过,如果自然疆界成为一个凹形的圆弧,那它便不能完成它的任务,因此也就不再是自然疆界了。既然如此不自然地使我们的疆界向里弯进去的这个凹曲的弓形地带的居民在“语言、风俗和文化”方面说来又是法国人,那难道就不应当改正自然界所造成的错误,实际上恢复理论所要求的外凸形状或者至少使它成为一条直线吗?难道住在自然疆界那一边的法国人就应当作为自然界恶作剧的牺牲品吗?

这种种波拿巴主义的理由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兼并的阴谋没有彻底失败以前一直接二连三地实行兼并的第一帝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最完善的疆界也有可以修正和改善的缺陷;如果不是需要客气一点的话,这种兼并可以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至少从上述论据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民族成分方面或者从法国的军事利益方面来说，为吞并萨瓦而制造的一切说法，也同样适用于瑞士法语区。

由滕达山口向西北偏北方向延伸的阿尔卑斯山脉，在很像皮埃蒙特、萨瓦和法国三国边界上的界桩的蒙塔博尔山整个转向东北偏北，而在皮埃蒙特、萨瓦和瑞士三国交界处热安峰更向东偏折。所以，要想使阿尔卑斯山脉成为法国由蒙塔博尔山到热安峰的自然疆界，就只有使这一疆界从热安峰成一直线直达巴塞尔。换句话说，就是使萨瓦并入法国的要求内包含着兼并瑞士法语区的要求。

在阿尔卑斯山主脉形成两国目前疆界的这整个地段上，只有一条石铺的山道——蒙热内夫尔。除此以外，还有阿真泰拉山口，这个山口由巴斯洛内特通至施图拉河谷，这里可以通行炮兵；另外可能还有一些骡马道，稍许费些气力，便可以通过各种兵器。但是，萨瓦和尼斯各有两条石铺山道穿过阿尔卑斯山主脉，所以任何一支进攻的法国军队，如果还没有控制这两个省，至少要先占领其中的一条山道，才能越过阿尔卑斯山。不仅如此，如果法国进攻，出蒙热内夫尔山口只能发动对都灵的直接攻击，而萨瓦的两个山口——塞尼，特别是小圣伯纳德却造成侧击的可能。对于进攻的意大利军队来说，经由蒙热内夫尔山口去攻击法国的心脏必须进行很大的迂回运动，而通过塞尼山口却有由都灵去巴黎的大道。因此，任何一个统帅都只会把蒙热内夫尔山口用做辅助纵队的通路；而主要的作战线总是要通过萨瓦。

所以，占有萨瓦，首先就会使法国获得一个进攻意大利时必不可少的地区，不然，它就得预先夺取它。采取守势的意大利军队当然任何时候也不会为了保卫萨瓦而进行决战，但是他们可以用积极的山地战和破坏道路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把进攻的敌人牵制在阿尔克

河和伊泽尔河上游河谷(塞尼大道和圣伯纳德大道正经过这里),然后凭借封锁山道的堡垒,在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北坡再据守一些时候。在这里,就像在一般的山地战中一样,当然谈不到绝对的防守;决战将拖到敌人冲下平原时进行。但是,这**无疑将保证赢得时间**,时间对集中兵力进行大会战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像意大利这样一个狭长而缺乏铁路的国家,时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所面对的法国地形优越而又布满良好的战略铁路网;如果法国在战前就已占有萨瓦,意大利**无疑会失掉**这段时间。意大利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单独与法国作战;如果它有同盟者的话,两军在萨瓦可能势均力敌。这样一来,阿尔卑斯山脉的争夺战将具有持久的性质;在最坏の場合,意军总能在山脉的北坡支持一段时间,如果北坡失守,它就会与法军争夺南坡,因为只有占领了这两面山坡并能越过山脉,才能成为山脉的主人。至于进攻者是否还有力量和决心下到平地上追击防御者,这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1792—1795年间在萨瓦进行的各次战局便是这种不分胜负的山地战的例子,当时双方的军事行动都拖沓、犹豫和没有信心。

1792年9月21日,孟德斯鸠将军侵入萨瓦。防守该地的1万名撒丁军队以当时惯用的方法分散为极长的哨兵线,以致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集中足够的兵力进行抵抗。尚贝里和蒙梅利扬被占领,法军迅速地沿山谷一直挺进到阿尔卑斯山主脉的山麓。当时山岭还完全在撒丁军队手中,他们于1793年8月15日经过几次小战斗后,即在戈登将军指挥下转入进攻,法军因派遣部队去围攻里昂而被削弱,被他们从阿尔克河和伊泽尔河谷赶回蒙梅利扬。被击败的法军纵队在这里同他们的预备队会合。凯勒曼从里昂折回,立即(在9月11日)转入进攻,没费很大力气又把撒丁军队击退到阿尔卑斯

山的山口；不过他的力量也因此而疲惫不堪，到了山麓就不得不停止前进。但是，1794年阿尔卑斯军团增加到75 000人，而与之对抗的皮埃蒙特军队则只有4万人，此外还有一支也许正在待命的由1万名奥地利人组成的预备队。虽然如此，法军起初的攻击，无论在小圣伯纳德山口或者在塞尼山口，都未奏效，直到4月23日法军才终于占领圣伯纳德山口，5月14日占领塞尼山口，于是整个山岭才落入法军之手。

总之，为了在山这面从皮埃蒙特军手里夺得进入意大利的通道，法军曾不得不进行3次战局。如果说在目前条件下已不可能在这种有限地区内在几次战局中这样毫无结局地作战，那么在双方兵力处于一定均势的情况下，法军不仅将难以强行通过阿尔卑斯山山口，而且也将难以保留充分的兵力，以便迅速冲到平原。虽然萨瓦不能给意大利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一点也已经足够了。

反过来说，我们假定萨瓦与法国合并。那时意大利的处境将怎样呢？阿尔卑斯山的北坡在法军手中，意军只能够防守南坡，法军却可以从高高的山顶上瞰制南坡的堡垒和阵地，或者至少可以监视它们，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可以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对它们进行迂回。这样，山地防御便成了意军最后的、最软弱的、而且伤亡最为严重的行动。萨瓦山地战所能提供的那种收集情报的可能性也就完全没有了。但还不仅如此。法国在夺取萨瓦以前，它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以此为满足，从而迫使意大利采取消极防御；它已经得到一定的成效，它可以把军队更好地用到其他地方去；不把过多的兵力放在这个战场上，对法国是有利的。相反，如果萨瓦最终成为法国的一个省，那么按法国方式进行攻势防御是有利的。消极防御在整个战局过程中造成的人员牺牲，会和进攻意大利时同样的多；进攻所需的兵力多不

了多少，而前途却完全两样！

在兼并萨瓦后的第二天，法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将进入阿尔克河和伊泽尔河的河谷，探索偏谷，翻山越岭，讯问最好的阿尔卑斯山的向导，丈量距离，测绘地形，详细地记录一切情况；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出于旅行者偶然的兴会，而是根据明显的，也许现在就已经准备好的计划进行的。随着这些军官的到来，很快就会出现工程师和承包商；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在这些高山中最僻静的深处，将会铺设道路，砌筑房屋，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旅行者大概都不能说出它们的用途来。它们既不是为当地农民而修，也不是为旅行者而建，它们的目的仅在于使萨瓦天然的战略特性臻于完善。

塞尼山口和蒙热内夫尔山口一样，都是通往苏萨的。如果这两个山口的南坡受到法军攻击，防守山口的意大利部队就会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无法知道，主攻将来自何方；但是，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法军强行通过其中的一个山口并占领苏萨，那么防守另一个山口的部队就被截断了后路。如果塞尼山口首先被强行通过，那么防守蒙热内夫尔山口的部队不管怎样还可以丢下火炮、辎重和马匹由山径避入费内斯特雷莱谷地；但是，如果进攻者通过蒙热内夫尔山口直逼苏萨，塞尼山口的守军就会丧失一切退却的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两个山口的防御就只限于采取简单的佯动。同时，两支法国部队的两条作战线，即由格勒诺布尔到布里扬松和由尚贝里到朗勒堡的两条大道，大致上是平行的，中间只隔着一条从蒙塔博尔山岔出的、有许多人行山道和骡马道的山脊。只要在这个山脊上修筑一条仅需4德里长的横贯道路，法军便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兵力由这条大道调到那一条大道；这样，对意军的钳形攻势就将更为有效，而阿尔卑斯山战线为对付来自意大利的进攻所进行的防御在这一边也

将会格外加强。

其次，在萨瓦还有一个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小圣伯纳德。法国许多权威人士都断言，如果拿破仑在跨越阿尔卑斯山时所选择的山口不是大圣伯纳德而是小圣伯纳德，那也许要更好一些，因为小圣伯纳德比较低，春季融雪较早，并且一般比较容易通过。由里昂和贝桑松出动的法军纵队至少可以同样容易地在阿尔贝维尔和洛桑会合；这两个山口又都通往奥斯塔和伊夫雷亚。关于究竟哪一个山口对于拿破仑在1800年的战局更有利这个问题竟能引起争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已证明，小圣伯纳德山口在军事上多么重要。当然，要想使小圣伯纳德山口能够用来重复以前在马伦戈进行过的那种战略的迂回运动，必须有完全特殊的条件。在现代战争中，作战的兵力要巨大得多，排成一个纵队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越过高山；在我们时代，谁敢仅仅动用3万人的兵力去做迂回运动，在大多数场合无异是自取灭亡。对于第一次或第二次战局说来，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当双方顽强进行的一切战争由于出现了现代的要塞群和筑垒阵地而具有另一种性质——持久性的时候，当双方的力量没有被一连串的战局逐渐消耗殆尽，战争的结局就不能最后决定的时候，军队的人数最后就会越来越少。假定说，战争在北意大利平原上打来打去已有数年之久；这时已占领了卡萨莱或者亚历山德里亚，或者把两个城市全都占领了的法军，后来又被逐回阿尔卑斯山那边；在这里双方兵力都已大大削弱，战斗停止下来。但是，在现代，在有铁路网以及到处都已把火炮的重量减轻了的情况下，通过小圣伯纳德山口把3—4万或者更多的军队迅速调到伊夫雷亚去，难道还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吗？法军可以由伊夫雷亚开向他们平原上的筑垒基地，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必需的一切，并且可以从守备部队中得到补充；如果这是不可能

的话,那么即使更强大的敌军部队也不能把他们通往都灵的道路和通过这两个最近的山口的退路截断。那时,上述的3—4万军队加上守备部队便会形成相当可观的力量;在最坏的情况,在击溃首当其冲的敌军之后,便可以在自己的筑垒阵地周围作战,并且极有希望获得胜利。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到1814年时军队缩减得多么厉害,而拿破仑在这一年又以怎样少的兵力获得了怎样大的战果,这就可以明白了。

如上所述,圣伯纳德大道是沿着伊泽尔河谷走的,而通往塞尼山口的大道则是沿着阿尔克河谷走的。这两条河流都发源于伊特朗山附近。在圣莫里斯堡上方,圣伯纳德大道离开河流而越过山岭,而峡谷(蒂涅河谷)则往右转向南逐渐升高。在朗勒堡下方,即泰尔米尼翁附近,有一小偏谷(圣巴泰勒米河谷)伸入阿尔克河谷。自蒂涅河谷起,有三条人行山道经过伊特朗山与沙弗卡雷山之间的山岭通往圣巴泰勒米河谷。这三条人行山道中准会有一条可以铺成石路。如果在这里铺设一条道路,同上述的横贯道路联结起来,萨瓦——作为法国边境的一个省——的战略道路网就相当发达了。如果在阿尔卑斯山主脉后面直接有一条道路连接三个主要山口,就可以在两天内把主力部队从圣伯纳德和蒙热内夫尔调到塞尼山口附近,并在四五天内从这一翼调到另一翼。如果再在这个道路网上加上两条道路:一条从穆捷经过普拉洛尼昂山口到圣巴泰勒米和朗勒堡,一条从穆捷到圣让-德莫里耶讷,那就很难再增加什么了。留下的事情仅仅是为了加强(不是为了完全阻塞)而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并保障作为中央基地的主要道路交叉点穆捷免受敌人的猛烈攻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铺设不到25德里的新道路。

如果这些道路或类似的道路修成了的话——毫无疑问,法国总

参谋部已经有了在战略上充分利用萨瓦的现成计划——，阿尔卑斯山南坡的防御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如果有这样的道路网确保新的勒库尔布能自由调动他的军队，那么，他凭借着坚固的中央基地和小堡垒，在防御战中能够打出怎样出色的仗来呢？还是不要说，山地战在我们现代军队庞大的条件下已不再是可能的了。只有在军队真正庞大和决定性的优势在某一方时，这种提法才是正确的。但是，在夺取现代要塞时，军队在数量上将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优势为均势所代替的情形也会经常出现。当然，没有必要是不会进入山地的，但由巴黎到意大利或者由意大利到巴黎的道路总是要通过萨瓦或者瓦利斯的。

总而言之，萨瓦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是由于它那些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如作为法国的一个省，能够使法军甚至在数量优势不大的情况下占领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境内的山坡，并向谷地出击，因而会发挥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作用。如果在战场上事先构筑一些工事，法军就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即使在其他方面完全处于均势，他们也能够立即取得对敌人的优势；不仅如此，小圣伯纳德山口还会迫使意军向很远的地方派出掩护部队，那时法军在某些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个山口进行决定性的攻击。

萨瓦在法国手中，面对意大利，只能作为进攻的武器。

那么，这与瑞士有怎样的利害关系呢？

在现今的形势下，瑞士的任何一个邻国只能从正面进攻它。在这里，我们把不包括奥地利的南德意志看做一个邻国，而把奥地利看做另一个邻国，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两个国家并不总是一定采取一致行动的。南德意志只能沿巴塞尔到康斯坦茨一线进攻，奥地利只能沿赖讷克到明斯特一线进攻，意大利只能沿波斯基亚沃到日

内瓦一线进攻,而法国也只能沿日内瓦到巴塞尔一线进攻。瑞士军队的退却线到处都是在正面之后,与正面垂直;而它的中立的边界地区到处都或多或少地掩护它的翼侧。因而,如果一个邻国进攻瑞士,那么在战斗开始之前,是无法实行战略迂回的。只有奥地利在格劳宾登州附近占有侧击之利,但是,瑞士军队反正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 在格劳宾登州进行决战来回击奥军的进攻,而会在更靠西北方,在阿尔卑斯山麓进行决战。奥地利让出了伦巴第,就使瑞士的这种有利形势变得更加有利;无论如何,一年以前,奥地利本来有机会对瑞士的西南部发动一场向心进攻,这种进攻在山地的条件下而且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往往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这样一种进攻的威胁也只限于格劳宾登、泰辛、乌里和格拉鲁斯诸州,就是说只限于人口最稀少而又最为贫困的这部分地区。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敌人由意大利来的道路不得不越过圣哥达山口,他们的兵力就必然会大为分散。诸邻国目前这种对瑞士有利的配置,对瑞士来说具有比欧洲的中立保证还要大的价值。这样一种配置使瑞士在受到一个邻国的进攻时,能够长期支持战斗,而这一点归根到底是这样一个小国所能指望的惟一的東西。

从萨瓦属于法国或者为法军所占领的那一刻起,就谈不上保卫由伯尔尼汝拉山到下瓦利斯的整个瑞士法语区了。日内瓦现在就有可能在 24 小时之内变成法军的基地;汝拉山如同齐尔河到纳沙泰尔湖和比尔湖防线一样,都是可以绕过的;法军将用不着在峡谷中作战,然后强行通过位于这两湖之间的狭道并穿过大沼泽,他们可以安然地通过瓦特州富庶的丘陵地区迂回进军,于是进行真正抵抗的第一道阵地也就会成为在伯尔尼之前、萨讷河和森瑟河之后必然展开第一次大会战的阵地,因为由萨瓦经过维勒讷沃和沃韦进行迂回的

纵队将使在瓦特州的一切抵抗毫无作用。

截至目前,汝拉山是瑞士对付法国的第一道防线,对缺少经验但熟悉地形并有居民援助的民兵来说,这是一个出色的战场。但是由于蜿蜒曲折的国境线常常横断汝拉山的平行山脉,所以也不能够过分看重它。第二道更为重要的防线是齐尔河,齐尔河连接纳沙泰尔湖和比尔湖并由比尔湖流入阿尔河。这道防线在右方为阿尔河下游所延续,左方为奥尔布河所延续;奥尔布河在伊韦尔东附近流入纳沙泰尔湖上端。齐尔河在这两湖之间的长度仅半德里,而由比尔湖到阿尔河的长度也只是一德里。实际上,这个阵地的正面在这两个湖之间;它为低洼地上的大沼泽所加强,因为这个大沼泽由纳沙泰尔湖扩展到阿尔贝格,而且只有沿大道才可以通过。当敌军从右翼经过比伦迂回到这个正面时,可以用预备队在阿尔贝格附近将其击退。更为深入的迂回则须要在阿尔河上架设桥梁,这样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交通线。从左翼的迂回只有经过瓦特州才可能实现,并且会依次遇到奥尔布河、曼丘河和布鲁瓦河的阻隔。瑞士军队在这一线上的抵抗也不可能被敌人沿日内瓦湖向弗赖堡进行的迂回所粉碎,因为沿纳沙泰尔湖退却的瑞士军队总是掌握有通向那里的较短的道路。因此,虽然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即在敌人犯了很大错误的条件下,齐尔河上的阵地才适于进行大会战,但是它仍然能够满足瑞士对它的一切要求:它能使瑞士阻止敌人,特别是能使瑞士从西南部抽调出部队来。

但是,如果萨瓦掌握在敌人手中,由圣然戈尔夫经过维勒讷沃和沙泰勒圣但尼进攻的纵队就将使得在瓦特州进行的一切抵抗毫无作用,因为这个纵队既然到达沃韦附近,它距弗赖堡的距离就差不多只比奥尔布河上的瑞士军队距弗赖堡的距离远2德里,因此能够截断

他们的退路。由圣然戈尔夫到弗赖堡约 12 德里；弗赖堡处在两湖之间的齐尔河阵地左后方约一天行程的地方，距彼得林根（帕耶讷）3 德里，通过瓦特前进的法军纵队和萨瓦部队可能在彼得林根会合。因此，进攻者如占有萨瓦，便能够在三四天内通过罗讷河谷截断瑞士军队与瓦利斯的联系，夺取日内瓦、瓦特和弗赖堡直到萨讷河一带，而且主力能直捣齐尔河阵地的后方，于是巴塞尔、索洛图恩、伯尔尼汝拉山和诺因堡便会落到他们手中。这些地方绝不是荒无人烟的高山地区，恰恰都是瑞士最富庶、工业最发达的州。

瑞士已感觉到萨瓦在战略上对它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它在 1814 年便完成了它的北部地区的有名的中立化，而在 1816 年又从撒丁取得条约的许诺：沙布莱、福西尼和热内瓦山除瑞士以外将不让与其他任何国家。路易-拿破仑也到处放出风声，说他仅仅要求得到萨瓦的南部，而沙布莱、福西尼和到于斯河畔为止的热内瓦山的一部分应归属于瑞士。但是要礼尚往来，据《泰晤士报》消息，他正利用福格特先生私下里在瑞士州议会打探一下，看他们是否同意因此而赋予他自由支配辛普朗山口的权利。这是第一次暗示说：辛普朗也是法国的一个自然界桩，正像它在第一帝国时代真的曾经是法国的界桩一样。

假定说瑞士多了一个新的州——北萨瓦，那么，疆界就会由在勃朗峰和小圣伯纳德山口之间离开阿尔卑斯山主脉而通向罗讷河峡谷（莱克吕兹堡）的那条山岭所形成，而且，看来这条疆界是十分“自然的”。但是，通过这个山岭的有来自伊泽尔河谷与罗讷河谷的下列道路：(1) 塞塞勒—日内瓦道路，(2) 阿讷西—日内瓦道路，(3) 阿讷西—博讷维尔道路，(4) 阿尔贝维尔—萨朗什道路。博讷维尔和萨朗什一样，都有道路经过阿尔沃河谷的北面山岭通往托农。因此，瑞士是毫

无屏障来阻挡对日内瓦湖南岸的托农的入侵的，并且因为由塞塞勒或者阿尔贝维尔到托农不超过 15 德里，所以占有北萨瓦，最多只能使瑞士多防御 5 天。但是因为对于这个新州的防御除了民团以外再不能派出什么部队，所以进攻的纵队也同样可以由日内瓦直扑托农（5 德里），而由这里去圣然戈尔夫仅还有约 4 德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北萨瓦只能使瑞士赢得仅仅 3 天的时间。况且，这只能使瑞士分散防御力量。受法国攻击的瑞士军队的退路，显然是沿低洼地区经过伯尔尼的这一路线，在那里如有可能就沿阿尔河到苏黎世，不然便是到卢塞恩，然后由这两地进入莱茵河上游谷地。因此，瑞士军队不应当把他们的阵地向南推移得过远，以免被敌人赶出这些防线而逼进高山地区。我们已经看到，把瓦特州包括到瑞士的防御体系中还比较容易，但北萨瓦和因萨瓦不复中立而被暴露出来的瓦利斯州肯定是不能够包括在这一体系中的。但是，大家知道，在一个以民军担任防御的联邦制国家里，一旦遭到威胁时，每个公民都会多么强烈地希望保卫自己的乡土。显然，如果整个整个的城市和州毫无抵抗就让给敌人，军队就会抱怨，国民院议员就要大声疾呼，何况这还是瑞士专门为了自己的防御而取得的一个新州呢！在总参谋部本身，每个人都想设法对他自己的地区加以特别的保护，而在民军中，由于受和平时期舒适享乐生活的影响，纪律至少也是很松弛的，所以长官将很难维持部队的秩序。可以断定，在这种情况下长官十次有九次会表现得软弱无力，或者不得不忍让妥协。占领北萨瓦的部队，将根本不会对防御有什么用处，而在退却之际还一定会吃尽苦头，其中有一部分会被驱逐到瓦利斯，在那里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通过盖米山口或者富尔卡山口重新和主力军会合。

对瑞士来说，惟一的保证就是北萨瓦既不属于它也不属于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北萨瓦在战时就能对于两国切实保守中立,实际上却掩护了瑞士。如果它属于瑞士,那对于瑞士来说并不比它属于法国要好多少。萨瓦的价值只在于使瑞士赢得3天至多5天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大部分将会在以后防御瓦特州时失去。这与肯定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够在巴塞尔和日内瓦湖之间进攻比较起来,还算得了什么呢?

北萨瓦对瑞士来说等于丹纳士人的礼物³⁴¹。不仅如此,这种礼物还包藏着一种威胁。在这种场合下,法国将在军事上控制整个瑞士法语区,使它无法进行任何哪怕是半真半假的防御。法国兼并南萨瓦以后,就会立刻提出并吞瑞士法语区的要求。

三

大家知道,尼斯伯爵领地位于滨海阿尔卑斯山麓,它和热那亚省的疆界,通过塞尔沃附近的奥内利亚以东一德里处向下一直伸到海边。尼斯西部操普罗旺斯方言,东部,即罗亚河东岸地区,则操意大利方言。但是除瓦尔河上一些村庄外,标准语到处都是意大利语,只是在尼斯城里,由于外国人大量流入,法语和意大利语才不相上下。为了正确地研究民族成分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一下阿尔卑斯山脉西部地区各种语言的相互关系。

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凡是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交错的地方,意大利语总是处于劣势。它没有渗入阿尔卑斯山脉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格劳宾登和蒂罗尔的罗曼方言完全与意大利语无关。相反,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南,一切边缘地区的语言却夺取了意大利语的地盘。在威尼斯省的西部山区乌迪内,说的是克赖因—斯洛文尼亚语。在蒂罗尔,德语的成分在整个南坡和埃奇河上游谷地占统治地位;再向南,在意大利语地区的中部,有七村社和十三村社³⁴²孤岛般的德语区;格里斯山南麓、泰辛的卡韦尔尼奥河谷、皮埃蒙特的福尔马扎河谷、辛普朗山麓的上韦德罗河谷,最后,还有玫瑰峰的整个东南坡、利斯、上塞西亚和安扎斯卡等河谷,都说德语。法语的疆界起自利斯河谷,包括整个奥斯塔河谷和从塞尼山口起的科蒂安山的东坡,因此,一般都认为,波河上游所有河流都发源于法语区。通常认为,这个疆

界是由代蒙特(施图拉河畔)起,即滕达山口稍西的地方起,到罗亚河并且沿罗亚河直到海边。

关于德意志或斯拉夫民间语与意大利民间语之间的界限问题,是不会引起什么怀疑的。但是如果两种罗曼语相遇,而且它们既不是意大利标准语即真正的托斯卡纳语,也不是北法兰西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而是意大利语的皮埃蒙特方言和行吟诗人所使用的、已经衰落了、变成无数种方言的南法兰西语(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一个不太确切但却是通用的叫法——普罗旺斯语——来称呼它),那么问题就不同了。无论谁,只要他哪怕是肤浅地研究过罗曼语比较语法或者普罗旺斯文学,那他在伦巴第和皮埃蒙特一定会立即觉察出,这里的民间语与普罗旺斯语非常近似。固然,在伦巴第语中,这种类似处仅仅限于方言的外形,例如:阳性元音词尾要省略,而阴性词尾在单数中仍然保留;同样,大部分元音词尾在变位时使这种语言带有普罗旺斯语的声调,而鼻音 *n* 以及 *u* 和 *œu* 的发音却好像北法兰西语;但是构词法和语音学实际上仍然是意大利语的,令人奇怪的是,凡与意大利语偏离的地方,则正如在勒托-罗曼语³⁴³中那样,多半很像葡萄牙语^①。皮埃

① “钥匙”在拉丁语是 *clavis*, 意大利语是 *chiave*, 葡萄牙语是 *chave*, 伦巴第语是 *ciàu* (读“恰乌”)。去年夏天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登载的来自维罗纳的通讯(见发自奥地利大本营的报道)写道:在街上,大家见面时常常说“恰乌,恰乌”。这家常常在语言方面犯错误的聪明的报纸,显然找不出打开这个“恰乌”之谜的钥匙。这个字实际上是 *s-ciau* (读“斯恰乌”),类似于伦巴第语中的 *schiaivo*——奴隶,仆人,就如在我国彼此寒暄时也说:“您的仆人,顺从的仆人”等一样。在伦巴第方言中,真正普罗旺斯语的形式,我们记得只有两个:阴性过去时形动词的词尾为 *da* (*amà, amada*) 与动词现在时第一人称的词尾为 *i* (*ami*——我爱, *saludi*——我致敬)。

蒙特方言在主要特点上和伦巴第方言非常类似,但是它比后者更接近于普罗旺斯方言,而且无疑的,科蒂安山和滨海阿尔卑斯山一带这两种方言非常相近,很难在它们中间划出确切的界限^①。此外,南法兰西方言大部分甚至并不比皮埃蒙特方言更接近于北法兰西标准语。因此,在这种情形上,民间语并不能确定民族的归属。操普罗旺斯语的阿尔卑斯山一带的农民既容易学会法语,又同样容易学会意大利语,但是这两种语言都同样用得很少;他们非常熟悉皮埃蒙特语,用这一种语言也足够了。如果一定要找出个根据,那么只有标准语才能提供,而这种标准语在全皮埃蒙特和尼斯,显然是意大利语;惟一的例外或许是奥斯塔河谷和瓦尔德锡河谷,在这两个地区,有些地方占优势的是法兰西标准语。

可见,企图以普罗旺斯方言作为论据(况且只是在半个省份使用的普罗旺斯方言)来断言尼斯在民族上属于法国,这从一开始就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注意到在比利牛斯山的西面,包括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普遍都说普罗旺斯方言,虽然它在这些西班牙省份里受到卡斯蒂利亚语的一些影响,但不仅在总的方面仍然保持着远较法国任何地方都纯粹的形式,甚至还作为书面语存在于民间文学中,

① 意大利方言和普罗旺斯方言的不同点是:(1)在意大利语中*i*在辅音后面要元音化(*fiore, piu, bianco*),普罗旺斯语则不然;(2)名词复数由拉丁语的主格构成(*donne, capelli*)。固然,普罗旺斯方言和古法兰西方言,在中世纪同样有过这样一种主格的构成法,而其余各格则由拉丁语的宾格(词尾*-s*)构成。但是据我们所知,所有现代的普罗旺斯方言,都只是保存着后面这种形式。然而,在这两种方言交错的地区,还可能发生疑问:现在保留下来的主格形式是来自意大利方言还是来自普罗旺斯方言。

——如果注意到这点，那上述断言就更没有道理了。如果路易-拿破仑在最近的将来也以这3个省份在民族上属于法国为理由而要求占有它们，那西班牙该怎么办呢？

在伯爵领地尼斯要博得对法国的同情，似乎比在萨瓦还要难些。在农村中没有半点反应，在城市中，一切尝试遭到了比在尚贝里更加彻底的失败，虽然在这个海滨胜地，纠合一批波拿巴分子要容易得多。想使尼斯人加里波第成为法国人，——这个念头倒真是不坏！

如果说萨瓦对于皮埃蒙特的防御具有巨大意义，那么尼斯就具有更加巨大的意义。由尼斯去意大利有三条道路：一条是沿海岸直达热那亚的科尔尼什大道，第二条是经过奥内利亚附近的纳瓦山口进入塔纳罗河谷到达切瓦的道路，最后，第三条是经过滕达山口到达库内奥(科尼)的道路。固然，第一条道路最后为热那亚所遮断，但是进攻的纵队在阿尔本加以及更往下在萨沃纳都有机会经由良好的石铺大道越过亚平宁山，此外还有许多通过山脉的骡马道和人行小径；至于作战时如何利用这些道路，拿破仑在1796年已经做出了榜样。第三条道路(经过滕达山口)对于尼斯说来，等于塞尼山口对于萨瓦；它直通都灵，但很少有或者没有侧击之利。而中间那条经过纳瓦山口的道路则直通亚历山德里亚，它在南方的重要性和小圣伯纳德山口在北方的重要性相同，不过它的作用更直接得多，偶然条件的影响也更小得多。另外，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距沿海道路非常近，在进攻时能够从那里得到很大的援助。沿纳瓦大道进攻的纵队在加雷西奥便可以与顺沿海道路进抵阿尔本加的军队重新取得联系，因为由阿尔本加有一条横贯道路通到这里；过了切瓦以后，这条大道往下直通亚历山德里亚，途中经过位于切瓦与萨沃纳之间的卡尔卡雷，而与来自萨沃纳的另外一条路相连接。但是，在切瓦、萨沃纳和奥内利亚

之间有一些高山，因此不能固守。此外，纳瓦山口的北坡连同塔纳罗河的发源地一带位于**尼斯境内**，因此，谁在战前占有尼斯，山口便属于谁。

如果法国军队在战争开始之前便控制了尼斯，他们就可以由此地威胁向亚历山德里亚以西出动的任何意大利部队的翼侧、后方和交通线。所以，把尼斯让给法国，在军事上就等于把意大利军队的集结地点向后移到亚历山德里亚，并放弃皮埃蒙特本土的防御，因为整个说来，只有在尼斯和萨瓦才能够防守皮埃蒙特。

革命战争的历史在这方面也提供出最好的例证。

1792年10月1日，昂塞尔姆将军率领9 000人的一个师渡过瓦尔河，同时法国舰队（12艘战列舰和巡航舰）在尼斯前面离海岸1 000步远的水面上抛了锚。尼斯居民因为同情革命而起义，力量薄弱的皮埃蒙特守备部队（2 000人）匆匆退到滕达山口，在索尔焦布防。尼斯城热烈欢迎法军，但是法军到处抢掠，焚烧农民的房屋，强奸农民的妻女，无论昂塞尔姆将军每日发布的命令或国民公会委员们的布告都无法节制他们。这些人便是后来的意大利军团的最初的核心，波拿巴将军以后靠他们为自己取得了最初的荣誉。看来，波拿巴主义在初期总是要依靠流氓无产者的；没有十二月十日会¹⁰¹这样的组织，它在任何地方都站不住脚。

交战双方对峙很久而不采取行动；法军占据着尼斯城及其四郊，以一个奥地利师加强了皮埃蒙特军队占据着以索尔焦为中心的坚固的筑垒阵地，在山上居高临下。1793年6月间，法军进行了几次总的说来没有什么效果的攻击；7月间，他们占领了通向敌人阵地后方的阿真泰拉山口。在占领土伦（1793年12月）后，意大利军团得到很大的增援，同时波拿巴将军也暂时被派遣到那里。第二年春天，

他向索尔焦的敌方兵营发起进攻,4月28日大获全胜,使法军控制了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切山口。这时波拿巴建议,让阿尔卑斯军团与意大利军团在施图拉河谷会合去攻占皮埃蒙特;但是他的计划未被采纳。不久以后,由于热月九日政变³⁴⁴,波拿巴失掉了自己最有力的庇护者小罗伯斯比尔,同时也就丧失了他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势力;他又成为一个普通的师长了。军队转入守势。只是在奥地利将军科洛雷多以惯常的迟缓行动向萨沃纳前进,企图截断法军与中立的热那亚之间的对法军极端重要的交通线时,波拿巴才有了攻击他的机会,并打败了他。虽然如此,通往热那亚的道路仍然受着威胁;同时1795年的战局一开始就是把法军驱逐出整个热那亚沿海地区。这时,由于法国与西班牙媾和³⁴⁵,东比利牛斯军团得以抽出来调往尼斯,到11月已全部在那里集中。在滨海阿尔卑斯山一带负责指挥的谢勒尔,根据马塞纳制定的计划立即转入进攻。当塞律里埃把皮埃蒙特军队钳制在滕达山口时,马塞纳沿高山地区做迂回运动,从背后到达洛阿诺,同时奥热罗又从正面攻击洛阿诺(11月23日)。计划完全成功了,奥军阵亡2000人,被俘5000人,损失火炮40门,并且同皮埃蒙特军队的联系完全被截断了。与热那亚的交通现在又有了保障,于是法军在整个冬季就牢牢地控制着山地。1796年春,波拿巴终于取得意大利军团的指挥权,于是情势大变。他凭借原由他控制的尼斯和西部海岸,从萨沃纳向山地运动,在蒙特诺特、米莱西莫和代戈³⁴⁶大破奥军,并把他们与皮埃蒙特军队隔开,后者因被法军优势兵力包围,陷于孤立,经过几次后卫战以后,即匆匆签订和约。这样,在博尔米达河上游河谷与塔纳罗河谷的四次胜利的战斗保证了法军对整个皮埃蒙特的军事占领,直接攻击都灵甚至已经没有必要了。战争立即转移到伦巴第,皮埃蒙特则成了法军作战基

地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在战争的头3年中,意大利是完全以尼斯为屏障的。只是在第三次战局中,意大利才丧失了滨海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最后,只是在第四次战局中,这些山口才被利用,并且是非常坚决地被利用了。在第一个星期的山地战斗后,仅仅经过一次有力的佯攻,就使皮埃蒙特军队了解到自己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必须投降了。这一次进攻几乎可以向米兰长驱直入;博尔米达河、泰辛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整个地区,轻易地落入了法军手中。

如果尼斯成为法国的一个省,那么,意大利对于法国就陷入了1794年战局后所处的那种地位。对法军敞开的就不仅是经滕达山口到施图拉河谷的道路和经纳瓦山口到塔纳罗河谷的道路了,因为要阻挡转入攻势的法军优势兵力向阿尔本加和萨沃纳前进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军在攻势开始三四日后又将位于1796年战局的出发点。意大利军队的主力应当在哪里抵抗法军呢?在热那亚的沿海地区,没有他们展开的余地;而在贝尔博河和塔纳罗河以西,他们和亚历山德里亚、伦巴第及亚平宁半岛之间的交通线将受到威胁。他们惟一能做的,就在亚历山德里亚以南进攻并以联合兵力攻击由山地走出的独立纵队。但是,这要以一开始就放弃阿尔卑斯山疆界的防御为前提,因为不然的话,位于滕达山口附近及其西部和西北部的所有部队都会被截断。换句话说,占有尼斯就会使法国控制阿尔卑斯山脉,使阿尔卑斯山不再成为意大利的屏障,同时,又使法国在军事上控制皮埃蒙特。

尼斯在南方给法国提供的侧击之利,和萨瓦在北方给它提供的侧击之利是一样的,只是尼斯提供的侧击之利更加充分、更加直接。既然尼斯和萨瓦各自都有使皮埃蒙特本土完全暴露在法军攻击面前

的作用,那法国同时占有了这两省,会对皮埃蒙特具有多么巨大的优势啊!皮埃蒙特将被这两省像钳子似地夹住;沿着由小圣伯纳德山口四周直到纳瓦山口和萨沃纳上方的山道的全线,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佯攻,直到在一个翼侧阵地上发动真正的攻击并截断死死地堵在山地中的一切意大利部队时为止。意大利军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集中在亚历山德里亚和卡萨莱附近,在阿尔卑斯山一带仅留下警戒部队,一旦发现主攻方向,立刻把集中的兵力派往该处。如果这竟成为事实,那么换句话说,这就等于不仅把阿尔卑斯山脉,而且把皮埃蒙特境内整个波河流域一开始就拱手让给敌人,而意军抵抗法国的第一道防御阵地就将位于亚历山德里亚筑垒线以后。有萨瓦和尼斯作为前进堡垒,皮埃蒙特就是意大利军队的第一个作战基地;如果没有它们,从军事观点来看,皮埃蒙特便成了法国进攻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在皮埃蒙特领土上取得胜利并夺回在萨瓦和尼斯的各个山口,才能从法军手中重新夺回皮埃蒙特。

法国兼并萨瓦和尼斯,同在军事上(就算不是在政治上)兼并皮埃蒙特具有同样的意义。将来维克多-艾曼努埃尔由都灵附近的女王别墅眺望雄伟的、但是一座山峰也不再属于他的阿尔卑斯山时,他就会明白这一切了。

但是有人说,一旦在北意大利形成一个军事强国,法国为了它本身的防御便需要占有尼斯和萨瓦。

萨瓦会显著加强法国的防御体系,这我们已经看到了。至于尼斯,如果说它能加强法国的防御体系的话,那只是因为敌人想侵入法国阿尔卑斯各省时不得不预先占领它。不过,问题在于,是否会有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意大利国家对法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以致法国需要对它进行特别的防御。

意大利纵然完全统一了，也永远不可能靠它的 2 600 万居民去进攻法国，除非它同德国联合。但在这样的战争中，主要的兵力总是德国提供的，意大利只提供次要兵力。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进攻的主力从阿尔卑斯山转移至莱茵河和马斯河。此外，还应当看到，进攻的最终目标——巴黎——位于法国的北部。对法国最致命的攻击总是来自比利时；如果比利时保持中立，那这种攻击总是来自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和来自巴登的莱茵河上游。一切其他的攻击都要采取迂回运动，而且多多少少总是偏向一旁，而不是直接指向巴黎。克劳塞维茨（在他所著的《战争论》第 6 篇第 23 章中）早就嘲笑过 1814 年那一支 20 万人的军队，他们不径直地向巴黎进军，却按照愚蠢透顶的理论，经过瑞士向朗格勒高原迂回；如果他看到企图经过意大利和萨瓦或者甚至经过尼斯来对巴黎进行主攻的作战计划，他又会作何评价呢？一切经由萨瓦的进攻比起从莱茵的进攻来都有极大的缺陷，首先，交通线长，并且还要经过阿尔卑斯山，其次，离巴黎远，最后，里昂巨大的筑垒阵地具有很大的钳制力，它在大多数场合下将迫使敌人中止进攻。因此，在 1814 年战局中，经过意大利向法国挺进的那部分军队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法国在它这段本来就掩护得很好的疆界上，握有这样一些防御手段来对付最软弱的邻国，实际上是无需乎扩充领土了。如果法国现在的国境线到处都和法意交界线一样，距离巴黎很远，都有天然的障碍、人为的工事以及不利于敌人的交通线，因而都那样可靠，那法国会是无法攻击的。如果波拿巴主义正好看中了这一点，才借口法国没有自然疆界便无法进行防御而提出所谓自然疆界的要求，那它为占有莱茵河的要求找根据就不知要容易多少倍！

尼斯即使现在割让给法国，它也将永远属于意大利。萨瓦可能

归并法国,将来当欧洲的各大民族在更大的规模上统一起来的时候,它也许会自愿这样做。但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从而显著地提高了自己在欧洲的权力地位以后,是萨瓦自愿成为法国的领土呢,还是像路易-拿破仑这样一个靠征服别人过日子的统治者,为了永远统治萨瓦,并为了给自然疆界论创立先例而从还处于分裂状态的意大利取得萨瓦——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四

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在围绕萨瓦和尼斯问题进行的这场交易中,关系重大的是下面三点。

第一,路易-拿破仑事实上是这样宣布了意大利的独立:意大利至少被分裂为3个或者甚至4个国家;威尼斯属于奥地利;法国由于占领萨瓦和尼斯而控制着皮埃蒙特。教皇领地在罗马涅分出去以后将把那不勒斯同北意大利王国完全分割开来,从而使北意大利王国无法向南方作任何扩张,因为领地的其余部分必须“保证”归教皇占有。同时,对北意大利王国来说,威尼斯仍然是一块摆在嘴边的诱饵,意大利的民族运动也就会以奥地利为直接的和主要的敌人;而为了使这个新的王国能够按照路易-拿破仑的愿望出来反对奥地利,法军占领了可以控制阿尔卑斯山西部的一切阵地,并把前哨推进到距都灵9德里的地方。这便是波拿巴主义在意大利布下的阵势,一旦发生争夺莱茵河疆界的战争,这种阵势可以代替它整整一个军团。而奥地利从这里得到的,如果说真能得到点什么的话,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派遣自己盟军的好借口。在这里只有一个补救办法,那就是完全改变德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德国并不需要到明乔河和波河为止的威尼斯领土,这一点我们认为已经在别的地方^①说明了。对于教

^①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编者注

皇统治和那不勒斯统治的存在,我们也不感兴趣,相反,我们所关心的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奉行自己政策的、统一而强大的意大利。因此,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可以比波拿巴主义对意大利作更多的贡献。也许不久会发生一些情况,那时回顾这一点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法国公开宣扬自然疆界论。法国报纸重新高唱这种论调,不仅是得到政府的同意而且是根据政府的直接命令,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理论目前只应用于阿尔卑斯山脉;这件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无害的。萨瓦和尼斯只是两个不大的省份,一个只有575 000人,另一个只有236 000人,总共不过使法国人口增加811 000人;它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意义也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是,由于对这两个省份的领土要求,恰恰使自然疆界论的观点被重新抬了出来,并使法国人重忆起这种观点,而欧洲人不得不再习惯于听这个口号,就好像习惯于听10年来不同时期所宣布而后又被抛弃的其他波拿巴主义的口号一样,——这些就特别同我们德国人有关了。在《国民报》的共和主义者们十分卖力地继续使用的第一帝国的语言中,所谓法国自然疆界主要是指莱茵河。就是今天,一谈到自然疆界,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会想到萨瓦或者尼斯,而只会想到莱茵河。哪一个依仗自己国家的侵略野心和侵略传统的政府,敢于重新鼓吹自然疆界论,却让法国满足于尼斯和萨瓦呢?

法国重提自然疆界论,是对德国的直接威胁,是一件明白无误的事实,这件事证明一年前在德国表露出来的民族感情是正确的。固然,现在不是路易-拿破仑,而是他操纵的报纸在大叫大嚷说:当然,过去和现在都仅仅是指莱茵河而言。

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就是俄国对于这整个阴谋的态度。去年爆发了战争,哥尔查科夫本人承认俄国对路易-拿破仑负有“书面义

务”，于是，关于这些义务的内容的传闻就扩散开了。这些传闻来自不同的渠道，并在主要问题上都互相印证了。俄国答应动员 4 个军配置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边境上，使路易-拿破仑更容易施展他的计谋。对战争过程本身，据传已经预先考虑了下面三种情况。

或者是奥地利同意以明乔河为边界而缔结和约。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丧失伦巴第，同时，由于与普鲁士和英国隔离，就很容易被拉入俄法同盟，而这个同盟下一步的目的（瓜分土耳其，把莱茵河左岸地区让给法国）将用其他方法来实现。

或者是奥地利为占有威尼斯而继续战斗。那时，它将被彻底逐出意大利，匈牙利将爆发起义，并在适当时机被转交给俄国康斯坦丁大公；伦巴第和威尼斯将归属于皮埃蒙特，而萨瓦和尼斯将归属于法国。

最后，或者是奥地利继续战斗而德意志联邦支持它。这时俄国将积极地加入战斗；法国将得到莱茵河左岸，俄国则将得到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

再说一遍：关于俄法同盟协定中最重要部分的这些材料，自战争爆发时就开始为大家获悉并且公布出来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为各种事件所证实。其余的部分情况怎样呢？

现在不可能提出相关文件来作证据，这是事物性质所使然。只有在有关事件本身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这些证据才会大白于天下。只有根据事实与文件（例如 1830 年在华沙发现的俄国公文³⁴⁷）查明的俄国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才是揭开这个错综复杂的阴谋的钥匙。对此查明政策就足够了。

在这个世纪内，俄国曾两次与法国结成同盟，并且每一次结盟都是以瓜分德国为目的或者基础。

第一次是在蒂尔西特附近的木筏上。³⁴⁸俄国当时让法国皇帝完全支配德国而自己仅取得普鲁士的一部分作为交换条件。为此它取得了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于是就赶忙夺取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瓦,并驱军渡过多瑙河。但是不久以后,拿破仑“研究了土耳其问题”³⁴⁹并根本改变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个情况对俄国说来便成了1812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在1829年³⁵⁰。俄国与法国缔结了一个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法国应取得莱茵河左岸,俄国则再度取得在土耳其行动的自由。这个条约被七月革命²⁶撕毁了;达来朗在准备对波林尼雅克内阁的起诉时,发现了有关的文件,但为了避免使法国和俄国的外交出丑,他把这些文件付之一炬。在公众面前,各国外交家结成了秘密同盟,他们永远也不会公开地彼此揭丑。

在1853年战争¹⁷中,俄国曾把希望寄托在神圣同盟¹³¹身上,据它的估计,它已经通过对匈牙利的干涉和使华沙屈服³⁵¹而复活了神圣同盟,并且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对路易-拿破仑的不信任使同盟得到了加强。但是它打错了算盘。奥地利以其忘恩负义的崇高行为³⁵²(在此期间,它已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华沙用高额偿还了它欠俄国的债)和它在多瑙河地区传统的反俄政策的彻底复活,使全世界吃了一惊。俄国在这个方面是失算了,但在另一个方面,敌人阵营中的叛卖行为却挽救了它。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夺取君士坦丁堡这个固定的想法,现在只有和法国结盟才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在法国又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像路易-拿破仑政府那样需要夺取莱茵边界。形势比1829年更为有利。牌握在俄国的手里,路易-拿破仑只能为它火中取栗。

首先必须消灭奥地利。奥地利从1792年到1809年在战场上顽

强地反抗过法国,而从 1814 年以来它又在同样顽强地(这是它仅有的然而却是无可争辩的功绩)从外交上反对俄国侵略魏克瑟尔河和多瑙河的计划。在 1848—1849 年间,当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把奥地利推到彻底崩溃的边缘时,俄国拯救了奥地利——它的崩溃不应该是革命的结果,因为革命会使帝国的已解放的地区免受俄国政策的摆布。然而,已具有独立性的各个民族的运动,从 1848 年起就使奥地利无力继续反抗俄国,从而也使奥地利的存在失去了最后的内在的历史根据。

这个反奥的民族运动现在应当成为分裂奥地利的杠杆,运动首先是在意大利,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是在匈牙利。俄国的做法和拿破仑第一不一样;在西方,特别是在那些人口稠密、文明程度超越它本国人民之上的地方,它前进得很慢。俄国征服波兰的最初阶段在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了,可直到现在还只是部分地完成。缓慢的、然而可靠的胜利和迅速的、具有决定意义且成果巨大的攻击一样,都是符合它的期望的;但是,它总是同时考虑到这两种可能性。它在 1859 年战争中利用匈牙利起义的做法,即把这次起义留作第二步使用的做法,清楚地暴露了俄国的手法。

难道俄国会只满足于在短促的 1859 年战局中削弱奥地利,而没有考虑到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了吗?难道它动员第一批的 4 个军就只是为了得到这种满足吗?如果奥地利不让步,那又将怎样呢?如果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局势迫使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在战争继续的条件下是不得不如此的)出来援助奥地利呢,那时又将怎样呢?在这种场合下,俄国对法国又会承担些什么义务呢?

蒂尔西特条约³⁴⁸和 1829 年条约³⁵⁰给这个问题作出了答案。如果俄国把它的领土扩张到多瑙河并且直接或者间接地统治了君士坦

丁堡,法国也应当取得它自己的那份战利品。俄国所能提供给法国的惟一抵偿就是莱茵河左岸;德国只得再次承受牺牲。俄国的自然的和传统的对法政策,是允许法国占领莱茵河左岸或者在一定场合帮助它占领以换取法国对俄国侵占魏克瑟尔河和多瑙河的承认和支持;对由于感恩图报而承认俄国侵占行为的德国,则帮助它从法国手中收复失地。自然,这个计划只有在发生重大的历史危机时才有可能实现,但是这绝不妨碍俄国在1859年很好地考虑到这些可能性,像在1829年那样。

侵占君士坦丁堡是俄国政策一贯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是不择手段的,如果今天还想来论证这个事实,那就可笑了。我们在这里只准备提醒一点,就是俄国除非与法国或者英国结盟,否则永远不能实现瓜分土耳其的目的。1844年,当俄国感到向英国直接提出建议是适时的时候,尼古拉皇帝曾去英国并亲自带去了俄国关于瓜分土耳其的备忘录^①,其中还把埃及许给了英国人。建议被拒绝了,但是阿伯丁勋爵把这份备忘录放在一个小匣内,加了封签传给了他外交部的继任者。以后历任外交大臣都看了这个文件,然后重新加封传给自己的继任者,直到1853年上院辩论时,这件事才终于被公开出来。同时公布的还有尼古拉一世同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之间关于“病夫”的有名会谈,会谈中埃及和干地亚岛同样被许给了英国,而俄国似乎只满足于一点小小的好处。³⁵³可见,俄国在1853年对英国的许诺和在1844年是一样的,那么在1859年对法国的许诺难道会比1829年吝啬些吗?

① 《涅谢尔罗德伯爵向女王陛下的政府提交的备忘录》1854年伦敦版第6部分。——编者注

无论从所处的地位或个人的品格来看,路易-拿破仑都注定要替俄国计划服务。他既然自命是伟大的军事传统的继承人,所以也把1813年至1815年的失败作为遗产接受了下来。军队是他的主要支柱;他必须通过新的军事胜利,必须通过惩罚那些使法国在那几年遭受失败的国家并恢复法国的自然疆界使军队得到满足。只有当法国的三色旗飘扬在整个莱茵河左岸时,才能洗雪巴黎两次被占领³⁵⁴的耻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强大的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英国与俄国之间选择。英国的内阁经常更换,即使有一个英国首相能同意这些计划,这个国家至少也是不可靠的。那么俄国呢?它已经两次表示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与法国结为同盟,只要求得到适中的代价。

从来没有一个人比路易-拿破仑对俄国的政策更为适合了,从来没有一个人所处的地位比他现今的地位对俄国的政策更为有利了。居于法国王位的是这样一个统治者:他仅仅为了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进行战争,就必须进行侵略;他需要同盟,为了这个同盟他只好依赖俄国,——这样一种形势是俄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自从斯图加特会晤³⁵⁵以来,法国政策的全部最后的原动力便不应再到巴黎,到路易-拿破仑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该到彼得堡,到哥尔查科夫公爵的办公室里去寻找。德国的庸人们如此敬畏的这位“神秘”人物降为俄国外交所玩弄的工具,俄国外交让他摆出伟人的姿态而自己却享受实际的利益。俄国从来都是非万不得已不肯牺牲一个戈比和一名士兵,但一有机会就要在欧洲各国间挑起纷争并削弱它们,因此,在路易-拿破仑还没有得意扬扬地摆出意大利解放者的姿态以前,当然要由俄国通过哥尔查科夫的条约³⁵⁶来加以认可。当俄属波兰的民情报告已经证实形势非常不妙,以致在毗邻的匈牙利不能

允许发生任何起义的时候,当动员俄国第一批4个军的尝试表明国家的元气尚未恢复的时候,当农民的骚动和贵族的抵抗规模在对外战争期间会成为一种威胁的时候,俄皇的将军衔侍卫长^①就来到了法军大本营,于是就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⁴。俄国暂时可以满足于既得的成就了。奥地利因为1854年的“忘恩负义”而遭到严厉的惩罚,其严厉程度比俄国所能指望的要大得多。在战前眼看就能整顿就绪的奥地利财政,受到了惨重的破坏,要几十年才能恢复,整个国家机构摇摇欲坠,它对意大利的统治不存在了,领土缩小了,军心涣散了,军队对自己的长官失去了信任,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和威尼斯人的民族运动大大加强,与奥地利分离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公开提出的目标;自此以后,俄国可以完全不再把奥地利的抵抗放在眼里,可以指望逐渐把奥地利变成自己的工具。这就是俄国的成就。而路易-拿破仑,除了为他的军队争得了极为渺小的荣誉,为自己争得了非常值得怀疑的荣誉,以及取得了关于有权占有萨瓦和尼斯的极不可靠的许诺而外,什么也没有得到;而这两省对他说来至多也不过是丹纳士人的礼物³⁴¹,它们会使他更加仰承俄国的鼻息。

进一步的计划暂时搁了下来,但并没有放弃。搁多久,那就要看欧洲国际关系的发展情况,要看路易-拿破仑能把自己的御用军队⁴³控制多久以及新的战争对俄国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而定了。

俄国在对我们德国人的关系上打算扮演什么角色,去年哥尔查科夫公爵致德国各小邦的有名的通告³⁵⁷已经作了清楚的说明。从来还没有人以这样的口气对德国说过话。但愿德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俄国竟然禁止他们去援助遭到攻击的德国的一个邦。

① 帕·安·舒瓦洛夫。——编者注

但愿德国人也不要忘记俄国的其他许多事情。

1807年在签订蒂尔西特和约的时候，俄国要它的同盟者普鲁士拿出一块领土——比亚韦斯托克省给自己，并且把德国出卖给了拿破仑。

1814年，甚至奥地利也承认波兰有独立的必要（见卡斯尔雷回忆录）时，俄国还把华沙大公国（也就是以前属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几个省³⁵⁸）几乎全部并入了自己的版图，从而对德国采取了进攻的态势，它将长期威胁着我们，直到我们把它从那里驱逐出去。在1831年后筑成的要塞群——莫德林、华沙、伊万城，甚至连亲俄派哈克斯特豪森也认为是对德国的直接威胁。

1814年和1815年，俄国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使德意志联邦条例³⁵⁹以现在这种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德国对外永远软弱无能。

自1815年到1848年，德国处于俄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奥地利在多瑙河上曾同俄国抗衡，而在莱巴赫、特罗保³⁶⁰和维罗纳等会议²²²上，它却实现了俄国对西欧所抱的一切希望。俄国能这样控制是德意志联邦条例造成的直接后果。普鲁士在1841年和1842年曾一度企图摆脱俄国的控制，但立即就被迫恢复原状。结果是，当1848年革命爆发时，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³⁶¹，把德国的运动说成是儿童游戏室里的吵闹。

1829年，俄国和波林尼雅克内阁缔结了自1823年就开始由夏多勃里昂准备的（并经他正式确认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莱茵河左岸割让给了法国。

1849年，俄国在匈牙利支持了奥地利，条件是要奥地利恢复联邦议会和摧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抵抗；伦敦议定书³⁶²保证俄国在最近期间获得对整个丹麦君主国的继承权，并使它有希望实

现自彼得大帝以来就渴望实现的进入德意志联邦(以前是德意志帝国)的计划。

1850年,普鲁士和奥地利被召到华沙受沙皇审判。虽然在庸俗的政客眼里只有普鲁士受到了屈辱,其实奥地利所受的屈辱并不见得少些。

1853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在同汉·西摩尔爵士交谈中任意摆布德国,就好像德国是他的世袭领地似的。他说,他对奥地利是放心的;至于普鲁士,他根本不屑于一提。

最后,1859年,当神圣同盟看来已彻底瓦解的时候,俄国就同路易-拿破仑缔结条约,法国在俄国的同意和支持下进攻奥地利,哥尔查科夫还发出通告,非常放肆地禁止德国人向奥地利提供任何援助。

这就是从这个世纪开始以来我们要感激俄国人的这一切,但愿我们德国人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切。

就是现在,我们也还受到俄法同盟的威胁。法国本身只有在个别时机并且也只有在与俄国结盟后才能威胁我们。但是俄国却时时刻刻在威胁我们,侮辱我们。每当德国起来反抗时,它就以莱茵河左岸作为许诺来策动法国宪兵。

难道我们应该继续容忍俄国这样玩弄我们吗?俄国把我们最美丽、最富庶、工业最发达的一个省永远当作诱使法国御用军政权上钩的诱饵,难道我们4500万人民还要继续忍受下去吗?难道莱茵地区除了作为战争的牺牲品,帮助俄国取得在多瑙河和魏克瑟尔河上行动的自由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用处了吗?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我们希望德国能迅速地手持利剑来回答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一定能把法国御用军和俄国“毛虫”一起打发回老家。

在此期间,我们已经有俄国农奴这样一个同盟者。现在,俄国农村居民中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爆发的斗争,正在动摇俄国对外政策的整个体系。这个体系只有当俄国内部在政治上还没有发展以前,才可能存在。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由政府与贵族以各种方式推动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不能再承受现存的社会关系的程度。这种社会关系的废除一方面是不必要的,而另一方面,不经过暴力变革又是不可能的。随着从彼得大帝到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的毁灭,这个俄国的对外政策也将遭到毁灭。

看来,德国注定不仅要用笔墨而且要用刀剑来向俄国说明这一事实了。如果发展到这一步,那时德国就将恢复自己的名誉,洗净几世纪来蒙受的政治耻辱。

卡·马克思

* 声 明

1860年2月6日于伦敦

致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

先生：

我请求您将附上的书面声明在贵报的最近一号上发表并寄给我一份副本。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致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

声 明

兹声明：我已采取步骤，准备对柏林〈国民报〉起诉，因该报第 37

号和第 41 号社论^①就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对我进行诽谤。对于福格特，我准备以后用文字予以回答，因为为此需要询问一些现时不在欧洲的人。

因此，暂时我只谈谈下面的情况：

(1) 根据《国民报》所编的文选来看，——尽管我作了一切努力，但无论在书商那里或者在以前曾收到过福格特先生寄的所谓《研究》的熟人那里，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能够在伦敦找到这本书——福格特的拙劣作品不过是他 9 个月前在他私人的通报即《比尔商业信使报》上所发表的文章^②的进一步发挥。当时我让伦敦转载他的诽谤书，不加任何评论。这样一个简单的做法在这里，在这个了解情况和人物的地方，足以对这位教授先生作出评价了。

(2) 福格特先生征讨我的借口，同征讨意大利的借口一样，是一种“观念”^③。这就是，似乎我是匿名传单《警告》的作者。根据我用英文发表的通告^④（现附上一份）您可以看出，我已采取措施迫使布林德先生^⑤和他的同伙，或者默认这个借口是谎言，或者由英国法院来揭穿他们的谎言。

卡尔·马克思

① 指 1860 年 1 月 22 日《国民报》第 37 号发表的《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和 25 日第 41 号发表的《怎样伪造激进传单》这两篇社论（见本卷第 348—391 页）。——编者注

② 卡·福格特《警告》。——编者注

③ 暗指路·波拿巴的小册子《拿破仑观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 431—433 页。——编者注

⑤ 《总汇报》登载这篇声明时，把“布林德先生”改为“真正的作者”。——编者注

1860年2月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2月
6日

载于1860年2月17日《总汇
报》第4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给《每日电讯》编辑的信

阁下：

您在您今天的报上刊登了一封题为《奥地利的报界帮凶》的信，充满了对我的诽谤和污辱。^①这封声称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写的信，大概是在柏林写就的，它实际上不过是今年1月22日和25日柏林《国民报》上登载的两篇文章^②的荒诞而冗长的重述而已。这家报纸得为自己的诽谤行为而受到普鲁士法院的审理。福格特发表对我的诽谤书的**虚伪借口**是：硬说我是匿名的德文传单《警告》的作者。传单起初在伦敦流传，后来由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③。从附上的抄件^④中您可以看出，我已向我的对手们提出把这个问题提交英国法院审理。

最后我要求：如果您不希望因犯诽谤罪而被控告，那您就得在下期报纸上刊登一项对您的轻率行为**表示歉意的声明**，因为您竟敢轻

① 见本卷第194、333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48—391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183—184页。——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431—433页。——编者注

率地侮辱一个人,而对这个人的人品、过去的政治活动、著作和社会地位——您不得不承认——您是一无所知。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1860年2月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2月
6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4年俄文第1
版第25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英国的预算³⁶³

1860年2月11日于伦敦

昨晚的会议是议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格莱斯顿先生在出色的演说中把自己预算的秘密和商约的秘密同时泄露了,他煞费苦心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用预算的大胆来支持商约的懦弱。关于现在全世界都知其详情的这个条约,诸位会发现,几星期前我对它所作的短评^①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实际上,我对当时所给予的总评论已没有什么可以补充了。因此,在这里我打算把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作为英国财政的一般业务来考察一下。这样来处理问题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即将进行的议会辩论,无疑还会逐渐地向我们澄清那些隐藏在格莱斯顿先生所举的事实和数字后面的外交背景。

不管人们在预算细目中可以找出多少不妥之处,不管人们对于如下的明智之举——用完全废除许多现行的税收(其中一部分未必是由人民群众负担)的办法来应付占总收入14%强的赤字和大大增加的支出——可以提出多少政治异议,单纯的公正心还是使得我要

① 见本卷第53—57页。——编者注

说,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是一个出色的和大胆的财政创举。如果采取不列颠自由贸易论的观点,撇开同对法条约有关、同时也同不列颠每一任财政大臣对5万个大地主的地租问题一贯温情有关的某些明显的荒唐事,——那就得承认,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预算。格莱斯顿先生的处境因他自己所造成的困难而复杂化了。正是他于1853年在自己的为期7年的所谓标准预算中,答应在1860—1861年度彻底废除所得税。他又在由于对俄战争而编制的追加预算中,答应在不久的将来废除茶叶和糖的战时税。而现在当此人的期票到期的时候,他却拿出一个计划:保留茶叶和糖的战时税,同时所得税从每英镑征收9便士提高到10便士,即提高 $11\frac{1}{9}\%$ 。大家还会记得,我在对格莱斯顿1853年预算的批评意见³⁶⁴中,曾力求说明,如果自由贸易的财政立法意味着什么的话,它首先是意味着用直接税来代替间接税。我当时就已指出,格莱斯顿先生答应继续废除关税和消费税,同时他又答应把所得税一项从税册中一笔勾销,这两种诺言是不相容的。尽管所得税的征收有片面性,不公平,甚至荒谬,它仍然是英国财政法中最好的一项。格莱斯顿先生不认真去课地产税,却保留茶叶和糖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战时税,是胆怯的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由于他的眼光短浅,而是由于议会的贵族结构。要是他胆敢去动一动地租,前途相当不稳的内阁就会立即垮台。古语说:饿汉没有耳朵,但同样也应当说,地租没有良心。

在简评格莱斯顿先生打算实行的变革以前,我先要请读者注意他在演说中某些脱口而出的意见。第一,这位财政大臣承认,关于英国的财政制度是自由贸易论的体现这种流行看法,纯粹是句漂亮话。第二,他承认,英国对法国没有什么大宗贸易,相反地,法国对英国有大规模的而且日益增多的贸易。第三,他不得不承认,帕麦斯顿背着

议会安排“友好远征”的政策^①，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国库由于不列颠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加的收入化为乌有。最后，——虽然他把这丸苦药裹上糖衣，并像法国药商通常制造最低劣的药品那样，做得式样美观，——他不得不承认，正是大不列颠目前准备从自己收入中拿出将近 200 万来捐助的那位亲爱的盟友，是使不列颠 1860—1861 年度陆军和海军军费开支增加到 3 000 万巨额数字的主要原因。应当提醒，24 年前，铁公爵^②恳求英国的理性允许承担的最高军事开支额是 1 800 万。

在谈过这些前言之后，现在再来谈谈格莱斯顿先生拟定的变动。这些变动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对法条约⁶⁷而作的变动；另一类包括一些附带的变动，是格莱斯顿先生被迫作出的，为了避免别人指责他的预算是被专制主义的外国逼出的让步，也是为了把预算打扮成对现行税率实行普遍改革的样子，使预算具有一个易于接受的外表。

由于对法商约⁶⁷而作的变动如下：工业品一项立即从英国关税税则中无条件地全部取消，只有三种商品，即软木、手套和另一种无关紧要的商品，在一定限期内例外。白兰地酒从每加仑^③ 15 先令降到殖民地关税的水平——8 先令。全部外国葡萄酒税将立即由每加仑约 5 先令 10 便士减到 3 先令。其次，英国答应从 1861 年 4 月 1 日起，葡萄酒税按照其酒精含量相应地下降。凡是也在英国生产并且征收消费税的外国商品，一律把关税减少到国内消费税的水平。这就是要作的第一类变动的要点。

① 见本卷第 47—52 页。——编者注

② 威灵顿。——编者注

③ 容量单位：英制 1 加仑等于 4.546 升。——编者注

那些同对法条约无关的、应使现在的预算具有不列颠财政立法普遍改革性质的变动如下：

立即和全部废除黄油、脂肪、干酪、橘子和柠檬、蛋类、豆蔻、胡椒、甘草和其他各种产品的税收，这些产品的总税额每年约为 382 000 英镑。现行的建筑木材的税收从 7 先令和 7 先令 6 便士降到殖民地税率水平即 1 先令和 1 先令 6 便士；无核小黑葡萄干的税收从 15 先令 9 便士降到 7 先令；葡萄干和无花果干的税收从 10 先令降到 7 先令；啤酒花的税收从 45 先令降到 15 先令。最后，取消纸张消费税。

1860 财政年度的预算是这样的^①：

	支 出	(英 镑)
长期和非长期国债		26 200 000
固定基金的支出		2 000 000
陆军和民军		15 800 000
海军和邮船		13 900 000
杂项和民政		7 500 000
税务局		4 700 000
共计		70 100 000
	收 入	(英 镑)
关税		22 700 000

① 下表的数据来自 1860 年 2 月 11 日《经济学家》(伦敦)第 859 号。——编者注

消费税	19 170 000
印花税	8 000 000
其余税收	3 250 000
所得税	2 400 000
邮政收入	3 400 000
王室土地	280 000
其他收入	1 500 000
<hr/>	
共计	60 700 000

收支相较,明显的赤字几达1 000万英镑。这个赤字,正像我们说的那样,格莱斯顿先生指望通过将所得税从9先令提高到10先令并保留茶叶和糖的战时税的办法来弥补。格莱斯顿先生还建议用一些微小的变动从其他各种来源中挖出几个便士,这些变动在这个对不列颠1860—1861年度预算的总评里就没有必要详谈了。

卡·马克思写于1860年2月
11日

载于1860年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78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8卷翻译

卡·马克思

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信³⁶⁵

1860年2月21日于曼彻斯特牛
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私 函

我从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收到注明日期是1859年10月16日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这样说的：

“请您相信，我们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一有机会就向您，可尊敬的先生，表示我们的谢忱。”

我并不希望也不期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谢忱”和“特别感激”，这一点，我的10月19日复信^①已足以表明了。不过，我所期待的是，在这种特殊事件中至少有一般的公正，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无论它的色彩如何）都不敢违背的公正。

① 见本卷第3页。——编者注

“特别感激”和“谢忱”表现如下：

(1)我的第一个声明^①没有被刊登，而是登载了布林德的无耻声明连同用阴谋手段弄得的两份伪证。汉堡的《改革报》立即刊登了我的声明。

(2)在我答复布林德的声明^②中，我不得不采用温和的压力，以确保声明被刊载。但是，我的声明并没有像我据理力争的那样刊载在刊登布林德的攻击的同一地方，即第一版上。

(3)奥格斯堡《总汇报》刊载了布林德的第二个声明，他在声明中恬不知耻地称我说的话是明显的谎言，并且又援用了维厄和霍林格尔那两份应受刑事追究的证词。该报以此宣布此事已了结，从而剥夺我答复的机会。

(4)2月6日我把最近一个声明连同用英文写的通告信^③一并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非常可敬的编辑部对我的声明置之不理，但却刊载了布林德的声明^④，而他的声明是由于有了我的通告信才写的。当然，报纸避免转载这位伟大的外交家附上的情书。其次，它刊载了比斯康普的声明，该声明注明的日期比我的声明迟3天（即2月9日于伦敦）。最后，在该报确信《科隆日报》、《人民报》等等早已刊载了我的声明以后，它才决定予以登载，但是，却殷勤地径自对我行使书报检查，任意修改我的声明。1842—1843年我在科隆曾受过普鲁士王国的双重书报检查³⁶⁶，但是从未料到，1860年我还得受科尔

① 见本卷第9—12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3—14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31—433、485—487页。——编者注

④ 指卡·布林德《反对卡尔·福格特》，载于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44号附刊。——编者注

布博士先生及其同伙的书报检查。

我认为,对这种行为作更详细的说明是毫无益处的。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2 月
21 日

载于 1919 年 3 月 28 日《新时
代》周刊第 37 年卷第 1 卷第 26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反对爱德华·梅因的声明³⁶⁷

读者来信

爱德华·梅因先生在《自由射手》第 17—21 号上大放厥词,对此我只谈下面一点:

我正进行的控告柏林《国民报》诽谤的诉讼,足以充分地 from 法律上说明福格特的小册子了。他的同谋爱德华·梅因不能企求同样的荣誉。所有我能够为爱德华·梅因做的就是:在即将于法庭审理后出版的小册子中,留给爱德华·梅因先生一个与他身份相称的位置。

卡尔·马克思

1860 年 2 月 28 日于曼彻斯特

卡·马克思写于 1860 年 2 月
28 日

载于 1860 年 3 月 7 日《改革报》
第 2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8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对摩尔人的战争³⁶⁸

西班牙在摩洛哥发动的战争的第一幕,同时也可能是最后一幕,现在已告结束,而且所有详细的官方报道已经到来,因此我们可以再次谈谈这个问题。

1月1日,西班牙军队离开休达的阵地,去进攻距离仅21英里的得土安。奥当奈尔元帅虽然从未受到过敌人严重的攻击或阻截,却花了不下一个月的时间才把他的军队开到这个城市附近。缺少道路和必要的谨慎,都不能成为行动如此闻所未闻地迟缓的充足理由;而且西班牙人显然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制海权。如果说不得不修筑一条道路以便运送重炮和给养,这也算不上一个理由。重炮和给养都可以主要由舰船载运,军队只要带一星期的给养和山炮(用骡子驮载)而不带其他火炮,至多5天就可以到达控制得土安的高地,并等待与里奥斯将军的师会合,这个师在那时,正像在3个星期以后一样,也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在舍卢河口登陆。2月4日的会战也许就可以在1月6日或7日进行,而且形势也许会更有利于西班牙人;这样,因疾病而丧失战斗能力的数千人大概就可以保全下来,而且也许在1月8日就可以攻占得土安。

这似乎是一个大胆的论断。的确,奥当奈尔像他的任何一个士

兵一样渴望攻进得土安；他表现了勇敢、谨慎、冷静以及军人的其他素质。既然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得土安城下，那么他用什么办法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做到同样的事情呢？当时奥当奈尔有两个办法把他的军队开到目的地。第一个办法是主要依靠陆上交通，舰船仅作为辅助。他就是这样做的。他组织了一个正规的陆上运输队来运送给养和弹药，并且给军队配备了大量的装备着十二磅炮的野战炮兵。在必要的情况下，他的军队可以完全不依赖舰船，舰船只是作为与休达联系的次要交通路线，虽有用处，但绝非必不可少。按这个计划自然就要组织一支庞大的辎重队，有辎重队就要修筑一条道路。因此，就花了一个星期来铺设从阵地到海岸的道路；而且差不多每走一段路，整个行军队伍——军队、辎重队等等就都得停顿下来，等待供次日前进用的另一段路筑成。这样，行军时间的长短，便以西班牙工兵每天所能筑成道路的英里数来计算；而筑路的进度看来是每天平均半英里左右。这样，所选择的这种运送给养的方法本身，又要求大大扩大辎重队，因为军队在途中停留的时间越长，消耗的东西当然也就越多。但是，当1月18日左右一场风暴把汽船刮离海岸时，军队就只好挨饿了，尽管他们设在休达的兵站近在咫尺；要是再来一天暴风雨，那么三分之一的军队就不得不回去为其余三分之二的军队搬运给养。奥当奈尔元帅就是这样在整整一个月中使18 000名西班牙士兵沿着非洲海岸散步，每天前进三分之二英里。军队一旦采用了这种补给办法，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显著地缩短这个前所未有的行军时间了。但是采用这种办法难道不是一个错误吗？

如果得土安是一个内陆城市，离开海岸不是4英里而是21英里，那么自然不能有其他选择。法国人在远征阿尔及利亚的内地时遇到过同样的困难，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克服了这些困难，当然他们做

得更努力、更迅速。英国人在印度和阿富汗由于比较容易找到驮畜和饲料，避免了这种麻烦；他们的炮轻，不需要良好的道路，因为战斗行动只是在干燥的季节里进行，这时军队可以越野行进。但是，带着一支军队沿海岸走整整一个月，而且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总共只走 21 英里这样一段“遥远”的路程，这种事情只有让西班牙人和奥当奈尔元帅来干了！

由此可见，西班牙军队的设施和观念都非常陈旧。既然眼前总是有一支由蒸汽舰船和帆力运输舰船组成的舰队，这样行军就十分可笑了，而在行军期间因霍乱和痢疾丧失战斗能力的士兵则是偏见和无能的牺牲品。工兵修筑的道路并不是与休达联系的真正交通线，因为西班牙军队只是在他们偶尔宿营的地方才控制这条道路。在他们背后，摩尔人随时都可以使这条道路不能通行。要送一个情报，或者护送一个运输队回休达，至少需要一个有 5 000 人的师。在整个行军期间，与休达的联络都是靠汽船来保持的。尽管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随军的给养还是非常不足，以致不到 20 天，军队就濒于饥饿，只是靠舰船上的储备粮才算得救。那么修筑这条道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炮兵吗？西班牙人一定很清楚地知道，摩尔人没有野炮，他们自己的线膛山炮足以胜过敌人所能用来对付他们的任何武器。那么，为什么还随军拖带所有的火炮（既然全部火炮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沿海路从休达运到舍卢河，即得土安河河口的圣马丁）？充其量，随军带一个野炮连就可以了。西班牙的炮兵如果不能以每天 5 英里的速度在任何地区行进，那它们就太笨拙了。

里奥斯师在圣马丁的登陆证明，西班牙人拥有的舰船每次至少可以载运一师人。如果是英国军队或者法国军队进攻，毫无疑问，他们会事先从休达发动几次佯攻，把摩尔人吸引到该地，然后这一师人

就立刻在圣马丁登陆。这样一个拥有 5 000 人的师一夜之间就可以筑起简易的野战工事,有这样的工事就可以无所畏惧地等待任何数量的摩尔人的攻击。如果天气好,每天都可以有一个师登陆,这样,军队便可以在 6 天或 8 天之内集中到得土安城下。然而,我们可以怀疑,奥当奈尔究竟愿不愿意让他的一个师在三四天内孤立地遭受攻击——他的军队是由新兵组成,没有战争经验。因此,我们就不能责备他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了。

但是他无疑可以做到下面这一点。他可以让每个士兵带一个星期的口粮,同时携带他的全部山炮——也许再带一个野炮连,以及用骡子所能驮载的给养品,从休达出发,尽快地到达得土安。即使把一切困难都考虑在内,日行 8 英里当然是够慢的了。不过就算 5 英里吧,那也只需要 4 天的行军就够了。再假定需要用两天的时间来作战,虽然战果不会很大,争不到 5 英里的土地。这样一共需要 6 天,包括因气候而耽搁的时间在内,因为一支不带辎重的军队差不多在任何气候下每天都可以走四五英里。这样,军队在耗尽他们所携带的给养以前就可以到达得土安平原;必要的时候,汽船可以在行军期间随时往陆上补充给养,而他们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的。就地形和气候条件来说,摩洛哥并不比阿尔及利亚更差,要知道法国人在严冬季节在阿尔及利亚的行军要远得多,并且要深入山区,没有汽船支援和运送给养。其实只要一到蒙特内格罗山的高地并控制住通往得土安的山口,就可以保证与停泊在圣马丁锚地的舰队保持联系,而海就可以成为作战基地。所以,只要稍微大胆一些,军队处于除自身以外别无作战基地的状态的时间就可以从一个月缩短到一个星期。可见,两种计划中较大胆的计划会是较可靠的计划,因为摩尔人越是令人生畏,奥当奈尔的迟缓行军就越加危险。如果军队在前往得土安

的途中被击败了，退却起来也会比带着累赘的辎重和野炮要容易得多。

奥当奈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通过了蒙特内格罗山，此后的行进还是完全同以前一样的迟缓。他在这里又赶筑和加固了多面堡，好像与他对垒的是一支组织精良的正规军队。整整一个星期就这样浪费掉了。其实只要挖一些简单的野战工事就足以对付这样的敌人。他不可能受到相当于他的6门山炮的任何炮兵的攻击，因此，构筑这样的兵营，本来只要一两天就足够了。4日，他终于去进攻敌人的营垒。西班牙人在这次行动中看来表现得很不错。关于战术方法的优劣，我们无法判断，因为西班牙兵营中的少数几个记者把所有枯燥的军事细节略而不提，而醉心于绘声绘色的描写和热情的夸张。像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所说的那样，要判断一片地形的特点，就应当自己去看看，我给你描写一番有什么用处呢。摩尔人完全被击溃，得土安在第二天便投降了。

这样就结束了战事的第一幕，如果摩洛哥皇帝^①不是过于固执的话，那么整个战争很可能就此结束。可见，西班牙人到现在为止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由于他们的作战方法而大为增加——表明，如果摩洛哥坚持到底，西班牙人还要花费不少的力气。问题不在于摩尔人非正规部队的认真抵抗，因为他们绝不可能击败受过训练的军队，只要后者集结在一起而且能够得到给养；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很荒凉，除了城市以外不可能夺取到任何别的东西，而且甚至从城市也不可能取得供应；问题在于必须把军队分散在大量的小据点上，而这些小据点终究不足以保证夺得的城市之间的交通经常畅通无阻，

^① 西迪-穆罕默德。——编者注

而且这些小据点要取得给养,就得派出大部分军队去护送运输队通过没有道路的、经常出没大批摩尔散兵的地区。大家知道,法国人在征服非洲的战争的最初五六年间,是怎样向卜利达和麦迪亚这样的城市供应粮食的,更不必说离开海岸较远的驻地了。在这里的气候条件下,欧洲军队很快就会疲惫,因此,进行历时6个月或12个月的战争,对于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是非同儿戏的。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当然是丹吉尔。从得土安到丹吉尔路途横跨一个山口,然后往下进入一个河谷。这完全是内陆行动——附近没有汽船运送给养,也没有道路。距离大约是26英里。奥当奈尔元帅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走完这一段距离而且必须留多少人在得土安呢?据报道,他曾说好像需要两万人来扼守该城,这显然过分夸大了。用一万人驻守得土安,以一个单独的旅驻守圣马丁的营垒,这一个地区就很安全了。这样一支队伍随时都可以作战,而且有足够的兵力击退摩尔人的任何进攻。对丹吉尔,可以由海上袭击来夺取,守备部队也可以由海上运往这个城市。关于拉腊什、萨莱和摩加多尔情况也是一样。但是,如果西班牙人打算这样做的话,他们为什么要长途行军到得土安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摩洛哥再坚持一年,那么西班牙人要迫使摩洛哥求和,还必须在军事方面好好学习一番。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2月
底—3月1日

载于1860年3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96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8卷翻译

弗·恩格斯

论线膛炮³⁶⁹

—

用在炮膛内刻制螺旋膛线的方法使炮弹获得垂直于飞行线的旋转运动以增大火炮的射程和提高射击精度的最初尝试，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慕尼黑有一门小型线膛炮，是1694年在纽伦堡制造的；它有8条膛线，炮膛的直径约为2英寸。在整个18世纪，不论德国或英国都进行了线膛炮的试验，其中有些是后装火炮。虽然这些炮的口径不大，试验的结果却很是令人满意。1776年的英国二磅炮在1300码距离上射击时，方向偏差只有2英尺；这样的精度是当时其他任何火炮根本无法达到的。就在同一年，这种线膛炮被第一次用来发射长炮弹。

然而，所有这些试验长时期内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结果。当时，军事界是完全反对线膛武器的。步枪本身在当时就是一种非常笨重的武器，它的装填动作既缓慢又累人，而且需要高度的技巧。这种武器在那一时代不适于在作战中普遍使用，因为当时不论展开的横队、纵队的前列或散兵的速射都是作战的主要要求之一。拿破仑就不曾

打算在他的军队里使用步枪；英国和德国只有少数几个营装备了步枪；只是在美国和瑞士，步枪才成了全国普遍采用的武器。

阿尔及利亚战争⁸²使步枪的声誉重新鹊起，促使人们改进了它的构造，这些改进仅仅是在整个火器方面的大革命的开始，这一革命直到现在还远没有结束。法军的滑膛枪无法与阿拉伯人的埃斯宾加德长枪相比；这种埃斯宾加德枪，枪管长，材料好，能使用较重的装药，因而卡比尔人⁶¹和贝都英人³⁷⁰能够在法军制式火枪根本射不到的距离上对法军射击。奥尔良公爵^①看到普鲁士猎兵和奥地利猎兵后极为满意，于是也仿效他们建立了法国猎兵，这支猎兵在武器、装具和战术方面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好的一支猎兵。他们装备的步枪比旧式步枪优越得多，并且很快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这就使线膛枪终于在欧洲所有国家的步兵中得到了普遍的采用。

这样，当步兵火力的射程从 300 码增大到 800 码乃至 1 000 码的时候，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在 300 码到 1 500 码之间的任何距离上一一直占优势的野炮，还能够保持对这种新式小型火器的优势吗？情况是，一般野炮最有效的射程正是步枪现在与它们相竞争的射程；霰弹在超过 600 码或 700 码的距离上就几乎没有作用了；六磅或九磅炮的球形弹在超过 1 000 码的距离上就不能取得很满意的效果；而要发挥榴霰弹（球形霰弹）的巨大杀伤作用，炮手就必须沉着并精确地计算距离，这在敌人进攻的情况下在战场上不是经常能做到的；至于用旧式榴弹炮对军队发射榴弹，则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拥有口径最小的火炮为九磅炮的军队，例如英国军队，情况还比较好；可是法军的八磅炮，尤其是德军的六磅炮，就几乎成了废物。

① 斐迪南。——编者注

法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大约在克里木战争¹⁷初期采用了一项所谓路易-拿破仑的发明,也就是轻型十二磅炮,即加榴炮,它既可以使用重量为实心弹重量的四分之一的装药(代替以前的重量为炮弹的三分之一的装药)发射实心弹,也可以发射榴弹。这种火炮只不过是英军已经弃而不用的轻型十二磅炮的一种仿造而已;用长管炮发射榴弹的方法,德国早就采用了,因此,这种所谓改进根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是,如果法国炮兵全部装备了十二磅炮,即使射程减小,也会使它获得对旧式六磅和八磅炮的决定性优势。为了对付这一点,普鲁士政府于1859年决定给自己所有的步炮连装备重型十二磅炮。这是滑膛炮发展过程中的最后举措;这表明,整个问题已就此了结,而滑膛炮的拥护者被证明是荒唐的。整个军队的炮兵全部装备这种笨重的、旧式的普鲁士十二磅炮,的确是再荒唐不过的了,何况是在灵活、迅速的机动已经成了最重要的要求的时候。既然法国轻型十二磅炮只是比其他火炮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根本不比新式小型火器优越,而普鲁士的重型十二磅炮又显然荒唐之至,因此,要么完全取消野战炮兵,要么改用线膛炮,别无他途。

这时各国都不断地进行了线膛炮试验。在德国,一位巴伐利亚中校赖辛巴赫早在1816年就进行了小型线膛炮和一种圆柱锥形炮弹的试验。在射程和射击精度方面,试验结果十分令人满意,但装填方面的困难和外界的障碍使试验未能继续下去。1846年,皮埃蒙特少校卡瓦利制成一门后装线膛炮,它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他制成的第一门火炮是三十磅炮,使用5磅装药和重64磅的圆柱锥形空心弹;当射角为14.75度时,火炮的射程(根据第一次测量所得的结果)为3050米,即3400码。他的试验一直继续到不久以前(部分在瑞典,部分在皮埃蒙特进行),得出一个重要的结果,即发现线膛炮发射

出去的一切炮弹都经常发生方向偏差,也就是由膛线的缠角所引起的、并且总是偏向炮弹旋转方向的偏差;当这种偏差被发现后,卡瓦利就又发明了一种叫做方向或水平正切分划尺来修正偏差。他的试验结果非常令人满意。1854年,他所设计的使用8磅装药和64磅炮弹的三十磅炮在都灵试验时所得的结果如下:

射角	射程(米)	方向偏差(米)
10°	2 806	2.81
15°	3 785	3.21
20°	4 511	3.72
25°	5 103	4.77

当射角为25度时,射程超过了3英里,而与瞄准线的方向偏差(用水平正切分划尺修正后所得的结果)竟不到16英尺!法国最大的野战榴弹炮,当射程达到2400米,即2650码的时候,方向偏差平均为47米,即155英尺,也就是说,当射程仅为线膛炮的一半时,方向偏差却是线膛炮的10倍。

在卡瓦利的最初试验以后不久,很快引起人们注意的另一种线膛炮,是瑞典瓦伦多夫男爵发明的。他的火炮也是后装的,炮弹也是圆柱锥形的。但是,在炮弹构造上有以下差别:卡瓦利的炮弹用硬金属制成,其上有嵌入膛线的弹齿;而瓦伦多夫的炮弹则包有一层薄铅,因而炮弹的直径较炮身膛线部分的直径稍大一些。炮弹放进足够容纳它的药室后,被装药爆炸的力量推入炮身的膛线部分,这时由于铅层完全嵌入了膛线,彻底堵塞了炮弹和膛壁之间的游隙,因而爆炸时所产生的气体就丝毫不会外泄。这种火炮在瑞典和其他各地取

得的结果十分令人满意。如果说卡瓦利的火炮在热那亚已被用来装备军队,那么现在瑞典瓦克斯霍尔姆的和英国朴次茅斯的穹窿形工事以及普鲁士的某些要塞里使用的,则都是瓦伦多夫式火炮。线膛炮就这样开始得以实际使用了,虽然还只是用于要塞。还需要再进一步,用线膛炮装备野战炮兵;法国已经走了这一步,而整个欧洲的炮兵现在也都正在走这一步。在下一部分,我们将介绍现在正在顺利制造的或可能制造出来的各种野战线膛炮。

二

我们在前一部分说过，最先在实战中使用线膛炮的是法国人。在过去五六年间，两位军官——塔米西埃上校和特雷伊·德·博利厄中校(现为上校)奉政府之命进行了线膛炮的试验，成果相当令人满意，以致能作为法国炮兵在最近这次意大利战争¹⁸前夕改组的基础。我们不谈这些试验的经过了，现在就来说一说法国炮兵目前采用的火炮。

由于法国人特别喜欢整齐划一，他们的野炮只采用一种口径(法国旧式四磅炮的口径 85.5 毫米，也就是大约 3.5 英寸)，攻城炮也只采用一种口径(旧式十二磅炮的口径 120 毫米，也就是 4.75 英寸)。其他一切火炮，除臼炮外，必须一律取消。造炮的材料大部分是普通的造炮金属，但有时也用铸钢。炮弹是从炮口装填的，因为法国人进行的后装炮的试验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每门火炮有 6 条圆膛线，深 5 毫米，宽 16 毫米；看来，膛线的缠角不很大，不过关于这方面的细节并不清楚。弹体与膛壁之间的游隙大约是 0.5 毫米到 1 毫米；弹齿即嵌入膛线的弹齿所形成的游隙，则稍小于 1 毫米。炮弹是空心的，呈圆柱尖头形；装满火药时重约 12 磅；炮弹共有 6 个弹齿，每条膛线 1 个，其中 3 个在弹头部；3 个在弹尾部；它们都很短，长约 15 毫米。发火管孔从弹头部通向中心，当弹内装满火药时，孔内即装上发火管或带击发火帽的雷管，在不需要炮弹爆炸时，则用铁螺帽

盖住；在后一种场合，炮弹要用木屑和沙子填满，以使其重量和装满火药时的重量相等。炮身的长度是 1 385 毫米，即为炮膛直径的 16 倍。硬铜炮的总重是 237 公斤(518 磅)。为了根据炮弹向膛线旋转方向产生的方向偏差，也就是一切线膛炮发射的炮弹必然发生的一种偏差来修正瞄准线，在火炮右耳轴上有所谓水平正切分划尺。据说这种火炮及其炮架制作工艺非常精巧，由于它尺寸小以及外观匀称，与其说它像一门真的军用火炮，不如说它像一个模型。

用这种火炮装备起来的法国炮兵参加了意大利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他们真正使奥军吃惊的，当然不是火炮的射击精度，而是火炮的射程远。这种火炮射击时经常产生甚至可以说总是产生超越目标的远弹，因而对敌人预备队造成了比对第一线部队更大的危险，换句话说，在它们比一般火炮更有效地发挥杀伤作用的地方，它们所杀伤的却根本不是它们所瞄准的那些人。这种优越性当然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意味着 10 次就有 9 次火炮不能命中所瞄准的目标。奥地利的炮兵虽然和欧洲其他各国的炮兵一样装备了笨重的火炮，但在对付法国火炮时却表现得很不错，他们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从牵引车上卸下了火炮，在很近的距离(500 或 600 码)上与这个可怕的敌人对射。毫无疑问，不论法国新式火炮比旧式滑膛炮有多大的优越性，它却完全辜负了人们对它的期望。它实际的最大射程是 4 000 米(4 400 码)，关于这种火炮似乎可以在 3 300 码的距离上轻而易举地击中单个骑兵的说法，毫无疑问不过是波拿巴分子无耻的夸大罢了。

在实际战斗中产生了如此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原因很简单。这种火炮的构造极不完善，如果法军坚持采用这种火炮的话，那么两三年以后，他们的火炮就会是全欧洲最差的火炮。线膛武器构造的基本原则是要在炮弹和膛壁之间**没有游隙**，否则，在炮膛和膛线内不

受制约地转动的炮弹就不能围绕本身的纵轴线旋转,而是围绕着一
条捉摸不定的轴线成螺旋状旋转飞行,这条轴线的方向决定于炮弹
飞出炮口时的偶然位置,而且螺旋状转动的圈子将随着飞行距离的
增加而不断增大。法国火炮有很大的游隙,而且没有这种游隙还不
行,因为炮弹的发火管必须由装药爆炸时的火焰来引燃。这正是射
击所以不够准确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装药爆炸时多少
会有一些气体从游隙中泄出,因而推力就不平衡。第三个原因是,由
于存在这种游隙,在装药量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加大射角,道理很
明显,等量的装药,在炮膛与炮弹之间根本没有气体外泄的情况下,
会比部分气体外泄时把炮弹推得更远。看来,法国的线膛炮不仅需
要大量的装药(相当于炮弹重量的五分之一),而且还需要用相当大
的射角。即使在装药较少的情况下,线膛炮的射程也比滑膛炮的射
程远,这主要是由于线膛炮没有游隙,以及装药爆炸时产生的推力全
部用于推送炮弹这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所致。法国人听任这种游隙存
在,浪费了一部分推力,于是不得不增加一定量的装药来弥补这部分
推力,而当装药无法继续增加时,则加大射角。然而在任何距离上,
对射击精度影响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大射角了。当弹道的最高点超过
目标的高度不多时,测定距离方面的误差不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
是在远距离射击时,炮弹飞得很高,因此落角平均要比射角大一倍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限于射角不超过 15 度时的情况)。由此可见,射
角越大,炮弹落地的弧线就越接近于垂直线;因此在测定距离时如果
发生 10 码或 20 码以内的误差,就可能根本不会命中目标。而射击
距离只要超过 400 或 500 码,这种误差是必不可免的,结果是,靶场
上根据已测定的距离进行的射击很出色,而战场上的实战射击却很
差,二者出现惊人的不同,因为在战场上,距离既不知道,目标又在运

动,而且考虑的时间也很短。新式步枪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战场上它们在300码以外的距离上命中率很小,而在300码以内的距离上,由于弹道低,命中率很大;因此当进攻的部队一接近这一距离,就只有刺刀冲锋是把敌人逐出阵地的最有效的方法了。假定某方军队使用的步枪,在400码距离上射击时所形成的弹道,并不高于他们敌人的步枪在300码距离上的弹道,这支军队就具有在比敌人远100码的距离上先开始有效射击的优越性,同时因为从400码的距离冲锋只需要三四分钟,所以这种优越性在战斗的决定性关头具有重要的意义。火炮的情况也是如此。10年前,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就认为能以最小射角达到最远射程的火炮是最好的火炮。这一点对于线膛炮更为重要,因为目测距离时产生误差的可能性,是随着射程的增加而增大的;而跳弹又只有在使用球形弹时才能利用。这是线膛炮的一个缺点;线膛炮要命中目标,就必须使炮弹直接击中目标,而球形弹在发生近弹时却能够跳起,几乎按最初的方向继续飞行。由此可见,低弹道在这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射角每增加一度,直接命中目标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减少;因此法国火炮的高弹道是它最严重的缺点之一。

可是,还有一个能使这种火炮声誉扫地的缺陷,这个缺陷使得它的全部缺点更加严重了。制造这种火炮所用的工具和所依据的原则,完全和过去制造旧式滑膛炮的一样。这种旧式火炮在其炮弹和膛壁之间有很大的游隙,炮弹的重量和直径都不相同,因而在制造这种火炮的过程中,丝毫不差的精密程度仅是次要的问题。直到最近几年,火器的制造仍是现代工业中最落后的部门。在这个部门中,手工操作很普遍,机械操作却很少。这对旧式滑膛武器来说还可以容许,可是当制造的火器必须在很大的距离上保持很高的射击精度时,

这种操作就不能容忍了。要使所有的火枪在 600、800 和 1 000 码的距离上以及火炮在 2 000、4 000 和 6 000 码的距离上一样精确地射击,就必须使各项操作的每一部分都由最完善的自动机器来完成,使生产出的每件武器都分毫不差,完全一样。在旧式火器中忽略不计的微小误差,现在却成了使武器完全变成废品的缺点。法国人对于自己那些旧机器没有作出什么显著的改进,因此他们的射击效果参差不齐。如果各门火炮之间不是在每一细节上都完全相同,那么即使射角相同,其他一切条件也都一样,火炮又怎么能达到相同的射程呢?而且由于火炮制造上的不精确,在 800 码距离上会发生 1 码误差,在 4 000 码距离上就会发生 100 码的误差。能指望这样的火炮在远距离上精确地射击吗?

扼要重述如下:法国的线膛炮不好,因为它们一定有游隙,因为它们使用比较大的射角,而且因为它们的工艺完全不符合远射程线膛炮的要求。必须尽快地把它们换成其他结构的火炮,否则,法国炮兵就会成为欧洲最差的炮兵。

我们有意识地对这些火炮考察得比较详细一些,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阐述线膛炮构造的主要原理。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探讨目前正在英国争夺首位的两种火炮。这两种火炮的基本特点是:炮弹由炮尾部装填,没有游隙,工艺精良;我所指的是阿姆斯特朗火炮和惠特沃思火炮。

三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目前正在英国争夺首位的两种后装线膛炮；这两种线膛炮都是平民发明的，但是它们的效能无疑都超过了造炮专家到目前为止所制成的一切产品；我说的是阿姆斯特朗火炮和惠特沃思火炮。

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的火炮占有优先发明之利，并且已经博得英国整个报界和官方的赞赏。这种火炮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而且比法国线膛炮优越得多，但是能否超过惠特沃思火炮，还很值得怀疑。

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制造火炮时，是在铸钢管外面用锻铁条按螺旋状缠绕成两层套筒，同时上层缠绕的方向与下层相反，像缠丝枪管的构造一样。这种结构的火炮虽然花钱很多，但非常牢固。炮膛内刻有许多紧密相邻的细膛线，这些膛线按炮膛的长度环绕一周。圆柱尖头形的长炮弹由铸铁制成，但外面包有一层铅，这就使炮弹的直径稍大于炮膛的直径；这种炮弹连同装药由炮尾部一起装入足够容纳它的药室；装药爆炸的力量将炮弹推入狭窄的炮膛，软铅便嵌入膛线，这样就完全堵塞了一切游隙，同时使炮弹获得一种由膛线缠角决定的螺旋式的旋转运动。这种把炮弹压入膛线的方法以及为此而在炮弹外面包上一层必要的软金属的方法，就是阿姆斯特朗线膛炮的特点。读者如果回忆一下我们在前两部分阐述过的线膛炮的构造

原理,那么一定会同意说,阿姆斯特朗的线膛炮在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炮弹的直径较炮膛大,那么火炮必然是后装的,我们认为这也是一切线膛炮必须具有的一个特点。不过,火炮后装设备就其本身来说,与不同类型的线膛炮的原理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不同类型的线膛炮上的后装设备可以交换使用,因此我们完全不准备谈这个问题。

这种新式火炮的射程和射击精度是相当令人惊奇的。炮弹能够发射到将近 8 500 码,即几乎 5 英里的距离,而且它在 2 000 和 3 000 码的距离上击中靶子的射击精度,远远超过了旧式滑膛炮在这三分之一的距离上所能达到的射击精度。尽管英国报刊大加宣扬,可所有这些试验在科学方面令人感兴趣的一些细节却严守秘密。这种射程究竟是用多大的射角和多重的装药获得的,根本没有报道过;有关炮弹和火炮本身的重量的详细数字,有关方向偏差和距离偏差等的确切资料,也没有报道过。现在,在出现了惠特沃思火炮以后,我们终于至少知道了一系列试验的某些细节。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曾经在议会宣布说,十二磅炮重 8 担,用 1 磅 8 盎司的装药,在射角为 7 度时,炮弹的射程为 2 460 码,最大方向偏差为 3 码,最大距离偏差为 65 码;射角为 8 度时,炮弹射程为 2 797 码;射角为 9 度时,炮弹射程则在 3 000 码以上,而两种偏差几乎都是一样的。可是在滑膛野炮的实战射击中,采用 7 度到 9 度的射角却是闻所未闻的事,例如在正式规定的射表中,射角最大只到 4 度,使用这种射角时,十二磅炮和九磅炮的射程可以达到 1 400 码。任何继续增大野炮射角的做法都是无益的,因为这会使弹道过高,从而使命中率大大降低。可是我们掌握有关于重型滑膛舰炮用大射角进行射击的一些试

验资料(引自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海军炮兵》^①一书)。1839年英国三十二磅长管炮在迪尔用7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是2 231码到2 318码;用9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是2 498码到2 682码。1846年和1847年,法国三十六磅炮用7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是2 270码,而用9度的射角所达到的射程则是2 636码。这说明,当射角相同时,线膛炮的射程并不比滑膛炮大很多。

惠特沃思火炮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阿姆斯特朗火炮相反。它的炮膛不是圆的,而是六角形的;它的膛线缠角几乎超过阿姆斯特朗火炮的一倍;炮弹是用极其坚硬的金属制成,外面没有任何铅壳;炮弹由炮尾部装填,但这并不是因为有这种必要,而只是为了便于操作和适应火炮的外形。这种炮是用不久前刚成为专利品的一种被称为“均质铁”的材料制成的,这种材料的强度、弹性和抗力都较大;炮弹与炮膛丝毫不差地紧密贴合在一起,因此,炮弹不加以润滑,就装不进炮膛。润滑炮弹用的是一种腊和油的混合剂,放在装药和炮弹之间,这种混合剂同时还用来减小炮弹和膛壁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游隙。这种火炮的制造材料很牢固,能够容易地经受3 000次发射,而炮膛不会有什么损坏。

惠特沃思火炮是今年2月在兰开夏郡海滨的绍斯波特进行了许多次试验而公之于世的。当时向大家介绍的共有3种火炮,即三磅炮、十二磅炮和八十磅炮;我们从这些试验的详细报告中仅选出十二磅炮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这种炮的长度是7英尺9英寸,重量是8英担;而一般使用球形弹的十二磅滑膛炮的长度却是6英尺6英寸,重量是18英担。惠特沃思火炮所达到的射程如下:在射角为2

① 霍·道格拉斯《海军炮兵论》1851年伦敦第3版。——编者注

度、使用 1.75 磅的装药时,射程为 1 208 码到 1 281 码(旧式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所达到的射程为 1 000 码);射角为 5 度时,射程为 2 298 码到 2 342 码(旧式三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所达到的射程为 1 940 码);射角为 10 度时,射程平均为 4 000 码(旧式三十二磅炮用这种射角时射程为 2 800 码)。在采用大射角时,则使用装药为 8 盎司的三磅炮;当射角为 20 度时,其射程为 6 300 码到 6 800 码;而当射角为 33 度和 35 度时,射程则为 9 400 码到 9 700 码。而旧式五十六磅滑膛炮在射角为 20 度时,其射程为 4 381 码;射角为 32 度时,射程则为 5 680 码。惠特沃思火炮的射击精度很令人满意,而在减小方向偏差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至少不比阿姆斯特朗火炮差;至于距离偏差的情况,则根据试验还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四

惠特沃思火炮的构造原理是,将炮弹与炮膛丝毫不差地紧密贴合在一起,并通过润滑剂的作用来消除可能遗留的任何一点小游隙,从而将炮弹和膛壁之间的游隙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方面,惠特沃思火炮比阿姆斯特朗火炮差,因为阿姆斯特朗火炮根本就没有游隙;我们认为这是惠特沃思火炮的主要缺陷。然而,多角形的炮膛不可能没有这个缺陷,无论如何都应该承认,虽然这一类火炮有先天的缺陷,但却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惠特沃思无疑使这种类型的火炮,即发射坚硬的和不易弯曲的炮弹、炮弹和膛壁之间留有游隙的火炮,发展到了最完美的程度。他设计的火炮与法国粗糙的线膛炮相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然而,阿姆斯特朗火炮以及其他一些通过压力将表面包有软金属的炮弹嵌入膛线的火炮都可以**无止境地完善**,惠特沃思火炮却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它已经达到了与它的基本原理相适应的最完美的程度。

最后总结如下:

我们发现,在野炮以**所能达到的射角**射击时,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线膛炮的射程只比旧式滑膛炮的射程远一点点。然而,线膛炮的射程确实远一点,这是它的一个优势。但是,线膛炮作为野炮使用时,它的主要优点是:

1. 同样重量的炮弹可以用炮膛小得多的火炮来发射,火炮的装

药也比只能发射球形弹的旧式滑膛炮小得多。因此,火炮的重量大大减少。旧式十二磅炮的炮膛大约为 4.5 英寸,重量为 18 英担,使用 4 磅的装药。新式十二磅炮的炮膛大约为 3.5 英寸,大致相当于旧式九磅炮的炮膛,重量为 8 英担,使用 1.5 磅到 1.75 磅的装药。法国的新式十二磅炮的炮膛只相当于旧式四磅炮的炮膛,因此重量更轻。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它使野炮具有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使野炮几乎像步兵一样能够到任何阵地去。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由 4 匹以上的马拉一门炮的情况了。

2. 在迄今为止野炮所能达到的射击距离上,它的命中率要高得多;它降低了弹道,把方向偏差和距离偏差都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用球形弹和带有着发引信的榴弹对射时,线膛炮总是能击败发射同样重量炮弹的滑膛炮。

线膛炮作为重炮使用时,特别是在发射带有着发引信的榴弹时,能够毫不费力地摧毁石墙。这一点在法国和德国的实验中已经得到证明。它能使炮舰和攻城炮在 4 000 码到 9 000 码的距离上对城镇进行炮击。从其他各个方面来看,它不会从实质上改变迄今为止存在着的围攻者和被围者的关系,以及炮舰与岸防炮相对抗的关系。

另一方面,线膛炮的缺点是:

1. 炮弹的螺旋式旋转运动让炮弹沿不规则的弹道飞行,使得普通的霰弹无法发射或者不起作用。

2. 炮弹和膛壁之间没有游隙或游隙很小,装药爆炸的火焰因而不能与放置在长炮弹弹头部位的引信接触,因此,发射带有定时引信的榴弹(以及带有定时引信的榴霰弹)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线膛炮有这些缺点,它现在已经成为每一支军队的必备武器。目前的问题只是,怎样才能克服这些缺点。毫无疑问,这些缺点

能够克服。但可以肯定,线膛炮的原理和小型线膛武器的构造和使用原理是一样的。线膛炮的射程能够达到5英里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就像新式步枪能够在800码或1000码的距离上击中人体的想法一样可笑。然而,无论是线膛炮还是线膛枪都有很大的优点,因此,每一支可能被迫与文明的敌人交战的军队都必须放弃一切滑膛武器,包括小型滑膛武器和滑膛炮。

弗·恩格斯写于1860年3月
上半月

载于1860年4月7、21日和5
月5、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5914、5926、5938和595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8卷翻译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这封信是马克思 1859 年 10 月 19 日起草的。他在同一天将信的抄件与排字工人奥·费格勒 9 月 17 日给他的一份书面声明一起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马克思的信和费格勒的声明与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以及埃·比斯康普 10 月 20 日写给《总汇报》编辑的信(参见恩格斯 1859 年 11 月 4 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 11 月 6 日给拉萨尔的信)一同发表。

这封信由于字迹潦草,发信地址和日期都不易看清楚,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的一条脚注中(见本卷 190 页)明确地予以指出。这一点也可从他 1860 年 2 月 24 日给法律顾问韦伯的信中看出来。马克思在给韦伯的信中附上了他 1859 年 10 月 19 日写的这封信的全文。这封信首次载于 1859 年 10 月 27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300 号。——3。

- 2 1859 年 10 月 20 日,奥地利、法国和撒丁之间就签订和约一事举行的谈判在苏黎世结束。马克思在伦敦就此事撰写了本文,揭露了拿破仑第三发动意大利战争所追求的王朝利益和兼并企图。

本文是以临时通讯员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作为邮件随亚美利加号轮船于 1859 年 10 月 22 日从利物浦寄出,于 11 月 3 日到达哈利法克斯,首次发表在 1859 年 11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86 号上。——5。

- 3 这篇注明写于巴黎的文章是马克思在伦敦写的。根据同《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协议,马克思把某些有关欧洲大陆个别国家的文章分别注明写于巴黎、柏林或维也纳,有时注明的日期也比实际写作时间早。——5、15。

- 4 1859 年 8 月 8 日—10 月 20 日在苏黎世召开了有奥地利、法国和撒丁参加的会议,以拟定最后和约的条款;同年 11 月 10 日各方在和约上签了字。略加修改的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的条款成了苏黎世和约的基础。苏黎世条约由三个单独的外交文件组成,即奥法条约、法撒关于把伦巴第转

让给撒丁的条约以及奥法撒共同条约。

维拉弗兰卡条约是1859年7月11日法奥之间签署的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1859年7月8日法奥两国皇帝在维拉弗兰卡城举行单独会晤，皮埃蒙特国王没有获准参加。这次会晤是根据拿破仑第三的建议举行的，因为他害怕战争拖下去会加强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这次会晤中签订了停战协定。7月11日法奥双方签署了初步和约，根据和约，伦巴第（曼都亚和培斯克拉两要塞除外）转归法国（但是拿破仑第三后来为了换取萨瓦和尼斯，把伦巴第让给了撒丁），威尼斯仍然受奥地利统治，同意在战时由于人民起义而被赶走的托斯卡纳公爵和摩地那公爵复位。和约规定建立以教皇为首脑的意大利联邦。这个和约完全符合拿破仑第三的计划，它并没有解决意大利民族统一这个课题，相反地却加深了国家的政治分裂，在它的某些地区保存了外国统治。尽管初步和约中的某些条文没有实行（例如，建立意大利联邦、两位公爵——他们的领土于1860年并入皮埃蒙特——在托斯卡纳和摩地那复位等条）或者有了改变，但整个说来，和约中提出的条件为1859年11月10日签订的苏黎世和约打下了基础。——5、8、203、271、307、444、481。

- 5 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不仅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法国民法典，而且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即1804—1810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在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实行，在莱茵省1815年归属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有效。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称《拿破仑法典》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5。
- 6 十二月英雄指拿破仑第三。他在1851年12月1日夜间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1848—1851年）（见注197）。——6、209、248。
- 7 督政府是1795—1799年间的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政权。1794年7月雅各宾专政被推翻之后，根据1795年制定的共和三年宪法，解散国民公会，成立由五名督政官组成的督政府，每年改选一人。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799年11月9日（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了督政府，建立了执政府。——6。

- 8 1848年“蓝色分子”是对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即蓝色共和党人的称呼,以区别于“红色分子”(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所谓山岳派)和“白色分子”(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君主主义者)。因其机关报是《国民报》,故又称《国民报》派,亦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建立了“蓝色分子”专政,它存在到同年12月总统选举时为止。——6。
- 9 明斯特和约(1648年10月)是结束了全欧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历史上总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约之一。这个条约是在德意志帝国的代表和德国各邦诸侯为一方同法国为另一方之间签订的,根据这个条约,法国获得了阿尔萨斯(不包括斯特拉斯堡),法国对梅斯、图勒、凡尔登等三个主教管区的权利得到了确认;德国各邦诸侯被承认为独立的君主,他们有权签订外交条约和协定而不受德国皇帝的干预。明斯特和约进一步削弱了德意志帝国,加深了德国的政治分裂,同时巩固了法国在中欧和西欧的优势地位。——6。
- 10 坎波福米奥和约是1797年10月17日参加反法同盟的奥地利与法国签订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奥地利退出第一次反法同盟,放弃原有的尼德兰(今比利时),承认莱茵河为法国边界。法国把威尼斯共和国的一部分领土连同威尼斯城以及伊斯的利亚半岛和达尔马提亚转让给奥地利以换取奥地利在莱茵河疆界上的让步。原威尼斯共和国的另一部分并入拿破仑第一于1797年夏在意大利北部夺来的土地上建立的山南共和国。归属法国的还有伊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共和国在阿尔巴尼亚沿岸地区的领地。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终结。——6、245。
- 11 荷兰的僭位者指拿破仑第三。他的父亲路易·拿破仑被其兄拿破仑第一于1806年扶上荷兰的王座,直至1810年。——6。
- 12 四边形要塞区又称威尼斯四边形要塞区,是意大利北部维罗纳、莱尼亚戈、曼图亚和佩斯基耶拉四个要塞组成的极为坚固的筑垒阵地。在19世纪战争中,四边形要塞区作为军队作战的基地曾起过很大的作用。1848年革命以后,控制这个要塞区的奥军按照当时战术的要求改建了这群要塞。——6、444。

- 13 由于害怕国内革命运动的加剧,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在同奥地利作战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限制受到人民支持的加里波第志愿军的行动,使他们经常处于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4)签订之后,加里波第建议继续对奥地利人进行斗争,但是1859年11月,志愿军在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的坚持下被解散了。——6。
- 14 指1813—1815年普鲁士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民族解放战争。——7。
- 15 指马志尼于1859年9月16日写给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的信。他在信中建议国王出来领导解放和统一全意大利的斗争,在加里波第的帮助下发动意大利南部起义,并组织向罗马进军。马志尼的信没有获得反响。——7。
- 16 大型政治历史剧(Haupt-und Staatsaktion)本来是指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德国巡回剧团演出的戏剧。这些戏剧用夸大的、同时也用粗俗的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历史事件。这个词的引申意义是指重大的政治事件。——7、84。
- 17 克里木远征即克里木战争(俄土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又称东方战争。——8、58、183、214、236、300、477、507。
- 18 意大利战争(1859年4月29日—7月8日)是法国及撒丁王国与奥地利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去扩张领土和加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奥军在马真塔会战和索尔费里诺会战中遭到失败后,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的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求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于7月11日背着撒丁与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见注4)。战争的结果,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管辖。——8、58、75、510。
- 19 维也纳条约即1815年条约。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的君

主、代表和复辟的波旁王朝代表于 1815 年 5—6 月在维也纳会议上签订了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根据 1815 年条约的规定,奥地利获得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挪威;俄国获得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荷兰的好望角与锡兰殖民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维也纳会议决定恢复法国 1792 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8、202、206、215、217、250。

- 20 1859 年 11 月 3 日,由爱·梅因在汉堡出版的《自由射手》第 132 号登载了一篇针对马克思的文章,标题是:《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文中断言,马克思是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的始作俑者,而今企图嫁祸于布林德。福格特利用这一诽谤性断言作为借口,攻击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在 1859 年 11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整个庸俗民主派在德国报刊上竭力掩饰布林德的事情并猖狂攻击我。《自由射手》的现任编辑梅因先生就是这样。”还在前一天(11 月 6 日),马克思已就此事写信给拉萨尔:“当然,我并不打算在一些小报上同所有这些狗崽子对骂,但是我仍然认为应当教训一下《自由射手》的爱德华·梅因先生,使其他人不敢再动。”此外,马克思写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福格特和布林德之间造成对立,以便逼使布林德交出福格特和法国波拿巴主义关系密切的证据。

这篇文章写于 1859 年 11 月 7 日。马克思把这篇声明分别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以供发表,但前者没有照办。本文首次发表在 1859 年 11 月 19 日《改革报》第 139 号附刊上。——9。

- 21 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 19 世纪 30—50 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 50 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

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在他 1892 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的英文版导言中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列宁把宪章运动称做“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6 卷第 292 页)。——10。

- 22 1852 年 12 月 11 日和 18 日,宪章派报纸《人民报》第 32 和 33 号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127—240 页)的评论。评论中摘要引证了这一著作。——10。

- 23 偷梁换柱(Quid pro quo)是 1859 年 7 月 30 日—8 月 20 日在《人民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的一组文章的标题,由于《人民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这组文章没有登完。

另见马克思 1859 年 6 月和 7 月发表在《人民报》上的《报刊述评》,写作这些文章的目的是反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哥·金克尔当时在伦敦出版的报纸《海尔曼》。——11。

- 24 奥格斯堡《总汇报》没有发表马克思 1859 年 11 月 7 日反对爱·梅因的声明(见注 20),相反地,却在 11 月 9 日第 313 号上登载了卡·布林德 11 月 3 日的信。布林德在信中否认自己应对传单《警告》负责。在此之后,马克思于 11 月 15 日写了这篇声明。

马克思在 11 月 16 日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他已经把对布林德的信的答复寄给了《总汇报》,并且坚决要求——同时提到它给我的信——刊登我的答复。这里提到的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没有留传下来。

这篇声明发表在 1859 年 11 月 21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325 号附刊上。——13。

- 25 1859 年底,黑森选帝侯国的宪法冲突日趋尖锐,11 月 17 日《泰晤士报》第 23466 号登出《黑森选帝侯国》一文,马克思显然是受这篇文章的影响,于同日写作了本文。

文章是以临时通讯员的名义发表的。本文作为邮件可能随欧罗巴轮船于 1859 年 11 月 19 日从利物浦寄出,于 11 月 30 日到达哈利法克斯,首次发表在 1859 年 12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07 号上。——15。

- 26 七月革命指1830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15、212、448、477。
- 27 黑森-卡塞尔革命指1830年秋天由黑森-卡塞尔政府的税收政策和关税政策引起的骚乱。——15。
- 28 德意志联邦议会即以前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见注19)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惟一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的全权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各邦的革命运动。1848年三月革命(见注168)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联邦议会从1850年9月2日开始仍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从1851年起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卡·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以代替俾斯麦。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德意志联邦由北德意志联邦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了。——17、139。
- 29 德国的国民议会指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它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它的选举采取两级制,不是直接选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有恩格斯称为“坚定左派”的罗·勃鲁姆、卡·福格特等人,还有恩格斯称为“极左派”的阿·卢格、古·施勒弗尔、弗·齐茨、威·特吕奇勒尔等人,这些人又称激进民主派。议会的多数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君主立宪政体。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

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

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法兰克福城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当地开会时,左翼议员于1849年5月30日决定把议会地址迁到斯图加特,迁至斯图加特后的国民议会又称“莱茵议会”。它曾试图组织保卫帝国宪法的合法运动(见注96)。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帝国政府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的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帝国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保证帝国宪法的实施,但是没有成功。1849年6月18日,议会被符腾堡军队驱散,停止了活动。——17、112、125。

- 30 北方联盟即所谓三王同盟。1849年5月26日,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在哥达举行会议,会上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三个邦的国王结成北方联盟。到1849年9月,共有21个德意志邦参加了该联盟。普鲁士国王试图领导该联盟实现德国的统一。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普鲁士被迫做出让步,到1850年11月就放弃了联盟。——17。
- 31 联盟议会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德国统一的企图,即联合汉诺威和萨克森的君主以及与这些君主联合在一起的17个其他德意志邦的君主,共同建立德意志君主联邦,从而实现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的“小德意志”计划(参看注192)。这个计划受到自由派右翼,即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哥达派的代表的支持。——17。
- 32 这篇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文章的开头所概括的结论,是马克思早在1858年仔细分析了1836年以来的英中贸易动向后就已得出的。相关的表述出现在马克思1858年9月写的《英中条约》和《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两篇文章以及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
- 这篇文章可能写于1859年11月18日。文章作为邮件可能随欧罗巴号轮船于11月19日从利物浦寄出,于11月30日到达哈利法克斯,首次发表在1859年1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08号上。——20。
- 33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或政府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20、180。
- 34 1843年的附约指南京条约(见注35)的附约,即1843年10月8日签订的

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通称虎门条约。——21、50。

- 35 1842年条约即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签订的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它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中国割让香港；②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③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对外通商，英国可派驻领事；④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同中国商人自由贸易；⑤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由中英共同议定。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21。

- 36 马克思写作这篇文章的起因是：英国舆论界散布谣传，说法国即将对英国发动军事入侵。文章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员的名义发表的。

文章作为邮件随波斯号轮船于1859年11月26日从利物浦寄出，于12月8日到达纽约，首次发表在1859年1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13号上。——25。

- 37 由于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加剧了。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本文列举的主张同工业资产阶级妥协的贵族统治集团中的个别人物提出的那些议会改革法案。1780年里士满公爵提出的法案规定每年要进行议会选举，给成年的男性居民以选举权，重新划分选区。小皮特于1782年以下院议员的身份提出，1785年又以政府首脑的身份再度提出的法案，规定要取消“腐败的城镇选区”，重新划分选区，以利于工业中心。查·格雷在1793年和1797年提出的那些改革法案也建议取消“腐败的城镇选区”，规定在农业区要增加选民人数等等。所有这些法案都被议会否决。

腐败的城镇选区是19世纪初英国议会改革者首先使用的专名词，指英国那些到18—19世纪时居民已经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城镇和乡村。这些城镇和乡村从中世纪起就享有选举代表进入议会的权利。然而这些议员的选举是由行贿受贿决定的，实际上是由当地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这种特权被1832、1867和1884年的改革所取消。——25。

- 38 反雅各宾战争即二十三年战争，指1792—1815年欧洲国家同盟（英、普、奥、俄等）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1792年2月，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联军对革命的法国发动战争。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支持联军，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及

1793年1月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以后,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反法同盟的联军,公开参战。1793年春,反法同盟从四面向法国本土进攻,并支持法国王党叛乱。在1794年6月的弗勒吕斯战役中反法联军被击败。1797年10月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见注10),同盟瓦解。

1798年12月,英、俄、奥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1800年6月,拿破仑在意大利马伦戈战役中击败奥军主力,迫使奥地利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后又迫使英国签订亚眠和约,同盟解散。

1805年夏,英、俄、奥、瑞典等国第三次组成反法同盟,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败俄、奥联军,签订普拉茨堡和约。

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击败普军主力,1807年2月8日在埃劳,6月14日在弗里德兰战役中打败俄军,迫使俄、普签订蒂尔西特和约(见注348),第四次反法同盟联军失败。

1809年春,英、奥等国组成第五次反法同盟,同年7月拿破仑在瓦格拉姆战役中战胜奥军,迫使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至此,拿破仑统治了整个西欧和中欧。

1813年10月,在莱比锡战役中,拿破仑被击败,1814年3月,第六次反法同盟俄、普、奥、瑞典的反法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退位,流放厄尔巴岛,波旁王朝复辟。

1815年3月,拿破仑回到巴黎复位,英、俄、普、奥等国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6月18日在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被击败。6月22日第二次退位,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长达23年的反雅各宾战争最后结束。——25、112、202、306。

39 禁口令即禁口律,指181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废除人身不可侵犯和限制言论、出版和集会等自由的六项法令。——25。

40 指洛克·金的法案和约翰·罗素的法案。1851年2月提交下院讨论的洛克·金法案规定把土地租赁者的选举资格限制从年收入50英镑降低为10英镑,从而使他们同城市房屋租赁者权利平等,这一法案遭到议会否决。

1852年2月,约·罗素作了关于提出改革法案的预先声明。法案规定的各项措施——取消1832年改革以后仍然保留下来的居民在500人以下的、过去曾经选派议员的所谓“腐败的城镇选区”,重新分配议员的席

位,使之有利于大城市,以及降低选举资格限制和财产资格限制——是为了加强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但是,这一法案也没有提交议院讨论。

1854年2月,约·罗素提出了一个新法案,提出对农村选区和城市选区应权利平等,凡是年薪达100英镑以上的人,或者持有国家证券、银行股票或东印度公司股票而年收入的利息在10英镑以上的人,或者在储蓄所有50英镑以上存款的人,都可以享有选举权;并且提出要给持有大学毕业证书的人以选举权。约·罗素的这个法案遭到下院否决。——40。

- 41 1851年12月2日法国发生波拿巴政变(见注197)以后,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在同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话时,赞同了路易·波拿巴的篡夺行为。帕麦斯顿采取这一步骤事前并没有征得辉格党内阁其他成员的同意,结果他于当月辞职,虽然在原则上,英国政府同帕麦斯顿的观点并没有分歧,而且它在欧洲第一个承认了法国的波拿巴政体。帕麦斯顿再度领导内阁后,由于他的外侨管理法案遭到弹劾,又于1858年2月被迫提出辞职。

外侨管理法案是帕麦斯顿于1858年2月8日在法国政府指责英国允许政治侨民避难的压力下向下院提出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参加阴谋活动的外国人同英国人一样,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法案在群众的抗议运动的压力下被下院否决了。——26。

- 42 指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见注17。——26。
- 43 御用军是古罗马皇帝或统帅的私人卫队,享有特权。在罗马帝国时期,御用军经常发生内讧,并常常扶助自己方面的人登上皇位。后来“御用军”就成为雇佣兵及军阀横行霸道的同义语。马克思把拿破仑第三所依靠的那些法国军阀叫做御用军队。——26、481。
- 44 奥尔良党人(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见注26)到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148)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26、109、286。
- 45 指1859年8月16日拿破仑第三签署的两项法令。

第一项法令对政治犯和刑事犯宣布大赦;第二项法令的第一条规定废除对报刊的各种行政“警告”,此前当局有权根据1852年的新闻出版法对报刊发表的不利于政府的材料提出警告。这种警告是政府公开压制出

版事业的手段之一。——27。

- 46 1859年10月22日,西班牙政府出于侵略目的向摩洛哥正式宣战。对军事问题一向很感兴趣的恩格斯,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于1859年12月、1860年1月和2月连续撰写三篇文章,报道摩洛哥的战事。这三篇文章,即本篇、《对摩尔人的战争》(见本卷第41—46页)和《对摩尔人的战争》(见本卷第499—504页),对西班牙人在1860年2月4日得土安战役之前的军事行动作了评价,它们作为社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三篇文章相互衔接,浑然一体。在前一篇文章中,由于消息来源的关系,对于事件仅作了一般性报道的地方,后一篇文章则作出进一步的详细评述。

本文恩格斯写于1859年12月20—29日。在写作过程中,恩格斯主要依据《泰晤士报》驻摩洛哥战地记者几乎每天从战场上发回的报道,同时参照了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日报上发表的官方通报和电报。文章作为邮件可能随欧罗巴号轮船于1859年12月31日从利物浦寄出,于1860年1月15日抵达哈利法克斯,首次发表在1860年1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46号上。——28。

- 47 西班牙为达到其侵略目的向摩洛哥宣战后,派奥当奈尔将军率军侵入摩洛哥境内。军事行动从1859年11月初一直延续到1860年3月,但是西班牙军队遭到爱好自由的摩洛哥人民的顽强抵抗,并没有取得特别明显的胜利。1860年4月缔结了和约,根据该和约西班牙获得了赔款和小块割地。——28。
- 48 1860年1月15日巴黎《总汇通报》第15号发表了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给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一封信,信中谈到法国的经济状况。马克思就此撰写本文,对法国政府企图整顿被危机所动摇的经济作了批判分析。马克思从这篇文章开始,写了一系列论述欧洲各国经济状况的文章。

本文写于1860年1月16—20日,以临时通讯员的名义首次发表在同年2月7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62号上。——35。

- 49 教友会(Society of Friends)也称贵格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和它的仪式,鼓吹和平主义思想。19世纪20年代产生的主张革新教友会信条的拥护者被称为“湿的”贵格会(区别于信奉正统教义的贵格会

——“干的”贵族会)。——35。

- 50 根据基督教关于“千年王国”的教义,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在这期间,信仰基督的圣徒们将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为王;魔鬼暂被捆锁,福音将顺利传遍世界。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20章第3、4节。——35、246。
- 51 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 全称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由贝列拉兄弟在1852年开办并为同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的一家法国大股份银行,同拿破仑第三政府有密切联系。该公司在政府的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它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1867年该公司宣告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35、277。
- 52 土地信用公司(Crédit Foncier)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它是1852年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土地信用公司发放以不动产作抵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50年)。土地信用公司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35。
- 53 马克思称波拿巴法国的银行企业为游荡银行(Crédits ambulants),是强调这些银行企业的不稳固性。——35。
- 54 土伊勒里宫(Tuileries)是巴黎的一座宫殿,路易十八的皇宫;拿破仑第三的官邸。——36、231、277、306。
- 55 英国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这一学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英国自由党的左翼。——39、54、180。
- 56 帝国的卡利奥斯特罗指拿破仑第三。马克思把他比作意大利的冒险主义者、神秘论者和到处招摇撞骗的家伙卡利奥斯特罗。——39。

- 57 “帝国就是和平”(L' Empire c' est la paix)是路易·波拿巴(1852年10月9日在波尔多的演说)中的话。——57。
- 58 本文是恩格斯为报道西班牙侵略摩洛哥的战事而写的三篇文章中的第2篇(见注46)。文章大约写于1860年1月18日,作为邮件随亚细亚号轮船于1月21日从利物浦寄出,于2月5日抵达纽约,首次发表在1860年2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63号上。——41。
- 59 公主骠骑兵是西班牙轻骑兵的一个团。——41。
- 60 1859年11月,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再次企图侵犯摩洛哥的边界,但是遭到摩洛哥人的强烈抵抗。接着由四艘军舰组成的一支法国分舰队袭击了得土安堡垒。——42。
- 61 卡比尔人是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其居住地是半山区地带,从地中海延伸到卡比利亚山脉南坡,从代利斯延伸到奥卡斯角。——44、506。
- 62 小型战争是18—19世纪军事书籍中使用的一个术语,指正规军小股部队结合游击队和非正规军的活动而采取的军事行动。——45、58。
- 63 1836年秋,阿尔及利亚军队在哈·艾哈迈德贝伊指挥下在君士坦丁胜利地击退了企图以强攻夺取该城的法军,并给以惨重杀伤。直到1837年秋,法军在第二次远征时经过围攻才攻占该城。——46。
- 64 马克思1860年1月25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帮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篇文章。次日恩格斯回信说,他没有什么材料可写,“不过,你在议会辩论中一定能为自己找到足够的材料”。

恩格斯在这里指的是1860年1月24日英国议会关于回奏书的辩论。按照恩格斯的建议,马克思于1月27日撰写了本文。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强调指出,“在议会关于回奏书的辩论中,最引人注意的问题是:第三次对华战争、对法商约和意大利形势的复杂化”。从这句话中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开始时打算就回奏书的辩论写若干篇文章。因此,马克思接着在《法英之间的新条约》(见本卷第53—57页)一文中,也顺理成章地分析了英法之间的贸易和政治关系。

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不仅依据了《泰晤士报》有关议会辩论的报道,而且还参考了1月28日《经济学家》杂志发表的统计资料。

同时,由于本文和《法英之间的新条约》涉及同一主题,并且是在《纽

约每日论坛报》同一号上紧挨着发表的,所以,并不排除两篇文章原本是完整的一篇,它被报纸编辑部分割为两篇通讯,注明不同的通讯日期。这两篇文章作为邮件可能随加拿大号轮船于1860年1月28日寄出,于2月10日抵达哈利法克斯,首次发表在1860年2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68号上。——47、53。

- 65 英国议会开幕时,由国王致开幕词。事后,议会照例要向国王进呈一道回奏书作答。国王的开幕词和议会的回奏书,内容均涉及施政纲领的基本问题。回奏书在进呈国王之前要经议会讨论通过。——47、53。
- 66 第三次对华战争指1859年6月英法舰队在白河受创(见注68)和后来在1860年英法两国以白河事件为由再次组织联军入侵中国。英法两国这次侵华,攻占了天津和北京,焚毁了圆明园,最后强迫清政府同两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从而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马克思撰写本文时,英国正在为这次入侵进行准备。马克思还把这次正在准备中的新的侵略行动称做第三次对华战争或第三次英中战争。同时把第二次鸦片战争从1856年10月亚罗号事件至1858年6月签订天津条约这一阶段称做第二次对华战争或第二次鸦片战争,把1840—1842年鸦片战争称做第一次对华战争。——47。
- 67 对法商约(对法条约)即英法商约,是英国和法国在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该条约规定两国互享最惠国待遇,减免对方重要商品的关税。条约得到两国自由贸易派的拥护,并符合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关于条约的详情,见本卷第53—57页)——47、53、492。
- 68 指1859年6月英法侵略军在大沽之战中遭受的失败。6月24日,英法舰队到白河(即海河)河口企图进攻大沽炮台,被中国守军击败(见马克思1859年9月写的《新的对华战争》)。——47。
- 69 立法团是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1852年12月2日起称帝,号拿破仑第三)在1851年12月政变(见注197)以后的御用立法机构之一。——48。
- 70 指1856—1857年英国对波斯进行的战争。19世纪中叶,英国企图征服波斯和阿富汗,以便在中东和亚洲实行进一步的侵略扩张。1856年10月,波斯占领了波阿两国有争议的领土赫拉特。英国以此为借口于11月对波斯宣战,先后占领了哈尔克岛、布什尔港、穆罕默腊市和阿瓦土市。

由于俄国在外交上对波斯的支持、印度人民起义的爆发以及向中国调兵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等,英国不得不在1857年同波斯签订和约,英军撤出波斯,波斯撤出赫拉特,放弃对赫拉特的一切要求。——48、50。

- 71 唐·佩德罗是葡萄牙王室成员,1822—1831年为巴西皇帝,称佩德罗一世。1826年其父若奥六世逝世,他继承了葡萄牙王位,称佩德罗四世,但随即将王位让给了自己七岁的女儿玛丽亚·达·格洛丽亚(即位后称玛丽亚二世),并任用自己的弟弟唐·米格尔为摄政。1828年唐·米格尔篡夺了王位。1831年唐·佩德罗放弃巴西皇位,回到欧洲为其女夺回葡萄牙王位进行斗争。1834年唐·米格尔被迫退位,玛丽亚二世复为葡萄牙女王。马克思文中所说斐迪南七世企图援助唐·米格尔,玛丽亚向英国求援以及坎宁为介入葡萄牙王室斗争而向议会下达咨文等情况,历史资料不详。但英国政府确曾参与葡萄牙的王位之争,并支持唐·佩德罗和玛丽亚二世。——49。
- 72 1831年在葡萄牙的战争指英国政府干涉葡萄牙内战(1828—1834年)的行动。葡萄牙内战是在以1828年夺得葡萄牙王位的唐·米格尔为首的专制派(封建教权派)和聚集在玛丽亚·达·格洛丽亚女王及其父亲唐·佩德罗周围的立宪派(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进行的。英国政府为巩固自己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影响和摧毁专制派所支持的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阵地,干涉这次内战,于1831年把舰队派往葡萄牙海岸,封锁了塔霍河和杜罗河的河口,因而促成了立宪派的胜利。——50。
- 73 1850年在希腊的战争指1850年6月英国议会对与“帕西菲科事件”有关的英希冲突采取的行动。1847年帕西菲科在雅典的住宅被烧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把舰队派往希腊并向希腊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英国的真实目的是想夺取爱琴海中希腊的几个战略要地。——50。
- 74 阿富汗的战争指1838—1842年的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38年,由于多斯特-穆罕默德(阿富汗的艾米尔)拒绝同英国结成反对伊朗和俄国的同盟,英国不能把阿富汗变成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于是决定用军事干涉的办法推翻多斯特-穆罕默德,并扶植自己的走狗舒扎沙赫为王。英国军队侵入阿富汗,几乎把阿富汗全国抢劫一空,1839年8月占领了喀布尔,俘虏了多斯特-穆罕默德。但是,英国人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1841年11月的人民起义,英国军队被击溃并被歼灭。1842年,英国人

- 再一次试图征服阿富汗,结果也完全失败。——50。
- 75 时效是一个法律术语。因一定时间之经过和一定事态状态之继续而取得或失去权利,谓之取得时效或消灭时效。这里显然是指帕麦斯顿长期惯于采取的僭越行动由不合法变为合法。——50。
- 76 指1858年6月13日签订的中俄天津条约。该条约并未明确提及白河,条约第二条规定:“遇有要事,俄国使臣或由恰克图进京故道,或由就近海口,预日行文,以便进京商办。”——50。
- 77 炮击广州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1856年英国侵略者借口亚罗号划艇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1856年10月27日起,向广州城内开炮轰击。29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入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尽行烧毁。后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轰城市、奸淫烧杀的暴行依然继续。——51。
- 78 指代表大奴隶主贵族利益的罗马统帅鲁·科·苏拉为争夺古罗马政权反对平民派(奴隶主民主派集团)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于公元前82年建立了苏拉的独裁。这里讽喻拿破仑第三。——52。
- 79 蒂妲妮亚(威·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的“可爱的换来儿”是她的丈夫奥伯伦恶作剧的起因。马克思在此借指1860年的英法商约(见注67),该商约在两国关系中成为复杂的政治倾轧的根源。——53。
- 80 反谷物法运动即19世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为废除谷物法开展的斗争。谷物法是从1815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税的法令。它维护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影响了国内贸易的发展。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反对谷物法。曼彻斯特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从而开始了有组织的斗争(参看马克思1848年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最后帝国议会终于在1846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案》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案》,从而废除了谷物法。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该同盟一直存在到1849年。——54、324。
- 81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马克思1859年11月3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你能否给我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中的新变化的文章。”翌日,恩格斯回复马克思:“一旦德国军事改革有了某些进展,我就给你写

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不过，到现在为止，这一切还不十分明朗，只要我能把事情看得稍微清楚一些，就立刻给你写文章。”1860年1月26日，恩格斯还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等待普鲁士军队改革的消息”。

这篇文章写于1860年1月27日至2月2日之间，文章作为邮件随阿拉伯号轮船于2月4日从利物浦寄出，于18日抵达纽约，首次发表在1860年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73号上。——58。

- 82 阿尔及利亚战争是19世纪30—70年代法国殖民者为征服阿尔及利亚而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法军入侵阿尔及利亚引起了阿拉伯居民长期的顽强的反抗。法国人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对付当地居民，到1847年基本上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未停止。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几十年，直到1871年法国资产阶级才最终把阿尔及利亚变成自己的殖民地。——58、506。
- 83 马真塔会战和索尔费里诺会战是1859年奥意法战争期间进行的两次会战。1859年6月4日，法军在通往米兰的要冲击败了奥军，攻占了马真塔，然后进入米兰。1859年6月24日法国和皮埃蒙特联军在索尔费里诺会战中击败了奥军。恩格斯在1859年写的《军事事件》、《奥军的失败》、《马真塔会战》、《索尔费里诺会战》、《历史的公断》和《索尔费里诺会战》等文章中分别分析了这两次会战的进程。——59、444。
- 84 马丁内特(Martinet)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陆军总监，以特别“严厉的上司”而闻名。所谓马丁内特制度是指用封建专制军队中实行的一套严酷办法治军。——59。
- 85 德意志联邦于1815年6月18日在维也纳会议(见注19)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其中还有藩属丹麦王国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尼德兰国王的领地卢森堡。丹麦国王以荷尔斯泰因公爵的身份，尼德兰国王以卢森堡大公的身份参加了德意志联邦的联邦议会(见注28)。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这就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德意志联邦惟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奥地利代表为会议主席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于1850年恢复。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奥地利和普鲁士不断地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联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

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代替。

德意志联邦军队由各邦按人口比例提供的兵员组成。——61、138、200。

86 奥斯特利茨是斯拉夫科夫(今属捷克)的旧称。1805年12月2日,俄奥军队(第三次反法同盟)和法军之间在奥斯特利茨进行了一次决定性会战(亦称三皇之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50、62、441。

87 1809年7月5—6日,拿破仑在瓦格拉姆战役中战胜奥军,迫使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62。

88 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会战中被法军击败,同一天,在拿破仑的元帅路·尼·达武的指挥下,法军在奥尔施泰特击溃了普鲁士军队的主力,这两次失败迫使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这两次会战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62、441。

89 拿破仑第三声明法国要求占有萨瓦和尼斯。为了揭露这种要求,马克思1860年1月28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写一写(不用很长)萨瓦(和尼斯)对于法国的军事意义。可参照今天《泰晤士报》上诺曼比在上院的发言”。恩格斯于1860年1月29日—2月3日之间写了本文。文章作为邮件随阿拉伯号轮船于1860年2月4日从利物浦寄出,于18日抵达纽约,首次发表在1860年2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74号上。

马克思的请求也促使恩格斯写作《萨瓦、尼斯与莱茵》(见本卷第435—484页)一文。——64。

90 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对庸俗民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福格特的诽谤性著作《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的答复,福格特的这一著作是反对马克思及其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福格特的小册子出版于1859年12月,而在1860年1月,柏林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就用两篇社论转述了该小册子的诽谤性内容。马克思为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决定用文字回答福格特,而对进行诽谤的《国民报》则向法院提出控告。从1860年1月底起,马克思就着手为写一本反对福格特的书和起诉《国民报》收集材料。为此目的,他写信给许多同他在共同的政治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有过联系的人,请他们提供揭露福

格特的材料。从1860年2月中起,马克思开始把控告《国民报》编辑察贝尔的材料寄往柏林,寄给他的法律顾问韦伯律师。但是在1860年4—10月期间,马克思的起诉却被普鲁士的各级司法机关毫无理由地拒绝了。

马克思在准备和寄发诉讼材料的同时,着手撰写抨击福格特的著作。他研究了18—19世纪的政治史和外交史,从论述外交政策问题的书籍和报纸中作了大量摘录,并且到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以便查阅由恩格斯保存的那些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家活动以及他们同各种敌对派别进行斗争的书信和文件。1860年9月,马克思基本上写完了这一抨击性著作。但是,在普鲁士的各级司法机关驳回了他对察贝尔的起诉书之后,他又补写了《一件诉讼案》这一章,对普鲁士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批评。马克思于11月写完抨击福格特的著作,把它题名为《福格特先生》。

《福格特先生》这一抨击性著作于1860年12月1日问世,它由伦敦佩奇出版社出版,由希尔施费尔德印刷厂印刷。该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再版过,只有第四篇附录(《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曾被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第二版。1885年出版《揭露》的第三版时,恩格斯对这一附录略加补充。——69。

- 91 硫磺帮(Schwefelbande)最初是18世纪70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因其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一切成帮结伙的犯罪分子和流氓无赖的同义语。

1849—1850年间,有个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团体在日内瓦曾经开玩笑地以“硫磺帮”为名。1859年,福格特在他的《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中歪曲事实,把这个“硫磺帮”描绘成一个干政治上的齷齪勾当的团体,并把它同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联系在一起,他还把“硫磺帮”叫做“制刷匠帮”(Bürstenheimer)。马克思在本文中指出,“制刷匠帮”一词是阿布特截取了制刷匠(Bürstenmacher)藻伦海美尔(Sauernheimer)的职业的前一半和姓氏的后一半拼凑而成的,并驳斥了福格特的这种污蔑(见本卷第69—430页,另见马克思1860年2月24日给韦伯的信)。——76、88。

- 92 马克思经常用卡·福格特的姓同中世纪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州官(叫做“福格特”或“兰德福格特”)——名称的巧合来嘲笑他。“疑虚堡的世袭州官”,即世间不存在的一个城堡的州官(“疑虚”的拉丁文 nihil 的原意是“一无所有”),是约·菲沙尔特的讽刺小说《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

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的卷头提到的人物。菲沙尔特的这部作品是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的德文改写本,于1575年问世。马克思在本文引用了这部作品中的话。——76。

- 93 马克思用“主要著作”来称呼他所分析的福格特的《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以别于福格特在报刊上对同一内容发表的其他短篇文章。——76。

- 94 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上篇》第2幕第4场。福斯泰夫在讲述他同一帮恶棍进行械斗的虚构故事时,每提到一次,就把对方的人数夸大一次,而且由于吹嘘得得意忘形,竟一会儿说对方穿的是草绿色衣服,一会儿又说对方穿的是麻布衣服。——77。

- 95 共和派起义即巴登共和派起义,又称1848年9月起义,是1848年9月21日以司徒卢威为首的一批德国流亡者从瑞士进入巴登发动的。在巴登民主派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司徒卢威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起义于9月24日被镇压下去,司徒卢威和许多起义者被捕,被判处长期徒刑,押解到巴登的布鲁赫萨尔城监狱。

参加过巴登起义的人后来加入了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这支由德国流亡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志愿部队到1849年初为止,一直领取法国政府的津贴,后来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于1849年5—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的战斗行动。——81、103。

- 96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即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惟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维护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09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88—101页)这两部著作中对这一运动分别作了评述。——81、90、337。

- 97 流亡者委员会即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原名是伦敦德国流亡者救

- 济委员会,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附属机构,1849年9月成立。马克思当选为委员会委员,1849年12月3日,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该委员会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1850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委员会被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控制。——82。
- 98 烧炭帮即烧炭党人(carbonaro),是19世纪初存在于意大利、19世纪20年代存在于法国的秘密政治团体烧炭党的成员。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抱的目的是实现意大利的民族统一和独立并实行政治改革。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目的是推翻波旁王朝。——82。
- 99 马克思把约·哥·拉德马赫称为神医,是暗指他的一本书名:《为从事炼丹术的老神医们的被学者们误解的合理的实用医疗学辩护,对25年中这门学科的临床试验结果所作的真实报告》。——82。
- 100 马克思把参加1851年12月2—4日波拿巴派政变(见注197)的人称为十二月帮,这次政变的结果是在法国建立了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第二个帝国(1852—1870年)的反革命制度。在策划这次政变中,1849年创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的十二月十日会(见注101)起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在本文中对该会作了评述。——83、201、275、380。
- 101 马克思在摘录《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把“会”均改为“帮”。这里指的是“十二月十日会”。该会是为纪念它的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经普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一组织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1850年11月该组织表面上被解散,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见注197)。——83、275、468。
- 102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企图实行政变的两次武装叛乱。1836年10月30日,他在一些赞成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策动了斯特拉斯

堡驻防军的两个炮兵团叛变,但几小时后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37年回到瑞士。因为他在举事时是瑞士国民,所以称之为瑞士兀鹰。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洛涅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他1846年就逃往英国去了。——84,235。

- 103 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148)结束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勃朗关于劳动组织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信用,另一方面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场中继续高涨,政府就采取减少工人人数,派他们去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利用国家工场内已有的军事组织。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84。

- 104 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的命令,为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由15—20岁的巴黎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被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当时任陆军部长的卡芬雅克将军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工人的行动。后来,波拿巴分子将其解散,他们担心波拿巴与共和党人发生冲突时,别动队会站在后者一边。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别动队作过具体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47页)。——84。

- 105 弗伦特运动是1648—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运动。弗伦特(Fronde)原意是一种投石器,曾为当局所禁,违令者应受惩罚;这个词的转义为破坏秩序、反对当局。因此,弗伦特运动又译投石党运动。

这个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高等法院弗伦特”(1648—1649年)。路易十四未成年期间,摄政太后安娜(1643—1653年)及首相马扎里尼的专横引起国内广大阶层的不满。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

要求监督政府财政,取消各省巡按使,遭到拒绝。8月,巴黎市民起义支持高等法院,曾迫使王室逃出首都。1649年3月,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高等法院被迫与王室妥协。第二阶段称为“亲王弗伦特”(1650—1653年)。1650年1月后,以孔代亲王为首的贵族资产阶级在外国军队支持下,利用城乡人民运动,与专制政府抗衡,1653年被政府军击败。弗伦特运动的失败为路易十四当政后的专制独裁铺平了道路。——85、340。

106 指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菲利浦摄政时期(1715—1723年)。当时路易十五尚未成年。——86。

107 特里尔的圣衣是保存在特里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稣受刑时被脱下的衣服。特里尔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86。

108 旺多姆圆柱(Vendome - Colonne)又称凯旋柱。它是为纪念拿破仑第一的武功,于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修建的。

整个圆柱全部用缴获的武器上的青铜制成,顶上铸有一座拿破仑雕像,雕像在复辟时期被拆除,但在1833年又重新复原。1871年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旺多姆圆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圆柱又被资产阶级政府修复。——87。

109 说战场上有两个里士满,或还有一个里士满,指出现意料之外的第二个敌手。原出处为莎士比亚的悲剧《理查三世》(第5幕第4场)。——89。

110 指1859年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90、287、440。

111 贝桑松流亡者兵营指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贝桑松(法国)组织的由德国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支武装队伍(见注95)。弗·卡·黑克尔参加领导的1848年巴登共和派起义失败之后,一些参加巴登起义的人后来加入了这支贝桑松流亡者队伍。——90。

112 “失去的战鼓”出自莎士比亚的《终成眷属》一剧。在该剧中,巴洛队长去寻找一面失去的战鼓,最终被他的老同事揭穿是个胆小鬼、吹牛家、出卖灵魂的人。马克思用巴洛来比喻福格特,用寻找“失去的战鼓”的大冒险来讽刺福格特在报刊上予以支持的法国拿破仑第三和波拿巴主义集团想夺取莱茵河左岸的企图。——91。

113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争取脱离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法国二月革命

- (见注 148)和德国三月革命(见注 168)的影响下,于 1848 年 3 月开始,打打停停,一直进行到 1850 年 6 月底。普鲁士统治集团考虑到德国社会舆论站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边,便于 1848 年 4 月发动了虚张声势的反对丹麦的战争,他们在战争过程中步步出卖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革命军队,使其终于遭到了失败。——92。
- 114 民主主义者在特里尔工人和附近居民点的支援下,于 1849 年 5 月 17—18 日袭击普吕姆军械库。袭击者的目的是夺取武器,发动保卫帝国宪法的起义。虽然军械库一度被起义者所占领,可是运动很快就被迅速赶来的政府军队镇压下去。——92。
- 115 爱·西蒙写的《德国政治风俗画。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一文,刊载在 1860 年 2 月 15 日出版的一期《现代评论》上。马克思对该文的评论见本卷第 153—154、175—177 和 289—292 页。——93。
- 116 这里提到的“鞋会”(Bundschuh)是双关语,它的德文原文由 Bund(同盟)和 Schuh(鞋)组成。鞋会原指 1493 年在阿尔萨斯由农民和平民建立的一个秘密同盟,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阐述了这个团体的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506—517 页)。席利用以指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它强调硫磺帮(见注 91)成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 122)之间并无任何联系。——95、284。
- 117 暗指 1849 年 6 月 5 日在卡尔斯鲁厄成立的坚决前进俱乐部。俱乐部联合了对洛·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的活动表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即共和主义者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古·司徒卢威、赛·奇尔纳和卡·海因岑等人)。俱乐部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推向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并吸收激进分子参加政府的工作。俱乐部的成员们在建议被否决后,于 6 月 6 日试图以武装示威迫使政府妥协。但是政府得到了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支持,强行解散了“坚决前进俱乐部”。——95。
- 118 社会小组(Cercle social)是民主知识分子的代表所建立的组织,于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初几年在巴黎活动。社会小组在共产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根据下面的事实确定的:社会小组的思想家克·福适主张平均分配土地、限制过多的财产并主张对凡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给予工作。

克·福适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形式上的平等所作的批判,促使“疯人派”的领导者雅克·卢对这一问题发表了大胆得多的言论。大多数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革命家对社会小组的思想家们、特别是“疯人派”所表露的平均社会主义思想都持否定态度。——97。

- 119 格吕特利联盟是瑞士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组织,1838年5月6日成立于日内瓦。该组织的宗旨是宣传和教育手工业者和工人,之所以采用“格吕特利”作为名称,是为了表现其瑞士的民族性。

“格吕特利”是瑞士中部乌里湖边的一片草地。据传说,1307年湖周围三个州的代表曾在格吕特利草地集会并缔结了联盟,宣誓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统治。——98。

- 120 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他之所以获得这一绰号,是因为他曾在1846年穿着一个名叫巴登格的建筑工人的衣服逃出阿姆的监狱。——100。

- 121 玛丽安娜(Marianne,是个妇女形象,象征法国人民)是法国一个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和派秘密团体的名称,产生于1850年。它在第二帝国时期所抱的目的是反对拿破仑第三。——100。

- 122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

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101、135、351。

- 123 这一段引自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第6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32、535页)。这一著作于1853年1月在瑞士巴塞尔印成单行本(福格特用的就是这种版本)。该著作最初在美国波士顿的一家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到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就是波士顿版的小册子。——101。
- 124 罗亚尔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17世纪初为红衣主教黎塞留修建的,自1643年起为路易十四的皇宫,1692年成为波旁王朝奥尔良王室的财产。18世纪末和19世纪30—40年代,这里成了商场、剧院等大众娱乐场所。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148)后,皇宫被宣布为国家财产,改名为国民宫。第二帝国时期它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日·波拿巴和他的儿子约·拿破仑亲王(绰号普隆-普隆)在巴黎的官邸。——101、276。

- 125 德美革命公债是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旅美德国人中间举借的公债,其目的是再次在德国唤起革命。这个活动的领导人是哥·金克尔、爱·梅因、奥·赖辛巴赫、卡·叔尔茨和奥·维利希。1851年9月—1852年3月,金克尔一直在美国动员那里的德国流亡者认购。这个活动遭到各方的非议,金克尔等人受到亨·伯恩施太因、威·魏特林、约·菲克勒尔和阿·戈克的攻击。金克尔回国后,1852年4月16日在伦敦召开了德美革命公债组织委员会的会议,决定恢复地方支部的活动。为此分别发出了由金克尔和维利希起草的通告式命令。1852年9月,赖辛巴赫提出了第一个财务报告,它宣告了德美革命公债的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而无成果的一种尝试。——102。
- 126 穆尔滕的失败指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军队于1476年6月22日在穆尔滕同瑞士人会战遭到失败。马克思在这里用于喻指。——102。
- 127 巴登武装起义1849年5月11日,驻拉施塔特要塞的巴登士兵举行起义,起义很快蔓延到巴登军队的其他部分。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这些部队构成巴登—普法尔茨地区革命军的中坚力量。——103。
- 128 圣保罗教堂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48年5月18日—1849年5月30日,在那里举行了法兰克福全德国国民议会(见注29)的历次会议。——103。
- 129 指1850年2月1日在日内瓦的德国工人协会向在瑞士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发出的通告信。——104。
- 130 大科夫塔是18世纪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萨莫)的头衔,此人是招摇撞骗的巫师的化身。“科夫塔”原本是对一位神秘莫测的埃及智者的称呼。卡利奥斯特罗伯爵于1782年创建了共济会埃及分会,他宣称,他在埃及旅行时,发现了埃及人智慧的秘密,他本人的行动体现了全能全知的大科夫塔精神。卡利奥斯特罗曾激起了歌德创作的灵感,写出了喜剧《大科夫塔》。——105。
- 131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

- 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见注26)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106、424、477。
- 132 联邦委员会是瑞士政府的名称。——106、249。
- 133 舍尔瓦尔的密谋即德法密谋。1851年9月,法国当局逮捕了1850年9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22)分裂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属巴黎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无视现实,采取密谋策略,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依靠领导巴黎一个地方支部的密探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的案件。1852年2月,被捕者被判刑。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普鲁士警察当局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企图完全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施拉姆,由于缺乏罪证很快就被释放。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揭穿了施梯伯在科隆案件中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85—500页)。——108、350、356。
- 134 科隆案件即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22)的11名成员送交法庭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证据是普鲁士警察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7名被告3—6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以及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1—545和563—570页)。——108、176、350、401。
- 135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即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

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建立的,有时用会址名称做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122)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该协会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成为国际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查封。——109、354。

- 136 察哈里埃即撒迦利亚,是《旧约》中所谓12个小预言家之一,察哈里埃之歌意指暗示灾难的预言。——114。
- 137 汉巴赫大会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前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参加者约3万人。集会发言人大多数提出了民主的和带有共和倾向的要求,号召反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力量联合起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这里首次获得群众基础,他们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并联合法国、波兰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民主力量组成欧洲民主联邦;他们还宣布了以武装抵抗对付暴力镇压的革命原则。——114。
- 13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557—591页。——120。
- 139 拉登多夫案件是1854年10月16—25日在柏林举行的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拉登多夫、格尔克、法尔肯塔尔、莱维等人的审判案;他们是因投向警察局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亨策的告密而于1853年被捕的。他们被诬告进行阴谋活动,被判处3—5年期限不同的徒刑。——121、408。
- 140 死人同盟是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存在于不来梅的一个密谋组织。1852年为警察局破获。——121。
- 141 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下面两句话:(1)“安静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这是普鲁士大臣舒伦堡-克涅特在耶拿会战(见注88)失败后于1806年10月17日发表的告柏林居民书中所说的话);(2)“你将在这一标志下获胜”(据罗马历史学家克萨里亚的欧塞比乌斯的记载,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312年

- 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前夕,据说在天空中看见了一个带有这样题词的十字架)。——123。
- 142 暗指 1851 年出版的卡·福格特《动物群体研究》一书的书名,该书通篇是庸俗唯物主义观点。——124。
- 143 科贝斯基一是雅·费奈迭的绰号,缘起于亨·海涅的讽刺诗《科贝斯基一》。海涅在诗中嘲笑雅·费奈迭是庸夫俗子的典型。科贝斯基在科隆方言中意思是雅科布(雅科布·费奈迭生于科隆)。——125、172。
- 144 指 1855 年出版的德国生理学家毕希纳的《力和物质》一书的名称,此处用于讽喻。毕希纳和福格特同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127、168、268。
- 145 这句话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 21 首歌。括号内是这句诗的德译文译者的姓。——131、370。
- 146 这句话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 28 首歌。——132。
- 147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即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或称德意志工人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7 年 8 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来米和瓦隆的工人协会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 148)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137、353。
- 148 二月革命指 1848 年 2 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 年 2 月 22—24 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它是欧洲 1848—1849 年大革命的第一次革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137、151、228、353、448。
- 149 宗得崩德(特别联盟)原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

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 19 世纪 40 年代建立的单独联盟,其首领是天主教僧侣和城市的上层贵族。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 40 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 年 7 月,瑞士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宗得崩德,于是宗得崩德在 11 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1847 年 11 月 23 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天主教僧侣和城市上层贵族后来不止一次地利用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权。联邦政府的胜利和 1848 年宪法的通过,使瑞士由国家的联盟变成联邦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这个名称来讽刺 1850 年 9 月 15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138、250、316。

150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以后,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奥地利企图恢复在革命时期实际上已经瓦解的德意志联邦(见注 85)。普鲁士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在它保护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霸权。1850 年秋,奥普两国的斗争因黑森选帝侯国在它们之间引起的冲突而尖锐化了。黑森选帝侯国的革命事件使奥普两国找到了干涉其内政的借口。为了回敬奥地利军队进驻黑森选帝侯国,普鲁士政府也向那里进军。可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压力下,普鲁士未经反抗就向奥地利让步了。——138。

151 德国“自救”武装协会即德国共和主义军人联合会“自助者”。这个组织是根据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约·菲·贝克尔的建议,于 1848 年 10 月 1 日创立的,目的在于把在国外的德国人,特别是在瑞士和法国的政治流亡者和手工业者紧密地联合起来。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比尔(伯尔尼州),联合会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分别由贝克尔和维利希担任。在贝桑松的德国纵队及其在南锡、沃苏勒、里昂等地的分遣队从一开始就归附于这个联合会。军人联合会遵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针,试图联合瑞士所有的德国人志愿队,以期在德国建立共和国。这个组织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秘密团体的影响下形成的,因而带有密谋的性质。瑞士当局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压力下对贝克尔以及军人联合会的其他组织者进行了司法追究。贝克尔被判处从伯尔尼州驱逐出境,为期一年。——139。

152 这里提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 1850 年 8 月底(至迟 9 月 1 日)举行的。——142。

153 此处借喻古希腊的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又译作《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这是一部对荷马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的模拟诗，作者不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对卢格的鼓动者协会和金克尔的流亡者俱乐部(马克思在这里称它为流亡者协会，见注 160)以及对这两个小资产阶级的流亡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1 卷第 385—401 页)。——146。

154 马克思引自他的《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

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是在 1849 年 2 月 8 日举行的。马克思、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第二曾出席科隆陪审法庭受审。他们被控的罪名是煽动叛乱，根据是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曾于 1848 年 11 月 18 日发表了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认为这是动员群众起来反对普鲁士即将来临的反革命的一种手段。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这次审判的记录登载在 1849 年 2 月 19、25、27 和 28 日《新莱茵报》第 226、231、232 和 233 号上，并且还发表在下列小册子中：《两个政治审判案。由科隆二月陪审法庭审理》1849 年《新莱茵报》(科隆)出版社版。——151。

155 指 1848 年在加利福尼亚和 1851 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欧洲和美洲向这些地方大批移民，这就是所谓的“黄金热”。“黄金热”引起商品价格猛涨，英国和美国殖民主义者趁机进行投机而发财。

1850 年 1 月，在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后 18 个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提出了这些发现对欧洲、美洲、亚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工商业发展，以及对新兴国家的殖民，都将有巨大的意义(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 年写的《时评。1850 年 1—2 月》和《时评。1850 年 5—10 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275—276 和 589—593 页)。——151。

156 秩序党指法国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 年)正统派(见注 224)和奥尔良派(见注 44)联合组成的政党。正统派是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奥尔良派支持在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 年)统治法国的奥尔良王朝，代表

了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互竞争的这两个君主主义集团在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后联合组成秩序党,它的领导人是阿·梯也尔、皮·法卢、沙·福·蒙塔朗贝尔等人。——152。

- 157 救国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 根据国民公会的决定,于1793年4月创立,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最高领导机构。委员会分六个部,分别主管军事、海军、外交、税收、内政、司法。据1793年12月4日法令,救国委员会成为国民公会所有21个委员会的领导者,负责监督和推动政府各部的工作。1793年4—7月,救国委员会中最有影响的成员是丹东;7月,国民公会改组救国委员会,由9人组成,丹东落选。此后,委员会改由12人组成,成员有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库东、卡尔诺等人,又称“大救国委员会”,领导人是罗伯斯比尔。1794年春,救国委员会内部分歧日益尖锐,以卡尔诺为首的多数派,在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ûreté générale)的支持下,发动了热月政变,罗伯斯比尔被处死,救国委员会权力削弱。1795年10月26日,它同国民公会一起被解散。——153。

- 158 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哥特弗里德·金克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402—40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针对因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注96)而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受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哥·金克尔的卑鄙行为的。金克尔在他的1849年8月4日的辩护词中,企图否认自己曾参加革命运动,并赞扬了霍亨索伦王朝。——156。

- 159 马克思这里暗示中世纪法国的抒情诗人佩·维达尔生平中的一件轶事。——157。

- 160 流亡者协会和鼓动者协会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的组织,这两个组织的会员都很少,其主要任务是募集资金,以便在德国“立刻”发动“革命”。维利希和他的拥护者们加入了流亡者俱乐部(马克思称它为流亡者协会)。这两个组织很快便解散了。关于它们的详细情况可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157、411。

- 161 马克思讽刺地把金克尔的机关报《德国通讯员》同法国政府的报纸《通报》相提并论。——157。

- 162 新旧大陆革命联盟即德美革命联盟(美国革命联盟),它是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组织,由到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戈克和菲克勒尔于1852年1月在美国费城建立。它反对金克尔在美国的筹款活动。1852年9月,在惠林代表大会上联盟改名为“新旧大陆人民联盟。”——159、412。
- 163 马克思为了讥笑福格特,把他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称为“劳斯之歌”(“Lausiade”),即“虱子之歌”(来自德文“Lause”——“虱子”),这是同18世纪末英国诗人彼·平达的一首讽刺诗“The Lousiad”——《劳兹之歌》(来自英文“louse”——“虱子”)相类似的东西。
《卢兹之歌》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葡萄牙诗人路·卡蒙斯所写的叙事诗。——160。
- 164 这句话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18首歌。括号内是这首诗的德译文译者的姓。——161。
- 165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地位比作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桑乔·潘萨在巴拉塔里亚岛上虚构的总督职位,以讽刺他身为帝国摄政(见注29)的表面权力。
巴拉塔里亚(Barataria)源出西班牙语 barato(意为“廉价的”),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虚构的岛屿,在这部小说的第1节中,唐·吉珂德的仆从桑乔·潘萨被任命为该岛的总督。——161、347。
- 166 马尔默停战协定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在马尔默签订的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的停战协定,该协定葬送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意志居民的革命民主成果,实际上保存了丹麦在那里的统治权。1848年9月1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顾坚持要对丹麦继续进行革命战争(这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斗争的一部分)的德国民主力量的反对,以21票多数批准了停战协定。这一决定引起了德国民主力量的极大愤慨。1848年9月17日,法兰克福东北郊的普芬斯特魏德草地举行了有2万人参加的人民集会,通过了一项决定,要求把投票批准马尔默停战协定的那些议员宣布为卖国贼,要求左派分子退出国民议会。当许多极左派代表同意普芬斯特魏德人民集会的上述要求时,卡·福格特出来反对接受这些要求。由批准停战协定所引起的人民运动,9月18日在法兰克福转变为街垒战,结果遭到了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165、342。

- 167 保卫国民议会法指 1848 年 10 月 9 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保卫制宪国民议会和中央政权机关官员的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侮辱国民会议员或中央政权机关代表(帝国摄政、他的大臣和官员们)的人,要处以徒刑。这个法律是国民议会多数派和帝国政府在法兰克福九月起义(街垒战,见注 166)后采取的镇压人民群众的报复措施之一。——165。
- 168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 年 3 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 月 13 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 17、18 两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 3 月 18 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 19 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 月 29 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165、341、345。
- 169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央三月同盟及其在德国各城市的分支,是 1848 年 11 月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 29)左翼议员为了集结激进小资产阶级和左翼自由资产阶级各派力量而建立的,其宗旨是保卫德国 1848 年三月革命(见注 168)的成果。它们的领导者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福禄培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他们用空话来代替革命行动,不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而是幻想走议会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48 年 12 月起就开始在《新莱茵报》上和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抨击同盟的领袖们对反革命斗争的畏首畏尾和犹豫不决。——165、291。
- 170 见恩格斯 1849 年 5 月 16 日写的《埃尔伯费尔德》一文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15—28 页)。——168。
- 171 指 1848 年 11—12 月初普鲁士发生的政变,它以反革命势力获得全胜告终。政变的结果是:成立了极端反动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见注 289),解散了国民议会。——168。
- 172 告德国人民书是诗人乌兰德以温和民主派的名义草拟的,他们的意图是,

使自己的政治观点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接近。在这一告人民书中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纲领,而只限于软弱无力地呼吁德国人民支持实施帝国宪法。

另一篇告人民书是由国民议会三十人委员会提出的,它同样是一个徒劳无益的呼吁书,其内容是:要求不承认国民议会及其决议的那些德意志邦的军队,宣誓效忠帝国宪法。——169。

- 173 三十人委员会是1849年4月11日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29)成立的,以便制订使帝国宪法付诸实施的种种措施,原因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议会加在他头上的皇冠采取暧昧态度。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起初表示他是否同意,要看德意志其他统治者的态度而定;1849年4月28日他声明,拒绝接受帝国宪法,放弃皇冠。——169。
- 174 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论及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见注29)的地方,马克思所利用的速记记录,后来以单行本出版,题名《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会议速记记录》1848—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169。
- 175 抱怨派(Heuler)是德国1848—1849年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而后者则把前者称为煽动者(Wühler)。——173。
- 176 法兰克尼亚革命 1849年5月初,位于法兰克尼亚中部地区的巴伐利亚的纽伦堡,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抗议巴伐利亚政府拒绝接受帝国宪法。1849年5月13日在纽伦堡举行的有5万人参加的人民集会运动的高潮。福格特出席了大会,他在会上用一套虚假的革命词句作掩饰,规劝人民抛开反政府的坚决行动。福格特的叛卖行为以及领导运动的民主派的动摇态度使人民遭到了失败。——173。
- 177 马克思讽刺地称路易·波拿巴是图尔高州公民,因为波拿巴是在瑞士的图尔高州长大的。1832年他成为该州的公民,1833年被授予瑞士共和国名誉公民的称号。福格特在他的《欧洲现状研究》一书中,自称“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174。
- 178 指19世纪30—40年代亨·海涅从巴黎寄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的文章,以及40年代初德国东方学家雅·法耳梅赖耶尔在同一报纸上刊登的特写。海涅把他在《总汇报》上发表过的大部分文章编成单行本,书名是《法国纪事》(1832年)和《吕太斯》(1854年)。法耳梅赖耶尔的特写于

1845年编成两卷集,取名为《东方来信片断》。——178。

- 179 马克思对《总汇报》亲奥立场的批判见他于1859年3月15日写的《普鲁士的战争前景》一文。

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长达十年之久;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大量文章,都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囊括了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内外政策和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重要问题。在欧洲的反动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销路很广的美国报纸,通过具体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以及它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采取为所欲为的态度,有些文章被删去作者的署名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有时编辑部还对文章加以篡改。马克思曾经对编辑部的这种做法不止一次地提出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受到影响,这时马克思不得不减少自己给该报写稿的数量。在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给该报写稿;马克思同《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决裂,主要是由于编辑部内主张与蓄奴州妥协的人增多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178。

- 180 见恩格斯1860年2月写的《萨瓦、尼斯与莱茵》第1章(见本卷第439—447页)。

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第1章中对“中欧大国”论进行了批评。——178。

- 181 衰落帝国(bas empire)在历史文献中有时用来指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后逐渐成了正在衰落和瓦解中的国家的代称。马克思把这类国家又称做小帝国(Lesser Empire)。——178、226、268。

- 182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59年1月13日写的《欧洲的金融恐慌》一文。——178。

- 183 1859年4月初,福格特把他的政治“纲领”寄给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许多人,在这个纲领中,他根据波拿巴派宣传的精神,主张德意志联邦在即将

- 发生的法奥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马克思在 1859 年 4 月 22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福格特的这个“纲领”作了评价。——179。
- 184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是关于英国议会两院会议的报告,因出版者为托·寇·汉萨德而得名,从 1803 年起至 1888 年定期出版,是马克思分析国内外政治事件的重要资料来源。——180。
- 185 见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这一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395—478 页)。——180。
- 186 指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415—429 页)。1853 年 11 月 26 日《格拉斯哥哨兵》用《帕麦斯顿和俄国》的标题转载了这篇文章;在后来的一个出版物的目录中标题改为《帕麦斯顿和波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注 232)。——181。
- 187 马克思 1856 年 3 月底至 4 月写的《卡尔斯的陷落》一文发表在 1856 年 4 月 5、12、19 和 26 日《人民报》上。——181。
- 188 外交事务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是 19 世纪 40—50 年代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英国许多城市建立的社会团体,其目的主要是与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181。
- 189 马克思曾计划写一部关于 18 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著作,这里所说的该著作导言于 1856 年 6 月—1857 年 4 月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以《18 世纪外交史内幕》为标题发表。1899 年马克思的女儿爱·艾威林在伦敦出版单行本,书名为《18 世纪外交秘史》。——181。
- 190 摩门教是 1830 年在美国成立的宗教教派。其创始人约·斯密斯(1805—1844 年)宣称得到神的启示而写了《摩门经》(1830 年),在这本充满荒诞无稽的臆想的书里,以先知摩门的名义讲述了仿佛古代曾经发生过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摩门经》是摩门教教义和组织的基础。马克思在此处作为对比所说的“摩门教福音书”指的就是《摩门经》。——182。
- 191 1859 年 6 月 7 日《总汇报》第 158 号发表了雅·费奈迭的一封信,其中着重揭露了福格特同约·拿破仑亲王的联系。——185。

- 192 小德意志派主张建立小德意志,即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企图实现这个小德意志计划的行动之一是1849年建立了在普鲁士国王领导下的17个德国君主的联邦。1850年这个联邦瓦解了。
- 小德意志派报刊是反映主张建立小德意志的人的观点的报刊,他们赞成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186、343、440。
- 193 马克思讽刺地把福格特称做“帝国缩小者”(Mindrer des Reichs)以与中世纪德国帝王常用的称号“帝国扩大者”(Mehrer des Reichs)相对照。——186、239。
- 194 指马克思《关于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见本卷第9—12页。——189。
- 195 指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的信》,见本卷第3页。——189。
- 196 见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第300号。——192。
- 197 十二月政变即十二月二日政变。1848年12月10日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务的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实行政变:立法会议和国务会议被解散,许多议员被逮捕,在32个省内宣布处于战时状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法国。1852年1月14日通过了新宪法,根据新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而在1852年12月2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又称十二月政变帝国)的波拿巴政体,宣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政变作了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7—240页)。——200、253、280、430。
- 198 圣马丁门剧场(Théâtre de la Porte Saint Martin)坐落在巴黎圣马丁门林阴道,1851年十二月政变(见注197)时,在该剧院附近曾发生波拿巴兵宿毆打共和党人的事件。——201。
- 199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是因奥地利王位继承权引起的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法国与英国、荷兰、俄国之间的战争。1740年10月,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查理六世死后,其女玛丽-泰莉莎依据《国事诏书》继承王位,普鲁士等国企图瓜分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反对《国事诏

书》。1740年12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攻属于奥地利的西里西亚。1741年,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法国等结成反奥联盟,英国、荷兰与俄国支持奥地利,因而形成欧洲范围内的战争。1742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单独与奥地利签约,获得下西里西亚。1745年,普鲁士为夺取上西里西亚,再次出兵,获胜并单独同奥地利媾和,获得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同时承认玛丽-泰莉沙继承王位。1748年10月18日战争结束签订亚琛和约,和约确认《国事诏书》,承认玛丽-泰莉莎继承王位的权利。普鲁士得到整个西里西亚。这一条约加剧了普奥之间的矛盾。——202。

- 200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间以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以法国、奥地利、俄国等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进行的战争。英、法争夺殖民地和商业霸权以及普、奥之间争夺西里西亚是战争的起因。

在欧洲,普鲁士与奥地利等国之间的战争进行到1762年5月,俄国与普鲁士签订一项条约,退出反普联盟,战局改观,最后以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而结束。根据1763年签订的胡贝图斯堡和约,普鲁士夺得西里西亚,成为欧洲大陆上的新兴强国。

英法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海上、北美、西印度群岛和印度。1755年英国不断攻击法国商船,法遂占领英国梅诺卡岛。1756年英国对法国宣战,在东方主战场印度与法国人及其走卒印度王公作战,1757年控制了印度孟加拉,1761年消灭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与此同时,法国在北美失去了加拿大,在非洲的塞内加尔及在小安的列斯群岛也蒙受巨大损失,被迫讲和,于1763年签订了巴黎和约。该和约确保了英国在战争中获取的殖民地,此后英国成为海上霸主。——202。

- 201 这里显然指在英国的倡议下,普鲁士于1790年1月10日同土耳其和波兰缔结的同盟条约。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同年7月27日签订了赖兴巴赫条约,上述盟约事实上又被废止。——202。

- 202 巴塞尔条约即巴塞尔和约(1795年4月5日),是参加了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同法国单独缔结的,和约规定普鲁士把西部领土转让法国,但继续占有东部的波兰领土,为此必须退出反法同盟。这个和约的签订是法军胜利的结果,也是法国在外交上善于利用第一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之间的矛盾,首先是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的结果。这个和约的签订导致了欧洲各国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202、441。

- 203 指法、奥、英的秘密条约。1815年1月3日法国、奥地利和英国之间在维也纳会议(见注19)期间签订了关于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秘密条约,其目的是不让普鲁士占领萨克森国王的领地,不让俄国占有前华沙大公国的土地。这一秘密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以往参加反拿破仑同盟各国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几乎酿成公开冲突。——202。
- 204 指奥英反俄协定。1821年10月英国国王乔治四世访问汉诺威时,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签订了奥地利和英国之间的一项协定。该协定旨在反对俄国在希腊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202。
- 205 匈牙利独立战争指1848—1849年期间匈牙利为反抗奥地利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203。
- 206 1711年条约指萨特马尔和约,这是在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失败以后,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贵族于1711年5月1日在萨特马尔城(匈牙利)订立的一项协定。萨特马尔和约巩固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统治,而且也加强了匈牙利贵族统治农民的权力。同时,按照萨特马尔和约的规定,贵族还从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得到一系列政治上的让步。——203。
- 207 1840年七月条约指伦敦公约(1840年7月15日)。1839—1841年土埃战争和由此引起的各大国间的矛盾加剧,是40年代初东方问题尖锐化的原因。土耳其苏丹的军队于1839年开进了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在1831—1833年占领的叙利亚,但被击溃。西方各强国深恐俄国单独干涉土埃冲突,于1839年7月27日向苏丹提出一个联合照会,声称所有大国都将帮助土耳其政府。但是,英法之间在近东、特别是在埃及的势力范围问题上有争执,结果只有英、俄、奥、普四国于1840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各强国对苏丹军事援助办法的伦敦公约。法国原有意帮助穆罕默德-阿里,但又惧怕因此面临形成新的反法同盟的危险,不得不放弃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支持。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里被迫放弃埃及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并服从土耳其苏丹的最高权力。——204。
- 208 根据英国政府和双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政府在1816年签订的条约,双西西里王国不得给予其他国家以有损英国利益的贸易特权。1838年那不勒斯国王授予法国公司在西西里岛开采硫磺的专利权,结果引起英国的强烈抗议。为了迫使那不勒斯国王撤销决定,英国政府于1840年

- 命令它的地中海舰队开始军事行动。那不勒斯被迫满足了英国的要求。——204。
- 209 这里指 1797 年的银行限制法(Bank Restriction Act)。为使英格兰银行不致破产,1797 年 5 月英国政府颁布了银行限制法,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银行券的强制性牌价并且停止用银行券兑换黄金。1819 年法令虽然恢复了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做法,实际上这种兑换到 1821 年才完全恢复。——205。
- 210 1858 年 8 月,俄国和撒丁王国达成一项协定,使俄国的一家轮船和贸易公司暂时享有利用维拉弗兰卡港东部的权利,该港位于地中海岸尼斯附近,专供船只停泊和修理以及装添燃料之用。——206、240。
- 211 1853 年,普鲁士向奥尔登堡公国购买了亚德湾的一部分岸边地带,用于建立军港(军港取名威廉港,建于 1855—1869 年)。——206、240。
- 212 1846 年 2 月,波兰各地准备举行以波兰民族解放为目的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贵族的背叛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只有个别地方爆发革命。2 月 22 日,起义者仅仅在克拉科夫,即按照维也纳条约(见注 19)于 1815 年宣布为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保护下的自由市取得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 1846 年 3 月初被镇压下去。1846 年 11 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207。
- 21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415—429 页。——207。
- 214 这一段引文中的着重是马克思加的。——208。
- 215 指 1847 年 11 月 8 日的敕谕;根据该敕谕规定,农奴所属的地主领地因债务而公开拍卖时,农奴有权赎买自己和土地(详见马克思 1858 年 12 月 31 日写的《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一文)。——208。
- 216 为加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俄国支持巴尔干各国人民进行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国同也想加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的法国一起,共同支持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合并和建立罗马尼亚国家的愿望。1859 年 1 月,在俄国和法国的协助下,库扎上校被选为这两个公国的君

- 主(执政者)。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建于1862年。——209。
- 217 涅米罗夫会议从1737年8月15日至11月11日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涅米罗夫举行,它是在俄土战争时期(1735—1739年)由土耳其倡议召开的,1737年奥地利站在俄国一方参战。俄国代表团提出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变成俄国保护下的独立公国,作为订立和约的条件之一。土耳其拒绝了在会议上提出的大多数建议,重新采取了军事行动。——210。
- 218 福克沙尼会议从1772年7月27日至8月28日在摩尔多瓦的一个小城福克沙尼举行,其目的是结束1768年开始的俄土战争。俄方在会议上同时也提出了让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获得独立的建议,土耳其拒绝了俄国提出的这一要求及其他要求。会议毫无结果,战事又起。——210。
- 219 布加勒斯特和约是1812年5月28日俄国和土耳其结束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时签订的和约。和约规定把到普鲁特河为止的比萨拉比亚和南高加索的一些省份割让给俄国,俄国获得多瑙河沿岸的通商航行权;和约还规定土耳其应给予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和约确认俄土两国过去达成的关于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拥有某些自治权的协定,还确认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所规定的俄国保护多瑙河两公国的正教居民利益的权利。——210。
- 220 组织规程(Règlement organique)是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根据1829年缔结的阿德里安堡和约规定的条件,俄军占领了两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两个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帕·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贵族、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从而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1848—1849年革命期间,组织规程被取消。——210、238。
- 221 赫特里(Hetairie)即费里克·赫特里(Philike Hetairia),是希腊的一个秘密团体,1814年成立于敖德萨。在希腊各大城市均有支部;该团体的目的是

- 准备武装起义反对土耳其的统治。自 1818 年起,该团体的中心设在君士坦丁堡。它于 1821 年发动了武装起义,而在起义刚开始就解散了。沙皇政府曾暗中支持“赫特里”。——211。
- 222 维罗纳会议是 1822 年 10—12 月神圣同盟在维罗纳召开的会议。会议通过了法国对革命的西班牙实行武装干涉以及奥地利继续占领那不勒斯和撒丁王国的决定。会议还谴责了希腊人民反对土耳其外来统治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211、482。
- 223 指法国军队为了镇压 1820—1823 年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而对西班牙进行的武装干涉。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于 1822 年 7 月 7 日试图占领革命的马德里遭到失败以后,秘密请求神圣同盟(见注 131)援助他镇压革命。根据神圣同盟维罗纳会议的决定,应由法国援助斐迪南。昂古莱姆公爵指挥的法国军队于 1823 年进入西班牙,在该国恢复了专制制度,法军在西班牙一直驻留到 1828 年。——211。
- 224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 年和 1814—1830 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 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就结成为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212、251。
- 225 指纳瓦里诺会战(纳瓦里诺,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港口城市),这是 1827 年 10 月 20 日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下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另一方的会战。英、法、俄各国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而把自己的联合舰队开进了希腊领海。因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的迫害,会战开始,结果土埃舰队全军覆没。这大大有利于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会战加速了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的爆发,在这一战争中俄国取得了胜利。——212。
- 226 青年意大利是 1831 年由马志尼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主张建立意大利共和国,在实现意大利统一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从 1831 年起秘密出版杂志《青年意大利》。1834 年,马志尼倡议成立“青年欧洲”,“青年意大利”

成为它的一个分支,于1848年解散。——213。

- 227 指在尼古拉一世调停下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1850年10月在华沙举行的谈判,目的是调整两国关系,因为这两个国家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特别是在由于黑森选帝侯国(见注150)和由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引起冲突之后,更加尖锐了。尽管普鲁士同丹麦在1850年7月订立了柏林和约,规定要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恢复革命前状况,但普鲁士仍继续帮助这两个公国同丹麦作斗争。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要求允许奥地利军队进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便完全制服这两个公国,但是遭到普鲁士政府的反对。尼古拉一世皇帝不愿意看到普鲁士强大并力图保持德意志封建割据状态,在华沙表示坚决支持奥地利。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1850年11月底两国政府首脑在捷克城市奥尔米茨(奥洛穆茨)举行会谈时得到了解决。按照1850年11月29日签署的奥尔米茨协定,普鲁士被迫放弃它要主宰德意志的贪求,并且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黑森选帝侯国问题上向奥地利作了让步。由于签署了这一协定,奥地利派一个军团前往荷尔斯泰因。——214。
- 228 指1825年10月16日俄国驻法国大使波措-迪-博尔哥给总理大臣涅谢尔罗德伯爵的紧急报告。这个紧急报告是对1825年8月18日涅谢尔罗德按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草拟的通令的答复,通令征询俄国驻外使节对西方强国在东方问题上所采取的对俄政策和对外交路线的意见。——214。
- 229 民族原则是波拿巴第二帝国(1852—1870年)统治集团为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而提出的。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它的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沙皇俄国的外交也利用这个原则来扩大沙皇在巴尔干,在中欧各斯拉夫民族中的影响。马克思在本文对欧洲国家当权派蛊惑人心地利用“民族原则”的行为进行了揭露。——215。
- 230 指由斯洛伐克斯拉夫学家帕·约·沙法里克专门为他的《斯拉夫民族志》(Slovanský národopis)一书绘制的地图,该书出版于1842年。——222。

- 231 这里引证的马志尼的宣言,由马克思译成英文,并加上简短的引言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 1859 年 5 月底写的《马志尼宣言》)。——224。
- 232 《路易之歌》是中世纪一位无名诗人的诗作,用法兰克方言写于 9 世纪末。该诗是献给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的颂词,赞扬他在 881 年打败了诺曼人。——224。
- 233 指六月十三日巴黎事件。1849 年 6 月 11 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赖德津-洛兰在立法会议上提议把路易·波拿巴总统和他的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因为他们违背宪法,下令法国军队炮轰罗马,以便消灭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议会中保守的多数派否决了这一提议之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愤怒的群众的压力下,企图在 1849 年 6 月 13 日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违背宪法。游行示威被政府军队驱散。山岳党——立法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党团——的一些著名活动家被剥夺了议员的权利并遭到迫害;其中一部分流亡国外。六月十三日事件暴露了山岳党领袖们的犹豫不决以及他们领导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无能为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191—225 页)。——226。
- 234 “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 1851 年法国立法议会会议上发表演说时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 年,雨果的抨击性著作《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问世以后,这一绰号便流传开来。——227。
- 235 1852 年法国政府制定了一个把黑人从非洲(包括葡属非洲领地)迁移到法属西印度殖民地种植场去劳动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行实际上意味着恢复奴隶买卖,它引起了法国和葡萄牙之间的冲突。——229。
- 236 社会治安法(lois de sûreté publique),又称嫌疑犯处治法(Loi des suspects),它是 1858 年 2 月 19 日由法国立法团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授予皇帝拿破仑第三及其政府以无限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投入监狱或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偏僻地区,或者彻底驱逐出法国领土。——229、448。
- 237 1858 年 1 月 27 日的命令,按照西班牙(在西班牙,军区的司令——镇守司令握有绝对权力)的模式,把第二帝国的领土划分为五个军区,分别由元帅管辖。

关于摄政和建立枢密院的命令是在1858年2月1日,在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第三以后不久颁布的。佩利西埃为枢密院成员之一,如果皇太子即位时尚未成年,枢密院就成为摄政会议。——229。

238 奥斯特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指拿破仑第三,他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即1806—1810年期间占据荷兰王位的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马克思称拿破仑第三为“奥斯特利茨会战的侄子”,是暗示下面这个事实,即1851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见注197)正好安排在他的伯父拿破仑第一粉碎了同盟国俄奥军队的1805年12月2日奥斯特利茨会战(见注86)的周年纪念日。——229、268。

239 曾发表文章谴责第二帝国制度的法国政论家沙·蒙塔郎贝尔,在1858年底受到了法庭审讯并被判罪。拿破仑第三赦免了蒙塔郎贝尔,但是,后者拒绝赦免,要求宣判无罪。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案件比作是对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约·汉普敦的审讯,汉普敦在1636年曾拒绝向王家收税官交纳未经下院批准的赋税——“造船费”。对汉普敦的审判案大大促进了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政体的反对派的壮大。

蒲鲁东于185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小册子《教会所恪守的正义》(La Justice poursuivie par L' Eglise),在小册子中,蒲鲁东把波拿巴王朝和奥尔良王朝作了对比,认为奥尔良王朝的管理原则比较好,但附有一个保留条件:必须进行一些民主改革。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保留条件比作是补充条例(Acte additionel),即拿破仑第一1815年4月22日从厄尔巴岛回来以后在法国实行的宪法附加条例,它是对第一帝国宪法的补充。——229。

240 指1858年3月6日索恩河畔沙隆驻军中的共和主义分子的起义,起义遭到了失败。——229。

241 因法国政府曾指责英国允许政治侨民避难,故帕麦斯顿在法国的压力下于1858年2月在下院提出了一个外侨管理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参加阴谋活动的外国人,同英国人一样,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法案在群众抗议运动的压力下被下院否决了,帕麦斯顿也被迫辞职。——229。

242 普隆比耶尔密谋指1858年7月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在普隆比耶尔(法国)签订的一项关于法国和撒丁王国(皮埃蒙特)在

对奥地利作战中结成同盟的秘密协定。拿破仑第三答应给加富尔以军事援助,以便使伦巴第和威尼斯摆脱奥地利的统治并把它们并入撒丁王国,王国应为此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在普隆比耶尔会晤期间,决定了法国和撒丁对奥地利作战的问题,这场战争爆发于 1859 年 4 月(见注 18)。

1858 年秋,帕麦斯顿(他当时领导反对德比—迪斯累里托利党内阁的辉格党反对派)应拿破仑第三的邀请,到贡比涅去阐明他对行将爆发的法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在会见时,帕麦斯顿表示赞成普隆比耶尔秘密协定。不过,在 1859 年 2 月 3 日的演说中,他谴责了法国的行为。——230。

243 马克思用腊肠阅兵来讥讽路易·波拿巴总统于 1850 年 10 月 10 日在萨托里平原(凡尔赛附近)举行的总阅兵。在总阅兵时,路易·波拿巴用腊肠、冷盘野味、香槟酒和雪茄烟款待士兵和军官们,企图借此收买军队,以便来日发动政变。马克思恩格斯在《时评。1850 年 5—10 月》中对此作了简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610—611 页)。——235。

244 第一次意大利战争指 1796—1797 年波拿巴将军在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在意大利战局中的一系列会战,在这次战局中,由波拿巴率领的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北部,击溃了同盟国奥地利和皮埃蒙特(撒丁)军队。——235。

245 远征埃及是 1798 年法国陆海军在波拿巴将军统率下向埃及的进军,目的是要在近东确立法国的殖民统治,侵占当时属于土耳其的埃及和叙利亚,并且在英国与印度的交通线上打击英国。由于法国舰队于 1798 年 8 月 1 日在阿布基尔被英国纳尔逊海军上将的分舰队歼灭,由于苏沃洛夫统率下的俄奥军队在意大利北部战胜了法军以及海军上将乌沙科夫指挥下的俄国分舰队在地中海的胜利行动,波拿巴在埃及的胜利被化为乌有。1799 年秋天,波拿巴把军队留在埃及,自己返回法国,1801 年这支军队被迫向英军投降。——235。

246 雾月十八至十九日(1799 年 11 月 9—10 日)波拿巴将军和他的拥护者实行政变,结束了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发展进程。政变的结果建立了被任命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波拿巴的军事专政。——236。

247 指巴黎条约,是1856年3月30日由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和土耳其的代表为一方和俄国代表为另一方在巴黎会议上签订的,即结束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见注17)的和约。条约规定俄国让出多瑙河河口和南比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放弃对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保护权,同意黑海中立,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俄国把卡尔斯归还给土耳其,以此换回联军在克里木所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等等。在会议上,法国不支持英国提出的高加索脱离俄国的要求,不支持奥地利提出的比萨拉比亚并入土耳其的要求。在会议上形成的法俄两国的接近,后来有了加强。——236。

248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引起的。在捷克发生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势力的进攻,成为这场战争的开端。后来参加战争的欧洲国家组成两个阵营。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同德意志天主教诸侯打着天主教的旗帜并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进攻新教国家——捷克、丹麦、瑞典、荷兰共和国和经过宗教改革的德意志各邦。新教国家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法国国王的支持。德国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主要的斗争是在捷克新教徒和皇帝天主教阵营之间进行的,结果捷克战败。1625年,英国、荷兰和丹麦在法国的协助下结盟,共同反对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丹麦时期(1625—1629年),这个时期一开始,战争就具有全欧洲的性质。但是,丹麦军队被皇帝天主教的军队击溃。1630年,瑞典参战,它在保护新教诸侯的旗帜下,力图在波罗的海南岸站住脚。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瑞典军队的一连串胜利开始,但在1634年瑞典军队被皇帝和西班牙的联合部队击溃。1635年法国公开站到瑞典和新教诸侯方面。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战争在第一阶段具有反抗封建专制欧洲的反动势力的性质,最后变成了互相竞争的外国侵略者对德国的一系列入侵。这次战争于1648年以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和约加深了德国的政治分裂。——241。

249 教皇至上主义是教皇至上派的理论。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

- 动的派别,它反对各民族教会的独立性,维护罗马教皇干涉一切国家内政的权力。19世纪下半叶教皇至上主义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堂,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1870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等等。——243、312、450。
- 250 基尔肯尼的猫这个典故出自一件轶事。在1798年爱尔兰起义中,基尔肯尼城被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黑森雇佣兵占领。士兵们把猫的尾巴拴在一起,让它们斗架来取乐。有一次,一个士兵在一个军官走近时用剑把猫尾巴割断,猫跑走了。他向军官解释说,猫彼此把对方吃掉了,只剩下尾巴。这件轶事在英国成为典故,用来形容斗争的残酷激烈,死拼至两败俱伤。——244。
- 251 联邦院(Ständerat)是瑞士联邦议会(国会)的两院之一。另一院为国民院。——249、270。
- 252 马克思在这里暗指有关拿破仑第三是非婚生子的传言。按正式的说法,他的父亲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见注238)。——249。
- 253 诺因堡冲突即纳沙泰尔冲突。纳沙泰尔(德文名诺因堡)是瑞士的一个州,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见注19)上被划归普鲁士;但却完全独立于普鲁士王国之外,仍旧是瑞士联邦的第21个州。在1848年2月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纳沙泰尔州宣布彻底脱离普鲁士,成立共和国。但是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在1852年3月24日的伦敦议定书中仍然向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重申,维也纳会议决定给予他的对纳沙泰尔的“主权”继续有效。于是在普鲁士和瑞士共和国之间便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直到1857年法国进行了外交干涉,普鲁士被迫放弃了对纳沙泰尔的要求,冲突才算平息。——250。
- 254 达普谷地是位于瑞士瓦特州和法国交界处的一个山谷。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见注19)承认它是瑞士领土,但后来法国拒绝承认这一决定。1862年以前,达普谷地由于其战略意义历来是法国和瑞士必争之地。1862年,瑞士把这个谷地的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从路易·波拿巴政府得到了领土赔偿。——251。
- 255 瑞士联邦委员会(见注132)在1859年3月14日分送给一些国家的照会

中声明：一旦发生意大利战争，瑞士将维护自己领土的不受侵犯和中立，并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占领萨瓦中立地区（北萨瓦）。

保证瑞士“永久中立”的维也纳会议（见注 19），在 1815 年 6 月 9 日的最后决议案中，宣布北萨瓦的沙布莱省和福西尼省为中立地区，并规定，在发生战争或瑞士邻国之间出现公开的敌对行为的情况下，瑞士有权占领这两个省，而撒丁王国则必须从这两省撤出自己的军队。——251。

- 256 马克思引用《哀诉》(Klage)作为本章的题词，这是 12 世纪一位佚名作者的一首中古德语叙事诗；马克思可能引自卡·拉赫曼 1826 年在柏林出版的《尼贝龙根之歌。苦难与哀诉》一书。

《伊威恩，或狮子伴随的骑士》是中世纪德国诗人哈特曼·冯·奥厄的一首华丽的叙事诗，该诗的基本思想是为荣誉牺牲个人幸福；作者是根据 12 世纪法国作家克雷田·德·特鲁瓦的同名小说改写成德文的。——261。

- 257 《帝国大事记》是 12 世纪的一首早期中古德语叙事诗，以半传奇的形式叙述了从凯撒到 1147 年的罗马和德意志帝王的历史。该诗的作者据推测是 12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诗人康拉德。——262。

- 258 拿破仑亲王于 1854 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因为他不赞成克里木远征，再加上没有足够的军事才能，在军队中没有声望，便托病力求从军事领导职务上解脱出来，而后便擅自返回巴黎。——267。

- 259 “起乎人力所及”这句话马克思引自路·卡蒙斯的《卢兹之歌》第 1 首。——268。

- 260 奥朗铁路之争指瑞士几条铁路即苏黎世东北部铁路和瓦特州西部铁路之间的激烈竞争。——277。

- 261 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Argonautenfahrt)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英雄们乘“亚尔古”船前往科耳希达寻求由巨龙看守的金羊毛；公元前 3 世纪罗陀斯的阿波洛尼乌斯在自己的长诗《亚尔古船英雄记》中歌颂了他们这次航行。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奥菲士也参加了这次航行。——278。

- 262 海尔维第(Helvetia)即瑞士的大学生联合会，它是 1858 年由阿劳、洛桑和伯尔尼等城市的同名联合会(以伯尔尼为中心)合并而成。在瑞士的许多城市都有带自由主义色彩的类似的联合会，而有的联合会甚至带有民主

- 主义的色彩(第一个“海尔维第”联合会于1832年在苏黎世建立)。马克思提到的“海尔维第”联合会曾于1859—1860年反对过波拿巴派把萨瓦划归法国的计划。——286。
- 263 融合派(fusion—融合)主张拥护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正统派同拥护幼系的奥尔良派联合。——286。
- 264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是法国最早的高等学校之一,1530年在巴黎建立。——286。
- 265 法兰西研究院(L'Institut de France)是法国最高的科学和艺术机关,由包括法兰西科学院在内的许多最重要的科学院联合组成。——286。
- 266 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100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287。
- 267 普瓦捷街(Rue de Poitiers)指普瓦捷街委员会(俱乐部),是秩序党(见注156)的领导机关。——288。
- 268 五巨头指1849年6月帝国摄政政府(见注29)的五个成员。——290。
- 269 三个圣王 科隆大教堂中有一个三圣王的圣堂,按基督教的说法,他们是到伯利恒来朝拜刚降生的耶稣的三个来自东方的星相家。根据传说,这三个星相家的遗骨就保存在这个圣堂里(参看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7章)。——290。
- 270 鼠塔(Mäuseturm)是位于宾根城下莱茵河中间的岩石上的一个塔;那里,河水流过岩石而形成的狭窄河身被称为宾根之穴。有人认为,塔的名称同关于美因茨主教哈托(10世纪)的传说有关,他由于下令把饥饿者集中在一个谷仓里烧死而受到惩罚,在这个塔中被老鼠吃掉。——293。
- 271 科莫恩战役即科莫恩要塞战斗。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匈牙利军队将军乔·克拉普卡于1849年7月指挥科莫恩(科马罗姆)要塞战斗,抗击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要塞本身于1849年1—4月和7—9月两次遭到围攻,直到9月27日被奥军攻占。——296。
- 272 指米兰起义,即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拥护者1853年2月6日在米兰发动并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支持的起义。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

- 工人,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是,由于起义带有密谋性质,又没有估计到现实的形势,很快就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34—635、640—643、667—669页)。——300。
- 273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朱·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流亡者的国际性组织。马志尼的倡议得到古·司徒卢威和阿·卢格的全力支持。卢格经司徒卢威的推荐,作为德国民派的代表加入了委员会。加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阿·达拉什和拉·科苏特。这个无论成分和思想都极其复杂的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恶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301。
- 274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的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77—407页)。——302。
- 275 匈牙利人指古·泽尔菲。见1852年12月28日马克思给他的信。——302。
- 276 第三者指贝·瑟美列。——302。
- 277 见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48—52页)。——302。
- 278 见马克思1857年3月写的《切尔克西亚的叛徒》。——302。
- 279 见马克思1858年5月写的《历史上有趣的一页》。——303。
- 280 宗教条约是天主教会的首脑罗马教皇与奥地利帝国于1855年签订的条约,这一条约确定了天主教会的地位与特权。根据宗教条约,奥地利的天主教会获得了自治权、与梵蒂冈直接联系权、承受财产权,设立了最高宗教检查机构并对学校大力施加影响。——304。
- 281 指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60年10月20日颁布的宣言,又称“十月恩诏”,恩诏准许帝国的各民族区域享有某种自治权。恩诏对联邦国家制度的拥护者,特别是对匈牙利人,作了不彻底的让步,对主要是由奥地利德意志人组成的集权派来说,则是对立的。然而,翌年初,十月恩诏就由于颁布了1861年2月26日的特许状而被取消,后者重新提出了

- 奥地利帝国的集权制原则。——309。
- 282 “In usum delphini”直译是：“供皇太子用”，转义是：经过删削、篡改。1668年，为教授法国的王位继承者（皇太子）而出版了一批古代经典作家的作品，书中“可非难”之处均被删去，此后，这一用语便流传起来。——309、348。
- 283 维拉戈什的叛变 1849年8月13日，匈牙利革命军队在维拉戈什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往匈牙利镇压革命的俄国军队投降，虽然匈牙利军队还有力量继续作战并拥有相当可观的资源，但是，军队总司令戈尔盖，为了匈牙利贵族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温和自由派分子的利益而叛变投降。——309。
- 284 自由放任(Laissez aller et laissez faire)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在法国七月王朝时期，这句口号变为一句成语。——315。
- 285 1849年1月，马志尼和贝克尔计划建立一支由德国和瑞士志愿者组成的共和派军团以支援西西里的革命运动。瑞士联邦委员会（见注132）借口这个计划有损瑞士的中立而禁止在瑞士的报刊上宣传该计划。贝克尔试图从马赛把2500名志愿者用船运到意大利，也因法国政府的禁止而失败。——316。
- 286 这是彼·平达《画家的主题》中的诗句。——320。
- 287 席尔达——城市名称，该城居民席尔达人是16世纪末流传在德国民间的同名故事“Schildbürger”里所描写的人物，他们是庸人的无知和愚蠢的象征。——321。
- 288 《新莱茵报》用这一称呼来讽刺《国民报》的读者，暗指当时一本名著的副标题：卡·罗泰克《从认识历史的萌芽时期到当代的世界通史，供善于思考的历史爱好者参考》1813—1818年弗赖堡—康斯坦茨版。——321。
- 289 曼托伊费尔统治的十年指曼托伊费尔在普鲁士掌权的时期（1850—1858年10月）。在这时期，由于经济上的成就而心满意足同时又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惊慌不安的资产阶级，站到了贵族和残酷地镇压了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的反动派方面。普鲁士革命的民主成果：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自由等遭到破坏；宪法一再修改，变成了一张废纸；在全国恢复了贵族的等级特权，政权完全掌握在土地贵族和贵族的手中。——322、355。

- 290 这一首两行的短诗是马克思从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于1728—1743年所写的讽刺诗集《邓斯之歌》第1册中引来的。诗集的名字 dunc, 意即：蠢货、笨蛋。作家在诗中辛辣地描绘了他的论敌，把他们安顿在 Dulness (愚昧)的王国里。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主题：理智对愚昧和野蛮的斗争是《邓斯之歌》的基调。——322。
- 291 协商派议会(协商议会)即普鲁士制宪议会。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是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官僚的代表，是所谓的“自由派”，他们完全站在普鲁士国王的立场上，按照国王在1848年5月22日制宪议会开幕辞中，向议员们提出“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的要求行事，从而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1848年11月15日，协商议会被强行解散。——323。
- 292 钦定宪法是1848年12月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解散普鲁士制宪议会的同时颁布的。宪法的基础是普鲁士制宪议会1848年讨论后并作了某些有利于封建政党的修改的方案。根据这个宪法，普鲁士实行两院制，第一议院借助年龄和财产资格限制成为一个有特权的贵族院；根据1848年12月5日的选举法，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被允许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宪法承认国王有权改变两院的任何决议，有权“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否决两院公布的法律，而且可以修改宪法的个别条款，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任命大臣，宣布战争，决定和平。国王被授予完全的行政权，并与议会一起享有立法权。——324、345。
- 293 1849年4月27日，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政府(见注289)解散了普鲁士国民议会第二议院，这个议院是根据1848年12月5日的反民主的钦定宪法(见注292)选举出来的。解散的原因是：在第二议院里有相当数量的反对派分子，特别是他们赞成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见注29)制定的帝国宪法。——324。
- 294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14—1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德国66个城市的89个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一切民主团体联合起来，并为此

成立了区域委员会及其领导机关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会址设在柏林。由于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软弱和动摇,德国民主运动在通过这个决议以后,仍然处于涣散的无组织状态。——325。

- 295 九月党人是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雅各宾党人的敌人对雅各宾党人的称呼,这些人诬蔑雅各宾党人在 1792 年九月的日子里极端残酷无情。

九月的日子即 1792 年 9 月 2—5 日巴黎人民的暴动,暴动是由于外国干涉者军队的进攻和内部反革命势力的猖獗引起的。巴黎群众占领了监狱,组织了审判在押反革命分子的临时人民法庭。许多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被处决。这次“红色恐怖”是革命人民的自卫行动。——329。

- 296 利未人(Levis)是古犹太人特殊等级的神职人员。——331。

- 297 诗句引自最早的希腊诗集第 XI 部第 203 首第 7 和 8 页。——332。

- 298 “市政府”德文是 Magistrat;英文 magistrates 在英国是“治安法官”。——334。

- 299 埃希特纳赫的游行(确切的名称是:舞蹈游行)是中世纪以来每年圣灵降临节在卢森堡的城市埃希特纳赫举行的游行,以感谢 1374 年猖獗一时的圣维特舞蹈病不再复发。游行者不用普通的步伐,而是做一些进进和退退的复杂动作。——335。

- 300 亚·蒲柏《邓斯之歌》第 2 册中的诗句。——335。

- 301 《去意大利,好啊!》1859 年日内瓦福格特出版社版。班贝格尔的这本《去意大利,好啊!》在出版时没有标明作者。——337。

- 302 马克思讽刺地套用了唐·吉珂德的绰号愁容骑士,把芬克叫做笑容骑士。

无畏又无瑕的骑士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 是中世纪法国骑士皮埃尔·杜·特赖耳·巴亚尔的绰号,后来成为普通用语(无论在字面意义上或是在讽刺意义上)。——338。

- 303 1848 年 7 月 11 日,帝国摄政王约翰大公到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保守派举行宴会向他表示敬意,芬克也出席了这次宴会。——339。

- 304 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指罗马的民法大全,是一部调整罗马奴隶占

有制社会财产关系的民法汇编,于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期间编成(约在529年)。从15世纪到19世纪,这部民法也广泛应用于德国。恩格斯称它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4节)。——339。

- 305 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议会的职权限于批准新的税收和贷款,讨论法律草案时有发言和向国王呈交请愿书的权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说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低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340。
- 306 由于芬克发表了反对犹太人的挑衅性言论,上诉法院陪审员罗·本达认为自己受到人身侮辱而提出决斗。不过,芬克拒绝应战。——340。
- 307 维也纳背叛指德国和奥地利资产阶级对待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反革命立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和中央政权以调停为借口实际上阴谋抵制援助革命的维也纳。芬克狂热地支持这种立场。
- 维也纳十月起义即1848年10月6日爆发的维也纳人民起义,它是由于大资产阶级所支持的保皇派试图消灭1848年奥地利资产阶级三月革命(见注168)的成果、恢复专制制度而引起的。奥地利皇帝派遣维也纳守备部队征讨革命的匈牙利的命令是起义的导火线。经过1848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的激烈战斗,起义被政府军队镇压。维也纳的十月起义是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中的最高峰。——342。
- 308 协离派指革命时期为了根据同王室达成的协定制定宪法而于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制宪议会(见注291)的议员。——344。
- 309 大名是日本皇帝的藩臣的称号。——344。
- 310 行动内阁(Ministerium der Tat)指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从1848年6月执政到同年9月垮台的普鲁士奥尔斯瓦尔德-汉泽曼内阁(见恩格斯1849年9月写的《行动内阁的垮台》)。——345。

- 311 腐败的城镇选区,见注 37。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这个词的转义。——345。
- 312 国际民主协会即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于 1847 年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见注 147)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1847 年 11 月 15 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 148)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 1848 年 3 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了 1849 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353。
- 313 工人议会是 1854 年 3 月 6—18 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由于 1853 年英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见注 21)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主张,把各个工联与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联合起来,首先使全国各个不同地区的罢工协调起来。这一组织应该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领导,而工人议会由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大会和参加了“群众运动”的各工联大会选出的代表组成。工人议会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纲领,成立了由 5 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被选为名誉代表的马克思寄去了一封信(《给工人议会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3 卷第 133—135 页),他在信中指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是英国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马克思认为工人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工联主义狭隘圈子的尝试,是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第一步。
- 可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没有成功,因为工联的大多数领袖都对政治斗争抱否定态度,不支持建立统一的工人群众性组织的主张。1854 年夏天罢工运动的低落对广大群众参加运动也起了不利的影 响。1854 年 3 月以后工人议会再没有召开会议。——354。

- 314 纪律法是 1851 年 5 月 7 日普鲁士当局颁布的、惩处法官渎职和将法官强行调离或解除职务的法律。——360。
- 315 拿破仑法典, 见注 5。此处指的是拿破仑统治期间根据 1804 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重新制定而于 1807 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360。
- 316 “祖国之友”指祖国之友协会, 它是 19 世纪 50—60 年代由伦敦德国流亡者成立的共和协会; 卡·布林德、卡·沙伊伯勒、斐·弗莱里格拉特和菲·霍林格尔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364。
- 317 祖国之友协会致民族联盟的“公开信”于 1859 年 11 月发表在德国的一些报纸上。在这封信里, 用含混不清的说法谴责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王朝计划。
- 民族联盟是德国北部和中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组织, 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 从而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该联盟于 1859 年 9 月 15—16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会议上成立。联盟的基本核心是 1849 年 6 月从法兰克福议会退出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右翼自由派——哥达派。1866 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 该联盟于 1867 年 11 月宣布解散。——364。
- 318 奎里特——这是古罗马全权公民的正式名称。——386。
- 319 席利套用了已经成为谚语的著名说法“惋惜埃及的肉锅”, 它出典于圣经传说: 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 行至旷野, 饥饿难忍, 于是开始抱怨摩西, 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 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 16 章第 1—3 节)——399。
- 320 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发表于 1853 年 4 月 1、8、15 和 22 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各号上。马克思在自己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中对这篇文章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48—52 页)。——401。
- 321 指德国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19 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 年柏林版第 1 部、1854 年柏林版第 2 部。该书第 1 部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 作为警察的必修课, 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中的共产主义者

同盟文件。第2部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409。

- 322 五月十五日事件指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其中主要是以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向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他们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阿·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10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见注103)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421。
- 323 《普特南氏月刊》曾经发表过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欧洲军队》一文，这篇文章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向马克思约的稿。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曾帮助恩格斯，为他在英国博物馆搜集资料。——423。
- 324 王公会晤指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以及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亲王1860年10月21日在华沙的会晤。——424。
- 325 克利希是1826—186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426。
- 326 教会什一税是爱尔兰当地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从16世纪起被迫向英国国教会缴纳的税，它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于1838年废除。但是废除什一税取消实物租以后，教会靠增加爱尔兰农民的租金，继续以特殊的货币租的形式得到收入。——429。
- 327 指拿破仑第三为了同普鲁士摄政王威廉会晤所作的巴登-巴登之行，会晤在1860年6月16和17日举行。会晤并没有满足拿破仑第三的愿望，他力图侵占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领土，千方百计靠牺牲德意志小邦的办法去勾结普鲁士；同时，由于这次会晤，普鲁士开始在德意志的对外政策方

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430。

328 指西·波克罕的匿名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一个德国流亡者对埃德蒙·阿布的小册子(1860年的普鲁士)的回答》1860年伦敦版。这本小册子是在马克思的协助下写成的。——430。

329 本文是马克思1860年2月4日写的反对布林德的英文通告信,它以传单形式印发。马克思曾经把这个声明连同1860年2月6日的声明(见本卷第485—486页)一起寄给几家德国报纸,但都未予发表。——431。

330 《萨瓦、尼斯与莱茵》这一著作同《萨瓦与尼斯》(见本卷第64—68页)一样,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见注89)于1860年2月4—20日之间写成的,这是他1859年2月写的另一著作《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恩格斯利用他在军事科学、历史和语言学方面的渊博知识,揭穿了波拿巴对萨瓦、尼斯以及莱茵河左岸地区的要求是荒谬的。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另一个目的是根据对奥意法战争的经过和结果的分析,证明马克思和他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所坚持的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正确性。

曾经匿名出版过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柏林出版商敦克尔,这次由于在对德国各政党的立场的估计上同恩格斯意见分歧,提出只有在作者于扉页上署名的条件下才同意出版这部新的著作。恩格斯不愿意正式署名,以免过早地让军界读者知道这两部著作均出于非军人之手,所以认为只要指出这本新出的小册子出于《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之手就够了。于是,这本小册子便于1860年3月在柏林的贝伦德出版社匿名出版。——435。

331 新年谈话指1859年1月1日拿破仑第三在土伊勒里宫(见注54)接见外交使团时与奥地利大使许布纳尔进行的谈话,据新闻报道,拿破仑第三向许布纳尔表示遗憾,说法奥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如以前那样友好”。这次谈话引起了拿破仑第三与奥地利的外交冲突。——439。

332 向“意大利的伊菲姬妮亚”求婚指拿破仑第三的堂弟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和撒丁公主克洛蒂尔达的联姻(见马克思1859年1月写的《路易-拿破仑的处境》一文)。马克思把克洛蒂尔达讽喻为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国王的女儿伊菲姬妮亚,传说亚加米农在进行特洛伊远征前,把她当作祭祀诸神的祭品。——439。

- 333 书面义务指俄法秘密协定。由于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在巴黎会议上的接近,两国在拿破仑第三的倡议下于1859年3月3日缔结了俄法秘密协定。协定规定,以法国和撒丁为一方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一旦发生战争,俄国对法国应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法国答应提出关于修改1856年的巴黎和约中有关限制俄国黑海主权的条款。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答应拿破仑第三,在他准备以军事上粉碎奥地利方面给予外交上的援助,而一旦战争发生即将俄军开至奥地利边境,以便在东方牵制奥地利的一部分军队。同时拿破仑第三根据协定的精神,继续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可是到后来,鉴于拿破仑第三不愿履行自己的诺言,又由于在其他问题上产生分歧,两国之间的关系冷淡了。——439。
- 334 指乌尔姆会战。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1805年10月17日,马克将军指挥的奥地利军队在乌尔姆要塞被法军包围,结果被迫向拿破仑第一投降。——441。
- 335 边屯营是指由奥地利帝国南部,即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等地的边境地区居民组成的部队。这些居民因使用土地而有义务服役保卫边境。——442。
- 336 宫廷军事会议是1556—1848年奥地利全军的最高机构,它掌管军事部门的工作,在战时对军事行动执行最高指挥权。宫廷军事会议虽然远离战场却经常干预最高指挥官做决策,使最高指挥官的行动受到钳制。——442。
- 337 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控制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能够在德国建立这种军事政治堡垒。莱茵联邦组成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不复存在了。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法国的藩属。1813年拿破仑的军队失败后,莱茵联邦便瓦解了。——446。
- 338 威斯特伐利亚王国是1807年拿破仑第一在德国中部建立的,一直存在到1813年。威斯特伐利亚的王位授予了拿破仑第一的弟弟日罗姆·波拿巴,其子即拿破仑亲王,也称普隆-普隆。——446。
- 339 指维拉弗兰卡和约和苏黎世条约(见注4)中规定的摩德纳、帕尔马和托斯

- 卡纳各公国统治者的复辟,这些公国在 1859 年爆发了起义,统治者被赶下台。摩德纳、帕尔马和托斯卡纳争取并入皮埃蒙特的人民运动使过去的统治者无法复辟。1860 年 3 月上述各公国都加入了皮埃蒙特。——446。
- 340 百日指拿破仑第一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自 1815 年 3 月 20 日他率军从流放地厄尔巴岛重返巴黎时起,到同年 6 月 28 日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450。
- 341 丹纳士人的礼物是指谁得到谁就可能遭殃的礼物。根据关于夺取特洛伊城的传说,希腊人(根据希腊部族之一的名称也称为丹纳士人)送给特洛伊人一只木马表示和解,其中藏有武装的军士。这就是罗马诗人维吉尔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第 2 部中的一个主人公所说的一句获得了广泛流传的话“我害怕丹纳士人,甚至害怕送礼的丹纳士人”的由来。——463、481。
- 342 七村社(Sevenne comuni)和十三村社(Tredici comuni)是位于威尼斯省境内阿尔卑斯山南部支脉上由德国人居住的两个小山区的名称。这两个德国移民区出现在 13 世纪下半叶,这两个移民区的居民所说的德语方言在 19 世纪下半叶只是在少数几个村子中还保留着。——464。
- 343 勒托-罗曼语(这个语种名称来自古罗马的勒威亚省名)属于罗曼语族,主要在瑞士东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高山地区作为口语流行。——465。
- 344 热月九日政变是 1794 年 7 月 27—28 日在法国发生的反革命政变,其结果是推翻了雅各宾派政府,建立起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丹东派,也与其他反革命分子一起积极参加了热月九日政变。——469。
- 345 指 1795 年 7 月 22 日法国同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西班牙在巴塞爾签订的单独和约(参看注 202),根据这一和约西班牙退出了反法同盟。——469。
- 346 指 1796—1797 年波拿巴在对第一次反法同盟(见注 38)的战争中在意大利战局最初阶段进行的几次会战。1796 年 4 月,波拿巴的军队从尼斯经由山道向波河河谷发起进攻,4 月 12 日在蒙特诺特击败了一股奥军;4 月 13—14 日在米莱西莫粉碎了在与奥军结盟的皮埃蒙特军队编制中的一

股奥军；4月14—15日在代戈击败了前来救援这一股军队的奥军。——469。

- 347 在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期间，波兰起义者占领了康斯坦丁大公在华沙的档案库，其中有许多沙皇秘密外交文件。这些文件一部分发表在戴·乌尔卡尔特于1835—1836年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丛刊《公文集。公文汇编》，一部分发表在1854年巴黎出版的《有关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476。
- 348 拿破仑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的第一次会见是1807年6月25日在涅曼河中心的木筏上单独举行的。这里指1807年的蒂尔西特和约，这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7日（同俄国）和9日（同普鲁士）签订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为了分裂战败国，拿破仑对俄国没有提出领土要求，反而使它获得了普鲁士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区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仑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的大陆封锁）。在蒂尔西特，亚历山大一世答应在法国的调停下开始同自1806年起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举行和平谈判。1807年8月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未能缔结和约；1809年军事行动恢复，1812年土耳其战败后才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见注219）。在蒂尔西特，拿破仑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之间还达成了一项瓜分欧洲的秘密协议。除君士坦丁堡以外的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巴尔干半岛和瑞典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法国将在埃及和余下的非洲国家扩张势力，并可在欧洲为所欲为。——477、478。
- 349 这里讽喻路易·波拿巴说过的一句话：“研究问题并非创举”。——477。
- 350 指1829年俄国和法国缔结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莱茵河左岸割让给了法国。——477、478。
- 351 指华沙会议。这个会议是根据俄国的倡议于1850年10月在华沙举行的有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参加的会议，会上沙皇尼古拉一世以仲裁人身

- 份,裁决普奥在统一德国问题上的争端。普鲁士在俄、奥压力下被迫放弃在它领导下建立德意志各邦联盟的计划。——477。
- 352 19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东方问题的尖锐化,奥地利转而奉行敌视俄国的对外政策,这种转变表现在奥地利首相兼外交大臣施瓦岑堡说过的一句话中:“全世界将会因我们的忘恩负义而感到惊奇”。——477。
- 353 关于1853年初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勋爵同尼古拉一世关于土耳其问题的谈判,可参看马克思的《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149—178页)。——479。
- 354 指欧洲国家反拿破仑同盟军队于1814年3月30—31日和1815年7月6—8日两次占领巴黎的事实。——480。
- 355 指1857年9月拿破仑第三和亚历山大二世在斯图加特会晤。这次会晤的目的是俄国和法国在外交方面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关于建立合作关系的问题早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就已提出来了。在会晤时,亚历山大二世保证一旦法国和奥地利因意大利问题爆发战争,一定支持法国。还讨论了达达尼尔海峡问题、多瑙河两公国问题、意大利的命运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拿破仑第三企图提出波兰问题,但没有成功。这次会晤结果没有缔结外交协定,但表明了俄国和法国想进行双边合作的意图。——480。
- 356 哥尔查科夫的条约即俄法秘密协定,见注333。——480。
- 357 指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1859年5月27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外交代表的紧急通告,1859年6月16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167号转载了该通告。——481。
- 358 华沙大公国是拿破仑第一在1807年根据蒂尔西特和约(见注348)划出原来归并于普鲁士的一小块波兰领土所建立的藩属;1809年,奥地利被击溃后,奥地利占有的几块波兰领土也并入这个公国。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见注19)的决定,公国的领土重又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所瓜分。——482。
- 359 德意志联邦条例即《德意志联邦条例。1815年6月8日》,它是1815年6

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见注19)上通过的德意志联邦宪法。根据这一条例,34个德意志邦在形式上组成了德意志联邦(见注85),但是并没有消除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各邦的独立性及德意志诸侯的政治权力仍然得到承认。——482。

360 特罗保(奥帕瓦)会议是神圣同盟(见注131)的第二次会议,于1820年10月开幕,1821年5月在莱巴赫(卢布尔雅那)闭幕。在这两次会上,神圣同盟各大国公开宣布了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以维持当地的封建君主制度。根据这一原则,会议决定派遣军队到别国去镇压当地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重建专制制度。——482。

361 指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1848年7月6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代表发出的通告。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8月在《俄国的照会》一文中对这一通告作了评价。——482。

362 伦敦议定书指1852年5月8日由俄、奥、英、法、普、瑞典等国代表和丹麦代表共同签订的关于丹麦君主国继承权的条约。条约的基础是1850年8月2日上述伦敦会议参加国(除普鲁士以外)通过的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丹麦王室的领地(包括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在内)的不可分割的原则。伦敦议定书中,提到俄国皇帝(作为1762年曾经以彼得三世这个名字统治过俄国的荷尔斯泰因-哥托尔普的卡·彼·乌尔利希公爵的后裔)是丹麦王位的合法要求者之一。尼古拉一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让位给被宣布为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格吕克斯堡王朝的克里斯蒂安公爵。这就为俄国沙皇以后在格吕克斯堡王朝不复存在时要求继承丹麦王位提供了口实。——482。

363 本文在题材和内容上与马克思的《法英之间的新条约》(见本卷第53—57页)紧密衔接。马克思指出,他当时对英法之间的商约所作的评述,已为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1860年2月10日的议会演说所证实。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要把对商约的一般性评价具体化。

本文写于1860年2月11日,首次发表在1860年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58号上。——490。

364 指马克思1853年4月评述格莱斯顿的预算的两篇文章:《菲格斯·奥康瑞尔。——内阁的失败。——预算》和《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

招魂术。——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69—76和77—86页)。——491。

- 365 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在奥格斯堡诉讼案(见本卷第189—190页)之后渐渐退出与福格特的论战。编辑部对马克思寄给他们发表的几篇声明(见本卷第9—12、13—14、431—433、485—487页)或置之不理,或随意修改,对此,马克思在这封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信中提出了抗议。

这封信写于1860年2月21日。首次发表在1919年3月28日《新时代》周刊第37年卷第1卷第26期上。——495。

- 366 指普鲁士政府对马克思在1842—1843年编辑的《莱茵报》实行的特别严格的双重书报检查。——496。

- 367 马克思的这篇声明写于1860年2月28日。从马克思的1860年札记中可以看出,他曾经把这个声明寄给《自由射手》。但是,这家报纸没有发表这一声明。——498。

- 368 本文是恩格斯为报道西班牙侵略摩洛哥的战事而写的第三篇文章(另两篇见本卷第28—34和41—46页)。本文写于1860年2月底—3月1日之间。文章可能作为邮件随亚细亚号轮船于1860年3月3日从利物浦寄出,于3月16日抵达纽约,首次发表在1860年3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96号上。——499。

- 369 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着英国发明家和工厂主惠特沃思和阿姆斯特朗用他们研制的火炮所做的试验。早在1858年10月22日,马克思就写信告诉恩格斯,《泰晤士报》上登有关于论线膛炮的文章,认为可以就此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一篇文章。1859年3月16日马克思又重提这一建议。不过,由于健康原因以及其他紧迫事务,恩格斯当时无法满足马克思的请求。

1860年初,英国报刊登载了大量关于此类试验的报道。英国国防大臣悉尼·赫伯特在1860年2月17日的议会演说中,也通报了惠特沃思火炮的最新试验结果。显然,这一切促使恩格斯为《论坛报》撰文,论述线膛炮的发展历史及其优越性。

本文写于1860年3月上半月,于4月7、21日和5月5、19日在《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5914、5926、5938 和 5950 号上连载发表。——505。

- 370** 贝都英人是西亚、北非等地讲阿拉伯语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他们勇猛善战，在许多军队中充当雇佣兵和职业军人。——506。

人名索引

A

- 阿贝尔, 卡尔(Abel, Karl 生于 1837 年)——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每日电讯》柏林通讯员。——333—338。
- 阿波罗尼乌斯(罗陀斯的)(Apollonius Rhodus 公元前 3 世纪)——古希腊诗人和语法学家,长诗《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的作者。——278。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ordon, 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 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 和 1841—1846)、殖民和陆军大臣(1834—1835)和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479。
- 阿布, 埃德蒙·弗朗索瓦·瓦朗坦(About, Edmond François-Valentin 1828—1885)——法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波拿巴主义者。——183、234、259、263—264、285、286、292、293、360、424、429—430。
- 阿布特(Abt)——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 世纪 50 年代初侨居日内瓦,因造谣中伤被开除出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88—92、95—96、98。
- 阿恩特, 恩斯特·莫里茨(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德国作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1813 年参加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德国统一的先驱;1815 年后受到封建反动势力的迫害,1820 年被免去波恩大学史学教授职务,1840 年恢复原职;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200。
- 阿尔贝罗尼, 朱利奥(Alberoni, Giulio 1664—1752)——西班牙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红衣主教;1717—1719 年任国王菲力浦五世的首相;意大利人。——308。
- 阿尔伯茨(Alberts)——19 世纪 50 年代是普鲁士驻伦敦使馆秘书。——401—

402。

阿尔宁-博伊岑堡伯爵,阿道夫·亨利希(Arnim-Boitzenburg, Adolf Heinrich Graf von 1803—1868)——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人物;曾任内务大臣,同时为书报检查三大臣之一(1842—1845)和首相(1848年3月19—29日),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为第二议院右翼领袖之一。——341。

阿尔滕赫弗,奥古斯特·约瑟夫(Altenhöfer, August Joseph 1804—1876)——德国新闻工作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175。

阿盖尔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Argyll, Archibald Campbell, Earl of 1629—1685)——苏格兰贵族,1685年5—6月领导反对詹姆斯二世的暴动;暴动失败后被处死。——130。

阿加西斯,路易·让·鲁道夫(Agassiz, Louis-Jean-Rudolphe 1807—1873)——瑞士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居维叶的学生,写有关于古生物和现代动物的著作和有关冰川理论的文章。——96。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公元前445—385)——古希腊剧作家,写有政治喜剧。——388。

阿姆斯特朗,威廉·乔治(Armstrong, William George 1810—1900)——英国发明家和厂主,以发明线膛炮而出名。——514—518。

阿塞尔曼,费伦茨(Assermann, Ferencz 1821—1893)——匈牙利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309—311。

埃查圭,拉斐尔,塞拉略伯爵(Echagüe [Echague], Rafael, conde del Serrallo 1815—1887)——西班牙将军,温和派;曾参加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在1859—1860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任军长。——28、29、42、43。

埃尔曼尼(Ermani)——伦敦的出版者和书商。——195、420。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莫里茨(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派;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年布雷斯劳五月起义的参加者,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1850年获释;1850—1851年流亡伦敦,回国后至1854年任《新奥得报》编辑,1855年起任主编;马克思曾为报纸撰稿。——352。

埃菲阿尔特(Ephialtes 死于公元前469年以后)——希腊人,公元前480年向波斯人密告了近抄温泉关的道路,而使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率领的隘口保卫

- 者全军覆没。——284。
- 埃默曼, 卡尔(Emmermann, Karl)——莱茵省林务官;1849年是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步兵分队指挥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33、134。
- 艾森曼, 约翰·哥特弗里德(Eisenmann, Johann Gottfried 1795—1867)——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8年是《德意志人民报》编辑;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后来属于左派。——165。
- 艾希霍夫, 卡尔·威廉(Eichhoff, Karl Wilhelm 1833—1895)——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50年代末因在报刊上揭露施梯伯的密探活动而受到法庭审讯;1861—1866年流亡伦敦,1868年起为国际会员,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一;国际柏林支部的组织者,总委员会柏林通讯员,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自1859年起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联系。——120。
- 安贝尔, 雅克(Imbert, Jacques 1793—1851)——法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40年代流亡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土伊勒里宫警卫队长。——353。
- 安凡丹, 巴泰勒米·普罗斯佩(Enfantin, Barthélemy-Prosper 人称安凡丹老爹 Père Enfantin 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门徒,同巴扎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自40年代中起在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53。
- 安娜·伊万诺夫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 1693—1740)——俄国女皇(1730—1740)。——210。
- 昂利第二(洛林的), 吉斯公爵(Henri II de Lorraine, duc de Guise 1614—1664)——法国弗伦特党领导人。——85。
- 昂塞尔姆, 雅克·贝尔纳·莫德斯特(Anselme, Jacques-Bernard-Modeste d' 1740—1812)——法国将军,1792年在革命的法国同奥地利作战期间任军长。——468。
- 奥本海姆, 亨利希·伯恩哈德(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1849—1861年先后侨居瑞士、法国和英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157、336—337。
- 奥尔良公爵——见斐迪南·菲利浦·路易·沙尔·昂利,奥尔良公爵。
-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85。
- 奥当奈尔-霍里斯(奥当奈尔), 莱奥波多, 卢塞纳伯爵和得土安公爵(O'Donnell

- y Jorris [O'Donnell], Leopoldo, conde de Lucena y duque de Tetuán 1809 — 1867)——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派的领袖之一;曾任古巴总督(1843—1848);1854年利用国内革命危机建立军事专政,在担任陆军大臣期间(1854—1856)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政府首脑(1856、1858—1863和1865—1866);在1859—1860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期间任西班牙远征军总司令。——28、29、33、41—43、45、499—504。
- 奥尔格斯,海尔曼(Orges, Hermann 1821—1874)——德国新闻工作者,1854—1864年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189、290、352、416、417、439、444。
-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的参加者;因谋杀拿破仑第三(1858)而被处死。——229。
- 奥克辛本,约翰·乌尔里希(Ochsenbein, Johann Ulrich 1811—1890)——瑞士将军和国务活动家,激进派领袖,1847年内战时期为自由派领袖,宗得崩德战争时期,任联邦院议员、议长,联邦政府首脑(1847—1848)。——316。
- 奥利,卡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海尔曼(Ohly, Karl Friedrich Christian Hermann 1825—1881)——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莱茵报》通讯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伦敦;《总汇报》通讯员。——175、350、378。
- 奥利芬特,劳伦斯(Oliphant, Laurence 1829—1888)——英国旅行家和新闻工作者,1855年以《泰晤士报》在奥美尔帕沙远征军中的随军记者身份在高加索活动。——255。
- 奥丽珈·尼古拉耶夫娜(Олга Николаевна 1822—1892)——俄国女大公,尼古拉一世的女儿,后为符腾堡国王卡尔-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的王后。——395。
- 奥热罗,皮埃尔·弗朗索瓦·沙尔(Augereau, Pierre-François-Charles 1757—1816)——法国将军,1804年起为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469。
- 奥斯瓦尔德,欧根(Oßwald [Osswald], Eugen 1826—1912)——德国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为普法尔茨革命军的营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82。
-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Ovid] Naso 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公元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

驱逐出罗马。——108。

B

巴布斯特, 伊万·康德拉季耶维奇 (Бабст, Иван Кондратьевич 1824 — 1881)——俄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曾先后任喀山大学(1851年起)和莫斯科大学(1857年起)的政治经济学教授。——93。

巴德尔, 玛格丽特(里戈尔博谢)(Badel, Marguerite [Rigolboche]生于1842年左右)——法国女舞蹈家。——424。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 — 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86、355。

巴克菲施(Backfish)——奥登林山铁匠, 侨居瑞士。——95。

巴克霍夫(Backhof)——因参与刺杀雪恩贝格伯爵夫人, 1834年同奥古斯特·克劳泽和贝泽勒尔一起被判处死刑。——403。

巴拉盖·狄利埃, 路易(Baraguay d' Hilliers, Louis 1764 — 1812)——法国将军,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235。

巴罗, 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 Camille-Hyacinthe-Odilon 1791 — 1873)——法国政治家, 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 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 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 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107、167。

巴罗, 雅克·瓦莱(Barreaux, Jacques Vallée 1602 — 1673)——法国诗人。——151。

巴罗焦(Baroggio)——流亡者, 贝桑松纵队的成员(1848)。——140。

巴罗什, 皮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Jules 1802 — 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 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 — 1851), 秩序党的代表人物; 波拿巴主义者, 1849年为上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前和以后曾数度入阁。——53、273。

巴塞尔曼,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 — 1855)——德国书商和政治家,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预备会议员; 1848 — 1849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议会中的代表, 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168,399。

巴泰勒米,艾曼纽埃尔(Barthélemy, Emmanuel 1820 左右—185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和 1848 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5 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141。

巴亚尔,皮埃尔(Bayard, Pierre 1476—1524)——法国骑士,同时代人称颂他是勇敢和高贵的榜样,是“无畏又无瑕的骑士”。——339,342—345,347。

巴赞库尔,塞扎尔男爵(Bazancourt, César, baron de 1810—1865)——法国军事著作家,波拿巴主义者。——236。

拜伦,乔治(Byron, George 1788—1824)——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135,329。

班贝格尔,路德维希(Bamberger, Ludwig 1823—1899)——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为《美因茨日报》编辑,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49—1850 年移居伦敦,1851 年在比利时经商,1852 年起侨居巴黎,1858 年成为巴黎的银行家;1866 年回到德国,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93)。——336,337。

班迪亚,亚诺什(Bangya, 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和军官,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科苏特的密使,同时也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活动。——302,303—304。

班迪亚,约翰——见班迪亚,亚诺什。

鲍蒂扬尼伯爵,卡什梅尔(卡希米尔)(Batthyány, Kásmér [Kasimir] Graf von 1807—1854)——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 年任匈牙利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革命被镇压后流亡土耳其,后迁居法国。——299。

鲍蒂扬尼伯爵,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Batthyány, Lajos [Louis, Ludwig] Graf von 1806—1849)——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匈牙利革命政府总理(1848 年 3—9 月);革命被镇压后遭枪杀。——299。

鲍威尔,埃德加(Bauer, Edgar 1820—1866)——德国政论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恩格斯的朋友;1842 年为《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 年转到主观唯心主义立场,曾多次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 1859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181。
- 贝尔坦(Bertin)——日内瓦咖啡店老板。——78—79。
- 贝克尔(Becker)——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407。
- 贝克尔, 麦克斯·约瑟夫(Becker, Max Joseph 死于1896年)——德国工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0年迁居美国。——78、81。
- 贝克尔, 约翰·菲利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制刷工, 1848年加入瑞士籍；三月革命以前的民主运动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以瑞士军队军官身份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民团；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 瑞士“革命中央”成员(1850), 国际日内瓦第一支部的创建人(1864), 国际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德国和瑞士德语区中央委员会主席(1865), 国际德语区支部主席(1866年起), 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 《先驱》杂志出版者和编辑(1866—1871)和《先驱者》杂志编辑(1877—188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03、114—118、134、139、312、315、320、338、351、356、395、400、426。
- 贝克曼(Beckmann)——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 《科隆日报》驻巴黎记者。——108、404。
- 贝里耶, 皮埃尔·安东(Berry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家, 七月王朝时期是正统主义反对派领袖,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229。
- 贝利, 莱昂(Belly, Léon 1827—1877)——法国画家。——424。
- 贝列拉, 伊萨克(Péreire, 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 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53、336。
- 贝林涅尔勃劳, 伊西多尔——见奥本海姆, 亨利希·伯恩哈德。
- 贝泽勒尔(Beseler)——因参与刺杀雪恩贝格伯爵夫人, 1834年同奥古斯特·克劳泽和巴克霍夫一起被判处死刑。——403。
- 本茨(Benz)——1850年是伯尔尼小店主。——103。

- 比德曼, 弗里德里希·卡尔(Biedermann, Friedrich Karl 1812—1901)——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初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 60年代起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德意志总汇报》编辑(1863—1879)。——399。
- 比利埃(Bullier)——法国新闻工作者, 波拿巴主义者。——264。
- 比斯康普, 埃拉尔德(Biscamp [Biskamp], Elard)——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1859年创办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周报《人民报》, 报纸从第2号起就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181、182、192、326、350、352、355、363—365、368、378、379、382、392、496。
- 彼得一世, 彼得大帝(Петр I, Петр Великий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 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181、210、478、483。
- 庇护九世(Pius IX [Pio Nono] 世俗名乔万尼·马利亚·马斯塔伊-费雷蒂(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209。
-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公元前571左右—497)——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 毕达哥拉斯派的创始人; 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 认为宇宙的根本是数, 相信灵魂转生。——324。
- 毕尔格尔斯, 约翰·亨利希(Bürgers, Johann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 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 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1851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判6年徒刑;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60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351。
- 波措-迪-博尔哥伯爵, 卡尔·奥西波维奇(沙尔·安德烈)(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Charles André], граф 1764—1842)——俄国外交官, 科西嘉人; 曾任驻巴黎公使(1814—1821)和大使(1821—1835), 驻伦敦大使(1835—1839)。——214。
- 波克罕,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6—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商人, 民主主义者, 1848年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1年起在伦敦经商; 50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1860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

- 好关系。——77、80、81、92、94、115、430。
- 波林尼雅克亲王，茹尔·奥古斯特·阿尔芒·玛丽(Polignac, Jules-Auguste-Armand-Marie, prince de 1780—1847)——法国国务活动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1829—1830)。——477、482。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路易(Bonaparte, Louis 1778—1846)——荷兰国王(1806—1810)，拿破仑第一的弟弟，拿破仑第三的父亲。——267。
-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又名日罗姆，Jérôme 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 Plon-Plon et prince rouge 1822—1891)——法国政治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日·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91、101、111、114、180、188、217、243、248、265—269、272、276—277、285、286、292、293、305、309、347、416、446。
-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威斯特伐利亚国王(1807—1813)，1850年起为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弟弟。——243、446。
-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1815和1852—1870)。——265。
- 玻利瓦尔-庞特，西蒙(Bolívar y Ponte, Simón 1783—1830)——南美政治活动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哥伦比亚共和国创建人和第一任总统(1819—1830)。——302、429。
- 勃兰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1792—1850)——普鲁士将军和国务活动家；内阁首脑(1848年11月—1850年11月)。——344。
-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125、354。
- 勃鲁姆，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副议长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为左派领袖之一；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在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

害。——90、127、130、270、328。

柏西阿斯(奥鲁斯·柏西阿斯·弗拉克斯)(Aulus Persius Flaccus 34—62)——罗马讽刺诗人,曾斥责当时罗马社会的堕落风气,斯多亚派哲学的追随者。——294、329、331。

博阿尔奈亲王,欧仁(Beauharnais, Eugène prince 1781—1824)——法国将军,拿破仑第一的继子,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意大利总督(1805—1814)。——212。

博布钦,弗里德里希·亨利希·卡尔(Bobzin,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生于1826年)——德国钟表匠帮工,1847年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同司徒卢威一起领导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1850年4月底成为该协会司库;1851年离开伦敦。——82。

博尔夏特,路易(Borchardt, Louis)——德国医生,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3。

博内留斯,乌尔里希(Bonerius, Ulrich)——中世纪德国诗人,多明我会修道士,1350年出版寓言集《宝石》。——164、272。

博尼法斯,路易(Boniface, Louis 生于1796年)——法国新闻工作者,波拿巴主义者。——264、292。

博尼什,赛米尔(Bónis, Samuel 1810—1879)——匈牙利法学家和政治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科苏特的拥护者。——429。

博雅多,马泰奥·马利亚(Boiardo [Bojardo], Matteo Maria 1441左右—1494)——意大利诗人,《恋爱中的罗兰》一诗的作者。——411。

博伊斯特,弗里德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冯(Beust, Friedrich Karl Ludwig von 1817—1899)——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因政治信仰退伍;1848年是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新科隆日报》的编辑(1848年9月—1849年2月);1848年10月代表科隆工人联合会出席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会上捍卫了几乎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相一致的纲领;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任教育学教授,“革命集中”的成员,1867年国际工人协会苏黎世支部的创建人之一,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年)的参加者;恩格斯的表妹安娜的丈夫。——133。

布赫尔,阿道夫·洛塔尔(Bucher, Adolph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司法

- 推事和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柏林《国民报》通讯员;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50年代赞同戴·乌尔卡尔特的的外交观点。——147、179。
- 布捷涅夫,阿波利纳里伊·彼得罗维奇(Бутенев, Аполлинарий Петрович 1787—1866)——俄国外交家,曾任驻土耳其大使(1830—1842和1856—1858),驻罗马公使(1843—1856)。——213。
- 布拉斯,奥古斯特(Braß, August 1818—1876)——德国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9—1860年是《新瑞士报》的主编,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北德总汇报》发行人。——264、265、293。
- 布莱克利(Blakeley)——英国军官和新闻工作者,1859年奥意法战争期间任《泰晤士报》在奥军中的通讯员。——443。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26。
- 布朗丹(Blondin 原名让·弗朗索瓦·格拉韦莱 Jean-François Gravelet 1824—1897)——法国踩钢丝演员。——308。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125。
- 布朗舍奈,路易(Blanchenay, Louis 1800—1881)——瑞士政治家,国民院议员(1848—1860),海关监督(1861—1873)。——277。
- 布里亚-萨瓦兰,昂泰尔姆(Brillat-Savarin, Anthelme 1755—1826)——法国法学家和作家。——276。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为临时政府成员;与马克思同去伦敦,在那里成为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成员;1849—1850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50

年代中期起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60年代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3、9、11—14、180、182—198、263、326、357、363—366、368—369、375—377、379、382、414、416—420、431—433、486、496。

布伦诺夫男爵,菲力浦·伊万诺维奇(Бруннов, 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барон 1797—1875)——俄国外交官,曾任驻伦敦公使(1840—1854和1858—1860)和大使(1860—1874);出席1856年巴黎会议的俄国代表团团员。——215。

布伦奇里,约翰·卡斯帕尔(Bluntschli, Johann Caspar 1808—1881)——瑞士法学家和政治家;对革命运动参加者实行警察迫害的策划者之一;1843年为苏黎世州政府设立的瑞士境内德国共产主义流亡者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会于1843年公布的工作报告的起草人。——136。

布伦坦诺,洛伦茨·彼得·卡尔(Brentano, Lorenz Peter Karl 1813—1891)——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领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迁居美国;1878年起为美国国会议员。——103、157、343。

布斯,弗兰茨·约瑟夫(Buß, Franz Joseph 1803—1878)——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普鲁士霸权的反对者,教权派,后为帝国国会议员。——169。

布特伯爵,约翰·斯图亚特(Bute, John Stuart, Earl of 1713—179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内务大臣(1761—1762),首相(1762—1763)。——202。

布瓦绍,让·巴蒂斯特(Boichot, Jean-Baptiste 1820—1889)——法国政治家,共和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领导人之一;1854年回到巴黎,又遭警察迫害和监禁,1859年获释。——105。

C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查理大帝。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 I, 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221。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

月革命赶下王位。——215。

察贝尔, 弗里德里希(Zabel, Friedrich 1802—1875)——德国政论家, 自由主义者, 柏林《国民报》编辑(1848—1875), 民族联盟的创始人之一。——73、193、321、333、334、348—388、391、405、423、425。

察哈里埃, 亨利希·阿尔伯特(Zachariae, Heinrich Albert 1806—1875)——德国法学家;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1849), 属于中间派右翼。——170。

D

达-达·路西德(Dahdah [Dâ-Dâ] Rochaid)——阿拉伯政论家, 19世纪50年代受阿尔及利亚当局的委托把一些波拿巴派的小册子译成本国语言。——199、258—260、264、286、290、292、423、429。

达来朗-贝里戈, 沙尔·莫里斯·德, 贝内文特亲王(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1838)——法国外交家, 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和1814—1815), 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 驻伦敦大使(1830—1834)。——477。

大胆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 1433—1477)——勃艮第公爵(1467—1477)。——102—103、105、108、173。

丹屠, 爱德华·昂利·茹斯坦(Dentu, Edouard-Henri-Justin 1830—1884)——法国丹屠出版社老板之一, 波拿巴主义者。——201—203、206、207、224、232—234、238、246、249、255、259、423、424、429—430。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102、131、289。

道格拉斯, 霍华德(Douglas, Howard 1776—186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著有炮兵、筑城学和军事桥梁方面的著作。——513、517。

德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 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 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殖民大臣和陆军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 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52、230、252、307。

德尔蒙泰, 朱泽培——见杜蒙, 约瑟夫。

德拉奥德, 律西安(De la Hodde, Lucien 1808—1865)——法国政论家, 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警探。——108、129、404。

德拉腊日阿兹, 路易·昂利(Delarageaz, Louis Henri 1807—1891)——瑞士政治家, 激进主义者, 傅立叶的拥护者, 《沃州新闻》编辑。——277。

德拉马尔, 泰奥多尔·卡齐米尔(Delamarre, Théodore-Casimir 1797—1870)——法国银行家和政论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44年起为《祖国报》所有人。——287、289。

德朗克, 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和作家, 曾一度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 1848年初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年7月是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往瑞士的特使; 1852年4月底流亡英国;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2)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警察当局的丑恶行径; 国际会员; 70年代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92、96、155。

德律埃, 昂利(Druey, Henri 1799—1855)——瑞士国务活动家, 激进主义者, 联邦委员会委员(1848—1854), 司法和警务部长(1848年起), 1850年为瑞士联邦主席。——95、96、104—107、392—393、395—397。

德纳, 查理·安德森(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新闻工作者, 废奴主义者, 40—6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 1868年起为《太阳报》主编。——354、423。

德斯特尔,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D'Ester [d' Est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3—1859)——德国医生, 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 曾在科隆的民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 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 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普鲁士制宪议会和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左派; 1848年10月起为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9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重要作用并支持普法尔茨临时政府, 后来流亡瑞士。——162、323。

登策(Dentzer)——在瑞士的德国侨民,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92。

登策尔(Dentzel)——1850年在瑞士的德国侨民。——395。

邓斯·司各脱, 约翰(Duns Scotus, John 1265左右—1308)——苏格兰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 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 著有《牛津文集》。——340、344。

狄茨, 奥斯瓦尔德(Dietz [Diez], Oswald 1824左右—1864)——德国建筑师,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年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

-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来是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852年赴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403。
- 狄更斯,查理(Dickens, Charles 笔名博兹 Boz 1812—1870)——英国现实主义作家。——126。
-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政治家和演说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338年)被驱逐出雅典。——124。
- 迪策尔,古斯塔夫(Diezel, Gustav)——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一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1850年流亡瑞士。——290。
- 迪芬巴赫,恩斯特(Dieffenbach, Ernst 1811—1855)——德国自然科学家,地质学教授(1850)。——293。
-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54、56—57、332。
- 蒂尔,伊什特万(Türr, István 1825—1908)——匈牙利军官,意大利和德国的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和土耳其;曾参加克里木战争,站在联军一边;参加过切尔克斯人反对俄国的战争;1860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1年起为意大利军队的将军。——302。
- 第欧根尼(锡诺普的)(Diogenes of Sinope 约公元前412—323)——古希腊哲学家,昔尼克派;他放荡不羁,流传下许多轶事和传说,传说他住在大木桶里,白日打着灯笼找诚实的人等。——97。
- 杜阿梅尔,亚历山大·奥西波维奇(Дюгамель, Александр Осипович 1801—1880)——俄国将军和外交官,1842—1848年负特别使命出使多瑙河两公国。——212。
- 杜班,安德烈·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人称大杜班 Dupin aîné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众议院议长(1832—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312。
- 杜邦,埃米尔(Dupont, Émile 生于1821年左右)——法国新闻工作者,《流亡者

- 之声)等许多杂志的发行人。——86。
- 杜弗尔, 茹尔·阿尔芒·斯塔尼斯拉斯(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臣(1839—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 卡芬雅克政府的内务部长(1848年10—12月)和波拿巴政府的内务部长(1849年6—10月); 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司法部长, 内阁总理。——229。
- 杜科曼, 埃利(Ducommun, Élie 1833—1906)——瑞士国务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 激进派, 1855年起为《日内瓦评论》编辑。——279。
- 杜朗, 鲁道夫(Dulon, Rudolph 1807—1870)——德国牧师, 反官方教会的“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1850年为《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撰稿人, 1850年3月起任主编; 1853年流亡美国。——146。
- 杜蒙, 约瑟夫(Dumont, Joseph 1811—1861)——德国新闻工作者, 温和的自由派; 1831年起为《科隆日报》发行人。——11、12、328。
- 杜舍克, 弗兰蒂舍克(Dušek, František 1797—1873)——匈牙利国务活动家, 原系捷克人, 瑟美列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1849)。——306。
- 杜伊(Duy)——日内瓦警察局长(1859—1860)。——280。
-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 彼得·弗拉基米罗维奇(Долгоруков, Пет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16—1868)——俄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自由主义者, 1859年流亡国外, 60年代出版反对派报刊杂志, 曾为赫尔岑的《钟声》撰稿。——209。

E

- 额尔金伯爵, 詹姆斯·普鲁斯(Elgin, James Bruce, Earl of 1811—1863)——英国外交官, 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1857—1858和1860—1861), 印度总督(1862—1863)。——20、21、23。
- 恩格兰德尔, 西格蒙德(Engländer, Sigmund 1828—1902)——奥地利新闻工作者, 1848年流亡英国, 密探。——367。

F

- 法耳梅赖耶尔, 雅科布·菲利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东方学家; 1848年起为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 写有关于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178。
- 法济, 让·雅克(詹姆斯)(Fazy, Jean-Jacques [James] 1794—1878)——瑞士政

- 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激进派,曾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1846—1853和1855—1861),瑞士银行的创办人。——79、105、130、176、180、265、270、271—272、274、275、277—282、296、313—320、392、394、426。
- 菲尔斯滕贝格公爵,卡尔·埃贡(Fürstenberg, Karl Egon Fürst zu 1796—1854)——多瑙埃兴根城堡主人。——158。
- 菲力浦逊,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Филипсон,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09—1883)——俄国将军,曾参加征服高加索。——303。
- 菲沙尔特,约翰(Fischart, Johann 1545左右—1590)——德国讽刺作家。——82、126、340、342。
- 斐迪南·菲力浦·路易·沙尔·昂利,奥尔良公爵(Ferdinand-Philippe-Louis-Charles-Henri, duc d'Orléans 1810—1842)——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长子,1835—1840年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506。
- 斐迪南七世——见费南多七世。
- 费格勒,奥古斯特(Vögele, August)——德国流亡者,1859年是伦敦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字工人。——184、188—191、193—197、356、357、366—367、375—377、418—420、432。
-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30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人,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125、165、172、185、186、339。
- 费南多七世(斐迪南七世)(Fernando VII [Ferdinand VII] 1784—1833)——西班牙国王(1808和1814—1833)。——49、211。
- 费舍尔,爱德华(Fischel, Eduard 1826—1863)——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进步党人,1858年起任柏林市法院陪审官,1859—1860年是柏林乌尔卡尔特派的杂志《公文集》的编辑,马克思的熟人。——333。
- 芬克(Fink)——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106。
- 芬克男爵,格奥尔格·恩斯特·弗里德里希(Vincke, Georg Ernst Friedrich Freiherr 1811—1875)——普鲁士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右派领导人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右派,50—60年代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属于温和的自由派。——116、164、166、338—347。
- 弗拉基米列斯库,图多尔(Vladimirescu [Wladimiresco], Tudor 1780左右—

- 1821)——罗马尼亚民族英雄,1821年瓦拉几亚反对大土地占有者和土耳其压迫的人民起义领袖。——211。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13、179。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5、8、204、245、247、307、442、444。
- 弗兰格尔伯爵,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Graf von 1784—1877)——普鲁士将军,1848年11月参加普鲁士反革命政变,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1856年起任陆军元帅;丹麦战争时期(186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344。
- 弗兰克,古斯塔夫(Frank, Gustav 死于1860年)——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初侨居伦敦。——147。
- 弗兰奇尼,维克多·安东诺维奇(Франкини, Виктор Антонович 1820—1892)——俄国军官,后为将军,曾参加克里木战争(1853—1856)和对高加索山地居民的战争。——304。
- 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 I 1494—1547)——法国国王(1515—1547)。——247。
- 弗雷-埃罗塞,弗里德里希(Frey-Hérosé, Friedrich 1801—1873)——瑞士军官,政治家,自由主义者;反对宗得崩德战争(1847)的参加者,1848年为联邦院议员,国民院议员;1854年和1860年任瑞士联邦主席。——251、273、277。
- 弗里茨(Fritz)——在瑞士的德国侨民。——117。
- 弗里德里希大帝——见弗里德里希二世。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125、202。
-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 1620—1688)——勃兰登堡选帝侯(1640—1688)。——343。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 I 1802—1875)——黑森摄政王(1831—1847),黑森-卡塞尔选帝侯(1847—1866)。——15。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60、346。
- 弗略里(Fleury)——查·弗略里的妻子。——402。
- 弗略里,查理(Fleury, Charles 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 Carl

- Friedrich August Krause 生于 1824 年)——德国商人,在伦敦经商,普鲁士的间谍和警探。——108、120、401—410。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 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353、421。
-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50 年为柏林《晚邮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0—1861 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住宅问题的著作;1851 年为《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编辑;1861 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1866 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181、183。
-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424。
- 福格特,阿道夫(Vogt, Adolf 生于 1823 年)——瑞士医生,卡·福格特的弟弟。——282。
- 福格特,埃米尔(Vogt, Emil 1820—1883)——瑞士法学家,卡·福格特的弟弟。——282。
- 福格特,菲利浦·弗里德里希·威廉(Vogt, Philipp Friedrich Wilhelm 1786—1861)——德国医生,自由主义者;1835 年起为柏林高等学校医学教授,卡·福格特的父亲。——118、282。
- 福格特,古斯塔夫(Vogt, Gustav 1829—1901)——瑞士法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和平和自由同盟组织者之一,统计局局长(1860—1862),《欧洲联邦》主编(1867—1869)和《新苏黎世报》主编(1878—1885),卡·福格特的弟弟。——280、282、396。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 年逃往瑞士,50—60 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9—14、73、74—75、76、77、80、82、88—116、117—135、153、160、161—162、164—168、171—194、197—210、213—217、219—228、230—231、232—271、274—286、289—294、308、312—313、320、325—328、333、336、338—341、347—351、352—357、362—376、380—384、395—401、409、415—416、418、426、429—432、461、486、488。

福禄培尔, 尤利乌斯(Fröbel [Froebel], Julius 1850—1893)——德国自然科学家, 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1843年底—1844年同马克思有密切联系; 德国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 属于左派; 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 1857年回到欧洲, 为奥地利政府撰写时评。——180、196。

福斯柯洛, 乌戈(Foscolo, Ugo 1778—1827)——意大利诗人。——283。

傅立叶, 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88、147。

富尔德, 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 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会议议员(1848—1849), 曾任财政部长(1849—1851), 财政大臣(1861—1867), 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35、36。

G

盖昂, 理查·德博弗尔(Guyon, Richard Debaufre 1803—1856)——英国军官, 匈牙利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任匈牙利革命军将军, 革命失败后加入土耳其军队, 被封为库尔西德帕沙, 1853年任高加索土军指挥官。——296。

盖沙特, 施泰恩——见班贝格尔, 路德维希。

哥尔查科夫公爵,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нязь 1798—1883)——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 外交大臣(1856—1882), 总理大臣(1867—1882)。——439、478、480—481、483。

哥利岑,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лицын,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18—1783)——俄国外交官和将军, 18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任驻伦敦公使。——202。

哥特弗里德(斯特拉斯堡的)(Gottfried von Straßburg 约12世纪末—13世纪初)——德国诗人, 骑士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的作者。——227。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127、130、260。

戈登男爵, 安东(Gordon, Anton, Freiherr 1767—1828)——奥地利将军, 曾多次参加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453。

戈尔德海姆,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奥古斯特(Goldheim, Friedrich Theodor

- August 约生于 1807 年)——普鲁士警官, 19 世纪 50 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111、407、408。
- 戈尔盖, 阿尔图尔(Görgey, Arthur 1818—1916)——匈牙利将军, 匈牙利军队总司令(1849 年 4—6 月); 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 背叛匈牙利革命, 率领所属部队向沙皇军队投降。——217、296、297、310。
- 戈克, 阿曼德(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海关官员, 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是巴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1862 年返回德国; 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创建人之一, 国际会员; 70 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59、412。
- 格贝尔特,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Gebert, August Friedrich)——德国木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巴登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参加者; 流亡瑞士, 1850 年迁往伦敦,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并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105。
- 格策(Götze)——普鲁士法学家, 19 世纪 50 年代任普鲁士最高法院副院长。——360。
- 格格拉赫, 恩斯特·路德维希(Gerlach, Ernst Ludwig 1795—1877)——普鲁士法学家和政治家, 普鲁士保守党及其机关报《新普鲁士报》的创办人(1848)之一。——334。
- 格拉贝, 帕维尔·克里斯托福罗维奇(Граббе, Павел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1787—1875)——俄国军事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 曾参加镇压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和 1849 年沙皇军队对革命匈牙利的干涉。——311。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19 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 和 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 和 1892—1894)。——48、53、490—492、494。
- 格赖夫, 弗里德里希·威廉(Greif, Friedrich Wilhelm 约生于 1819 年)——普鲁士警官, 19 世纪 50 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108、110—111、402—408。
- 格赖纳, 泰奥多尔·路德维希(Greiner, Theodor Ludwig 约生于 1820 年)——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是普法尔茨临时政府成员;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移居美国。——162、173。

- 格兰维尔伯爵, 乔治·鲁森-高尔(Granville, George Leveson-Gower, Earl of 1815—1891)——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1851—1852、1870—1874 和 1880—1885)、殖民大臣(1868—1870 和 1886)、枢密院院长(1852—1854、1855—1858 和 1859—1865)。——51。
- 格朗吉约, 阿尔西德·皮埃尔(Grandguillot, Alcide-Pierre 1829—1891)——法国政论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9年起是《立宪主义者报》主编, 1863—1865年为《国家报》主编。——251、264、424。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贝尔纳·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Bernard-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 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52—1870); 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 50年代为《国家报》主编。——86、263、292。
- 格雷伯爵, 查理, 豪伊克子爵(Grey, Charles, Viscount Howick, Earl of 1764—1845)——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之一, 曾任海军首席大臣(1806), 外交大臣(1806—1807), 内阁首相(1830—1834)。——25。
- 格雷伯爵, 亨利·乔治(Grey, Henry George, Earl of 1802—1894)——英国国务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军务大臣(1835—1839)、陆军大臣兼殖民大臣(1846—1852); 查·格雷的儿子。——47—50、52。
- 格雷戈里一世(Gregorius I 540—604)——罗马教皇(590—604)。——424。
- 格雷戈里十六世(Gregor XVI 1765—1846)——罗马教皇(1831—1846)。——213。
- 格龙尼希(Grunich)——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9世纪50年代初流亡伦敦。——82。
- 格奈泽瑙伯爵,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特(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Graf Neithart von 1760—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 1825年起为元帅; 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 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和夏恩霍斯特等一起制订军事改革的原则, 1813—1814年和1815年是布吕歇尔军队的总参谋长。——215。
- 葛伊甸, 洛金·彼得洛维奇——见海登伯爵, 路德维希·西吉斯蒙德·文森特·古斯塔夫。
- 龚佩尔特, 爱德华(Gumpert, Edward 死于1893年)——德国医生, 在曼彻斯特行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3。
- 古特施米特(Guthschmidt)——普鲁士法官。——375、383—384。

H

- 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皇朝(1273—1806年,中有间断)、西班牙王朝(1516—1700)、奥地利皇朝(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1867—1918)。——218、219、269、343、364。
- 哈茨费尔特伯爵,马克西米利安(Hatzfeldt, Maximilien Graf von 1813—1859)——普鲁士外交官,1849年起任驻巴黎公使,1856年巴黎和会的参加者。——110、404。
- 哈菲兹(Hafis原名沙姆斯乌丁·穆罕默德·哈菲兹 Shams-ud-Din Muhammad Hafis 1325左右—1390)——波斯诗人,塔吉克人,波斯和塔吉克的文学巨匠。——95。
- 哈根,卡尔(Hagen, Karl 1810—1868)——德国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1836年起在海德堡任大学副教授,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5年起在伯尔尼任教授。——162、170。
- 哈吉,阿布杜-萨里姆(Hadji Abd Saleem)——在1859—1860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期间任摩洛哥的得土安驻军指挥官。——32。
- 哈克兰德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冯(Hackländer, Friedrich Wilhelm von 1816—1877)——德国作家。——260。
-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 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后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215、482。
- 哈里斯,爱德华·阿尔弗勒德·约翰(Harris, Edward Alfred John 1808—1888)——英国军官和外交官,驻伯尔尼代办(1858—1867)。——251、271—273。
-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主派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144。
- 哈森普夫卢格,汉斯·丹尼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Hassenpflug, Hans

- Daniel Ludwig Friedrich 1794 —1862)——德国法学家、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曾任黑森选帝侯国的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1832—1837)，首相(1850—1855)。——18。
- 哈特曼·冯·奥厄(Hartmann von Aue 约 1168—1210)——中世纪德国的抒情和叙事诗人。——261。
- 哈特曼,莫里茨(Hartmann, Moritz 1821—1872)——奥地利作家,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261。
- 哈瓦斯,奥古斯特(Havas, Auguste 1814—1889)——法国一家通讯社所有人之一。——367。
- 海登伯爵,路德维克·西吉斯蒙德·文森特·古斯塔夫(葛伊甸,洛金·彼得洛维奇)(Heiden [Heyden], Lodewijk Sigismund Vincent Gustaaf Graf van) [Гейден, Логин Петрович]1772—1850)——俄国海军上将,荷兰人,1827年指挥波罗的海舰队的分舰队,完成对地中海的远征,并参加了纳瓦里诺海战(1827);1828—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任俄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212。
- 海利奥加巴尔或埃拉加巴尔(Heliogabalus [Elagabalus] 204—222)——罗马皇帝(218—222)。——101、267。
- 海瑙男爵,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cob Freiherr von 1786—1853)——奥地利将军,1848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曾任总司令(1849),率领奥地利军队去镇压匈牙利革命。——312。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178、257、320、372。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莱比锡总汇报》记者,《莱茵报》撰稿人;1844年9月逃往布鲁塞尔,1854年春移居瑞士,1847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后为《先驱者》报的主编(1854—1879)。——317。
- 海泽,亨利希(Heise, Heinrich 1820—1860)——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大胡蜂》报出版者和编辑(1848—1850),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流亡英国。——182。
- 韩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Händel, Georg Friedrich 1685—1759)——德国作曲家。——25。
- 汉普敦,约翰(Hampdon, John 1594—164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反对专制独裁,革命斗争的参加者,在国内战争中牺牲。——229。
- 豪格,恩斯特(Haug [Haugh], Ernst)——奥地利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宇宙》的出版者和编辑。——146。
-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1849),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年10月在汉堡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捕者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1852年迁居巴西。——122、406。
- 赫伯特,悉尼,利男爵(Herbert, Sidney, Baron of Lea 1810—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41—1845),军务大臣(1845—1846和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1)。——516。
- 赫德森,詹姆斯(Hudson, James 1810—1885)——英国外交官,驻都灵公使(1851—1863)。——273、274。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7年流亡法国,1852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317。
- 赫尔曼, K. (Hermann, K.)——德国法学家,1859年是福格特对《总汇报》提出诉讼时的律师。——76、82、190、326。
- 赫弗尔,古斯塔夫(Hörfel, Gustav 生于1807年左右)——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0年起侨居巴黎,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法国警探。——145、146、159。
- 赫斯男爵,亨利希(Heß, Heinrich Freiherr von 1788—1870)——奥地利将军,后为元帅,曾参加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1854—1855年任匈牙利、加利西亚和多瑙河两公国奥军总司令,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马真塔会战失败后,统率奥军(1859年6—7月)。——443。
- 贺布,詹姆斯(Hope, James 1808—1881)——英国海军上将,1859—1860年曾率领远征舰队侵略中国。——52。
-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65—8)——罗马诗人,同奥古斯都关系甚密。——61、74、202、296、334。

- 黑弗纳尔,莱奥波德(Häfner, Leopold 生于 1820 年)——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145、146、159—160、265。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1。
-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卡尔(Hecker, Friedrich Franz Karl 1811—1881)——德国律师,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德国旁观者》的撰稿人和资助者(1847—1848);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侨居美国,1861—1865 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上校。——90、343。
- 黑克舍尔,马丁(Heckscher, Martin)——德国医生,在曼彻斯特行医,恩格斯的熟人。——183。
- 亨利,托马斯(Henry, Thomas 1807—1876)——英国伦敦治安法庭法官。——196、419、420。
- 洪堡男爵,亚历山大(Humboldt, Alexander Freiherr von 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91、240、252、259、333。
- 洪特(尔)(Huntel)——19 世纪 50 年代不来梅警察局长。——401。
- 惠特沃思,约瑟夫(Whitworth, Joseph 1803—1887)——英国厂主和军事发明家。——515—519。
- 霍夫曼(Hoffmann)——新闻工作者,波拿巴主义者。——292。
-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269、322、343、364。
- 霍林格尔(Hollinger)——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的妻子。——195、418。
- 霍林格尔,菲德利奥(Hollinger, Fidelio)——瑞士排字工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后为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曾承印《人民报》。——12、14、184、186、188、190—192、194—197、326、366、375、417—420、432、496。
- 霍斯曼,爱德华(Horsman, Edward 1807—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5—1857 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230。

J

- 基什,米克洛什(Kiss, Miklós 1820—1902)——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

- 巴黎,拉·科苏特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代理人,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300、305。
- 基谢廖夫伯爵,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Киселев, 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граф 1788—187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将军;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俄国行政当局首脑(1829—1834),枢密院农民问题委员会常务委员(1835),国家产业大臣(1837—1856);1837—1841年实行温和的改革;俄国驻巴黎大使(1856—1862)。——210、212。
-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86、136、353。
- 吉佩里希,约瑟夫(Gipperich, Joseph)——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0年起为普鲁士警探,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察局帮助下越狱逃跑,后流亡英国。——404。
- 吉斯公爵——见昂利第二(洛林的)。
- 济格尔,阿尔伯特(Sigel, Albert 1827—1884)——德国军官,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3年侨居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57—158。
- 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德国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和巴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流亡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6年起为纽约新闻工作者;阿·济格尔的哥哥。——157—158。
- 加富尔伯爵,卡米洛·本索(Cavour, Camillo Benso, conte di 1810—1861)——意大利国务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撒丁王国政府首脑(1852—1859和1860—1861),实行在萨瓦王朝霸权下“自上”统一意大利的政策,支持拿破仑第三的政策,1861年起任第一届意大利政府首脑。——106、256、273。
- 加格恩男爵,亨利希·威廉·奥古斯特(Gagern, Heinrich Wilhelm August, Frei-

- herr von 1799—1880)——德国政治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长,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内阁首相(1848年12月—1849年3月),1849年5月后为哥达派的领袖之一。——162、172、225。
- 加莱尔,阿尔伯·弗雷德里克·让(Galeer, Albert-Frédéric-Jean 1816—1851)——瑞士教师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1847年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日内瓦民主派领袖;瑞士“革命集中”的成员,格吕特利同盟的创建人。——79、316、317—318。
- 加莱尔,奥斯卡尔(Galeer, Oskar)——大学生,阿·加莱尔的兄弟。——79。
-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4—7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50—60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2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了远征;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和1866),在普法战争中站在法兰西共和国一边,70年代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6、65、308、467。
- 金克尔,哥特弗里德·约翰(Kinkel, 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在卡·叔尔茨帮助下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0—11、90、102、145、146、155—159、175、181、325、412—414。
- 金莱克,亚历山大·威廉(Kinglake, Alexander William 1809—1891)——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议会议员(1857—1868),自由党人。——245、288。
- 久洛伊,费伦茨,毛罗什-内迈特和纳达什卡伯爵(Gyulay [Giulay, Giulai], Ferenc Graf von Maros-Németh und Nádaska 1798—1868)——奥地利元帅,匈牙利人,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曾任陆军大臣(1849—1850),1859年意大利战争初期指挥奥地利军队,在马真塔战败。——442—443。
- 居维叶男爵,若尔日·莱奥波德·克雷蒂安·弗雷德里克·达哥贝尔特(Cuvier Georges-Léopold-Chrétien-Frédéric-Dagobert, baron de 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经将比较解剖学上升为科学,并提出了灾变论。——129。

K

- 卡贝,埃蒂耶纳(Cabet, Étienne 人称卡贝老爹 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0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理论。——147—148。
- 卡波·迪斯特里亚伯爵,乔瓦尼·安东尼奥(Capo d'Istria, Giovanni Antonio, Conte 1776—1831)——希腊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09—1822年在俄国供职,任外交副大臣(1815—1822),曾参加维也纳会议(1815);后任希腊总统(1827—1831),奉行亲俄政策,后被外国间谍刺杀。——212。
- 卡德龙·德拉巴卡,佩德罗(Calderón de la Barca, Pedro 1600—1681)——西班牙诗人和剧作家。——76、339。
- 卡尔利埃,皮埃尔·沙尔·约瑟夫(Carlier, Pierre-Charles-Joseph 1799—1858)——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108。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年5—6月),镇压巴黎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108、225。
- 卡拉姆津,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Карамз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俄国历史学家和作家,亚历山大一世的御用历史编纂学家。——209。
- 卡利奥斯特罗,亚历山大罗(Cagliostro, Alessandro 原名朱泽培·巴尔萨莫 Giuseppe Balsamo 1743—1795)——意大利冒险家、神秘主义者和大骗子;178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39。
- 卡罗伊伯爵夫人(Karolyi, Cráfin 1818—1903)——267。
- 卡蒙斯,路易斯(Camões, Luis Vaz de 1524左右—1580)——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牙诗人,史诗《卢兹之歌》的作者。——160。
- 卡斯尔雷——见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

- 卡斯泰拉(Castella)——瑞士政治家,激进主义者,1847—1856年是弗赖堡州政府成员。——105。
- 卡塔卡济,加甫里尔·安东诺维奇(Катакази, Гавриил Антонович 1794—1867)——俄国外交官,原系希腊人,驻希腊公使(1833—1843),参政官。——212。
-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Lucius Sergius Catilina 公元前108左右—62)——罗马政治家和统帅,贵族,反对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策划者。——113、123、255。
-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95),监察官(公元前184);《论农业》的作者。——331。
- 卡瓦利,乔万尼(Cavalli, Giovanni 1808—1879)——意大利军官,1860年起是将军;军事发明家。——508—509。
- 凯勒曼,弗朗索瓦·克里斯托夫(Kellermann, François-Christophe 1735—1820)——法国将军,1804年起为元帅,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后为正统主义者。——453。
- 凯伦,约翰·康拉德(Kern, Johann Conrad 1808—1888)——瑞士政治活动家、法学家和外交家;1849年是图尔高州政府首脑,联邦法院院长,曾任驻巴黎公使(1857—1883)。——106、250、273、275、317。
- 坎宁,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官,托利党领袖,议会议员;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和1822—1827)和首相(1827)。——49。
- 康巴塞雷斯,让·雅克·雷吉斯(Cambacères, Jean-Jacques-Regis, duc de 1753—1824)——法国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国民公会代表(1794—1795),吉伦特党人,拿破仑第一的亲近助手之一,《民法典》的编纂人之一。——276。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236。
- 康姆,弗里德里希(Kamm, Friedrich 1806左右—1867)——德国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1852年侨居美国;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主席(1857—1859)。——89—90、96、394。
- 康内吉塞尔,卡尔·路德维希(Kannegießer, Karl Ludwig 1781—1861)——德

国诗人和翻译家。——131、161。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俄国大公,海军元帅,1850年任国务会议委员、海军条令修改委员会主席和军械临时委员会主席,1852年任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853年任代理海军大臣,1855—1881年任海军大臣,1857年任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委员,1860年任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1862—1863年任波兰王国总督;尼古拉一世的次子。——13、187、224、416、431、476。

考莱伯爵,亨利·理查·查理·韦尔斯利(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巴黎大使(1852—1867)。——53、230、232、250、271、273、275。

考尼茨,温采尔·安东(Kaunitz, Wenzel Anton 1711—1794)——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所谓文明的专制制度的拥护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曾任首相(1753—1792)。——202。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53、54。

科恩海姆,麦克斯(Cohnheim, Max 约生于1820年)——德国店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8年为《新莱茵报》通讯员,1850年流亡伦敦,1851年迁居美国;国际会员,国际旧金山支部创建人。——78、81、82、103。

科尔布,古斯塔夫·爱德华(Kolb, Gustav Eduard 1798—1865)——德国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曾为大学生联合会会员,1824—1826年被监禁,1828年起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1837年起任主编。——189、496。

科尔恩,阿道夫(Korn, Adolf 1822—1904)——德国药剂师和化学技师,普鲁士军官(1845年以前),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瑞士,1857年迁居阿根廷。——78、80、81、103。

科拉切克,阿道夫(Kolatschek, Adolph 1821—1889)——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1850—1851)和《时代呼声》(1858—1862)两杂志的出版者,1862年创办《信使报》。——161、192、426。

科兰男爵,让·吉约姆·塞扎尔·亚历山大·伊波利特(Colins, Jean-Guillaume-

- César-Alexandre-Hippolyte, baron de 1783 —1859)——法国经济学家,原系比利时人;主张由国家征收地租,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矛盾。——36。
- 科勒特,查理·多布森(Collet, Charles Dobson 死于 1898 年)——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自由新闻》编辑(1859 —1865)。——13、188、189、194。
- 科洛雷多-梅尔茨和瓦尔德塞,温采尔·约瑟夫(Coloredo-Melz und Waldsee, Wenzel Joseph 1738 —1822)——奥地利将军,1808 年起为元帅,曾多次参加欧洲各国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战争。——469。
- 科斯塔·德·博雷加尔侯爵(Costa de Beauregard, marchese 1806 —1864)——意大利贵族,代表萨瓦出席撒丁议会的议员。——450。
-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ouis, Ludwig] 1802 —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 —1849 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 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1、218、237、267、296 —308、412、426、429。
- 克拉普卡,乔治(格奥尔格)(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 —1892)——匈牙利将军,1848 —1849 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1849 年 6 —9 月是科莫恩要塞司令;1849 年流亡国外;50 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1866 年普奥战争时期指挥普鲁士政府为参加这次战争而在西里西亚组织的匈牙利军团;曾一度任拿破仑·约·沙·保·波拿巴的秘书;1867 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267、276、277、296、302、305、307 —312。
- 克莱维尔,路易·弗朗索瓦(Clairville, Louis-François 1811 —1879)——法国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424。
- 克劳塞维茨,卡尔·菲利浦·哥特弗里德·冯(Clausewitz, Karl Phillip Gottfried von 1780 —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首次把辩证法应用于军事理论;参加普鲁士军队的改革;1812 —1814 年在俄军中供职;1818 —1830 年任普通陆军学校校长,1831 年任普鲁士元帅奥·泰·冯·格奈泽瑙伯爵的参谋长。——472。
- 克劳谢,乔治(Crawshay, George)——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新闻工作者,乌尔卡尔特的拥护者,《自由新闻》的撰稿人(1856 —1860)。——301、302。
- 克劳泽,奥古斯特(Krause, August)——德累斯顿鞋匠,因参与刺杀雪恩贝格伯爵夫人,1834 年同巴克霍夫和贝泽勒尔一起被判处死刑;卡尔·弗里德里

- 希·奥古斯特·克劳泽的父亲。——403。
- 克劳泽,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见弗略里, 查理。
- 克雷默——见舍尔瓦尔, 茹利安。
- 克路斯, 阿道夫(Club, Adolf 1825—1905)——德国工程师,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年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书记, 1848年流亡美国; 华盛顿海军部职员; 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 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 同魏德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 19世纪末成为著名的建筑师。——410。
- 克伦克(Klenk)——巴塞尔移民局代办。——396。
- 克洛蒂尔达, 萨瓦公主(Clothilde, Princesse de Savoie 1843—1911)——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的女儿, 1859年起为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的妻子。——293。
- 克罗伊策, 康拉丁(Kreutzer, Konradin 1780—1849)——德国作曲家和乐队指挥。——328。
- 克洛斯曼, A. 冯(Clossmann [Klosmann], A. von 死于1871)——德国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侨居瑞士, 从事新闻活动。——265。
- 克吕登纳, 巴巴拉·尤莉娅男爵夫人(Krüdener, Barbara Juliane Baronin von 1766—1824)——俄国女作家, 虔诚主义者; 19世纪时误传建立神圣同盟的主张是她提出的。——205。
- 克吕登纳, 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Крюденер, Павел Алексеевич 死于1858)——曾任驻华盛顿和伯尔尼的俄国公使(1837—1858)。——395。
- 库贝什(Kubesch)——奥地利警官。——401。
- 库尔西德帕沙——见盖昂, 理查·德博弗尔。
- 库扎, 亚历山大鲁·约翰(Cuza [Kusa], Alexandru Ion 1820—1873)——罗马尼亚政治活动家, 1859—1866年为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于1862年成立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共和国)的国君, 称亚历山大·约翰一世; 由于反动派的阴谋, 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209、211、233、237。

L

- 拉德茨基伯爵, 约瑟夫·温采尔(Radetzky, Joseph Wenzel Graf 1766—1858)——奥地利陆军元帅, 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司令, 1848—1849

- 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1850—1856)——203、442。
- 拉德马赫, 约翰·哥特弗里德(Rademacher, Johann Gottfried 1772—1849)——德国医生, 以与众不同的疾病治疗分类法而闻名。——82。
- 拉登多夫, 奥古斯特·约翰·弗里德里希(Ladendorf [Ladendorff], August Johann Friedrich 生于1816年左右)——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4年曾被诬控犯有进行阴谋活动的罪行而被判5年徒刑。——121—122、408。
- 拉多维茨, 约瑟夫·玛丽·恩斯特·克里斯蒂安·威廉·冯(Radowitz, Joseph Maria Ernst Christian Wilhelm von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匈牙利人, 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极右派。——339、341。
- 拉斐德侯爵, 玛丽·约瑟夫·保尔·罗什·伊夫·吉尔贝·莫蒂埃(Lafayette, Marie-Joseph-Paul-Roch-Yves-Gilbert Motier, marquis de 1757—1834)——法国将军,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在任国民自卫军长官时(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 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 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工具, 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 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153。
- 拉盖罗尼埃子爵, 路易·埃蒂耶纳·阿尔图尔·迪布勒伊-埃利永(La Guéronnière, Louis-Étienne-Arthur Dubreuil-Héliou, vicomte de 1816—1875)——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50年代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国家报·帝国报》主编(1850年起)。——176、205、258、263、287—289、292。
- 拉科西, 费伦茨(弗兰茨)(Rákóczi, Ferencz [Franz] 1676—1735)——18世纪初匈牙利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309。
- 拉马丁, 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领袖; 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 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287。
- 拉尼克尔(Ranickel)——德国手工业者, 职业是装订工,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89—91、96、107、117、133—135、182—185、271、284、286、339、394。
- 拉品斯基, 泰奥菲尔(Łapiński, Teofil 1827—1886)——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

- 家,流亡者,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改名帖泰菲克贝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西亚同俄国作战(1857—1858);1863年率领远征军援助波兰起义;写有关于高加索历史的著作。——218、296、297、303、309—312。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此后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333、336、406。
- 拉斯拜尔,弗朗索瓦·万桑(Raspail, François-Vincent 1794—1878)——法国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和政论家,社会主义者,《人民之友》的出版者,靠近革命无产阶级;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年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6年徒刑,后流亡比利时;1870—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夜属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反对派,后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125。
- 拉沃,弗兰茨(Raveaux, Franz 1810—1851)——德国烟草商,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1849),属于中间派左翼;驻瑞士的帝国专员,1849年6月是帝国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成员,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342。
- 莱昂伯爵夫人(莱伯爵夫人)(Lehon [Gräfin L.], comtesse de)——比利时驻巴黎公使沙·艾·约·莱昂伯爵的妻子,30—50年代随丈夫住在巴黎,同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系。——85。
- 莱奥尼达斯(Leonidas 公元前508左右—480)——斯巴达国王(公元前488—480),在温泉关保卫战中阵亡。——284。
- 莱奥塔尔,茹尔(Léotard, Jules 1830—1870)——法国马戏演员。——424。
- 莱蒂,阿尔芒·弗朗索瓦(Laity, Armand-François 1812—1889)——法国军官和政治家,路易·波拿巴策划的斯特拉斯堡叛乱的参加者(1836),1857年起为参议员。——101、279。
- 莱维,约瑟夫·莫泽斯(Lévy, Joseph Moses 1812—1888)——英国新闻工作者,《每日电讯》的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329—335、338、346。
- 莱亚,莱昂(Laya, Léon 1811—1872)——法国剧作家。——117。
- 莱茵兰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heinländer, Georg Friedrich)——德国商人,巴黎流亡者同盟盟员,后侨居伦敦。——114、313、315。

- 赖德律(赖德律-罗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 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 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49), 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 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 1869年回到法国。——226。
- 赖纳赫, 阿尔诺德(Reinach, Arnold 1820左右—1870)——德国商人,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流亡瑞士, 卡尔·福格特的朋友。——184, 395。
- 赖沙特, 约瑟夫·马丁(Reichardt, Joseph Martin 1803—1872)——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翼; 1849年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成员, 1849年五月起义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 后流亡美国。——344。
- 赖辛巴赫伯爵, 奥斯卡(Reichenbach, Oskar Graf von 生于1815年)——德国西里西亚地主;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1850年起侨居英国, 后迁居美国。——413。
- 赖辛巴赫, 格奥尔格·冯(Reichenbach, Georg von 1772—1826)——巴伐利亚军官和军事发明家。——507。
- 朗根施瓦茨, 马克西米利安(Langenschwarz, Maximilien 约生于1806年)——德国商人、即兴诗人, 曾试图创立科学的即兴诗理论 1849年被驱逐出德国, 后流亡伦敦; 马克思揭发他是普鲁士警探。——308。
- 朗金, 卡西乌斯(Longinus (Longin), Cassius 213左右—273)——希腊哲学家, 新柏拉图主义者。——184。
- 勒库尔布, 克劳德·约瑟夫(Lecourbe, Claude-Joseph 1759—1815)——法国将军, 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458。
- 勒宁——见勒文塔尔, 察哈里亚斯。
- 勒文塔尔, 察哈里亚斯(Löwenthal, Zacharias 1857年起更名为卡尔·弗里德里希·勒宁 Carl Friedrich Loening 1810—1884)——德国出版商,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吕滕-勒宁出版公司创办人(1844)和所有人之一。——186, 262, 263。
- 勒泽尔, 彼得·格尔哈德(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雪茄烟工人; 1848—1849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副主席,《自由、博爱、劳动》的发行人; 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主席,

-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6年徒刑;后来成为拉萨尔派。——406。
- 雷,泰奥多尔(Reh, Theodor 1801—1868)——德国律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曾任该议会的最后一任议长(1849)。——169—170。
- 雷茨(Redz)——在伦敦的奥地利侨民。——147。
- 雷缪扎伯爵,沙尔·弗朗索瓦·玛丽(Rémusat, Charles-François-Marie, comte de 1797—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71—1873)。——109—110。
- 雷辛,皮埃尔(Raisin, Pierre 1820—1870)——瑞士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大会议员。——393—394。
-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艾曼纽埃尔·迪普莱西(Richelieu, Armand-Emmanuel du Plessis, duc de 1766—1822)——法国国务活动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流亡俄国,1813年回到法国,曾任内阁首相兼外交大臣(1815—1818和1820—1821)。——211。
-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迪普莱西(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法国国务活动家和神学家,红衣主教。——6。
-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329。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i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79、102—105、176—177、181—184、186—187、189—190、192—193、195—196、198、326、334、350、352、357、363、366、376—378、381、407、408、417—418、420。
- 里奥斯,迭戈·德洛斯(Rios, Diego de Los)——西班牙将军,在1859—1860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期间历任师长和军长。——44、499、501。
- 里戈尔博谢——见巴德尔,玛格丽特。

- 里瑟尔,加布里埃尔(Riesser, Gabriel 1806—1863)——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犹太人,维护犹太人的平等权利,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最初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9月起为中间派左翼。——172。
- 里士满公爵,查理·伦诺克斯(Richmond, Charles Lennox, Duke of 1735—1806)——英国政治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25。
- 利珀伯爵,莱奥波特(Lippe, Leopold Graf zur 1815—1889)——普鲁士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1860年为柏林检察官,后任司法大臣(1862—1867)。——358。
- 利梅拉克,保兰(Limayrac, Paulin 1817—1868)——法国新闻工作者,波拿巴主义者,曾为《祖国报》和《国家报》撰稿,1861—1868年为《立宪主义者报》主编。——424。
- 利希诺夫斯基公爵,费利克斯·玛丽(Lichnowski [Lychnowsky], Felix Maria Fürst von 1814—1848)——西里西亚大地主,普鲁士军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8年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与汉·阿·埃·奥尔斯瓦尔德一起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诗《阿塔·特洛尔》和维尔特的著作《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中一个讽刺人物的原型。——146、164、339、341。
-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1847—1848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353、422。
- 林德赫斯特男爵,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Lyndhurst, John Singleton Copley, Baron 1772—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大法官(1827—1830、1834—1835和1841—1846)。——202。
- 林格斯,L. 韦尔纳(Rings, L. Wern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流亡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407。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0、146、157—158、160、405。
-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317。

- 鲁埃,欧仁(Rouher, Eugène 1814—1884)——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49),1849—1852年曾断续地担任司法部长和司法大臣;第二帝国时期任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55—1863)、国务大臣(1863—1869)、参议院议长(1869—1870);第二帝国崩溃后逃离法国;70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领袖之一。——53。
- 鲁库鲁斯(鲁齐乌斯·李奇尼乌斯·鲁库鲁斯)(Lucius Licinius Lucullus 约公元前106—57年)——罗马统帅,曾任执政官,以家产富有和举行豪华宴会而闻名。——276。
- 路透,保罗·尤利乌斯(Reuter, Paul Julius 1816—1899)——伦敦路透通讯社的创办人(1851)。——367。
- 路西德帕沙,穆斯塔法·穆罕默德(Reshid Pasha, Mastafa Mehemed 1802—1858)——土耳其国务活动家,曾任总理大臣(1846—1852和1856—1857),外交大臣(1853年5月—1855年5月)。——219、301。
- 路易三世(Louis III 863—882左右)——西法兰克国王(879年起),881年在索库尔击败诺曼人,所谓的《路易之歌》就是歌颂他的。——225、233。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201、309。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86、221。
-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211。
- 路易-菲利浦一世(路易-菲利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109、207、215、229、236、249—251、271、316、336。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律斯勒,古斯塔夫·阿道夫(Roesler [Rösler], Gustav Adolf 1818—1855)——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1850年起侨居美国。——159。
- 罗昂伯爵,阿尔布雷希特·泰奥多尔·埃米尔(Roon, Albrecht Theodor Emil Graf von 1803—1879)——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1873年起为元帅,普鲁士军阀代表人物之一,陆军大臣(1859—1873)和海军大臣(1861—1871),曾改编普鲁士军队,普鲁士首相(1873年1—11月)。——340。
- 罗伯斯比尔,奥古斯坦(Robespierre, Augustin 1763—1794)——18世纪末法国

- 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之一,法学家,国民公会代表,雅各宾党人;马·罗伯斯比尔的弟弟。——469。
-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 Charles-Latour 1800—1885)——比利时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自由党人;1847—1852年任内务大臣。——353。
- 罗森布卢姆,爱德华(Rosenblum, Eduard)——德国大学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78、79、81、82、103。
- 罗斯(Roos)——瑞士皮毛商。——185。
- 罗斯·德·奥兰诺,安东尼奥,阿尔米诺伯爵(Ros de Olano, Antonio, conde de Almino 1808—1886)——西班牙将军、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温和派,1854—1856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在1859—1860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任军长。——42。
-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64、251、273、275。
- 罗泰克,卡尔·文策斯劳斯·罗代克·冯(Rotteck, Karl Wenzeslaus Rodecker von 1775—184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250、255。
- 罗伊特,麦克斯(Reuter, Max)——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探。——403。
- 洛默尔,格奥尔格(Lommel, Georg)——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瑞士;曾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搜集资料。——123、127。
- 洛伊希滕贝格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欧仁·约瑟夫·拿破仑(Leuchtenberg, Maximilien-Eugène-Joseph-Napoléon, duc de 1817—1852)——欧仁·博阿尔奈的儿子,1839年与尼古拉一世的女儿结婚。——213。

M

- 马丁(Martin)——法国新闻工作者,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报》撰稿人。——264。
- 马里耶,埃蒂耶纳(Marilley, Étienne 1804—1889)——弗赖堡主教(1846—

- 1879), 弗赖堡 1848 年 10 月 24 日反民主暴乱的煽动者。——319。
- 马茂德二世 (Mahmud II 1785 — 1839)——土耳其苏丹 (1808 — 1839)。——211。
- 马姆兹伯里伯爵, 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Earl of 1807 — 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保守党人, 曾任外交大臣 (1852 和 1858 — 1859), 掌玺大臣 (1866 — 1868 和 1874 — 1876)。——201、252 — 254、271。
- 马尼利乌斯·布鲁土斯 (Manilius Brutus)——罗马法学家。——386。
- 马塞纳, 安德烈 (Masséna, André 1756 — 1817)——法国将军, 1804 年起为元帅, 拿破仑第一的多次远征的参加者, 1814 年倒向波旁王朝方面。——469。
- 马松, 奥古斯特·米歇尔·贝努瓦 (Masson, Auguste - Michel - Benoit 1800 — 1883)——法国作家。——227。
-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 — 1872)——意大利革命家, 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意大利 1848 — 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 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1853 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50 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1864 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 1871 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 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7、212、224、256、257、300、301、305、317。
- 玛丽-泰莉莎 (Maria Theresia 1717 — 1780)——奥地利女大公,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 (1740 — 1780);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女皇 (1745 — 1780)。——306。
- 迈尔 (Mayer)——19 世纪 50 年代瑞士建筑学家。——315。
- 迈尔, 卡尔 (Mayer, Karl 1819 — 1889)——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 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1863 年返回德国, 60 年代为德国人民党领导成员, 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185、283 — 284。
- 麦克马洪伯爵, 玛丽·埃德姆·帕特里斯·莫里斯, 马真塔公爵 (Mac 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comte de, duc de Magenta 1808 — 1893)——法国军官和政治活动家, 1859 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 后任夏龙军团司令, 阿尔及利亚总督 (1864 — 1870), 凡尔赛军队总司令 (1871), 第三共和国总统 (1873 — 1879)。——443。

- 麦克亚当, 约翰(McAdam [MacAdam], John)——英国新闻工作者。——308。
- 曼托伊费尔男爵, 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 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 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 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1866年入选第一议院; 埃·汉·卡·曼托伊费尔的哥哥。——18、322、324、345、355。
- 梅利奈, 弗朗索瓦(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比利时将军, 法国人, 1830年比利时资产阶级革命和比利时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名誉主席, 里斯孔图案件的被告之一, 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30年徒刑; 1849年9月被赦免。——353。
- 梅斯特尔, 克萨维埃·德(Maistre, Xavier de 1763—1852)——法国作家, 将军;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流亡俄国。——335。
-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 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202、218。
- 梅因, 爱德华(Meyen, 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自由人”小组成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柏林改革报》编辑(1861—1863); 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9—12、157、324—325、327—328、405、498。
- 门罗, 詹姆斯(Monroe, James 1758—1831)——美国国务活动家, 共和党人, 曾任美国总统(1817—1825); 1823年发表阐明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 后称门罗主义。——211。
- 蒙塔朗贝尔伯爵, 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1810—187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 奥尔良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 天主教党的首脑;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 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 1852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229。
- 孟德斯鸠-费森萨克, 安娜·皮埃尔(Montesquieu-Fezensac, Anne-Pierre 1739—1798)——法国将军和政治家, 正统主义者, 1792年参加征服萨瓦。——453。
- 弥勒, 格奥尔格(Müller, Georg)——在伦敦的德国侨民; 1860年为伦敦德意志

- 工人教育协会主席。——354。
- 米格尔, 马里亚·埃瓦里斯托 (Miguel, Maria Evaristo 1802—1866)——葡萄牙执政者(1826—1828), 葡萄牙国王(1828—1834)。——49, 211。
- 米涅, 克劳德·埃蒂耶纳 (Mini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 米涅式步枪发明者。——62。
- 米切尔 (Mitchell)——英国驻广州代办。——21—23。
- 米斯科夫斯基, 亨利克·路德维克 (Miskowsky, Henrik Ludvic 1814 左右—1854)——波兰军官,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后来先后迁居德国和英国。——142, 143。
- 明希豪森男爵, 卡尔·弗里德里希·哲罗姆 (Münchhausen, Karl Friedrich Hieronymus Freiherr von 1720—1797)——德国乡绅, 以擅讲故事闻名。——406。
- 缪尔纳, 阿曼杜斯·哥特弗里德·阿道夫 (Müllner, Amandus Gottfried Adolf 1774—1829)——德国作家、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写有一些宣扬宿命论思想的悲剧。——184。
- 摩莱伯爵, 路易·马蒂厄 (Molé, Louis-Mathieu, comte 1781—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曾任首相(1836—1839),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 秩序党领导人。——215。
- 莫尔, 约瑟夫 (Moll, Joseph 1813—184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钟表匠; 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年7—9月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主席,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 不久改名回到德国, 在各地进行宣传鼓动;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在穆尔格河战役中牺牲。——137。
- 莫尔尼公爵, 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 (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duc de 1811—1865)——法国政治家,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 1851年十二月十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 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 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长(1854—1856和1857—1865), 驻俄国大使(1856—1857); 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85, 231。
- 莫帕, 沙勒曼涅·埃米尔·德 (Maupas, Charlemagne-Émile de 1818—1888)——法国律师, 波拿巴主义者, 巴黎警察局长(1851), 1851年十二月二

- 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第二帝国时期为警务大臣(1852—1853)。——404。
- 穆罕默德(Muhammad 570左右—632)——伊斯兰教创始人。——90、345。
- 穆莱·阿巴斯(Muley-Abbas死于1885)——摩洛哥亲王,在1859—1860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任摩洛哥军队总司令。——32。
- 穆西乌斯·赛沃拉(Mucius Scaevola)——罗马法学家。——386。

N

-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86、153、157、202、205、211、217、228、231、234—237、259、266—268、380、456、457、467—469、477、482、505。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5、6、7、8、10、11、16、26、27、35—39、47、48、53、56—57、64、67、75、82—87、157、172、200、201、205、207—208、220、224—241、243—259、262、265—274、278、280、282—286、304—305、307—309、312、315、328、336、415、423、425、426、429、439、441、444、446、450、461、467、473、474、477、480—482、486、507。
- 纳皮尔,查理(Napier, Charles 1786—1860)——英国海军上将,曾参加葡萄牙战争(1810—1834)和叙利亚战争(1840),1854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201。
- 奈,米歇尔,埃尔兴根公爵,莫斯科亲王(Ney, Michel, duc d'Elchingen, prince de la Moscova 1769—1815)——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89。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206、208、210—214、217、311、479、483、484。
- 纽金特——见舍尔瓦尔,茹利安。
- 纽金特(Nugent)——茹利安·舍尔瓦尔所谓的妻子,英国人。——116、117。
-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法因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 Clinton, Duke of 1811—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6),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陆军大臣(1854—1855),殖民大臣(1859—1864)。——49—51。

努根特伯爵,拉瓦尔(Nugent, Laval Graf von 1777—1862)——奥地利元帅,曾参加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1859 年奥意法战争的参加者。——442。

O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47。

P

帕庇尼亚努斯,埃米利乌斯(Papinianus, Aemilius 140 左右—212)——罗马法学家,奴隶占有制度的坚决保护者。——386。

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法国警官。——288、292。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1865)。——10、26、47—48、50—51、54、180、181、202、203、211、229—231、247、254、282、298、330、414、491。

佩德罗一世,唐·佩德罗(Pedro I, Don Pedro 1798—1834)——巴西皇帝(1822—1831),葡萄牙国王,称佩德罗四世(1826),后把葡萄牙王位让给自己的女儿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49。

佩尔采尔,莫尔(Perczel, Mór 1811—1899)——匈牙利政治家和将军,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 年流亡英国。——219、307。

佩尔采尔,莫里茨——见佩尔采尔,莫尔。

佩尔西尼伯爵,让·日尔贝尔·维克多·菲阿兰(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Fialin, comte 1808—1872)——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 和 1860—1863),驻伦敦大使(1855—1858 和 1859—1860)。——248。

佩里埃,约翰(Perrier, John)——瑞士政治家,激进主义者,大会议员(1852 和 1856—1860),法济的拥护者。——275—279。

- 佩利西埃,阿马布勒·让·雅克,马拉霍夫公爵(Pélessier, Aimable-Jean-Jacques, duc de Malakoff 1794—1864)——法国将军,1855年起为元帅,30—50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克里木战争期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5年5月—1856年7月),因攻克马拉霍夫岗而受封为马拉霍夫公爵;曾任驻伦敦大使(1858);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任南锡监视军指挥官,186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62,229。
- 佩泰坦,昂塞尔姆(Petétin, Anselme 1807—1873)——法国政论家,初为共和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萨瓦省长(1860—1861)。——271。
- 皮埃特里,皮埃尔·玛丽(Piétri, Pierre-Marie 1809—1864)——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巴黎警察局长(1852—1858)。——100。
-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12。
-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25,49,112,202。
- 皮亚,让·皮埃尔(Piat, Jean-Pierre 1774—1862)——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十二月十日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83。
- 平达,彼得——见沃尔科特,约翰。
- 蒲柏,亚历山大(Pope, Alexander 1688—1744)——英国诗人,启蒙运动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322,338。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49,229。
- 璞鼎查,亨利(Pottinger, Henry 1789—1856)——英国外交官和将军,1841—1842年任驻华公使,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军司令,1843年任香港总督,1847—1854年任马德拉斯总督。——21。
- 普尔斯基,费伦茨·冯(Pulszky [Pulsky], Ferenc von 1814—1897)——匈牙利政治家、作家和考古学家;波兰人,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人,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

- 牙利,议会议员(1867—1876和1884—1897)。——308。
- 普富尔,恩斯特·亨利希·阿道夫·冯(Pfuel, Ernst Heinrich Adolf von 1779—1866)——普鲁士将军,反动军阀的代表人物之一;1848年3月任柏林卫戍司令,4—5月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1848年9—10月任首相兼陆军大臣。——345。
- 普劳图斯(梯特·马齐乌斯·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 公元前254左右—184)——古罗马诗人,喜剧作家。——175、397。
- 普里姆-普拉茨,胡安,雷乌斯伯爵(Prim y Prats, Juan, conde de Reus 1814—1870)——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派领袖之一,曾参加1834—1843和1854—185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1843—1844年镇压共和派和进步派左翼发起的卡泰罗尼亚起义,在1859—1860年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中任师长,后任军长。——29、41、42—43、45。
- 普隆-普隆——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 普吕米克,J.C.(Plümicke, J.C.)——德国军官,《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一书的作者。——119。

Q

- 齐茨,弗兰茨·亨利希(Zitz, Franz, Heinrich 1803—1877)——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预备议会议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59。
- 奇尔讷,赛米尔·埃尔德曼(Tzschirner, Samuel Erdmann 1812—1870)——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萨克森议会中极左派领袖,1849年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萨克森临时政府成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革命集中”的创建人和主席,后迁居英国,1853—1863年侨居美国。——154。
- 戚美尔曼,恩斯特·威廉·爱德华(Zimmermann, Ernst Wilhelm Eduard 1807—1878)——德国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1—1843年出版的《伟大农民战争通史》的作者。——165、172。
-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49。
- 乔治四世(George IV 1762—1830)——英国摄政王(1811—1820),英国国王(1820—1830)。——49。

切尔西子爵(Chelsea, Viscount)——英国外交官,驻巴黎大使馆秘书(1859)。——232。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英国律师、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宪章派领袖,《北极星报》编辑,《寄语人民》和《人民报》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180、354、422。

R

日拉(Girard)——瑞士警察官。——392、394。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50—1851),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287。

日拉丹,德尔芬娜·德(Girardin, Delphine de 1804—1855)——法国女作家,埃·德·日拉丹的妻子。——86。

日罗姆·拿破仑——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德国陪审员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1848年为普鲁士制宪会议员,属于左派,后为民族自由党人。——344。

茹尔当,路易(Jourdan, Louis 1810—1881)——法国政论家,圣西门学说的拥护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849年起为《世纪报》编辑。——264、285、292。

若特兰,吕西安·莱奥波德(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治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1847—1848);《社会辩论报》编辑。——353、421。

S

萨瓦拉-德拉普恩特,胡安(Zabala y de la Puente, Juan 1804—1879)——西班牙将军,温和派;1854—1856年西班牙革命的参加者。——29、42。

萨宗诺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Саз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俄国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40年代初流亡国外,为各种杂志和

- 报纸撰稿,《改革报》编辑。——92、93。
- 塞弗尔帕沙(塞弗尔贝伊)(Sefer Pasha [Sefer-Bey], Zan Oglu 1795 —1859)——切尔克西亚王公;听命于土耳其,曾参加俄土战争(1826—1828);1855—1859年领导高加索山民同俄国作战。——303。
- 塞律里埃,让·马蒂约·菲利贝尔(Sérurier, Jean-Matthieu-Philibert 1742—1819)——法国将军,1804年起为元帅,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征。——469。
- 赛普尔斯,威廉(Cyple, William 1831—1882)——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乌尔卡尔特分子,1856年任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出版者之一。——414。
-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巴黎,1865年回到匈牙利。——93、218、309、429。
- 森劳,奥古斯特(Semrau, August 1816—1893)——德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323。
- 沙贝利茨,雅科布·卢卡斯(Schabelitz, Jacob Lucas 1827—1899)——瑞士出版商和书商,1846年10月—1848年5月为《德意志—伦敦报》编辑。1846年起为民主派七弟协会会员,1848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40年代末—50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雅·克·沙贝利茨的儿子。——111、120。
- 沙法里克,帕维尔·约瑟夫(Šafárik, Pavel Josef 1795—1861)——斯洛伐克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自由派代表人物。——222。
- 沙勒,茹利安(Schaller, Julien 1807—1871)——瑞士国务活动家,弗赖堡州政府首脑(1848—1856)。——105。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新莱茵报》撰稿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102、138、143、356、403。

沙特莱, C. (Châtelet, C.)——法国新闻工作者。——424。

沙伊伯勒, 卡尔·亨利希(Schaible, Karl Heinrich 1824—1899)——德国医生和作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英国。——196—198、294、357、364、376。

莎士比亚, 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84、88、91、97—99、108、113、180、193、268、331、362。

绍恩海默(Sauernheimer)——德国制刷匠, 19世纪50年代初流亡瑞士, 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主席。——89—90、96。

舍尔瓦尔, 茹利安(Cherval, Julien 原名约瑟夫·克雷默 Joseph Crämer)——普鲁士警探和奸细, 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曾领导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 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 在警察局的帮助下越狱逃跑, 1853—1854年化名纽金特在瑞士进行密探活动。——95、108—118、161、182、255、350、351、356、369—371、378、381、400、404—406。

舍伐利埃, 米歇尔(Chevalier, Michel 1806—1879)——法国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 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者。——53。

圣西门, 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47。

施拉姆, 康拉德(Schramm, Conrad 1822—1858)——德国新闻工作者,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48年11月起为《基尔民主周报》出版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年起流亡伦敦, 后侨居泽稷岛,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2—1857年侨居美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41—144、378。

施莱安(Schlehan)——德国新闻工作者。——323。

施莱尼茨, 亚历山大(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普鲁士国务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1848年6月、1849—1850和1858—1861)。——335。

施勒弗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Schlöffel, Friedrich Wilhelm 1800—1870)——西里西亚的厂主, 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流亡瑞士, 之后又流亡美国。——170。

- 施勒弗尔, 古斯塔夫·阿道夫(Schlöffel, Gustav Adolf 1828—1849)——德国大学生和政论家, 革命民主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1848年三月革命后在柏林出版《人民之友》杂志, 接受工人的要求, 因而被判处要塞监禁; 1849年曾一度任《新莱茵报》通讯员; 匈牙利自由斗争和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1849年6月21日在瓦格霍伊瑟尔附近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弗·威·施勒弗尔的儿子。——167。
- 施利克曼, 冯(Schlieckmann [Schlickmann], von)——普鲁士法官。——388、391。
- 施梅林, 安东(Schmerling, Anton 1805—1893)——奥地利国务活动家, 自由党人;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 1848年任帝国内务大臣(7—9月), 首相兼外交大臣(9—12月); 首相兼内务大臣(1860—1865)。——342。
- 施奈德第二, 卡尔(Schneider II, Karl)——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8年是科隆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案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人; 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 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 后脱离政治活动。——110、352、356。
- 施塔耳, 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Stahl, Friedrich Julius 1802—1861)——普鲁士法哲学家和政治家, 1840年为柏林大学法哲学和国家法教授, 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334。
- 施泰歇, H.C.(Stecher, H.C.)——巴登中学校长,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逃离德国; 从事石印工作。——116、117、400、401。
- 施泰因, 马克西米利安(Stein, Maximilian 1811—1860)——奥地利军官, 匈牙利 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任革命军参谋长;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改名费尔哈德帕沙; 曾在切尔克西亚同俄国作战(1857—1858)。——304。
- 施泰因, 尤利乌斯(Stein, Julius 1813—1889)——德国教师和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年是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 50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 1862年起是《布雷斯劳报》编辑。——323—324。
- 施坦普弗利, 雅科布(Stämpfli, Jakob 1820—1879)——瑞士国务活动家, 激进主义者; 1846—1850年为伯尔尼州政府成员, 实行新征税制度; 40—50年代

- 是《伯尔尼报》编辑；瑞士联邦主席(1856、1859和1862)。——272、282。
- 施特芬, 威廉·卡尔(Steffen, Wilhelm Karl)——普鲁士军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 1853年流亡英国, 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 1858年迁居美国。——145。
- 施滕策尔, 古斯塔夫·阿道夫(Stenzel, Gustav Adolf 1792—1854)——德国历史学家, 自由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169。
- 施梯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 同维尔穆特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 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10、104、109—111、120、381、401、403—404、406—410。
- 施瓦尔岑堡公爵, 费利克斯·路德维希·约翰·弗里德里希(Schwarzenberg, Felix Ludwig Johann Friedrich Fürst zu 1800—1852)——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被镇压后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11月—1852年)。——18。
- 施瓦尔克(Schwarck)——普鲁士王国上诉法院检察长(1860)。——358。
- 叔尔茨, 卡尔(Schurz, Carl 1829—1906)——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加入秘密组织“革命集中”; 1852年迁居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美国共和党领袖之一, 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 后为参议员和内政部长(1877—1881)。——145、147、157、159。
- 舒尔采(Schulze)——普鲁士法官。——375、383—384。
- 舒瓦洛夫伯爵, 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Шувалов, Павел Андреевич, граф 1830—1908)——俄国国务活动家, 外交官和将军, 克里木战争参加者(1853—1856); 驻柏林大使(1885—1894), 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将军衔侍卫长。——481。
- 司徒卢威, 阿马利亚·冯(Struve, Amalie von 父姓杜扎尔 Düsar 死于1862年)——德国小说家和回忆录作家, 1848—1849年德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古·司徒卢威的妻子。——317。
-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冯(Struve, Gustav von 1805—1870)——德国律师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共和主义者; 1847—1848年是《德国旁观者》的出版者; 预备议会议员; 1848年四月和九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

- 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2年返回德国。——82、103、105、317。
- 斯坦伯里(Stanbury)——英国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405。
- 斯特恩，劳伦斯(Sterne, Laurence 1713—1768)——英国作家，感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332。
- 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Stewart, Henry Robert, Viscount Castlereagh 1769—182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殖民和陆军大臣(1805—1806和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英国政府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202、482。
- 苏，欧仁(Sue, Eugène 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403。
- 苏拉(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 公元前138—78)——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曾为执政官(公元前88)和独裁者(公元前82—79)。——52。
- 苏路克，法斯廷(Soulouque, Faustin 1782左右—1867)——海地共和国总统(1847—1849)，1849年自立为帝，称法斯廷一世。——86。
- 索菲娅(Sophie 1805—1872)——奥地利大公妃，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母亲。——329。
- 索绪尔，泰奥多尔·德(Saussure, Théodore de 1824—1903)——瑞士国务活动家、作家和艺术家，贵族反对派的首领；大会议员(1854—1856和1858—1872)。——278。

T

- 塔克尔，E.(Tucker, E.)——英国出版商。——181。
- 塔米西埃，弗朗索瓦·洛朗·阿尔丰斯(Tamisier, François-Lauran-Alphonse 1809—1880)——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军事发明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870年9—11月)，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510。
-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227、377、396。

- 泰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Techow, Gustav Adolph 1813—1893)——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柏林攻占军械库的参加者, 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1849),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成为在瑞士的流亡者组织“革命集中”的领导人之一; 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132—135、141—160、327、350、374、378、380、384。
- 泰列基伯爵, 拉斯洛(Teleki [Teleky], László, Graf 1811—1861)——匈牙利政治家和作家,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匈牙利共和国驻法国代表, 革命失败后仍留在法国, 匈牙利议会议员。——305。
- 泰梅, 约多库斯·多纳图斯·胡贝尔图斯(Temme, Jodokus Donatus Hubertus 1798—1881)——德国法学家和作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后为进步党人。——345。
- 唐尼采蒂, 加埃塔诺(Donizetti, Gaetano 1797—1848)——意大利作曲家。——135。
- 陶森瑙, 卡尔(Tausenau, Karl 1808—187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代表, 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首脑; 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后侨居美国。——158。
- 特雷伊·德·博利厄男爵, 安东·埃克托尔·泰泽(Treuille de Beaulieu, Antoine - Hector Thésée, baron 1809—1886)——法国将军和军事发明家。——510。
- 特罗格, 约翰(Trog, Johann 1807—1867)——瑞士国务活动家, 国民院议员(1848—1857), 联邦法院法官(1852—1856)。——317、393、398。
- 图尔特, 阿伯拉罕·路易(Tourte, Abraham Louis 1818—1863)——瑞士政治家和外交官; 驻都灵公使(1860)。——105—106、276、320、393—395。
- 图姆(Thum)——日内瓦鞋匠, 日内瓦工人协会会员。——134。
- 图沃奈尔, 爱德华·安东(Thouvenel, Édouard-Antoine 1818—1866)——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波拿巴主义者, 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5—1860), 外交大臣(1860—1862)。——250、273—276。

W

- 瓦尔特(福格尔魏德的)(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约1170—1230)——德国中世纪情歌演唱者和诗人。——172。

- 瓦列夫斯基伯爵, 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约瑟夫·科隆纳(Walewski, Alexandre-Florian-Joseph Colonna, comt de 1810—1868)——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 曾任驻伦敦大使(1851)、外交大臣(1855—1860); 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儿子。——64、271。
- 瓦鲁斯(鲁卜利乌斯·昆提利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tilius Varus 公元前53左右—公元9)——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 叙利亚总督(公元前7), 后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公元7—9), 日耳曼部落起义时在条顿堡林山会战中阵亡。——340。
- 瓦伦多夫男爵, 马丁(Wahrendorff, Martin Reichsfreiherr von 1789—1861)——瑞典厂主和军事发明家。——508—509。
- 瓦洛特(Wallot)——在瑞士的侨民; 卡尔·福格特青年时代的朋友。——90。
- 瓦纳(Wanner)——1850年为阿弗尔商人, 瑞士驻阿弗尔领事。——396。
- 瓦尼, 马尔库斯(Vaney, Markus)——瑞士出版商。——123。
- 威尔逊, 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1847—1859), 自由贸易论者; 《经济学家》的创办人和编辑, 曾任财政大臣(1853—1858), 印度财务大臣(1859—1860); 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31。
-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I [William the Victorious] 1797—1888)——普鲁士亲王, 摄政王(1858—1861), 普鲁士国王(1861—1888), 德国皇帝(1871—1888)。——241、269、412、430。
- 威廉第二(Wilhelm II 1777—1847)——黑森-卡塞尔选帝侯(1821—1847);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3—1814)。——15、17。
- 威斯特华伦, 斐迪南·奥托·威廉·亨宁·冯(Westphalen, Ferdinand Otto Wilhelm Henning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 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129。
- 韦伯, J. M. (Weber, J. M.)——普鲁士法学家, 1860年柏林《国民报》诉讼案件中马克思的律师。——351、357、375、386、388。
- 韦隆, 路易·德西雷(Véron, Louis-Désiré 1798—1867)——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 1848年前是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巴黎评论》和《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1852)。——86。
- 韦森东克, 胡果·马克西米利安(Wesendonck, Hugo Maximilian 1817—

- 1900)——普鲁士律师,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68。
- 韦斯帕西安(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9—79)——罗马皇帝(69—79)。——336。
- 维蒂希,恩斯特·路德维希(Wittig, Ernst Ludwig 生于1820年左右)——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德累斯顿日报》发行人。——402、409。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48。
- 维厄(Wiehe)——约翰·弗里德里希·维厄的妻子。——195、419—420。
- 维厄,约翰·弗里德里希(Wiehe, Johann Friedrich)——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1859年为伦敦霍林格尔印刷所的排字工。——191、194—197、357、366、375、418—420、432、496。
- 维尔穆特,阿道夫(Wermuth, Adolph)——德国警官,汉诺威警察厅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证人;同施梯伯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111。
- 维尔特(Würth)——德国政治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72。
-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 Georg 1822—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421。
-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nus Vergilius Maro 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135、363、374、399。
- 维吉齐-鲁斯卡拉,乔文纳勒(Vegezzi-Ruscalla, Giovenalle)——19世纪中叶意大利政论家,小册子《尼斯民族》的作者。——277。
- 维克多二世(Victor II Saez)——费南多七世的忏悔神父。——211。
-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维克多-艾曼努埃尔)(Vittorio Emanuele II [Victor Emanuel] 1820—1878)——萨瓦公爵,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7、64、279、293、446、471。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82、90、92、96、102、119、120、134—143、145、149、157、327、349、356、401、403、407。
- 维斯(Wyß)——19世纪50年代伯尔尼的律师。——397。

- 魏德迈, 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6—184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56、410。
- 魏特林, 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136。
- 温克尔里德, 阿尔诺德(Winkelried, Arnold 死于1386)——传说他是14世纪瑞士人民在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解放斗争中的民族英雄。——277。
-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 阿尔弗勒德·坎迪杜斯·斐迪南(Windischgrätz, Alfred Candidus Ferdinand Fürst zu 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镇压布拉格六月起义和维也纳十月起义;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140、328。
- 文翰, 赛米尔·乔治(Bonham, Sir Samuel George 1803—1863)——英国外交官;1847—1852年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1853年曾访问太平天国国都天京(南京),试探太平军的对外政策。——21。
- 沃尔弗, 伯恩哈德(Wolff, Bernhard 1811—1879)——德国新闻工作者,1848年起为柏林《国民报》所有人,德国第一个电讯社(1849)的创办人。——367。
- 沃尔弗, 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 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莱茵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07、129、137、168—173、179、183、367、378、381。
-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 约1170—1220)——德国诗人,骑士诗《巴齐法尔》的作者。——295。

- 沃尔科特, 约翰(Wolcot, John 笔名彼得·平达 Peter Pindar 1738—1819)——英国讽刺诗人。——160、165。
- 沃里克伯爵, 理查·内维尔(Warwick, Richard Neville, Earl of 1428—1471)——英国封建主, 在红白蔷薇战争(1455—1485)中起巨大作用; 他两次操纵立王事宜, 因此得外号“国王制造者”。——345。
- 乌迪诺, 尼古拉·沙尔·维克多, 雷焦公爵(Oudinot, Nicolas-Charles-Victor, duc de Reggio 1791—1863)——法国将军, 奥尔良党人,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 1849年指挥军队侵犯罗马共和国; 曾任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 试图组织力量抵抗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 后离开军界。——226。
- 乌尔卡尔特, 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亲土耳其分子; 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 议会议员(1847—1852); 《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10—11、13、179—182、188、217、219、296、298—299。
- 乌尔里希(Ulrich 1487—1550)——符腾堡公爵(1498年起); 1519年被士瓦本联盟驱逐出符腾堡, 1525年曾企图利用农民起义军进攻斯图加特, 以图恢复公爵地位, 1534年重新取得符腾堡公爵爵位。——284。
- 乌尔默, 约翰(Ulmer, Johann)——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 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1年起侨居英国;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2年为新伦敦工人协会创始人之一; 1865年起为国际会员。——407。
- 乌尔皮安努斯, 多米齐乌斯(Ulpianus, Domitius 170左右—228)——罗马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386。
- 乌兰德, 路德维希(Uhland, Ludwig 1787—1862)——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政论家、文学研究者和自由派政治家,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169、171。
- 乌洛阿, 吉罗拉莫(Ulloa, Girolamo 1810—1891)——那不勒斯将军, 1848—1849年意大利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 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为托斯卡纳军队指挥官。——91。

X

- 西迪 - 穆罕默德 (Sidi Mohammed 1803 — 1873) —— 摩洛哥皇帝 (1859 — 1873)。—— 503。
- 西尔莫伊伯爵, 帕尔 (Szirmay, Pál, Graf 1804 — 1883) —— 匈牙利革命家, 科苏特的拥护者, 匈牙利 1848 — 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经巴黎流亡伦敦; 1855 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 300。
- 西蒙, 爱德华 (Simon, Édouard 1824 — 1897) —— 法国政论家, 波拿巴的密探。—— 93、153、175 — 177、286 — 291、321、325 — 326、331。
- 西蒙, 路德维希 (Simon, Ludwig 1810 — 1872) —— 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 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极左派; 1849 年流亡瑞士; 曾被缺席判处死刑, 1866 年前往巴黎, 后返瑞士蒙特勒。—— 162、288 — 289、430。
- 西摩尔, 乔治·汉密尔顿 (Seymour, George Hamilton 1797 — 1880) —— 英国外交官, 曾任驻彼得堡 (1851 — 1854) 和维也纳 (1855 — 1858) 公使。—— 479、483。
-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 — 43) —— 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 113、123、126 — 127、150。
- 希尔盖特纳, 格奥尔格 (Hillgärtner, Georg 1824 — 1864) —— 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 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413。
- 希尔施, 威廉 (Hirsch, Wilhelm) —— 德国店员, 19 世纪 50 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探, 曾伪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文件。—— 401 — 410。
- 席勒, 弗里德里希·冯 (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 — 1805) —— 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 90、99、127、163、264、270、287、347、440。
- 席利, 维克多 (Schily, Victor 1810 — 1875) —— 德国法学家, 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秘密组织“革命集中”的成员, 1852 年迁居法国; 国际会员, 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际,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90 — 92、94、97、106、107、133 — 135、162、392 — 399。
- 席梅尔普芬尼希 (奥耶的), 亚历山大 (Schimmelpfennig von der Oye, Alexander 1824 — 1865) —— 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石勒苏益

- 格—荷尔斯泰因和巴登的斗争以及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有联系;1858年迁居华盛顿,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32、133、141、144—148、151、153、157、159—160。
- 席斯,约翰·乌尔里希(Schieß, Johann Ulrich 1813—1883)——瑞士资产阶级政治家,瑞士联邦总理(1848—1881)。——254、272。
- 夏多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奈(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法国作家、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法国出席维罗纳会议(1822)的代表。——211、482。
- 咸丰(1831—1861)——中国清朝皇帝(1850—1861)。——51。
- 谢尔策尔,安德烈亚斯(Scherzer, Andreas 1807—1879)——德国裁缝和政论家,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员,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1852年2月)的被告之一,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新时代》出版者和《人民报》撰稿人;1871年底由于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言论和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工人教育协会。——181、182、414、415。
- 谢努,雅克·埃蒂耶纳·阿道夫(Chenu, Jacques-Étienne-Adolphe 生于1816年)——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些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奸细和密探。——129。
- 欣克尔代,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冯(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von 1805—1856)——普鲁士政府官员,1848年起为柏林警察局长,1853年起为内务部警察司司长。——119、122、146、406。
- 辛辛纳图斯(鲁齐乌斯·昆克提乌斯·辛辛纳图斯)(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 约公元前519—438)——罗马贵族,执政官(公元前460年),独裁者(公元前458年和439年),据传说,他生活简朴,亲自耕种土地。——346。
- 许勒尔,恩斯特(Schüler, Ernst 1807—1881)——德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3年起侨居瑞士,教师,1853年起出版《瑞士商业信使报》,50—60年代宣传波拿巴主义思想。——183。
- 雪恩(Schön)——在法国的德国流亡者,1848年贝桑松纵队成员。——140。
- 雪恩贝格伯爵夫人(Schönberg, Gräfin)——1834年被奥古斯特·克劳泽、巴克霍夫和贝泽勒尔刺杀。——403、409。

Y

-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 Abraham 1830—1919)——德国医生,波恩体操联合会创建人和会长(1850—1851),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特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因被控“侮辱国王陛下”而继续被监禁;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后为纽约医学科学院院长(1885—1889),一些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写有医学方面的著作。——397、410。
-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205、208、210—211、217、223。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48、205、207—210、216。
- 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横跨马其顿到印度的世界帝国的缔造者;曾从师于亚里士多德。——268。
- 杨,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Jahn, Friedrich Ludwig 1778—1852)——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德国体操运动的组织者;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200。
- 耶拉契奇,约西普,布日姆伯爵(Jellacic, Josip Graf von Buzim 1801—1859)——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省总督(1848—1859),积极参加镇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1848—1849年革命。——140。
-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206、210。
- 叶凯尔法鲁希(Jekelfalussy [Jekelfalusy])——匈牙利神父,齐普斯主教(1848—1849)。——429。
- 伊曼特,彼得·米夏埃尔(Imandt, Peter Michael 1823—1897)——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2年3月被驱逐出境,迁居伦敦;1852年7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国际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90、92、94、96、392、397。
- 伊普西朗蒂,亚历山大(Ypsilanti, Alexander 1792—1828)——希腊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12),摩尔多瓦1821年起义的组织者,起义失败后逃往奥地利,被捕并一直监禁到1827年因俄国出面干涉

而被释放。——211。

伊万三世(Иван III 1440—1505)——莫斯科大公(1462—1505)。——267。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60左右—127以后)——罗马讽刺诗人。——95。

雨果,维克多·玛丽(Hugo, Victor-Marie 1802—1885)——法国作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西岛;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1870年回到法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二帝国时期为参议员(1876)。——268。

约翰(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9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1848年6月—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111、170—172、342。

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奥地利女皇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奥地利君主国执政(1780—179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218、219。

Z

泽登施提克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卡尔·泰奥多尔(Seidensticker, Georg Friedrich Karl Theodor 1797—1862)——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因参加1831年格丁根暴动而被判处徒刑,1845年流亡美洲,从事新闻工作。——158。

泽特,奥托·约瑟夫·阿尔诺德(Saedt, Otto Joseph Arnold 1816—1886)——普鲁士法官,1848年起任科隆检察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公诉人。——121。

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33—1701)——英国国王(1685—1688)。——130。

朱斯蒂,朱泽培(Giusti, Giuseppe 1809—1850)——意大利讽刺诗人。——283。

佐默尔(Sommer)——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108、404。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艾塞勒和柏塞勒——德国作家约·威·克里斯特恩匿名出版的讽刺性小册子《1847年4月艾塞勒博士和柏塞勒男爵出席省议会会议旅途散记》中的两个滑稽人物。——197、364。

埃吉丽亚——罗马神话中的女神，聪慧有预知能力，常暗中向罗马王努玛·庞皮利乌斯出谋献策。——266、276、277。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忒拜国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浦斯王》和《奥狄浦斯在科隆纳斯》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他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而使忒拜城逃脱了吸血怪物的毒手。——277。

奥菲士——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他的歌声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曾参加亚尔古船英雄们寻求金羊毛的远航。——278。

B

巴克科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快乐之神，为狄奥尼索斯的别名。据传说，他首创用葡萄酿酒，并将种植葡萄和采集蜂蜜的方法传遍四方。祭祀巴克科斯的方式是狂欢暴饮和疯狂舞蹈。——285。

巴洛——莎士比亚的喜剧《终成眷属》中的人物。——91。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134。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一个企图影响暴君的、高尚的、有自由思想的内侍官。——266。

柏克司尼弗——狄更斯的小说《马丁·切斯维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个伪君子，假好人。——249。

柏塞勒——见艾塞勒和柏塞勒。

D

大嗓门——见高亮都亚。

邓斯第一——亚·蒲柏的叙事诗《邓斯之歌》中的人物。——322、365。

邓斯第二——亚·蒲柏的叙事诗《邓斯之歌》中的人物。——322。

狄奥尼索斯——古希腊神话中司丰收之神，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的保护神。——308。

E

莪菲莉霞——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人物。——331。

F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77、82、88、91、98、99、111、113、125、126、131、163、193、217、276、282、286、293、339、347、370。

孚恩（浮努斯）——古罗马神话中最低的神，相当于希腊的萨蹄尔神；森林和田野的保护神。——346。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339。

G

该隐——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长子，出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334。

高亮都亚（大嗓门）——16世纪德国作家约·菲沙尔特的小说《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仿拉伯雷小说《巨人》中卡冈都亚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物。——82、126。

H

哈巴谷——圣经中的先知。——329。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268、331。

亨利四世——莎士比亚同名历史剧中的主要人物。——88、101、131。

J

基普里安诺(基普里安)——卡德龙的歌剧《神奇的魔术师》中的人物;一个同浮士德相象的典型人物。——339。

吉耳里——埃·阿布的同名喜剧中的人物。——424、430。

加西莫多——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加西莫多这个名字已成了丑陋的化身。——290、305。

杰克——见福斯泰夫。

K

卡斯托尔——罗马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宙斯和勒达的双生子之一,波鲁克斯的弟弟。——332。

科贝斯第一——海涅的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125、172。

克拉林——卡德龙的歌剧《神奇的魔术师》中的人物。——76、339。

克勒维尔——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中的人物,是暴发户、贪财者和贪淫好色之徒的典型。——86。

库尼贡达——伏尔泰的哲学小说《老实人》中的女主人公。——289、430。

L

拉萨里略——16世纪中叶问世的一部匿名西班牙中篇小说《来自托尔梅斯河的拉萨里略及其种种不幸》中的人物;狡猾骗子的典型。——260。

莱波雷洛——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唐璜的仆人。——91、278。

里士满——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三世》中的人物。——89。

罗兰——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博雅多的叙事诗《恋爱中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和许多其他著作中的人物,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中也曾提到他。——411。

M

玛丽花——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在罪犯中长大的姑娘,但保持了高贵的品德和少女的纯洁;作品给她取了一个花名,即百合花,因为百合花长在污泥中,但花瓣洁白耀眼。——403。

麦克佩斯——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人物。——91。

弥勒和舒尔采——讽刺杂志《喧声》中的人物。——383。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311。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331。

莫斯康——卡德龙的歌剧《神奇的魔术师》中的人物。——339。

N

尼克·波顿——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织工，愚蠢的小人物的典型。——84。

P

潘奇——英国民间木偶喜剧中的人物，他背驼、鼻长、好闹、滑头和爱说俏皮话。——324。

潘奇内洛——意大利民间假面喜剧中的人物，好说俏皮话和爱插科打诨。——165。

潘塔隆——意大利民间假面喜剧中的人物，威尼斯商人，一个富有、吝啬而又愚蠢的老头儿。——339。

泼息·霍士泼——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中的人物，一个充满热情的勇敢高贵骑士的典型。——144。

普隆涅斯——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一个狡猾多嘴的廷臣。——121、252。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罚。——395。

普律多姆，约瑟夫——法国作家和漫画家昂利·莫尼埃创造出来的一个自满自负而又眼光狭小的小市民典型。——286。

Q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神，雷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条公牛。——331。

S

赛克斯，比尔——见威廉·赛克斯。

胜者乔治(圣乔治)——传说中的基督教“圣徒”，降龙者。——344。

圣乔治——见胜者乔治(圣乔治)。

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席勒的悲剧《强盗》中的人物；丧尽天良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暴徒。——84。

斯芬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传说它常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后来谜底被奥狄浦斯道破，遂即自杀。今用以隐喻“谜”一样的人物。——277。

斯洛肯贝尔吉——英国作家劳·斯特恩的小说《特利斯屈兰·善第先生的生平 and 见解》中的人物；一个陌生人，他的大鼻子使许多城市惊惶不安。——332。

斯皮格尔勃——见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

T

唐·吉河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268。

特里斯坦——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的骑士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德国民间故事书和卡·伊默曼诗集中的传奇人物。——227。

W

威廉·退尔——13世纪末14世纪初瑞士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战争的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中描写他以百发百中的箭术射死了奥地利地方长官。席勒在他的同名剧作中采用了威廉·退尔这个典型。——91、163。

威廉·赛克斯(比尔·赛克斯)——狄更斯的小说《奥列佛尔》中的角色，强盗。——126。

X

熙德——12世纪西班牙中世纪史诗《我的熙德之歌》(用西班牙文写成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约1140年)、《熙德轶事》和许多抒情诗歌中的主人公，民间传说中这位受人爱戴的英雄成了17世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剧《熙德》的题材，海德的同名史诗中的主人公。——29。

锡仑——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同伴。——98、285。

小丑——意大利假面喜剧中的人物，一个正在热恋的仆人，常常在陷入窘境时能巧妙地对付过去。——237。

休迪布腊斯——17世纪英国诗人巴特勒的同名讽刺诗中的人物，喜欢滥推论

和争辩。善于用三段论法来证明最荒谬的论点。——268。

Y

雅罗米尔——格里尔帕尔策的悲剧《女始祖》中的主要人物。——184。

雅努斯——古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有前后两副面孔，一副向着过去，另一副朝向未来，掌管门户出入和水陆交通；后人用雅努斯这一名字比喻口是心非的人。——268。

亚比该——圣经中的人物，拿八的妻子，后为大卫的妻子。——334。

亚伯——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次子，由于遭到长兄该隐的忌妒而被害。——334。

亚尔古船英雄——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乘“亚尔古”船前往科耳希达寻求由巨龙看守的金羊毛；公元前3世纪罗陀斯的阿波洛尼乌斯在自己的长诗《亚尔古船英雄的远航》中歌颂了他们这次航行（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奥菲士也参加了这次航行）。——278—279。

伊菲姬妮亚——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和克丽达妮斯特拉的女儿，准备祭献给女神阿尔蒂米斯，但为阿尔蒂米斯所赦免并成为她的女祭司。在古代伊菲姬妮亚的形象有时与阿尔蒂米斯等同。伊菲姬妮亚是许多古希腊和西欧文学著作中的主要人物；让·拉辛的悲剧《伊菲姬妮亚在奥利德》中的女主人公。——293、439。

伊佐尔达——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的骑士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德国民间故事书中的女主人公。——227。

约翰牛——18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思诺特在1712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一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56。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对〈奥格斯堡报〉的诉讼。致〈自由新闻〉编辑。1860年2月4日于伦敦》[通告](*Prosecution of the Augsburg Gazette. To the Editor of "The Free Press"*. London, 4th February, 1860. [Zirkular]). —193, 417, 486, 488, 496。
- 《法兰克福三月同盟和〈新莱茵报〉》, 载于1849年3月17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48号(*Der Frankfurter Märzverein und die "N. Rh. Z."*.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48, 17. März 1849*). —167。
- 《高尚意识的骑士》[1854年]纽约版(*Der Ritter vom edelmüthigen Bewußtsein. New York [1854]*). —120, 141, 142, 145, 411。
- 《声明。1860年2月6日于伦敦》, 载于1860年2月10日《科隆日报》第41号附刊(*Erklärung. London, 6. Februar 1860.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41, 10. Februar 1860. Beil.*)。 —73, 496。
- 《声明。1860年2月6日于伦敦》, 载于1860年2月10日《人民报》(柏林)第35号(*Erklärung. London, 6. Februar 1860. In: Die Volks-Zeitung. Berlin. Nr. 35, 10. Februar 1860*)。 —73, 323, 496。
- 《给〈总汇报〉编辑的信》, 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00号(*Brief an den Redakteur der "Allgemeinen Zeitung."* 19. Oktober 1859.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00, 27. Oktober 1859*)。 —3, 190, 495。
- 《关于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 1859年11月7日于伦敦》, 载于1859年11月19日《改革报》(汉堡)第139号附刊(*Zum Prozesse von Karl Vogt contra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London. 7. November 1859. In: *Die Reform. Hamburg. Nr. 139, 19. November 1859. Beil.*)。 —189。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巴塞尔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asel 1853)。——10、100、104、108—113、117—119、138、350、352、356、403。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波士顿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oston)1853)。——101、102、121。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第3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Aufl. 3, 1885)。——403、408。
- 《卡尔斯的陷落》,载于1856年4月5、12、19和26日《人民报》(伦敦)第205—208期(The fall of Kars.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205, 5. April 1856; Nr. 206, 12. April 1856; Nr. 207, 19. April 1856; Nr. 208, 26. April 1856)。——414。
- 《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致《纽约论坛报》编辑。1852年11月16日于伦敦》,载于1852年1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7号(Kossuth, Mazzini, and Louis Napoleon. To the Editor of the N. Y. Tribune. London, November 16, 1852.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27, 1. Dezember 1852)。——300。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第1期,约·魏德迈编(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rsg. von J. Weydemeyer. New-York. 1852. H. 1)。——10、83—87。
- 《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载于1852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90号(Movements of Mazzini and Kossuth. —League with Louis Napoleon. —Palmerst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90, 19. Oktober 1852)。——300。
- 《帕麦斯顿和波兰》,载于[1854年]《政治飞行传单》伦敦第2版(Palmerston and Poland. In: Political fly-sheets. 2. ed. London[1854])。——181、207。
- 《帕麦斯顿和俄国》,载于[1853年]《政治飞行传单》伦敦第1版第1期(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Political fly-sheets. 1. ed. Nr. 1. London[1853])。——10、180、181。
- 《帕麦斯顿和俄国》,载于1853年11月26日《格拉斯哥哨兵》(Palmerston and Russia. In: Glasgow Sentinel. 26. November 1853)。——10、180、181。
- 《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载于[1854年]《政治飞行传单》(伦敦)第2期

- (Palmerston, What has he done? In: Political fly-sheets. Nr. 2. London [1854]). ——10、180、181。
- 《帕麦斯顿勋爵》，载于1853年10月22、29日，11月5、12和19日，12月10、17和24日《人民报》(伦敦)第77、78、79、80、81、84、85和86期；一部分作为社论发表于1853年10月19日，11月4、21日和1854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2、3916、3930和3973号(Lord Palmerston. I—VIII.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77, 22. Oktober 1853; Nr. 78, 29. Oktober 1853; Nr. 79, 5. November 1853; Nr. 80, 12. November 1853; Nr. 81, 19. November 1853; Nr. 84, 10. Dezember 1853; Nr. 85, 17. Dezember 1853; Nr. 86, 24. Dezember 1853; [Leitar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902, 19. Oktober 1853; Nr. 3916, 4. November 1853; Nr. 3930, 21. November 1853; Nr. 3973, 11. Januar 1854)。——180、181。
- 《帕麦斯顿勋爵传》，载于1855年12月29日，1856年1月5、12日和2月9、16日《自由新闻》(伦敦)第12、13、14、18和19期(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Nr. 12, 29. Dezember 1855; Nr. 13, 5. Januar 1856; Nr. 14, 12. Januar 1856; Nr. 18, 9. Februar 1856; Nr. 19, 16. Februar 1856)。——10。
- 《普鲁士的战争前景》，载于1859年3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98号(The war prospect in Prussia.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5598, 31. März 1859)。——178。
- 《偷梁换柱》，载于1859年7月30日、8月6、13和20日《人民报》(伦敦)第13—16期(Quid pro quo. In: Das Volk. London. Nr. 13, 30. Juli 1859; Nr. 14, 6. August 1859; Nr. 15, 13. August 1859; Nr. 16, 20. August 1859)。——11。
- 《三月同盟》，载于1849年3月1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43号(Der Märzverei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43, 11. März 1849)。——167。
- 《声明。1859年11月15日于伦敦》，载于1859年11月21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25号附刊(Erklärung. London, 15. November 1859.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25, 21. November 1859. Beil.)。——192、366、496。
- 《声明。1860年2月6日于伦敦》，载于1860年2月11日《改革报》(汉堡)第18

- 号(Erklärung. London, 6. Februar 1860. In: Die Reform. Hamburg. Nr. 18, 11. Februar 1860)。——73, 496。
- 《声明。1860年2月6日于伦敦》, 载于1860年2月17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48号附刊(Erklärung. London, 6. Februar 1860.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48, 17. Februar 1860. Beil.)。——73, 485, 486, 496。
- 《施泰因》, 载于1849年2月18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25号(Stei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25, 18. Februar 1849)。——324。
- 《18世纪外交史内幕》, 载于1856年8月16日[—]1857年4月1日《自由新闻》(伦敦)第3卷第1—34期(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Vol. 3. Nr. 1, 16. August 1856 [bis] Nr. 34, 1. April 1857)。——181。
- 《18世纪外交史内幕》, 载于1856年6月28日、7月5、12日和8月2日《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Sheffield Free Press. 28. Juni 1856; 5. Juli 1856; 12. Juli 1856; 2. August 1856)。——181。
- 《十字报》, 载于1849年5月16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99号(Die Kreuzzeitung.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99, 16. Mai 1849)。——168。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4期(Der Klassenkampf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1—4)。——150。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149。
-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 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conomie. H. 1. Berlin 1859)。——93。
-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载于1858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55号(The British and Chinese treat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5455, 15. Oktober 1858)。——20。

弗·恩格斯

- 《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Po und Rhein. Berlin 1859)。——11, 178, 338、

440、474。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Campagn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1—3）。——157、162。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载于1848年9月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91号（Die Polendebatte in Frankfurt.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91, 1. September 1848）。——146。

《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柏林版（Savoyen, Nizza und der Rhein. Berlin 1860）。——178。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15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11日于布鲁塞尔》（传单）〕〔Zirkular gegen Kriege. Brüssel. 11. Mai 1846. Flugbl.〕。——137。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4期（Gottfried Kinke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4）。——156。

《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137、147—150、155。

《两个政治审判案。由科隆二月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科隆版（Zwei politische Prozesse. Verhandelt vor den Februar-Assisen in Köln. Köln 1849）。——151。

〔《流亡中的大人物》1852年版〕〔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 1852〕。——157、158。

《时评。1850年1[—2]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2期（Revue. Januar[/Februar]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2）。——152。

《时评。1850年5—10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5—6期（Revue. Mai bis Oktober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 5/6)。——139、152、153、156。

其他作者的著作^①

A

- [阿贝尔,卡·]《奥地利的报界帮凶》,载于1860年2月6日《每日电讯》(伦敦)第1439号([Abel, K.]: The journalistic auxiliaries of Austria. In: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Nr.1439, 6. Februar 1860)。——194、333、488。
- 阿布,埃·《罗马问题》1859年布鲁塞尔版(About, E.: La question romaine. Bruxelles 1859)。——183。
- 阿布,埃·《罗马问题。庇护九世》,载于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比尔)第150号(About, E.: Die römische Frage. Pius IX. In: Schweizer Handels-Courier. Biel. Nr.150, 2. Juni 1859)。——182。
- 阿布,埃·《1860年的普鲁士》1860年巴黎版(About, E.: La Prusse en 1860. Paris 1860)。——234、259、360、429。
- 阿布特《卡尔·福格特和卡尔·马克思或制刷匠帮》,载于1861年《时代呼声》第39期附刊(Abt: Carl Vogt und Carl Marx oder die Bürstenheimer. In: Stimmen der Zeit. 1861. Nr.39. Beil.)。——90。
- 阿尔文斯莱本《在维拉戈什投降后的拉·科苏特》1852年魏玛版(Alvensleben: L. Kossuth nach der Capitulation von Vilagos. Weimar 1852)。——298。
- [艾希霍夫,威·]《施梯伯》,载于1859年9月10、17、24日和10月8、22和29日《海尔曼》(伦敦)([Eichhoff, W.]: Stieber. In: Hermann, London. 10., 17., 24. September, 8., 22., 29. Oktober 1859)。——120。
- 奥本海姆,亨·《我们在英国和法国的理想与失望》,载于《民主研究》1860年汉堡版(Oppenheim. H.: Unsere Ideale und Enttäuschungen in England und Frankreich. In: Demokratische Studien. Hamburg 1860)。——337。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方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 《奥地利。(本报通讯员报道)》,载于1860年2月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533号(Austria.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533, 3. Februar 1860)。——274、418。
- 奥利芬特,劳·《普选权和拿破仑第三》1860年伦敦版(Oliphant, L.: Universal suffrage and Napoleon III. London 1860)。——255。

B

- 巴布斯特,伊·康·〔《政治经济学报告集》〕,载于1860年1月24日《莫斯科消息报》第19号(Бабуст, И. К.: [Доклады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In: Московскій вѣдомости. Nr. 19, 24. Januar 1860)。——93。
- 《巴黎快讯》,载于1843年11月2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18458号(Express from Pari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18458, 20. November 1843)。——212。
- 巴塞尔曼,〔弗·〕〔《1849年4月25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莱比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9卷(Bassermann, [F.]: [Rede in der Sitzung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25. April 1849.]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 M. Bd. 8. 9. Leipzig, Frankfurt a. M. 1849)。——168。
- 巴赞库尔,塞·德·《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1857年巴黎第5版第1、2卷(Bazancourt, C. de: L'expédition de Crimée jusqu' à la prise de Sébastopol. 5^e. éd. T. 1. 2. Paris 1857)。——236。
- 班贝格尔,路·《Michael Pro和Thomas Contra在1859年间的通信集》,载于《民主研究》1860年汉堡版(Bamberger, L.: Des Michael Pro Schriftwechsel mit Thomas Contra, aus dem Jahre 1859. In: Demokratische Studien. Hamburg 1860)。——337。
- 〔班贝格尔,路·〕《去意大利,好啊!》1859年伯尔尼—日内瓦版〔Bamberger, L.]: Juchhe nach Italia! Bern, Genf 1859)。——337。
- 《班迪亚在军事委员会的供词》,载于1858年5月12日《自由新闻》(伦敦)第16期(Confession of Bangya before the council of war.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Nr. 16, 12. Mai 1858)。——303。

- [贝克曼]《[对舍尔瓦尔等人的指控]》。2月25日于巴黎,载于1852年2月28日《科隆日报》第51号([Beckmann]: [Notiz über die Anklage gegen Cherval und andere.] Paris, 25. Februar.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51, 28. Februar 1852)。——109。
- [比斯康普,埃·]《帝国摄政》,载于1859年5月14日《人民报》(伦敦)第2期([Biscamp, E.]: Der Reichsregent. In: Das Volk. London. Nr. 2, 14. Mai 1859)。——182。
- 比斯康普,埃·《致〈总汇报〉编辑部》,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00号附刊(Biscamp, E.: An die Redaction der Allgemeinen Zeitung.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00, 27. Oktober 1859. Beil.)。——192、350、352、363、364。
- 波措-迪-博尔哥,[卡·奥·]《紧急报告》。1825年10月4—16日于巴黎,载于《有关俄国的文件汇编》1854年巴黎第2版(Pozzo di Borgo, [K. O.]: Dépêche réservée en date de Paris du 4/16 octobre 1825. In: 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2. Ausg. Paris 1854)。——214。
- [波克罕,西·路·]《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一个德国流亡者对埃德蒙·阿布的小册子《1860年的普鲁士》的回答》1860年伦敦版([Borkheim, S. L.]: Napoleon III. und Preußen. Antwort eines deutschen Flüchtlings auf "Preußen in 1860" von Edmond About. London 1860)。——429。
- 波拿巴,路·拿·《拿破仑观念》1839年巴黎版(Bonaparte, L. N.: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6、10、231、486。
- 波拿巴,路·拿·《以法国人民的名义》,载于1852年1月1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5号(Bonaparte, L. N.: Au nom du peuple français.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5, 15 Januar 1852)。——35。
- [布拉斯,奥·]《州府新闻》,载于1859年11月12日《新瑞士报》(日内瓦)第11期([Braß, A.]: Neues aus den Kantonen. In: Neue Schweizer Zeitung. Genf. Nr. 11, 12. November 1859)。——264。
- [布林德,卡·]《对帝国的背叛。代为传布的警告》,载于1859年6月18日《人民报》(伦敦)第7期([Blind, K.]: Die Reichsverraetherei. Warnung zur gefälligen Verbreitung. In: Das Volk. London. Nr. 7, 18. Juni 1859)。——195、431。
- [布林德,卡·]《反对卡尔·福格特》,载于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奥格斯

- 堡)第44号附刊([Blind, K.:] Gegen Karl Vogt.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44, 13. Februar 1860. Beil.)。——496。
- [布林德,卡·]《警告》[传单]([Blind, K.:] Zur Warnung. [Flugbl.])。——3、9、11、12、14、183—198、326、352、356、364—366、375、376、417—420、431、432、486、488。
- [布林德,卡·]《卡尔·福格特和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载于1859年6月22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173号附刊([Blind, K.:] K. Vogt und die deutsche Emigration in London.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173, 22. Juni 1859. Beil.)。——184。
- [布林德,卡·]《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载于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闻》(伦敦)第5期([Blind, K.:] 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 to be King of Hungary.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Nr. 5, 27. May 1859)。——12、187、188、416、431。
- 布林德,卡·《声明》,载于1859年12月11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45号附刊(Blind, K.: Erklärung.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45, 11. Dezember 1859. Beil.)。——192、496。
- 布林德,卡·《声明。驳我是传单〈警告〉的作者的說法》,载于1859年11月9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13号附刊(Blind, K.: Erklärung. Zur Abweisung der Angabe als sey ich der Verfasser des Flugblattes "Zur Warnung".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13, 9. November 1859. Beil.)。——191。
- [布伦奇里,约·卡·]《瑞士的共产主义者。依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1843年苏黎世版([Bluntschli, J. C.:] Die Kommunisten in der Schweiz nach den bei Weitling vorgefundenen Papieren. Zürich 1843)。——136。
- 布伦坦诺,[洛·彼·][《1848年8月7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莱比锡版第2卷(Brentano, [L. P.:] [Rede in der Sitzung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7. August 1848.]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 M. Bd. 2. Leipzig 1848)。——343。

C

- [察贝尔,弗·]《卡尔·福格特和〈总汇报〉》,载于1860年1月22日《国民报

(晨版))(柏林)第 37 号([Zabel, F.]: Karl Vogt und die Allgemeine Zeitung. In: National-Zeitung. (Morgen-Ausg.) Berlin. Nr. 37, 22. Januar 1860)。——73、194、321、348 —351、357、361、362、363、368、372 —379、382 —384、387、486、488。

[察贝尔, 弗·]《怎样伪造激进传单》, 载于 1860 年 1 月 25 日《国民报》。(晨版))(柏林)第 41 号([Zabel, F.]: Wie man radikale Flugblätter macht. In: National-Zeitung. (Morgen-Ausg.) Berlin. Nr. 41, 25. Januar 1860)。——73、129、193、194、321、333、348、354 —357、361 —370、374 —382、384 —387、486、488。

D

道格拉斯·霍《海军炮兵论》[1851 年伦敦第 3 版](Douglas H.: A treatise on naval gunner Y. [3. ed. London 1851])。——517。

德比, [爱·] [(1860 年 1 月 24 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 1860 年 1 月 25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3525 号(Derby, [E.]: [Rede im House of Lords am 24. Januar 1860.]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525, 25. Januar 1860)。——52。

《德国的一部分……3 月 14 日子巴黎》, 载于 1859 年 3 月 15 日《总汇通报》(巴黎)第 74 号(Une partie de l'Allemagne... Paris, le 14 mars.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74, 15. März 1859)。——200。

《德国》。《希望报》特别通讯, 载于 1860 年 3 月 25 日《希望报》(日内瓦)第 85 号(Allemagne. Correspondance particulière de l'Espérance. In: L'Espérance. Genève. Nr. 85, 25. März 1860)。——284。

德拉奥德, 律·《1848 年 2 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 年巴黎版(De la Hodde, L.: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 Paris 1850)。——129。

迪斯累里, [本·] [(1860 年 1 月 24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60 年 1 月 25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3525 号(Disraeli, [B.]: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am 24. Januar 1860.]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525, 25. Januar 1860)。——57。

《帝国大事记》, 载于亨·库尔茨《德国文学史。附优秀作家作品选》1857 年莱比锡第 2 版第 1 卷(Die Kaiserchronik. In: H. Kurz: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mit ausgew. Stücken aus den Werken der vorzüglichsten Schriftsteller.

2. Aufl. Bd. 1. Leipzig 1857)。——262。
- 杜邦,埃·《内部纪事》,载于1850年12月15日《流亡者之声》(巴黎)第8期(Dupont, É.: Chronique de l'intérieur. In: La Voix du Proscrit. Paris. Nr. 8, 15 décembre 1850)。——86。
- 《对自由派议员冯·芬克的又一评论和施普罗赫费耳—埃尔伯费尔德的道路建筑的有教益的历史》1849年哈根版(Auch eine Charakteristik des liberalen Abgeordneten von Vincke und erbauliche Geschichte des Sprochhövel-Elberfelder Wegbaues. Hagen 1849)。——347。
- 多尔戈鲁科夫,皮·《俄国真相》1860年巴黎版(Dolgoroukow, P.: La vérité sur la Russie. Paris 1860)。——209。

E

- 《俄国备忘录,对当今皇帝的劝诫》,载于1859年7月13日《自由新闻》(伦敦)(Mémorandum sur la Russie, pour l'instruction de l'empereur.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13. Juli 1859)。——209。
- 《俄国备忘录,对当今皇帝的劝诫》,载于1859年7月23、30日和8月20日《人民报》(伦敦)第12、13期和第16期;[转载自:]1859年7月13日《自由新闻》(伦敦)(Russisches Mémorandum zur Belehrung des gegenwärtigen Kaisers. In: Das Volk. London. Nr. 12, 23. Juli 1859; Nr. 13, 30. Juli 1859; Nr. 16, 20. August 1859. [Nachdruck aus]: The Free Press. London. 13. Juli 1859)。——209。
- 《俄国政策的标志》,载于1855年6月9日《普鲁士周报》(柏林)第23期(Zur Signatur der russischen Politik. In: Preußisches Wochenblatt. Berlin. Nr. 23, 9. Juni 1855)。——210。

F

- 法耳梅赖耶尔,雅·菲·《东方来信片断》(两卷集)1845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Fallmerayer, J. Ph.: Fragmente aus dem Orient. Bd. 1. 2. Stuttgart, Tübingen 1845)。——178。
- 《法国皇帝的实际权限》,载于1859年1月22日《经济学家》(伦敦)第804期(The practical limits of the imperial power in France.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804, 22. Januar 1859)。——232。

- 《法国政府……4月9日于巴黎》，载于1859年4月1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00号(La Gouvernement français, ... Paris, le 9 avril.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100, 10 avril 1859)。——200、234。
- 法济, [让·雅·] [(1860年2月3日在公众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的演说)], 载于1860年2月5日《日内瓦评论和瑞士报》第31号附刊(Fazy, [J.J.]: [Rede auf einem Treffen im Club populaire am 3. Februar 1860.] In: 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 Nr.31, 5. Februar 1860. Beil.)。——275。
- 《法兰西银行》，载于1859年1月1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203号(The Bank of France. In: The Times. London. Nr.23203, 14. Januar 1859)。——337。
- 菲沙尔特, 约·《关于格朗果施、高亮都亚和庞大固埃诸英豪和老爷的业绩与名言的惊险长篇历史故事》，载于J. 沙伊布勒《修道院。世俗的和教会的》1847年斯图加特版第8卷(Fischart, J.: Affentheurliche, Naupengeheurliche Geschichtklitterung: Von Thaten u. Rahten der vor kurtzen, langen und je weilen Vollenwolbeschreyten Helden und Herrn: Grandgoschier, Gorgellantua und deß Eyteldürstlichen, Durchdurstleuchtigen Fürsten Pantagruel von Durstwelten... In: Scheible, J.: Das Kloster. Weltlich und geistlich. Bd. 8. Stuttgart 1847)。——82、126、340、342。
- 费格勒, 奥·[(1859年9月17日的书面宣誓证词)], 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00号(Vögele, Au.: [Affidavit vom 17. September 1859.]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300, 27. Oktober 1859)。——357。
- 费奈迭, 雅·《保卫自己和祖国, 反对卡尔·福格特》1860年汉诺威版(Venedey, J.: Pro domo und pro patria gegen Karl Vogt. Hannover 1860)。——125、172、186。
- 芬克, [格·] [(1848年6月21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8年6月2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5号(Vincke, [G.]: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21. Juni 1848.]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25, 25. Juni 1848)。——339、342。
- 芬克, [格·] [(1848年8月7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莱比锡版第2卷(Vincke, [G.]: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7. August 1848.]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 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 M. Bd. 2. Leipzig 1848)。——343。
- 芬克, [格·] [(1848年9月1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莱比锡版第3卷 (Vincke, [G.]: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16. September 1848.])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 M. Bd. 3. Leipzig 1848)。——342。
- 芬克, [格·] [(1848年10月23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8年10月26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26号 (Vincke, [G.]: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23. Oktober 1848.])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26, 26. Oktober 1848)。——341, 342。
- 芬克, [格·] [(1848年12月12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69号 (Vincke, [G.]: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12. Dezember 1848.])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69, 15. Dezember 1848)。——344。
- 芬克, [格·] [(1849年1月9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9年1月16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96号 (Vincke, [G.]: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9. Januar 1849.])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96, 16. Januar 1849)。——345。
- 芬克, [格·] [(1849年4月2日普鲁士国民议会第二议院呈上国王陛下的奏折的修正案)], 载于1849年4月4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63号附刊 (Vincke, [G.]: [Amendement zum Adreßentwurf an den König in der Zweiten Kammer der preußischen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2. April 1849.])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63, 4. April 1849. Beil.)。——346。
- 福格特, 卡·《纲领》。[1859年]4月1日于日内瓦, 载于卡尔·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日内瓦版 (Vogt C.: Programm. Genf, den 1. April 1859). In: Carl Vogt: 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Genf 1859)。——179, 268。
- [福格特, 卡·]《警告》。5月23日于伯尔尼, 载于1859年6月2日《瑞士商业信使报》(比尔)第150号特刊 ([Vogt C.]: Zur Warnung. Bern, 23. Mai. In: Schweizer Handels-Courier. Außerordentliche Beil. Biel. Nr. 150, 2. Juni 1859)。——77, 89, 182, 414, 486。

- 福格特,卡·《警告》,载于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伦敦)第6期(Vogt C.: Zur Warnung. In: Das Volk. London. Nr. 6, 11. Juni 1859)。——89、183、486。
- 福格特,卡·《盲从和科学。一篇反对格丁根的枢密官鲁道夫·瓦格纳的论战文章》1855年吉森版(Vogt C.: Köhlerglaube und Wissenschaft. Eine Streitschrift gegen Hofrath Rudolph Wagner in Göttingen. Gießen 1855)。——171。
- 福格特,卡·《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伯尔尼版(Vogt C.: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Bern 1859)。——128、154、162、171、179、182、199、203—209、214—217、220、221、225—228、231、233—253、255—261、264、268、270、282、284、312、338、357、486。
- 福格特,卡·《欧洲现状研究》(附《跋》)1859年日内瓦—伯尔尼增订第2版(Vogt C.: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2. mit einem Nachw. verm. Aufl. Genf, Bern 1859)。——208、220、239、241、247、256、269。
- 福格特,卡·《声明》,载于1859年6月16日《瑞士商业信使报》(比尔)第162号特刊(Vogt C.: Erklärung. In: Schweizer Handels-Courier. Außerordentliche Beil. Biel. Nr. 162, 16. Juni 1859)。——185。
- 福格特,卡·《动物群体研究》185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Vogt C.: Untersuchungen über Thierstaaten. Frankfurt a. M. 1851)。——124。
- 福格特,卡·《我对〈总汇报〉的诉讼。速记记录、文件和声明》1859年日内瓦版(Vogt C.: 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Dokumente und Erläuterungen. Genf 1859)。——73、77、83、88、98、99、102、107、112—113、118—123、124、125—133、141、147—151、153—156、160、162、164、172、174—177、180、183、188、189—192、233、240、254、262—263、265、268、270、282、286、289—296、321、325、326、328、333、348、356、362、368—372、381、398、414、432、486。
- 福格特,[卡·][〔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莱比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9卷(Vogt [C.]: [Rede in der Sitzung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26. Mai 1849.]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 M. Bd. 8.9. Leipzig, Frankfurt a. M. 1849)。——171。
- 福格特,卡·《致卡·布林德》,载于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

44 号附刊(Vogt C.: An K. Blind.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44, 13. Februar 1860. Beil.). —263。

傅立叶,沙·《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四卷集)1841—1843年巴黎第2版(Fourier, Ch.: 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 Vol. 1—4. 2. éd. Paris 1841—1843)。——88。

G

《告德国人民书。[国民议会三十人委员会于1849年5月26日提出]》，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莱比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9卷(Aufruf an das deutsche Volk. [Vorgelegt vom Dreißiger-Ausschuß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am 26. Mai 1849.]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 M. Bd. 8.9. Leipzig, Frankfurt a. M. 1849)。——169。

《告各国民主义者书》，载于1850年11月18日《立宪主义者报》(巴黎)(Aux démocrates de toutes les nations. In: Le Constitutionnel. Paris. 18. November 1850)。——139。

戈尔盖,阿·《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1848—1849年》(两卷集)1852年莱比锡版(Görgei, A.: Mein Leben und Wirken in Ungarn in den Jahren 1848 und 1849. Bd. 1.2. Leipzig 1852)。——310。

哥尔查科夫,[亚·米·][《给俄国驻德意志各邦使馆的紧急通告。1859年5月15日(或27日)》],载于1859年6月16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167号(Gortschakow, [A. M.]: [Zirkulardepesche an die russischen Gesandtschaften in den deutschen Staaten vom 15. (27.) Mai 1859.]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167, 16. Juni 1859)。——439、475、481、482。

格莱斯顿,[威·尤·][《1857年2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595号(Gladstone, [W. E.]: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am 3. Februar 1857.]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2595, 4. Februar 1857)。——48。

[格赖纳,泰·路·][《流亡的帝国摄政福格特及其党羽和阿道夫·科拉切克的〈德国月刊〉》][传单]1850年版([Greiner, Th. L.]: Der flüchtige Reichsregent Vogt mit seinem Anhang und die deutsche Monatsschrift von Adolph Ko-

- latschek. 1850. [Flugbl.]。——162。
- 格兰维尔, [乔·] [(1860年1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60年1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525号(Granville,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am 24. Januar 1860.]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525, 25. Januar 1860)。——51。
- 格雷, [亨·乔·] [(1860年1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60年1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525号(Grey, [H.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am 24. Januar 1860.]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525, 25. Januar 1860)。——47—50。
- 格律恩, 卡·《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登上法国王位的斯芬克斯》1860年汉堡增订第3版(Grün, K.: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 die Sphinx auf dem französischen Kaiserthron. 3. verm. Aufl. Hamburg 1860)。——277。
- 《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的函件。1857—1859年》1859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London 1859)。——20—21。
-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函件。1859年1—5月。根据女王陛下的命令提交议会两院》1859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Italy. January to May, 1859.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9)。——201, 203。
- 《哈里斯上尉给马姆兹伯里伯爵的信。(3月28日收讫)第174号》(Captain Harris to the Earl of Malmesbury. (Received March 28.) Nr. 174)。——251。
-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函件。考莱伯爵给马姆兹伯里伯爵的信。(4月11日收讫)第282号》(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Italy. Earl Cowley to the Earl of Malmesbury. (Received April 11.) Nr. 282)。——201, 203。
- 《切尔西子爵给马姆兹伯里伯爵的信。(3月6日收讫)第88号》(Viscount Chelsea to the Earl of Malmesbury. (Received March 6.) Nr. 88)。——232。
- 《〈国民报〉》, 载于1849年2月17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24号((Die "Nationalzeitung".) In: Neue Rheinsche Zeitung. Köln. Nr. 224, 17. Februar 1849)。——321, 322。
- 《国外来信》, 载于1859年1月15日《经济学家》(伦敦)第803期(Foreign correspondence.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803, 15. Januar 1859)。——232。

《国外来信》，载于1860年1月28日《经济学家》（伦敦）第857期（Foreign correspondence.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857, 28. Januar 1860）。——54。

H

[海尔布特, B.]《一份有关三月同盟的档案》，载于1848年12月2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81号（[Heilbut, B.]: Ein Aktenstück des Märzvereins.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81, 29. Dezember 1848）。——165。

赫尔曼, K. [《在奥格斯堡王国地方法院的辩护词。1859年10月24日》], 载于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日内瓦版（Hermann, K.: [Plädoyer vor dem Königlichen Bezirksgericht in Augsburg am 24. Oktober 1859.] In: Carl Vogt: Mein Prozess gegen die Allgemeine Zeitung. Genf 1859）。——82。

[黑弗纳尔, 莱·]《流亡者（第二部分）》，载于1851年2月28日《汉堡消息报》第51号（[Häfner, L.]: Die Flüchtlinge. 〈II.〉 In: Hamburger Nachrichten. Nr. 51, 28. Februar 1851）。——160。

黑格尔, 乔·威·弗·《逻辑学》1833年柏林版（Hegel, G. W. F.: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 Berlin 1833）。——11。

《黑森选帝侯国宪法原本。1831年1月5日》1831年林特尔恩版（Verfassungs-Urkunde für Kurhessen vom 5^{ten} Januar 1831. Rinteln 1831）。——15、16、17、18、19。

《黑森选帝侯国宪法原本。1852年4月13日》，参看威·阿尔特曼《1806年以来的德国宪法历史文献选编。史学家和法学家速查手册。1806—1866年》（两卷集）1898年柏林版第1卷（Verfassungsurkunde für das Kurfürstentum Hessen. 1852. April 13. Nach: W. Altmann: Ausgewählte Urkunden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806. Zum Handgebrauch für Historiker und Juristen. Th. 1. 2. Th. 1. 1806—1866. Berlin 1898）。——18、19。

J

《建议将萨瓦和尼斯并入法国版图的函件》1860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proposed annexation of Savoy and Nice to France. London 1860）
—《哈里斯上尉给约·罗素勋爵的信（7月5日收讫）》第1号（Captain Harris to Lord J. Russell. 〈Received July 5.〉 Nr. 1）。——271。

- 《哈里斯上尉给约·罗素勋爵的信(11月24日收讫)》第9号(Captain Harris to Lord J. Russell. 〈Received November 24.〉Nr.9)。——254。
- 《哈里斯上尉给约·罗素勋爵的信(1月25日收讫)》第15号(Captain Harris to Lord J. Russell. 〈Received January 25.〉Nr.15)。——251、273。
- 《哈里斯上尉给约·罗素勋爵的信(2月6日收讫)》第23号(Captain Harris to Lord J. Russell. 〈Received February 6.〉Nr.23)。——274。
- 《考莱伯爵给约·罗素勋爵的信(7月5日收讫)》第2号(Earl Cowley to Lord J. Russell. 〈Received July 5.〉Nr.2)。——271。
- 《考莱伯爵给约·罗素勋爵的信(2月8日收讫)》第28号(Earl Cowley to Lord J. Russell. 〈Received February 8.〉Nr.28)。——273。
- 《1860年2月5日〈日内瓦评论〉摘录》第29号附件2(Extract from the “Revue de Genève” of February 5, 1860. Inclosure 2 in Nr.29)。——275。
- 《格雷先生给约·罗素勋爵的信(1月10日收讫)》第13号(Mr. Grey to Lord J. Russell. 〈Received January 10.〉Nr.13)。——273。
- 《詹·赫德森先生给约·罗素勋爵的信(2月16日收讫)》第34号(Sir J. Hudson to Lord. J. Russell. 〈Received February 16.〉Nr.34)。——273、274。
- 金克尔,哥·《关于德国国民促进革命公债的札记》,载于1852年3月6日《纽约州报》第10号(Kinkel, G.; Denkschrift über das deutsche Nationalanlehn zur Förderung der Revolution. In: New-Yorker Staatszeitung. Nr.10, 6. März 1852)。——412。
- [金克尔,哥·]《哥·金克尔博士1849年8月4日在拉施塔特普鲁士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载于1850年4月5、6日《晚邮报》(柏林)第78、79号([Kinkel, G.]: Vertheidigungsrede des Dr. G. Kinkel vor dem preußischen Kriegsgericht zu Rastatt am 4. August 1849. In: Abend-Post. Berlin. Nr.78, 5. April 1850; Nr.79, 6. April 1850)。——155。
- 金莱克,[亚·威·]《[1860年7月12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0年7月1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671号(Kinglake, [A.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am 12. Juli 1860.] In: The Times. London. Nr.23671, 13. Juli 1860)。——245、288。
- 《切尔克西亚近来的背叛行为》,载于1858年5月12日《自由新闻》(伦敦)第16期(Recent treachery in Circassia.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Nr.16, 12. Mai 1858)。——303。

K

- 卡贝,埃·《伊加利亚旅行记》1840年巴黎版(Cabet, É.: Voyage en Icarie. Paris 1840)。——148。
- 卡拉姆津,尼·《俄国史》1839年巴黎版第11卷(Karamsin, N.: Histoire de Russie. T.11. Paris 1839)。——209。
- 卡斯尔雷,[罗·斯图亚特]《回忆录和书信集》(八卷集),由卡斯尔雷的兄弟查·魏恩编辑,1848年伦敦版第1卷(Castlereagh, [d.i. R. Stewart]: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Ed. by his brother, Ch. Vane. Vol. 1—8. Vol. 1. London 1848)。——482。
- 康德,伊·《实践理性批判》(Kant, I.: Kritik der practischen Vernunft)。——236。
-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公爵签署的为保卫公爵领地华沙、抗击任何一个俄国敌人而在波兰征兵的命令。1814年12月11日于华沙》,引自丹热贝格《波兰签订的条约、协定和外交文件汇编。1762—1862年》1862年巴黎版(Ordre du jour signé par le grand-duc Constantin Pavlovitch, enappelant l'armée polonaise à défendre le duché de Varsovie, s'il était attaqué par un ennemie quelconque de la Russie. Varsovie, le 11 décembre 1814. Nach: D'Angeberg: Recueil des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ctes diplomatiques concernant la Pologne 1762—1862 par le comte d'Angeberg. Paris 1862)。——210。
- 考莱,[亨·理·查·韦·][《1860年4月23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60年4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602号(Cowley, [H. R. Ch. W.]: [Rede im House of Lords am 23. April 1860.]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602, 24. April 1860)。——275。
- 科尔布,古·《声明》,载于1859年11月15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19号附刊(Kolb, G.: Erklärung.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19, 15. November 1859. Beil.)。——189。
- 科拉切克,阿·《叫好的人们》,载于1860年7—12月《时代呼声》第2卷(Kolatschek, A.: Die Juchheisten. In: Stimmen der Zeit. Bd. 2. Juli—Dezember 1860)。——426。
- 科兰,[让·吉·]《社会科学》1857年巴黎版(Colins, [J. G.]: Science sociale. Paris 1857)。——36。

- 科兰, [让·吉·]《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三卷集) 1856—1857年巴黎版(Colins, [J. G.]: *L' économie politique. Sources des révolutions et des utopies prétendues socialistes. T. 1—3. Paris 1856/1857*)。——36。
- 《科隆日报》和《莱茵国民大厅》, 载于1848年11月16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44号(*Die Kölnische Zeitung und die Rheinische Volkshall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44, 16. November 1848*)。——329。
- 科斯塔·德·博雷加尔[《声明》], 载于1860年2月8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39号(*Costa de Beauregard: [Erklärung.]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39, 8. Februar 1860*)。——450。
- 《评价科苏特的材料》, 载于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闻》(伦敦)第5期(*Data by which to judge of Kossuth.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Nr. 5, 27. Mai 1859*)。——301。
- [科苏特, 拉·] [《给格拉斯哥的约翰·麦克亚当的信》] 1859年9月26日于伦敦, 载于1859年10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428号([Kossuth, L.]: [*Brief an John Mc Adam in Glasgow.*] *London, September 26, 1859.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428, 4. Oktober 1859*)。——308。
- 科苏特, 拉·《1851年11月3日在哥本哈根大厦的演说》, 载于《匈牙利执政者路易斯·科苏特阁下的真实生活》1851年伦敦版(Kossuth, L.: *Speech at Copenhagen -House. 3. November 1851. In: Authentic life of his Excellency Louis Kossuth, Governor of Hungary. London 1851*)。——299。
- [科苏特, 拉·]《以匈牙利民族的名义致驻扎在意大利的士兵》, 载于1853年2月1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8号([Kossuth, L.]: *In the name of the Hungarian nation. -To the soldiers quartered in Italy.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48, 10. Februar 1853*)。——300。
- 科苏特, 拉·《致马赛民主派。(1851年9月29日于密西西比号船上)》, 载于阿尔文斯莱本《在维拉戈什投降后的拉·科苏特》1852年魏玛版(Kossuth, L.: *An die Marseiller Democratie. <Bord des Mississippi am 29. September 1851.> In: Alvensleben; L. Kossuth nach der Capitulation von Vilagos. Weimar 1852*)。——298。
- [科苏特, 拉·]《致祖国。1849年8月11日于阿拉德要塞》, 载于泰·拉品斯基《1849年匈牙利主力军的进军》1850年汉堡版([Kossuth, L.]: *An die Na-*

- tion! Festung Arad am 11. August 1849. In: Th. Lapinski; Feldzug der Ungarischen Hauptarmee im Jahre 1849. Hamburg 1850)。——297。
- 克拉普卡, 格·《回忆录。1849年4—10月》1850年莱比锡第1版第1卷 (Klapka, G.; Memoiren. April-October 1849. Bd. 1. Orig.-Ausg. Leipzig 1850)。——310。
- 克劳塞维茨, 卡·冯·《战争论》(Clausewitz, C. von; Vom Kriege.)。——472。

L

- 拉多维茨, [约·玛·冯·][《1848年8月12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8年8月1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76号(Radowitz, [J. M. von]: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12. August 1848.]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76, 15. August 1848)。——341。
- 拉盖罗尼埃, [阿·]德·《皇帝拿破仑第三的政治画像》, 由达-达·路西德译成阿拉伯文, 1860年巴黎版(La Guéronnière, [A.] de: Portrait politiqu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Trad. en arabe par Rochaid Dahdah. Paris 1860)。——258。
- [拉盖罗尼埃, 阿·德·]《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1859年巴黎版([La Guéronnière, Ar. de]: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et l'Italie. Paris 1859)。——258。
- 拉品斯基, 泰·《1849年匈牙利主力军的进军》1850年汉堡版(Lapinski, Th.: Feldzug der Ungarischen Hauptarmee im Jahre 1849. Hamburg 1850)。——218、296、297、309—312。
- 《莱茵河》, 载于1860年5月30日《希望报》(日内瓦)第149号(Le Rhin. In: L'Espérance. Genève. Nr. 149, 30 Mai 1860)。——285。
- 朗金, 卡·《论崇高》(Longinus, C.: De Sublimitate)。——184。
- 李比希, 尤·冯·《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40年不伦瑞克版(Liebig, J. von: 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Braunschweig 1840)。——329。
- 利希诺夫斯基, [费·玛·冯·][《1848年7月25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 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莱比锡版第2卷(Lichnowski, [F. M. von]: [Rede in der Sitzung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25. Juli 1848.]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 M. Bd. 2. Leipzig 1848)。——146。
- 《流言》，载于1849年5月12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96号(Klatsch.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96, 12. Mai 1849)。——322。
- 卢格,阿·《揭露》，载于1853年9月11日《西方先驱报》(路易斯维尔)(Ruge, A.; Enthüllungen. In: Herold des Westens. Louisville. 11. September 1853)。——146。
- 《路易·科苏特和泛斯拉夫主义》，载于1858年11月20日《格拉斯哥哨兵》(Louis Kossuth and panslavism. In: The Glasgow Sentinel. 20. November 1858)。——304。
- 《伦敦鼓动者协会》，载于1851年12月4和5日《德国通讯员》(巴尔的摩)(Der Agitationsverein in London. In: Der Deutsche Correspondent. Baltimore. 4. und 5. Dezember 1851)。——157、158。
- 《伦敦祖国之友协会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民族联盟委员会的公开信》，载于1859年11月23日《新汉诺威报》第544号(Offener Brief der Vaterlandsfreunde zu London an den Ausschuß des Vereins der Deutschen National-Partei zu Frankfurt a. M. In: Neue Hannoversche Zeitung. Nr. 544, 23. November 1859)。——364。
- 《罗马教皇及其强权》，载于1844年4月13日《纪事报》(伦敦)第205期(The Papacy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ablet. London. Nr. 205, 13. April 1844)。——213。
- 罗泰克,卡·冯·《从认识历史的萌芽时期到当代的世界通史,供善于思考的历史爱好者参考》1813—1818年弗赖堡—康斯坦茨版(Rotteck, K. von: Allgemeine Geschichte vom Anfang der historischen Kenntniß bis auf unsere Zeiten, für denkende Geschichtsfreunde bearb. von Karl von Rotteck. Freiburg und Konstanz 1813—18)。——328。
- [洛默尔,格·]《日内瓦席勒纪念会》1859年日内瓦版([Lommel, G.]: Die Schiller-Feier in Genf. Genf 1859)。——127、130、131。
- [洛默尔,格·]《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盛会。(1859年在洛桑举行)》1859年日内瓦版([Lommel, G.]: Das Centralfest der deutschen Arbeiterbildungsvereine in der Westschweiz. (Lausanne 1859.) Genf 1859)。——123—125、262、263、269—270。

M

- 马姆兹伯里, [詹·霍·][《1860年4月23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60年4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602号(Malmesbury, [J.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am 23. April 1860.]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602, 24. April 1860)。——253—257。
- 《马志尼和波拿巴老爷》, 载于1859年6月4日《人民报》(伦敦)第5期(Mazzini und Monsieur Bonaparte. In: Das Volk. London. Nr. 5, 4. Juni 1859)。——256。
- 马志尼, 朱·《战争》, 载于1859年5月2—16日《思想和行动》(伦敦)第17期(Mazzini, G.: La Guerra. In: Pensiero ed Azione. London. Nr. 17, 2.—16. Mai 1859)。——224、256。
- 梅斯特尔, 克·德·《环绕我的房间的旅行》, 选自《梅斯特尔著作集》1847年巴黎版(Maistre, X. de: Voyage autour de ma chambre.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1847)。——335。
- [梅因, 爱·]《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 载于1859年11月3日《自由射手》(汉堡)第132号([Meyen, E.]: Der Prozess Carl Vogt's gegen die Augsburger Allg. Ztg. In: Der Freischütz. Hamburg. Nr. 132, 3. November 1859)。——9。
- 梅因, 爱·《卡尔·福格特与奥格斯堡〈总汇报〉和马克思派的斗争》, 载于1860年2月9、11、14、16和18日《自由射手》(汉堡)第17—21号(Meyen, E.: Carl Vogts Kampf gegen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und die Marxianer. In: Der Freischütz. Hamburg. Nr. 17, 9. Februar 1860; Nr. 18, 11. Februar 1860; Nr. 19, 14. Februar 1860; Nr. 20, 16. Februar 1860; Nr. 21, 18. Februar 1860)。——325、327、498。
- 《民法大全》1830年莱比锡版第1卷(Corpus juris civilis. Hrsg. von C. Otto. Bd. 1. Leipzig 1830)。——339。
- 《民主总同盟会议》, 载于1849年5月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90号((Sitzung des demokratischen Hauptvereins.)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90, 5. Mai 1849)。——324。
- 莫兰, 弗·《文学运动。1860年9月。I—II》, 载于1860年10月14日《星期日邮报》(巴黎)第42期(Morin, F.: Le mouvement littéraire. Septembre 1860. I

—II. In: *Le Courrier du Dimanche*. Paris. Nr. 42, 14 Oktober 1860)。——423—425。

N

拿破仑,波·《拿破仑·波拿巴的机密函件》(七卷集)1819年威尼斯—巴黎版第5卷(Napoléon, B.: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officielle et confidentielle de Napoléon Bonaparte*. T.1—7. T.5. Venise. Paris 1819)。——235。

—《致威尼斯市政委员会。1797年5月26日于蒙特贝洛》(*A la municipalité de Venise*. Montebello, 26 mai 1797)。——235。

《拿破仑第三给国务大臣的信》,载于1860年1月1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5号(Napoléon III: *Lettre de l'Empereur à S. Exc. le ministre d'Etat*.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5, 15 Januar 1860)。——35—37, 57。

《拿破仑第三告驻意大利军队书。7月12日于瓦莱焦》,载于1859年7月1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95号(Napoléon III: *Armée d'Italie. Proclamation. Valleggio, le 12 juillet*.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95, 14. Juli 1859)。——67。

《拿破仑第三和罗马尼亚问题》1859年巴黎版(Napoléon III et la question roumaine. Paris 1859)。——234, 258。

《拿破仑第一告匈牙利人书。1809年5月于申布伦》,载于巴·德·瑟美列《1848—1860年的匈牙利问题》1860年巴黎版(*Proclamation que Napoléon I^{er} adressait aux hongrois de Schoenbrunn, au mois de mai 1809*. In: B. de Szemere: *La question hongroise, (1848—1860.)* Paris 1860)。——234。

《拿破仑法典》1808年斯特拉斯堡版(*Code Napoléon*. Strasbourg 1808)。——5, 360。

《尼斯伯爵领地》,载于1860年1月27日《祖国报》(巴黎)(*Le comté de Nice*. In: *La Patrie*. Paris. 27. Januar 1860)。——275。

《涅谢尔罗德伯爵向女王陛下的政府提交的备忘录》1854年伦敦版第6部分(*Memorandum by Count Nesselrode delivered to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and founded on Communications received from the Emperor of Russia Subsequently to His Imperial Majesty's visit to England in June 1844*. Part. 6. London 1854)。——479。

纽卡斯尔, [亨·] [《1860年1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60年1月25日

《泰晤士报》(伦敦)第 23525 号(Newcastle, [H.]: [Rede im House of Lords am 24. Januar 1860.]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525, 25. Januar 1860)。——50。

P

帕麦斯顿, [亨·约·][《1849 年 7 月 21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9 年伦敦版第 107 卷第 3 部分(Palmerston, [H. J.]: [Rede am 21. Juli 1849 im House of Commons.]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 ser. Vol. 107. London 1849)。——203。

帕麦斯顿, [亨·约·][《1860 年 1 月 25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60 年 1 月 26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3526 号(Palmerston, [H.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am 25. Januar 1860.]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526, 26. Januar 1860)。——51。

佩泰坦, 昂·《论萨瓦的被兼并》1859 年巴黎版(Petétin, An.: De l'annexion de la Savoie. Paris 1859)。——271。

《普鲁士国家刑法典施行法规。1851 年 4 月 14 日》, 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1 年柏林版(Gesetz über die Einführung des Strafgesetzbuchs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Vom 14. April 1851.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51)。——358。

普吕米克, J. C. 《普鲁士皇家炮兵军官手册》1820 年柏林版第 1 部分(Plümicke, J. C.: Handbuch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rtillerie-Offiziere. Th. 1. Berlin 1820)。——119。

Q

乔治三世《关于西班牙人在努特卡海湾夺取船只的电文。1790 年 5 月 5 日》, 载于《截至 1803 年止的英国议会史》1816 年伦敦版第 28 卷(George III: Message respecting vessels captured by Spain at Nootka Sound. 1790. 5. May. In: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1803. Vol. 28. London 1816)。——49。

乔治四世[《关于葡萄牙的电文。1826 年 12 月 11 日》],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27 年伦敦版第 16 卷(George IV: [Message respecting Portugal, 1826, 11. December.]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Vol. 16. London

1827)。——49。

《确实,时间正接近……[通讯]3月23日于德国海德堡》,载于1849年3月28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57号(Wahrlich, die Zeit ist nahe... [Korrespondenz aus]: Deutschland, Heidelberg, 23. März.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57, 28. März 1849)。——107、108。

R

《人民的呼唤和呼唤人民》,载于1850年9月27日《1850年人民报》(巴黎)第26号(L'appel du peuple et l'appel au peuple. In: Le Peuple de 1850. Paris. Nr. 26, 27. September 1850)。——223。

《瑞士联邦委员会致一些国家的照会。瑞士在意大利有可能发生的一场战争中所持的立场。[1859年]3月14日于伯尔尼》,载于丹热贝格《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所签定的条约、协定和外交文件汇编》1859年巴黎版(Note adressee par le conseil federal de la Suisse aux diverses puissances, pour exposer l'attitude que la Suisse se propose de prendre dans l'éventualite d'une guerre en Italie. Bern, 14 mars [1859]. In: D'Angeberg: Recueil des traités, conventions et actes diplomatiques concernant l'Autriche et l'Italie. Paris 1859)。——251。

茹尔当,路·《自然的边界》,载于1860年5月31日《世纪报》(巴黎)第9184号(Jourdan, L.: Les frontières naturelles. In: Le Siècle. Paris. Nr. 9184, 31 mai 1860)。——285。

S

《萨瓦的愿望》,载于1860年1月25日《祖国报》(巴黎)(Les vœux de la Savoie. In: La Patrie. Paris. 25. Januar 1860)。——274。

瑟美列,巴·德·《1848—1860年的匈牙利》1860年伦敦版(Szemere, B. de: Hungary, from 1848 to 1860. London 1860)。——218。

瑟美列,巴·德·《1848—1860年的匈牙利问题》1860年巴黎版(Szemere, B. de: La question hongroise 1848—1860. Paris 1860)。——309。

沙特莱,C.《英国对法国的罪行和过失》1860年里昂版(Châtelet, C.: Crimes et délits de l'Angleterre contre la France. Lyon 1860)。——424。

沙伊伯勒,卡·《有关福格特的小册子。致《每日电讯》编辑》,载于1860年2月15日《每日电讯》(伦敦)第1447号(Schaible, K.: The Vogt-pamphlet. To the

- editor of "The Daily Telegraph". In: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Nr. 1447, 15. Februar 1860)。——197。
- 《商务条约和自由贸易》，载于 1860 年 1 月 28 日《经济学家》(伦敦)第 857 期 (Commercial treaties and free trade.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857, 28. Januar 1860)。——54。
- [施勒弗尔, 弗·威·][《1849 年 4 月 25 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 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 年莱比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8—9 卷 ([Schlöffel, Fr. W.]; [Rede in der Sitzung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25. April 1849.]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 M. Bd. 8.9. Leipzig, Frankfurt a. M. 1849)。——170。
- 叔尔茨, 卡·《[书信。]——给巴黎亲爱的人们。1851 年 4 月 4 日》, 载于 1853 年 11 月 1 日《西方先驱报》(路易斯维尔)(Schurz, C.; [Brief.] An die lieben Leute zu Paris. 4. April 1851. In: Herold des Westens. Louisville. 1. November 1853)。——147。
- 斯特恩, 劳·《特利斯屈兰·善第先生的生平和见解》(Sterne, L.: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332。
- 《4 月 22 日的表决》, 载于 1860 年 4 月 18 日《日内瓦评论和瑞士报》第 98 号 (La vote du 22 avril. In: 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 Nr. 98, 18. April 1860)。——280、281。
- 《所谓的密谋……[通讯][1854 年]4 月 16 日于日内瓦》, 载于 1854 年 5 月 27 日《工人共和国报》(纽约)第 22 期 (Der durch das sogenannte Komplott... [Korrespondenz aus]: Genf, den 16. April [1854.] In: Republik der Arbeiter. New York. Nr. 22, 27. Mai 1854)。——110。
- 《全军宿营……[电讯]1 月 7 日于马德里》, 载于 1860 年 1 月 10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3512 号 (The whole army encamped... [Telegraphic despatches.] Madrid, January 7.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512, 10. Januar 1860)。——43。
- 《索尔费里诺会战。(本报通讯员报道)》, 载于 1859 年 7 月 2、4、7 和 9 日《泰晤士报》(伦敦)第 23348、23349、23352 和 23354 号 (The battle of Solferino.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348, 2. Juli

1859;Nr. 23349, 4. Juli 1859;Nr. 23352, 7. Juli 1859;Nr. 23354, 9. Juli 1859)。——442。

T

陶森瑞,卡·[《致泽登施提克尔公民。1851年11月14日于伦敦》],载于1851年11月29日《巴尔的摩警钟报》(Tausenau, K.: [Brief an den Bürger Seidensticker. London, 14. November 1851.] In: Baltimore Wecker. 29. November 1851)。——158、159。

《条约的信守,缔约的列强和皇帝拿破仑第三》1859年巴黎版(La foi des traités les puissances signataires et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Paris 1859)。——207、208、246。

图沃奈尔,[爱·安·]《外交大臣给法国驻伯尔尼使馆代办的急电。1860年3月17日于巴黎》,载于1860年3月2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82号(Thouvenel, [É. - An.]: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 également adressé la dépêche suivante au chargé d'affaires de France à Berne, Paris, le 17 mars 186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82, 22 März 1860)。——274。

W

瓦尔特(福格尔魏德的)《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诗集》,卡·拉赫曼出版发行,1828年柏林第3版(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Die Gedichte Walthers von der Vogelweide, Hrsg. von K. Lachmann. 3. Ausg. Berlin 1828)。——172。

韦森东克,[胡·][《声明》],载于1849年2月1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19号第1附刊(Wesendonck, [H.]: [Erklärung.]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19, 11. Februar 1849. 1. Beil.)。——168。

维吉齐-鲁斯卡拉,乔·《尼斯民族》1860年尼斯第3版(Vegezzi-Ruscalla, G.: La Nazionalità di Nizza. 3. ed. Nizza 1860)。——277。

[维利希,奥·]《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载于1853年10月28日和11月4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3和34期([Willich, A.]: Doktor Karl Marx und seine Enthüllungen.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 33, 28. Oktober 1853; Nr. 34, 4. November 1853)。——120。

魏德迈,[约·]/[阿·]克路斯/[阿·]雅科比《致〈纽约刑法报〉编辑部。声

- 明),载于1853年11月2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7期(Weydemeyer, [J.]; Cluß, [A.]; Jacobi, [A.]: An die Redaktion der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Erklärung.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Nr.37, 25. November 1853)。——410。
- 《问题的实质。法国—意大利—奥地利》1859年巴黎版(La vraie question. France-Italie-Autriche. Paris 1859)。——206、234、246。
- 《我们很意外地读到……12月5日于日内瓦》,载于1859年12月6日《日内瓦评论和瑞士报》第284号(Nous avons été très-surprise de lire... Genève, 5 décembre. In: 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 Nr.284, 6 Dezember 1859)。——265。
- 沃尔弗,威·《“帝国”追记》,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4期(Wolff, W.: Nachträgliches "aus dem Reich".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York. 1850. H.4.)。——173、179。
- 沃尔弗,威·《声明。1860年2月6日于曼彻斯特》,载于1860年2月11日《改革报》(汉堡)第18号(Wolff, W.: Erklärung. Manchester, 6. Februar 1860. In: Die Reform. Hamburg. Nr.18, 11. Februar 1860)。——129。
- 沃尔弗,威·《声明。1860年2月6日于曼彻斯特》,载于1860年2月13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44号附刊(Wolff, W.: Erklärung. Manchester, 6. Februar 1860.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44, 13. Februar 1860. Beil.)。——129。
- 沃尔弗,威·《声明。1860年2月6日于曼彻斯特》,载于1860年2月24日《人民报》(柏林)第49号(Wolff, W.: Erklärung. Manchester, 6. Februar 1860. In: Volks-Zeitung. Berlin. Nr.49, 24. Februar 1860)。——129。
- 沃尔弗,[威·][《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莱比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9卷(Wolff, [W.]: [Rede in der Sitzung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26. Mai 1849.]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 M. Bd.8.9. Leipzig, Frankfurt a. M. 1849)。——169—170。
- [乌尔卡尔特,戴·]《波兰的新希望》,载于E.塔克尔《政治飞行传单》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1期([Urquart, D.]: The new hope for Poland. In: E. Tucker:

Political fly-sheets. Vol. 2. Nr. 1. London 1855)。——217。

乌尔卡尔特,戴·《屈塔希亚的匈牙利流亡者访问记。科苏特报道》,载于1853年《自由新闻》(伦敦)附刊(Urquhart, D.: Visit to the Hungarian exiles at Kuttayah etc. Correspondence of Kossuth.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1853. Appendix)。——296。

乌尔卡尔特,戴·[《1859年5月9日在伦敦一次集会上的演说》],载于1859年5月27日《自由新闻》(伦敦)第5期(Urquhart, D.: [Rede auf einem Meeting in London am 9. Mai 1859.] In: The Free Press. London. Nr. 5, 27. Mai 1859)。——179。

乌兰德,[路·]《德国国民议会告德国人民书》,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莱比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9卷(Uhland, [L.]: Die 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 an das deutsche Volk.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 M. Bd. 8. 9. Leipzig. Frankfurt a. M. 1849)。——169。

X

西蒙,爱·《德国政治风俗画。福格特先生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载于《现代评论》1860年巴黎第9年卷第2版第13卷(Simon, É.: Un tableau de mœurs politiques en Allemagne. Le Procès de M. Vogt avec la gazette d'Augsbourg. In: Revue contemporaine. 9^e année. 2^e sér. T. 13. Paris 1860)。——153、175、289—292、321。

西塞罗,马·土·《反对卡提利纳的演说》(Cicero, M. T.: Orationes in Catilinam)。——123。

西塞罗,马·土·《论法律》(Cicero, M. T.: De Legibus)。——150。

[希尔施,威·]《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辩护书》,载于1853年4月1、8、15和2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2卷第3—6期([Hirsch, W.]: Die Opfer der Moucharderie. Rechtfertigungsschrift. In: 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 Bd. 2. Nr. 3, 1. April 1853; Nr. 4, 8. April 1853; Nr. 5, 15. April 1853; Nr. 6, 22. April 1853)。——401—409。

[席利,维·]《谎言批发商……[通讯]3月21日于日内瓦》,载于1852年3月25日《瑞士国民报》(巴塞尔)第72号([Schily, V.]: Das Engros-

- Lügengeschäft... [Korrespondenz aus]: Genf, 21. März. In: 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 Basel. Nr. 72, 25. März 1852)。——398。
- 《嫌疑犯处治法。[1858年2月19日]》，载于1858年3月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64号((Loi relative à des mesured de sûreté générale [le 19 février 185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64, 2 mars 1858)。——448。
- 谢努,阿·《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Chenu, A.: Les conspirateur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sidière; les corps-francs. Paris 1850)。——129。
- 《〈新普鲁士报〉上的〈德国的祖国之友〉》，载于1859年11月27日《新汉诺威报》第551号(Die deutschen Vaterlandsfreunde in der Neuen Preußischen Zeitung. In: Neue Hannoversche Zeitung. Nr. 551, 27. November 1859)。——364。

Y

- [《1859年8月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载于1859年8月23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235号([Erklärung des deutschen Arbeiterbildungsvereins in der Westschweiz, August 1859.]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235, 23. August 1859)。——90。
- 《1859年在洛桑举行的瑞士西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盛会》，载于1859年8月3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215号附刊(Das Centralfest der deutschen Arbeiterbildungsvereine in der Westschweiz zu Lausanne 1859. 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Nr. 215, 3. August 1859. Beil.)。——127。
- 《1860年的欧洲。(地图说明)》，载于1859年2月12、1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228、23229号(L'Europe en 1860. <A description of the map.>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3228, 12. Februar 1859; Nr. 23229, 14. Februar 1859)。——204、216、237、240、243、248。
- 《意大利状况。1860年10月8日于都灵》，载于1860年10月15日《现代评论》第17卷(La situation de l'Italie. Turin, le 8 Octobre 1860. In: Revue contemporaine. T. 17. Paris. 15. Oktober 1860)。——258。
- 《英国政治》1860年巴黎版(La politique anglaise. Paris 1860)。——248、249。

Z

- 《这确实是真的……[通讯]11月8日于巴黎》，载于1860年11月12日《曼彻斯

- 特卫报》第 4441 号 (It is perfectly true. . .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November 8. 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Nr. 4441, 12. November 1860)。——425。
- 《政治概况。7 月 13 日于维也纳》, 载于 1859 年 7 月 15 日《布拉格报》第 165 号 (Politische Übersicht. Wien, 13. Juli. In: Prager Zeitung. Nr. 165, 15. Juli 1859)。——247。
- 《祖国在危险中》, 载于 1849 年 4 月 3 日《新普鲁士报》(柏林) (Das Vaterland ist in Gefahr. In: Neue Preussische Zeitung. Berlin. 3. April 1849)。——346。
- 《最新消息》, 载于 1859 年 7 月 22 日《加利亚尼信使报》(巴黎) 第 13876 号下午版 (Latest intelligence. In: Galignani's Messenger. Paris. Nr. 13876, 22. Juli 1859. Afternoon ed.)。——248。
- 《最终结束政变……[社论] 12 月 5 日于日内瓦》, 载于 1851 年 12 月 6 日《日内瓦评论和瑞士报》第 289 号 (La coup d'etat léve tout á fait. . . [Leitart.]: Genève, 5, décembre. In: 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 Nr. 289, 6. Dezember 1851)。——271。

文学著作

A

- 阿布, 埃·《吉耳里教父》。——424、430。
- 阿里斯托芬《云》。——388。
- 《哀诉》, 引自《尼贝龙根之歌》。——261。

B

- 巴尔扎克, 奥·德·《贝姨》。——86。
- 巴尔扎克, 奥·德·《失去的幻想》。——355。
- 巴特勒, 赛·《休迪布腊斯》。——268。
- 柏西阿斯·弗拉克斯, 奥·《讽刺诗集》。——294、329、331。
- 拜伦, 乔·《唐璜》。——135。
- 拜伦, 乔·《墓志铭》。——329。

博雅多,马·马·《恋爱中的罗兰》。——411。

博内留斯,[乌·]《宝石》。——164、272。

D

但丁《神曲》。——102、289。

狄更斯,查·《奥列佛尔·特维斯特奇遇记》。——126。

狄摩西尼《论金冠》。——124。

G

哥特弗里德(斯特拉斯堡的)《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227。

歌德《浮士德》。——127。

歌德《迷娘》。——130。

H

哈特曼·冯·奥厄《伊威恩,或狮子伴随的骑士》(叙事诗)。——261。

海涅,亨·《还乡曲》。——320。

海涅,亨·《科贝斯第一》。——125、172。

海涅,亨·《旅途景色》。——257。

贺拉斯《讽刺诗集》。——74、202、334。

贺拉斯《书信集》。——296。

贺拉斯《颂诗》。——61。

J

《酒鬼》(德国早期的滑稽故事)。——104。

K

卡德龙·德拉巴卡,佩·《神奇的魔术师》。——76、339。

卡蒙斯,路·《卢兹之歌》。——160。

克罗伊策,康·《格拉纳达宿营地》(歌剧)。——328。

L

《老鼠与青蛙之战》。——146。

《路易之歌》。——224、225。

P

平达,彼·《劳兹之歌》。——160、165。

蒲柏,亚·《邓斯之歌》。——322、338。

普劳图斯《迦太基人》。——175。

普劳图斯《虚假》。——397。

S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268。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362。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180、268、331。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88、97—99、108、113、193。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19。

莎士比亚《麦克佩斯》。——91。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331。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84。

苏,欧仁《巴黎的秘密》。——403。

T

塔西佗《维塔·尤利·阿格里科拉》。——377。

唐尼采蒂,加·《贝利萨留》。——135。

W

维吉尔《牧歌》。——135。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363、374、399。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帕威法耳》。——295。

乌兰德,路·《歌手的诅咒》。——171。

X

席勒《唐·卡洛斯。西班牙王子》。——347。

席勒《威廉·退尔》。——91、99、163。

席勒《小溪边的男孩》。——264。

Y

尤维纳利斯, 德·尤·《讽刺诗集》。——95。

雨果, 维·《小拿破仑》。——227、267。

圣经

《旧约全书》

—《摩西一经(创世记)》。——198。

—《摩西四经(民数记)》。——128、334。

—《诗篇(第4篇)》。——95。

—《诗篇(第37篇)》。——95。

—《约伯记》。——158。

《新约全书》

—《马太福音》。——95、97。

报 刊 索 引

A

- 《阿尔高消息报》(Argauer Nachrichten)——瑞士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 1854—1918年出版。——284。
 《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见《总汇报》。

B

- 《巴尔的摩警钟报》(Baltimore Wecker)——美国的一家德文日报, 美国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 1851年由卡·亨·施瑙费尔创办, 1867年停刊。——157—159。
 《巴尔的摩通讯员》(Baltimore Correspondent)——见《德国通讯员》。
 《北部各省和加来海峡通报》(Le Propagateur du Nord et du Pas-de-Calais)——法国的一家日报, 1860—1883年在里尔出版; 持波拿巴派的观点。——285。
 《北方日报。国际述评》(La Gazette du Nord. Revue Internationale)——法国的一家周报, 1859年10月8日起在巴黎出版, 它与法国一致, 支持俄国的外交利益。——93。
 《笨拙, 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 简称《笨拙》, 1841年在伦敦创刊, 主编是威·梅·萨克雷。——324。
 《比尔商业信使报》(Bieler Handels-Courier)——见《瑞士商业信使报》。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比利时的一家日报, 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 最初名称为《独立报》(L'Indépendant), 1843年6月27日改用现名出版; 19世纪中叶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286、421。
 《波罗的海月刊》(Baltische Monatsschrift)——俄国的一家德文月刊, 1859年10月—1913年12月在里加出版; 由泰·伯蒂歇尔和亚·法尔廷创办。——

335。

《波斯特伊里》(Der Postheiri)——瑞士的一家带有插图的讽刺性周刊, 1845—1875年在索洛图恩出版。——285。

《柏林军事周刊》(Berliner Militair-Wochenschrift)——见《德国国防报》。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 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的一家日报, 18世纪初在柏林创刊, 1785—1911年用这个名称出版, 1751年起因报纸所有人是克·弗·福斯而被称为《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 1911—1934年正式用这个名称出版; 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柏林资产阶级温和自由派的观点。——120。

《布拉格报》(Prager Zeitung)——奥地利的一家日报, 1814—1919年出版, 奥地利君主国的机关报。——247。

《布雷斯劳日报》(Breslau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 1820年创刊, 19世纪40年代持自由派观点, 50年代持保守主义倾向。——321、322、323。

C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 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 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 报纸还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Evening Star)。——180。

D

《大胡蜂》(Die Hornisse)——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亨·海泽和克耳纳办的报纸, 1848—1850年在卡塞尔出版, 每周3期; 1848—1849年由埃·比斯康普任编辑; 有时用副标题《黑森俗人报》(Zeitung für hessische Biedermänner)出版。——182。

《德国国防报。德国军官和陆军文官协会出版的军事周报》(Deutsche Wehr-Zeitung. Militairische Wochenschrift herausgegeben von einer Gesellschaft deutscher Offiziere und Militair-Beamten)——德国保守派的一家军事周报, 1848—1854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每周出版两次, 1854—1864年用《普鲁士国防报。军事杂志》(Preußische Wehr-Zeitung. Militairische Zeitschrift)的名称在波茨坦出版。——114。

《德国通讯员》(Der Deutsche Correspondent)——在美国出版的一家德文报纸, 由弗·赖纳于1841年在巴尔的摩创办。——157、158。

- 《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Deutsche Monatsschrift für Politik, Wissenschaft, Kunst und Leben)——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0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51年在不来梅出版;出版者是阿·科拉切克。——161、192、426。
- 《德累斯顿萨克森及德国状况日报》(Dresdner Zeitung für sächsische und allgemein deutsche Zustände)——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12月1日—1850年8月4日出版,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402、409。
- 《东德意志邮报》(Ost-Deutsche Post)——奥地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1848—1866年在维也纳出版。——440。
- 《独立报》(L'Indépendant)——瑞士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周报,1851—1852年在日内瓦出版。——106、393。

F

-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的一家日报,1665年左右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创刊,1684—1903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23—1903年每日出版文学附刊《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 Blätter für Geist, Gemüth und Publizität);19世纪40年代报纸具有温和自由派的倾向;1842—1843年曾多次转载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127、398。
-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见《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G

- 《改革报》(Die Reform)——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1892年在汉堡出版。——73、129、189、496。
- 《格拉斯哥哨兵》(The Glasgow Sentinel)——苏格兰的一家周报,1850年10月5日—1877年12月29日出版;保守党的机关报。——180、304。
-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1850—1855年由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德文报纸,最初是月刊,后改为周报;其宗旨是宣扬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观点。——110。
- 《国家报。帝国报》(Le Pays. Journal de l'Empir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在巴黎创刊;1852—1870年是波拿巴政府的半官方报纸。——288。
-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路·阿·梯也尔、弗·奥·玛·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

(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40年代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斯和路·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316、475。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4月1日—1915年在柏林出版;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后为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1866年以后支持俾斯麦的政策,1870—1871年曾号召兼并法国领土,主张武力镇压巴黎公社。——73、129、138、179、190、193、194、321、322、333、348—350、354、355、357、361—363、369、374、375、377—382、383—385、387、422、425、485、488、498。

H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英国的一家周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刊物;1859—1869年用德文在伦敦出版;出版者为海·尤赫,编辑是哥·金克尔(1859年1—7月)、海·尤赫(1859年7月起)和恩·尤赫(1859—1869)。——11、181、412。

《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德国的一家日报,1792年创刊,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拥护帝国宪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动年代是普鲁士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是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纸。——160。

《湖滨小报》(Seebblätter)——德国的一家报纸,30年代中至1849年在康斯坦茨出版;1836—1848年4月主编是约·菲克勒尔;先是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机关报,后为民主派的机关报。——108。

J

《纪事报》(The Tablet)——英国天主教会的周报,1840年在伦敦创刊。——213。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50年代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292。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刊物;1851年6月—1852年4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厄·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

支持这个杂志,参加它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在周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422。

《加利尼亚尼信使报》(Galignani's Messenger)——法国的一家英文报纸,1814年在巴黎创刊,主要是转载英国报纸上的材料。——248。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54—56、231、493、494。

《军事总汇报》(Allgemeine Militair-Zeitung)——德国的一家军事问题周刊,1826—1902年由德国军官与陆军文官协会在达姆施塔特和莱比锡出版;1860—1864年曾刊登恩格斯的一些文章。——443。

《君士坦丁堡报》(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土耳其的一家法文报纸,1846年创刊,每月出六次;半官方报纸,鼓吹法国在土耳其的影响。——303。

K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后站在民族自由党的立场支持俾斯麦的政策;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11、108、192、194、328—329、335、404、408、421、496。

L

《莱芒湖信使报》(Le Messager du Léman)——瑞士民主派的一家法文日报,1853年起在日内瓦出版。——116。

《莱茵国民大厅》(Rheinische Volks-Halle)——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在科隆出版,1849年10月2日—1859年用《德国国民大厅》(Deutsche Volkshalle)的名称在康斯坦茨出版;具有天主教保守派的倾向。——329。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

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77、174、324。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闻》(Le Constitutionnel. Journal politique, Littéraire, 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1870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86、264、288。

《联邦报》(Der Bund)——瑞士的一家日报，激进派的机关报，1850年起在伯尔尼出版。——91、255。

《联邦射手节通报》(Journal du tir fédéral)——瑞士的一家德法双语杂志，由马·瓦尼在日内瓦出版；支持瑞士的波拿巴派；编辑是皮·雷辛。——394。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法国的一家历史、政治、文学、艺术和经济学问题的半月刊，1828—1944年在巴黎出版。——286。

M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最初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两次，1855年起改为日报。——425。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英国的一家日报，1855—1937年在伦敦出版；起初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从19世纪80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194、196、329—333、337、488。

《每周邮报》(The Weekly Mail)——英国的一家周报，1858—1860年在伦敦出版；保守党的机关报。——331。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鲁·莱克索在纽约创办的德文周报，从1852年3月20日开始出版到1911年12月29日停刊止曾几易其名，1853年3月18日—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此后又先后以不同的名称出

- 版,如《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和《刑法报》(Criminal-Zeitung)等等。——119、302、401—410。
- 《美因茨报》(Mainz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00—1885年在美因茨出版,1848—1849年由路·班贝格尔任编辑。——336。
- 《民论报》(L'Opinion nationale)——法国的一家政治性日报,1859—1874年在巴黎出版;19世纪50—60年代持波拿巴派立场。——248、285、292、430。
- 《民族报》(Les Nationalités)——法国的一家报纸,1860年在巴黎和都灵出版,受卡·加富尔的影响。——292。

N

- 《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10、178、300、303、354、422、423。
- 《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51年创刊。——10。
-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 《纽约州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在美国的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1834年创刊;最初为周报,1844年起改为日报;代表德国流亡者中的自由派的观点,1849—1850年支持伦敦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从50年代中期起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政策。——412。

O

- 《欧洲评论》(Revue européenne)——法国波拿巴派的月刊,1859—1861年在巴

黎出版,1862年与《现代评论》(Revue contemporaine)杂志合并。——287。

P

《普鲁士报》(Die Preuß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51年3月11日在柏林创刊,1858年11月18日以前用《山鹰报》(Adler-Zeitung)这个名称出版;普鲁士保守派的政府机关报。——335。

《普鲁士政治时事问题周报》(Preußisches Wochenblatt zur Besprechung politischer Tagesfragen)——德国保守派的周报,具有右派自由派观点的普鲁士容克小组(周报派)的机关报;1851—1861年在柏林出版。——210。

《普特南氏月刊。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Putnam's Monthly. A Magazine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美国的一家杂志,1853—1857年在纽约出版;共和党的机关刊物。——423。

Q

《青年意大利》(La Jeune Italie)——法国的一家日报,由马志尼及其追随者在巴黎创办,1843年起出版,1859年6月4日更名为《意大利战争》(La Guerre d'Italie);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机关报。——212、213。

R

《人民报》(Das Volk)——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工人团体的机关报;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由埃·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从6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为报纸的编辑,并于7月初接任该报的领导;编辑部成员有比斯康普、威·李卜克内西和弗·列斯纳等。——11、14、89、181—184、192、195、254、256、326、327、355、365、366、368、418、420、431、432。

《人民报》(Volksblatt)——德国的一家日报,在特里尔出版。——289。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一家日报,1853年4月9日—1904年6月30日在柏林出版。——73、129、189、323、496。

《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2年5月由厄·琼斯在伦敦创刊;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并对报纸的编辑工作给予帮助;周报除刊登马克思和

- 恩格斯专门为之撰写的文章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在这个时期,报纸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日益接近,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撰稿并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6年6月报纸转入资产阶级实业家手中。——10、180、414、422。
- 《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Journal de Genève national,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瑞士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26年起在日内瓦出版。——398。
- 《日内瓦评论和瑞士报》(Revue de Genève et Journal Suisse)——瑞士的一家日报,1842—1861年用这个名称出版,第二帝国时期持波拿巴派的观点;1861年与《瑞士民族报》(La Nation Suisse)合并后用这个名称出版,并附有副标题《瑞士日内瓦评论》(Revue de Genève Journal la Suisse)。——265、267、271—272、275、275—283、286、318。
-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瑞士的一家日报,1842—1858年由雅·克·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1849年主编是小沙贝利茨;报纸采取民主主义立场;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398。
- 《瑞士联邦报》(Eidgenössische Zeitung)——瑞士的一家日报,1845—1860年在苏黎世出版,1860—1864年在伯尔尼出版;19世纪50和60年代持波拿巴派的立场。——255。
- 《瑞士民族报》(La Nation Suisse)——瑞士的一家激进派日报,1860—1866年在日内瓦出版。——286。
-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Courier)——瑞士的一家日报,1853—1909年在比尔出版,出版者是恩·许勒尔;19世纪50和60年代持波拿巴派的立场;卡·福格特参与报纸的部分编辑工作;马克思讥称该报为“推销员”。——77、89、182、185、198、270、276、282、286、354、414、486。

S

- 《萨瓦爱国者》(La Patriote savoisien)——法国民主派的日报,1851—1895年在尚贝里出版。——270。
- 《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51—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编辑是戴·乌尔卡尔特;该报多次刊登马克思的文章。——181。
- 《社会辩论报。民主派机关报》(Le Débat social, organe de la démocratie)——比

- 利时的一家周报,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的机关报,1844—184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421。
-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 《石印通讯》(Lithographirte Correspondenz)——法国的一家德文报纸,1845—1849年在巴黎出版。——263。
- 《时代呼声。政治和文学月刊》(Stimmen der Zeit. Monats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德国的一家月刊,后为小资产阶级的周刊,1858—1862年由阿·科拉切克在哥达出版,后来在魏玛、莱比锡、海德堡和维也纳同时出版。——192、426。
-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1939年在巴黎出版,1870—1871年间曾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9世纪40年代代表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97、269、285。
-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英国的一家半月刊物,1858年9月—1860年5月在伦敦出版,1860年6月起在卢加诺和热那亚出版,编辑是朱·马志尼。——224、256、305。

T

-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瓦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瓦尔特第二,约·瓦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47—52、57、212、213、229、250、253、274、278、300、328、418、442、443、461、503。
- 《天主教、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联盟报》(L'Univers et l'Union catholique, religieux, philosophique, politique, scientifique et littéraire)——法国教权派的报纸,1833年在巴黎创刊;19世纪50年代报纸支持波拿巴派。——97。

W

- 《晚邮报》(Abend-Post)——德国的一家日报,它的前身是《民主报》(波罗的海守卫者)的续刊,1850年1月改名为《晚邮报》在柏林出版;直至1850年3月底,报纸附有《民主派报纸》(Demokratische Zeitung)这个副标题,由爱·梅因、尤·孚赫和约·普林斯-斯密斯编辑出版;支持自由贸易派的观点,有时具有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倾向;1850年7月因同年6月颁布的普鲁士新闻出版法而停刊。——82、155。
- 《万茨贝克的使者》(Der Wandsbeker Bothe)——德国的一家日报,1770—1775年由马·克劳狄乌斯在汉堡出版。——328。
- 《沃州新闻和瑞士民族报》(Nouvelliste Vaudois et Journal national Suisse)——瑞士的一家日报,1798—1804年和1824—1914年在洛桑出版。——277、292。

X

- 《西方先驱报》(Herold des Westens)——美国的一家德文周报,1853年9月初在路易斯维尔创办,出版者是J. B. 霍洛赫,编辑是卡·海因岑;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报。——146。
- 《西里西亚报》(Schle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42—1945年在布雷斯劳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立宪君主派的机关报;19世纪60年代是保守派报纸。——323。
- 《希望报》(L'Espérance)——瑞士的一家波拿巴派的报纸,1859—1862年在日内瓦出版,1862年起用《北方和独立》(Le Nord et l'Indépendance)的名称在巴黎出版。——284—286、292。
- 《现代评论》(Revue contemporaine)——法国的一家半月刊,1851—1870年在巴黎出版;第二共和国时期(1852年4—8月)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组成的秩序党的机关刊物;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刊物;爱·西蒙是编辑部成员之一(1859—1860)。——93、153、178、258、286、289—291、321。
-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它的前身是《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1849年4月—1855年底在布雷斯劳出版,编辑是莫·埃尔斯纳、尤·施泰因和约·泰梅;具有民主派左翼的立场,支持布雷斯劳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从而成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被普

- 遍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其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是路·海尔贝格；1855年该报曾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55年12月31日停刊。——323、352。
-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Deu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7月1日—1849年4月1日在达姆施塔特出版，4月1日以后至1850年12月1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编辑是奥·吕宁(1849年10月1日以前)、格·君特和约·魏德迈(10月1日以后)；报纸持左派民主主义立场，1848—1849年在魏德迈的影响下接近《新莱茵报》，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后因编辑被驱逐出境而被迫停刊。——156。
- 《新汉诺威报》(Neue Hannover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汉诺威政府的机关报；1858年1月1日—1883年在汉诺威出版。——364。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11、91、107、130、164—168、174、226、321—324、328、338、349、353、362、367、373、378、381、421。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139、150、151、155—157、162、173、179。
-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容克和宫廷奸党的喉舌；1848年6月在柏林创刊；创办人是恩·路·格尔拉赫和汉·胡·克莱斯特-雷措，编辑是海·瓦盖纳(1848—1854年)；报纸的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1939年停刊。——129、145、168、334—336、345、346、364、365。
- 《新瑞士报。政治、科学和艺术周刊》(Neue Schweizer Zeitung. Eine Wochen-

- schrift für Politik, Wissenschaft und Kunst)——瑞士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周刊, 1859—1860年由德国流亡者奥·布拉斯在日内瓦出版。——264—265。
- 《新时代》(Neue Zeit)——美国的一家德文周刊, 1855—1857年由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在纽约出版。——144。
- 《新时代。民主派机关报》(Die Neue Zeit. Organ der Demokratie)——英国的一家周刊, 1858年6月—1859年4月在伦敦出版;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报。——181。
-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icher-Zeitung)——瑞士的一家日报, 1780年起在苏黎世出版, 1821年起用德文出版;19世纪50和60年代持波拿巴派的立场。——277。
- 《星期日邮报》(Le Courier du Dimanche)——法国的一家周刊, 1858—1866年在巴黎出版, 持反波拿巴派的立场。——423—425。
-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 《喧声》(Kladderadatsch)——德国的一家带有插图的讽刺性周刊, 1848—1944年每周日在柏林出版;最初具有极左派倾向, 后来持反动派的观点。——324。
- 《喧声》(Rummelpuff)——瑞士的一家周报, 在瑞士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爱·罗森布鲁姆、麦·科恩海姆和西·路·波克罕于1849年底在日内瓦创刊;该报只出了两期。——80、81、94。

Y

- 《演员》(The Players)——英国的一家戏剧和音乐周报, 1860—1861年在伦敦出版。——331。

Z

-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的一家日报, 1789年在巴黎创刊, 1814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1849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70—80年代报纸具有保守主义倾向。——286。
- 《政治、文学、科学和技艺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英国的一家保守派周刊, 1855—1938年在伦敦出

版。——279、330。

- 《知识界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Leser)——德国的一家日报,1807年由约·弗·科塔创刊,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最初的名称为《知识阶层晨报》(Morgenblatt für gebildete Stände);报纸在1817—1849年出版附刊《文学报》(Literatur-Blatt),1830年起附刊主编是沃·门采尔;1837—1865年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1827年起报纸主编是海·豪夫;报纸在1826—1840年还出版夜刊《知识界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Leser),其间1826—1838年是用《知识阶层午夜报》(Mitternachtzeitung für gebildete Stände)的名称出版;1835年起主编是爱·布林克迈尔。——176。
-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德国的一家周报,1825—1878年在汉堡出版,主要刊登戏剧评论和文学评论;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9、10、325—328、498。
-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英国的一家报纸,1855—1865年由戴·乌尔卡尔特及其追随者在伦敦出版,1858年4月以前是周刊,后改为月刊;该报刊登一些有关外交政策问题的文章,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多次发表马克思的文章。1866年更名为《外交评论》(Diplomatic Review)。——10—13、180、187、189、193、194、300—303、356、382、416、431。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3、9、12、13、73、90、111、127、129、131、162、174—178、184、185、186、189—194、196、197、198、254、263、265、289、326、335、348—352、356、357、361—366、368、374—376、416—418、421、431、432、439、440、444、465、485—488、495、496。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最初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报纸》(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35、168、200、225、231—234、259、425。

《祖国报。商业、农业、工业、文学、科学和艺术报》(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de l'agriculture, de l'industrie,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在巴黎创刊;1850年报纸支持秩序党的保皇派选举联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274、287、288。

地名索引

A

- 阿尔卑斯山脉 66、68、201、222、
232、447—449、451—458、461、
464、466、469—472、474、475。
- 阿尔贝格 460。
- 阿尔贝维尔 66、456、461、462。
- 阿尔本加 467、470。
- 阿尔比昂(英国古称) 116。
- 阿尔汉格尔斯克 440。
- 阿尔河 276、460。
- 阿尔赫西拉斯 28。
- 阿尔及尔 105、258。
- 阿尔及利亚 31、46、58、258、444、
500、502、506。
- 阿尔及利亚海岸山区 44。
- 阿尔克河 452、453、455。
- 阿尔克河谷 457。
- 阿尔萨斯 221。
- 阿尔沃河 91、461。
- 阿尔沃河谷 451。
- 阿弗尔(勒阿弗尔) 396。
- 阿富汗 50、501。
- 阿杰尔比 303、304。
- 阿卡迪亚 123、135。
- 阿拉德 297。
- 阿拉贡 466。
- 阿利马河 266。
- 阿罗纳 442。
- 阿讷西 461。
- 阿真泰拉山口 452、468。
- 埃尔伯费尔德 168。
- 埃尔迈拉 412。
- 埃格尔河 221。
- 埃及 203、204、235、243、248、259、
479。
- 埃奇河(阿迪杰河) 6、203、464。
- 埃斯林根 185、283、284。
- 埃希特纳赫 335。
- 艾蒂安——见圣艾蒂安。
- 艾克斯莱班(艾克斯) 252、254。
- 爱丁堡 130。
- 爱尔福特 17。
- 爱森纳赫 344。
- 安哈尔特 240。
- 安特卫普 141、229、327、353。
- 安扎斯卡河谷 464。
- 敖德萨 78。
- 奥登林山 95。
- 奥地利(奥地利帝国) 5、15、17—

- 19、61、62、138、139、170、178、179、
186、188、194、199—207、209、211、
213—220、222—226、228、230、
231、234、235、237—248、251、252、
254—256、258、263、269、276、282、
283、286、309、333、342、401、415、
425、429、439—442、458、459、474、
476—478、481—483。
- 奥尔布河 460。
- 奥尔登堡 240、248。
- 奥尔米茨 18。
- 奥格斯堡 3、9、12—14、76、82、174、
175、177、183—185、188—190、
192、193、321、352、361、364、374—
376、417、431、444、465、485、488、
495、496。
- 奥内利亚(因佩里亚) 66、464、467。
- 奥帕瓦(特罗保) 482。
- 奥斯塔(河谷) 456、464、466。
- 奥斯坦德 327。
- 奥斯特利茨 62、229、441。
- 澳大利亚 36、81、133、228。
- B**
- 巴登 10、17、61、78、80、103、137、
169、242、402、409、472。
- 巴登-巴登(巴登) 430。
- 巴伐利亚(拜恩) 59、61、62、170、
222、242、357。
- 巴拉塔里亚 161、347。
- 巴黎 5、6、15、35、53、78、81、83、84、
86、90、93、94、108—114、117、121、
135、136、144—146、153、159、162、
175、177、200、203、205—207、214、
226、229、232、234—236、246、249、
250、252、258、263、270、271、274、
276—279、285—288、290、293、
294、300、302、305、313、315、316、
319、337、350、351、353、356、367、
381、383、401、403—405、409、420、
421、425、430、446—448、452、458、
472、480。
- 巴伦西亚 466。
- 巴拿马 424。
- 巴纳特 238。
- 巴塞尔 67、111、119、120、202、395、
396、398、441、451、452、458、461、
463。
- 巴斯洛内特 452。
- 白河 47、51。
- 北海(德意志海) 18、240。
- 贝宾根 334。
- 贝尔博河 470。
- 贝纳丁 252。
- 贝桑松 90、105、108、139—141、
456。
- 比尔 88、89、139、185、270、276、277、
282、486。
- 比尔湖 459、460。
- 比利牛斯山脉 466、469。
- 比利时 56、136、137、182、215、229、
243、248、249、285、353、421、448、
472。
- 比伦 460。

- 比萨拉比亚 210、238、477。
 比亚韦斯托克省 482。
 彼得堡(圣彼得堡) 180、181、265、
 335、480。
 宾根 89、117、293。
 滨海阿尔卑斯山脉 464、466、469、
 470。
 波恩 89、116。
 波尔多 40。
 波河 67、178、439、464、471、474。
 波兰 11、75、181、206、207、210、213、
 215—217、219、221、222、224、236、
 303、341、478、480。
 波罗的海 240。
 波美拉尼亚(波莫瑞)(地区) 222。
 波森(波兹南) 216、218、243。
 波士顿 101。
 波斯(伊朗) 48、50。
 波斯尼亚沃 458。
 波斯尼亚 245。
 波希米亚 220—223、239、243、244。
 伯尔尼 103、106、132—134、174、
 182、198、249、252、255、257、261、
 264、265、272—275、277—280、
 282、316、317、320、393—398、426、
 459、462。
 伯尔尼汝拉山区——见汝拉山。
 柏林 73、78、114、119—122、129、
 130、155、178、183、189、221、302、
 321—323、333—335、343—346、
 348、349、351、354、357、358、361、
 366、367、369、375、388、407、408、
 424、425、441、485、488。
 勃兰登堡 78、222、223。
 勃朗峰 66、451、461。
 博登湖 276。
 博尔米达河 469、470。
 博法洛拉 443。
 博洛尼亚(波伦亚) 445。
 博讷维尔 461。
 卜利达 504。
 不来梅 121、146、401。
 不列颠——见大不列颠。
 不列颠群岛——见大不列颠。
 不伦瑞克 240、248。
 布加勒斯特 210、212、238。
 布科维纳(地区) 238。
 布拉格 221。
 布赖顿 405。
 布赖斯高 242。
 布雷根茨 252。
 布雷斯劳 78、116、166、169、322、
 323。
 布里扬松 451、455。
 布龙采尔 15、18。
 布鲁赫萨尔 81。
 布鲁塞尔 136、137、229、353、421、
 422。
 布鲁瓦河 460。
 布洛涅 84、235。
- C
- 长江(扬子江) 23。
 措恩多夫 125。

D

达姆施塔特 169, 443。

达普谷地 250, 251。

大不列颠(不列颠, 英格兰, 英国)

14, 15, 20—22, 24—27, 47, 49—
56, 64, 75—77, 81, 102, 110, 136,
137, 145, 150, 154, 163, 181, 182,
197, 199—205, 207, 208, 229, 230,
233, 236, 255—257, 259, 274, 282,
299, 304—308, 329, 330, 349, 383,
403, 424, 425, 476, 479, 480, 491,
492, 495, 505, 506, 509, 515。

大圣伯纳德山口 67, 251。

大西洋 15, 152, 163。

大沼泽 460。

代戈 469。

代蒙特 465。

邓迪 90, 92。

丹吉尔 32, 33, 46, 504。

丹麦 137, 180, 482。

得土安 31, 33, 44—46, 499, 500,
502—504。

得土安河——见舍卢河。

德国 德意志(北德意志, 南德, 南德
意志) 3, 6, 9, 10, 13, 15—19,
58—62, 74, 75, 78, 79, 97, 98, 101,
107, 108, 113, 126, 129, 136—138,
140, 150, 155, 160, 162, 166, 178—
180, 188, 200, 214, 216, 217, 220—
224, 228, 233, 234, 237, 239—249,
257—260, 263, 268, 269, 281,

283—285, 289, 302, 317, 328, 338,
341, 350—354, 363, 367, 370, 379,
380, 384, 405, 413, 417, 421, 423,
439—442, 449, 458, 473—479, 481
—484, 505—507, 520。

德累斯顿 169, 221, 403, 409。

迪尔 517。

地中海 42, 152, 203, 204, 206, 208。

蒂尔西特(苏维埃斯克) 477, 478,
482。

蒂罗尔 7, 205, 223, 464。

蒂涅河谷 457。

东欧——见欧洲。

东普鲁士——见普鲁士。

东印度——见印度。

都灵 66, 68, 106, 256, 258, 273, 274,
293, 307, 309, 449, 452, 456, 467,
469, 471, 474, 508。

杜塞尔多夫 406。

敦刻尔克 451。

多拉巴尔泰阿河(多拉河谷) 252,
448。

多拉里帕里亚河 448。

多瑙河 213, 215, 311, 477, 478, 482,
483。

多瑙河谷 222。

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 瓦拉几亚)
209—212, 214, 234, 237, 238, 477。

E

俄国 俄罗斯 18, 19, 25, 50, 58, 93,
140, 169, 179—181, 199, 200,

202—225、230、236—238、241、
244、245、298、304、317、423、426、
429、475—484。
厄尔士山脉 240。

F

法国 法兰西(高卢) 5—7、15、26、
27、35—39、56、57、59、60、64—68、
74—77、79—81、84—86、101、
112、113、134、136—140、163、172、
174、178、179、199—201、203—
209、211、212、214、215、220、224—
228、230—237、239—241、243—
249、251—256、265—268、271—
277、280—285、287、289—291、
293、298、299、319、349—351、353、
362、363、367、370、379、380、383、
384、421、423、424、439—442、
446—454、458—460、462、463、468
—480、483、491、492、509、510、520。
法兰克福——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非斯 33。
非洲 42、140、204。
菲希特尔山 240。
费尔德基希 252。
费拉拉 445。
费内斯特雷莱 251、259、455。
芬兰 211。
弗赖堡(弗里堡) 67、102、104、105、
319、460、461。
弗赖堡(布赖斯高) 173。
弗劳施塔特 78。

弗雷瑞斯 451。
弗利 445。
伏伊伏丁那(地区) 309。
符腾堡 61、117、125、242、284。
福尔马扎河谷 464。
福建 23。
福克沙尼 210。
福西尼 64、255、273、274、276、280、
450、461。
阜姆 307。
富尔卡山口 462。

G

盖米山口 462。
干地亚岛 479。
高加索 58。
格拉鲁斯 459。
格拉斯哥 10、237、308。
格赖夫斯瓦尔德 78。
格劳宾登(州) 133、459、464。
格勒诺布尔 455。
格里斯山 464。
格洛高 78。
贡比涅 230。
广州 51。

H

哈根 347。
海德堡 107、166。
汉巴赫 114。
汉堡 9、73、139、218、328、401、409。
汉诺威 125、128、129、170、186、215、

240、242、248、381。

汉普斯特德 176。

荷尔斯泰因——见石勒苏益格—荷
尔斯泰因。

荷兰 6、229。

黑林山 158。

黑森-达姆施塔特 61、242。

黑森-卡塞尔(黑森选帝侯国) 15、
17—19、138、240、242、335。

黑森 16、248。

华沙 214、215、476、477、482、483。

华盛顿 410。

霍杰日 222。

J

基尔肯尼 244。

基希海姆 162。

基希海姆博兰登 337。

基耶塞河 444。

吉森 171、176。

加来 285。

加雷西奥 467。

加利福尼亚 36、151、228。

加利西亚(地区) 216—218、220、
221、223、244。

加泰罗尼亚 466。

交趾支那 225。

教皇国 225、445。

旧普鲁士 242、243。

君士坦丁 46。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211、
212、214、215、238、239、301—304、

327、477—479。

K

卡博内格罗山 44。

卡博内格罗海角 44。

卡尔卡雷 467。

卡尔斯 181、236。

卡尔斯鲁厄 402。

卡夫里亚纳 442。

卡萨莱 442、456、471。

卡塞尔 182。

卡斯蒂利亚(地区) 41。

卡斯蒂列霍斯(伯爵夫人兵营)
43—45。

卡韦尔尼奥河谷 464。

卡宴 84、448。

坎波福米奥 6、245。

康斯坦茨 458。

科隆 11、77、100、108—111、117、
119—122、130、138、145、150、166、
176、290、325、328、329、350—352、
356、381、401、403—409、421、497。

科迪勒拉山脉 168。

科蒂安山 464、466。

科尔尼什 467。

科莫恩 218、296、302、309、312。

科莫湖 252。

科斯维希 409。

克恩滕山(卡林西亚) 222。

克拉科夫 206、207、225。

克里木 8、58、79、210、234、267。

克罗地亚 309、442。

库内奥(科尼) 467。

L

拉巴特 33。

拉布 310。

拉腊什(阿拉伊什) 33、46、504。

拉芒什海峡 183、204、355、448。

拉姆贝萨 448。

拉施塔特 103、155、158、412。

拉韦纳 445。

莱昂 41。

莱巴赫(卢布尔雅那) 482。

莱比锡 78、98、169、310。

莱克吕兹堡 451、461。

莱芒湖(日内瓦湖) 79、276、314、
460、461、463。

莱茵巴伐利亚——见普法尔茨。

莱茵河 27、68、91、96、178、201、215、
232、233、243、245、246、248、249、
255、262、276、284—286、288、
439—441、445、451、462、472、
474—477、479、483。

莱茵省 莱茵区(莱茵普鲁士) 莱茵
莱茵地区 62、78、110、117、156、
169、242—244、247、248、283、285、
360、430、435、444、477、483。

赖讷克 458。

兰开夏郡 53、517。

朗格勒 472。

朗勒堡 455、457。

劳特堡 221、451。

劳西茨 222。

雷根斯堡 221。

里昂 449、453、456。

里夫山区 44。

里马索姆巴特 311。

里米尼 450。

利伯罗瑟 222。

利珀河 241。

利斯河谷 464。

利物浦 92、163。

联合王国——见大不列颠。

林堡 289。

林茨 221。

卢塞恩 462。

卢库斯河 33。

卢瓦尔河 39。

路易斯维尔 146。

吕本 222。

伦巴第 7、8、65、203、204、212、245、
247、256、441、445、446、459、465、
469、470、476。

伦敦 3、9—14、35、53、73、76—78、
82、90、92、99、105、107、109—112、
114、122、123、129、132、134、135、
137、138、143、145—147、154、155、
157、159、174—177、179—185、188
—194、196、197、204、207、215、218、
230、231、280、293、298—300、
302—304、306—308、325—327、
329、330、332—335、338、349、
351—354、356、363—365、367、
374、376、378、381、383、400—402、
404—410、414、415、418、421、422、

430、431、485、486、488—490、503。
罗马尼亚 234、237—239。
罗马涅(地区) 7、212、445、474。
罗纳河 461。
罗纳河谷 461。
罗萨泰 443。
罗亚河 465。
洛阿诺 469。
洛梅利纳 442、443、450。
洛纳托 444。
洛桑 123、125、127、128、185、190、
262、268、270、327、365、456。

M

马尔默 165、342。
马尔克 343、345。
马耳他 203。
马拉加(省) 44。
马伦戈 456。
马赛 298。
马斯河(默兹河) 472。
马真塔 59、62、443、444。
曼彻斯特 23、80、129、142、183、
186、307、351、354、355、495、498。
曼丘河 460。
曼图亚 5、445。
麦迪亚 504。
玫瑰峰 464。
梅克伦堡 237、240、242、248。
梅克内斯 33。
梅莱尼亚诺 443。
梅泽里茨(州) 222。

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北美) 10、20、
22、36、49、54、74、81、90、102、107、
108、136、141、143、145、146、151、
152、158、159、162、163、173、182、
211、229、299、301、302、315、348、
409、410、412、422、423、506。
美因茨 240、336。
美因河 240、241。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7、18、130、
139、156、164—167、169、172、173、
262、291、325、333—335、339、341、
342、345、346、404、488。
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南美) 124、
135、148、151、168。
蒙勃朗省 450。
蒙费拉 450。
蒙梅利扬 453。
蒙热内夫尔(蒙热内夫尔山口)
452、455、457。
蒙塔博尔山 452、455。
蒙特贝洛 442。
蒙特内格罗山 43、44、502、503。
蒙特诺特 469。
米德尔塞克斯(郡) 419。
米莱西莫 469。
米兰 235、282、300、443、470。
明乔河 6、178、341、439、440、444、
474、476。
明斯特 6、345。
明斯特 458。
摩德纳 7、8、203、445。
摩尔多瓦——见多瑙河两公园。

摩加多尔 33、504。
 摩拉维亚 220—223、239、243、244。
 摩洛哥 28、33、41、204、499、502—504。
 莫德林(新格奥尔吉耶夫斯克) 215、482。
 莫尔多瓦河(伏尔塔瓦河) 221。
 莫列讷 64、450。
 莫斯科 93。
 慕尼黑 79、221、505。
 穆尔滕 102、104—108、127、350、381、399。
 穆捷 66、457。

N

那不勒斯 91、203、204、212、445、474。
 纳沙泰尔——见诺因堡。
 纳沙泰尔湖(诺因堡湖) 459、460。
 纳瓦里诺(皮洛斯) 212。
 纳瓦山口 467、468、470。
 南安普敦 298、299。
 南锡 139、141。
 内茨河(诺泰奇河) 222。
 内格罗谷地 43。
 尼斯 64—68、106、178、246、248、255—258、271、273、275、276、279、288、435、446、449、450、452、464、466、468—472、474、476、481。
 尼翁(诺伊斯) 293。
 涅米罗夫 210。
 纽伦堡 173、221、505。

纽约 83、110、120、141、152、159、303、383、401、409、410、412、422。
 诺曼底群岛 448。
 诺瓦拉 443。
 诺因堡(纳沙泰尔) 67、250、251、267、283、284、461。

O

欧洲(东欧,中欧,西欧) 6—8、15、26、27、58、66、75、135、151—153、178、179、188、199、200、202—205、207—213、215—217、222、228、230—232、234—236、240、246、248、257、259、266、271、273、281、301、307、445、459。

P

帕尔马 7、8、203、445。
 帕莱斯特罗 443。
 帕耶讷(彼得林根) 461。
 佩斯(布达佩斯) 306、309、429。
 皮埃蒙特 65、67、203—206、212、238、244、251、439、445—452、464—471、474、476、507。
 皮亚琴察 442。
 葡萄牙 49、50、152、229。
 朴次茅斯 509。
 普法尔茨(莱茵巴伐利亚) 92、162、169、402。
 普芬斯特魏德 165。
 普拉洛尼昂山口 457。
 普隆比耶尔 230、256、257、270、

276。
 普鲁士(东普鲁士,西普鲁士) 7、
 15—19、27、59、60、62、73、119、
 120、122、123、138、139、146、156、
 168、199—202、206、207、214—
 217、222、223、225、228、230、239—
 248、250、259、269、286、340、346。
 普吕姆 92。
 普罗旺斯 156、448、465、466。

Q

齐尔河 459—461。
 奇维塔韦基亚 225、226。
 切尔克西亚 180、218、223、302—
 304、309。
 切斯特 145。
 切瓦 467。
 钦博拉索山 168。
 屈洛兹 252、254。
 屈塔希亚 219、298、300。

R

热安峰(吉甘特峰) 452。
 热那亚 66、258、450、464、467、469、
 470、509。
 热内瓦(山) 64、274、280、450、461。
 日本 20。
 日内瓦 67、76—80、83、89—97、
 104—106、110—113、115—117、
 119、127、128、130、134、162、176、
 179、180、188、197、199、249、252、
 255、261、264、265、270、271、274—

276、278—281、283、284、292、296、
 307、312—320、349、351、356、362、
 365、369、382、392—395、397—
 401、426、431、449、458、459、461、
 462。

日内瓦湖——见莱芒湖。

汝拉山(伯尔尼汝拉山区) 67、451、
 459—461。

瑞典 236、508、509。

瑞士 64、65、67、68、74—81、89、92、
 103—106、113、123、126、127、132、
 134、136—138、144、154—156、
 163、173、182、229、250—257、263、
 265、266、268—283、293、301、316、
 320、349、363、365、369—372、383、
 392、393、395—400、448、450—
 452、458—463、472。

S

撒丁 8、64、65、67、225、229、236、
 253、254、258、271—275、283、285、
 445、450、453、461。

撒哈拉 撒哈拉沙漠 343。

萨尔茨堡 222。

萨克森 215、223、240、242、248、402。

萨莱 504。

萨朗什 461。

萨讷河 459、461。

萨托里(平原) 235。

萨瓦(北萨瓦,南萨瓦) 64—68、79、
 106、178、246、248、253—258、270、
 273—276、279—284、288、313、

- 317、320、435、446、448 —463、467、
468、472 —476、481。
萨沃纳 467、469、471。
塞尔维亚 212、245。
塞尔沃 464。
塞格丁(塞格德) 297。
塞尼山 塞尼山口 66、251、259、452、
454 —457、464、467。
塞拉略 28。
塞塞勒 461。
瑟堡 307。
森瑟河 459。
沙布莱(地区) 64、255、273、274、
276、280、450、461。
沙弗卡雷山 457。
沙隆 229。
沙泰勒圣但尼 460。
上恩加丁 133。
上海 51。
上萨瓦 64、450。
上塞西亚河谷 464。
上士瓦本 242。
上韦德罗河谷 464。
尚贝里 64、66、252、254、450、453、
455、467。
绍斯波特 517。
舍卢河(得土安河) 33、41、44、499、
501。
设菲尔德 10、181、414。
申布伦 234。
圣艾蒂安(艾蒂安) 248。
圣巴泰勒米(河谷) 457。
圣伯纳德 454、457。
圣伯纳德大道 452、457。
圣弗朗西斯科 440。
圣哥达山口 459。
圣赫利尔(圣埃利耶) 144、219。
圣伦纳兹 187。
圣马丁 501、502、504。
圣莫里斯堡 457。
圣佩拉日耶(监狱) 356、404。
圣然戈尔夫 460、462。
圣让-德莫里耶讷 457。
圣约翰伍德 187。
施潘道(柏林) 165。
施普雷河 333。
施普吕根山口 252。
施泰尔阿尔卑斯山脉——见阿尔卑
斯山脉。
施泰尔马克(施蒂里亚)(州) 222。
施图拉河(施图拉河谷) 252、259、
452、465、469、470。
施托尔普(斯武普斯克) 222。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
格, 荷尔斯泰因) 18、81、92、214、
240、477、482。
士瓦本 284、334。
斯德哥尔摩 335。
斯蒂维耶雷堡 444。
斯拉沃尼亚 309。
斯特拉斯堡 81、84、108、227、235。
斯图加特 173、185、265、290、480。
四森林州湖 272。
松德里奥 450。

苏格兰 304、307。
苏黎世 6、7、107、129、133、154、155、
158、175、185、462。
苏萨 455。
苏伊土地峡 204。
索博尔奇 429。
索尔费里诺 59、60、62、444。
索尔焦 468。
索霍区 12、191、194、195、417、418、
432。
索洛图恩 461。

T

塔郎泰斯(地区) 64、450。
塔纳罗河 468、470。
塔纳罗河谷 467、469、470。
太平洋 152。
泰尔米尼翁 457。
泰梅什堡 238。
泰晤士河 329。
泰辛河 252、439、443、464、470。
泰辛州 283、449、459。
特拉布宗 303。
特兰西瓦尼亚 238、309。
特里尔 86、90、288、430。
特罗保 482。
滕达山口 66、452、465、467—470。
图尔比戈 443。
图尔高(州) 174、250、271。
土耳其 180、212、214、219、224、236、
240、243、298、300—302、399、476、
477、479。

土伦 235、468。
托恩 339、374。
托莱多 41。
托农 278、280、461、462。
托农湾 279。
托斯卡纳 7、8、272、445。

W

瓦尔代克 240。
瓦尔德锡河谷 466。
瓦尔河 464、468。
瓦格河 311。
瓦格拉姆 62。
瓦克斯霍尔姆(韦格霍尔姆) 509。
瓦拉几亚(地区)——见多瑙河两公
国。
瓦利斯州(瓦莱州) 67、458、461、
462。
瓦隆区 448。
瓦特州——见沃州。
万茨贝克 325、328。
威尼斯 8、153、203、204、234、235、
256、446、449、474、476、481。
威尼斯省 235、446、464。
威斯贝奇 299。
威斯特伐利亚 242—244、247、339、
347、446。
维拉戈什 309。
维拉弗兰卡 206、446。
维勒讷沃 459、460。
维罗纳 203、211、443、465、482。
维亚马拉山口 252。

维也纳 8、130、147、183、202、214、
217、221、230、309、310、329、334。

韦尔切利 443。

魏克瑟尔河 215、216、222、478、
479、483。

文德 222。

沃韦 459、460。

沃州(瓦特州) 67、277、293、459—
463。

乌迪内 464。

乌尔姆 441。

乌里 394、459。

X

西班牙 31、32、33、41、42、49、152、
154、204、211、229、339、445、467、
469、499—501、503、504。

西部海岸 469。

西里西亚 215、221—223、323、367。

西西里岛 西西里 203、204、316。

西欧——见欧洲。

西普鲁士——见普鲁士。

西蒂(伦敦西蒂区) 77、231、330、
332。

希腊 50、211、212、332。

锡格马林根 172。

锡耶纳 450。

席尔达 321。

下萨瓦 64。

下瓦利斯 459。

香港 335。

小圣伯纳德山口 452、454、456、

458、461、467、471。

辛普朗山口 辛普朗 251、274、461、
464。

新维德 315。

匈牙利 11、13、75、95、167、169、180、
187、188、217—221、224、231、234、
238、243、244、263、296—306、308、
309、312、341、426、429、431、476—
478、480、482。

休达(塞卜泰) 28、31、32、33、41、
42、44—46、499—502。

叙利亚 203、204。

Y

雅典 212。

雅斯特罗夫 222。

亚琛(艾克斯拉沙佩勒) 110。

亚德里亚海 307、444。

亚德湾 206、240。

亚历山德里亚(省) 67、442、456、
467、468、470、471。

亚平宁山脉 467。

亚平宁半岛 470。

亚洲 20。

耶路撒冷 148、288。

耶拿 62、166、441。

伊奥尼亚群岛 203。

伊德施泰特 81。

伊夫雷亚 456。

伊克尔恩 339、340、346、347。

伊斯拉山 66、457。

伊特鲁里亚 265、272、446。

伊万城(登布林) 215、482。

伊韦尔东 460。

伊泽尔河 455。

伊泽尔河谷 452、453、461。

易北河 221、222。

意大利 5—8、11、18、26、27、58、
65—68、75、85、91、146、152、178、
179、186、199—201、203、209、212、
213、215—217、220、226、228、
231—235、237、241、243、244、252、
257、258、262、266、271、282、283、
299、300、341、342、374、400、421、
423、439—441、445、446、449、450、

452—454、458、459、468—475。

印度(东印度) 21、24、31、58、203、
204、231、501。

英格兰——见大不列颠。

英国——见大不列颠。

于斯河 461。

Z

泽西岛 110、144、383。

直布罗陀(海峡) 33、204。

中国 20—24、26、47、48、50、51。

中欧——见欧洲。